

目 录

忘忧草.....	(1)
春之烦恼.....	(102)
黑十字架.....	(170)
热 土.....	(269)
在水一方.....	(297)
追花人.....	(368)
生物圈.....	(526)

忘忧草

安得萱草，种于北堂，以忘其忧。

——引自《野客丛书》

有朋自远方来

一列自北京发出的特快列车驶出天下第一雄关，扑向寥廓的松辽大平原，像摇鬣长嘶的骏马奔驰在鲜花点缀的春天的原野上。

时交五月底，说是春天，在时令上已经说不过去，而北方的春天又实实在在总是迟到的。

如果有人能跟得上火车行进的速度，他一定会发现，软卧车厢有一扇车窗始终开着，有一个穿西装的中年人身子微微前倾，右臂伏在茶桌上，半个头探出窗外，强风撩乱着他的头发，白纱窗帘不时地遮住他的脸。他一直以这没有变化的姿势瞩目着急速旋闪而去的村镇、田野……像一尊大理石雕像。

让我们研究一下他的身份，探讨一下他的内心世界吧。

软卧列车员是当外宾接待这位单身旅客的。这不会错，在北京上车时，中国海洋石油开发公司的人送他上了车，并亲自向列

车员交代过：他是日本一家海上石油钻探公司的地质师，这次是随同日本石油代表团来华，共同商讨开发中国近海大陆架油田的。他这次离京去海滨城市 D 市，并非为了公务，而是得到特许的一次私人旅游。在别人看来，这是不用解释都自然成理的，从 1931 年到 1945 年，在那场灾难与浩劫中，除了被蹂躏的中国人而外，那些被驱赶到东北这块净土上实行“王道乐土”开发的大和子民们，在“8·15”的惨败后，不是扔下过很多的亲人吗？

然而，这位一直缄默少言的地质师，血管里流淌的却没有一毫升大和民族的血液，他是地道的中国人，而且不是华侨，也不是海外华裔。

五月的风，卷起从绿草如茵的大地上散发出来的春天气息，还夹杂着一股清淡的幽香。

这是什么花的香气？

地质师那僵直的姿势变换了一下，他的头又向窗外探出了半尺，眉宇间流露出深沉的爱恋，或许更多的是慨叹。那双眼角有了扇形细纹的眼睛，蒙上了一层透明的泪水，但他却没有让其肆意地淌下来。

他看见了什么？啊，碧青的原野，弥漫着一层金黄的花，简直是铺天盖地。

其实这花普通得很，没有人采集它去充案头清供；没有哪个文学家、诗人在它身上做文章。通观浩如烟海的古诗中，能查到吟咏牡丹、菊花、梅花、桂子的诗何止万首，吟诵这种黄花的却几乎没有。

忽然，一个女人清亮圆润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这是从记忆底层泛起来的声音：“哦，这花吗？植物志上称它为金针菜，属百合花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只知道年年采它炸酱菜的农民叫它黄花菜；《诗经》上的叫法要文雅得多，叫谖草、葍草，也写成萱草；最有意思的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有人叫它做宜男草，又

叫忘忧草。我这学医的却不理解，这种花草还有忘忧的疗效！如果真有这个价值，它有一天会比金刚石还要贵重，说不定会成为金融世界的储存单位了呢！”

在地质师心底储存这声音的人叫赵蓓，是19年前在一起春游时说的。那时，她这个刚刚考上医学院的姑娘还没有订婚，如果不是地质师的情操高尚，她本来可能嫁给他的。但，这一切都成为过去了。他一点都不嫉妒，他成全了赵蓓同宫震遥的爱情。宫震遥也是地质师中学时代的密友。

地质师有点奇怪，为什么一踏上家乡的土地，赵蓓会第一个从记忆的深水里浮出来呢？是因为她那娇小、秀气的脸，那双永远含笑和深沉的眼睛吗？

他自己也不明白。思维，有时候也不见得受自己的指挥。

他把目光从车窗外连绵不绝的忘忧草的海洋里收回来，一声长叹，把摆在茶桌上的一本影集打开来。

影集的扉页有一张海滨生活照，是一群被憧憬未来炽热的火烧得不能自制的青年男女。那是1961年盛夏时节，他们在D城虾须湾礁石前拍的照，一共有7个人，5男2女，全是高中时代的同窗好友。

地质师仿佛又听到了故乡虾须湾震耳的潮声，潮声中夹杂着一片洋溢着青春活力的笑声。

啊，那鼻梁卡着金丝镜架、有着一副沉静面孔的纤细青年，就是宫震遥。他有思想，嗅觉敏锐，办事执拗，从来都穿得齐齐整整，哪怕在海滨游玩时拍摄下的镜头，他那学生制服仍然连领钩都是挂好的，一如他处事那样严谨。

他身旁的李纯就不一样了，这个大块头的运动健将只穿着游泳衣，头上罩一顶白底红杠的游泳帽，挎着一个橡皮圈，嘻天哈地的样子……

李纯背后是号称“校花”的梁小星。她虽说戴着一副几乎遮

去半个脸孔的深色墨镜，却仍旧能使人辨得清那张惊人美丽的脸。她天真欢快地笑着，抱着照相机（不，他清楚地记得，那不过是相机的空壳），几乎半躺在另一个斯文得多的女同学怀中。这个女同学就是姣小漂亮的赵蓓，人如其名，她脸颊上永远保存着一丝甜蜜的笑意，像是就要开放的蓓蕾。那双会说话的眼睛大得出奇，即便在伏夏的烈日下，也没有眯起来。

在赵蓓身后，是一个胖瘦适中的青年，风度翩翩，他一只脚随意蹬在多孔的礁石上，搭在腿上的一只手，拿着一卷子书。我们的地质师在时隔 19 年后的今天，仍能回忆得出，那是一本古希腊哲学大师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物理学后诸篇（形而上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天生具有哲学家禀赋的人，苏格拉底、柏拉图、康德、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笛卡尔以及后来的黑格尔、费尔巴哈，这些哲学界的先驱们的名字和格言，常常是他言必称、行必效的楷模。他本来叫郭福临，后来在高中毕业前夕，改名为郭亚笛，在亚里士多德和笛卡尔的大名中各取一个字，以示景仰。1966 年，他又顺应潮流，改叫郭四新。应当承认，郭福临是个聪明好学的人，虽然有点锋芒外露。

在郭福临的脚下，坐着地质师本人，他叫闻非。他看到自己 19 年前那穿着对襟褂子的形象时，差不多要哑然失笑了。他是惟一质朴得有点像古董的人，在这张照片里显得极不和谐。

还有一个人，是侧着身子弯腰照的，好像在沙滩上挖掘到了什么宝贝。严格说，他不像是这张照片的摄取对象，倒仿佛是无意间把他拍进来的。这个人叫许炎，他是班级里的老大哥，其实大也大不到哪儿去，比那些同班同学不过年长一岁罢了，可是这一岁却充分显示出了级差和分量。许炎为人持重，不好动，文体活动他都不喜欢。高中毕业那年，若不是梁小星偷着把男生用的 500 克的手榴弹偷换成女生用的 300 克的，他的体育课非不及格不可，那才糟糕，体育难道也能补考补及格吗？

闻非望着这张被逝水流年带走了理想、欢乐的照片，心潮久久不能平静。19 个年头过去了，他们都不再是天真烂漫、对未来抱有惹人发笑理想的青年了，如果他们都还安然无恙地活在祖国的这块土地上，他们该都是工程师、哲学研究员、主治医生或著名体育教练了吧？是的，“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这些接近不惑年龄的人，应当成为社会中坚，这个年龄真正才是出成绩的黄金年月，它一扫青年人切实际的幻想和幼稚的一面，又没有进入到使人昏聩、心灰意冷，只图安静地度过晚年的老年时期，他们是支撑时代的栋梁。

闻非盼了多年的事情，终于在他出生的这块净土上破土动工了！当闻非远在樱花异国从卫星电视上收到祖国要搞四个现代化的消息时，他按捺不住狂跳的心，他看到了这个东方古国正在上升的太阳！

从前，他记得古诗里有一句，叫做“人到中年万事休”，他感到不能苟同，人到中年正是为国家民族出力的好时光，不是万事休，倒应当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如今，这鼓满中年人生活风帆的东风已经从祖国土地上吹起，闻非是怀着这样一种特别的心情申请回到哺育他长大的 D 城来旧地重游的。

D 城是一座美丽的海滨城市。闻非在它的怀抱里，做过童年时代五光十色的梦，度过了青春时代最甜蜜的时光。D 城绕城而过的大金河，像一条源远流长的乳腺，把知识、营养供给每一个在 D 城长大的青年。他对 D 城的感情是深厚的，永远不能忘怀的。

但是，伴着幸福，也常有辛酸和痛苦。从这个意义上说，幸福与辛酸几乎总是一对双胞胎，同时来到你的身边。一想起十几年前 D 城出现过腥风血雨，闻非感到一阵阵切肤之痛。他应当怎样评价昔日的功罪呢？茫然！包括他本人的去处远走他乡，虽然时过 7 年，他都无法拿出来放到真理的天平上去准确地衡

量。但他却时时不忘用良心的天平去衡量。

他再次拿起照片，端详着每一张充溢着英风豪气的面孔。忽然，他的目光盯住背橡皮圈的李纯，心里咯噔一下，仿佛冷冻了。啊，不可能见到所有的旧日同学了！李纯早已不在人世，7年前，在“希望号”远洋货轮的桅顶，你不是亲眼看到，船员们抬着在冷藏室里冻僵了的李纯，将他浑身上下缠满了白布，用跳板掀到汹涌的太平洋里水葬了吗？

泪水模糊了闻非的视线，他再没有勇气把目光对着那一双天真无邪的眼睛了。他的心多年来一直没有安静过。对李纯的死，他知道自己应负什么责任，他是教唆犯、是杀人犯，是把李纯驱赶到死亡胡同里的坏蛋！

李纯在D城是有妻子的，还有一个儿子。“希望号”船上惨剧发生的时候，李纯那年仅1岁的儿子还在襁褓中，如今，该是挎起书包走上学堂的年龄了，他是否知道自己有过那样一个善良而又乐观的父亲？李纯的妻子秦淑颖可能早已另嫁他人了，我这样突然出现在她们母子面前，会不会搅乱她们早已恢复平静的生活？

闻非困惑地掩起面孔，他的胸口隐隐作痛。

也许是不该回来的，为了重温自己过去的梦，再把自己所爱的朋友们推到往事的痛苦中去重新熬煎一回，这不是太残酷了吗？

闻非感到周身发热，脸颊烧得不行。他甩掉外衣，顺手打开了壁上的电风扇，任那旋转着的凉风吹着胸膛。

忽然，一阵风把影集又掀开来，把那张海滨合影掀落地上，露出了照片后头插着的一支压扁了的花朵标本。

闻非把它轻轻拈到手中，这是一支忘忧草，原来金黄的花瓣被岁月洗淡了颜色，变得枯干、黝黑，同任何枯草一样，没有半点香气了。

这朵花，是平生从不喜欢花草的宫震遥送给他的。

……

闪电、雷鸣，天下着瓢泼大雨，料峭的春风把雨丝吹斜，利箭一样打在人的脸上。在 1973 年晚春一个凄风苦雨的夜晚，闻非和李纯蜷缩在空旷的、被潮声吞没了的荒海滩上，望着远处码头下一闪一闪的航标灯。那是即将起锚东渡日本的一艘万吨远洋货轮“希望号”。

“希望号”上有希望吗？天晓得。

这两个青年知识分子，到了绝望的地步了，他们在等宫震遥。要么去坐牢，要么出逃，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竟没有为他们提供一平方米的立足之处。他们自认为不是民族的败类，不是祖国的叛逆者。那时，闻非心中的希望灯火像大海航标灯一样，在愁雾和凄雨中一闪一烁、忽明忽灭，渺茫得很，但他有一个信念，总有一天，母亲会原谅他的孩子。

在他们上船偷渡之前，宫震遥冒雨赶到了荒海滩。他没有带雨伞，雨水顺着他头顶浇下来。他脸色铁青，但却像平日一样沉着，甚至带有一种视死如归的神情。

闻非扑过去抱住宫震遥，一句话没说，涕泪交流。

李纯粗声地说：“你这个书呆子，真沉得住气，我们还以为你不会来了呢！”

宫震遥低沉地说：“来是要来的，是为你们送行。我决定不走了。”

闻非和李纯都吓了一跳，愣住了。不走意味着什么？等待他的命运只能是走向监牢！他们三个人是在中央文革挂了号的现行反革命，是江青、张春桥亲笔批示“迅速侦破，严加惩处”的要犯。一个月以前，当他们把 50 封匿名信投寄中央各机关、中央政治局所有成员以后（天晓得那些靠了边的委员们能否看到），公安部在 3 天之内派了第三批、120 名侦破人员，蜂拥 D 城，一个

星期内在 D 城建立了三千多个群众破案小组，这震惊 D 城的“4·15”案件已经叫那些胆虚的人睡不着觉了。

终于，漫天撒下的大网向宫震遥、闻非头上收拢过来。幸亏赵蓓得到了消息，及早告知了闻非，他们才决定趁大网没有出水之前，冲突出去。

谁想到宫震遥会中途变卦呢？

“希望号”拉起了汽笛，粗犷而低沉的吼声像举哀的低音圆号，久久地在黑沉沉的海面上回荡。

闻非如大梦初醒，疯狂地叫着：“不！就是拖，也要把你拖到船上去！我们不能看着你一个人代人受过。”

膀大腰圆的体育学院大力士李纯应声走上来，只轻轻一夹，就把宫震遥夹到了右肋下，打算向“希望号”靠拢。

宫震遥低沉地吼了一声：“放开我！”

这声音浸透了权威感和不容置疑的命令语气。出于平时对宫震遥五体投地的尊重，李纯松了手。

宫震遥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雨水，低哑而沉痛地说：“你们走吧，也许历史会证明你们无罪。我要留下来，应当有人铤而走险。历史上凡是要干成一点事业，总要付出一点血的代价，流了产的戊戌变法，不也要有六君子的喋血吗？”

闻非和李纯都忍不住痛哭失声了。

宫震遥从来没有感情用事过，包括他做错了的事，也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办事不但看到现实，而且总是不忘回顾历史，从历史的后院摘取相近的事例供自己选择。他在同学中所以享有别人所没有的威信和声誉，很重要的因素在于他的稳重和说一不二，不说则已，一说则必做到底，言必信，行必果，对孩子都从不失信。闻非记得有这样一件小事：1971年夏天，他和宫震遥到老同学许炎家里去做客，正赶上许炎在打点行装要出海远航，他那5岁的小儿子明明吵着要同爸爸一起出海，许炎只好哄骗明

明说：“听爸爸话，爸爸这次不能带你，你看，宫叔叔来了，他明天带你坐船上青岛！”

明明不哭了，放开了爸爸，又来纠缠宫震遥。宫震遥抚摩着孩子的头说：“好孩子不哭，明天叔叔带你去青岛就是了，上栈桥，看水族馆，比咱这好玩儿多了。”

在场的人，都以为宫震遥不过是哄哄孩子罢了，哪会认真？

没想到第二天清早，宫震遥拿了两张四等舱的船票来接明明逛青岛了。弄得许炎的老婆陈含英哭笑不得，百般不让：“你这人，这么认真？你们大学教员只有7天暑假，又要去写教材备课，怎么能任孩子性呢？”

宫震遥一笑说：“答应孩子的事就得照办，对孩子尤其不能说半句谎话，他们不是照着大人的样子学做人吗？这道理，古代的曾子都懂，曾子的老婆哄骗孩子，说：等你父亲回来给你杀猪吃，曾子回来，果然操刀宰猪，为了取信于孩子嘛！”

宫震遥就是这样一个人，方正、严谨甚至有点迂腐的人，朋友们都说他这是学历史的结果，谁知是不是呢？

面对他这样一个人，闻非知道，是难夺其志的，他既然已决心不走，你即使把他绑在轮船螺旋桨上，他也一定会像铁锚一样牢牢地抓住海底。

他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又分开了。也许是生离死别，人世茫茫，有谁能料到后事呢。

就在分手的时候，宫震遥默默地从怀里拿出一朵花来，花朵沾着雨珠，黄灿灿的，这正是家乡野草坪上到处都有的金针花啊！要知道，宫震遥向来不喜欢花草，有一回，淘气的梁小星故意要破破他的“怪癖”，抱了家里的一盆夜来香，悄悄放到宫震遥的单身书房桌上，使人一进屋就得抽几下鼻子，那花儿实在太香了，尤其是夜阑人静的时候，空气都被染得香醇无比。

可是，宫震遥把花盆搬到走廊上去了。

不能想像，宫震遥这样严谨得有些过分的人会拿一朵花为朋友的远行送别。

宫震遥仿佛意识到了闻非在想什么，他自语似地喃喃说：“这不是花，是忘忧草。记得叶梦得有两句诗说：白发萱堂上，孩儿更共谁？古人把萱草——也就是忘忧草——比做母亲。游子在外远游，采一束萱草供在北堂，时刻不忘母亲，也可以使人忘掉过去的忧伤……带上它吧。”

7个年头在风风雨雨中流失了，宫震遥那深情的送别话，一直令闻非长思绵想，正如同这支枯干了的忘忧草始终带在他身边一样。

啊，7年前那凄风愁雨的海滨之夜，7年前那种种说不清的苦恨，总算过去了。如今，又到了故乡黄花耀眼的季节，他回来了，回来了。

母亲毕竟是母亲，她将怎样张开温暖的双臂来欢迎海外游子的归来啊！

热泪又一次打湿了闻非的衣襟。

等待他的不都是快乐

黄昏时分，特快列车驶抵终点站D城。闻非已经透过车窗软纱帘望见了大海，大海碧沉沉的，涂上了一层金色的落日余晖。

他提着一只黑皮箱，一走下车门，狠命地吸了一口饱含紫丁香花气的空气。站台上的紫丁香开得正浓。

从前他熟悉每一块方砖、每一根天桥栏杆的火车站变了，变得使他陌生起来。这里重新修了地下道，从前的旧车站推倒了，又新建了一座具有浓厚民族风格的候车大厦，两侧有斗拱飞檐的对称钟楼，时针正指向6点。

正在闻非目不暇接的当儿，软列服务员引着一个穿一身中山装的中年人向他走来，中年人背后跟着一个苹果脸的姑娘，看那神态，像是来迎接他的。

果然，中年人笑容可掬地停在闻非五步开外，苹果脸的姑娘走上来，用不很流利的日语问道：“先生，您是从北京海洋石油公司来的日本客人吗？”

不知为什么，闻非的脸呼地一下红了，一直热到耳后。

他很不高兴，甚至有点气恼，就用汉语回答道：“谢谢，我不用翻译，因为我是中国人。”

小翻译怔了，绯红了脸，更像一个红香蕉苹果，她马上掉过头去看那中年人，她以为接错了人。但她随即发现客人的皮箱上有一行电化铝烫金字：日本海洋钻探株式会社。她更奇怪了，没有接错啊，他为什么一定要说自己是中国人呢？

可惜，无论闻非，还是来接站的中年人，都无暇理会女翻译的惊诧，这两个人在互相审视，双方脸上的惊愕和犹豫神色，竟然持续了好几分钟。

闻非认出了这个代表外办来接他的人，正是他的老同学郭福临，不，他早改名叫郭亚笛了，哦，是郭四新！是的，没有错，虽然7年过去了，他还是那么洒脱、有气度，难怪从前同学们取笑他是“英俊小生”。你看，他那光泽不减当年的一头黑发，仍是驯服地向两边分开，也可能稍稍打了点发蜡，亮闪闪的。他那对漂亮的眼睛，高而直的鼻梁，白白净净的脸孔，都一如从前。所不同的，他手上不再拿着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后诸篇（形而上学）》，但天生哲学家的禀赋好像还在。令闻非感到迷惑不解的是，自称“哲学构成我灵魂”的郭福临，怎么会抛弃哲学这个行当，搞起了送往迎来的外事活动了呢？

在闻非相面似的看着郭福临的时候（请原谅，还是听他的原名舒服些），郭福临脸上的莫名惊诧感，要比闻非来得强烈十分。

先前，他以为见鬼了！在7年前那场令人怵目惊心的“4·15”案件事发后，风传闻非投海自杀了，而且有物证。许炎的老婆陈含英是造船厂的技术员，她有一天把闻非穿过的一只破皮鞋拿了来，叫同学们认，说是从港口海面上捞上来的。同学们都无言对泣起来（当然许炎和赵蓓例外），因为谁都记得这双青年式的猪皮鞋，是闻非从高中一直穿到大学，又补了补丁穿到海上石油研究所的惟一的一双皮鞋。

那么，闻非是投海自杀无疑了。为此，由郭福临出面，把泡得像胖头鱼的破鞋拿到了市公安局。从那以后，印着闻非免冠照片的通缉令才算在10万份上卡住，不再翻印了。

郭福临万万想不到，闻非还活着，而且在7年后，会以外宾的身份出现在人们久已把他忘却的D城。

郭福临觉得闻非苍老多了。他们同龄，都是39岁，可看上去，闻非像是45岁开外的人了，方脸膛比从前要黑得多，额头深深地横着三条老纹，甚至鬓角已经有了隐隐约约的白发。

不管时光给人留下什么样生理上的印记，郭福临还是一眼就认出了这个老同学。

僵持了一阵之后，两个人几乎同时向前跨了两步，同时伸出了双手，异口同声地喊出了“是你——”的字眼儿。

郭福临哭了，闻非也是热泪盈眶。

郭福临双手按在闻非的肩膀上，偏着头打量着闻非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这是人生不可抗拒的哲学！想不到，在我们老同学为你的亡灵祈祷的时候，你却悄悄地爬到海洋油田地质师的宝座上去。生活啊，常常同人们开着这种带眼泪的玩笑……”

几句话说得闻非心里发热，他说：“你这个哲学家，三句话不离本行，言语之中，还是带有明显的哲理性。”

郭福临双手一摊，又潇洒地大笑起来：“我只能是业余哲学

家了。人生像逆水行舟一样，打偏了一桨，你的船就可能远离你所向往的目标，这叫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你想不到的，我现在是‘外办’的工作人员了。”

说罢，他转身对呆愣在一旁的小翻译说：“来，介绍一下，这是刚从日语系毕业分到‘外办’来当翻译的余小光。唉，这回你失业了，你看出来了么？这位闻地质师是我从小朋友！”

余小光的苹果脸绽开了天真的笑容。她对这对久别重逢的老朋友说：“闻地质师的名字常听郭处长，不，常听他讲，太巧了……咱们是不是该出站了？”不知为什么，她的脸又红了。

郭福临含笑点头：“可不是？旅客都走光了。”

闻非有点奇怪，这小翻译和她的处长有什么微妙关系？初次见面，他当然不好问。

三个人向贵宾室走去，余小光替闻非提着黑皮箱。

闻非问郭福临道：“噢？你当上了处长？”

郭福临笑道：“滥竽充数，大概你没有料到吧？每个人，在人类的社会这只巨掌里，不过是一团可以捏圆也可以搓扁的泥巴，你成为什么形状，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也许郭福临说的话有点哲理吧，闻非咀嚼着，望着轿车窗外闪过的街树、广场在沉思。

郭福临急于想知道闻非是怎样出国、又是怎样实现了海上石油地质师的梦，衣锦还乡的。

为了不使自己的话太外露、太唐突，郭福临用自言自语的口气说：“15世纪文艺复兴时代的代表人物达·芬奇曾经说过：‘……能够直接找到泉水的人，就不应该再去找水缸了。’他又说：‘科学是船长，实践是水手。’我应当祝贺朋友，你是被正确罗盘带到生活和科学海洋去的幸运水手，你是找到了科学甘泉的人，你的经历，一定不比哥伦布寻找到新大陆更平坦吧？”

闻非回过头来，望着他那张能流出许多格言和哲学词汇的

嘴，轻轻地一笑。这笑里面，使人感到有一种无法形容的苦味。他暂且还不想回答，因为这也确非一两句话所能说清楚的。

为了礼貌，闻非只说了这样一句：“出于一种偶然吧。我不懂哲学，这大概也有点哲理。在一切偶然当中寓有必然。古人说，树高千丈，落叶归根，这又是必然的。”

郭福临被他惹笑了：“你居然成为哲学家了！其实，哲学与自然科学是近缘血统，大科学家亚里士多德、布鲁诺、哥白尼，他们本身就是哲学大师嘛。”

闻非没有心思再扯这些不感兴趣的玄学，他急于要知道几个老同学如今的下落，可不知为什么，他几次话到嘴边，又都噎了回去。他的心情恰似在一片有过油层显示的茫茫海上，钻探船开到了预测海域，地质师要下令抛锚打下第一钻，需要科学，更需要勇敢，这第一钻下去，可能探到油层，也可能打到干硬的岩石上，今天，科学还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那么，人世间的种种事情，不是常常比科学更费琢磨吗？

可是，尽管提心吊胆，总是迟早要问的，他单身离开代表团来到 D 城，除了梦萦情牵的朋友们，还有什么值得他留恋呢？

为了不太意外地过重地打击他那本来已经支离破碎的心，他打算笼统一点发问。唉，该死的郭福临，他本来应当逐一介绍的，可此时他的注意力仿佛根本不在这上面。

于是闻非问道：“怎么样？我们的七君子还都好吗？”

“七君子”是当年宫震遥开玩笑的称呼，那是因为他们 7 个有志青年经常聚会，谈谈国事，颇有点“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样子。

郭福临喟然长叹一声，说：“每个人都面临着交叉路口，有时是自己选择路途，有时却是一种莫名其妙的社会力量把你推向某一条道路。真的，有时回顾起来不可思议，有时却又觉得不足为怪……”

又是一套漫无边际的哲学式的开头！闻非有几分焦急地皱起了眉峰，幸而郭福临很快切入了正题：“老夫子发迹了，还记得咱们的许炎大哥吗？去年年底，他当上了船舶研究院的研究员，大概是研究员中惟一没有白头、没有秃顶的，不过，也秃了一半了！他是破格提拔，前年他参加了北京的科技大会，好像发表了一篇什么核动力的论文，一鸣惊人了，近视镜已经增加到1 200度，不信，你站在他一米以外，他都认不出你来。”

闻非轻轻嘘了口气：“陈含英呢？她还在造船厂吗？”

郭福临道：“她还在船厂，提了工程师，一个研究，一个制造，他们相处得好极了。梁小星说他们是先结婚后恋爱，真有点说对了。满40岁的人了，孩子都14岁了，有一次我在虾须湾陪外宾，碰上这两个宝贝，竟然像热恋中的情人那样，手勾着手，肩靠着肩，别人会误认为他们在海滨度蜜月呢，哈哈……”

闻非也不由得发自内心地笑了。听他言语中带出了梁小星，就想问问她的情况。梁小星是个又稚气、又骄傲的姑娘，在“七君子”中，她是最小的一个，是大家宠爱的小妹妹，包括她轻浮、喜欢恶作剧这些明显的缺陷，都能被大家所容忍，没有人不喜欢她。梁小星多才多艺，会使好几种弦乐，有一副清脆甜润的嗓子，高中毕业的前夕，她突然声明，不随赵蓓报考二类，放弃了进医学院当“白衣天使”的志愿，却非要考音乐学院，去当未来的歌星不可。她这个动议，曾经遭到所有朋友的反对。宫震遥是迂阔的书生，他认为“人不能凭父母遗传下来的好嗓子生活”。老大哥许炎说得要婉转得多，他说：“艺术天才也是难能可贵的，唱歌能鼓舞人的精神，可是救不活一个病人，连桑菊感冒片的作用都顶不上。”于是人们大笑起来。但是，也有人支持她，那就是郭福临，他替梁小星辩护说：“17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培根曾经说过：‘人是人自己的上帝。’我们谁都没有权力替小星选择未来，她自己才是自己的上帝。”

后来，梁小星凭她的优美的音色，如愿以偿地考取了音乐学院声乐专业，沉浸在五线谱那蝌蚪状音符的乐趣中。从那以后，梁小星突然倾心于哲学家郭福临了。为了这事，“七君子”还专门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当然不包括当事人郭福临和梁小星），大家感到郭福临在用他自己的风度、容貌和才智向梁小星施放“情箭”，罪责不能归咎于天真无邪的梁小星。在这一点上，郭福临背叛了5个男同学之间明确规定的约法。那约法说来很简单，因为梁小星太单纯，又长得太迷人，容易过早地被小伙子列为猎取对象，那她会从此分神，不在事业上思求进取。因此朋友们约定：任何人不准向小妹妹“进攻”，哪怕“潜移默化的诱导”都不行；而对“外来势力”，则应当拒之国门之外，挽起手来保护小妹妹的成长。

这是多么纯真而又淳厚的友情啊！

然而，哲学家开始食言，用有利于他自己的哲学逻辑俘虏了梁小星。为这件事，朋友们好长时间不再理睬郭福临。还是后来老大哥许炎出面调停，他认为从前大家订的约法，是出于好心，然而未免有些不切实际，因为梁小星毕竟是有七情六欲的人，是有血有肉的青年，她爱上哪个，不要说朋友，就是她自己的理智都控制不了自己的。许炎后来提出了一个折衷的方案：把梁小星和郭福临叫到一起来，重新修订约法，大学不毕业，不准结婚！

郭福临的哲学胜利了，他信守了约法，直到大学毕业二年后，他们才结婚，闻非是吃过婚礼喜糖的。

在闻非想来，梁小星一定是幸福的，她是有眼光的，丈夫当了处长。闻非虽说在外国7个年头，可他这次回国，仍然感觉得到，不要说一个处长，即或是一个科长、股长，也要比空有头衔的教授、研究员来得实惠，那，他们一定是个小康之家了。

闻非带着笑说：“你要严守秘密，不要对梁小星提起，等我突然出现在你们房门口时，叫她大吃一惊。你能信守此约吗？”

郭福临莞尔一笑，有意无意地瞟了小翻译余小光一眼，轻轻摇摇头：“很难奉命。”

“为什么？”闻非有点讶然。

“怎么向你说明呢？”郭福临无所谓地摇晃着迭在右腿上面的左腿，慢条斯理地说：“我们分开了，早在5年前就各行方便了。你感到奇怪吗？哲学大师斯宾诺莎追求所谓‘绝对圆满之物’，其实这是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绝对，在宇宙间是没有的。即便是我和梁小星度蜜月的时候，也并不是绝对圆满，矛盾是潜在着罢了，这是促使一切事物、包括爱情由相对圆满走向相对破裂的根据，这是自然法则，说穿了，事情就这么简单。”

听他用这样轻率、甚至有几分玩世不恭的语气讲话，闻非几乎无法容忍。他可以肯定，郭福临是用玷污了的哲学概念来亵渎生活、事业和爱情的。他感到心里很难过，像有无数只蚂蚁在爬。

郭福临却还在若无其事地述说，那无动于衷的神情，仿佛他在说着一件与己无关的、微不足道的事情：“水性杨花，大概是对女人的一种概括吧？我不能说出小星什么来，离婚是她提出的，我是被动应战的。我不能妨碍别人去向往、追求更圆满的幸福。你明天会见到她，她在电影制片厂乐团里，从前唱花腔女高音，自从邓丽君的歌从香港卷上大陆，近来她又唱起了酒吧间的调子，她是在一片青年人的喝彩声中过日子的……”

闻非感到难过，甚至有骂他一顿的欲望，但克制住了。他承认，梁小星有稚气和追求虚荣的一面，可是由别人口中说出她水性杨花，他是不能容忍的，好像同时也污辱了自己的人格。但平心静气想来，他又不得不承认，毕竟最了解梁小星的还是她以前的丈夫，自己没有力量反驳他，哪怕他信口雌黄！

上海牌小轿车拐过中山广场的转盘道，折向虾须湾，小翻译告诉他，那里去年落成一座15层楼的高级宾馆，命名为“北海

宾馆”，大概嫌虾须的字眼儿不够文雅，才摒弃了这个现成的名字。

沉默了片刻，郭福临又提起了赵蓓，他说：“赵蓓还在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脑外科，虽说没有提升为主治医师，可名气比主治医师、科主任都大。”

余小光插了一句：“是那个给黄书记治好过脑脓肿的女医生吗？”

郭福临点了点头，给闻非讲起了这桩事。

那还是 1975 年的事了。省委黄平书记，正在常委会议室研究部署‘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事，忽然昏倒在地，人事不省，当即叫来救护车送到了附属医院急救。原来医学院的两名脑外科专家都不能参与治疗了，一个在 1968 年清队时打折了腰椎，毁坏了坐骨神经，全身瘫痪 7 年；另一位远在千里以外的五七干校改造，远水解不了近渴。于是省委办公厅的高秘书长亲自点名让赵蓓出马——尽管她当时被贬到制剂室专门刷瓶子。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赵蓓是这所医院惟一仅存的敢动脑外手术的能人了。

但是医院工宣队长提出了疑问：“她这种人给省委书记开刀，怕不保险吧？”

高秘书长火了：“手术刀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看你用什么路线指挥她这把刀！”

幸而老院长是个开明人，他坚信，批归批、斗归斗，尽管黄书记曾经亲自来附属医院严令监督赵蓓，不准她参与任何病例的治疗，但那时黄书记没有休克！倘他现在清醒着，一定会比高秘书长更为果决地起用赵蓓这把刀，叫她为无产阶级服务的。

于是，赵蓓脱去了被盐酸烧得千疮百孔的工作服，走出了堆满瓶瓶罐罐的半地下室，回到了无影灯下。

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会诊。省医院、市医院、驻军医院所有

的脑外科、神经科有头有脸的大夫们全都来了，经过 X 光线大脑血管造影，大夫们提出了三种方案。

一种意见认为，黄书记的大脑基底动脉有堵塞，属于“闭锁式综合症”，因为《基度山恩仇记》里的基度山伯爵患有这种突然昏倒的病症，医学上又称它为“基度山综合症”。持这种观点的人，感到手术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第二种意见认为像是脑动脉出血，属于中风型。他们认为，D 城没有一架椎动脉造影器，也没有用电子计算机控制的断层 X 光线扫描装置，很难确诊，主张立刻空运北京抢救。

第三种意见是极少数派。以赵蓓为首的人认为黄书记患的是脑脓肿，如果手术及时，摘出病灶，是大有希望的，否则可能死在飞往北京的途中。

这时要看高秘书长决断的本事了。他到底是有经验的，他一方面指示赵蓓按第三种方案抢救，一方面通过专线电话直拨王洪文的专机，请求火速空运专家和特效药品、精密仪器飞往 D 城。

王洪文是慷慨允诺了。黄书记当年是他在上海起家的左膀右臂，他岂能见死不救？于是下令专机马上带上医务人员和药品驰援 D 城。

赵蓓应该感谢燕山山脉 7 000 米高空突然涌自西北的一股冷气流，它使专机延误了一个半小时。这使得赵蓓在一片反对声中得以完成复杂的开颅术。

走上手术台前，她和所有在场的医生一样，胆战心惊。凭她当时的处境和身份，手术成功，一好遮百丑；一旦失败，那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前脚走下手术台，后脚就会跨进监牢了。她在下决心之前，曾经有意无意地环顾了医生们一眼，看见了一双双同情、劝阻、担忧的眼光，多少知心话，尽在不言中。

赵蓓满可以打退堂鼓的，谁都不会因此而坐定她一个什么罪名。可她是医生，几年来，残酷的、非人的待遇可以毁掉她的一

切，但那根救死扶伤、实行人道主义天职的神经却一如从前那样灵敏，这根永远不会坏死的神经支配了她的一切，使她断然走上了手术台，一切恐惧感都烟消云散了。

当北京来的专家们赶到医学院附属医院时，开颅术已经完成，出奇的顺利。她的诊断出人意料的准确，果然是脑脓肿。黄书记活过来了！

北京的专家们对这位娇小清瘦、满面菜色的女医生叹服了！在这些鹤发童颜的专家们眼里，三十四五岁的赵蓓不过是个孩子呀！

为此，中国医学科学院专门拨了100万美元的外汇，指令医学院附属医院用来购置脑外科先进技术设备，扩建脑外科，还专门下达了几项科研项目。

听到这里，闻非又激动得发抖了，他怎么能不为赵蓓高兴呢？

人，常常是反色彩的。从前，在赵蓓立志要报考医学院时，大家都嘲笑她、打趣她，友好地打击她。是啊，她平时最怕走夜路，上厕所都要把梁小星捅起来陪她；逢年过节每当学校大厨房后院杀猪时，赵蓓照例掩起耳朵，更不要说去参观了。谁能想像，这样一个文静娇弱的女孩子，会替自己选择了在人身上开刀的职业呢？

可是，她不但成功了，而且成了一位出色的脑外科医生。

惊叹欣喜之余，闻非问道：“赵蓓和咱们的历史学家宫震遥的日子过得怎样？宫震遥怕是吃了更多的苦头吧？”

郭福临脸上的肌肉痉挛了一下，像罩上了一片乌云，过了半晌，才沉重地点点头，低沉地反问：“这么说，关于宫震遥的事，你一点都不知道？”

仿佛挨了一闷棍，闻非眼前一阵发黑。听郭福临的口气，好像有什么不幸的事已经发生了。他想问，可是一点勇气都没

有了。

还是郭福临在叹息中告诉了他：“宫震遥是个好同志，可惜，他已经不在人世了……”郭福临的眼圈红了，急忙掉过头去。

“这怎么可能？”闻非几乎喊了起来，“你快说，他是怎么死的？得了什么病？”

郭福临长叹一声，说：“难道只有病魔才能夺去人的生命吗？子弹，一颗罪恶的子弹，强迫他蓬勃的生命终止了……”

闻非顿时头晕目眩，他倒在车厢里。他实在不敢相信，他最尊敬的朋友，他的良师益友，一个纯正的人，得到的是这样凄惨的结局！

斯人独憔悴

闻非不知道自己是怎样上了北海宾馆 12 楼的。

他睁开眼睛，模模糊糊地看见一片白颜色，定睛细看，是医生和护士，还有郭福临，侧坐在床头。

闻非想起了那有如五雷殛顶的打击，至今还觉得头痛欲裂。他讷讷地叫了一声“宫震遥啊——”声音未曾出口，苦涩的泪水早就顺腮滚下来了。

医生见他醒过来，向郭福临挥挥手，轻声说：“他是累了，不要紧的，我给他注射了镇静剂，睡一夜就会好的，我们走吧……”

闻非懒得说话，听凭他们去了，直到踢踢踏踏的脚步声消失在楼道远处。

他从席梦思床上欠起身，把松软的枕头塞到背后半坐起来。

窗外已经是万家灯火了。这座宾馆是面海而盖的，带有咸腥味的海风从北窗吹进来，使丝绒窗帷抖得啪啪作响。

他忽然失悔起来。

此行的目的是什么？是期望和旧日的朋友们欢乐地相聚一堂，还是来寻求安慰的？多年来他那颗破碎了的、无论如何安静不下来的心，实在需要友谊和爱的抚慰啊！可是，自己的脚刚刚踏上 D 城的净土，就听到了难以承受的噩耗，难道自己是来替朋友们揭伤疤的吗？

时光能流送掉甜蜜的往事，这是可恨的；时光同时又能冲淡和洗涤旧日的伤痕，它又是可爱的……此时的闻非，竟然不知道应当怎样来应付了。

他没有去开灯。窗外的月亮不很圆，也不很亮。清冷模糊的光透过东面的窗子，在拼花地板上洒下一片摇曳不定的光斑。那些光斑一时个个都化成了宫震遥的面影。

闻非颓然坐到沙发里，倒了一杯冷饮，却又放下。他分明听到一个深沉而又带有视死如归样的声音，这声音压倒了晚潮的音响：“这不是花，是忘忧草。记得叶梦得有两句诗说：“‘白发萱堂上，孩儿更共谁？’古人把萱草——也就是忘忧草——比做母亲。游子在外远游，采一束萱草供在北堂，时刻不忘母亲，也可以使人忘掉过去的忧伤……带上它吧。”

闻非浑身一震，这不是宫震遥的诀别词吗？你听，他不是说过吗：“历史上凡是要干成一点事业，总要付出一点血的代价，流了产的戊戌变法，不也要有六君子的喋血吗？”

今天想来，这是宫震遥义无反顾的宣言，是向远走高飞的朋友们的诀别啊！闻非啊闻非，你怎么会那么傻，怎么会没有猜透他的心呢！

闻非真想大哭一场，他痛切地感到，是自己害了宫震遥，或者说自己是借了宫震遥的生命活在世上的，他感到从来没有过的惶愧、心痛。

他一点睡意都没有，镇静剂对一个过度哀伤的人是无效的。他扭亮地灯，又从皮箱里翻出了在虾须湾拍下的那张照片。啊，

那两片镜片后的一双细长的眼睛是那样赤诚、火热，那是祖国、对人民的无限赤诚啊！别人很难想像，在那沉稳的面容后头，在那纤细身躯里面藏着一个何等正直、纯正的灵魂！他还在高中念书时就常念叨一句名言，大概是高尔基的吧？他说：“天才就是劳动，人的天赋就像火花，它可以熄灭，也可以燃烧起来，而逼它燃烧成熊熊大火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劳动再劳动！”

后来，这句话成了7个朋友共同的座右铭。他们从青年时代起，就用勤奋的学习来作为助燃的氧气，时刻不让那为祖国而燃烧的火焰熄灭。

然而，宫震遥生命的火花却被残酷地扑灭了，他还没来得及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宫震遥和他的伙伴们，是戴着红领巾长大的。熏陶、教育对他们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家庭、社会、学校、共青团，口径都是一致的，他们还感到有什么不舒服。他们懂得什么是耻辱，什么是光荣，恪守着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切道德法规，准备着为祖国献出自己的知识和力量，他们从来没有思考过学业以外的事情。他们单纯、赤诚，像一张白纸，像一团火焰。

但是，在那场迅雷不及掩耳的风暴到来的时候，这群血气方刚的青年人同全国亿万来不及思考或向来没有思考习惯的人们一样，卷进了风暴的旋涡中心。既然毛主席号召，他们就勇往直前，破四旧，反对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串连，揪斗走资派，清理阶级队伍，夺权，反二月逆流……他们一步步紧跟过来，一直跟到文攻武卫的时候。

宫震遥他们这些已经念完了大学所有的必修课、选修课，搞过了毕业实习、毕业论文答辩的应届毕业生们，本来只消拿到毕业文凭，就分期分批到那激动人心的岗位上去了。有的将到文史研究所专攻甲骨文、金文，有的将到船舶研究院，有的到歌舞剧院，有的到体工队，有的走上哲学讲堂，有的将去履行救死扶伤

的神圣使命。

但是，12级飓风吹跑了这一切，他们没有埋怨、没有犹豫地投身到他们相信比走上工作岗位更有意义的斗争行列中去了。

他们在学业上是佼佼者，在斗争的行列中也不是松松垮垮的落伍者。“七君子”中，除了历来以“蜗牛”自居的老大哥许炎仍然躲在蜗牛壳里研究他的核动力结构而外，其他人都成为叱咤风云的角色。后来发展到社会上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对，D城武斗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有一天，腰里插着双枪的大力士李纯大摇大摆地打着一面三角形白旗，越过岗哨、碉堡林立的街垒、巷战工事，来到了D城第二造反司令部的大门外（司令部大本营就设在省委大院，倒退二十多年，这里是日本关东军驻D城警备司令部），要求见二司的常委闻非，递上了第一造反司令部第一勤务员（勤务员是谦称，实际是司令的同义词）宫震遥的亲笔信。在那夫妻、父子间因为观点不同而反目的年月里，朋友们站到对立两派里去，这本是十分平常的事。无论宫震遥还是闻非，都曾做过最大限度的努力，力图把对方说服，让他杀回马枪投诚，但双方几乎同时发现，这是不可能的。谁都认为自己代表和捍卫的是革命路线，甚至背后都有枪杆子的“支左”力量为后盾，谁会轻易投降呢？

人在发高烧时容易失去理智，闻非不得不承认，这种狂热劲正像火山熔岩一样地喷吐，它将吞没一切、烧毁一切，包括那血和肉的友谊。就在前几天，二司的一个大学生在市医院五楼平台上担负警戒任务时，被对方架在橡胶总厂楼顶的高射机枪打死了。当时二司上上下下都红了眼，高呼着口号，抬着盖着造反者大旗的战友的尸体，全副武装游行示威，发誓要踏平一司大本营，绞死宫震遥等一小撮。初听这个口号，闻非心里一阵阵发冷，到底那是他的好朋友啊！在他略显出游移神情的当儿，有人来叫号了，他受不了这种刺激，于是戴起柳条帽，背起冲锋枪，

跟上队伍浩浩荡荡出征了。

幸而那天没有出事，大约一个团左右的解放军战士赤手空拳拿着语录本，在中山广场纪念碑前组织了一道人墙，呼喊“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才算化险为夷。但是，一场大规模武斗的阴云，却在 D 城天空堆积得更厚了，随时都可能来一场电闪雷鸣。

今天，宫震遥竟然指派运动健将、对立派作战部副部长李纯单枪匹马来闯阵下书，闻非一时不解其意：是下战表，还是投降告饶？

闻非仿佛不认识老朋友似的，喝令手下人：“把人带上来，下了他的枪！”

尽管大力士反抗、抗议，毕竟是好虎架不住一群狼，他被解除了武装，押解到闻非面前。

闻非看了他一眼，问道：“你来干什么？承认你们的大方向错了吗？”

李纯毫无惧色地说：“你自己胆小了吧？不然何必缴了我的家伙？投降？你看看公文，就明白谁该投降了。”

闻非拆开宫震遥亲笔写来的信，没有激烈的措词，只是约定晚上 6 点半叫他单身一人到北水路 48 号许炎家里碰头，说有要事相商。

闻非冷笑一声，对手下的人说：“还给他枪，放他出卡子。”

李纯大摇大摆地走了。

当天晚上，闻非果然只身一人来到了许炎家里。

许炎的家是满阔绰的，独自住着一栋一楼一底的小洋楼，据说是从前中东铁路俄国官员的私宅。许炎的父亲是铁路局桥梁工程段的主任工程师，专门研究桥梁、隧道应用力学的，同时兼着铁道学院的教授职务。文化大革命兴起后，这位留学德国的学者自然是天字第一号的反动学术权威，还有里通外国的特务嫌疑，

他比省委书记关牛棚的资格要老得多！

谢天谢地，这时节许家除了经过三五次抄家的洗礼，还没有到勒令“净身出户”的份儿上，因此还暂时住着这宽敞的住宅。

宫震遥选择许家作为谈判地点，倒不是看中了这地方宽敞。北水路一带接近郊区，是双方武斗触角暂时都还没有伸到的空白地区，是战略缓冲地带；而许炎本人，又实在是双方朋友没有一点厚薄倾向的缓冲人物，他乐意为朋友的和好提供方便。

许炎在船舶工程学院读书时，就是个三天两头受批判的走“白专道路”典型，可他又改不掉钻图书馆的毛病，挨批又不服气，常常摊开手，眨着看得清圈数的镜片后头的一双小眼睛，无可奈何地向宫震遥诉苦：“你是博古通今的，你说说，哪朝哪代把做学问当成罪过呢？唉，他们去跳交际舞，偕朋携侣去逛马路，这都可以不批，干嘛我用这闲暇时间看点书，就大逆不道了呢？”

宫震遥了解这个书呆子，同情他、支持他，却不敢放纵他。他知道这个朋友的弱点，在新环境里要得到人们谅解是很不容易的。因此他总是鼓励他：“多和同学们谈谈心，叫人家了解你。另外，你也该争取进步的……”

入党？对他来说太难了，况且他改不掉“白专”的老毛病，一直连团的大门都摸不着，直到修完大学课程的1966年，他仍旧是七个同学当中仅有的一个“党外布尔什维克”。

亿万人都发动起来的这场大革命，也仍然有死角，许炎就是个死角。他生性喜静不喜动，一见到画满红叉红杠的大字报就害怕，更不要说去看“喷气式”、“剃鬼头”之类的表演了。何况，他的父亲就最先受到了这种待遇。他本人也丧失了“佩戴红心”、“摇语录”的资格，但这正中下怀，他乐得躲在家庭的蜗牛壳里研究他的激光传导、“ β 射线”，还有加速器。

他是老大哥，他这个不偏不倚的中间人物是朋友间两派激烈

争夺的对象。有一回，穿一身旧军装、腰扎一根宽皮带的梁小星闯进家门，一见许炎又在他父亲的绘图桌前拉丁字尺，就走过去，一把夺下丁字尺，跺着脚喊起来：“外面都天翻地覆了，你真坐得住。走出象牙之塔，用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了！”

梁小星是闻非所属的第二造反司令部的广播员，每天用那高八度的嗓子“战斗”几十遍，有时悲壮，有时义正词严，具有感人下泪的煽动力和感染力。可她万万想不到，她这热火炭一般的话掷出去，仿佛落到了冰山上，只冒了一股烟，便熄灭了，什么反应都没有。她扯急了，许炎就扶着玻璃杯底似的镜子求饶说：“你们去闹还不够吗？何必拉上我？”

梁小星认真动气了：“观潮派！说不定你是秋后算账派！怎么是‘闹’？这是革命，知道吗？革命！”

“好，就算是革命，”书呆子说，“革完了命，总还得建设吧？大家总不能喝西北风啊！副食品商店的罐头、饼干也总有叫你们吃光那一天啊！”

真拿他没有办法！到头来，他还是个没有倾向的彻底的观潮派。

直到后来，宫震遥才逐渐感觉到，他需要感谢这个观潮派！

观潮者站在岸上，就是个清醒的旁观者，比裹到大潮里随波沉浮的人要看得明白。先前，尽管他苦口婆心地劝这个、劝那个，连向来稳重的、怕事的赵蓓都认为许炎一身暮气，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但后来，在吵闹、厮杀的空隙里，宫震遥得以与许炎长谈过几次，他渐渐有些清醒了。

今天，宫震遥所以找闻非来私谈，那是他最近去了北京一次，受到了震惊才有的动议。半个月前，闻非曾经托许炎悄悄给宫震遥透漏了一点绝密消息。那消息确实令宫震遥大为震动，难怪闻非那一派近来明目张胆地挑起是非，原来他们正在部署一次

血洗一司的作战行动；原来他们是有了“上头精神”，才有恃无恐的。据许炎传话说，半个月前江青、陈伯达等人亲自召见了第二造反司令部的几个头头，给他们打了气，称赞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宣称中央文革支持他们。

在那把合法的政治局一脚踢开的年月里，中央文革的一句话，常常具有上帝箴言的威力，这是连白痴都明白的。

宫震遥没有把这消息告诉任何人，他怕涣散军心。他同时百思不得其解，难道我们第一司令部没有斗走资派吗？他无论怎样从鸡蛋里挑骨头，都找不出根据来证明一司是“保守派”或“反革命派”。

为了求得良心不被曲解，他同几个一司的头头进京上访去了。

如果说他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满足，倒不如说他从此看破了红尘。不过，他仍是守口如瓶，没有乱讲，他需要用历史的眼光去回顾一下。

他是经过了再三审慎的斟酌，才决定要找闻非推心置腹一谈的。

被几次抄家弄得零乱不堪的许家书房里，7个同学都到场了。尽管许炎为了缓和彼此间的冲突和紧张状态，故意在大圆桌面上贴了7张写有名字的字条，把两派的朋友互相间隔开来，但总是不那么和谐。特别是闻非，盛气凌人地靠在椅背上，五四式手枪大大方方地摆在桌面上，大有“不徇私情”的味道。

他一落座，就无所谓地笑笑，问宫震遥道：“大概不会摆鸿门宴吧？我希望我是来受降的——革命不分早晚，造反不论先后。我对朋友是作到仁至义尽了。”

大力士李纯在圈椅里动了动身子，椅子嘎吱一声，差点散了架子。他回敬闻非道：“刘邦是个胆小鬼，才怕鸿门宴。你是英雄，就得有关云长单刀赴会的胆略。”

梁小星拍了拍闻非放在桌上的五四式手枪，帮腔说：“单枪赴会还不够吗？”

这时许炎的老婆陈含英端了一盘奶油太妃糖放到桌上，和解地说：“吃一点甜的，粘上嘴巴，省得说话都带酸味。”

一直没有说话的赵蓓扑哧一下笑出来，抓起一把太妃糖分扔到各人面前。

宫震遥没有笑，他笑不出来。他说：“我真想大哭一场。”

大力士火了，因为他看见了闻非脸上漾出得意洋洋的神态，大概以为宫震遥这是打白旗的前奏呢！他马上有针对性地说：“先别笑，笑到最后，才笑得最好。”

宫震遥制止了李纯插话，他手里摆弄着一块糖纸，愁眉紧锁，似乎想了一下，才用异常严重的口气说道：“是的，我真想哭。我们是十足的可怜虫！糊涂虫！青年人热血、敏感，这是优点，但又同时是致命的缺点，它是冲锋陷阵勇气的来源，又是上当受骗的因素。让我们暂时都消除派性，恢复我们的本来面目，我请求大家要这样，即使是忍耐也行。至少今天晚上，我们应该摘去假面具，用朋友的良心来谈话，行吗？”

没有人反对，也没有人应声。

许炎巴不得这样，马上附和道：“早该这样，在我这个蜗牛壳里，只有友谊和安静，不准谈政治。”

“不，”宫震遥说，“政治还是要谈的。你不承认，我们每个人都还是卷进了政治旋涡；你拒不参加任何派别，本身也是一种政治态度。我想提一个问题，供大家冷静想一想。从大辩论到互相吐唾沫、人身攻击，发展到抛砖头、抡大棒，一直到抢枪，除了飞机，恐怕各种武器在各地都用上了，这是一场内战。D城武斗的火药气息、血腥味到处闻得到了，二司是要血洗一司的，一司也正在布置把二司彻底打垮的计划。为此，不仅机枪、大炮，甚至把军工厂的坦克都动用了。大家想想，这么互相残杀，为了

什么？为了谁？

大概人在头脑发涨的时候，连一加一等于二的低等算术题都未见回答上来。谁都不会想到宫震遥提出了这么一个古怪的问题，一时你看这，我看你，都愣住了。是的，如果用那种脱口而出、不经过自己大脑思考的下意识办法回答，是有现成答案的。但仔细想来，那不过是个 $x+y=z$ 的公式罢了，是虚的，不代表数学，没有实质意义。难道这些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能回答出“对方的学生、工人该杀”吗？

在静场的当儿，郭福临半开玩笑地说了一句：“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有一句名言，他说：‘人对人是狼’……”

没有人笑，也没有人驳斥郭福临不伦不类的引用，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宫震遥的脸上，仿佛那张无比严峻的面孔后头写着最准确的答案。

宫震遥没有正面解答，却兜了个大圈子，研究起他的历史来：“我最近翻了一下史料，觉得社会主义不应当承袭最反动的封建糟粕。剃鬼头是什么？是古代污辱人格极不人道的髡刑；抹黑脸是什么？是宋代在犯人脸上刺字的黥面刑法；我们是 20 世纪的有过大学教育的人，我们在干这种蠢事时没有意识到这是对历史的反动，反而认为这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行动……”

闻非打断了他：“好像你们那一派从来没干过？”

“干过。”宫震遥说，“我是在探讨问题，不是责难谁。再譬如，把‘万寿无疆’的词用在领导人身上，还要三呼，这与跪在丹墀前山呼皇帝万岁有没有区别？早请示、晚汇报那种仪式与在佛像前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炉香又有什么不同？这不是史无前例，是史有前例！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所要宣扬的吗？”

一席话把同伴都震住了。这些，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或者说从来没敢想过的。因为谁都明白这些话意味着什么。

许炎出来缓解了：“扯远了，扯远了，历史和现实是对不上

号的。”

“不，”宫震遥十分执拗，“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照见今人、来世。武则天为了篡位揽权，她使用了最恶毒、阴险的手段，利用朝臣和宦官两派势力的矛盾来稳固自己的地位，大家借武则天的镜子再看看今天，像不像？”

闻非坐不住了，他觉得听下去都是一种罪过。宫震遥所以借武则天的历史来讽喻当今，那矛头所指，不是再明白不过了吗？中央早有过明令，凡是把矛头指向江青的，就是现行反革命，要严加惩处。闻非不明白，宫震遥莫不是疯了吗？

许炎比谁都害怕，他像一只老母鸡那样，时刻张起翅膀把雏鸡庇护起来，惟恐被鹁子叼走。现在他有点慌了，灵机一动，到底想出了一个办法。他煞有介事地走过去，噤起鼻子凑近宫震遥的脸嗅了嗅，开脱道：“怪不得说话走板，他喝醉了。”

梁小星毕竟单纯，也离座凑过去闻了闻说：“净胡说，我怎么没闻到酒味？”

许炎老大不高兴，又不好对这不懂事理的丫头发脾气，只好求救地望着赵蓓说：“他大概精神出毛病了，赵蓓，你来看看。”

赵蓓明白老大哥的良苦用心，她果然走过去，煞有介事地看看宫震遥的脸色，说：“有点精神分裂症初期的征兆。”

人们似乎松了一口气，幸好有那么一条法律：精神病人是不受法律约束的。

但是，宫震遥苦笑了一下，说：“你们的戏演得不高明。我比任何时候都清醒，有精神病的是至今还一本正经地干着危害国家、民族利益的事情，又自认为是革命的人。现在，我把谜底告诉你们好了。我应当报告给党的，可是党不存在了，市委垮了，省委垮了，所有的党组织都瘫痪了。可我相信，能领导中国人民打垮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这样一个大党是垮不了的。但是，胜利不是等来的，需要有人去斗争。这场斗争，才是我们应当抛头

颇、洒热血去干的。”

沉默了一下，宫震遥从椅子上站起来，踱到闻非背后，眼里噙着泪水，说：“我们都是些工具，是某些败类向上爬的垫脚石。可悲的不在于我们的不得已，恰恰在于我们的自觉自愿！闻非，你们二司不是得到了中央文革的秘密召见吗？这种荣幸我们也得到了。江青不是鼓励你们坚决用武力打垮我们吗？她对我们的关切远比对你们要深，她还亲自看了我们的武斗计划，只差没有签上‘照打’两个字。同时，她还指示，武斗后马上把账都记在被打倒的省委第一书记身上。为什么？因为据她说，这位老同志是邓小平的旧部下……你看有多滑稽，我们双方在‘誓死捍卫’，在认真流血，我们不过是一个傀儡戏演员在幕后操纵的两个傀儡，我们可爱的老板是一个！你说，我们还不该和解吗？我们的血即或像凉水那样不值钱，也不应当这样白白地流啊……”

宫震遥哭了，所有在场的人都哭了。

他们不是怯懦者，没有人为自己的得失悲悼，他们都不求在这场风云变幻中得个一官半职，他们是有事业有理想的青年。他们不过是出于对党、对毛主席的一片赤诚之心，去冲杀、斗争。他们所以抱头痛哭，是因为他们突然发觉受了欺骗，良心受到了恶意的欺骗！有人利用了他们的天真、热血和正义感，利用了党在人民群众中无比崇高的威信。他们毕竟不是文盲，不是浑浑噩噩的流浪汉，他们是大学生啊！他们觉得有人祭起最堂皇的旗帜，把他们当成阿斗那样恣意地蒙骗、摆布和愚弄！

友谊和真理的呼唤赢得了这伙青年大学生良心的解放！

第二天，D城乱套了！两个造反司令部的常委相继在省委大楼门前张贴出自己的声明，不但闻非、宫震遥率先退出，有几个看破了这场闹剧的造反派头头也退出了，接下去是赵蓓、梁小星、李纯这些人雪片一样的退出声明。D城仿佛闹了一场大地震，连支左的部队首长都不明真相。

宫震遥是有头脑的，他制止了一勇之夫李纯要把真相公布于众的倡议，他们退出的口径都是一致的：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对立的矛盾，反对任何借口的武斗！

这次地震的结果是缓和了双方剑拔弩张的局势。人心涣散，武斗计划破产了，双方留下来固守营垒的头头们不得不重新整顿组织，防止再出现这种“萧墙内乱”。

……夜深了，海堤上银链似的灯火十分明亮，辉映着远处中山广场四周高耸入云的建筑群。望着这些不曾被毁掉的建筑物，闻非觉得鼻子一阵阵酸楚。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见证，是宫震遥功绩的见证！如果没有宫震遥的觉醒和许炎家的“策反”，以中山广场为中心的所有建筑，怕是要在那场空前规模的武斗中毁掉了，光是第二造反司令部，就准备了12卡车爆破用的炸药，更不要说火焰喷射器和四〇火箭筒了！

然而，历史往往是不公正的！

这个对D城的历史写下了值得纪念的一页的宫震遥，非但没有得到嘉奖，反倒长眠在D城的那一片荒凉土地上……

想到这里，闻非又一次泪流满面。

可怜天下父母心

闻非半点睡意都没有，他能够忍受天涯各一方的苦痛，那是没办法的事；他无法忍受咫尺天涯的熬煎，他的朋友也许离他不过几百米或几千米，却要叫他等到天明吗？

他决心出去闯！去闯医学院附属医院，去夜访船舶研究院，去电影制片厂大院……鼻子下有嘴，还愁找不到一个人吗？他真有点怨恨郭福临的薄情，竟这样不声不响地去了！

当他带上门来到铺有猩红地毯的长廊时，客房服务台的梳羊角辫的小姑娘抬起困顿的眼睛，礼貌地冲他一笑：“您是

闻先生吗？’

不知为什么，在日本习以为常的称呼，现在却使他感到极不舒服。他心里一阵难过，只是勉强地向客房服务员点了点头。

那小姑娘马上从道林纸登记簿里取出一张硬纸卡，递到他面前：“是您的。”

闻非接在手里一看，是郭福临临走留下的条子。他错怪他了。

条子是这么写的：

闻非：你太疲劳了，只好临时撤销今夜带你出访的安排。望好好休息，明天将是高朋满座。

奇怪，落款竟是“郭化”。

笔名吗？不像。哦，这家伙是有改名癖的，说不定又附会上四化的内容了。想到这里，闻非禁不住哑然失笑。

D城的夜景一如从前那么幽静、安适，海关大楼音韵铿锵的钟声，港口船舶进港的汽笛声，还有马路车辆繁喧声静下去才显露出来的海浪声，组成了一支叫他永远渴慕的乡恋交响乐。

他在行人寥寥无几的宽阔马路上走着，拐过中山广场大转盘，坐上开往医学院附属医院的7路无轨电车，在终点站下来，奔到附属医院夜间急诊室，问了一个正在打瞌睡的值班护士，才知道赵蓓今天不是夜班；他问清了住址，就又乘回头车返到中山广场，再换15路汽车向东行，穿过拥挤不堪的工厂区，来到蛤蟆塘。

这是个极不雅的旧名字。闻非知道，300年前D城还没有奠基时，蛤蟆塘就有了，只不过在一般地图上找不见，在沙俄的军用地图上却点了个大蓝点。1905年日俄大战时，还在这个小地方展开一场大规模冲突呢。大概这地方有几分战略价值，尤其中长铁路开通以后，以蛤蟆塘为起点，很快形成了D城这个水陆码头中心城市。

不难想像，蛤蟆塘必然是挤满破败的民房的落后住宅区，没有暖气、煤气……在闻非印象中，这里的住户多是小商小贩、个体手工业者或者属于大集体小企业盖不起家属住宅的单位的职工。

难道医学院会挑选这么个低洼潮湿而又偏僻的地方盖一栋宿舍吗？

闻非总想在那一片灰黑房脊的民房当中，找出个鹤立鸡群的高层建筑来。他失败了，最高的建筑是十字街口的一间风雨骑楼，从前是卖天津包子的小铺，如今骑楼倾颓，用几根电线杆子撑着，楼下亮着灯火，楼上的包子铺早就收摊了。

闻非又仔细看了看小护士留给他的门牌号码，一路叩门问下去，谢天谢地，总算找到了。

赵蓓的住室是一间平顶泥屋，房顶铺着碱土，是那种旱天裂缝、阴天漏雨的简易房子。屋子里没有点灯，院子里黑乎乎一片。院子前面是一片有几公顷大小的臭水塘，杂草丛生，垃圾堆成山，霉臭气味一阵阵扑鼻而来，使人感到恶心。

赵蓓的住屋是城东北角的边缘了，再往前越过一条公路，便是乡村大片田地，没有人家了。

闻非的心像被人剜了一下，阵阵发痛。赵蓓呀，这样一个著名的脑外科专家，救过省委书记命的人，却被遗忘在生活最边远的角落……

他悄悄走到窗下，屋子里仿佛有人在咳嗽，是女人的声音。这苍哑而干涩的声音会是赵蓓吗？不，绝不会。连以金嗓子自居的梁小星都说赵蓓的声音“又甜又柔”，怎么会变得这么难听？

闻非几次想叩门，又都犹豫地缩回了手。赵蓓睡下了，她或许正做着美丽的梦……自己的出现，意味着什么？是破坏安适的噪音，是麝在甜水中的砒霜，是揭人伤疤的钝刀……

他几乎要退出院子乘车回去了，却又临时改变了主意：迟早

总要见的，伤疤总是要揭的，那就不如狠下心早点捅破！

他的心剧烈地跳着，终于横下一条心，叩响了龇牙咧嘴的木板门。

板门门轴缺油，拉开的时候十分难听地怪叫了一声。

闻非瞪大眼睛向黑乎乎的门口张望，他看到的不是赵蓓那张娇小清秀的面孔，而是一张满脸布满核桃纹的苍老面孔，两腮肌肉松弛，两眼下方垂着一道衰老的弧形肉泡，是个老太太。

闻非大失所望地问了一声：“请问，赵蓓、赵大夫是住在这儿吗？”

老太太似乎打量了闻非几眼，反问道：“你是谁呀？有病人吗？”

看来，深更半夜叫门求医是常事，才使老太太这样发问。

闻非道：“不，我是赵蓓的老同学，我来看看她。”

老太太走出门来，在依稀的月光下，又把闻非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才颤巍巍地问道：“这么说，你是震遥的好朋友闻非了？刚从日本回来的？”

闻非料到是郭福临急不可待地把消息透露出去了，就说：“是呀，大娘，我是震遥的好朋友……”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老太太伸出一双滚烫的手，拉住了他往屋里拽。他从那双粗糙的手上得到了温暖，同时也体会到了那双手上担负的艰辛。

这老太太是谁呢？赵蓓的妈妈吗？不是，她的妈妈自己见过，是郊区一所中学的生物教师，没有这样苍老。

突然，他认出来了，这是宫震遥的母亲，从前是在农村果园里侍弄苹果的一把好手！闻非也见过的。记得那是1961年8月底，7个朋友都分别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宫震遥把朋友们带到乡下家中，在躺倒地上可以吃到苹果的果园浓阴下，度过了最有趣的一天。那时节，正是黄元帅苹果乍熟的时候，大力士李纯

一连吃了12个半斤重的，吃得吐酸水喊胃疼，满地打滚叫唤，还是宫大娘有办法，用小苏打冲了一碗水给他灌下去，才立刻消停了。当时梁小星说：“这是什么灵丹妙药？”还是赵蓓一语点破了：“这不是化学上的酸碱中和吗？”

事隔多年，闻非依然记得摆在苹果树下的那顿丰盛的晚餐。老太太把一只下蛋的母鸡杀了，把一片片摘下来用蜂蜜煨出来的玫瑰酱也端了出来，还有她现赶到海边去买来的梭子蟹，亲手为孩子们捣蒜、切姜丝儿……赵蓓、梁小星抢着帮厨，她说：“你们今个都别打下手，都是有功之臣，大娘只盼你们将来学问成了，为国家做事，对得起共产党，我听个名声，也就心满意足了……”

闻非随着老太太走过黑乎乎的厨房，觉得她走路有点摇晃，比当年苍老多了。她是个多么慈祥的老人啊！她像所有善良的母亲一样，哺育儿子不是出于动物性的本能，也不是出于母亲的天性，而是出于完成对社会的一种义务。她用勤劳、善良、正直、诚实和一切美好的道德课子，希望他能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她也许永远都不会明白，正是这正直和忠诚害了儿子，使他丧生！她那颗受了重伤的心，现在该是怎样的孤寂和酸痛啊！

闻非生怕赵蓓不在家，他实在无法安慰这个伟大而又可怜的母亲。

15瓦的灯拉亮了，像一团昏暗的萤火照着这一间小屋。

墙是泥巴的，爬满了龟裂的纹路，有些地方糊了纸，有些地方因为墙体凸凹不平，纸早就脱落了，露出斑斑驳驳的泥片。没有天棚，用成捆的高粱秸编起来用来承托碱土房顶的大概就算天棚了。小小的方格纸窗前有一铺两米左右的土炕，上面铺着三床被子，半新不旧，但还干净。除了炕，地上有一张两屉桌，其余的地方被杂乱东西堆得没有下脚的地方，书刊垛得老高，顶到了房梁。靠门后，有一个木箱子，是药品包装箱，上面搁着十几块

镜框、匾额，闻非以为是奖状，逐个搬起来看了看，全是患者送给医生的，无非写着“妙手回春”之类的誉词。只有这些东西才使人相信，这间寒碜得难以想像的小屋里，住着一位专门在地狱门口往回夺人的圣人。

闻非说不清心里是一种什么滋味，像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应有尽有。他不敢再多看，放下镜框，不觉潸然泪下，赵蓓竟然没有一堵可以悬挂匾额的墙壁。

宫大娘掸掸炕沿，拉他坐下，眯着眼，仔细地打量了闻非好久，转过身去，吃力地在一口包角木箱子里翻腾了半晌，到底找出一本 32 开的影集，抖抖地打开来。啊，第一页就是宫震遥保存下来的“七君子”合影，与闻非的那张是同一底板。

老太太用手指了指照片上的闻非，问道：“没错吧？你还是这个憨厚样子！”

闻非默默地点头，他本应当首先安慰老人一番，表示自己对宫震遥的不幸遭遇寄以同情，可是他不敢，生怕惹得老人泪出肠痛。

他踌躇了半天，才问道：“怎么，赵蓓不在家？”

宫大娘说：“你们俩走两岔去了。她下班回来就说接到电话，说是你从日本回来了，连饭都没顾得上吃，领起小近就去看你了。你别急，大长的夜，她扑个空儿，就会回来的。”

“小近？”闻非刚问出口，马上意识到多余，小近当然是宫震遥的儿子了。

老太太误解了，她苦笑地说：“都是我封建，给孙子起了这么个名儿。我是怕了，巴望着孙子离得近点。儿子呢，都是坏在你们中学那个曹老师身上了，偏给他改了个震遥的名字，后来我才明白，遥就是远啊，这不是……远得不能再远了吗？”

闻非以为宫大娘就要哭出来了，忙说了几句安慰话，岂不知她并没有流泪，仍是苦笑着说：“你别担心，我不会哭的，这么

多年了，眼泪早就哭干了。”

闻非听了这话，简直比看见老人的眼泪还要难受，他倒先撑不住，热泪顺脸颊直往下淌。他哽咽地问道：“震遥哥哥什么话都没留给我们吗？”

老太太机械地点点头，回身摘下挂在墙上的诊箱，从最里层隔子里抖出一个白色塑料袋，里面是一封宫震遥的狱中手书。大概纸笔都不方便，那信是写在两张拆开来的废香烟盒上的，是铅笔字，却写得一丝不苟，一点都不潦草，像他平时工工整整的听课笔记，更像他本人连上衣风纪扣都从来不敢着一样严谨。不了解内情的人，大概不会猜到这是一个行将饮弹而亡，走向另一个世界者的笔迹吧？

闻非捧着那两片香烟盒纸，只见上面写着：

亲爱的欢欢——我亲爱的儿子：

这封信是留给你能够读信的时候看的，那时爸爸相信，你生活的祖国一定是丽日蓝天，你不再会因为有我这样一个爸爸而难过、伤心、耻辱和受人欺凌了。是的，历史总要恢复它本来的面目。

别了，孩子！在你能懂得这一切的时候，爸爸已经在荒郊野外躺了多年了！我痛苦，又骄傲。我为求真理而斗争，死在为敌人准备的监狱里、枪弹下，这是爸爸从学会唱第一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时候压根儿没有想到的。我骄傲，因为我相信，我的血总会有一点代价，哪怕是让一些正直的人们思索一下也好。

孩子，你是不幸的，你的妈妈比你还要不幸。这不是爸爸的罪过，爸爸像所有的爸爸一样，不愿意抛弃亲人去死。我只有—件憾事，看不到祖国扫去乌云走上富强道路的那一天了。你是能看到的，你一定是一个建设

者，如果你能理解爸爸，就用双倍的精力去为祖国效力，把爸爸的一份也干出来！别忘了，到了那一天，到爸爸的坟上去告诉一声，不，我可能不会有坟墓，骨灰也不会存在。那你就对着青天、大地呼喊好了，我的灵魂不会离开祖国的天空和土地，我会听得见的。

爸爸答应给你买一支玩具手枪的，可惜来不及亲自到儿童商店替你挑选了，偶然在衬衣口袋里找到两块钱，捎给你，让妈妈陪你去买吧。还有，元宵节那天，爸爸错打了你，炸元宵的油是邻家的猫弄翻的，不是你……看来，这个误解是此生此世不能挽回的了。

我现在听见了围墙外面的烘炉有丁当声传来，我马上要走上刑场了！凡是处决的人，都要先走进烘炉砸上脚镣子。昨天，他们已经对我宣判了死刑，驳回了我的上诉。再见吧，再见吧，告诉妈妈、奶奶，在枪弹击碎我的头骨之前，我都在心中呼喊你们的名字……

爸爸 宫震遥

1976年12月19日

看来，这是一封没容他写完的诀别信，签名很草，那是最后时刻了。

闻非读着读着，放声痛哭起来。这是怎样一封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有恨又有爱的诀别信啊！没有信仰的人、没有骨头的人，会写得出来吗？他不是被审者，他是在审判那些欺世盗名者。这使闻非想起了残酷的中世纪宗教法庭上那些貌似强者的红衣大主教们，当他们下令把伟大的、握有真理的布鲁诺绑在十字架上活活烧死的时候，他们恰恰是神经脆弱者，害怕真理的大火会烧焦他们赖以生存的神像。宫震遥却无论如何不该死在20世

纪的比宗教法庭毫不逊色的非宗教法庭。

尤其令闻非齿冷心颤的是宫震遥诀别信成文的月日，1976年12月19日，那是在“四人帮”覆灭73天以后。远在海外的闻非正是在这一天得到了他的祖国扫除了阴霾的迟到消息，也是在这一天，他邀了几个华侨朋友，跑到东京最大一家酒店，喝酒祝贺……可他哪里会想到，正是这一天，他的朋友却被处决了？而这时刻，又恰恰是祖国的太阳冲出阴云冉冉上升的时刻。

听宫大娘告诉他，宫震遥是在送走了闻非以后的第七天被逮捕的。为了追他的幕后走资派，同时逮捕了6个人，最大的是一位前省委书记，最小的是省里的一位副局长。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理由是这几个人曾经同宫震遥接触过。王洪文、江青亲自阅卷，亲自指令省里严办“后台”。如果不是宫震遥守口如瓶，说不定那几位判了15年徒刑的干部会和他一起走上刑场。

闻非知道所谓“4·15”案件的全部内情，他是参与者，还有李纯。是宫震遥起草的传单，由李纯、闻非分头刻写蜡板。他们虽然知道这是万分危险的事，可是他们感到必须把江青一伙人挑动内战的内幕揭开，不让她蒙蔽中央。他们认为这是对党的忠诚。

在事情急迫的日子里，他们决定逃走。他们到了有家难奔、有国难投的地步了。许炎帮助他们。他冒着生命危险，答应掩护他们出逃，为他们提供远洋轮的船体结构、航次。那时许炎被赶出了试验室，下放到船舶维修公司，负责对每艘出港船的机械检修。

闻非走了，逃了，得以保全性命，而中途改变主意的宫震遥留下了，看来他早就立志要用自己的鲜血来呼唤沉睡的人们了……

闻非抬起泪眼，问道：“难道……现在震遥还没有昭雪吗？”

宫大娘一边去翻抽屉，一边说：“总算盼到这一天了！不容

易啊！许炎、郭福临这些孩子们天天写信、告状，一直告到中央。先时，‘四人帮’虽说倒台了，祸水可没除净，那些得过便宜的人照样是官儿，就是这些人判的震遥……他们肯尽心吗，他们怕自己打自己嘴巴子啊……后来，多亏郭福临亲自上北京，中央下来人，才算平反了，这不，还登了报呢！”

老太太从抽屉里找了一张上个月的省报。消息发在头版头题，左上方刊印着宫震遥的一张遗像，还有一篇长篇报告文学，通栏标题是《又为斯民哭健儿》，副标题是“他死在上升的太阳下”。那位作家是用蘸饱了血和泪的如椽巨笔写下这样的卷头语的：

在一间小屋的灯光下，一位白发的母亲和一个5岁的孩子泫然相对，涓涓而来的眼泪，只有往她们的肚子里吞咽。

尽管那时候从南方已经吹来了春天的气息，而西伯利亚的寒流，还正在松辽平原上徘徊。

在铺满白雪的山坡上，她的儿子——小孙孙的父亲，还会躺在那儿吗？她知道他已经永远不会感到寒冷了……

这时候天已经亮了，一个光明的中国正在同太阳一起升起。

看到这里，闻非的手已经抖得不行，热泪像断线的珠子，噼里啪啦砸在那张报纸上。

啊，想不到他死在太阳上升的时候，死在黎明以后，他那颗蒙上了尘埃的灵魂，大概永远不会得到安息的。

闻非实在不能再陪伴这孤苦的老人在这小屋子里待下去了，他觉得窒息，他再坐下去，简直要发疯了！

可他又不忍心遽然离去，就偷眼看了看宫大娘。她很安详，凄凉的安详！大概这老人的泪源确实干涸了，她没有一滴泪水，深陷的眼窝四周，印着一圈黑晕，只有当眼珠迟缓地转动时，你才会觉得她的感情并没有死掉。

闻非本想问问家里的生计，问问为什么平反昭雪了，她们还住着这种破烂不堪的房子。可他没有勇气，他觉得那没有一滴泪水的凄凉而慈祥的面孔，比号啕大哭更叫人不忍心多问一句。他咬咬牙，站起身来。

他的右手探进了西装口袋。那里面有他离京前用外汇刚刚兑换的 500 元人民币，他离开宾馆时就揣在口袋里了。可他的手好半天没有抽出来，他踌躇起来。这算什么名目呢？可怜、同情，还是友谊？是作为自己生命得以存在的代价吗？他觉得，那张凄凉的慈祥面孔透着一种隐隐约约的刚强，她会轻易收下这笔钱吗？

他终于还是把钱放到了炕沿儿上。

老太太的眼珠动了一下，她说：“钱可以通神，可是换不回命来。唉，震遥的大学里，前天送过抚恤金了，5 000 块，我一分都没有要。我饿死、冻死，也不会花那带着儿子血的钱……”

闻非迟疑了一下，扯了个谎说：“大娘，我在出国前，震遥给我筹集了一笔钱，这是我应当还他的。他不在了，大娘理当收回这笔钱。”

说完，他仿佛怕宫大娘执意不收，就匆匆告辞，逃也似跑出了屋门，融进了黑暗中。他仿佛听到门后有笨重的脚步声，头也没回，一口气跑到了电车站，心里才略觉轻松。

埋葬的和苏醒的……

当闻非乘坐末班车赶回北海宾馆时，已经是下半夜一点了，

幸而底楼专为外宾们开设的咖啡厅还没有停业，否则他真会被关在大门外了。

楼梯口开电梯的服务员伏在一把高背椅上睡着了。闻非不忍心叫醒她，决心爬到12楼去。

他太疲惫了，几乎每爬一层，都要在平台上喘息一下，仰头望望盘旋而上的楼梯，感到眼晕。他忽然感到，他的前半生，就是像爬楼梯这样一步一个坎儿，何等的艰辛！他的精神早已疲惫不堪了。

不知为什么，一想到含冤九泉之下的宫震遥，他就浑身战栗，一个固执的想法总是像铁钉子一样嵌进他心间：你难道不是一个怯懦者吗？

是的，他默认了。7年来，在物质生活上，他比留在祖国的人们要优裕得多，可他的精神世界是空虚的、脆弱的。他如果是那种醉生梦死的人也许会好些。但偏偏不是，他清醒得很。

如果说一点精神的安慰都没有，也不尽然。他到底回来为祖国开发近海大陆架油田了。如果可能，他宁愿像赵蓓那样居陋巷、住斗室，也不愿再以什么外宾的身份出现在自己的国土上。只要给他工作的权利！他恨那些见了外国人便一副讨好的媚相，而对自己的同胞却嗤之以鼻的人的丑态。

一路胡思乱想着，正要往上迈步，头几乎撞倒了一块牌子，上面用红漆写着英汉两种文字：宾客止步。

啊，他爬过头了，原来爬到15层来了。

闻非摇摇头苦笑一下，手扶花曲柳栏杆，拖着一双灌了铅似的腿往下挪步。

闻非的脚步声在走廊方厅里一响起来，值班客房小服务员热情地迎过来：“闻先生，您有客人，等了您几个小时了。”

客人？莫非是赵蓓还没有走吗？自己怎么忘了这一层？

顿时，他像刚刚注射了一针樟脑酊一样，神志一爽，马上追

问：“在哪里？”

小服务员一笑，走到会客室门前，轻轻推开门，闪到一旁。

果真是她，赵蓓！

她坐在面向房门的一张沙发里，使闻非能够一下子看清她的全部表情。

她老了，明显的老了。不幸的生活，坎坷的经历，繁重的工作负担，在她那张娇小而清秀的脸上刻下了明显的痕迹，只有那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还没有走样。她变得太厉害了，假如在街头邂逅相逢，他是绝对不敢贸然相认的。

赵蓓沉静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却没有狂热地扑过来，狂热，本来也不是赵蓓的属性。

闻非也站在房门口，没有向前迈步。

就这样，两个人对视了有一分钟之久，才不约而同地绕过沙发向一起靠拢。他们的步履都很沉重、很迟缓，像他们7年来坎坷艰辛的生活征程一样，走得艰辛极了。

两只手握到一起了，谁都没有说什么，没有热烈的问候，没有朋友的安慰。是啊，言语在这种彼此心照不宣的场合，往往显得多余、笨拙。

他们面对面坐下。

闻非这才看见，一个10岁左右、发育得并不很好的男孩趴在沙发扶手上睡去了，这当然就是赵蓓的儿子小近了。

闻非俯过去看了看孩子，长得很像爸爸，只是比宫震遥要瘦削。

闻非轻轻地把小近抱起来，托在胸前，低低地说：“到房间去吧。”

赵蓓没有说什么，默然站起身，跟在闻非身后。

闻非把孩子放到卧室床上，怕惊醒孩子，连鞋子都没给他脱，就拉条毛毯齐胸盖上。

赵蓓轻轻说：“不行，要弄脏的。”

闻非苦笑：“这算什么！叫孩子的好梦做得长一些吧”。

赵蓓鼻子一酸，转过脸去，揩了一下眼睛，赶忙走到外间客厅去。

闻非跟了出来。他身边有现成的方糖、咖啡，还有简易加热器，把电源接通，煮了两杯咖啡。

赵蓓啜了一口，凄然地说：“生活，你说像不像这苦中有甜、甜中带苦的咖啡？”

闻非不想去碰她的隐痛，就说：“苦尽甜来，这一天不是来了吗？”

赵蓓明白闻非的意思，也就扭转话题说：“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有生之年还能见到你。”

“是啊，”闻非抚弄着咖啡杯子说，“尤其是在祖国的土地上，我做梦都不曾想到。”

“生活毕竟比梦还要现实。”赵蓓说，“谈点愉快的事吧。你的理想到底实现了，老同学都应当祝贺你。我们也该吃你的喜酒，大香槟，怎么样？”

闻非浑身一震，一时竟愣住了。“我们也该吃你的喜酒，大香槟，怎么样？”这话多么熟悉啊！在哪里听过？他努力在记忆中久已尘封的仓库里搜索着……啊，记起来了，正是赵蓓的话，她的音色都没有变，说话的音调，就像溪水漫过石子滩那样，丁丁当当……那是哪一年呢？对了，那是他们各自结束了愚蠢狂热的造反生活以后的1968年，他们都走上了工作岗位。

用哲学家郭福临的话来说，在爱情的专题面前，赵蓓是“二元论”者。意思是说，她在宫震遥和闻非之间搞“等距离外交”。这话也确实有几分道理，她对这两个精明强干的人都很景仰、尊重，不偏不倚。偶尔有同事送给她两张戏票，她从来不要，总要向人家再要一张。只有当真能搞到三张，她才肯去，还必定同时

邀上宫震遥和闻非，她坐在他们中间。有一回，宫震遥参加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一次考古发掘，在西安住了半年。回来的时候，他给赵蓓带来了一件珍贵的礼品，是仿制唐三彩陶瓷品，一双并蒂莲下卧着一对鸳鸯。据宫震遥告诉她，这是依据一座唐代合葬墓里发掘出来的原件复制的，外行人很难辨出真伪。仿制的匠师真有两手，连那驳落的彩片都弄得惟妙惟肖，仿佛真是在地下埋过一千多年的古董。据说这件复制品在国际市场上，能卖1 000美元。当时，宫震遥再三告诫她，不要对别人讲起，因为他实在没有第二件送给其他的朋友，他不愿在朋友间显出厚薄。

谁知道赵蓓怎么想的？她嫣然一笑，马上跑到单身宿舍的传达室，给石油研究所挂了个电话，把闻非叫来，让他一起饱饱眼福。这事当然弄得宫震遥十分尴尬，从那以后，反倒疏远了她，以为赵蓓心目中真正倾向的是闻非。闻非不傻，他从种种迹象中分析到，宫震遥对赵蓓是有好感的，认真想来，只有他们俩的结合才合适。因此也有意少同赵蓓来往，不管赵蓓怎样热情地邀他一起过礼拜天，他十次有九次推说研究所工作脱不开身，除非“七君子”都到场，他才会去出席。

于是，这三个人都把真情隐蔽起来，像在捉迷藏。

为这件事，朋友们都有点伤脑筋，后来议决，推举德高望重的老大哥许炎出面，居间调停。

许炎首先找赵蓓，这是哲学家给他出的主意，因为他说“赵蓓是矛盾的主导方面”。

许炎本想批评赵蓓，可他过于老实、善良，批评的话一从他嘴里说出来，早就没有一点锐气了。他问赵蓓：“你说，震遥好呢，还是闻非更好些？”

赵蓓文静地一笑，回答说：“都好。”

岂有此理！许炎肚子里寻思：都好？你总不能同时嫁给他們俩呀！可这种粗鲁的话只能从大力士李纯口中说出来，许炎是说

不出口的。他憋了半天才说：“你这丫头真叫城府森严，大伙儿都希望你早点表现出倾向性来，省得大伙操心。”

赵蓓当然明白老大哥指的“倾向性”是什么，她说：“我还没有想过呢，你们着什么急？”

许炎没有话了，他若有郭福临的口才就好了。他摊开两手：“那怎么办？”

赵蓓扑哧一下笑了：“总不能抓阉儿吧？”

这次调停宣告失败了。

其实，赵蓓不是那种优柔寡断的人，她心里有一架极端精密的天平，天平的一端，倾注了她全部内在的感情分量，可另一端却不时地把别人放到上面去量。她有个怪毛病，从来不把别人的优点放到天平盘里去，专门拣小伙子们的缺点往上放，难怪她一直在搞等距离外交。

按照许炎的说法，赵蓓是过于挑剔。李纯则说得直白：“挑花眼了！若我说，闭着眼睛在他们俩当中摸，摸到哪一个，都是用不着后悔的。”大概他说得有几分道理，可能也正因为她面前可供抉择的两个人难分上下，她才这样为难。

终于，宫震遥和闻非都开始退却，宫震遥是最先作出姿态的，他居然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同赵蓓发了脾气。因为这脾气发得毫无道理，又根本不像他平时的为人，因此弄得在场的朋友们摸不着头脑。

倒是敏感的闻非洞察了宫震遥的用心，他是在赵蓓面前制造“坏印象”，借以把闻非推到第一线去。

闻非回去以后斗争了很久。他是喜欢赵蓓的，他虽然看不出赵蓓的明显倾向，却知道宫震遥是爱她的。那件唐三彩，再明白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

朋友间可以衣食与共、生命相托，惟有爱情是恼人的自私。说真的，如果闻非与宫震遥不是亲如手足的莫逆之交，他们双方

都会无所忌讳地向赵蓓表白爱情。可是朋友间不成文的道德情操，同时在他们爱的权利上套上了一具枷锁。

闻非决定成全他的朋友。

爱情是不能“出让”的，可是爱情是能够“促成”的，闻非作为一种反作用的催化剂出现了。

在一个周末，朋友们照例到许炎家聚会的时候，闻非突然宣布，他要在国庆节结婚。这消息把大家都闹愣了，继而大哗，从没发现闻非有过谈恋爱的蛛丝马迹，怎么会突然结婚呢？

在人们为着他的闪电式恋爱责难不休时，闻非从口袋里拿出一封寄自新疆克拉玛依油田的信件，贴着航空邮票。

梁小星最先把信抢到手，抖出信笺，念了出来：“亲爱的非，既然你坚持要结婚，那就依着你好了。我国庆节探亲休假，可以回D城，反正两个行李卷搬到一起就是了……”

这姑娘叫李钟秀，据闻非自己说，是他下一班的同学。学石油地质的，毕业后分到克拉玛依油田去，并不奇怪，多得很。只是这个李钟秀是何许人，又是什么时候和闻非好起来的，却是个天大的奇闻。于是大家拼命抨击了一气“闻非背着朋友”以后，当然还是为他高兴。

只有宫震遥和赵蓓有点怀疑。他俩不由得交换了一个会意的眼光。宫震遥特地拿起闻非放到桌子上的信封，仔细审视了半天，找不出半点破绽，确实是寄自克拉玛依的，邮戳上的墨迹十分清晰。他把信封转给了向来细心的赵蓓，赵蓓同样找不出毛病，不由得信。

这出戏成功了，“吃喜酒、大香槟”就是在这个场合说出来的。

那以后，赵蓓很自然地将她和宫震遥的友谊向纵深推进了一大步。他们的婚期也订在这一年的国庆节，而且一再和闻非约定，三对新人集体举行婚礼，要好好热闹一场（第三对当然是哲

学家和电影明星了)。许炎主动承担起证婚人的差使，李纯呢，是采购员，负责印发请帖。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9月30日晚上，人们还没有看到新娘子李钟秀的影子，一再催问闻非。他很冷静，说是10月1号凌晨3点的车抵达。

许炎特地在海员俱乐部海上圆形厅布置了结婚礼堂，新人座席上，摆了6只红毡垫子。

下午两点，当来宾和来自四面八方的老同学济济一堂的时候，去接闻非和新娘子的李纯气喘吁吁地跑上楼来，大声喊着：“大骗局，是一场大骗局！”

是的，是一场大骗局。闻非来了，只有他光棍一人，他不是以新郎身份出现的，完全像一个观光者。据他自己说：“新娘因事在北京耽搁了，要在5天以后才能到达，只好单独举行婚礼。”

人们虽然有点扫兴，婚礼还是照旧举行了。

人们奇怪地发现，新娘赵蓓的眼睛一直盯着坐在墙角低头吸烟的闻非（他平常是烟酒不沾的）。后来，新娘哭了，是带着泪痕完成婚礼的。

人们吃着糖果、瓜子，在大厅里跳起欢乐的伴舞的时候，已经是华灯初放时分了。

赵蓓悄悄溜出大厅，顺着露天回廊走到远处。那里有一条直通到海上的栈桥，晚上海面雾很大，只有栈桥八角亭上的绿色高压水银灯还看得清清楚楚。

赵蓓向浓雾深处走去，她看见了闻非，他果然一个人躲在这里，伏身在栈桥栏杆上，凝望着大雾迷茫的远海。

赵蓓以她特有的敏感，悟到了一切，她的心像坠上了铁板一样沉重，不，更多的是酸痛。

她没有惊动闻非，靠在他身旁一根水泥灯柱上，一直过了很久，才凄惻地说：“闻非，你骗了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呢？”

闻非猛然掉过头来，看见有一汪闪亮的泪水在赵蓓的眼睛里转，又赶忙避开那可以看穿一切的目光，淡然地说：“你怎么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人呢？”

赵蓓苦笑了一下，说：“你根本没有女朋友，也根本不存在李钟秀这个人！你不过是利用一个同学的信封，找人另写了一纸所谓情书，拿来掩人耳目罢了。”

西洋镜既已拆穿，闻非倒也无须再一味地骗下去。他强作欢笑着说：“难怪人说，你的精明在常人之上。算了，一切都是过去的事了，请你不要告诉任何人，特别不要告诉震遥，你能答应我吗？”

他很激动，眼里也积满了泪花，却强忍着，没有让它们流下来。

赵蓓点了点头：“我……答应你。那么，从今往后，你就要疏远我们了吗？”

闻非说：“你想哪儿去了！难道男女之间除了爱情以外，就不存在友谊了吗？不是情人就是仇人吗？我们应当比传统的世俗观念更高尚一些。”

闻非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此后他没减淡对宫震遥、赵蓓的友谊，一如从前。

赵蓓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始终没有把这件事情的真相告诉宫震遥，倒不是因为怕刺伤宫震遥的心，却是为了使她与闻非间那圣洁的友谊得以天长地久。赵蓓是那种可以让不该说的话烂到肚子里的人。后来，她后悔了，在宫震遥走上刑场之前，她真该把这件事告诉宫震遥，让他死前了解他忠实朋友的品格。可惜，这只能是永远的遗憾了！

此时，赵蓓要他谈点愉快的事，谈点什么呢？他最想知道的、又最不想问的，不是有关宫震遥的一切吗？可他不敢问。

闻非沉默了好久，才问了这么一句：“在我逃走了以后，震

遥就被捕了吗？’

赵蓓说：“是的，你走后的第七天。他是有预感的。那天我没上夜班，是夜里12点到家的，他还没有睡。堆在床底下的脏衣服他全洗好晾出去了，他给小近修剪了指甲、洗了脚。那些日子天旱缺水，自来水只有深夜才有水，他把水龙头下的贮水缸接满了。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还问他，干嘛这么勤快？他还笑着开了一句玩笑：‘我想体会一下，怎样做一个好丈夫。’后来他把他写了5年的一部书稿交给了我，那是你知道的——《论鸦片战争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覆灭》。他嘱咐我，先保存起来，在祖国需要它的时候，再把它奉献出去。他说‘中国的一切悲剧，也许在于缺少了资本主义这一环节……’他最后说，只有一件事情他办不到了，小近好长时间就要爸爸给他买一支电子玩具枪。他舍不得花钱买玩具，孩子的三轮车、积木块，全是震遥自己动手做的。他对我说：‘我不是个好丈夫，也许也不是一个好爸爸，请你们原谅我吧。’刚说完一句，有人敲门了，公安局的人闯进来，向他宣读了逮捕证，他主动伸出双手，任人家给他铐住手腕，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目光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就这样走了，永远地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说到这里，赵蓓已经泪流满面了。

闻非拼命咬住嘴唇，才不至于使那无法抑制的呜咽声从喉咙里送出来。

窗外传来一阵阵单调的海浪扑击长堤的声音，显得很凄凉。

隔了一会儿，赵蓓双手蒙住面孔，说：“我递了七次申请，要求见他一面，都被驳了回来。理由是他是中央挂号的现行反革命，没有宣判之前不能见任何人。还有，我也正在受审查，大概怕订攻守同盟吧……可惜，我再没有和他说上一句话……”

远海上传来一声声近似呜咽的汽笛声，这声音大概唤起了她心底的共鸣。她抬起泪眼，侧耳谛听着，口中讷讷地说着：“汽

笛……是这样的声音，那天就是这样的……”

在宫震遥被处死的那一天，港口海面上，就是这样一声接一声响着叫人心痛欲裂的汽笛声的。

那是一个霰雪飞扬的天气，铅色的云块几乎贴着房顶，天冷得出奇。

直到宫震遥已经被押上刑车，押往市体育馆万人大会会场前夕，市公安局才有两个人来到赵蓓住处。他们不顾卧床不起的宫大娘能不能承受得了，简单地宣布了判处宫震遥死刑的通知，随后宣读了两条纪律：一天之内，不准家属出门；不准以任何借口收尸！

全家人哭成了一团。

宫震遥怎么会判死刑？在此之前，病倒了宫的宫大娘还在庆幸：“‘四人帮’这帮狗东西垮了，天理昭彰，小近他爸爸快见天日了。”她们哪里知道，正是出于同一个原因，那个还暂时当着省委第一书记的“四人帮”黑干将，为了转移全省人民揭批“四人帮”的视线，为了“杀鸡给猴看”，才这样匆匆忙忙杀人的。

宫大娘从炕上爬起来，哭天喊地地叫着：“青天啊，睁睁眼睛吧……”

看她哭得太凄惨了，被公安局指令看守反属的街道治保主任都落泪了，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老太太出去了。

支在省委大院门前的高音喇叭里，不断传出来自体育馆批斗现场的口号声，宫大娘被拦在省委大院门岗外边。她披头散发地呼喊着：“救救我的孩子吧，他从小听党的话，他反的是‘四人帮’啊！救救我的孩子吧……”

围上来的人越来越多，人们除了同情、低泣，谁有回天之力？

高音喇叭里终于传出了一声刺耳的喊声：“将现行反革命罪犯宫震遥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口号声，沉重的镣铐声响成一片。

老太太突然张大没牙的嘴巴，傻了似的抱住广播喇叭的电线杆子，滑倒在雪地上。

那从扩音器里飞出来的铁镣声，把老人的心都震碎了，不复存在了。忽然，老太太从地上爬起来，双手在头上乱举乱抓，失声地喊着：“孩子呀！你怎么不喊冤枉啊！我怎么听不见你喊冤枉啊……”

老太太以她那善良淳朴的心，怎么会理解刽子手的狠毒？

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中国，人要聪明得多了。行刑前，省委第一书记特别指令公安局和省法院办案人，“要想尽一切办法，避免犯人在大庭广众面前呼喊反动口号！”

办法有的是。如果说割断张志新烈士喉管是一种发明，但还有点过于原始，还有比那更为现代化的不露痕迹的手段。他们用麻醉剂普鲁卡因把宫震遥的喉咙、舌头、气管，所有能发声的器官都封闭了，干净、彻底。

在那严寒砭骨的日子里，赵蓓昏倒在床上。她想爬起来。她虽然没有资格和权利去刑场为宫震遥送行，却幻想着听到那结束丈夫生命、也结束她一切的闷哑枪声，可是她什么都没有听到，只是风雪的呼啸，和海上暗哑的汽笛声。

不知道什么时候，小近失踪了。

小近要看看爸爸。爸爸从狱中捎给他的两元钱，还攥在孩子的手心里。他听街坊的孩子们在唧唧喳喳地议论，说犯人要游完街才能上刑场。

孩子人小，心里却盛满了苦水，注满了被人歧视的恶言。他不敢在人多的地方露面，头上扣着一顶小皮帽子，躲到近海大街一个铁制垃圾箱后头，冒着风雪望着通往体育馆的大路。

风在吼，雪在下，7 岁的孩子从早晨一直等到黄昏，也没见到刑车开过来。傻孩子啊，他哪里知道，他的父亲此时早已倒在

白雪和热血混杂的某个荒山脚下，再也听不到爱子的呼唤了！

直到天黑，邻居才在垃圾箱后找到了小近。他又冻又饿，已经快昏过去了，浑身上下积满了雪花，泪痕在鼻子两侧冻成了冰条，两眼呆呆地盯视着大路的远方，冻僵的手里还捏着爸爸从狱中捎出来的两元钱……

这情景，使那些当时并不明白真相的邻居大嫂们都心疼，难过得哭出声来了……

现在，小近长大了。他卸去了为爸爸戴了好几年的耻辱的帽子，他总该是一个可以和别的少年平起平坐的孩子了。

赵蓓走进卧室，从孩子口袋里拿出个塑料透明硬夹，里面夹着一张票额两元的人民币。

不用问，这就是爸爸从狱中捎给儿子的钱了。看来，赵蓓没有遵从宫震遥的遗嘱给孩子买一支电石枪。

赵蓓像对老朋友解释似地说：“小近死也不肯买枪，他说，爸爸就是被枪打死的，我再也不玩儿枪了……”

闻非那颗本来已经七零八碎的心，再也承受不了打击了。他掏出手帕揩干眼泪，站起身来走到落地大窗前，打开了一扇窗子，海风灌进来，冷飕飕的。

他忽然掉过头来，愤慨地问道：“是不是有人出卖了宫震遥？他们怎么会那么准确地抓到他？”

赵蓓轻轻地摇摇头：“这一直是个谜，恐怕永远是个谜。前几天，几位作家来采访我，他们把给宫震遥量刑的几次记录都拿给我看了——那本来是绝密的。只是，那揭发者是谁可能永远查不出来了。作家们还在查找……”

闻非叹了口气：“震遥太正人君子了！那些匿名信都是刻印出来的，并不是他的亲笔，他蛮可以不承认。”

赵蓓苦笑了一下：“你还不了解他吗？他自认为自己是握有真理的，是保卫党的声誉。我看过审讯笔录，他在第一次审讯

时，就全部承认了，承认是自己一个人干的。”

又是一阵难堪的沉默，海关大钟夹在海潮声中响起来，特别像庙上给死人做法事那种叫人断魂的钟声。

闻非看看表，已经三点钟了，再有两个多小时天就亮了。他劝劝疲惫的赵蓓稍稍休息一下，她天亮还要上早班，不像自己是个闲人。

闻非说：“你到卧室去躺一会儿吧，你天亮还要上班的。”

赵蓓微微一笑，露出那两排碎玉似的牙齿来，她摇摇头：“我不累，坐在这里不就是休息吗？况且，我今天是要告假的，真的，要告几天假，陪你玩玩。从我走进医院大门那天起，包括枪炮齐鸣的武斗年月，包括宫震遥出事那天，我都没有请过一天假。”

她说的是实话，良心不允许她轻易休息，她所管辖的十几张病床，长年有病人等着她，像是嗷嗷待哺的婴儿等待母亲。如果不是这种力量，她也许早就躺倒，再也起不来了。有人说，人一住进医院，就是废材了，你看，他们不是有用得很吗？他们可以使一个医生忘我地干下去、活下去。

闻非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的脸，似乎要从那张从前熟悉的脸孔上找到旧日的痕迹。那是一张苍白如纸的脸，从前那含蓄、深情的笑意早被岁月的风云赶走了，留下的只是疲惫、凄凉，伴着她那冷漠的美丽。这也许是耗尽了青春，销蚀了锐气，失掉了灵魂的一具美的僵尸！闻非心里吓得一抖，终于不敢再看下去。

他站起身，说：“你无论如何要休息一下，我去找服务员，再另开一个房间。”

赵蓓似乎动了一下，脸上飘过一片淡淡的红晕，大概只有这时候，她才恢复了一个女人的本来面目。

她说：“你带上门，到小近床上躺躺吧，我不想睡，就坐在这儿，不会有伤风化的吧？”

这一句，说得闻非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知道劝也无益，只好随她便了。

闻非拿了她的一个笔记本进了卧室，看看孩子睡得正香甜，不忍心移动他，就在靠窗的一张长沙发上躺下来，脚架在茶几上。

他想看几页，赵蓓希望他看。他有这个习惯，睡前随便看上几页什么文字，才能入睡。

可是一打开笔记本看下去，他就睡不成了。这原来是她悄悄抄录下来的审讯记录和省市委、法院的判决过程。

他一边看一边唏嘘流泪，以至于后来根本躺不住了。

现在，他正在看判决前的最后一次复审记录，时间是1976年10月6日，地点是市公安局拘留所。

审判员：你犯有攻击无产阶级专政、诬蔑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罪，你都供认不讳吗？

宫震遥：你们太健忘了，我从来没有认过罪，也没有摁过手押。

审判员：可是，你自己交代过罪行。

宫震遥：我再重复一遍，那不是罪行，是一个共产党员经过深思熟虑讲出来的。难道那几个野心家把好端端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糟踏得还不够吗？历史迟早要做出结论，给刘少奇、邓小平以及千千万万无辜的老干部们恢复名誉，共产党不能搞造神运动，那是对历史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背叛。如果高喊着极“左”的口号就能够让人民吃饱肚子，那是见鬼！如果越穷越是社会主义，那我们千千万万先烈的信仰不是毫无意义了吗？他们的鲜血不是白流了吗？

审判员：放毒！你这是公然在法庭上气焰嚣张地坚

持反革命。

宫震遥：你们害怕了吧？连听一听都是罪过吗？你们是人，是共产党，你们心里未见得想法不是和我一样，只是你们没有勇气承认罢了！今天，你们替那伙野心家审我，总有一天，人民会反过来把他们推上历史的审判台。好了，不必的唆，宣判吧。

审判长：根据你所犯的罪行，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处你死刑，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宫震遥：敌人比我想像的要恶毒 10 倍！一个没有犯罪的共产党员坐了共产党为敌人设的牢房，已经是千古奇冤，你们把他生存的权利都剥夺了，这是根据什么法律？我要上诉，给我纸和笔，我要一直上诉到中央。

……

闻非的泪眼模糊了视线。10月6日的最后刑讯时刻，在北京正在发生着什么事情？这正是下令处死宫震遥的总后台们覆灭的时刻，这是历史的巧合，也是历史的耻辱。

大概因为随后公布了“四人帮”垮台的消息，暂时延缓了宫震遥的刑期。宫震遥在狱中高墙里也一定会知道“四人帮”完蛋的消息的，这是肯定的。可以封锁报纸、电台，可是十月中旬以后席卷 960 万平方公里的庆祝声浪，哪是高高的狱墙所能阻隔的？

也许，宫震遥在盼望上诉的回音，他相信上诉书会递到新的党中央。他不想当英雄，但总可以凭着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资格挺起胸膛走出狱门，回到自由的蓝天之下了。

他过于乐观了。

省高级法院根本没有向上转递他的上诉书，就宣布“驳回上诉”了，仍然是维持原判：死刑。这是宫震遥惟一的一次没有在

五千年文明史上找到先例的，他真正的悲哀了。

死在“四人帮”的刀剑下，那是他有过精神准备的。眼看着一轮红日正伴随着伟大的中兴的祖国冉冉上升，自己却失去了为它工作的权利，即将长眠于另一个世界，这是宫震遥永远无法瞑目的憾事。

闻非无力地放下笔记本，本子里有一张报纸滑落地下。

他拾在手中，打开，是他在宫大娘那里看到的那一份登有歌颂宫震遥烈士事迹的那一张。

他的注意力被作家那不加渲染的白描手段所吸引了，白描固然简单，可它比任何色彩都真实。

那位作家这样写道：

下面，我只想仿效伟大作家司汤达尔处理他的素材的榜样，客观地将这一场卑鄙的谋杀的完成过程记录下来，不加任何感情的渲染。因为在这里，感情只有在冰冻的状态下，才能容忍得了如此众多的丑恶、残忍与欺诈。另一方面，也只有这样，心才经受得住在那最后的时刻里亲人之间相互思念的痛苦，和那未实现的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恨。

1976年5月31日至6月4日，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高潮中，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主持了讨论“4·15”案件的会议。除一个副院长主张判死缓以外，多数意见主张以现行反革命罪判死刑。院务会议决议：上报死刑。

6月12日，市委主管书记，在市法院报告上批示：同意报市委审批，我个人意见倾向于不杀。

8月23日，市委常委会议讨论“4·15”案件，会议纪要记载：常委多数意见判死刑，立即执行。××

（主管政法书记）意见，作为反面教员留一下，判死缓。前市委主要负责人在常委会结束时讲：“这个反革命案件极为严重，反革命气焰达到了顶点，应严肃处理。在省委批准之后，在全地区利用这个反面教员进行教育。通过开批判会的形式，与批邓扣紧。为刘少奇翻案，也是给邓小平翻案。”

9月22日，省高级法院党组织讨论，一致决议，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宫震遥死刑，立即执行。

10月7日，粉碎“四人帮”；19日，省法院刑庭一个副庭长，在修改、签发办案人写的宫震遥案件综合报告材料时，按照主管刑庭的副院长的意见，将报告中涉及反对“四人帮”的内容全部抹掉。然后，对量刑意见丝毫未作改动，直报省委常委办公室，等待常委讨论审批。

11月，中央下发的35份揭批“四人帮”材料中，点出了该省“四人帮”爪牙在计划座谈会上与“四人帮”死党一起向党进攻的阴谋，在群众起来揭发前省委负责人罪行的情况下，“四人帮”在本省的代理人亲自部署拿宫震遥开刀。

12月1日上午，办案人良心发现，向省法院副院长提出：“此案是‘四人帮’未倒时所定，是否再复议一下？”这个副院长说：“党组定了，涉及‘四人帮’的内容都勾掉了，报省委讨论。”

12月1日下午，省委常委讨论该案。常委一致意见，死刑。省委第一书记大喊大叫：“他的主要罪行是为刘少奇翻案，否定文化大革命，现在处理这起案件很有现实意义。”

执行死刑日期定为12月19日，不准上诉……

在此期间，市公安局一位局长叫市局办案人给省法院打过电话，指出：市局广大群众反映判死刑偏重，他不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

省法院未予考虑。

12月19日上午，省、市法院办案人到市公安局看守所向宫震遥宣布驳回上诉，并验明正身，准备执行。市公安局局长向省法院提出：犯人又一次喊冤不服。判刑过重，是否再向省里请示一下。

省法院一个青年副院长听了反映之后说：“主罪没有变化，仍按省委意见办。”

市公安局局长又派两个办案人向市委主管政法的书记汇报，这个书记立即向省委第一书记打电话，说市局提出：“犯人提出申诉，不好执行。”省委第一书记说：“不准他申诉。”市局报告：“犯人不舒服，要讲话，不好执行。”省委第一书记指示：“你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嘛！”

于是发生了押赴刑场前的注射普鲁卡因的事情。

……

看到这里，闻非再也看不下去了。他也感到欣慰，他感谢这位正直、泼辣、敢于还真理以本来面目的作家，用这样的白描手法，把一切见不得天日的丑恶东西暴露到太阳底下。在这篇报告文学的结束语部分，这位作家留下了这样一笔：

他们一家人现在生活得都很幸福。但是，我无法向你们讲述他们这些年是怎么生活过来的。

这一切，将来让小说家们去写吧。

闻非的头仰在沙发上，固执地相信：这样的小说家会有的，尽管一篇报告文学、一部小说可能给作家招来横祸（因为那些由于种种不同原因而力主杀掉宫震遥的人，除了极个别的“四人帮”死党之外，大多数还坐在原来的椅子上，他们可能因为不舒服而起来算计作家们）。但是，闻非乐观地相信，作家的良心是和人民相通的。良心，不正是胆识的源泉吗？

冤魂游荡的大海

7点钟光景，闻非12层楼的寓室电话铃不断地响起来。先是郭福临的，随后是梁小星的，都声称马上来看看闻非。

在餐厅吃早餐的时候，闻非对赵蓓说：“他们都活着，早见晚见都不要紧的，我打算先到乡下去，看看李纯的妻子。”

赵蓓点点头：“要我陪你去吗？”

闻非说：“当然。不过，得先把小近送到学校去，他要迟到了。”

闻非征得了赵蓓的同意，打电话给一楼总服务台，要了一辆菲亚特牌轿车，带着小近跑下楼去，送他上了车子。

孩子高兴极了，竟然是他一个人坐一辆轿车去上学——不是借光！从前，他连借光都不曾借过呀！

但是，闻非却没有再要车，他提议说：“还是同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一样吧，我非常想乘公共汽车到巴鱼湾去。”

赵蓓说：“你想得对，倘若我们显眼地坐轿车去看秦淑颖，首先就要刺痛她的，她这几年已经变得神经质了。”

他们走出北海宾馆大门，来到中山广场汽车总站，找到了远郊汽车站牌，买了票，上了班车。

通往巴鱼湾的班车一天八趟，上下午各四趟，倒也方便，因为巴鱼湾有一座农学院的园艺农场，有些职工是跑通勤的。

车里并不拥挤，明晃晃的太阳从玻璃窗直射进来。车子沿着滨海大街向东飞驰，前方出现了海员俱乐部穹窿形建筑，还有伸向蓝瓦瓦海水中的栈桥。今天没有雾，栈桥八角亭在蓝缎子似的海面上映出的影子特别清晰。

赵蓓侧过脸来，看了闻非一眼，那意思好像在提示他：看见了吗？栈桥！

闻非当然看见了，他是漫游归来的游子，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对他都有非凡的吸引力。

他明白赵蓓那眼神的意思。在那雾 的月夜，他和她在栈桥旁有过一次彼此永生不会忘记的谈话^{潺湲}！

闻非叹口气，目光仍盯着海水：“你履行诺言了吧？”

赵蓓却滴下泪来，说：“是的，可那实际上等于对一个正直灵魂的欺骗。”

“不，”闻非说，“不能那么看。为什么一定要把本来很甜的糖水熬糊变苦呢？假如有在天之灵，他会得到安慰的。”

“不，”赵蓓说，“最好是没有在天之灵，否则他的灵魂不会得到安静。我从来没对他隐瞒过一件小事，只有这一回撒了谎……”下边的话她咽回去了。她记起了那个不眠的新婚之夜，宫震遥大概察觉了赵蓓脸上怏怏不快的神色，就问了她一句：“你有心事瞒着我，是不是？你说，你爱石油大王超过我，是不是？赵蓓说谎了：“没有的事。”丈夫又问：“他是不是在玩什么把戏？他那新娘子怎么突然不来了？”赵蓓在继续替闻非、也是替自己圆谎：“你太多心了，怎么会有这种事？闻非所以不快，那是因为女朋友到了北京后病倒了。”

她以后再没有听到丈夫提起过这件事，包括后来闻非戏剧性地宣布他与克拉玛依女郎因“性情不合”解除婚约。

谁知道宫震遥是轻信呢，还是有意回避此事不去触动她的心事？

现在他去了，永远地去了……另一个却又回来了，就坐在她身边，这是痛苦呢，还是……她自己都分不清。

有点破旧的老爷车里充满了汽油味道，闻非把车窗摇下来一半。湿润的海风从窗口扑进来。大海真美啊，碧蓝蓝，水天一色，有几只海鸥抖动着长长的翅膀在掠浪低飞，传来好听的鸣叫。

赵蓓十分严肃地提醒他说：“你要小心点。秦淑颖是个古怪的人。自从航运局政保处给她送来了她丈夫的死亡通知书以后，她哭了很久，又骂了很久，后来可能精神不正常了，抱着孩子跑到区法院，要求办手续，和李纯离婚，人家告诉她，没有同死人办手续的规定，她却不服，天天去吵。”

闻非的心又发紧了，问道：“秦淑颖原来不是花样滑冰运动员吗？她怎么到了乡下？”

赵蓓说：“被开除了。那年冰上运动队出国，本来有她的，她是教练员嘛。可是李纯‘叛国’的事一出来，她被取消了资格，被隔离起来了。有人怀疑她与丈夫密谋好了——一个从海上私逃，一个借公开出国机会叛国。大概那时候说二乘二等于八都是成立的，她就被赶到了乡下。”

“现在早该落实政策了。”“怎么她还不回体工队？”闻非问道。

赵蓓叹口气说：“体工队党委同意给她平反，也同意给李纯摘掉‘叛国’的帽子，但落实政策办公室迟迟不批。他们说：“右派错划的有文件，外逃的没有上头精神，还要等一等。”

闻非的心像被什么咬了一口。没有逃的要判死刑；逃走失败的人，死了还要戴上反革命帽子；只有他这逃走成功的人是幸运儿，仿佛倒成了真正的英雄。这是为什么呢？他百思不得其解。

赵蓓又说：“秦淑颖有点变态，我真不大敢去。有好几次，我和小梁去给她送钱，都被她赶出来了。许炎更惨，差点被泼了

一脸脏水。你就更不同了，她说不定拿起棒子打你……”

闻非深深地叹了口气：“我是该打的。也许只有挨上几棒子，我的心才能轻松一些……”

鲑鱼湾是个风景秀丽的海湾。如果你乘坐云雀直升飞机凌空看它，你会被鲑鱼湾那修长的弧形海岸线所吸引，海潮光滑的浪条徐徐滚到沙滩上，像给一件大袈裟滚上一道白边。

这里如果不是因为 10 公里以内的海水都不足 10 尺深，它一定能辟成一个天然良港，但现在只能作为近海渔场，养珍珠，人工繁殖海带。闻非一走下公共汽车，就看到了漂浮在海上的玻璃圆球，每个球底下都拴着一束人工培育的海带，这样，就不会被退潮的海水带走了。

闻非是 D 城人，到这海产丰饶的鲑鱼湾来，却是第一次。

鲑鱼镇是个秀丽而清幽的居民点，民房都是白色条石垒起来的，大约怕海风，窗子又高又小，但仍不减这种独特石屋的雅致。

这里是苹果的故乡，徐缓的山坡上到处是枝干扭曲的苹果树，树干根部一律涂着一米半高的石灰，果树多得出奇，房前屋后自不必说了，连街道两侧的风景绿化树都是苹果。

闻非和赵蓓走进镇子，闻到一股鱼腥味。原来十字路口两侧是鱼市，现在的政策，准许渔民们把业余时间捕捞或钓到的鱼拿到市上出售，镇子也就显得有点生气。这季节正是青鱼上市的时候，沙滩上、房屋门前，成了晾晒腌制青鱼的工厂，到处是鱼。

他们打听了别人后，知道秦淑颖仍住在镇子的最南端。

路经小镇供销合作社时，经赵蓓提示，他们走进去买了几包点心。糖果是本地出的，做得很粗劣，有什么办法呢？

李纯的妻子和一户渔民合住一幢石条房子，有一个用果树围起来的小院。这早晚正是苹果树开花的季节，惹得蜜蜂在小院里飞来旋去，嚶嚶鸣叫。院子里收拾得很干净，连根草屑都找不

见，有两只大白鹅在空旷的院子里晃来晃去。

看来主人都下海了，门钉锦儿上别着一根柴棍。

赵蓓懂得渔村的规矩：渔民们不像城里人那样怕贼，正确点说，不是不怕，是很少有贼，因此一般都不上锁。客人来访，哪怕主人外出，你都不妨拔掉门钉锦儿上的小柴棍，自己进去就是了，不会惹得主人不痛快。

赵蓓打开院门，两只大白鹅警惕地“嘎儿嘎儿”地叫着走过来，伸长着脖子，似乎摆出一副向生人进攻的架势。

这时，西屋的门开了，一个10岁左右的小男孩跑出来。他颈上戴条红领巾，是红绸子的，簇新，显然没有下过水。这孩子有一张大圆脸，眉毛短而黑，像粘在眼睛上面的两颗大蚕。嘴有点大，嘴唇偏厚，有一副憨厚、爽直的气质。

赵蓓回头看了闻非一眼：“真像啊！”

闻非也笑了，可不是，这孩子的脸型、眉眼，像根据李纯的模样复制成的一样，只是缩小一号罢了。

闻非正要说什么，那孩子说话了：“你们找谁？”

闻非笑道：“就找你呀。喂，你叫李什么？”

那孩子眨眨黑眼睛，摇摇头：“我不姓李，我叫秦大海！”

哦，是这样！闻非明白了，他是随着妈妈姓了。这不是风俗，也不是特别有什么纪念意义的姓氏。谁都知道，在中国，凡是随妈妈姓的孩子，总有点令人伤感的经历，有的与母亲的不幸婚姻有关，有的则是一种政治后遗症。不用说，秦大海是后一种产物。

赵蓓问：“你妈妈不在家吗？”

孩子眨眨眼，说：“妈妈去打鱼了。今年青鱼多得很，海水都直冒泡……你们是谁？妈妈从来不让客人到家里来。”

他说的是实话，赵蓓就吃过闭门羹。

赵蓓说：“我们是你妈妈的朋友，是来看望她的，能让我们

进屋吗？’

秦大海挺为难的样子，故意装出一副老成的神气，皱眉想了想说：“你们光是妈妈的朋友吗？那就好了。千万别是爸爸的朋友，我没有爸爸。”

闻非心里一阵发酸，他看了赵蓓一眼，心里想，李纯给这一家人的生活罩上了一层多么可怕的阴影啊！可这能怨李纯吗？大海的妈妈秦淑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是不可理喻的精神病患者，还是至今不肯原谅她丈夫的心胸偏狭的女子？倘若是后者，秦淑颖为什么这么多年不肯再嫁呢？

孩子认真极了，当他确信这两位客人与那陌生而可怕的爸爸毫无关系时，才放闻非和赵蓓进屋。

石头结构的房舍外表华丽，里面却不大考究，甚至有点寒酸。石条墙壁的缝隙没有用水泥勾好，潮湿的壁上爬着钱串子和潮虫之类的东西，屋子里一股霉气。

屋子的陈设极其简陋，一张小炕桌放在炕上，摊着几本书、笔记本，方才孩子无疑是在用功。几件炊具放在一只老式橱子里，和几本杂志摆在一起，旁边有一条长长的板凳，能容5个人坐，炕角摆着两套铺盖。这就是全套家具、物品。

整洁、清贫，这是屋子主人留给闻非的第一印象。

两个客人被让到长条凳上坐下，孩子跑到厨房里，一转身，端回两杯水。闻非一拿到手中，凉冰冰的，呈淡黄色，有一股清幽的香气透出来。

孩子见客人发愣，露出两颗小虎牙笑了：“好喝呢，是蜂蜜水。”

闻非抿了一口，凉爽，带有花蜜的甜味。

闻非想从这间屋子里找到一点有关李纯的旧物，哪怕是一张照片也好。

没有，一点痕迹都没有。好像女主人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中从

来没有过李纯这个伴侣，连匆匆过客都不是。

闻非问好奇地望着他的大海：“你家有影集吗？”他用手比成方形的四边，又解释了一句：“装照片的。”

大海晃晃小平头：“全烧了。从前有的，妈妈全烧了，还有书、衣服……”

谁的书和衣服烧了？一定是李纯的。看来秦淑颖发誓不让李纯的痕迹留下，她是恨他的。

闻非的心又像被什么螫了一口，又麻又痛。他喃喃地像自语似的说：“但愿她能原谅那可怜的好人。”

赵蓓懂得这句话的意思，惟恐说穿了成了不受欢迎的客人，只是缄默着。

孩子又去做他的作业。

闻非凑到炕桌边，见那孩子正在草纸上算一大堆算术题，很简单，只是多位小数点连乘法，不过太麻烦，那数字大得有点像天文数字，演算了好几页草纸尚未得出答案，看来这是老师为培养孩子的耐性和精确性才出的题目。

闻非悄悄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个小型电子计算器来，在字盘上摁了几下，对孩子说：“积是 93345656.35。”

大海刚好满头大汗地得出了答案，他有几分讶然地望着闻非：“你是用心算的吗？”

闻非像变戏法似的亮出电子计算器来，又当场给孩子表演了几次。

大海被这神奇的玩意儿吸引了。扔下笔，把它拿在手里，自己试着摁了几回，那显示出来的绿色阿拉伯数字答案，精确又异乎寻常的迅速。

这孩子太闭塞了，他有生以来头一次看到计算器。

闻非说：“送给你吧。”

大海心里当然高兴，甚至有点信不实，憋红了脸把计算器推

给了闻非：“妈妈会骂我的。”

赵蓓笑眯眯地说：“你拿着吧，是这个舅舅送给你的，他是你舅舅！”

孩子似信非信，他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不是舅舅，若果真是，那当然好了，要舅舅的东西，是不会被妈妈责罚的吧？

大海终归是太喜欢这神乎其神的東西了。从前，妈妈从D城卖鱼回来，给他买一块三角板，一个泡沫塑料文具盒，他都能搂在被窝里乐半宿！三角板啊、文具盒呀……比起电子计算器来算什么！

他控制不住自己了，拿起了电子计算器，看了看第二道习题，毫不犹豫地摁了几下，就要往作业本上抄答案。

“哎，这可不行。”闻非伸手摁住了他握笔的小手。

赵蓓柔声说：“好孩子，电子计算器不是叫你偷懒的，它只能在你长大的时候用。”

孩子眨着眼，乐了。他点了点头，不好意思地把它装到了塑料套里。

以电子计算器为媒介，孩子很快和两个客人混熟了，成了朋友。

赵蓓问道：“妈妈对你好吗？”

大海点了点头：“有好吃的，妈妈总是留给我吃。”

大海停了一下，又说：“妈妈流眼泪的时候对我好，让我念好书，长大为人民做好事情……”

“没有打过你吗？”赵蓓又问。

“打过。”孩子说到这儿，大眼睛里有几分困惑。“那不怨我。老师让我填写表儿，我把爸爸那一栏勾了，老师不让，她说，爸爸死了要填，离婚要填，是反革命也要填，你总不是石头里蹦出来的。我就拿回家来叫妈妈填。妈妈先前不理我，我哭了，非要她填，妈妈就把我打了……”

赵蓓望着他胸前的红领巾：“入少先队了？好孩子才入得上呢。”

大海很知道羞耻，他说：“上星期我才入上，是全班最后一个。”

赵蓓当然明白这里的奥妙，她感到心里一阵阵绞痛，不敢再沿着这个问题问下去了。

闻非问道：“妈妈在队里干什么？”

“打鱼呗！”大海有几分自豪地说，“张奶奶说，妈妈是天生的渔家婆娘，头一回上船就不吐、不晕……”

闻非苦笑。那当然了，一个运动员，是在秋千架子和健身圈的飞轮里练出来的功夫嘛！

闻非等了好一会儿，问道：“妈妈几点钟回来？”

大海推开小窗户探头向外望了望，说道：“你们看，风信旗朝岸上转了，说不定顺风船快，天不黑就能到家。”

海边的孩子都懂得看风向啊！他说得不错，船坞响起了螺号声，好些渔民的家人在空寂的街道上跑过，奔向了船码头，这就是说，渔船归来了。

大海扔下书本，赤着脚奔出了屋子。

不知为什么，闻非的胸膛里擂鼓似的响起来，他有点怕。

赵蓓望了他一眼：“有点紧张吗？”

他点点头。他怎么能不紧张呢？他是怀着一种负荆请罪的心情来到巴鱼湾的。他知道，他所到之处，给人们带来的绝非美好的回忆，他仿佛是个厄运的天使，专门去揭别人痛定思痛的创伤！

他是个有良心的人。正因为有良心，他的心才不能一日稍安，觉得这家被抛弃在荒海天涯的孤儿孀妻，都是他的罪过。

他不由得又回到那不堪回首的日子里去……

7年前，在那个疾风骤雨的夜里，为了生存，为了维护人的

尊严不受到毁伤，闻非和李纯带着宫震遥送给他们的一株忘忧草，向茫茫风雨中的“希望号”巨轮游去。

他们有内线，那就是许炎。他遭贬了，被赶出船舶研究院的大门，下放到码头上送往迎来，负责停港船只的机械部分检修、保养，得以熟悉每条船的去向、起锚时间及海员们的活动规律。

连许炎自己都没想到，他自认为倒霉的差使却成了替朋友们提供方便的机缘。

“4·15”案件爆发后，包围圈逐渐缩小，有一天，宫震遥半夜叩响了许炎的门，身后跟着李纯和闻非。

宫震遥向老大哥宣布：“4·15”案是我们三个人干的。赵蓓一个表哥在市公安局二处工作，他说，我们三个已经成为最小范围的重点怀疑对象，很可能在最近几天被分别隔离，然后逮捕。

许炎吓了一跳，他把朋友们让到屋子里，说：“胡闹！人人都看得明白的事，为什么人家不捅这个马蜂窝？除了送死，无济于事。这么大的事，你们都不跟我商量一下……”

许炎话没说完，李纯打断了他：“吃后悔药有什么用？现在是找你想办法来了。”

许炎仍按自己的思路说下去：“我看了你们传单的影印件，真骂得痛快淋漓。研究破案那天，看过影印件，我们那些人，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眼，都悄悄溜走了，这是对你们心里的赞许啊……可这有什么用？我早说过了，咱们不是政治家，研究点学问，对国家尽一分力，就行了，你们硬是不听，忽而去捍卫什么路线，忽而又觉得上了当……现在怎么办？”

宫震遥说：“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引颈就戮，用血去唤醒民众；另一条是逃走，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当然是后者，也只能是后者！”许炎说完，在书房中踱了很久，才站住脚，“你们听我的吗？可不准后悔。”

李纯说：“你说吧。”

许炎说：“后天早晨五点半，有一艘开往日本的货轮‘希望号’，拉的都是瓷器、蕨菜和大豆。这艘船不在港口上货，今天夜里海员都登陆休假了，船上人很少。我熟悉这艘船，有几个不易发现的死角。你们若是同意，我在今夜 12 点掩护你们登船，我给你们画货位图。”

李纯火了：“你让我们叛国？”

可是，天下之大，已经到了他们无立锥之地的時候，只要不想无谓地去死，又有什么生路呢？

当宫震遥经过一阵思索之后下了决心时，四个好朋友抱在一起痛哭起来。他们不是为生离死别而哭，他们是在悲悼自己无家可归的命运，在悲悼“爱国有心，报国无门”的处境啊！

为了不至于饿死，宫震遥出去搞食品，当然只能带压缩饼干。本来这个任务交给李纯去办，是手到擒来的，他们体育学院的仓库里就有几箱，是给野外训练队储备的。不过，任何人都不同意放这个一勇之夫出去，生怕他露了马脚。

两个小时后，他们分别化了装，溜到虾须湾海港隐伏下来。

宫震遥是最后一个来的，但是他决定不走了。

这时，许炎在栈桥方向亮起了绿色手电光亮，一共三下。这就是说，一切正常，指令他们按预先的布置偷渡。

于是，满脸泪痕的闻非和李纯，在腰间结扎好用塑料口袋盛好的压缩饼干，向深海潜游了。

头上大雨如注，面前猛浪掀天。泪水是咸的，海水是苦的，闻非和李纯十分艰难地在巨浪中向远方黑黝黝的影子游去。那就是“希望号”，希望真的在那里吗？

这长达两海里的路程，也许比闻非走过的前半生都要艰辛！有好几次，他都丧失了信心，一点气力都没有了，真想停住手脚，葬身大海算了。

不知是李纯觉察到了朋友的心情了呢，还是单纯出于友谊的

力量，他始终像监护人一样，不离闻非左右。最后，他是凭着运动健将的膂力，硬是把闻非拖到城垣一样的铁皮船舷下的。

大力士又一次发挥了他的长处，他从身上解开尼龙搭索，抛到船舷钢缆上，矫捷地攀援上去，再把闻非吊上去。

成功了！

他们人不知鬼不觉地从后甲板绕过去，通过一道通往烟囱的窄小盘梯，躲到了“希望号”涂着国旗的大烟囱过道死角里。他们在那里度过了难堪的一天一夜。

千不该万不该，李纯一定要另找一个避身地点。他说：“我们两个人不能躲在一处，万一被发现，岂不是一网打尽了吗？能逃出去一个，就是百分之五十的成功。”

闻非虽然觉得他说得有几分道理，可又不愿意让他离开。两个人在一起，遇事总还有个商量啊！可是闻非扯不住他，李纯像西班牙牛一样有力气。他到底带上一些压缩饼干，悄声向闻非说了句“在遥远的樱花之国再见”，就走了。

他们就这样分手了。

李纯没有看到日本列岛上怒放的樱花。他那生命力旺盛得如同戈壁滩上骆驼一样的身躯，就永远泡在苦咸的太平洋水底了。

李纯趁夜深灯暗的机会钻到货舱最底层，躲在六号货位后，那里堆着山一样的景德镇瓷器。在巨大的货箱角落里藏个把人，那是十分安全的。但是第二天早晨开船前，有几个船员来到了底舱，逐一地翻查各个货位的角落。他们开亮了所有的灯，还拿着手电，在寻找一捆尼龙缆绳。

李纯的处境十分危险，他随时有被发现的可能。在船员们的脚步向他走来时，他一边向后退缩，一边紧张地搜寻，想找一个脱身的地方。终于，他发现了左边有一个开着的厚重的水密门，便一闪身躲了进去。

这里暗得很，像冰箱一样透出刺骨的寒气。他立刻意识到，

这间充满鱼腥味的房间是冷藏室！他正要设法走出去，却听得水密门砰地一声关死了，冷藏室里漆黑一片。呜呜响了一阵之后，冷库里温度骤然下降，他冷得直打战。可是任他拍破了门，也没人理会，除了船员们来取冷冻食品，谁会来开门呢？

当“希望号”向正东日本海方向行驶了一天一夜以后，遥远的太平洋上出现了第一束曙光，疲惫困顿的闻非被一声声沉重的汽笛声惊醒过来，吼声震得他耳鼓直跳，汽笛离他太近了。

他睁开惺忪的睡眼，从窄小的过道坐起来，只见海面上滚荡着暗灰色的波涛，船头那面，目力所及的凸起海面上，抹上了一条玫瑰色的影子。他知道就要天亮了，他庆幸又安然无恙地度过了一个昼夜。正在惦念李纯的时候，忽听甲板上一阵骚乱。

他心悸地偷偷望下去，只见一些水手拥在前甲板上，连袖口带着三条金杠和金锚标志的船长都出来了。

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时候，正是船员们关紧水密门，躺在摇篮样的软床上甜睡的时刻呀！

紧接着，他看见，有四个水手从底层货舱上来，抬着一个直挺挺的人！

天哪！那一定是李纯！别人会有那么高大的身躯，那么重的分量吗？

怎么了，他暴露了吗？他为什么一点都不挣扎、反抗，竟像睡熟了一般呢？

这时，他听见了一个袖口有三道金杠的青年人大声对船长说：“一个偷渡私逃的人，误钻到冷藏室里去了。发现他的时候。估计已经停止呼吸 12 个小时以上了。”

闻非几乎哭出声来。他真想从扶梯上跳下去，伏在可爱的朋友尸体上痛快地哭一场！他太可怜了，这样地惨死了……日后他将怎样向宫震遥和李纯的妻子、儿女交代呀！

船长平静地蹲下身去，看了看李纯的面孔，说：“能验出他

的身份吗？’

三副递上了李纯的证件：“死者是 D 城体育学院助教、运动健将。你看这张照片，我好像在哪个运动会上见过他”

这是可能的，海员中有不少人是体育爱好者。但如今，他们不再是在体育馆看台上欣赏运动健将的杰出技艺，而必须替他料理后事。

闻非看见，那年老的船长似乎不忍再看死者，扭过头去，眺望着红日升腾的焯红一片的大海，半晌，才说：“不管怎样，他毕竟死了。按照我们海上的惯例，为他举行水葬吧。”

船长匆匆地走了。

闻非是怀着怎样一种心痛欲裂的大悲大恸，看着陌生的船员们把李纯浑身上下缠上白布，坠上铅板，送到暗无天日的深海的呀！

这一刻，闻非觉得从来没有过的孤独、可怕。这以前，尽管他和李纯不能见面、交谈，可毕竟都在一条船上，他们的心在一处跳动。现在完了，他是真正的孑然一身，像一个失掉一切希望的人，正任凭一块烂木板把他推向遥远的、迷茫的大海……希望在哪里呢？

……

如今，几经人生痛苦的沧桑，当年失掉希望的绝望者远渡重洋，回来了，这正是他的祖国重又升起希望的太阳的时刻。可是，李纯没有熬到这一天，他的热血沸腾的心脏，在当年那冷酷中冻结了。他的希望随他的躯壳一起，被埋到了几千米深的深海，永远伴着海底荒凉的沉沙！

闻非将怎样来见李纯的妻子呢？道义和良心审判了他整整 7 年，仿佛就为了等待这一时刻的判决，而这威严的大法官就是李纯的妻子秦淑颖。

院子里一阵脚步声打破了闻非的思绪。他一扭头，见赵蓓已

经从条凳上站起身向门外迎去。闻非下意识地起身，却没有勇气向前走。

厨房里人影一晃，仿佛是卸下了一副担子，接着新鲜的鱼腥味飘进内室来。

大海牵着妈妈的手，出现在房门口。儿子叫道：“妈妈，舅舅在那儿！”

这一瞬间，闻非的呼吸简直要窒息了。他偷偷地向门口望去，他看见了一张淡漠得近乎有点冷酷的面孔。

秦淑颖不失为一个花样滑冰运动员，虽近中年，仍然保持着当年那窈窕的身材。虽然穿着渔家的防水服，身材的曲线还是没有被掩盖。闻非跟她并不熟，只见过几面。她与李纯恋爱和结婚的年月，一年总有大半时光消磨在比赛场、集训地。留给闻非的印象，她是美丽的，瓜子脸，有点向上弯的嘴唇时刻都带着笑意。

记得她和李纯举行婚礼的时候，朋友们自然都去祝贺，也包括胡闹。新娘给客人点烟，这是惯例。闻非那天有意叫新娘难堪，每当她擦着一根火柴凑到闻非嘴边时，闻非总是从叼着香烟的嘴唇缝隙里巧妙地吐出一股小风，把火柴吹灭。她不得不重点，一直划了半盒火柴，仍是笑着，耐住性子一根根划下去。后来还是李纯沉不住气了，走过去一把夺下闻非口中的香烟，挥起小筐箩般的拳头，只轻轻一碰，便把闻非连同椅子一起碰翻在地上，惹起一场哄笑。

可是，眼前这个女人就是当年那位永远带着笑容的全国花样滑冰冠军吗？不，他无论如何都不敢相信！

岁月，不，生活，好像把她那微微翘起的嘴唇向下拉，拉成了现在一副冷酷的样子。

闻非的心不由自主地抖了一下。

秦淑颖在门口站了足足有5分钟，半眯的眼睛像审贼一样盯

着闻非，一直过了很久，都没有说话。

赵蓓惴惴不安地说：“小秦，进来坐啊！他……刚从外面飘零回来，他来看你了。”

秦淑颖冷笑了一下，说：“看我？还觉得我们能有一口气活下来也不舒服吗？请你出去，出去！”她一声比一声高，竟把大海吓傻了，怀里抱着计算器，直往赵蓓身后躲。

闻非幸好有思想准备，不但没有生气，反倒向门口走近一步：“我知道，你恨我恨得对。可是，在那种年月，我们实在连保护自己生存下去的权利都没有啊……到今天，难道你还不肯原谅我吗？”

秦淑颖厉声说：“住口！我谁都不原谅！你们男人坏透了，你们眼里还有什么道德、良心？”

一听她连李纯都骂到了，一种朋友间的情谊使他说出了这么一句：“不，你不能这样，李纯是好人，你应当了解他……”

话还没说完，啪地一声，秦淑颖狠狠掴了闻非一个耳光。随后，她从儿子手里夺过闻非送他的计算器，狠命地摔在地上，还用力跺上几脚。好像这还不能解恨，她的脸扭曲着，可怕地冷笑着，指着闻非的鼻子叫道：“好人？我看到了！把灾难推给老婆、孩子，不管别人死活，去叛国，再混一身洋服回来，这就是好人，哈哈……好人啊……”说到这里，她神经仿佛错乱了，可怕地笑起来。

大海吓得哭起来。赵蓓又急又痛，只能流泪，却没有一点办法使一个暂时失去理智的人变得清醒。

闻非尽管当初心里希望秦淑颖能打他一顿借以消除内疚，可真挨了嘴巴，他还是大吃一惊。望着面前变了态的秦淑颖，他的心像被鹰爪撕裂一般难过。

生活的苦水，能把人泡苦，也能把信赖、友谊的神经泡得萎缩、变形，这比任何肉体的疼痛还难受！闻非能说什么呢？

过了一阵，赵蓓把闻非打发到院子里去，自己和秦淑颖在一起。

秦淑颖已经不哭了。她不管客人，独自一人坐到板凳上，挂起一片织了一半的鱼网，机械地飞着梭子织着，两只眼睛直呆地不知望着什么。

赵蓓说：“淑颖，我知道，你心里比我们还要难过。难道是我们的罪过吗？李纯、闻非、宫震遥……都是热血青年。他们如果没有思想，是行尸走肉，那他们都会活下来，可那有什么价值？我们的民族、国家，不正因为还有这样清醒的子孙才值得骄傲吗？”秦淑颖无动于衷。

赵蓓柔声劝道：“‘四人帮’粉碎这么久了，一切被颠倒的，都又颠倒过来了，你应当出来工作。”

秦淑颖突然扔下线梭子，直视赵蓓好一会儿，冷笑了一声，起身从柜子上拿起一张纸，用手一拍，说：“这是我的平反决定！哈哈，我今天就去当教练，你说好不好？”

赵蓓陪着小心地说：“早就应当这样了……”

可是秦淑颖却一把扯碎了那张纸，莫名其妙地狂笑起来，笑够了，又说：“干什么，当教练再进牛棚吗？你不用替他们来说客，我是不去的！若不，把我拉去枪毙好了——像宫震遥那样……”

赵蓓哑口无言。

在院子里的闻非也听到了。

他们都没有办法说服、劝慰一个精神变态的人。

傍晚，他们便离开了这小小的石板屋。秦淑颖没有留他们吃一餐饭，没给他们喝一杯茶。待他们一走出院门，秦淑颖简直像是驱走了瘟神一样，赶快拿起竹扫帚扫院子。

妘的一声，那个踩坏了的计算器被扫到了街上，扫到了闻非脚下。

闻非再也无法忍受了，坐在村口，呜呜咽咽地哭起来。他哽咽着说：“真没有想到，她的神经……”

赵蓓从口袋里掏出手绢丢给闻非，叹口气说：“你丝毫都不能怪她。她的精神被锁链锁得变形了，这是她惟一剩下的反抗办法。十年浩劫所留下的精神创伤，是不容易平复的啊！”

闻非抑郁地问道：“那怎么办？总不能叫她这样下去呀！她有一天会投海自杀的。”

赵蓓想了一阵，说：“治她这种病，不是一日之功。过一段，该我到下边巡诊了，我打算到鲛鱼湾来，我相信，我能让从前的秦淑颖再回到我们中间来……”

望着坠落在海上的夕阳，闻非只是深深地叹息一声。

陋巷斗室的赤子

闻非和赵蓓从鲛鱼湾一回到北海宾馆，12楼服务员就热情地迎上前去，笑着说：“闻先生回来了？您的客人都快挤破门了，现在会客室还有人在等。”

闻非和赵蓓一推开房门，人们呼噜一下子把他们围了起来。

郭福临、梁小星、许炎的老婆陈含英，还有几个孩子都在，只是许炎不在场。

埋怨无形中代替了问候。

女高音梁小星大声说：“闻非，我就知道我在你心里不挂号，怎么样？过门而不入，竟然叫人家等了这么久！”

陈含英道：“老许来过四五趟了。这下子好了，到底盼回你来了，好，我去打电话。”说完就向服务台跑。

郭福临说：“闻非的房间里电话！”陈含英这才又跑回来。

闻非不知道该回答哪个好，索性笑着任人们去品评胖瘦、衰老还是年轻。

他被朋友们簇拥着回到房间客厅。

闻非打开皮箱，拿出几盒奶油巧克力糖给晓明等孩子们吃。又过了一会儿，赵蓓的孩子小近也背着小书包跑了进来，孩子们吃着巧克力糖，在窗前玩了起来。

郭福临感慨地说：“孩子催人老啊，你看，当年‘七君子’的后代都快成人了，我们怎么能不见老？”

闻非在给朋友们倒茶，他发现，在郭福临说话的时候，梁小星总是把头掉向窗外，不屑一顾的样子。

闻非在给郭福临身旁的一个姑娘倒水，当那姑娘一抬头时，闻非认出了她，那圆圆的苹果脸……不是刚下火车时碰到的外办小翻译吗？方才怎么没有注意到她？她在这个场合出现有什么必然性呢？

在闻非端着茶壶发呆的当儿，谈笑风生的哲学家说话了：“怎么，不认识她了吗？她是余小光，在车站见过的呀！好了，现在该介绍一下了，她，就是我的爱人……”

闻非大吃一惊！他发现梁小星起身到卫生间去了，余小光的脸像喝过了高粱酒那么红！闻非看了赵蓓一眼，似乎是在求得证实，又似乎是责难她为什么没有说及此事。闻非觉得余小光还是个孩子，无论怎样往合理处设想，也总觉得她不像哲学家的妻子，倒像是女儿。

不过，闻非懂得，这种场合是不宜在这上头做文章的，也不好开郭福临的玩笑，因为有他的前妻梁小星在场。唉，他明白，如果不是出于对闻非诚挚的友情，梁小星说什么也不会在这种场合露面的。

在一旁挂完电话的陈含英走过来入了座，她说：“电话通了，老许乐得快发狂了！”

赵蓓问道：“他马上来吗？”

陈含英说：“他正在借车，把大家都接去，弄个同学会，好

好热闹一场。”

“这个东道主应当是我。”闻非说。

“你是远方归客。”从卫生间走出来的梁小星轻轻款款地迈着具有弹性的台步，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你是国际友人了。”

闻非像挨了一个嘴巴，脸登时紫涨起来。赵蓓看出了闻非发窘，赶紧岔开话题，说：“既然要聚会，就该齐全，可惜，秦淑颖是来不了啦。”

“你别怪她，”陈含英说，“她太惨了。”

“是啊，”赵蓓说，“她的理智，不，应当说是她的感情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活过来呢？”

人们吃着糖果，品着茶，天南地北地谈着天。闻非听得多，插言少，他总感到像在梦境中。

眼前那个风姿绰约不减当年的梁小星还是那样迷人，她像比所有的人都年轻10岁！是演员、艺术家不容易衰老呢？还是她那依然天真稚气的性格所致？

陈含英却苍老得不行！她比许炎高一班、大两岁，过去在船舶学院，是出名的丑姑娘。她的体形有点像男子汉，胸脯干瘪，线条模糊。她的脸很长，嘴太大，用梁小星从前的挖苦话来说：“一笑，嘴都咧到腮帮子上去了。”许炎怎么会相中她的呢？天晓得！记得许炎向朋友们公布他与陈含英的关系，并把她带到朋友们面前时，差点把大伙的鼻子气歪了！背地里，人们用各种重火器把许炎猛轰了一通。许炎笑咪咪地听着，直到排炮轰完了，他才说：“你们只挑长相，长得好能当饭吃吗？陈含英是个有才气的人，女人里不多见的。”后来大家一打听，才知道他并没有夸张。陈含英是船舶制造系的头名状元，她的毕业设计被海军设计院采用，用来建造了一种高速快艇。她并不比别人多几百克大脑，只是个用功的学生，而且她所以得到成功，那是与安静的大学生涯不受外界干扰分不开的。而这安静的原因，又确实因为她

貌丑，对任何一个小伙子都没有吸引力。没有人追她，没有人给她写情书，没有人约她去逛海滨、看电影，她惟一的领域便是图书馆。所以许炎曾经诙谐地说：“才貌不能两全，二者不可得兼，舍貌而取才者也。”这话引得伙伴们大笑不止。

许多年过去了，陈含英的鬓角挽上了白发，戴上了花镜，像个半老太太，可她是技术研究室的骨干，是工程师了。

望着她，闻非问道：“你们家还在北水路48号吗？那栋俄国式小楼冬暖夏凉，倒是挺舒服的。”

陈含英扶扶鼻梁上的镜子，说：“早就被轰出来了。臭老九还配住那种房子？”1975年老许父亲死在干校农场，正赶上反右倾翻案风，我们到乡下处理丧事回来，房子已经叫人占了，把我们赶到集体宿舍的一间半地下室里去住。去年才自己租了一间半房。”

又碰到了不愉快的伤疤！闻非真不知道该找点什么话题来谈，才能高兴。越是小心，越是要碰到伤疤，伤疤实在是太多了。

半个小时以后，从宾馆收发室里打来了电话，是许炎的声音，他对接电话的梁小星说：“宾馆不让车子开到楼前，你们都下来吧，我实在爬不动楼了。”

“岂有此理！”梁小星愤然地说，“这帮人看人下菜惯了！倘若许大哥西装革履，试试，他们就点头哈腰了。我就不信，一个研究员不如一个采买员！”

陈含英宽厚地说：“算了！习惯了，老许从来不去计较这些。”

外办是管着这家宾馆的，大约同伴们都拿眼睛瞟着接待处长郭福临，他有点脸上下不来吧，就走到阳台上。居高临下向下一望，他禁不住哈哈大笑。

人们不明白他乐什么，他点头道：“你们过来看看。难怪人

家不让许大哥车子进来，你看他弄来一辆什么宝贝车？拉青菜、煤球的‘嘟嘟嘟’。”

人们一看才明白，他所说的“嘟嘟嘟”，是柴油三轮运货卡车，南站前专供出租拉货用的。

郭福临操起电话，拨了三个号，叫道：“经理室，喂，哪位？噢，赵经理在吗？好，谢谢。”

大概对方去找赵经理了，趁这机会，他回头对陈含英说：“怎么搞的，研究员受这种寒酸待遇？即便不配备专车，总该有公车代步啊！”

“你说得真轻巧！”梁小星带三分挖苦地说，“你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呀！一个科长、股长都比教授、研究员吃香，我们是这样一种文明：认带‘长’的，不知道科学家、艺术家为何物！这不是我们的现实吗？”

闻非知道梁小星是借题发挥，却又驳不倒她。他心里真难受，研究员因三轮车被挡在宾馆门外，成功地做过多少开颅术的脑外科医生，住在窑洞一般的黑屋里，这叫什么呢？

人们都以为郭福临要向经理发发处长威风，教训他几句，注意下属的礼貌，其实他是叫经理出一部旅游车。他说：“出一辆进口的有空调的那种好了。费用吗，当然出在外办，其实，下在你账上就是了……”

闻非说：“何必要车呢？机动三轮才是真水平，摆阔倒没有意思。”

人们从电梯下来时，面包车已经等在门口了。闻非叫人们都上去，自己却坚持要陪许炎去坐“嘟嘟嘟”，他说：“他雇来了，是一片心，我不能不坐。”

赵蓓说：“也好，叫他去好了。”

车子开动前，梁小星趁人不备也从旅游车上跳下来，钻进了许炎的三轮车货篷。

如果说，从前许炎的眼镜像个茶杯底，现在简直像凸起的汽车灯了。他抓住闻非的双手，眼镜都快要贴到他脸上了，看了好久，才说：“好啊，好，你总算活着，我还以为这一世见不到你了呢……”两行泪水从镜片后头流了下来。

许炎苍老多了，连声音都变得沙哑了，背也过早地驼起来，头顶正中秃了一大块，不知道他实际年龄的人会以为他有50岁！

许炎拉着闻非和梁小星坐在车上，坐到没有弹簧的只有二十公分宽的窄凳上，防止被颠下来，还要拽好吊在帆布篷钢梁上的拉手。

嘟嘟声爆发出来，一股呛人的柴油味倒灌进车篷，车子摇摇晃晃地跑了起来。

闻非叹口气，说：“许大哥，你的负担大概太重了，你老得太快了。”

“是啊，”许炎说，“10年前，听见别人叫我叔叔都有点脸红，现在呢，经常有人问路时叫我老大爷了。哈哈，老大爷，这种尊称对我来说，不能不是一种悲哀……”

“你的身体还好吗？”闻非关切地望着他。他总感到许炎喘气又粗又费力气。

许炎说：“应该说，尚且顽健！毛病嘛，总会有点，操心多点就是了。咱们就不如搞艺术的人心宽，你看小星，还像个孩子。”

梁小星插嘴说：“你总是自欺欺人。去年你大病了一场，从参加科技大会回来，钻到实验室里，一连半个月不眠不休，结果当场昏倒。你敢拿出那次会诊的结论给闻非看吗？”

许炎被揭了老底，只是干笑：“医生的话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否则，你就只好吓死。”

闻非忽然想起了红光满面的郭福临来，就说：“福临倒是春风得意，他好像诸事顺遂。”

没等许炎回答，梁小星鄙夷地用鼻子哼了一声，说：“他？当然了。平步青云，混到上流社会去了，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

闻非问道：“你们俩怎么闹崩的？当年，可不是这样的啊。”

“是呀，”梁小星有点世故地说，“人若能退回去重新初恋，我就有经验了，我会一眼看穿虚伪笑容后头的奸滑和伪善。唉，可怜那个小姑娘，正在步我当年的后尘……”

她指的当然是日文翻译余小光了。

梁小星说的都是切肤之痛的心里话。当年她确实被郭福临吸引了，为他的风度所倾倒，为她的才气所惊服。而郭福临呢，开始对她并不热，她越热，他越冷。他自称为“反差大些”，才能“俘获女孩子的心”，倘若卑躬屈膝地去讨好、献媚，反倒容易让正经的女人生疑、讨厌。应当说，郭福临局部地摸到了一部分少女的心，这与他研究过心理学是有关系的。

“那么，你们在什么问题上的闹翻的呢？”闻非问道。

“没有。”梁小星说，“从来没闹翻过，也从来没有合过拍。他的为人处事，我看不惯。我的为人处事，大概他也反感，就这样，日积月累，非各走各的路不可了。唉，恋爱时的情人，并不等于是未来的丈夫。丈夫的一切是真实的，情人却常常披着火一样热的外衣。当你揭掉他的伪装看清本来面目时，那就太迟了。”

闻非默然，没有表示可否。他不相信郭福临会那样坏，为了给宫震遥伸冤，他不是亲自到北京上告、到处游说吗？至于自身，各有各的路，各有各的本事，不可强求一律的。“七君子”中，惟有他一个人独善其身，得以在人生夹缝中走了红运，得以在迷宫样曲折的道路上走出一条对他自己有利的路，大概还要感谢他那哲学的功底吧？

话题又渐渐扯到了宫震遥身上。

闻非问道：“震遥在狱中的时候，你们都没见到过他吗？”

许炎叹道：“谈何容易！他一直到死，都押在公安局看守所，没有往监狱转，不准见。连赵蓓都……对了，倒是小星去闯了一回，见到他了。”

梁小星不以为然地接口说：“我是不怕的，他们挡驾，我就直接闯看守所。看来人出点名是有好处的，那些看守们认得我这张脸，至少在电影、电视上常见。人们对电影都有一种神秘感，问起来没尽没休，这倒成全了我，算是走后门见了他一回，只有5分钟。”

闻非问道：“震遥留下什么话了吗？”

梁小星眼里涌出泪水：“没有。他根本意识不到会被处死，真的，我们都正准备为他出狱接风呢，许大哥特地托人买了一瓶茅台酒。那时，‘四人帮’已经打倒了嘛！我隔着铁栏杆安慰他，他很乐观地说：‘十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不过是一瞬间的时光。我们刚交中年，正是为国出力的时候，这一天终于盼到了，告诉朋友们，拿出双倍的精力去工作吧。’”

许炎叹了口气，说：“送他上路那天，只有我和小星去了……赵蓓被勒令不准出门，郭福临有外事任务，再说他的身份也不容许他太放肆……”

“屁！”梁小星愤然说，“你总是把人都当成君子！依我看，他就是怕大风吹掉了乌纱帽，因为友谊比起官阶来，是不成比例的。”

许炎虽然觉得梁小星有偏见，说得过于苛刻，却也不认为没有道理。

唉，可怜“七君子”中，只有两个人亲眼目睹了宫震遥最后的时刻。

宫震遥是被拖到尖嘴山荒坡上执行的。尖嘴山前面是大金河，下面就是大海。由于奇寒，往年从不结冻的尖嘴湾都结上了

厚厚的一层冰凌，延续到海中很远，海浪只能在远处咆哮。

天下着雪，赶来围观的人还是成千上万，附近农村，人更多些。

宫震遥被人从汽车上扔下来的时候，头上还插着招子，名字上打着红叉。

他没有跪下，在原地站了有几秒钟，深情地望了望大海，又掉过头来环顾三面围观的人群。还没等他环顾一周，闷哑、凄厉的枪声就响了，他没有立即倒地。许炎夹在人丛中，看见他胸口浸出血来。

又一枪响了，宫震遥扑倒在地，仰面卧在雪中。许炎和梁小星木雕泥塑般地站在雪地里，泪水冻在睫毛上，好久，好久，不忍离去。

那天，许炎和梁小星商量好，等到夜深人静再去收尸，但是没有成功。在围观者散去以后，尸体被扔到一辆破牛车上运走了，不知运到了什么地方……

闻非简直被这骇人听闻的事情吓呆了，直到车子停下，他都不知道。

无独有偶，原来许炎的住处也在蛤蟆塘，离赵蓓家不远。这是进不去车辆的居民大院。说四合院又不大像，前前后后拥挤着好多房子，倒像八卦图。房屋样式都是砖木结构，没有水泥，砖缝磨得又平又细，据说是糯米粘合的，这是前清留下来的建筑。由于年久失修，房瓦上头普遍盖满青苔，甚至长出手指头粗细的小榆树，有的房子地基下沉，有的山墙倾斜不得不用木头顶住。

闻非在大院胡同口一钻出三轮小卡车，就被上百个孩子围上了，大杂院里的半大孩子实在多得惊人，吵声直上云霄。

闻非简直难以想像，研究员在这种环境里研究，那真得有点硬功夫！

许炎住的是一间半东厢房，没有地板，也不是水泥地，是三

合土的泥地，由于返潮，地面一片黑色。

外面半间是厨房，厨房本来够小的了，却又在里面用三合板隔出一个容得下一张床的小屋子，从里面传出呻吟之声。乘旅游车先到家的陈含英这时正拿着痰盂在小屋里，给一个病恹恹的老太太接痰。

许炎对闻非说：“唉，自从父亲去世，母亲就卧床不起了，一年 365 天要我和含英照顾起居，老人生活都不能自理了。”

闻非问道：“为什么不送医院？”

许炎说：“送过，还是赵蓓帮了忙。不过，只在医院里住了两个星期就被赶出来了，医院说，没有治疗价值，要长期压床。”

“那你还哪有精力从事研究啊！”闻非一边说一边可怜许炎，难怪他未老先衰，即使是铁打的汉子，也要被这种生活担子压垮啊！

他随着许炎进了大一点的那间屋子，一铺炕占去了一半，地中间有一个没来得及拆除的火炉，炉筒子倒是卸下去了。屋地当中放着一张桌子，桌上堆满了各种书刊、报纸、绘图用具、硫酸纸……大概实在没有办法了，不得不向有限空间发展，幸亏老式房子举架高，许炎架了个二层棚，图书都堆在上面。

闻非问道：“书这样堆着，你找点资料怎么办？”

许炎笑道：“爬梯子呗，高空作业！有时候真伤脑筋，在棚顶翻上半天还找不到，倒弄得像个小鬼似的。”

梁小星有点愤然了：“若我，干脆不干了！你这么干，多拿多少工资啊？还不照样是 58 块钱？”

“去年他调了一级，”陈含英进来说，“是按百分之二特殊贡献调的。”

许炎打断她们：“说这些有什么意思？来，小星，帮我摆桌子。”

梁小星帮他把桌子上堆积如山的東西都挪走。赵蓓在厨房里

帮助陈含英动手做菜。

一直皱着眉头的郭福临这时打抱不平地说：“荷兰的哲学家斯宾诺莎说过：‘依据自然的最高权利，每人皆得生存。’更何况造福于社会的人呢！最近中央三令五申，照顾知识分子生活，研究员一级，住房要达到 100 平方米，你们研究院太不像样子了！不是听说在虾须湾盖了 9 栋吗？”

进来拿糖钵子的陈含英答道：“房子盖了，却并不按研究员的职务分，按工资级别，得达到科技六级以上才行。”

“那就可怜了。”梁小星说，“怕是许大哥把仅有的那几根头发都熬光了，也未能见升到六级。我真不明白，谁最需要房子？中年知识分子！他们上有老人需要赡养，下有未成年的孩子需要抚育，他们本人正是为研究出力献身的时候，可恰恰他们过得最惨，低工资、低待遇，高效劳动，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

“算了，”许炎息事宁人地说，“慢慢会好起来的，条件要随着国家的富强一道来。这些牢骚从前我也有过，可现在觉得没意思，发牢骚有什么用？”

闻非想，忍辱负重实在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美德，可对待这美德也多少要公平一点才好。

菜陆续上来了，还真够丰盛的。

这时，除掉秦淑颖，能找到的都来了。当年的“七君子”虽然再也凑不全了，有他们的妻子儿女在，也算一个盛会。

人们都围到桌旁来，有的只能在外圈站着，孩子们另辟一张小桌摆在炕上。

许炎多摆了两副杯筷，大家都明白，那是为死去的宫震遥和李纯虚设的。人们的心一下子又沉重起来。

闻非把茅台酒启了封，这还是当年许炎为迎接宫震遥出狱预备的，一直留到今天。闻非首先把那两只没有主人的杯子斟满酒，又一一给大家满过，每个人都举到了眉梢，一片沉默，似乎

都等待老大哥许炎祝酒。

许炎缓缓起身，先后拿起宫震遥、李纯的杯子，泼洒到地上，才又举起自己的杯子，沙哑着嗓子说：“为了过去的一切成为过去，为了美好的未来成为现实，为我们的祖国，为我们每个人的良心，把它，干下去吧！”

杯子轻轻地碰了一圈，人们都饮下了这杯似苦似甜的酒。

为了打破这沉闷的局面，郭福临说：“明天，我要请大家到我家聚会一次，条件稍好些。我要请北海宾馆的特级厨师去上灶，怎么样？一言为定好吗？”

腼腆的余小光补充邀请道：“都要去，连孩子都带去。我从前不知道你们这些朋友间有这么多曲折、凄惨的经历，你们真正的人……”

许炎怕梁小星说出叫大家扫兴的话，就赶紧接过来说：“好，一言为定。我替大家保证，全部出席！”

席间的气温开始回升，气氛渐渐地融和了。

一直在厨房里上灶的陈含英招手把丈夫叫了出去，好半天不见许炎进来。

赵蓓问道：“他哪儿去了？”

陈含英走进来，坐到丈夫方才的位置上，说：“我先替他陪大家两杯。煤气罐没有气了，他得现到液化气站去换，真是不凑巧，偏偏赶上今天用光了……”

梁小星埋怨说：“你真是！咱这闲散劳动力有的是，何必他去？”

陈含英道：“没关系，从来都是他去换罐，他会用自行车货架子驮，半个小时就会回来。”

哲学家又在代为不平了：“岂有此理，研究院就这样办科研人员的后勤？还要研究员们自己骑上车子去排队换煤气罐？”

梁小星弦外有音地说：“你倒像是海外来的人。研究员再大

也不如公务员，手里没权，也没有人溜须。他手里那几张图纸怕是换二斤菠菜都没人干。”

人们都笑起来。

陈含英说：“这已经很照顾了。从前没给煤气罐那时候，每隔一个月得到煤场去排队买煤球、到木材公司去买引火柴。有时候引火柴供不上，老许把家里的板凳、书箱子都劈开引火了。”

过了一会儿，话题很快引到闻非身上，大家都要他详细讲讲日本的情况，讲讲他这几年的经历。

不知为什么，闻非一谈起这些，兴致总是提不起来，他说：“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乡。”

梁小星毫不思索地说：“你是我们这伙羊群中惟一的骆驼！看看我们的衣食住行，你就会明白的。”

郭福临说：“这叫‘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就是生活的辩证法。假如他不出走，那下场是可想而知的；假如他在‘四人帮’倒台前回来，那命运同样是可悲的。今天就不同了，是上宾。”

闻非有点反感，他说：“我讨厌这种上宾，我愿意过和你们一样的日子。我不想再走了，留下来，只要不剥夺我献身石油开发事业的权利。”

梁小星不以为然地讥讽地一笑说：“你现在所以住宾馆、车接车送，像个人物，不过因为你沾了点‘洋’光，你去掉这个商标试试看，马上和我们一样，挤电车、排队买青菜，驮着煤气罐满街跑……把精力都消耗到这上头，你的事业也就要被生活的大海淹掉了！”

陈含英也说：“你现在可以拿出十分精力去工作，我们呢，只能有三分，另外三分去料理家务。那四分更可怜了，去扯皮、维护某种人事关系……唉，你还是慎重考虑。”

闻非突然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悲哀！

半个小时过去了，一个小时过去了。

许炎一直没有回来。

陈含英不禁埋怨起来：“你看他这个人，好像不知道家里等火炒菜似的。”

梁小星站起来：“我去接接他。”

她刚走到门口，研究院收发室的老刘头骑着摩托车赶来了，一进院就大喊：“陈含英，快到附属医院去！老许摔伤了！”

人们都听到了，顿时乱了营，纷纷跑出来，谁都没有心思再喝酒了，都张罗着马上到医院去。老刘头又说不清楚伤势怎么样，见陈含英着急，就让她骑到摩托车后座上，带她先走了。

幸亏郭福临打电话又要来一辆车，人们才蜂拥般地赶到医院。

谁都没能见到许炎。他被送到二楼手术室去动手术了。虽然不是赵蓓值班，她马上换上衣服去参与手术了。

据门诊医生说，许炎伤势不轻，颈椎骨折，伴有脑震荡和颅骨挫伤，送到医院时已经昏迷了。

闻非看见比他们先到一步的陈含英呆坐在走廊长凳上，两眼发直，像是傻了一般。

他不忍再看，推开门来到院子里。

花坛四周榆树墙旁放着许炎那台折断了大梁和车前叉的自行车，煤气罐上缘保护阀门的铁圈碰弯了，幸亏没有爆炸。

据医生说，液化气公司门前的街道因为修自来水管道挖开了三米长一条深沟，许炎的眼力太差了，又心急如火，只顾骑车快走，等发现那条深沟时已经来不及刹闸，连人带车跌了下去。

生活啊，这就是生活！闻非真想大哭一场！

哲学的贫困

郭福临为了为朋友们举办一次丰盛的聚餐，可以说调动了一切能调动的力量。特级厨师是从宾馆请来的，连作料都是从宾馆带来的。他从冷库里以“特需”的名义搞来了对虾，从副食品商店里买来了海参，甚至连几年都不见的鲍鱼，他都有办法弄到手。

他的菜谱八凉八热，全是一般人叫不出名堂来的名菜。

原定是晚7点开餐的，现在是6点整。余小光早把雪白的台布铺到客厅两张桌上，有餐巾、有口纸，餐具是青一色花瓷，景德镇建国瓷厂的传统产品。

郭福临亲自把茶酒柜里的酒拿出来摆了一大片。茅台、五粮液、香槟、威士忌、五星黑啤酒、天坛牌啤酒，还有果子露、汽水和葛瓦斯。

他有点沾沾自喜，相形之下，他的排场和丰盛程度，比许炎昨天的那一餐要高上10倍。他环顾一下客厅，不算富丽堂皇，却也够得上小康，这一套70平方米的房子，在D城里，能住得上的人还是屈指可数的。

余小光总有几分担心，她说：“昨天许炎刚刚动过手术，还处于休克状态，我怕大家不肯来，你应当改改日期。”

郭福临原来也曾试图改日期，可是闻非行期已近，一两天后就要启程回北京，向海上进发了。他只能硬着头皮维持原方案。

听见妻子这样说，他只是笑了笑，说：“陈含英可能不来或晚来，梁小星嘛，因为你你知道的原因，可能拒绝出席，别人是会来的。”

郭福临过于乐观了，直到6点50分，还没有一个人到达。他有点慌了。好客的主人最怕的是客人失约，他有点像热锅上的

蚂蚁，决定亲自出车去接。

“先打个电话吧。”余小光提醒道。

郭福临同意了。客厅里就有电话，处长本来是没有资格在家里安电话的，但因为他管外事，特批装了一架。

他先往北海宾馆 12 楼挂，闻非不在房中，服务台说他一天没有回来过。他又挂医学院附属医院脑外科住院部，一个女护士接的，很不客气，只说了一句“这里不负责找人”，便挂断了电话。

郭福临有点发烦，在客厅里焦躁地转了一圈，抓起衣帽勾上的帽子，说：“先来到的，你就招待，我去看看。”

余小光答应了，郭福临沿着楼梯噤噤噤跑了出去，楼下就停着一辆外办的上海牌轿车，今天是专供郭处长驱使的。

特级厨师把八个凉菜都摆好了台，热菜下好了料，该炸的都炸好了，单等客人一到就开炒了。此时他从厨房走出来，余小光把泡好的一大杯酃茶递给他：“师傅，快喝点浓茶，消消油烟子味儿。”

厨师点点头，坐到一张沙发上。

时钟在打 7 点半，不要说客人一个都没来，就是出去找人的郭福临也一去无影了。余小光有点坐立不安起来，每隔一会儿就要走到窗口去张望，过路人都常常被她误认为是客人到了。她在胡乱猜测，会不会是郭福临的那些朋友们不愿“高攀”他呢？除了梁小星，别人倒也看不出这种迹象。再不，莫非许炎的伤势恶化了，人们都守到医院里无心来赴约？她觉得这种可能性最大，于是她想到往医院挂个电话。

刚要拨号，一阵楼梯响。余小光像听见救星到来的仙乐一般，神情为之一爽，跑出了客厅。

啊？是梁小星！

余小光愣住了。她万万没有想到，第一个到达的会是她！

梁小星倒并不怎么冷漠，那张漂亮得叫人嫉妒的脸上添着一丝笑意。她见余小光发傻，就用轻松的语气说：“想不到吧？怎么样，小余，欢迎我这个不速之客吗？”

余小光的脸忽地红了，嗫嚅着退到门旁，说：“你怎么这样说呢？请还请不到呢。”

梁小星嫣然一笑，坐到沙发上去，向喝茶的厨师点了点头，然后环顾了一下房间，带几分讥刺地说：“小余，你们这个安乐窝蛮舒适呀，相比之下，许炎和赵蓓那样的房子，只能是贫民窟！”

余小光不知道她是何用意，又不好让人家下不来台，只好笑着附和：“是呀，许炎他们的待遇太差了……梁姐，怎么人到现在还不来呀？老郭去挨门请了也不回来。”

“是吗？”梁小星嘴角露出了一丝明显的狡黠的笑，像是幸灾乐祸地说道：“或许，永远不会有朋友再登你家门了。门可罗雀也算一种悲凉。”

余小光吃了一惊，她那还有几分孩子气的圆脸上，流露出几分恼怒。

“怎么，不高兴听？”梁小星有点儿玩世不恭地问道：“小余，说实话，你是不是讨厌我？”

余小光摇摇头，涨红了脸：“你说哪去了？”

“你撒谎，”梁小星启开一瓶汽水，嘴对嘴地喝了一口，说：“你脸都红了。说谎的人脸红，说明人还单纯，还没有坏透。我从前和你一样，现在学得坏多了，说谎不会脸红了。”

余小光真想甩脱她。说不过她，又不得不应付，真不是好受的滋味。她盼望快点来客人，人一多就会把她们之间的不快冲淡的。

可是快到8点了，楼梯仍是静悄悄的。

梁小星看了厨师一眼，问余小光道：“有方便的屋子吗？警

如，可以到你的卧房去谈点事情吗？”

余小光厌烦她的阴阳怪气，可又不想得罪她。余小光怕落得个“争风吃醋”的坏名声，只好不情愿地作出笑脸说：“卧房有什么不能进？走吧！”

两个人一前一后，从客厅里面的门进了一个小套间。

卧房干净利落，一个穿衣柜，一个五斗橱，一只床头几，还有一对简易沙发，一张摆在正中的席梦思床，上面罩着一条绿色毛毯，屋子显得雅素、大方，可以看出女主人是有点艺术眼光的。

梁小星坐到靠窗子的沙发上，余小光六神无主地坐到她对面的弹簧床上，望着她，不知她要说什么。

梁小星问她：“你看，我们这些朋友怎么样？许炎、赵蓓、闻非……不在人世的，你当然无法评价。”

“那还用说吗？”余小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好应付：“一提起你们这些朋友来，老郭总是称赞的。”

“是吗？”梁小星似乎笑了一笑，又问道：“那么你对郭福临印象如何？”

余小光无法回答，心里有点恼怒了。她这不明明是在挑拨离间吗？如果郭福临没有叫余小光倾倒的地方，他们相差十几岁，她肯嫁给他吗？况且，这话倘是别人问倒也没什么，偏偏出自梁小星之口，她是郭福临的前妻，既然离婚，那还能对郭福临有半点好印象吗？

余小光本欲不理她，想了想，还是给了她两句：“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希望你放尊重些，知道点自爱才好。”说罢站起身要走。

梁小星也站起来，挡住通向客厅的门，严肃地说：“你先别走！你不要以为我是那种轻薄的人。是的，在你面前，为了洗清自己，他尽可以把脏水都扣到我头上，这我并不去计较。我是替

你可怜。你像我当年嫁给他一样天真、幼稚。即使在我决定同他分开的时候，我也只是感到他庸俗，生活情趣不高。直到今天，我才真正认识了他，他是个喝朋友血的人！”

“什么？”余小光呆了，“你这是什么意思？”

梁小星复又坐下，说：“让我来告诉你好了。幸亏有一位作家，为了写小说，搜集生活素材，阅了宫震遥的全部存档，包括保存在省、市公安局有关这起案件的全部原始材料，其中当然有揭发人的材料。”

余小光有几分明白了，痛苦地痉挛了一下，双手抓住胸口，脱口叫道：“你是说，告发宫震遥的人是、是……是他？不，这不可能！”

梁小星点点头：“是呀，我更希望这不是真的，可事实是残酷的！这虽然对你是个不愉快的事，可它总是事实。郭福临是根据那一次我们7个人在一起研究江青接见以后何去何从的时候，宫震遥大骂了江青，便认定后来传单里有的词儿都是宫震遥当时讲过的。应当说，郭福临的敏感还是对了，他得到了奖赏，他用朋友的血染红了顶子，当上了处长。不过，他也心虚，他亲自要求当时的市委、省委对他的揭发保密到底。可是答应为他保密的那班人，现在垮的垮、调的调，那位作家才有可能摸清这个底细，昨天晚上，找我和闻非谈了。”

余小光“啊”地一声尖叫，痛哭起来。她无论如何想不到她崇拜得五体投地的丈夫，心灵会这样龌龊、卑劣！

她爱他吗？与其说是爱，还不如说是尊敬、感激。余小光并不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外语人才，她不过是想找个职业，才在初中没有念完时，走后门进了外国语学校。她只是一个旁听生，即或毕业，也不一定有文凭。当时，省报点了外语学校的名，要求他们把额外多招的后门学生退回去。这时，她认识了外办接待处长郭福临。她对这位处长简直是崇拜极了，他会好几种外语，待人

接物风度高雅，在女孩子们面前从不失于检点。余小光毕业前夕，大着胆子求到了处长名下。郭福临很冷淡，但是没有拒绝。在余小光已经有点绝望时，郭福临有一天把她找去了。他正在家里客厅中忙着审批外语学校送来的报表。见她进来，他什么都没说，从桌上的一厚沓志愿表里抽出一份，扔给了余小光，叫她自己看。

啊！这正是余小光的表格！

在这份盖满了朱红大印的表格上，学校和教育局的意见是一样的：该生属于旁听生，不拟分配。只有省外办签署意见的栏目空着。余小光知道，只要郭处长在这一栏里轻轻写上两个字：同意，那她就全完了，说不定像同学们一样到农村去种地。

余小光捧着那张命运攸关的表格，伤心地哭起来。

这时，郭福临从转椅上掉过身来，扔给她一条手绢，顺手夺过这张表格，当着她的面，在上级审批栏里写上了这么一句话：“该生成绩优良，经查，不属于后门入学，上调省外办，担任日语口头译员。”

余小光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当她确信这是真的而不是玩笑时，她扑通一声给郭福临跪了下去。

郭福临把她扶起来，趁势搂到怀中，粗暴地吻了她。她没有反抗，甚至觉得这些也是报恩的一种方式……就这样，当郭福临提出要她嫁给他时，她几乎没有犹豫，也没有去和父母商量，就同意了。

自己爱的人，不容易挑出毛病来。余小光从来没有认真想想，郭福临还有什么缺点。今天猝然间叫梁小星这么一提，她甚至觉得郭福临那一天把自己叫到家里，当场填表签署意见，本来就是一种诱饵，是一种交易，是他蓄谋已久的诡计，这能叫做真正的爱情吗？

余小光惶惑了，不知道该怎么办。

只听梁小星说：“朋友们都知道郭福临这件出卖良心的丑事了，有谁还会来你家作客呢？你就是预备下山珍海味，也是枉然。朋友们志同道合，讲的是真情，哪怕在一起吃糠咽菜，也是香甜的。”

余小光又呜呜地哭起来。她又害怕又后悔。

梁小星替她拭干泪水，说：“当然，郭福临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这你尽可以放心。他会说，告发别人，出于他当时政治上的幼稚，出于对党的热爱，都解释得通，应会得到保护的。可是良心与做人的道德，却是要审判他的。我本来不该来破坏你心中甜蜜的均衡，可我不愿意让他那丑恶的灵魂在他妻子面前也伪装起来，这才决心来找你。我是背着朋友们来的，请你原谅我。”

梁小星走到外间客厅，向余小光索来纸笔，写了一幅条屏，也是引用哲学家的格言来揭穿郭福临的：“火焰能烧尽谎言，也能烧毁伪善的面具，直到烧毁虚伪的灵魂。”

梁小星告别余小光下楼走了。走到楼梯口，她又回过头来说：“明天午后两点，在南郊机场为闻非送行。我是通知你的，不是通知郭福临的。”

余小光点点头，看她走远，扑到楼梯栏杆上痛哭起来。她感到，这座舒适而温暖的家，突然像荒凉的墓地一般孤寂、怕人，而真正的欢乐、幸福，却在那些经历过种种磨难的人手里，因为他们真正的人。

为了忘忧的忘忧草

一辆菲亚特牌小轿车在前面开路，另一辆大象牌面包车尾随在后，正拐过浪涛澎湃的虾须湾，向南郊机场行驶。

赵蓓和儿子小近陪着闻非坐在轿车里。车窗开着一半，海风没遮拦地扑进来，使人感到惬意。

赵蓓和闻非都沉默着。往往有这种情况，越是到了分手前的最后时候，越是觉得还有许多话要说，却又一句都说不出来了。

眼前又是海员俱乐部的穹形建筑了，还有伸向蓝汪汪海水中的栈桥。在那座栈桥的大雾之夜，他们的谈话，至今都还铭刻在彼此的心中，那是不会忘记的。

感情可以用理智来压服，却不能被理智所消灭。此时闻非和赵蓓都能够推测出对方的心思，却谁都无法打破这界限。如果说，一对青年在定情前夕都难以启齿捅破那一张纸，那是因为羞口和缺少勇气。闻非和赵蓓却不同，他们更懂得情意的分量，梗在他们中间的不只是羞口与缺乏勇气，他们当中横亘着一座山，它那样高大，那样圣洁，那是宫震遥的化身啊！如今，要他们越过这座山，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陈含英在他们面前流露过那种意思：促使他们结合。可是无论是赵蓓还是闻非，都没有一点表示。陈含英只好把这件事暂时搁置起来，留待最有权威的许炎病好以后再处理了。

汽车已经驶进了南郊机场候机厅前的广场，人们纷纷走下车来。

官方代表姓仇，是接待处的副处长。他解释说：“郭处长偶感风寒，不能亲自来送，很抱歉。”

他的“风寒”人们都清楚，大家正怕他来煞风景呢，他还算识趣。

其余的人都到了，除了卧在医院的许炎。

他们拥到候机厅里，围着闻非坐下。距起飞时间还差 30 分钟，这是最宝贵的时光了。

陈含英突然问了一句：“你……还能回 D 城来吗？”

闻非说：“我一定要回来的。这里有我的欢乐，也埋葬着我的悲哀；有纯真的友谊，也有虚伪的欺骗；产生过五光十色的理想，也毁灭过我的热情，我是忘不了它的。”

梁小星说：“但愿你忘了它，忘得干干净净才好。干吗还要回来？为了折磨自己吗？”

没有人去驳斥梁小星。她近年来那些玩世不恭的语言，人们都习以为常了，这也是生活留给她的纪念。

不知什么时候，余小光红肿着眼睛在人们身后出现了，怯生生的。梁小星最先发现了她，站起来，把她拉到前面来，相面似的看了她一阵，问道：“你和我一样，成了不受人摆布、无拘无束的自我了，是不是？”余小光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人们都明白，她和郭福临闹崩了，她离开了那个虚伪的人。从道义上，没有人会反对她的作法，她才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女孩子，谁不同情她的遭遇呢？

这次送行有点凄然。闻非察觉了，却没有法子转圜。

还是梁小星有办法，她从背包里拿出照相机、三角架说：“呆子们！干吗在这儿唉声叹气？走，到外面去，拍张照片！”

孩子们雀跃般冲出了候机大厅。

在离开停机坪 100 米的地方，夜航灯左边，有一块翠绿的草坪，茂草萋萋，萱草花随风摇摆。他们站到了一起。

只有这一刻，人们的脸都带上了笑容。

“三叉戟”就要起飞了，赵蓓她们目送着闻非一步步走向舷梯。他手里拿着一束忘忧草，每个人手中也都拿着一束忘忧草。

走到舷梯下，闻非忽然停住步子，回转过身来，深情地盯着每个人。赵蓓轻轻地走上去，像是代表所有的朋友说的：“再来吧……那时，房子会大些，一切都会好得多了……”

梁小星凄然地说：“但愿那时我们不会都成为老头子、老太婆……”

“三叉戟”昂起头冲上了高空，带着闻非和他手里的忘忧草，还有两滴清泪。

春之烦恼

—

北大荒劝农河农管局忽然传出一个消息：刚出狱不久、官复原职的老局长黎白去住疗养院了！

为什么住院，众说纷纭。有人认为黎白坐牢4年，全身许多零件损伤，需要大修；有人却按照流行的观点推测：他可能心情不舒畅。亲自接黎白出狱的农管局党委书记柳正言，见老战友骨瘦如柴、老态龙钟的样子，心想老黎是需要好好疗养一个时期，才能接手那摊繁重的工作。

这是一个初春的早晨，黎白正在临近疗养院的松花江畔散步。他披一件白地蓝条子休养员服，拿了一本《英语九百句》，沿着飘泛着白雾的江湾走着，聚精会神地轻声诵读。

这时，刚刚换上护士白罩衫的一个小护士推了一平车药品走过附近，听见有人早读，还以为是个年轻人呢，一扭头却认出是他，不禁停住平车，热情地打了个招呼：“黎伯伯，早啊！”

黎白走过去，说：“啊，抗抗！你在这个疗养院当护士有八九年了吧？”

柳抗抗点点头。她是柳正言的女儿，因为是在她爸爸赴朝作战那年生的，所以起了这么个乳名，大了也没改过。她和好多人

一样纳闷，在北大荒向四化进军的日子里，黎白心安理得地跑来疗养，叫人难以理解。

黎白坐到江边一张长椅上，说道：“抗抗，咱们订个攻守同盟怎么样？”

“攻守同盟？”抗抗眨着眼，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黎白说：“简单得很。我的一切行动，都要对人保密，包括你爸爸，你答应吗？”

柳抗抗愣了一下，眼睛突然亮了：“伯伯，这么说，你是要大干一番？”

黎白说：“现在还不好说，往后看吧。我在监狱里呆了几年，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不了解情况。我想在疗养院开几个调查会，你能给我发通知、下请帖吗？”

柳抗抗高兴地说：“保证完成任务。”说到这里，她又噘起了小嘴：“不过，你也得听从指挥，比如要按时吃药、遵守疗养院的作息制度……”

“好、好，”黎白妥协地说，“咱们是君子协定！”

两个人都笑了。

“君子协定”一直执行得不坏。有好几次骗过了来探望黎白的人。每次柳抗抗都一律“挡驾”，不是说黎白在睡觉，就是说在理疗。不过，柳正言是有点划问号的，因为他发现了蛛丝马迹，听说黎白利用疗养的机会开了好几个调查会，还和岳海划不清界限，竟然接受了他的一份告状信。这使柳正言大为恼火。

岳海是什么东西？横踢马槽的货，不是他在1966年第一个起来给黎白、柳正言戴上高帽子的吗？在柳正言看来，岳海是个吃“四人帮”狼奶长大的火箭干部，所以对他很反感。

有谁能料到，黎白竟然按照岳海的提示去行动了呢？

黎白这一次的行動并不能保密，他要去查人事档案，就无法越过人事处长杜月秋的门槛儿。这位女处长是农管局副局长、黎

白的老战友刘耀功的内助，所以他们是老熟人。

黎白从早晨就进了农管局的档案室，直到午后两点还在查阅卷宗，害得杜月秋和机要秘书林玲不得不牺牲一个午休，还得把午饭打到办公室来吃。

黎白的脸色很冷峻，头埋在档案丛中，很少说话。他索要的大多数是知识分子的档案，难为这老头记性这么好，手里连个花名册都没有，却能一连串道出几十个名字来。

黎白把案卷翻得哗哗响，越看脸色越难看。杜月秋不得不小心赔笑地在一旁守着，不敢解释，也不敢多问。说实在的，精明干练的杜月秋一听他索看知识分子卷宗，早明白了他想干什么。搞农业现代化缺乏技术骨干，全农管局上下都吵开锅了。局党委不止一次向总局、农垦部打报告要人。在这个节骨眼儿上，黎白却一头扎到死档案里想刨出金子来，杜月秋多少有点儿感到可笑。不过，她心里不能不揣个小兔子。尽管好些“臭老九”们重新结论、平反了，可还是没有使用起来，各总场、分场意见一大堆，责难人事处不按党的政策办事。可杜月秋有她的道理，不当家不知当家的难处啊！

终于，脸色阴沉的黎白抬起头来，问道：“怎么，重新结论的工作已经告一段落啦？”

杜月秋说：“按上级要求，该平反的一律平反了。”

“你别拿上级堵我！”黎白把档案袋一推又说：“平反是为了使用。”

杜月秋文静地笑了笑，说：“这些人，并没有低于文化大革命前黎局长使用他们的格啊！”

黎白被戳了肺管子，站起身说：“文化大革命前并不是一切都正确。”

杜月秋说：“党委会里不少老干部希望照 17 年的样子干，现在，总算一切就绪了。”

这话引起了黎白内心的波澜。是啊，他的老部下纷纷从农场作业队、五七干校、甚至监狱回到了原来的办公桌前，掸去旧日的灰尘，开始办公了。从表面看，一切都一如那场特级风暴到来之前的样子，还是那座工字形的农管局灰楼，还是原班人马。曾经占据这座大楼的后来者们，现在都成了历史上瞬间的匆匆过客，消失了。

在文化大革命最混乱的岁月里，黎白做梦都想把农管局恢复到老样子，他毫不犹豫地认为那是黄金时代。可黄金时代的北大荒为什么没有真正变成“北大仓”？是北大荒地力不足、土质不肥，还是北大荒人天生愚昧、懒惰成性？事实终于迫使黎白思索点问题了。

现在，他单刀直入地说：“人才难得，应当放手使用他们。是骡子是马总得牵出来遛遛，才知道哪个是千里驹，哪个是只会拉磨的货。”

杜月秋赔了个笑：“这话对……”

黎白不满地敲打着厚厚一沓档案袋，问道：“这些人平反结论后头都有个‘但是’，什么意思？”

杜月秋说：“平反是大势所趋，但是毕竟不能说这些人一点问题没有啊，所以，也得一分为二嘛。”

黎白说：“杜月秋同志，你能说你一点问题没有吗？我从来都是跟党走，谁都没说过我有什么问题，不照样关牛棚、住监狱？”

杜月秋觉得这老头说话很不在行，就淡淡一笑，没有说什么。

黎白转了个身，说：“我猜得到，你们这是给自己留条后路。万一将来有个风吹草动，你就可以说：给这些人平反，是上级有令，我们头脑并不发昏，还有个‘但是’跟在后头呢，是不是这样？”

杜月秋嘿嘿一笑，说：“老局长真会开玩笑。”

黎白突然提高了嗓门，说：“那么，说点正经的吧，怎么没有唐卓新的档案？”

杜月秋暗暗吃了一惊。她真有点纳闷，老局长怎么会突然记起了这个从北大荒消失了好多年的名字？

唐卓新是1957年南京农学院的毕业生，1958年（反右派斗争在全国结束一年多以后）被农管局划为右派分子。这是在全国独一无二的土政策。理由是这个时期农场不大稳定，一些人对官僚主义作风不满，特别是有些大学生带头给头头们提了意见，农垦总局在控制不了这“浮动”局面时，祭起了1957年使用过的法宝，掐了一批“尖”，抓了一批右派，果然农场消停了。幸亏1963年中央监委发现了北大荒农垦系统这个不可饶恕的错误，给所有“追认”的右派们甄别、平反了。不过，甄别、平反并没有改变他们的命运和地位。他们在人们心目中，仍然是“摘帽右派”。

唐卓新这个精通农业技术的大学生，便是这批“追认右派”当中的一个。他先被赶到三家子参场去劳动改造，后来就被递解回福建原籍了。

不知为什么，黎白问到唐卓新时，他发现杜月秋有点儿惊慌，她似乎有意地瞥了机要秘书林玲一眼。这些细微末节没能逃出黎白的眼睛。他觉得这里面有文章，就用严厉的目光盯住林玲问道：“唐卓新的档案到底在哪里？”

林玲显得有几分惶惑，她无疑不敢违拗顶头上司杜月秋，但良心又促使她不愿对老局长隐瞒真相，于是她趁杜月秋不注意，用手指轻轻点了点靠墙角安放着一个铁皮柜。

精明的杜月秋早看在眼里。她咬着下唇，正要说什么，黎白早向那个暗绿色铁柜走去。只见上面贴着一个标签，写有“死亡·在押·在逃”字样。

黎白用命令口吻对林玲说：“打开！”

林玲倒也很会做戏，她故意为难地望了杜月秋一眼，迟迟不拿钥匙。

杜月秋恨恨地瞟了林玲一眼，见事已至此，料定不打开是不行了，她先发制人地对林玲说：“快打开嘛！你整天昏头昏脑，说不定把唐卓新的档案塞到这里了。”

女秘书虽说有点委屈，还是很乐意地打开了铁柜。

黎白第一眼就发现了柜子里有一卷子东西，用塑料薄膜包着。他伸手掏出来，掸去表面的灰尘，打开来，竟是一卷子农机图纸！

杜月秋脸上闪过明显的不安神色，不过旋即消失。她走过来，煞有介事地叫道：“哎哟，怎么把图纸混到档案柜里来了？”

黎白瞟了她一眼，并不搭腔，把图纸一张张打开，原来是一套现代化农机具的设计图纸，有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有二百马力液压传动的大型轮式拖拉机，有电子控制精量多功能点播机，有滚移式喷灌机，也有清粮机、喷洒农药的机器……

这些图纸的右下角，都标有设计人唐卓新的名字，而定稿日期竟然是1978年6月，在粉碎“四人帮”一年零八个月以后！这就是说，这些当前北大荒急需的图纸是有人有意锁起来的！

黎白心里怒火上攻：

“这是怎么回事？”

这声音把杜月秋吓了一跳，但她马上用更加严厉的口气质问女秘书：“怎么搞的？刘局长不是叫你把图纸送给科研所处理吗？为什么保存在这里？”

女秘书差点哭了，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可怜巴巴地望着黎白。

黎白再次肯定，这其中有名堂。他料定，女秘书当着杜月秋的面是不敢说出真相的，只好暂时不问。他想起调查会上群众反

映的一些情况，感到杜月秋是个不能小看的人物，他不想在问题水落石出之前大呼小叫。

黎白在“死亡·在押·在逃”者的档案柜里翻了半天，找到了唐卓新的档案。

档案里有一份盖着劝农河农管局党委公章的复查结论表，有柳正言的签字。虽然同意给唐卓新平反，但是又有这样的决定：“鉴于该人一贯走个人成名成家的白专道路，不再恢复公职。”

接着，黎白又从档案袋里看到了从前的结论材料。他的心隐隐作痛，手颤抖着。他看到唐卓新的“错误事实”竟是那样可笑！材料中说唐卓新“攻击党的领导”，攻击了什么呢？他说：“外行领导内行，当然不如内行领导内行好。假如我们的局长、书记都变成内行，就可以少出官僚主义，少犯瞎指挥的错误……”

黎白的头嗡地响了起来。这种“攻击”，有半点错误吗？回过头来看，它不恰恰一语击中了要害吗？

更叫黎白吃惊的，还不在于唐卓新言论的正确与否，签字把他打成“右派”的，竟然是自己！他真不敢相信，那两个字是自己写上的！但是，白纸黑字，是最无情的证据！

黎白不禁回忆起唐卓新问题的处理经过。他写上这条意见时，正是部里一位司长来北大荒视察的时候。这位司长提出北大荒要以排涝为主，要大力挖掘排涝渠道，制造开沟机。没想到，在干部和技术人员联席会上，血气方刚的唐卓新竟然认为司长的指示是“只看到暂时的、片面的情况，没有看到长远的变化”。他认为，从水文资料和林木逐渐被砍伐的情况分析，未来威胁北大荒的可能是旱灾，因此他主张排涝与灌溉应当并行。但是，他的意见没有被采纳，而且司长亲自下令，解散了唐卓新的“喷灌机研制小组”，把搞这项试验的全部资金、钢材都调走了。为此，唐卓新一怒之下贴了“应当由内行领导内行”的大字报，直接给

司长上书。

结果，他被掐了尖。黎白至今还记得，司长是在怎样盛怒的情况下指示柳正言和他，要给这个“狂妄分子”戴上帽子的。

历史是无情的。近年来，北大荒大量过剩的开沟机、铲刨机都堆到旷野里生锈了。因为旱情一年重似一年，而劝农河农管局除掉去年进口了四台美国圆形喷灌设备而外，抗旱能力几乎可以说是零！

然而，提了正确意见的人，至今仍不能恢复公职，这怎么能不让黎白痛心呢？

杜月秋知道这个案子的原委，而且她知道，原来那位司长现在当上副部长了，这些因素，难道他黎白会考虑不到吗？

于是，杜月秋类似提醒地说道：“老局长，这事……不那么好办，涉及到老领导啊……”

黎白的火气又被她烘起来了：“难道老领导错了，就不应当改正吗？”

杜月秋不出声了。

黎白在屋里转了一圈，又说：“唐卓新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是怀着多大的期望把图纸交给你们啊！可在你们眼里，他的创造设计，他为祖国服务的愿望都是罪恶，都应当变成棺材瓢子，永远埋在地下！你告诉我，唐卓新到底在哪里？”

杜月秋嗫嚅地说道：“大概……还在福建……1966年被递解回原籍的。”

黎白敲打着唐卓新的档案袋：“平了反，为什么不到原籍去宣布？”

杜月秋说：“还没……来得及。”

“撒谎！”黎白说，“你们根本没想这么办！因为该抽出的材料你们还给人家保留在档案里。”

杜月秋说：“这是副本。原始材料都抽出销毁了。”

一听这话，黎白简直气得发昏，他大叫起来：“好啊！你们在给自己留后路！你们对中央的指示这样阳奉阴违！你……”

说到这里，他忽然感到一阵眩晕，鼻子流出血来，咚一声栽倒了，头重重地碰到铁皮柜上，磕出了血。他不省人事了。

杜月秋和女秘书全慌了，她们以为是老局长心脏病发作，不敢动他一下，赶忙打电话给疗养院找大夫来急救……

当黎白神志清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一点多了。

他睁开眼睛望了望围在他身旁的柳正言、刘耀功和一大堆医生、护士，渐渐回忆起了白天发生的事，禁不住还是一阵阵心里难过。他对周围的人们说：“夜深了，你们都回去休息吧，我想一个人安静一会儿。”

值班医生把柳正言他们劝走了。柳正言临走在走廊里一再叮嘱值夜班的柳抗抗：“你别偷懒睡大觉，等着取化验结果。若只是血压高倒没什么了不起，万一真是白血病，他可就……”

当时病房的门没有关严，这话恰巧让黎白听到了，他吓了一跳。白血病？这不是号称绝症的“血癌”吗？

待人们陆续走散以后，他从褥子底下抽出一本《实用内科学》，迅速翻到血液循环系统疾病那一章，仔细地看下去。

当他看到白血病的症状为时常昏迷、头晕和流鼻血时，他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这些临床表现，他远在狱中就经常出现，一则因为当时没有人认真给他看病，二则他也缺乏常识，从来没有注意过。

黎白突然害怕起来，怕什么呢？怕死吗？是的，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多么想活下来。但是若讲他怕死，实在又有几分冤枉。他在“黑帮队”里遭到酷刑毒打时，他在监牢中受到非人折磨时，本来随时有丧命的可能，但是他从来没有怕过。那么，现在怎么了？

他所以要活下去，是他觉得要干的事情太多了！从前，他从

来没有意识到自己，这个出生入死的老革命还会有什么错误，他感谢这 10 年的坎坷道路。大概人只有在自己倒霉的时候才能心平气和地、客观地思考一点问题。他是在遭受厄运的时候才清醒过来的。

清醒过来就要去干，去拼命干。他恨自己的年龄太大，醒悟得太迟了。而偏偏在这时候，什么白血病之类的玩意儿又出来捣乱！

他一分钟也躺不住了。他觉得唐卓新是个难得的人才！他哪怕走到天涯海角，也要把这颗明珠寻觅回来。

他在屋里踱了一阵子步，决定先去看看验血的结果。

他轻轻拉开房门，走廊里的灯只开着三五盏，不很亮。深更半夜，医护办公室里也静悄悄的，这时候大概值班医生和护士也都在打盹吧？

黎白甩掉拖鞋，光着脚，贴着走廊墙壁小心翼翼地向前走，一点声息都没有。

他终于蹭到了化验室门前。

带拉门的玻璃窗口敞开着。值班化验员是个梳一双羊角辫的小姑娘，趴在桌上睡着了。

黎白觉得机会难得，四下张望一阵，顺手把插在钎子上的一沓化验单抓过来，翻拣了一阵，终于找到了自己那一张。

他将化验单揣到怀中，其余的照原样插到钎子上，又蹑手蹑脚地回到自己的病房，关好门，从褥子底下抽出《实用内科学》，翻到白血病那一节，对照化验单看下去。

看着、看着，他又眩晕起来。化验单上的数据在涨大、涨大，像一束可怕的利箭刺向他的心口。

科学是无情的，它不会怜悯任何人！

白血病，千真万确的白血病！虽然黎白不是医生，他也能从对照参阅中判断出来。

他呆了！这是死刑的宣判。留给他的生命时光，已经屈指可数了。他难过地在床上躺卧了不知多久……他悄悄下床走到户外。

春天来了。可是北大荒的春夜还有浓重的寒气。仰视苍茫河汉，两侧的天琴星座和天鹰星座分外清晰。传说中的织女星不就是天琴星座中最亮的那一颗吗？它和银河彼岸的牛郎星遥遥相望，星海阻断……不知为什么，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这样强烈地怀念起妻子来了。她是被文化大革命浪潮吞没的——被活活打死了……黎白猛然感到有一种凄惶、孤独的感情袭上心头，止不住齿冷心寒……他当然更惦念还活在人间的女儿若兰。他甚至后悔，从前给予女儿的父爱太少了。她如今还待在农场作业队里，黎白急于见到女儿的心情来得那么强烈。

许多往事，在黎白的头脑里翻腾。他的思想很少这样活跃，想了这又想那，想到出狱以来，他利用住院作幌子，想摸清北大荒农业现代化的阻力。他打算从起用专业人才方面打开突破口，破釜沉舟地大干一场。但是，他已经隐约地感到了阻力之大，也许他亲密的战友们都不会同他合作，积重难返啊！

他在丁香树下徘徊着，耳畔突然响起了曹操的几句诗，那是他曾经用指甲刻画在监狱墙上自励的啊：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难道一个共产党人，反倒不如一个封建诸侯有雄心吗？

黎白好像注射了一支清醒剂、振奋剂那样，觉得周身清爽起来。他大步走向病房，动手按正常数值改动化验单。他是在欺人，却不是欺己！

就在他吃力地篡改化验单上每一个数据时，柳抗抗敲门了，而且声音有点异样。

黎白赶忙把改过的化验单夹到书里，打开了门。

他见柳抗抗脸色煞白，喘气都不大匀了，就故作镇静地问

道：“怎么了，抗抗？”

柳抗抗也不出声，走过去拿起书本，准确地翻出化验单，看了一眼，立刻哭起来。原来，她方才从门玻璃外把一切都看在眼里了。

这一下，倒把黎白弄得没主意了，又不敢大声说话，只得小声哄劝她别哭。

柳抗抗哽咽着说：“黎伯伯，您这是干什么？难道您……”

既然已经真相大白，对抗抗就谈不上有什么保密价值了。黎白惟一需要做的，就是把她争取过来，当自己的保护伞。

他抚摩着柳抗抗的头发，轻声说道：“别哭，别哭嘛。咱们商量一下，咱们不是有过攻守同盟吗？”

柳抗抗像被针扎了一样跳起来：“不，不，一百个不！我再也不替您保密了！伯伯呀，您为什么要这样害自己呢？”一边说，她一边又哭起来。

黎白叹了口气，推开风窗，让后半夜的冷风吹拂着他那发热的脸颊。他沉了半晌，才语重心长地说：“一个人，如果明白他为什么活着，为什么而奋斗，哪怕只活一天，这一天都是有价值的。我在北大荒干了20年，前10年盲人骑瞎马地乱闯，后10年我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如今，我打算按照三中全会的精神要大干一场了，自然规律却又给我定了期限。孩子，作为一个管农场的共产党员来说，看着这么好的地不能多打粮食，看着这么好的人民仍过着贫穷的日子，我的良心能让我平静、能让我躺倒不干吗？”

哭着的柳抗抗抬起头来，透过眼泪，望着黎白那大理石雕塑般的脸，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什么滋味都有。她爱黎伯伯，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爱过，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理解过这颗正直的心。

她该怎么办啊？是啊，生活本身就是这样离奇古怪，在这种

时候，医师、主治医师、科主任、院长，统统成了毫不相干的角色，她一句话可以让黎白永远离开北大荒，一句话也能让他放开手脚干一番！

黎白又说话了，是一种退让商量的口气：“这样好不好？我可以按时服用你拿来的药，但你要为我保密。目前，我不需要眼泪的安慰，需要的是工作的机会。孩子，咱们就再订一次君子协定吧。”

柳抗抗勉强地点点头。

二

化验单成了奇异的“护身符”，使黎白又获得了自由——虽然有几个医师半信半疑。

第二天，柳正言来到疗养院，病房空着。据柳抗抗告诉爸爸，黎伯伯到作业队去看女儿黎若兰了。

柳正言觉得很难堪，后悔安排得不当。父亲出狱，却不把人家女儿接回来团聚，这难道不是柳正言最大的疏忽吗？

其实，无论从干练的角度还是从友谊的角度，柳正言和刘耀功都没有这么粗心，他们怎么会忘掉黎白这惟一活在世上的亲人呢？

柳正言要的是“强烈效果”。他不打算让黎若兰以“探亲者”的名义出现在黎白面前。他想把黎白的女儿、女婿调到城里来，永远待在这个孤独者的膝下。

这算不得大事，可是也要费点周折。黎若兰好办，她不过是个普通农工，她的丈夫裴旭却是燕子坪农场的副场长，这事总得通过局党委研究一下。柳正言办事是以稳健著称的。他对刘耀功夫妻说：“调若兰进城，这是名正言顺的照顾，名正言顺地通过党委讨论决定，省得别人说闲话，也不会把责任推到哪个人

身上。”

北大荒虽说地广人稀，毕竟不是 20 年前关山阻隔、路断人稀的年月了。老局长黎白出狱、走马上任的消息早就一阵风似的吹遍了劝农河两岸。不管那些最早开发北大荒的老铁道兵们，还是好几万转业官兵，他们都一点不怀疑这个事实：黎白回来就好了，北大荒的农业现代化就支上了一根顶梁柱！

这消息飞到黎若兰耳里时，已经迟了好几天了，消息是她丈夫裴旭带回来的。

那是吃晚饭的时候，黎若兰简单地收拾了饭菜，摆在炕桌上，左等右等不见裴旭回来。她料定场里的干部大概又到哪个作业区去检查旱情了。这几年，北大荒恼人的春旱差不多都叫人们丧失信心了，去年有的队一亩麦子只收了十几斤，而春季下种竟要用 25 斤！

黎若兰刚倚在炕墙上想打毛衣，院子里像开了锅似的哐嘎乱叫，圈里的三江大白猪也在拱圈门子，鸡饿得跳到窗台上来。她只得放下手里的活去侍弄畜禽。

黎若兰今年才 23 岁，可是已经结婚半年了。按照晚婚的要求是不大符合的，但是男方大，裴旭已经满 30 周岁了。他们的结婚，是得到特批的。黎若兰本来生得单薄、文弱，从体质上看像她爸爸，可是清秀的面容却酷似母亲。几年的农场生活使她变结实了，脸上是那种黑红的健康肤色。

她从厨房二层吊棚上拿下一个小圆箩，把里面的瘪苞米往院当心一扬，猪、鸡、鸭、鹅全都挤过去争吃起来。院子里暂时安静了，她又回到屋中拿起了毛线活。

掌灯时分，裴旭回来了。

他是上海人，脸是江南人那种脸型，眉脊骨有点高，身板并不粗壮。进了屋子，没有像往常那样先奔洗脸盆去，却先走到方炕桌前，伸长脖子望了一眼饭菜：一小盆小米粥，两个大馒头，

一碟切成两瓣的腌鸭蛋，一小碟鸡蛋炒黄花菜。

见裴旭这个样子，黎若兰放下毛线活，笑着说：“真没出息，快去洗手。”

裴旭一笑，一边去洗脸一边说：“我以为今天至少是红烧肉呢。”

“为什么？”黎若兰撇了撇嘴，“你们的滚移式喷灌机成功了？还是天老爷解除了春旱？”

裴旭神秘地一笑，说：“有一个重要的好消息。”

他这一说，黎若兰的心不禁怦怦地跳起来了。她一下子想到了那个梦寐以求的愿望。近来，她总有一种幸福的预感，看来这预感应验了，因为裴旭是不大开玩笑的。

黎若兰走过去抓起毛巾，递给裴旭擦脸，急切地问道：“是不是爸爸……出来了？”一边说，眼里汪出了泪水。

裴旭接过毛巾，替她拭了泪，说：“我刚听许场长说的，千真万确，是三天前开的平反大会。”

黎若兰乐得跳起来，眼泪止不住哗哗流。她拉起裴旭说：“快吃饭，吃过饭你派车，咱们回城去看爸爸。真气人，柳叔叔好像忘了我是爸爸的女儿，连个招呼都不打。”

裴旭说：“照说，柳书记不会有这个疏忽的，假如真的疏忽了，无疑是有意。”

黎若兰高兴得只吃了半碗稀饭就觉得饱了：“你答应派车不？”

裴旭感到为难，农场倒是有四辆北京吉普，可是批给妻子回城探亲，总不能说是公事。这可是千载难遇的特殊情况，他不愿意伤了黎若兰的心，正当他思考两全之策的时候，黎若兰不耐烦了：“算了，我找许场长去，大不了我自己掏汽油钱。”说完把家门钥匙往饭桌上一扔，扭身就走。

裴旭追出屋门：“小兰，你不等等我呀！”

黎若兰没好气地说：“又不是你的爸爸，我不勉强你，小心为私事出车丢了副场长的乌纱帽。”

裴旭叹了口气，望着黎若兰走远的背影，没有说什么。他懂得此时此地黎若兰的心情，爸爸是她惟一的亲人，她能不急吗？

裴旭转身走回院子，把鸡鸭鹅猪都圈起来，把钥匙交给邻家，托付帮助照看一下，锁上门，去追黎若兰了。

当裴旭赶到场长许连云家时，花白头发的老场长正撂下吃了一半的饭碗穿鞋下地，他已经答应马上给黎若兰安排车子进城。

这不能不叫裴旭暗暗吃惊，从燕子坪农场场部到农管局所在地的市里，单程就有 200 公里。尽管这些年来，有些头头，伏天到分场去吃西瓜都坐小车去，但那毕竟有掩人耳的名目，到瓜园也可以“检查”工作嘛！可专门送局长女儿去看父亲，这就有点师出无名了。

作为副场长，裴旭看到派车去送自己的亲人，本想提出异议，可他望望黎若兰急切的心情，要出口的话只好咽回肚里。他顺水推舟，替黎若兰说了几句客气话。

司机嚼着最后一口饭跳上吉普车，刚刚打着火，只见公路上两束刺眼的车灯光笔直扫过来。他凭经验叫出声来：“局里的小车！听动静像是柳书记的‘上海’。”

司机的耳朵真灵！果然是农管局那辆灰色上海牌轿车驶进了场部。轿车刷地一下停住，车门打开，钻出柳正言和刘耀功来。

站在吉普车旁的许连云赶忙走过去：“唉呀，这么晚才到？有急事吗？”

柳正言摘下帽子掸去身上的浮灰，反问了一句：“黎局长是不是到这儿来了？”

人们吃惊地摇摇头，说：“没有啊。”

刘耀功感到奇怪：“咦！局长没有到这儿来？”

许连云说：“这不，正要送若兰进城呢。”

柳正言无可奈何地说：“这老兄啊，上他当了！他自己提出来，一个月内不打算上班，要养养身体，可不知溜到什么地方去‘修身养性’去了，见鬼！”

既然黎白并不在城里，黎若兰急于进城已经没有意义了，司机又把车子倒进车库。

柳正言半开玩笑地问黎若兰：“有啥好吃的？我可饿得不行了。”

黎若兰说：“小米稀饭，还有咸鸭蛋。”

柳正言说：“好吧，就去喝小米稀饭！”

柳正言和黎若兰、裴旭前头一走，刘耀功就和许连云小声嘀咕起来。

等刘耀功赶到裴家时，柳正言已经盘腿坐到炕头上了。不会吸烟的裴旭翻箱倒柜，把春节招待客人的一包“参芪”烟找出来，递给柳正言，又回身张罗去泡茶。

黎若兰正在厨房泡木耳、打鸡蛋，她挥手把裴旭叫出来，小声说：“到鸡架里摸一只鸡来。”

裴旭问：“哪只不下蛋？”

“你真抠！”若兰说，抓住哪只算哪只。”

裴旭一笑，摸起菜刀出去了。

黎若兰对柳正言的感情并不亚于父亲。在她孤单一人的时候，她成了柳正言的养女，一直在他家长到18岁。如果来得及，叫她把那口大白猪宰掉，她也不会心疼。

就在院子里抓鸡抓得格格乱叫的时候，柳正言正在研究黎若兰的新居。

这是一间半砖房，半间是厨房，一间是住室，和所有农场职工的居住条件没有什么两样。不过，这间屋子却有点“现代化”的味道。除了姜黄色的立柜、五斗橱和一张斜面抽斗的小写字台外，还有一对用方格红色人造革包起来的简易沙发，一张用杂色

木块拼成几何图案的小茶几，一个书架，一句话，有点文化气息。

这种布局、这样摆设的房间，柳正言并不陌生。北大荒前前后后来过 55 万知识青年，远自杭州、上海，近自京、津、哈，哪儿的都有。其中 1968 年左右来这里的，大多数成了家。有了这样的家庭环境，他们本来是安心的。可是最近却刮起了一股风，京、津、沪的知识青年撂下地里的活，好多人跑回城里去了。这股风应该煞住。

十多年来，好多知识青年都成了技术骨干、基层干部。这些人一走，农场就缺少骨干力量，他感到十分棘手。午后他们车子路过笔架岭农场时，就看见一对知识青年把一套崭新家具摆在十字路口低价抛售，一套家具只要 10 块钱！仿佛只要能离开北大荒，白送给人都甘心。

柳正言感到苦恼。“四人帮”粉碎以后，要搞农业现代化，要向国家交粮食，就得有人。他正准备再扩建五个农场，至少要增加两千个农工。可眼下，现有的人也保不住，他不知道应该怪上边还是应当怪下边。反正他已经给各场劳动工资料的头头们下了死命令：手续一个不办，一律卡住。

在这种时候，他多么希望足智多谋的黎白出来支撑局面啊！黎白的名字在北大荒是有威信的。可是这老兄这几天尽跟他捉迷藏，不知打的是什么主意，真叫人无法琢磨。

过了一会儿，还没等小两口把一只鸡褪好毛，许连云带着食堂管理员闯进来，两个人抬着一个盖着纱布的大方盘，放到炕桌上。

刘耀功揭去纱布，嗨，好丰美的菜肴，色、香、味俱全，四凉四热，还有一个热气蒸腾的白木耳虾仁汤。

柳正言杆了杆眼，乐了：“你倒来个麻利的，好家伙，来来来，都过来吃。若兰啊，你那小米稀饭免了吧。”

人们都笑起来。

柳正言伸筷子夹了一块糖醋酥鸡放到嘴里嚼着说：“火候正好，我说老许，先说好，这可是你请客。喂，管理员，到时扣他工资！”

许连云说：“小意思！”

管理员点头应承：“照扣不误。”

这桌菜使满头大汗的裴旭和黎若兰得到了解脱，大伙都凑到桌上来。许连云又从两个裤口袋里掏出两瓶酒来，一瓶是65度的北大荒白烧酒，另一瓶是山葡萄酒，都贴着农场自酿的商标。

喝了一口酒，柳正言问许连云：“伙计，知青问题，你这儿能稳住阵脚吗？”

许连云咂咂被烧酒辣麻了的嘴唇，说：“差不多。”

“差不多可不行！”柳正言筷子一撂说，“一律把门卡死！搞农业现代化，第一位的是人，人给我放跑了，机器能自个转吗？”

许连云嘿嘿一笑，低头去喝酒。

裴旭说：“咱们场还算可以，笔架岭都乱套了。听说劳资科长抱着大印东躲西藏，后来到底顶不住了，干脆把大印都挂到办公室房梁上了，谁爱怎么盖章就怎么盖。”

许连云说：“我们有难处啊，我就怕上边飞条子来。有些知识青年就咬住这个理儿，为什么干部子女都先回城了，轮到他们走就把大门关死了？我们受夹板子气，不好回答呀！”

“你只能当落后群众的尾巴！”柳正言说，“特殊和一般总是有区别的。当前这股思潮就是搞绝对平均主义，文化大革命造反派的‘脾气’又起来了，这还了得！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尽快恢复文革前的秩序，走上正轨。”

许连云苦笑：“当然，你不作具体工作……”

柳正言用力蹙了一杯酒，说：“你不是共产党员吗？你长着舌头是干什么的？哼，告诉你，你说的那种条子今后还要飞。”

说到这里，他用筷子一指黎若兰，说：“像若兰，妈妈被害死，哥哥也没了，只有一个父亲，她跟着革命一辈子的父母吃尽了苦头，难道她不应当得到照顾？”

许连云见柳正言十分激动，他连忙说了一声“那是”，给柳正言夹了一筷子片肘花。

这一席话，别人倒无所谓，黎若兰却高兴得不行。她用力捅了裴旭一下，那意思只有裴旭能懂：“怎么样，不用我自己出面，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吧？”

裴旭没有出声。他知道，回城去，这是黎若兰盼望已久的事了。1976年以前她当然不敢做这个梦，现在，随着父亲的出山，她的好运终于到了……

三

正当这些具有共同语言的人们吃到兴头、唠得投机的时候，被一个突如其来的人搅了席，煞了风景。

来人叫岳海，是造反派出身，当过生产建设兵团的副政委。“四人帮”粉碎以后，他这火箭干部连降几级，现在是笔架岭农场的场长。虽然还挂着农管局党委常委的头衔，但早已形同虚设，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按照柳正言的意思，凡是“吃‘四人帮’狼奶长大的”火箭干部一刀切——全部哪来哪去。他这个主张没有得到农场总局的同意，总还要区别对待嘛。岳海所以没有削职为民，就因为他是个实干家。若讲问题，只要需要，还是可以一抓一堆的，他毕竟是造反起家的，亲自主持过斗争黎白、柳正言和刘耀功的大会，称他们为北大荒的“三家村”，这难道不可以认定为迫害老干部吗？

不过，岳海这个造反派又有点特殊性。他不是那种蛮干的小青年，他没有私设刑堂，没有搞过“红色恐怖”，因此民愤不大。

这是不是与他的年龄、学历有关呢？天晓得。他是 1957 年南京农学院毕业生，学农机的，业务上内行。他今年已经 45 岁了，所以许多人不把他划到年轻的“火箭干部”堆里去。

岳海身上有那么一股傲气，好像他本来不愿意当这个官似的，又好像是谁求他代为署理几天，随时准备交印似的。

今天，他是风闻黎白来到燕子坪农场，特地从笔架岭专程赶来见他的。

岳海万万没想到，黎白女儿家这桌丰盛的筵席上，并没有黎白参加，他有点后悔自己的冒失。可是既然步子已跨进来，就不好再退出去了，脸上很不自然地说：“我找老黎同志，哦，不在这儿吗？”

岳海一出现，人们都大为扫兴。有的放下筷子，有的厌恶地望着他。

柳正言先搭话了：“他不在。怎么，急不可待了？眼下我还是负责局里的一切，有事跟我谈，不会感到不便吧——当然告发我除外了。”

柳正言这夹枪带棒的话是带着笑容说的，可连裴旭听了都觉得脊梁骨冒凉风，这话听起来太叫人难堪了。于是，他以主人的身分出来解围，说：“老岳还没吃饭吧？来，上来吃一点。”他示意叫黎若兰去拿双干净筷子。

他打圆场的努力失败了。岳海声音不高，但却不饶人地借题发挥道：“吃人的嘴软，我不愿在筷子头子下作交易。”屋子里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好像划根火柴就要爆炸。

柳正言铁青了脸说：“岳海，你应当明白，我们把你留在领导岗位上，是落实政策，把你拿下去，同样是落实政策。”

岳海又是一笑：“明白。文化大革命前你就是党的化身、政策的化身。对于我，无所谓，我随时准备交出我掌管的这部分权，老实说，我还巴不得呢。”

他这话不卑不亢，实在戳人肺管子。它像一把钩子，一下子钩起了捂在柳正言心坎儿上的、多年的怨气、怒气。他霍地从炕上跳下来，双手叉腰，说道：“我没有说错，吃过狼奶的人是改不掉狼性的，你的话帮味多足啊！你的矛头处处对着受迫害的老干部。”

柳正言真的气得不行了，要知道，自从1976年11月他重新掌权以来，还没听见一个人用这样的口吻跟他说话呢。

可是，在他的农管局里竟有这样顽固不化的死硬派！他不想多谈，他那快被上级党委说服了的“一刀切”想法此时又冒出来。他已暗下决心，对岳海这种人，不单非拿下去不可，而且要隔离审查！

对待柳正言的暴跳，好像都在岳海意料中，他倒显得十分冷静。他说：“我干过错事，我悔悟之后，心里常常感到内疚。但是有的同志把文革前的错误也看做功劳，总不是正确的态度。”

每当这种时候，刘耀功就显出他的能量了。

他把柳正言推坐到炕沿上，再把岳海拉坐到沙发里，然后剔着牙，不紧不慢地说：“人在激动的时候，说话容易走火，都冷静一下。”说到这里，他掉过头去，语重心长地对岳海说：“你呀，你一点都不体谅老同志的心，还往伤疤上戳！为了使你能留在领导岗位上为四化出力，柳书记舌战群儒，他才真是爱护你呀！你是有耳朵的，你打听一下其他10个农管局，像你这样经历的干部还有吗？”

刘耀功说得很诚恳，连裴旭、黎若兰都感动了，都来劝岳海压压火，他梗着脖子倒不好说什么了。

刘耀功叹口气又说了下去：“你的劲头应当用到工作上去，你们笔架岭不大好吧？知识青年竟然把家具搬到公路边摆小摊出售，成什么样子？这不是向新班子示威吗？我不能去批评那个小青年，我要找你算账。”

岳海听了说：“我这儿有一张统计表，干部子女首先离场回城的统计表，当然不是指一般干部。上梁不正下梁歪啊。如果你有办法把这些人退回到农场来，那我就可以保证，笔架岭军心稳如泰山！”

岳海简直在叫号了！

屋子里又恢复了剑拔弩张的气氛。正当柳正言拍一下炕沿起来要爆发的当儿，有一个人在门外说了这么一句：“你们这儿真热闹啊！”

屋子里的人全愣了，但这只是极短的一瞬间，人们马上都听出这熟悉的声音。黎若兰跑着推门出去，连声喊着：“爸爸、爸爸……”

果然是黎白！他拄着一根腊木杆，腰里扎的宽皮带上挂着一只水壶，风尘仆仆地走进来。

黎白一经出现，屋子里的空气骤然间解冻了，谈话中心自然而然地转到他身上。争吵的话语，变成了对老局长行踪的探询、不告而辞的埋怨、不顾身体的担忧……

别看岳海并不惧怕柳正言的威风，对于几年不见的黎白却怀着深深的歉意。他眼光里含着敬意，迎到门口，双手攥住黎白青筋裸露的右手，不说话，不停地摇晃着，好像千言万语都通过这双手传达了。

柳正言很奇怪，这个岳海何以对黎白有这种感情，这是不可思议的。

黎白落座以后，问岳海道：“怎么样？听说你在准备下野？”

岳海毫不隐晦地说：“我是吃‘四人帮’狼奶长大的嘛！”

黎白纠正他道：“不，你是吃人民的奶长大的……”

“反正一样，”岳海并不领他的情，“前几年如果我是个逍遥派，那多好。”

黎白说：“嗨，你发牢骚倒有点水平。”

岳海说：“这年头，发牢骚不是比实干更时髦吗？”

黎白想起了岳海前天写给他的那封信，应当说：“口气是不大友好的，一张口就是“……应当祝贺你官复原职，但我是持怀疑态度的，不知你想走轻车熟路呢，还是改改车辙。假如你不念私仇的话，我倒想提醒你一句：北大荒的现代化是靠人化的，埋在荒草里的珍珠——锈了 20 年的人才，还不该擦点油用上吗？”

黎白对于揪斗过自己的人，那感情当然不会与保自己的人相同。问题是黎白的心事却跟这个斗争过自己的人想到一起了。他感到奇怪，岳海这个被称为横踢马槽的人物，为什么在群众中反倒挺有影响呢？这是黎白急于想找他唠唠的原因。今天正好在这儿遇上，就说：“岳海，你的信我看到了，你再容我琢磨一下，不过，选贤用人的问题嘛，咱们倒是想到一块儿了。”

柳正言不喜欢黎白用这种口吻同岳海交谈，就有意扭转话题，用埋怨的口气对黎白说：“你怎么搞的？你若不肯好好养病，我可要绑架你上任了！”

没等黎白答话，岳海已经站起身，跟谁都没打招呼，朝屋外走去。

黎白说：“岳海，别走啊，我还有话问你呢。”

岳海头也不回地说：“以后再说吧。”

待岳海走出屋子，柳正言对黎白道：“你倒是宰相肚里能撑船，这种人能和我们共同语言吗？我们倒霉的时候，正是人家祖坟冒青烟的时候；现在调了个个儿，跟他们搞和平共处是没有好处的……”

黎白本想说几句什么，却又咽了回去。他觉得在自己没有找到足以驳倒柳正言的事实以前，说也无益。从感情上讲，你不能不承认柳正言的情绪在干部当中（特别是吃尽了苦头的老干部当中）是很有代表性的。

见他沉默，柳正言说：“我看哪，你很难躺得住，干脆出山

算了，省得我们去三顾茅庐。”

黎白说：“不，糊涂庙里的糊涂神，我是再也不想当了，光受人家香火不显灵，不过是一堆泥胎而已！”

刘耀功在一旁眨着眼，说：“你的一切行踪都在我们掌握之中，你在私访，对不对？”

黎白并不否认，说：“是啊，我脱离工作多年，现在到下边走走看看，搞点调查研究。你们如果把侦探我行踪的精力用到正事上，大概更有用。私访并不是好事，说明我们的各级班子官僚主义严重，浮夸惯了，放屁都掺假。我是上当受骗怕了，当然也骗过上级，所以工作之前想把下情先摸清楚。”

他停了停，又说：“一穿上冠带袍服，就不自由了，虽然也能下去调查研究，得来的情况总有水分。只是，我们农场系统的各级班子太老了，农场一级平均 48 岁，分场一级 45 岁，局里不用说了，少说有 60 岁！年龄是不饶人的。即便这些人都是好干部，毕竟心有余力不足，下不去啊……”

他说的是农场干部的现状，没有人能驳倒他。

柳正言没有出声，他面前的黎白真成了个谜。他曾经开玩笑地说过：“老黎浑身上下有多少个汗毛孔我都数得出来。”这虽然有点夸张，却道出了他们之间思想的一致和相互了解的程度。这是从前。现在，他却不敢这样说了。黎白到底要干什么呢？看来，要养病不过是个借口，说不定他在摸什么底，好发射一颗重磅炸弹。柳正言心里隐隐约约有一种不痛快的感觉。是啊，自己比黎白早出来工作两年多，农场的每根神经都集中在自己的脑中，听从自己的指挥。对劝农河农管局所属的 10 个大型农场，柳正言敢说是一本活档案，只消问问自己就行了，可黎白却抛开自己单独去摸情况，这不是在制造不信任气氛吗？

柳正言不愉快的猜测很快得到了证实。这天晚上，三个老伙伴住在燕子坪农场的招待所里，谈了半宿。

谈话是由柳正言先引起的。

他说：“老黎，你该摊牌了，我应该知道你在想什么问题。”

刘耀功在敲边鼓：“老柳急得火上房了！国营农场在农业现代化长征中，不用说，是扛大旗的角色，可是往哪里扛啊？‘四人帮’破坏了十多年，问题成了山，摸哪哪是个窟窿，按倒葫芦起来瓢。”

柳正言叹了一口气：“是啊，要人，没有，现有的已经扎了根的知识青年有拔根危险。要机器，没有什么70年代的先进东西，无非是50年代苏联的那套，又是瘸腿。要资金，没有，这么多年，农场个个赔本。”

黎白表示同意他们的判断：“是啊，百废待兴，但是总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得分出个轻重缓急，得搞个几年规划才行。”

这几句，说得柳正言轻松了，他向刘耀功递了个眼色，刘耀功打开文件包，拿出一份打字的计划出来，送到黎白膝上。

黎白一边掏花镜一边惊叹道：“噢？规划已经拉出来了？好神速啊！”

可是，当他透过花镜片看到封面字迹时，他的眉头皱起来了。

这份打印稿他太熟悉了，说不定用放大镜就可以在上面找到他的指纹。这是1966年春天劝农河农管局来不及上报给农垦部的一份五年规划草案。想不到，柳正言和刘耀功把这个老箱底翻出来了。假如拿出来参考一下倒也罢了，作为正式文件，竟把封面上“1966—1971”的字样用墨笔勾去，改成了“1979—1983”，这未免太不严肃了！

黎白翻翻内容，也有些勾抹、删改，但大体没什么变化。

他摘下镜子，对刘耀功说：“真难为你，这个老箱底你还保存着。”

刘耀功笑道：“哼，造反派抄家时，我老婆把它卷在油布里

埋到地下才幸免于难。”

望着沾沾自喜的刘耀功，黎白说：“我可不感激你那位贤内助！她使我们的懒汉们可以不动脑筋就能从故纸堆里拣到农业现代化的‘天书’。”

这话当然是充满了讽刺味道，谁还听不出来？

柳正言搔搔头皮，说：“我大致翻了一下，当然还没提交党委讨论。我觉得大体差不多，如果这份草案得以实施，劝农河两岸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黎白说：“在我看来，这个草案充其量不过是个形而上学的产物。”

“你这样看？”柳正言有点吃惊了。

黎白说：“你不这么看？在总则和指导思想这一部分里，我看就行不通，什么‘摆正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怎么摆？文化大革命前，政治这个灵魂在天上四处游荡，就是附不到国民经济的体上，总是魂不附体。照这个方案干下去，北大荒只能办干校，而不是现代化的农业基地。”

柳正言感到黎白太偏激。他说：“那么，你以为北大荒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是什么？”

“人。”黎白斩钉截铁地回答，“人才，首先是各级班子。把有真才实学的专业干部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这是关键。我仍然欣赏这句话：在一定的条件下，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

柳正言放心地哈哈笑了：“原来我们想到一块去了。目前，我们正在一边落实政策，一边调整各级班子。充实内行，也有个方案。”

接着刘耀功念了一大串名单，从农管局各处、各科到各总场、分场头头，有的是已经到任的，有的是即将上任的，有的是等待任命的。这些名字黎白都十分熟悉，大多数是他的旧部下。

刘耀功念过，柳正言笑咪咪地问道：“满意吧？你甚至无需调档案看。”

“那当然。”黎白说，“不过，档案也常常骗人。对自己的手下人，脑子里应当有一部随时加上新情况的活档案才行。对了，我怎么没听到青年人的名字？”

“有啊，”刘耀功说，“裴旭不是吗？这是你带出来的‘小猫’啊！”

“老猫”当然记得“小猫”。那还是批林批孔以前，黎白曾经被从干校貂场接回来当了一段兵团三师的副师长。他只干了一年就又下台了，原因是他鼓吹“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这还不算，他竟然带着一个他相中了的上海知识青年裴旭扎到燕子坪农场，仅仅一年，就把商品粮抓了上去。有人说：“老猫”教出一只会抓耗子的“小猫”，这话确实有几分道理，裴旭的作风真有点黎白的风度。

现在，裴旭已经是他的乘龙快婿了，他将怎样回答呢？

黎白几乎不加思考地说：“我想，裴旭当然是可以用的。”

刘耀功望着柳正言一乐，那眼神好像说：“老黎倒不怕别人说他有私心，一点不避嫌。”

黎白又问道：“怎么没有那个造反派岳海？”

“他？”这不屑的语气，几乎同时从柳正言、刘耀功嘴里脱口而出。

随即，柳正言又补了一句：“狼肉贴不到狗肉上啊！就冲他今天晚上的张狂劲，我看，他也该到反省室去过过筛子了。”

黎白听了这话，吃了一惊。姑且不说他这几天从群众那里得到的有关岳海的印象，单凭柳正言的口吻，他已经觉得很不得体了。不过，他觉得现在不到时候，也就没有说什么。

柳正言说：“吃狼奶长大的，到底不行啊！老黎，听了这个名单，你该放心了吧？对了，还有一个人，刚知道下落，就是从

前管局的秘书长老肖，他也应当回来。”

“肖彬？”黎白感到不解，“我前天去看过他了，他全身瘫痪，中风不语，怎么能上班工作？”

“落实政策嘛，”柳正言说，“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就不能没有他的位子。原来有人考虑给他挂个顾问衔，我考虑这不合适，顾问在人们心目中是无权的。有权和没权不一样，如果老肖不挂衔，要个车都不方便。”

黎白的眉头又皱成了“川”字，他感到问题远比自己想的要严重。难怪农场工人都是这样一种口气：“唉，中央着急怕是没有用啊，半大不小的官儿，又捧起老黄历啦。”

于是黎白说：“对肖彬同志我们要尊重、要照顾，但以目前情况来看，不能进班子。还有一些人也不能进，应该大力培养中青年接班人，应当把班子变成有朝气的指挥系统，而不是把农业现代化的司令部变成养老院，更不是搞安慰赛的元老杯分配所。”

这回轮到柳正言大吃一惊了。他想不到，受害最深的黎白竟然这样冷酷地对待被“四人帮”残害过的同志。他真想大声说一句：“你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啊，同志！”不过，他一看黎白那苍白没有血色的脸，他的心又软下来，不忍再伤他的心，就改用缓和的语气说：“不过，你得承认，这批人都是随你南征北战过来的，你是了解他们的……”

黎白一点都不让步：“正因为我了解他们，我才不愿意这么干。”

过了一阵，黎白站起身踱着步说：“人老经验多，是好事，但也不尽然。我们要对四化负责。何况，还有一些倚老卖老、靠资历吃饭的人，还有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人，就不能用！”

“你太偏激了！”柳正言说，“别忘了，你自己也是老的……”

“这得看有没有朝气。”黎白说，“我正在给自己作鉴定，我得出的结论是我还能干，因为我知道我过去干过错事，有些错误

对国家、民族是不可原谅的。不能因为我被‘四人帮’抓到监狱里去过，就连我的错误也都变成了宝贝。如果我是那种人，我就自动退位！”

一席话，震动了他的战友。

到此为止，柳正言和刘耀功已经无需再对他作什么猜度了，他的观点不是十分明白吗？

看来，北大荒劝农河上空的风暴信息已经来到了。柳正言曾经多么盼望黎白早一天上任啊！可现在，这种迫切心情烟消云散了，他甚至希望黎白在疗养院里长期疗养。

四

黎白第二天并没有跟柳正言、刘耀功返城，他借口要在女儿若兰这里住几天，享点“天伦之乐”。这是无可厚非的，不怕柳正言不答应。

其实，柳正言的小车一上路，黎白就向笔架岭农场奔去，他要去找岳海。昨天因为有柳正言在场，有些话他无法谈，更何况岳海是那种顶风上的脾气，三句话不行就崩。

有一件事，是黎白做梦也没有想到的。这只能怪他的两条腿跑不过四个轮子的汽车。当黎白拄着一根腊木杆步行70里，天黑时分赶到笔架岭农场时，柳正言和刘耀功的汽车早已经来过这里而且开走6个小时了。他们一下车就召集了农场干部紧急大会，当众宣布对岳海实行停职反省。理由十分简单，岳海本来就应当被革职，念其多年来仍然坚持搞科学实验，不同于专门搞打砸抢的人，才给他保留了场长职务，却不曾料到他竟然“不知悔悟”，还要到处上告，因此，在宣布大会上，柳正言一再检查自己“太右”了。

听到这个意外消息，黎白很生气。

他不能容忍，对农场一级干部的处分，怎么可以不通过党委研究，两个人说了就算数？何况，就黎白所接触到的人谈起岳海来，没有一个人不赞扬他能干的。不过，人们也说起过岳海的“毛病”，两个字，叫“抗上”，敢提意见，敢把上级不合理的命令顶回去。这又怎么能算“毛病”呢？对待那些官僚衙门式的领导作风，不正需要这种“抗上”精神吗？

岳海并不在家里，他老婆没好气地告诉黎白：“停职了，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

后来黎白找到场部，打更的老头才告诉他，岳海到“赤眼蜂繁殖站”去了，离笔架岭有七八里路，还要蚌过一条河。

这七八里路黎白走了两个多小时，才算摸到地方。幸好“赤眼蜂繁殖站”有一星灯火给他指明了方位。

“赤眼蜂繁殖站”真静啊，附近没有一点儿声音。

赤眼蜂是一种只有针鼻儿大小的野生寄生蜂。这种东西古怪得很，专门往柞蚕或玉米螟虫的卵块上产卵，等到把虫卵的营养全都吸光，幼蜂就孵化出来了。因为赤眼蜂能够大量消灭玉米螟虫，因此被岳海他们发现后，从1962年起开始了人工繁殖，每年到玉米螟虫生成季节放出赤眼蜂，虫害就轻而易举地被治住，这叫“生物防治法”。

现在，发现这一“生物防治法”的岳海，一个人在他从前夜以继日奋斗的工作室里干什么呢？

按照站长的指点，黎白来到一幢跨度很大的木板房外，外表很像简易大礼堂，门前堆放着几架铁皮机器。

一扇可怜的窗户漆黑一片，只从边角处隐约能透出一点光亮。

黎白来到窗下，从窗帘的边缝向屋里张望，只见岳海并没有写检查，却在灯下聚精会神地工作。

岳海背后是一排又一排的大木架子，木架子上堆满了蚕蛹，

有好些蚕蛾从蚕茧里爬出来，爬到桌子上，甚至爬到岳海的肩膀上，他都木然不觉。

黎白浑身的疲劳顷刻间化为乌有了，心口热乎乎的，他禁不住慨叹了一声：“老柳啊，老柳，你把这样的人停职了！你这思想僵化的脑袋不应该清醒清醒吗？”

黎白轻轻敲了几下窗棂，他看见岳海马上放下了手里的活，把一本稿纸向桌子当间挪了挪，煞有介事地描了几笔，眼睛却盯着窗子。

黎白又敲了几下。

门轻轻打开了。岳海打量了黎白一眼，似乎很吃惊。他特地向院子张望了一下，黎白当然不知道他在看什么。他是在找汽车。他奇怪，汽车煞在附近，总该有个声音啊！

黎白跨进大木房子，马上下意识地抽了几下鼻子，放蚕茧的屋子里因为要保持一定温度，通风不好，一股刺鼻的臊臭气简直叫人无法忍受。

等黎白在长条凳上坐下，岳海不友好地问道：“气味不佳吧？”

黎白没有出声，却伸手拿起桌上那沓稿纸，原来只写了一行描得很粗的标题：我的检查。而检查的内容却一个字都没有。

黎白放下稿纸，说道：“你是在写检查吗？你是听见我敲窗户才把稿纸拿出来摆样子的吧？”

岳海的火气上来了：“农场就这么搞下去吧，什么时候把有的人都训练得光会写检查，大家一起喝西北风好了！”

黎白笑了起来，他从大木架子上拿起一个网着丝络的蚕茧，若有所思地说：“人，应当冲破束缚，像蚕那样，抽丝抽到死……”

岳海苦笑道：“可惜赤眼蜂太多了，专门吃寄生饭。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黎白说：“是啊，无事不登三宝殿，一是来看看你，跟你随便谈谈；二是来向你打听一下唐卓新的下落。”

岳海十分警惕地重新打量着黎白，没有马上回答。听他的口吻，倒是一片真诚，可是，上午他的两个老伙计已宣布自己停职反省，难道会不和他通气，取得他的同意？说不定就是自己走后他们在昨晚酒桌上一起拍板的呢。

一想到这儿，他又用惯常那种冷淡的语气说：“谢谢。还有人想到唐卓新，实在不容易。”

黎白问道：“他到底在什么地方？”

岳海摇摇头：“我怎么知道？”

黎白说：“好多人告诉我，你和他有来往，因为在事业上他是你最知心的朋友！”

岳海的眼圈红了，他狠狠地说：“别提事业了吧！粉碎‘四人帮’以后，谁不想振作精神大干一场？可是事实叫人寒心哪！唐卓新的图纸交上去一年多了，结果呢？也许早在废纸篓里了。”

黎白不但不生气，反而从心眼儿里更器重这个中年人。他从背包里拿出一卷子图纸，说：“在这里。现在，该请唐卓新出山了……”

岳海该感动了吧？不，他看也不看地说：“遗憾的是不大可能。”

黎白问：“为什么？”

岳海说：“人有才，大概本身就是一个威胁——至少是潜在的。何况，亲手把他打下去的人都在，起用他，不等于否定了他们自己吗？”

黎白笑问：“也包括我吗？”

岳海说：“答案在你自己手里。”

黎白说：“说得好。正因为答案在我这里，我才来向你公布答案。”

岳海似信非信地杆了他一眼。

黎白说：“北大荒长粮食也长莠草，出珍珠也埋没珍珠。但是，珍珠即或在黑夜里也要放出光华的。”

这句话，打动了岳海，不过他仍然用一种审视的冷静目光看着黎白。

黎白站起身来：“告诉我，唐卓新的准确地址在哪儿？”

岳海说：“我想你能知道——你们有档案啊。”

黎白说：“档案是死的，人是活的。”

岳海叹了口气：“他在福建长汀原籍。”

黎白忽然觉得岳海眼里滑过一丝狡黠的光影，就说：“你若骗我，我永远不会饶恕你。好了，再见。检查，你可以不必捏着鼻子写，研究你的赤眼蜂好了！有人问起，你就拿我的牌子当盾用。”

他走了，留下这几句暖人肺腑的话叫岳海琢磨。岳海呆了半晌，才追出门去。

他并没有听见发动汽车的声音，也没有看到汽车灯在公路上晃动，他倒是看到了一个蹒跚的身影……

他的头轰然一响，难道……这老头是步行 80 里地走来的？

一刹那间，岳海心血翻腾，觉得有如万箭穿心那么难受，自己连一杯热水都没给他倒，不是太冷酷了吗？

他想了想，锁上房门，顺着公路追下去。

本来年轻力壮的岳海追一个干瘦的老头是不成问题的，可是追了一程，他忽然改变了主意。他要看个究竟，所以只是像影子一样尾随在黎白身后。

黎白没有到场部去，却直接向附近的小火车站走去。

一走进狭小的火车站，黎白先是拣张长椅坐下喘了好一阵。从背包里拿出一个搪瓷缸子打了点凉开水喝下去，又掏出一个干硬的面包咬了几口，一吃直掉渣。他牙口不行了，吃起来像啃骨

头那么艰难。

岳海又一次感动了，这个老头看来要乘火车到福建长汀找唐卓新去。这样的局长打灯笼上哪儿去找啊！自己为什么要冷言冷语伤他的心呢？

卖票口的昏黄灯泡亮起来，十几个旅客走过去买票。岳海看见黎白掏出很厚的一沓子钱也凑过去排在最后，一边还在咬面包。这时候岳海再也忍不住了，鼻子一酸，扑上去，抱住黎白大哭起来：“老局长，我……对不起你……”

他扶着黎白一边走出售票室一边哽咽地说：“唐卓新不在福建，他怎么肯离开北大荒啊！”

在门口，黎白骂了他一句：“浑！那唐卓新到底在哪儿？”

岳海说：“在宝清县三家子，是候补社员。他回原籍只一年就回来了，只有我知道……”

黎白拍了拍他的肩头：“好了，这倒省了好多时间。”

岳海说：“你要找，我带你去见他。”

黎白笑了：“感动你这个‘上帝’可真不容易啊！”

就这样，他们在笔架岭住了一夜，第二天清晨搭乘去宝清县的公共汽车，又走了60里旱路，傍晚赶到了三家子大队。

三家子是一个只有五六十户人家的自然村落，看样子很富庶，家家小院侍弄得干干净净，粮有囤、柴有垛。

黎白望见队部机库前一大排各种配套农业机具，不禁赞道：“嗨，想不到这个偏远的小村落，倒有点现代化味道呢。”

岳海说：“这都是他们的‘候补社员’一手设计、制造的。这里的农民对他可好啦。文化大革命横扫一切那阵子，公社派人来捉拿唐卓新这个‘黑人’，农民把他保护下来了，把他藏到蚕场小房里，家家轮流给他送饭，天天吃饺子、吃葱油饼。”

黎白无限慨叹地说：“人心是杆秤啊，人民是需要科学的，人民是有良心的。”

由于黎白坚持不惊动队委会的干部，岳海就领他径直向村东唐卓新的住屋走去。

这显然是队里出钱为他们的“秀才”新盖的一所砖房，青堂瓦舍，可惜有点冷清。

他们走进院子时，正好看到有一个老太婆从后门走出去，腰里扎着围裙。

黎白与岳海两个人互相对看一眼，向堂屋走去。

不知为什么，黎白觉得心跳，跳得发慌。他一边往屋里走，一边琢磨，怎样跟唐卓新说话……

屋子里没有人。

作为工作室的东屋，堆满了图书、仪器，工作台上电烙铁、印刷电路板、切割好的敷铜板、各种集成电路元件、土造示波器、逻辑功能检测仪，屋子里凌乱不堪，屋地上胶质电线差点把黎白绊了个跟头。

西屋是住室，也堆满了书刊。看来，唐卓新虽是知识的富有者，却掩盖不了生活的贫困。一铺土炕上，那一小卷行李，一个孩子也可以一夹就走。

黎白环顾房间，发现炕桌上摆了一只大海碗。他走过去揭开，是一碗热气腾腾的水饺。不用问，是方才那个老太太悄悄送来的。

再看看厨房，却寒酸得不行。锈迹斑斑的铁锅没有盖盖，有一只铁帘子撑在锅里，上面放着五六个长了绿毛的馒头，锅台上有一只破木瓢里盛着几个卤出盐花的芥菜疙瘩。

黎白伸手拿起一个硬得如同石头的馒头，心酸地说：“唉，为现代化事业奋斗的人，却过着原始的生活……他到哪儿去了呢？咱们到附近找找去。”

然而岳海说什么也不走了。他不能再叫老局长奔波了。他点火刷锅，煮一点儿面条两人吃了。

他们吃过饭，唐卓新回来了。

在黎白印象中，唐卓新还是个英俊清秀的书生模样，可眼前这个人却显得十分苍老、瘦弱，脸黑黑的，穿着一身带了补丁的破工作服。他手里抱着一摞干枯的树枝，像是刚从河边林子里来。

唐卓新一见黎白和岳海，愣了。

岳海先说话了：“卓新，黎局长请你出山来了！看，他把你的设计图都带在身边呢！”

唐卓新悄悄放下枯树枝，拘谨地搓搓手上的灰土，不知该上去握手好，还是该问候人家好。

在他犹豫的当儿，黎白早就上去握住了他那沾着泥土的手，用力摇撼着说：“卓新，多年来你受委屈了。我是凭着共产党员的良心来请你的。你恨我吗？”

文静的唐卓新满眼是泪，摇摇头说：“我……我只想……工作”

夜已经很深了，黎白和唐卓新的话还没有唠尽。他俩伙盖一条千疮百孔的破毯子，半躺半坐在炕梢，而岳海早就蜷伏在炕头沉沉睡去了。

黎白问道：“你搞这套设计，有没有人协助你？”

唐卓新沉了片刻，低声说：“文化大革命前，多亏我有一个同学——她也在咱农管局，是比我晚几届分配来的。因为她是华侨，引进资料容易些。”

“她叫什么名字？”黎白问道。

唐卓新从一本外文资料里抖出一张照片。

黎白捧起照片，大吃一惊，他怎么会不认识她？这个恬静清秀的姑娘，不是叫邓云岫吗？

文化大革命中，邓云岫曾经被以“里通外国”的罪名被捕入狱，和黎白关在同一座监牢里。多少年来，邓云岫那恬静的面

容，一直没有从黎白眼前消失。

黎白试探地问：“你们是朋友？”

唐卓新笑笑，说：“只能是朋友……”

黎白又问道：“你们相爱很久了吗？”

唐卓新长长叹了口气，说：“我的爱，实在是一股祸水，谁得到它谁就会倒霉。我……爱过她，我常常为此谴责自己……因为我当时忘掉了一条常识：有罪者的爱，带给别人的只能是不幸。”

这是深深埋在他心底的创痛。多少年来他轻易不敢去触动这伤疤。现在，却再也不能自欺欺人了。

他停了停又说：“如今不知道她在哪儿？”

黎白吃惊了：难道关于邓云岫的事情他唐卓新一点都不知道？黎白听说，三年前，邓云岫在狱中病危，后来送到上海看病，就死在江南。

黎白当下肯定，连唐卓新最好的朋友岳海，都向他有意隐瞒了邓云岫的悲惨遭遇！所以黎白不敢轻易说破，让他暂时沉浸在美好的憧憬中吧。

在沉默中，黎白又拿起邓云岫的照片，望着她那恬静的面容，不禁汪出了一眶热泪。为了不让唐卓新看见，他躲到灯影里，悄悄试去了……

五

清晨，三家子大队套上了三挂大马车，送他们的“候补社员”上路。这是黎白和队里人交涉了两天才达成的协议。老队长说：“别看他是候补社员，可在俺心坎上，他可是颗明珠。唉，若不是国家急用人才，你拿八抬大轿都抬不走他呀。”

这话不假，从送行的场面可以得到证明。全村的男女老少差

不多全出动了。点心啊、鸡蛋啊、草莓果啊，在车里堆得小山一样。有些老大娘扯着唐卓新的手，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这情景使黎白在一旁越发难过，像有无数条鞭子抽打在他心上，这么好的人，为什么被抛弃了 20 年啊！

难舍难分的送行延续了一个多小时，有些人一直送到十几里以外的黄土坡才挥泪分手。

现在，三辆大马车走了两天路程，已经绕过宝清县城，向市里进发了。

光棍一人的家当居然装了三辆大车，但几乎全是唐卓新的书籍、仪器。

已经进入夜间，黎白和唐卓新、岳海坐在头辆马车上，都有点疲倦了。马儿打着响鼻，不紧不慢地晃着颈下的串铃。拴在车尾的料槽子和饮马水桶不断地相互磕碰，发出丁丁当当的单调的音响。

夜晚的北大荒是宁静的，只有远处水洼里不时地传来一两声鸟叫。

他们唠了一道，此时都困顿了。黎白想伏在行李卷上打个瞌睡，可是骨骨碌碌的车轮辗压大地的声音使他睡不成。他索性又仰面躺着，望着深邃暗蓝的天幕上摇来晃去的星星，觉得心里十分坦然。不过，他一想到身旁的唐卓新也许还梦想着去见他的女朋友邓云岫时，禁不住心头一阵阵酸痛，还要对他继续隐瞒下去吗？可是，又怎样告诉他呢？

沉默中，邓云岫那清秀恬静的姿容又在他眼前回旋……

黎白对这个苗条聪敏的姑娘多么熟悉啊！只是，他们的相识是在牢狱里！黎白的罪名是“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攻击江青的现行反革命”，邓云岫是“里通外国的特务”。他们关在一处，男牢和女牢间有一道矮墙。放出去监督劳动时，可以常常见面。入狱前，黎白并不认识这个姑娘。她引起老局长的注意，

是因为她在劳动时常常大声说话。起先黎白不理解，后来她自己说：“不练习说话，一个人关几年后会丧失说话能力的。”她很好学，常常拣别人扔掉的香烟盒，在上面写呀写的。有一次，她大声对老局长说：“你还能出去吗？我想，我是不会坐一辈子牢的！等我出去那天，我就可以把一本《高纬度区植物保护学》拿到出版社去了……”说着，她举起了厚厚一沓废烟盒纸，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小字。

听了姑娘这乐观、豪迈的话，黎白心里很难过。他悔恨、痛骂自己：为什么自己身边有这么值得骄傲的青年却从来不知道自己长两只眼睛是干什么的？难道专门为了看谁脑后长有反骨吗？

与邓云岫的结识，是黎白思想上的一个转折点。从那以后，黎白竟然向邓云岫学起了植物生理基础知识。

那时，黎白多么想活下去呀，多么想活到云开雾散的那一天，走出监狱告诉党，像邓云岫这样的知识分子，应该得到工作的权利，享受到她应当享受的信赖和荣誉……

但是，后一个愿望没有实现。在一个风雪迷茫的深夜，被毒刑拷打得奄奄一息的邓云岫被允许“保外就医了”！

黎白不相信邓云岫还能活命。果然，后来他听说邓云岫死在上海一个医院里。据说她临死还念念不忘嘱咐人把她的遗骨送回北大荒来……

如今，姑娘早不在人世了。她用心血写成的书稿，被暴徒们毫不吝惜地扔到火堆里，烧成了纸灰……而更为可叹的是这九泉下的冤魂，至今还是唐卓新的梦里人！

此时的唐卓新，脑海的屏幕上也印着邓云岫的情影。过去的一切，像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在他眼前展现出来。

他认识邓云岫是在他已经倒霉的日子里。1962年，当邓云岫来到北大荒时，正是祖国面临三年自然灾害严酷考验的岁月。

有的同伴受不住勒紧裤带的生活，纷纷乘车南下。时值中国和南洋某国关系已经破裂，为了迎接邓云岫再返南洋，她的舅舅专程赶到香港，为她办好了印尼入境手续。但是，这个胸中激荡着青春热血的华侨姑娘没有南旋，却毅然选择了北上的道路。

邓云岫被分配到劝农河农管局农业研究所协助岳海研究用赤眼蜂防治病虫害这个项目。

那时，她常常到野外去实地观察赤眼蜂的生性、形态、产卵方式、寄生手段……她在一个十分偶然的时机里，和当时已经戴上右派帽子的唐卓新相识了。

那是一个炎热的中午，邓云岫独自在劝农河畔放了几张沾有赤眼蜂卵粒的放蜂纸，暑热难挡，看看附近没人，河水又清又稳，就脱掉衣服跳到河里洗个痛快。

上岸后，她抱着衣服钻进一片白桦林里去换衣服。刚进了林子，邓云岫惊叫了一声，赶紧抱住衣服蹲到地上，头也不敢抬了。原来，眼前白桦林里有一间用银色桦皮搭起来的小棚子，一个只穿了一件红背心的男人正伏在小房前一个简易桌上工作。

其实，专心工作的唐卓新并没有发觉有人走近，等听到惊呼，他倒真的抬起头来，看见了赤身露体、羞愧难当的邓云岫。唐卓新脸忽地一下红到耳根，他赶紧转过脸，走进小房，拿出一条干净床单，往门口桌子上一放，背过身向林子深处走去。

邓云岫把床单挡在门口，换好衣服，本想悄悄走掉，却被这杂乱无章的小棚子吸引住了。这是个三角形小棚子，里边有一张用松枝、落叶搭成的地铺，上面卷放着一床又脏又潮的被子。靠门口有一个三块青石支起来的锅灶，有一口掉了一只耳朵的生铁锅蹲在灶上。锅没刷，沾着又干又糊的苞米面，招来成群的苍蝇、瞎虻围着铁锅嗡嗡乱叫……邓云岫感到一阵阵恶心，不用问，这是个多年来独居林间的老光棍，他们的职业不是下碓子、打野物的猎人，就是采山货的人。不过，这种判断很快就被她自

己否定了！她发现床头有两只又大又破的木箱子，里面堆满了书，没有上锁。她顺手抽出几本来，不但有中文的农业科技书，还有外文原版书，书页行间写满了小注、行间批。再看门口那张用四根大椽子支起来的小桌上，摊着一张图纸，丁字尺、圆规、鸭嘴笔放在一边……

她对这个邋遢的、不修边幅的主人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兴趣。她决定等他回来，会会这个裹在谜团里的人。

一直过了好久，不见主人归来，邓云岫有点着急了，她走出小棚儿，喊起来：“喂——人哪儿去了？”

一阵空谷回声过后，草丛深处响起了嚓嚓的脚步声，主人回来了——原来是个清秀的、脸膛黑黑的小伙子！

在相距十步远的地方，不知为什么，小伙子脸刷地红了，而且低下头去。

邓云岫本来早就不介意方才的事了，一见他倒先红了脸，自己也被弄得脸上热辣辣的。

从此，他们认识了。她对这个着了迷地设计农机具的大学生有着明显的好感。那时，正是唐卓新被流放到山林里看农场参园的岁月。

本来他们的感情会再向前发展一步的，却因为邓云岫被总局抽调到荒原踏查队而暂时告一段落。

那是一个夕阳残照的黄昏，打好了背包的邓云岫跑来找唐卓新告别。她一路上用脚分劈着齐胸的红毛公草，顺手采摘着艳丽动人的野花。她心里充满了人们所能理解的那种甜蜜而又微妙的别离的滋味。她唱着印度尼西亚华侨人人会唱的《思乡小调》：

人道南洋好赚钱，
多少儿郎有去没有还！
盼白了亲娘头呀，

憔悴了闺中女儿颜。
回来吧，别再下南洋，
海水苦哇乡水甜。
何日归来君且记：
独桅上头挂白帆……

平时，他们百分之九十的时光是谈事业，谈北大荒的未来，只有这一次颠倒了过来，彼此谈了些身世。临分手的时候，唐卓新让她忘掉自己，他道出了自己的政治面貌。

邓云岫如同遭了霹雳，她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出那座荫翳的林子的，她哭了。命运好像在有意捉弄她，是啊，为什么这样好的一个事业家，却那么不相称地套在那无形的枷锁里呢？

在她离开林子以后，她试图把这个人从心里排除出去，可是这种努力是徒劳的。在经历了一番痛苦的、不可自拔的折磨以后，这个纯真的姑娘决心冒着一切危险听凭感情的潮水泛滥了。她在乌苏里江边绿色帐篷里给唐卓新发出了第一封厚厚的、热得烤人的信。

但是，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她没有得到复信，她连续寄出10封，都如石沉大海，毫无消息。

她不由得想起了分手时唐卓新的那句话：“忘掉我吧，为了你，也为了我不再犯罪。千万不要写一个字给我，因为你只能失望，真的，你一个字的答复都看不到的。”

难道他真的这样信守誓言，决定忍受着感情的煎熬吗？

她不信。在她即将结束踏查回到佳木斯市的时候，她又给他发了第11封信。

唐卓新回信了，不过没有几个字，他好像画地为牢似的，把他的思想潮水堵在层层设防的围堤里面，滴水不漏。即使这样，邓云岫仍然欣喜若狂，她不知道把那寥寥可数的几个字琢磨了多

少遍。在她看来，每一个字都是感情的压缩品，每一个字都是随时能爆发巨大能量的原子核……

从那以后，邓云岫不断从国外引来先进的农业技术书刊，然后就转寄给他。她开始得到唐卓新发自肺腑的感谢。

邓云岫一直幻想着，有那么一天，唐卓新的才能会得到党和人民的重视。那时他们之间见不到阳光的爱情幼芽，也就可以抽叶、开花、结果了。

也许他们之间喜剧式的相识本身就孕育着悲剧式的结局吧？只是这以后的事情唐卓新都蒙在鼓里就是了。他每天除了和一个老右派（1954年归国的农业科学家）一起搞技术设计而外，他什么都不知道。

他怎么会想到，一夜之间，邓云岫竟成了“特务”？他又怎么会晓得，为了保护唐卓新，她任人拷打，始终不说出引进的外国资料在谁手里啊！

直到此时，唐卓新还在心里编织着他和邓云岫重逢时的瑰丽云锦呢！

黎明的曙光透过罩住北大荒旷野的乳色岚雾，投下一束又一束金辉。云雀在头顶飞翔、鸣叫，远处林间透出鹿鸣。

车老板把马车赶到河边去饮牲口，黎白和唐卓新、岳海下了车，活动着麻木的腿。

在这里，劝农河经过九曲十八拐，和松花江汇合到一起，白亮亮、浪滔滔地向北流去。透过江上的雾带，依稀可以看到佳木斯市耸立在江边的防汛纪念塔了。它像一把劈天利剑的尖塔独岫云表，显得十分肃穆。

黎白和唐卓新、岳海沿着芳草萋萋的江湾散步，谈论着未来的工作。忽然，从河滩那边林子里传来一阵凄伤哀婉的哭声。唐卓新猛地站住，指指林子那边：“你们听，有人在哭！”他们寻声走去，见江边有一个清秀窈窕的姑娘的背影，抱膝坐在荒坟前抽

动着肩膀哭泣。唐卓新看到姑娘面前是一座坟茔，坟上搁着一个由野花、野草编织成的花圈。

姑娘听见脚步声回头一瞅——黎白发现，原来是柳抗抗！老局长吃了一惊，猛扑过去，把她扶起来：“抗抗，你怎么到这儿来？这坟里埋的是谁？”

柳抗抗叫了一声“黎伯伯”，泪眼汪汪地说：“这里埋的是邓云岫。今天，是云岫姐死去三周年的忌日……”

这话像晴空霹雳，击得唐卓新眼前金星乱迸。他发疯一般不顾一切地扑上去大声叫喊：“你胡说！不会，这怎么可能？”

但这是事实。柳抗抗把邓云岫的悲惨遭遇和临死时希望把骨灰埋在北大荒的遗嘱，详详细细说了一遍。

唐卓新扑到坟上失声痛哭起来。

黎白和岳海本来向他隐瞒着事情的真相，现在却由于路途的巧遇把不幸的消息捅明了。他们没有去劝唐卓新，让他发泄一下积郁在他心中的爱和恨吧。

黎白采了一把野花放到坟顶，他久久地凝视着围着鲜花翩翩飞舞的两只马莲蝴蝶……

唐卓新哭了一阵，抬起泪眼，对柳抗抗说：“告诉我，她临死都说了什么？你不是一直守在她身边吗？她一定有话……”

原来在邓云岫被保释出狱就医的时候，她上海的亲人要求农场派人护送，当时正愁找不到人，在医院当护士的柳抗抗自愿承担这一任务，因为从前她和邓云岫相处过一段时间，两人很有感情。

邓云岫的内伤太重了，上海的医院也无法挽回她的生命。

记得那是邓云岫只有几个小时可挨的日子，医生、护士围了一大群，都凄惻地望着这可怜的姑娘。

邓云岫那口气就是不肯断，她的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墙上的一幅版画，那是一帧套色木刻：《北大荒的未来》。

邓云岫临终前向人们伸出手去，固执地要着什么。护士无论拿水、拿药，她都一律摇头。后来，还是朝夕守护她的柳抗抗明白了她的心，伸手摘下那张木刻画递给她。邓云岫满意了，把那幅画抱在胸前，流出了泪水。她抓住柳抗抗的手，气逆地说：“我托你……两件事，你答、答应吗？”

柳抗抗附在她耳边，含泪点头。

邓云岫说：“别把……我死的事……告诉唐、卓、新……我不能为我分、分心……还有，我是北大荒人，把、把我的骨灰带回北大荒去……”

邓云岫就这样死了，含恨死去了，她没能看到北大荒的未来。

柳抗抗没有食言，她把邓云岫的骨灰埋到了北大荒的热土里，埋到了这个华侨姑娘生前工作过的三江平原上。

啊，邓云岫，你热爱祖国的心，比金子还赤纯！

六

农管局机关的老传达是个活情报。这个整年剃着和尚头的人本名叫李荣富。不过，“老传达”的诨号要比本名真姓更响，除了劳动工资处，连局领导都顺口叫他“老传达”。

其实，论年龄，他老不到哪儿去，还不到退休的时候。老，是指当传达、搞收发的年限而言。这个人资格倒不浅，还给王震部长当过马夫呢。1956年老部长把他留在北大荒“东北农垦总局”，因为他文化水平太浅，自愿当传达员。

他这“传达员”可不一般，绝非只管收发信报、登记来访者，好像谁赋予他一种特权似的，他什么事都要过问，好打抱不平，因此讨人喜欢的地方比讨人厌的地方多得多。

这正是午后上班的时间，农管局大门口人流正旺。

有几个爱刺探小道消息的干部一进大门，就搭讪着走过来：“‘老传达’，有什么新闻？”

“老传达”用手向前一指，说：“看见没有？这就是新闻！”

顺他手指的方向望过去，嗨！是有点新鲜，刘耀功腆着发胖的肚子和他老婆杜月秋是步行走来的。

一个调皮鬼杆杆眼睛说：“这算什么新闻？如今，提倡艰苦作风嘛。”

“老传达”一咧嘴，说：“你懂个屁？刘耀功在机关管处长，回到家可是处长管局长了，你们信不信？这是干部处杜处长不叫他坐车！”

人们似信非信地笑着走散了。

上班的人流过去了，“老传达”的话才开了大闸：“老局长平反快一个月了，你们知道他为啥不立即上任？先前还有人胡猜，八成老黎的锐气都磨没了，不会有当年勇了，养养病、挂个衔就算了。看了一阵子，大不是那码子事哟！你们听到风声了吗？他这一个月来，拄着一根破棍子，又顺着当年王震部长踏勘的路线走了一圈。他到处跟人谈，睡车库、吃冷馒头，保准心里全都有谱了，就等上任后哗啦一声摊牌了，说不定谁要倒霉呢！”

一个调皮鬼故意说：“有啥倒霉的？掌权的都是他的老班底，都受过迫害。就拿刘副局长来说吧，那是他的左右臂呀……”

“你小子才吃几碗干饭！”“老传达”用鼻子哼了一下说。“依我看，刘耀功就第一个心里头揣小兔子。他这两年啊……”说到这儿，“老传达”伸出脖子往大门口望，见老局长黎白同一伙中年人说说笑笑地走了过来。

这群人中，有个40岁出头、中等个、黑黑的脸膛、眼睛特别大的人，这不是被国营农场开除的唐卓新吗？前些年，听说唐卓新被递解还乡了，怎么又在北大荒出现了？

“老传达”早就耳闻，有一些当年和唐卓新一起当过“右派”

的人，也有一些文化大革命期间从农管局科研所赶走了的“臭老九”们，纷纷要求党委复查他们的问题。据说许多人给摘了帽子，也有不少人得到改正。不过，他们来到农管局大院门口，向来都只是点点头，不言不语，好像比人低一等的样子，什么时候见过这些人如此谈笑自如？

看来，劝农河两岸真要大变样了。

此时，脸色阴郁的刘耀功和柳正言站在三楼会议室的窗口，居高临下，正好望见斜穿篮球场走过来的黎白，以及前呼后拥的那些人。

刘耀功用胳膊肘撞了柳正言一下，轻声说：“看见了吗？”

柳正言点了点头，心里很不痛快。他承认，从前极“左”的那一套作法伤害了一些人，可是黎白和这些人如此融洽无间，不就等于否定了他自己，否定了文革前那些正确的做法吗？

刘耀功小声嘀咕说：“今天是他正式到任。召集第一次党委会，我真不知道这个会怎么开呢？”

柳正言道：“老黎一个人不会推翻党委从前的决议，你照预定的议程开好了。”

按原来的议程，今天的党委会是研究总场、分场一级人事任免，还要挑选一批技术骨干充实各级领导班子。

因为是黎白局长在“周游列国”之后首次上任，因此掌握会议的柳正言临时加了个议程，欢迎老局长重返岗位，并且说了一番期望的话。

刘耀功等柳正言致完欢迎辞，鼓着掌说：“请老黎讲话！”

黎白说：“我新来乍到，情况还不清楚，我看，免了吧！”

柳正言笑了：“都是老同志了，不讲就不讲，以后讲的机会多着呢。”

随后，顺利地议到正题，无非是撤掉某个场长、任命某个场长，机关科室的负责人也作了适当调整。

名单是刘耀功念的，他在党委里分管组织这一摊。他一边念一边不时地向柳正言那里汰一眼，间或征询地望望坐在最后一排折叠椅上的干部处长杜月秋。

经过讨论，没有异议，人事任免很快就通过了。

当议到第二项议程挑选一批技术骨干，充实各级领导班子时，卡了壳。所以卡壳，是因为找不到精通农业技术、又没有政治问题的业务尖子。拨拉来，拨拉去，还是有问题的多，清清爽爽的少。干部当中，有好些人在用人问题上都是惊弓之鸟，“包庇重用坏人”、“网罗牛鬼蛇神”，到时候那是要算总账的。所以做人事工作的人谨小慎微，顾虑重重。

有人说：“李同仁是块料。”

有人赶紧提醒：“可惜他叔叔在台湾。”

有人试图辩解：“台属现在不算问题了嘛。”

有人很有分寸地说：“当然，若是能回归祖国大陆就不算问题了……”言下之意，那还是有问题。于是，这个李同仁便作罢。

又有谁提了一个：“常戈呢？”

有人提出了备忘录：“他当过右派呀。”

有人说：“不是改正了吗？”

一个很轻的声音来自会议室的角落，但人们都听得十分真切：“改正是政策，他错误还是有的，控制使用已经是格外照顾了，重用？怕不合适吧！中央有这个精神吗？”

似乎这是言之成理的，于是常戈又撂到了一旁。

一个个被提出来，又一个个被否定掉。

大尾巴常委会一直开了3个小时，最后总算选定了两个人，家庭、历史都干净，但本人的学历也过于干净，只是念过几个月农管局自办的农垦大学。

有反对意见，不居多数，就这样通过了。

会议快结束时，柳正言发现好多委员总是不断地目视黎白，还有人悄悄地给他写字条。柳正言有点不大高兴，党委会上搞小动作，这是他不能容忍的。他很想把这个现象提几句，转念一想，投鼠忌器，怕伤了黎白的面子，就忍住了。他总感到黎白这样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是一个无形的压力，甚至比他说几句反对意见的压力还大。这老兄在打什么主意呢？他真变得古怪起来了。

柳正言简单总结了几句以后，笑着问黎白：“你总该说几句吧？”

黎白朝大家致歉地点点头，说：“搞农业现代化没有技术力量，这叫人有点犯愁，听说已经向上打报告要人了？”

干部处长杜月秋接过话碴儿说：“打两次报告了。咱们农管局 10 个总场，79 个分场，外加水文站、气象所、农研所，再有 300 名技术员、农机师都不够。”

“300 人？”黎白问了一句。

谁都不明白他是嫌 300 人多了，还是嫌少了，都拿眼睛瞟着他。

黎白站起来，说：“300 人太少了，踢开第一脚，没有 500 个技师、副技师充实、提拔到各级岗位上，那，我说劝农河两岸的农业现代化不过是一句空话罢了！”

“好大的气魄！”柳正言笑了，“你这几年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呀！作大买卖，你得问问内掌柜的，家里有多少本钱！”

黎白一本正经地说：“我们从前总犯叶公好龙的毛病，平常说得好听，龙真的来了，却吓得钻到桌子底下去了。现在，就看我们有没有胆量去请龙！”

杜月秋仿佛意识到黎白要打什么牌，就笑眯眯地用玩笑的口吻说：“请龙当然好，别请来神送不回去呀！”

黎白望了杜月秋一眼，说：“过去，我们是捧着金碗讨饭吃，

挨饿活该，该打屁股！我就第一个该打！部里驳得好！我们还有脸向上级要人才？在我们这里，已经人尽其才了吗？北大荒的荒草埋死了多少人才啊！要 300，太少了！我有精确的数字，历年由北京农大、农机学院、南京农学院、东北农学院、沈阳农学院……分配到劝农河农管局的大学生共有 826 人，除掉 62 人调走，7 人病死，18 人被迫害致死外，目前埋在荒草里的明珠还有 739 颗。”

说到这里，他从挎包里拿出了一套图纸，哗地摊开，说：“这是唐卓新设计的，却差点烂在档案柜里，这是为什么？”

黎白的话简直像突然投进来一枚手榴弹，震动着整个会场。

一见他抬出了唐卓新，柳正言感到麻烦了。他正愁没法收场，杜月秋在一旁说：“老柳，党委会是不是先开到这里，姜贵恒的遗体还在太平房停着呢！”

死人有时也能救活人驾！

这个姜贵恒是从前的农管局办公室主任，被“四人帮”迫害一病十几年，昨天死了。

柳正言立刻说：“那好吧，大家去向遗体告别，医院来了几次电话了。”

黎白有一千条理由延迟会议也不行了，战友之情，也不能不顾啊！

七

百病缠身的黎白精神抖擞地上阵了，原来心宽体胖的刘耀功却病倒了。

一听说刘耀功称病，好多人都乐了，因为他们想起了“运动型高血压”的典故。这个典故对刘耀功来说，虽然不够体面，却是恰如其分。他这个“毛病”是老战友黎白所不知道的，因为是

近十年来“偶发”的。

原来，他的病是老婆杜月秋“传染”给他的。别人得病百般痛苦，他得病却是独得其乐。那还是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刘耀功是农管局文革小组的组长，自然搜集了不少造反派的言论、大字报摘抄，准备运动后期抓右派。革命这么多年，只有这一次刘耀功没有看准风向，他反被戴上了高帽，走资派外加“消防队长”。他每天得三次挂牌子随着“黑帮”大队到市广场去站班示众，大热天被晒得浑身冒油。他本来是可以陪黎白、柳正言站到底的，但是他老婆救了他。那时他老婆在农管局医院当副院长，风暴暂时还没卷到这一层。在她安然无恙的日子里，她给丈夫想好了一个金蝉脱壳计。有一天，正在示众的刘耀功扑倒在地，人们把他抬到农管局医院，闻医生给造反派的医疗诊断上写着，高血压，270/180毫米汞柱。这真够吓人了。而且这个闻大夫还对造反派说：“要绝对卧床，否则随时可能脑溢血，你们就什么材料也掏不出来了。”

造反派不知有诈，为了掏材料打黎白，只好放他回家卧床，另扎了个稻草人，挂上刘耀功的牌子，代他示众当替身。

这以后，运动不断有，他的血压就随时升高，难怪人们称他患着“运动型高血压”病。

由于杜月秋想出了这一高招，所以刘耀功确实没像黎白、柳正言那样吃许多皮肉之苦。

尽管刘耀功与黎白、柳正言之间无话不讲，这件丑事他决意隐瞒到死。他觉得这事太不光彩。

这回，刘耀功的血压骤升，却有点出乎人们的意料。因为揭批“四人帮”运动哪怕再搞半个世纪，也不会有半点不利于他的地方，他干嘛犯病呢？

原来，刘耀功发现，黎白和柳正言在干部使用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而他们俩，一个是书记，一个是局长，又都是自己

的老朋友，他往哪边站都有不便，都担风险。在他看来，这种分歧，短期内很难弥合。从报纸宣传的种种迹象看，用暂时的眼光观察，无疑黎白是得人心的。可是有谁能担保政治运动从此在中国大地上绝迹？倘若真的再折腾一回，那黎白走的这条道儿可就成了货真价实的“右倾路线”，不用上纲，就已在纲上了。

对这棘手的问题，刘耀功本来想和稀泥。但是那天党委会以后，他老婆严令他“血压上升”。他想了想，也只好这样。躲过这阵风再说，岂不是万无一失！

其实，杜月秋下决心让丈夫称病还有一个原因，她没有向丈夫透露就是了。原来，自从黎白到档案室查档案发了脾气以后，杜月秋对年轻的女秘书林玲十分恼火。她怎么能容得下眼皮底下有这种胳膊肘向外拐的部下！林玲居然敢向黎白泄露天机，这还了得！

杜月秋手里掌管着人事大权，她几乎当时就在心里打好了算盘，决定给林玲一点颜色看。给人穿小鞋也有诀窍呢，要你七寸脚硬穿六寸鞋，让你知道疼却又有苦难言，这就是杜月秋的诀窍！

杜月秋从柳正言那里讨来一个签字的批令，以“充实基层”的冠冕堂皇的理由把林玲下放到最边远的三合屯农场去当政工科长，你能说出什么来？干事升科长，甜在表面，苦在心里呀！是杜月秋亲自找林玲谈话的，她一口一个“好妹妹”，一句一个“组织上重用你”，弄得林玲连告状都没法去告。是呀，升职提拔能算“穿小鞋”吗？

可是，杜月秋自认为干得天衣无缝的事，不知怎么叫黎白知道了，他硬是卡住了这件事，而且声言要经过党委会研究才能提升干部。

杜月秋觉得不给黎白一个眼罩戴不行了。这两年，人事、政工大权可以说操纵在刘耀功夫妻手中。出于对他们的了解和信

任，柳正言一般不去过问。偶尔听到风言风语反映，柳正言也只是出于爱护找他们夫妻叮嘱几句：“人事问题不同于走后门买几吨钢材，要坚持党性原则，捅出娄子来我可不同意你们。”而到底他们手脚是不是干净利落，柳正言并不深知底细。

杜月秋是个绝顶精明的人。58年的时候，她不过是个二十七八岁的护士。原来在北京空军医院工作，无奈一声令下，十万官兵奔赴北大荒，她也被卷了下来，心情是不大舒畅的。不过，当她护理因为肠炎住院的刘耀功时，开始乐观起来。这个比对方小12岁的漂亮女人，不顾一切地追求死过一房妻子的副师级干部刘耀功。先前，刘耀功有点犹豫，怕别人说三道四，特地捎信叫黎白、柳正言从几百里外来到密山医院。两个老战友还以为他病情恶化了呢，连夜启程来到他身旁。一听是这事，两个伙伴差点没捶他一顿。不用说，支持了他的婚事，柳正言还打趣他说：“得了肠炎便宜你了，原来医院里有桃花运等着你呢……”

自从嫁给了农管局的政治部主任，平平常常的小护士杜月秋得到了另眼看待。她为人精明，也讨人喜欢，等她调出医院的时候，她已经是党员护士长了。后来她在局劳资科当了半年干事，觉得阿拉伯数字太枯燥，就又回到了医院，先当科主任，到1965年，就被提升为副院长了。

至于她执掌干部处大权，那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事情了。这10年里，她碰到的也全是厄运，住过“牛棚”，在干校里种过菜、挑过粪。在控诉“四人帮”的大会上，她痛切陈词，声泪俱下，赢得了一片又一片掌声。事后，当柳正言征求她对工作安排的个人想法时，她不想回医院去，直截了当地要当干部处长。她当过副院长，是副处级，照说提拔一级使用也说得过去，柳正言在考虑了几天之后，同意了。

但是，刘耀功却不赞成她出任干部处长。他有两条理由：第一，自己是主管人事的副局长，搞成“夫妻店”怕别人说闲话；

第二，他认为管人头、特别是管干部很费脑筋，容易得罪人，一个女人干吗不当个工会主席、妇联主任之类有职无权的散差？级别不低却又累不着。

这一点，他实在太不了解自己的妻子了。

杜月秋有一种癖好，喜欢出人头地，喜欢让别人都来求助于她，特别喜欢那些男人归自己调遣。这种欲望在她心底燃烧多年了。从前，她尽管不是党委委员，却控制着一个常委，枕头风吹得硬极了。有好多事，不管刘耀功承认不承认，他实际上是执行了她的意旨。

自从她当上了干部处长，有些精明人很快就看明白了一切。他们想要谋到什么职位，都去走杜月秋的“终南捷径”，送厚礼，说奉承话，借以满足杜月秋奇特的权势欲，而求者必应，屡试不爽。

你不要以为杜月秋仅仅是为了满足一种欲望，不，她还要当副书记，至少是副局长，她相信自己比丈夫有魄力。就自己的资历来说，她当然知道太浅，但她正在一步步为自己垫脚，她有人！那些在她笔下得以晋升的人们，就是她坚定的拥护者。

这几天，她得知黎白正在调查干部使用上的一些问题，特别是涉及给一些人平反、落实政策的事，她心里不能不打鼓。她知道，反对她的人不在少数，她不可能把全局的干部都拉到自己的石榴裙边！

但是，黎白的一举一动她都知道，她有眼线、耳目。杜月秋如今想利用一下黎、柳之间的矛盾关系，掩饰自己工作中的问题。她背着刘耀功跑到柳正言那里去，一进门就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哭个不止，把柳正言哭得心烦了，问道：“你哭什么？有话好好讲嘛！”

杜月秋悲悲凄凄地说：“我能说什么？我对不起你，给你丢脸了。”

柳正言被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又问道：“这是从哪儿说起？到底出了什么事？”

杜月秋说：“老黎容不得我呀，他撒下人马，到处调查我的问题。我调动一个秘书，还有你签字，他都驳回了呢！”

柳正言本来对黎白有意见，杜月秋的挑拨在他心里又种下了一粒不愉快的种子。

杜月秋下班回到家里，丈夫不在屋，她急不可待地找到后院。

他们的住宅是一幢一楼一底的小白楼。在公园附近有八座这样的住宅，是文化大革命前专为老红军盖的。后来，有几户老红军回南方，因此分给农管局头头了。

在后院宽敞的院子里，养了不少花。从前刘耀功是十分讨厌花草的，这几年得闲，养花成了排遣时光的好办法。今天，他正在拿小花锄移栽马兰草，听见脚步声，他扔下小花锄，问道：“有什么新闻吗？”

杜月秋蹲下来，说：“知识青年越跑越多，好几个农场乱营了！”

刘耀功说：“你是管人头的，不给办手续不就堵住口子了吗？”

杜月秋说：“我是尽力堵，怕堵不住啊！”

其实，杜月秋不仅没有堵，还利用了柳正言曾有过的提议，先斩后奏地发了调令，把黎白的女儿黎若兰、女婿裴旭调进城来，以此给老局长施加舆论压力。

八

“靠老天爷吃饭，算什么农业现代化？”这是黎白局长这几天所到之处必说的一句话。凡是承认现状的北大荒人，都得认账，

目前尽管黑龙江的大农场农业机械化水平在全国来说名列前茅，但是却仍然不得不服从老天爷的意志，还要受它的气。

黎白带着唐卓新、岳海一帮子人在各农场转了半个多月回城之后，他把他们请到临江的松江春饭店美美地饱餐了一顿，打发他们去剃头、刮胡子、洗澡，再美美地睡它一天一夜，自己却向有名无实的“家”走去。

天阴着，铅灰色的云层离地面很低。晚炊的蓝烟全都压在地面，街面上灰蒙蒙的一片。

走在马路上的黎白不时地看看天，看看云象，却看不出有雨的征兆。

这几年真是怪事，北大荒的旱像达到了极限！春天倒也常常阴云密布，但并不下雨。这种天气就像绑在牛角上的一束可爱的青草，给人以希望，却永远吃不到嘴里。这使人们感到烦恼。

北大荒初创时期，三江平原大部分是沼泽地、大酱缸，到处是白汪汪的明水，所以当时排涝一直是农田建设的首要一环。文化大革命以前，黎白的心思全在挖疏通干渠、连结排涝网和研制开沟机、清淤机上了。可惜，现在，各农场的开沟机、清淤机都快成了废铁块，再也用不上了。

俗话说，春雨贵如油，但是老天爷硬是滴水不下。

路灯一盏盏亮起来，构成一条淡蓝色光点的长练。也许是路灯含汞太多，颜色不正，照射在黎白本来苍白、没有血色的脸上，更显得发灰、发暗。

黎白确实疲惫不堪了。他那全身都需要大修的零部件，一个都没有修，又挺了这么一段时间。这个困难还不是压倒性质的，叫黎白气愤的，是老战友之间的严重分歧。

现在，他拖着沉重的步子，禁不住在心里叹了口气：人心不齐，想要干成一点事，实在难呵！难怪农场群众说，中央和群众两头着急，可中间呢，出了“结症”，顺不下、排不出，堵塞住

了。他现在不能不承认，群众看得对呀。

为什么形成目前这种局面呢？看来这十年动荡给我们国家留下的毒害还远远没有肃清。

他一路低头走着、想着。当他来到自家小院前的时候，发现客厅里开着灯。他愣了一下，是谁在屋子里？莫非是女儿若兰从下边回来了吗？

黎白没有猜错，果然是女儿和女婿在客厅里等他回家。

瘦骨嶙峋的老头子在门口一出现，黎若兰就扑过去，高兴地叫嚷起来：“爸爸，您终于回来啦！”

裴旭也站起来，有几分拘谨地说：“爸爸，快坐，您累了。”

黎白暂时忘却了那些骚扰他的种种不愉快的事情，他决心好好享受一下天伦乐趣了。他在沙发上坐下来，接过女儿递过来的手巾，擦了擦脸，拍拍长沙发上空出来的位子，说：“过来，都坐过来。”

黎若兰、裴旭顺从地坐在老人左右。

黎若兰高兴得不行，她记起了儿时的事。那时，哥哥黎若竹还没有在武斗的枪弹下殒命。每到周末，爸爸从繁杂的公务中解脱出来，也总是这样，把女儿、儿子叫到身边，吃着儿女们给他剥出来的干荔枝或者嗑着瓜子儿，半眯着眼睛给他们讲南朝北国，也讲些有趣的童话。

这些早都随着时间的流水漂走了，此时黎白跟女儿、女婿谈了一阵他在下边各个农场里的所见所闻之后，对裴旭说：“我要拿你们燕子坪农场搞个试点，岳海那家伙是块好料，内行、肯钻研，你们俩搭配起来，错不了。我已经决心精简各层干部了，不抓耗子的猫，就别蹲在那儿装模作样。干不了的，应该让出位置请能干的人来干。”

黎若兰看到爸爸仍然是那种雷厉风行、干起工作来不要命的作风，便用婉转的口气说：“爸爸，这几年您吃了多少苦头啊！

我看，您的身体需要好好休养一阵子。”

黎白说：“若兰，目前正是抢时间、争速度的关键时期，你说我能安心休养，去当世外桃源的陶渊明吗？”说到这儿，他发现屋角里有一大堆行李，忽然意识到了什么事，皱起眉头，盯着女儿问道：“怎么？也像别的知识青年那样，跑回来了？”

黎若兰轻声说道：“爸爸，不是跑回来，是经过组织批准回来的。”

黎白一只手揉着胸口，说：“在某种意义上说，调，比跑更坏。你们所以能以合法的手续办不合法的事情，无非是因为你们有个当局长的老子。”

黎若兰见父亲动了气，一半难过，一半解释地说：“爸爸，您别生气……我不能让您一个人过孤苦伶仃的日子。如果是从前，有妈妈在，有哥哥活着，我……”

她说不下去，起来哭了。

黎白叫女儿哭得一阵阵地心酸。是啊，在这个世界上，黎白除了这个女儿，哪还有亲人呢？

见父亲陷入沉思，黎若兰就用哭腔说：“爸爸，十多年来，我跟您背黑锅，吃尽了苦头。我能挣扎到今天不容易啊……现在，就算我借您一点光，都不行吗？”

黎白沉默一阵，终于说道：“孩子，你跟着爸爸背了十几年‘黑锅’，吃了苦头，这我知道。这不能说是应该的，因为我们党的党纪里从来没有株连九族的一说。但是，共产党也绝对不应该‘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我们不能用林彪、‘四人帮’那种害人哲学如法炮制，你们懂吗？”

裴旭一直不语，垂头坐在一边。

黎若兰吃惊地望着爸爸：“您……是说叫我们再回到农场去种地？”

“是的，”黎白说，“无条件回去。我有‘罪’，不该株连孩子

“我有功、有地位，你也没有权利世袭！因为我们是共产党，不是封建时代的王公贵族。”

女儿大哭起来，哭得很伤心。

黎白虽然爱他这惟一的女儿，可是不愿拿这私爱去损害党的原则、党的威信，他不能因为别人这样干脸都不红，就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凭女儿获得特权！不，他不能。

经过十几年的痛苦折磨，在荣辱中他看到了党和民族、国家兴亡的症结所在。上梁不正下梁歪，正人先正己。只有自己立得正，才能说服别人跟着做。他常常问自己：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里，在交通壕里，在白刃格斗的战场上，他们这一代人想过将来封妻荫子吗？假如有这种杂念，即或不临阵脱逃、背叛革命，也一定是一打就垮。记得，那时候，老百姓是多么拥护自己的队伍啊！他们宁可饿着肚子，也把最后一把米献给他们打江山的人吃……可是现在，为什么一谈起某些搞特权的干部，群众常常用一种讥刺的口吻说话呢？文化大革命前的黎白，听到这种议论，总觉得这是攻击党的干部，至少是一种落后言论。可是，十几年的“在野”生活，甚至比普通群众还不如的遭遇，使他终于明白过来，广大群众不满的是官僚主义作风，封建衙门式的陈规陋习！如果不从根本上铲除这种和党的性质格格不入的封建主义的东西，四个现代化只能是一句空话。现在必须立即恢复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黎白决心先从自己做起，煞住国营农场系统这股从“四人帮”时候延续下来的歪风。他相信，裴旭终会转而支持他，他的女儿也会明白大义的。

九

消息灵通的“老传达”又在农管局大门口对人说道开了：“瞧着吧，这功夫党委会上干冒烟了。”

一个人问道：“谁和谁干啊？”

专门给柳正言开上海轿车的司机说：“当然是我们那位和局长了……”司机们有个习惯，把自己的首长叫“我们那位”。

“老传达”说：“有眼力。你没见这几天柳正言脾气特别大吗？连总局关局长都亲自坐镇来了。”

有人说：“真是怪事，他们俩，可是从一个战壕里爬出来的老战友啊……”

“老传达”不以为然地一笑，说：“一张床上睡过的，不照样反目吗？”

正当这时，党委秘书小吴急匆匆地跑出办公大楼，吆喝道：“出车，去接刘耀功同志。”

有一个司机闻声跑过去，拉开伏尔加轿车门，小吴一哈腰钻进去，对司机说：“快！”

黑色伏尔加轿车一溜烟儿驶出了农管局大门。

“老传达”神秘地杆杆眼，说：“看吧，连咱这‘运动型高血压’患者都在家猫不住了，这说明，矛盾冲突尖锐了。”

“老传达”的猜测还真有几分道理！

一连开了七八个小时的马拉松会议，现在到了白热化程度。尽管柳正言反对，黎白还是叫人把躲在家里的常委刘耀功找来表态。

刘耀功来得够神速的了，小车往返不到 15 分钟。

刘耀功推开烟雾腾腾的门，谁也没看，径直走到外圈一张空闲的沙发上一坐，伸手从兜里摸出个四四方方的小盒子放到茶几上。

这简直等于示威、抗议。这个小方匣里有三种片剂、两种水剂，无非是“三硝基甘油酯”、“亚硝酸异戊脂”之类的抢救药。随身携带的“炮弹”，对于猝发的心绞痛、心肌梗塞，确实有着起死回生的奇效。农管局里不少负责干部，有的因为脑力劳动过

度，有的因为发胖、身体里胆固醇增多而患有高血压、冠心病。去年医院进口了一批“炮弹”，柳正言感到数量少不好分，就决定处级干部以上患有这种病的人手一份。这种分配药物法，曾引起医院某些医生的不满。他们说了些俏皮话：“看来，冠心病是有级别的，不当处长最好别犯。”但又不能说柳正言的“按需分配”没有一点道理，机关科室的一般干部和工人得这种病的不能说没有，但毕竟屈指可数，因此也就没有很多人去计较。

今天，黎白一见刘耀功把这发“炮弹”亮了出来，就皱皱眉头说：“老刘，用不着把救命炮弹摆出来，我有一发迫击炮弹，震你一下，你的血压就会下去！”

刘耀功不知道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他汰了一眼柳正言，他在大口大口地吸烟。他面前茶几上的烟灰缸里，烟头堆得像座小山，烟灰洒了一桌子。他再斜了一眼坐在斜对角的老婆杜月秋，她脸色蜡黄，尽管没有人发言，她却在刷刷刷地往“保密手册”上记着什么。

刘耀功虽然身在马拉松会议之外，他却什么都知道。杜月秋常借上厕所的功夫给刘耀功挂个电话，有条理地把会场争论焦点、可能出现的局面详细告诉他，所以，刘耀功心里有底。在司机去接他时，他得到了杜月秋的字条。条子上是这样写的：“……看来黎白下决心要整顿班子。你来会后要强调安定团结，这才能从当前政策这一环上摧垮黎的打算。另，既是抱病到会，可把‘炮弹’带来，给他当场摆在桌上……”

现在，他按杜月秋的指点来到会场，却不料黎白一开头就说出这样的话来。

这次党委会开得有点紧张。紧张的标志是总局关肃民局长的突然到来。

关肃民在总局 200 万职工中，是个不同凡响的人物，这不是由于他的经历、资格、魄力，而是因为他深入基层，了解下情，

办事果断。关肃民来到会场上，坐在沙发里，眯着眼，无论听到什么样针锋相对的意见，他都不惊奇、不激动，像是个与会议无关的局外人。其实他在聚精会神地分析着各方面的意见。

黎白说：“目前我们农管局党委的中心任务是搞北大荒的农业现代化。不搞现代化，什么都谈不上。要搞现代化，第一步是要重视人才，坚决落实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同时要整顿好各级领导班子。多少年来，干部当中互相防备、搞几套马车，运动来了就翻烙饼，你上来我下去，睚眦之怨必报……试想想，大家究竟拿出了多少精力去为人民工作？正因为有这个弊病，有些庸人得以浑水摸鱼，吃着人民的、喝着人民的，却不给人民干事情，甚至贪污受贿干坏事。这种人应当赶出各级班子，不能再让他们占着茅坑不拉屎，害党害民。”

矛盾表面化了。不知为什么，杜月秋的脸上露出惊惶之色。

柳正言不反对把一些有才能、有作为、有实践经验的知识分子重用起来，甚至提拔当负责干部，但他不明白，今天黎白干吗那么愤激呢？

他把头向干部处长杜月秋一摆，说：“我不是要你们干部处搞一个考核报告吗？凡是可以提拔使用的知识分子，都可以摆一摆、议一议。”

杜月秋说：“经过干部处认真考核，上来下去几次，觉得有5名知识分子可以考虑提拔到科研所副所长、农场副场长、分场场长等关键岗位。”

接着她念了五个人名，也提到了唐卓新。黎白问道：“你打算委派唐卓新什么工作呢？”

杜月秋不愧是搞人事工作的，话说得滴水不漏：“这只能由党委作出决定。”

黎白说：“你不也是党委成员吗？假如让你个人表态呢？”

杜月秋出人意料地来了个大胆的迎合：“我看，让唐卓新破

格来当主管农机的副局长是可以胜任的！”

会场里起码有一半人哗然。

黎白也暗暗吃了一惊。他在猜测，这个杜月秋是不是在故意将自己一军？

黎白想了想，说：“我支持你这个意见。我看，唐卓新具有这个才干，我已经写了一份给党委和总局党委的报告，这是我的第一个提案。”说着，他郑重地从挎包里拿出复写得工工整整的一份材料，交给了坐在柳正言身旁的党委书记。

让一个当过“右派”的人出任农管局副局长，人们感到十分意外。

柳正言坐不住了，他捻死了大半个烟头，激动得站起身，说：“我提醒你，杜月秋同志！这是严肃的党委会，决不能搞庸俗的迎合！”接着他针对唐卓新发了一通议论：唐卓新有才能，我不否认，但他有当副局长的德吗？”

从没发过言的岳海打了个横炮：“我要问一句，唐卓新缺什么德？”

柳正言气得脸色铁青，环视了一下会场，说：“当然，给唐卓新平反是应该的，去掉对他的那些污蔑不实之词也是对的。可是，能说他就一点问题没有了吗？为什么别人没有被当‘右派’打，他却被打了？至少是还有错误嘛，尽管这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我要提醒一些同志注意，落实政策不是一风吹，平反不等于庆功会！”

黎白说：“唐卓新这样的同志，好比是被母亲误解、误罚的孩子，被遗弃多年，可是他照样在默默工作，希望有一天得到母亲的理解。这就是他的品德。可惜时至今日，还有些人在扮演着后妈的角色，带着不能令人容忍的偏见和私心来对待一个忠诚于母亲的孩子！试问，我们在座的人，在你被揪斗、被关押的岁月里，你在干什么？你有没有过消极情绪？包括我在内，有谁像唐

卓新那样仍然埋头苦干？他利用两年零两个月的时间，走遍了北大荒的每一个角落，得到了可靠的数据。有谁能像他那样，一天吃几个窝头，却用十几个小时去为农业现代化设计蓝图？他过去到底是犯了什么过错？他说，外行领导内行不如内行领导内行，免得出官僚主义，这有什么错？依我看，那些以党的化身自居，却抱着党内的痼疾不准别人去动手术的人，才是真正的害党害民的人！可是，他们因为这一条得到过惩罚了吗？他们不但受不到惩罚，至今还以天生的左派自居，把给别人落实政策看成是一种‘恩赐’，这是能够容忍的吗？在这次会议上，有人提议，建议组成一个调查班子，审查杜月秋同志违法乱纪、卖官鬻爵的错误。”

这一发炮弹打出来之后，会场震动了。大多数与会者没有思想准备，因而感到突然。柳正言怀疑地问道：“老黎，你有什么根据？”

黎白说：“根据都掌握在群众那里。这也正是我们要好好整顿一下班子的原因，否则群众不信任我们，那怎么能同心同德搞四化？”

杜月秋不愧为杜月秋。在她经受了这闪电般的攻击以后，愣了一下，随即反攻起来。她像放连珠炮似的说：“我不怕任何人对我发动突然袭击，包括局长在内。我声明，我可以停职，但不反省，因为我是清白无辜的。什么人反对我？清楚得很，那些个人私利没有得到满足的人，那些过去在历次运动中挨过整的人。但这无所谓，我现在就可以交待工作，只要黎局长不认为这是破坏安定团结！说实在的，我不能不怀疑，黎局长是不是‘四人帮’阴魂附体了？不然为什么对我们这些被‘四人帮’害得这么苦的人下这么大的劲呢？”

她说完，神经质地从邻座那里抢过一支香烟，翘起腿大大方方地吸起来。

黎白发言了：“党是有纪律的，对违反党纪的人必须绳之以

法纪！我问你，医院的闻大夫是怎样当上院长的？他这几年给知识青年开假病情诊断书达五百余起，而且和你是有默契的。他接受了近两千元的贿赂，你分了多少？这无需我给你报账。他为什么提升院长？难道不是因为他救过刘耀功，使老刘沾了‘高血压’的光，逃避了运动吗？闻光给你送了一台 420 元的电视机作为提升院长的报酬，这不是虚构吧？还有，大北农场的副场长刘品德，本来是欠有血债的打砸抢分子，为什么基层报上来后你给压下了？难道不是因为在春节前夕给你家送去了一口白条猪、20 瓶北大荒白干酒，还有鹿茸、蜂蜜、鸡蛋吗？你不能否认这些事实吧？你还哪里有一点共产党员的气味？’

这一席话把会场镇住了，杜月秋只剩了耍泼的一宗本事，又哭又闹。

刘耀功呢，突然往沙发上一栽，闭上了眼睛。

委员们听了很生气，都支持黎白的提议，主张对女干部处长审查。

柳正言的脑袋简直成了一锅糨子！他想不到杜月秋竟是这样一个人，同意审查她违法乱纪的事情。这时，人们都把目光盯住总局局长关肃民，他们都想听听关局长的意见。

关肃民望了望大家，说：“为了实现四化的宏伟事业，我们一定要善于鉴别和选拔干部。因为在一定的条件下，干部是决定性的因素。所以我觉得你们这个会开得好，可以深入开下去……”

十

劝农河经过镇子南边，恰恰在黎白新居的院前甩了个大弯。200 米外那架双拱石桥，是通往市里的必经之路。

这一天傍晚，黎白在自己的新居设了一桌便宴，招待柳正言

和刘耀功两个战友。黎白认为，刘耀功虽说对他不满，他总会看在几十年的友情份上赏脸的。可是等到天黑，只有柳正言一人赶到。两人默默无言地喝了一杯茶，黎白悄悄走出去了，他在桥头上等了好一会儿，始终不见刘耀功的人影。

一阵沙沙的脚步声在黎白身后响起，他一回头，见是柳正言倒背着手走来，就喃喃地问了一句：“他真的不来了？”

柳正言长叹了一口气：“你呀，太痴了！把人家搞到了声名狼藉的地步，还指望人家像从前那样对待你吗？回去吧，他不会来了。”

黎白固执地自语：“如果纵容杜月秋，让她沿着邪路滑下去，对党、对她个人有什么好处？”

柳正言只能独自苦笑。

天已黑透，看来刘耀功不会奇迹般地出现了，黎白这才同柳正言缓步往回走。

黎白问道：“这么说，他生我气了？到了记仇的地步？”

柳正言说：“你对杜月秋，已经够霹雳闪电的了，干吗还非得在党内批评老刘？老刘最近憋屈得要死。他昨天对我说：“‘四人帮’的爪牙们搞了他十几年，没有把他搞臭，却不料臭到自己人手里了。”

黎白听了这话心里咯噔一沉，像被人打了一闷棍。他想起了最近劝农河农管局系统实行一系列改革招来的种种议论，不觉一阵阵心寒。真是积重难返啊！

柳正言说了一番令黎白大吃一惊的话：“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看出了时弊？如果列举阴暗面，我并不比你你知道得少，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别说你呀，恐怕比你地位高得多的人物也只能慢慢地来呀！”

黎白想了想，说：“正因为这样，我们党才需要有更多的、真正起模范作用的党员，帮助党度过目前的困难。”

柳正言慨叹地说：“我佩服你的气魄和胆量，但我觉得，跑到潮头前面，是很危险的。”

黎白感到一阵阵眩晕，鼻子又流出血来，他赶忙背身擦去，说：“过去我们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在战火中出生入死，我们怕过危险吗？干革命需要闯将，搞建设同样需要闯将。为了人民的利益，我们应该总结 30 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解放思想，排除阻力，奋勇前进。”

劝农河两岸已经亮起了灯火。黎白感到，虽然春天早已来到了北大荒，但在这劝农河两岸，乍暖还寒最难将息啊……

（原载 1980 年 2 期《十月》）

黑十字架

报警，黄金被劫！

春末的南国，薄暮时分，晚风无力地吹拂着雨丝。

这里是距南屏市郊区 5 公里的地方，路灯稀少，偶尔地照出柏油路上的水洼。公路两侧茂密的油棕林、檳棕和英雄树联起枝叶，搭成黑黝黝的棚架，细雨打在树上，发出柝人的声音。

从南苑县方向开来一辆日本造三菱牌工具车，两个大灯照得雪亮，以 100 公里的时速向市区急驰而来。车轮把马路上的积水溅起老高，呈扇形向路旁喷洒。

除掉司机，车上坐着三个人。

一个民警，手里提着一支张开机头的手枪，坐在司机右边的位置上，盯着风挡玻璃上刷刷滑动的雨刷器。

后面座位上的两个人，一个是年轻人，披一件军用雨斗，两只脚分别踏在脚下两个白色帆布袋子上。帆布袋子一大一小，都装得鼓鼓的，口袋嘴有铅封，口袋上印有一行红字：南苑县银行。

另一个人要老成得多，眉脊骨很高，眼睛凹陷，却很有神。他头戴一顶藏青花呢鸭舌帽，穿一件风雨衣，是姜黄色的，脚上

穿一双万里牌高筒雨靴，面部表情有点紧张，不断地抬起腕子看表，时而催促一下司机：“再开快点！”

这个中年人脚下有一个大约两英寸见方的绿色保险箱，同样标有南苑县银行的字样。

工具车在阒无人迹的郊区公路上飞驰着。

青年人有几分担心地问：“快到了吧？我真有点……”

中年人拍拍他的膝盖，说：“放心好了，你又不是第一次。”又向前面的民警努努嘴，意思是安全系数很大。

青年人嘟囔了一句：“可今天咱们照原计划晚了三个小时啊。”

中年人说：“都怪这台该死的车，硬是打不着火。不要紧，好在市行李行长在银行大厦等我们。”

车子骤然减速，前面是弯道。

突然，车身一震，随着两声闷哑的枪响，车大灯被打灭了，挡风玻璃发出稀里哗啦的响声。

顿时，工具车陷在一片黑暗中。还没等人们分清发生了什么事，一排排子弹已经泼水般迎面扫来。

民警喊了句：“不好，有人劫车！”随后向司机下令，“冲过去，快！”

司机低低地应了一声，驱车猛冲。

怪，车子像打摆子一般左扭右晃，不走正道，速度越来越低。

民警侧脸一看，司机前胸的血放箭般溅到七裂八破的挡风玻璃上，他那死抓住方向盘的手在痉挛……

司机终于伏到方向盘上。

民警跳过去，把司机向一旁推了推，一边回头命令两个人：“给司机包扎”，一边亲自驾车。

砰！又一颗子弹迎面飞来，民警全身向上一挺，胸口血流如

注。他右手下意识地一扭方向盘，工具车猛地向右前方冲去，轰隆一声，翻到路旁陡深的草坡上，四个轱辘朝天，还在转。

在汽车倾翻的同时，从棕树林后头窜出七八个黑影，个个手里提着凶器：有枪，也有七寸匕首和斧头。他们都穿着带雨帽的反胶面雨衣，蒙着面。

这伙人飞快地靠近汽车，撬开扭曲变形的后车门。

两个押运员看来早有防备，他们脸上都带了撞伤，年轻人操着一根摇车手柄，中年人双手抱着千斤顶，两个人趴在翻倒的车中，准备抵抗。

后车门一撬开，中年人猛地把千斤顶掷出去，正好打在一个匪徒的肩膀上，那人“哎哟”一声，退后几步。青年押运员趁机抡起摇车柄左右开弓，打得匪徒们不敢靠前。

一个矮个子蒙面强盗拨开匪徒走过去，手起枪响，青年押运员倒在血泊中。

漆黑的雨夜中亮起了车灯，一辆外国造高级轿车从公路下面的树林里开上公路。

矮个子蒙面强盗指挥匪徒们把绿色保险箱抬到轿车后货仓里，那箱子很重，撂下去咚的一声。

矮个子从青年押运员身下拽出那两个帆布袋，用匕首一划，小的一条里豁朗朗流了满地银元，有“袁大头”，有光洋，也有鹰洋；另一条大帆布口袋里却是成捆的人民币，全是10元、5元票面的。

矮个子又一挥手，上来两个匪徒把银元袋子抬走了。

几个匪徒刚刚上来抬人民币口袋，矮个子制止了他们。他想了想，伸手拿了几捆钞票，给匪徒们一人分一捆，剩下的就扔在车中。

矮个子把警察手中的枪拿起来，揣到自己口袋中，然后叫人把青年押运员的尸体抬下车，一直抬到树丛后头，那里有一个事

前掘好的土坑。

矮个子匪徒把青年人脚上的靴子剥下来，然后点点头，匪徒们把尸体丢到土坑中，用铁锹把坑沿上的松土盖好，又把事先预备好的草皮子栽到新土上，居然不留什么痕迹。

矮个子亲自穿上死者的高筒靴，在泥水中沿着林中土路走了一段，绕上公路，又脱下靴子，回到高级轿车旁。他向几个匪徒低声说：“四散走开，沿着公路走，不要留下脚印，走几公里后再离开公路。”

几个匪徒领命，分头走去。

只有一个水蛇腰的高个匪徒似乎留恋不舍地回眸望了汽车几眼。

矮个子不动声色地钻进汽车。汽车向远郊方向驰去。

少顷，水蛇腰从树后趑回来。这个蒙面强盗小心翼翼地蹭上公路，望望四下确实无人，才放心地撬开工具车的后门。他刚要伸手去捞钱袋子，猛然有人抓住他的后衣领子，把他吓了一跳，挣扎着回过身来，见是那个矮个子强盗首领，正冲他冷笑呢。

水蛇腰吓得打躬又作揖：“饶命，老 K，老 K，饶命，我一时钻到钱眼儿里去了……”

矮个子一松手，把水蛇腰摔倒在路旁，恶狠狠地说：“我不是老 K！我是奉老 K 命令来的。你这个贪心的家伙！”

说罢，掏出从民警手里得来的那支五四式短枪，砰砰两枪打过去。顿时，水蛇腰在地上打了几个滚，弓起虾米腰，沿着路旁的斜坡滚下去了。

矮个子走过去踢了两脚，看看确实死了，才掖起枪，不慌不忙地顺着公路走去。

在半公里外的石拱桥那里，高级轿车等着他呢。

失踪的是尸体，还是活人？

雨夜枪声惊动了郊外苗圃沉睡的工人，他们发现了被劫的现场，迅速用电话通知了南屏市公安局。

15 分钟后，公安局侦察处处长关穆带着侦察员、武装警察、法医飞驰出事地点。

关穆四十五六岁的年纪，个子不高，脸很瘦削，大檐儿帽子戴在他头上显得有点滑稽，所以他平时很少穿警服。

今天，他披了一件胶面朝外的雨衣，只带了一个助手，是个刚从政法干校毕业的小青年，叫骆峰。

骆峰足能比关穆高出一头，不仅身材结实得像个运动员，脸孔也长得漂亮，如果不是公安工作的限制，他有好几次机会在拍外景的电影里当了“大群众”演员呢。骆峰为人憨厚，又机灵。他爸爸原是这个市的公安局长，在“砸烂公检法”的年月里，被诬“里通外国”、“资敌通敌”罪下到牢狱中，活活折磨死了。作为老局长的老下级，关穆 5 年前把骆峰从北大荒农场接回来，亲自送到政法干校去学习，他要让骆峰承继他爸爸的职业。为了培养他，关穆一遇到重大的案子，总是带着他来。

今天这起抢劫案，是近几年来南屏市出现的最恶劣的一起。

镁光灯在暗夜中闪烁，车辙印、脚印，翻车现场，各个角度的照片在拍照。关穆指示骆峰，从车门上马上取下各种人的指纹，自己则走到一旁，询问报案苗圃工人发现的经过。

一共死掉三个人。司机、押送民警，路旁还有一个蒙面人，身分不明，很可能是抢劫犯之一。

中年押运员还活着。他的腿部中了一弹，他自己撕了一块衣摆包扎上了。

听说有人活着，关穆很高兴，这是目击者，很难得。他走过

去，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中年人骂了一句：“该杀的强盗！”然后才说，“我叫戚宾如，是南苑县银行黄金收贮员。”

关穆问：“就你一个人押送吗？”

戚宾如说：“还有会计马会德，去年从省财贸学校毕业的。”

关穆望望几具尸体：“马会德哪里去了？”

戚宾如四下望望：“怪呀！他哪儿去了呢？枪响车翻以后，我们抵抗了一阵，受伤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关穆沉吟了一下，说：“好吧，咱们以后再谈。”回头叫了声，“小骆！”

骆峰跑过来。

关穆说：“派一个人，用吉普车把戚宾如同志马上送到市医院去。”

骆峰扶着戚宾如走向吉普车，把他交给司机和一个民警，看着汽车开走，才又走过来。

一辆面包车从市里方向开来，停到出事现场。从车上急急慌慌地跳下一个50岁上下的人来，光着秃顶，没有披雨衣，说话结巴发抖，不知是冷的还是怕的。

他结结巴巴地问道：“谁、谁是负责的……”

关穆向他走过来：“你是……”

来人说：“我是李旭，市银行行长。刚刚得到你们的通知。”

骆峰问道：“你一直在市行值班吗？”

李旭说：“有、有值班员。我、我是特、特地留在行里准备接收南苑送来的黄金、白银的。”

关穆打开车门，扭亮手电，对李旭说：“你知道县行上缴的数目吗？”

李旭点点头，说：“黄金800两，银元3000多、多块，全、全抢走了。”

骆峰指了指成捆的人民币，问道：“人民币为什么不抢呢？真有点奇怪？”

李旭说：“是呀，是有点怪。”

关穆问道：“为什么要夜里送黄金？”

李旭说：“只、只有这次是例外。本来他、他们应当下班前，也、也就是6点钟前，送、送到的，可他、他们的车坏了，耽误了几个小时。”

关穆点点头，同骆峰走开。

骆峰说：“看样子，问题就出在拖延送库时间上。”

关穆说：“有道理。首先要查清，市行、县行有哪几个人知道送库的准确时间。其次，要查清这台车事前检查过了没有，到底出了什么毛病。”

骆峰答应了一声。

关穆说：“走吧，咱们去看看那个蒙面人。”

尼龙黑色面罩已经揭去，看出死者的年岁不超过25岁。他蓄着两撇小胡子，右下颏有一道三寸长的疤痕，不像是淋巴结核手术后的刀口，也不像自然受伤的痕迹，看上去至少缝过七针，倒像是刀伤，斗殴留下的纪念。

死者浑身溅满了泥水、污血，脖颈吊着一只金链黑十字架。关穆托到手上细看，十字架正中是一块石英电子表。这人是鸡胸，背略有点驼，穿着港衫，大喇叭裤，脚上是一双镶有红绿压条的厚底足球鞋。

法医检查着伤口，照相的灯光一闪一烁。

关穆蹲在死者身旁，久久地端详着这张似曾相识的面孔，却又始终对不起号来。是职业病造成的过敏吗？不，分明对他有过印象。是在劳改农场呢，抑或是在大北监狱？还是在公安局看守所？

关穆小声对骆峰说：“这个人，可能是打开抢劫案疑团的钥

匙，回去马上查档。”

骆峰点着头，正在从死者口袋里往外掏东西，一只气体打火机，是日本造；一包美国造云斯顿牌香烟，只抽了三支，其余的都被水泡湿了。还有一些零星人民币，一捆 10 元票面的现钞是掖在裤带里的。

最后从他屁股后的口袋里摸出一个硬壳小本子，是香港签发的“回乡证”。打开来，左面盖有骑缝章的地方贴着死者留长发的照片，填写着他的职业：“罗小蟾，香港北角木星街 380 号，联侨企业有限公司雇员。”

关穆和骆峰对视了一眼。

骆峰问：“这家伙是香港的？”

关穆没有正面回答：“奇怪的是，几万元现款，他们不拿，为什么单单把黄金、白银抢走呢？”

骆峰醒悟地：“你是说，这和走私有关系？”

关穆说：“答案嘛，也许在海关那里。他们要破获的那个代号为黑十字架的走私集团，为了从大陆搞走黄金，眼睛都红了！”

这是有道理的分析。最近，由于国内提高了黄金兑换价格，走私集团想从大陆民间直接搜刮金银首饰越来越不现实，狗急跳墙，有可能采取劫掠国库黄金的办法。可是关穆仍然不敢相信，黑十字架集团的头子们敢直接派遣匪徒潜进大陆作案。因为人生地不熟，可能性是极小的。那么，国内还有另外一个抢劫集团吗？它与海外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这个有香港身份证的人参与了这次抢劫呢？

关穆合上记事本，站起来，说：“马上回局，通过我们驻港澳的关系，也可以通过香港移民局，首先查清这个叫罗小蟾的底细。”

疑团！现场留下的是一大堆疑团！

年轻的会计马会德怎么会失踪了呢？是被匪徒们绑架走了？

这种可能性极小，他们要的是金子、银子，会计脑子里只有天文般的阿拉伯数字，并不能变成有用的黄金。

那么，马会德是抢劫犯的同伙？是内应？是牵线人？是提供情报的人？

骆峰首先提出了这个疑问。

关穆没有做声。两个人下了公路，在沾满雨珠的草丛中走着。

骆峰说：“如果马会德真的是抢劫犯的同伙，他的失踪就不难解释了，肯定是事情败露，逃之夭夭了。”

关穆说：“现在，你说的一切，都只是一种假想，没有证据。”

突然，骆峰弯下腰去。手电筒光圈里照出一行深深的高筒胶靴印迹。

他们量了尺寸，拍了照，然后顺着脚印向棕林深处走去。

骆峰说：“靴子很新，40号到41号之间。”

绕了一程，靴子印把他们带到了公路上。

一到公路，靴子印再也分不出来了。即或有，也被雨水冲刷干净了。

随后，另一个侦察员在前面松树林湿地里发现了汽车轮胎的印迹。

关穆和骆峰跑过去。轮胎印在泥土上的花纹很清楚，可以判断车身自重很轻，轮距不大，像是轿车。可那连续“∞”形花纹却很少见，一般轮胎的花纹多是“W”形、“Y”形和浪线状。

“这是什么车呢？”骆峰问了一句。

关穆叫人拍照下来，在原地站了一会儿，说：“走吧，回局去。”

他们就这样带着种种谜团回市公安局去了。

国门的钥匙揣在自己兜里

海关白色大楼的平台上站着两个人，正是关穆和骆峰，他们都换上了便装。

他们背后上方，有一行斗大的泥金大字镶嵌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南屏海关。

从这里望过去，可以看见边界港方沿着一条河拦起来的两丈高的铁丝网，对面山上香港移民局的小白楼，楼上飘扬着米字旗。

河上有一座带着穹隆形大棚的界桥，对面是香港方面的车站。从界桥大篷下走过成批的港澳旅客，来自东南亚的华侨和从香港入境的外国人。

他们走过边防检查站通道，纷纷交验“回乡证”和入境护照。香港方面的“红帽子”脚夫替他们用平板纸箱车推着行李、箱笼跟在后面。

接着便涌进海关检查大厅，免税口和完税口通道，以及候检大厅、小卖店、外币券兑换处、休息厅都挤满了熙熙攘攘的旅客。

关穆凝望着飘扬在边检站瞭望台上的五星红旗，感慨地说：“这里才是天下第一关啊！”

骆峰说：“记得，从前在哪本书上看过，刘少奇同志对海关有一句什么话来着？”

关穆说：“原话记不得了。大意是说，海关关员是掌管国门钥匙的人。解放了，经济命脉掌握在人民自己手中，国门的钥匙揣在我们自己兜里了。”

“形象！”骆峰说，“这里没有枪炮，没有边防军，却有虎狼出入。”

他们身后的门开了，原来那是一间会议室。

有两个穿着米色海关制服的人来到阳台上，一个年老的，一个三十五六岁的。

年老的说：“欢迎你们来帮我们抓老鼠！哈哈！”

关穆也笑着向骆峰介绍：“这位是海关关长彭明光同志，老把门的了！”

骆峰和彭明光握手，忍不住笑了。

关穆又指着浓眉方脸的中年人说：“这位是号称‘看门虎’的查私科长严方锐同志。这是我的助手骆峰。”

严方锐同骆峰握手，笑道：“你别听他胡说八道，够得上看门的猫，也就不错了……哈哈哈哈哈。”

四个人都笑着回到会议室里。

一个戴着海关女式无檐儿软帽，穿短袖海关衫，长得很漂亮的姑娘早给他们沏好了茶，向他们笑笑，退了出去。

彭明光叫住她：“童小娣，你到检查口去吗？”

童小娣点点头：“是呀。”

彭明光从文件包里拿出一封信：“这是九龙新界一个同胞的来信，揭发有一个人带走私手表在这趟车入境，你注意一下。”

童小娣接了信，答应一声走出去。

骆峰赞道：“你们这一行不坏，还有人通风报信。”

彭明光摸出一包红双喜香烟，递给关穆，说：“在港澳，搞走私的只是极个别的，可也小瞧不得他们的势力。他们同黑社会勾结，再同大陆的走私分子里应外合，很猖狂呢！”

严方锐啜了一口茶，望着关穆说：“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

关穆只是一笑，慢慢地打开文件包，戴起老花镜在翻找。

彭明光吸着烟问：“看来，又要搞三堂会审？”

关穆嘿嘿一笑，说：“老搭档了，是来求援的。”

严方锐狡黠地一笑：“让我猜猜看，你是为黄金抢劫案来的！对不对？”

“鬼精灵！”关穆捣了严方锐一拳，说：“黄金 800 两，银元 3 000 块，就冲你要了！”

严方锐半开玩笑地说：“笑话！那是你那一亩三分地上的事儿，咱是铁路警察，管不着那段！”

关穆合上文件包，故意绷起面孔，说：“真的吗？那好，咱都各扫门前雪，我也不求你！不过，你要破获‘黑十字架’集团的事，可别找我，敲锣卖糖，各干一行嘛！”

彭明光笑着说：“别演戏了！一到有了任务，打破脑袋抢，甚至互相插手别人的事呢。”

人们又都笑起来。

关穆这才从皮包里拿出一沓材料，还有抢劫现场的一些照片，交给他们看着，说：“这次黄金抢劫案很古怪，如果是一般的抢劫集团，连粮票都不肯放过的，怎么会几万元现款不动？只拿走了几千元，看来那只是小伙计们自己偷干的，像被打死的那个叫罗小蟾的人，口袋里就有两千多元钞票。这几天经过调查，市银行提供了一些情况，他们抢走的金条，不是民间的普通成色，经过熔铸，是最纯的，只有国库才有。换句话说，抢劫犯是不敢、也没有可能把这样大批国库黄金拿出来卖给国家的。”

彭明光和严方锐对视了一眼。

严方锐问道：“你的意思是说，抢劫犯有可能把这批国库黄金偷运走私出境？”

关穆点头：“可以这样分析。甚至可能同你们正要破获的黑十字架集团有瓜葛。”

骆峰补充说：“奇怪的是，县银行的另一个押运员马会德失踪了，是他夺走了民警的枪当内线呢，还是他被绑架了？现在还不清楚。惟一的线索就是这个人的照片，请你们协助查证一下。

我们通过查证，香港联侨企业有限公司是专门经营地球牌人造皮革手袋、靴鞋、旅行袋的，地址在九龙观塘励业街 11 号，根本没有罗小蟾这么个人。请你们帮助查一下。”

严方锐看了看罗小蟾的照片和“回乡证”，站起来，走到门口说：“我叫人拿到电脑中心用电脑查一下，看看这个人什么时候过来的。”

严方锐出去以后，彭明光说：“最近以来，走私活动越来越猖獗，个别旅客少量夹带还不是最可怕的。据我们掌握，香港、澳门有几个大走私集团，大张旗鼓地从海上走私，把大量洋杂货向大陆市场倾销，已经达到直接破坏金融市场、扰乱四化建设的地步，中央三令五申要严厉打击。”

关穆问道：“黑十字架集团有眉目了吗？”

彭明光说：“黑十字架集团的老板绰号叫‘臬老大’，公开的身份是经营干鲜果品的总经理，从前干过特务，进过戴笠的庐山星子训练班，1950 年逃出大陆的。他声称，要把大陆的金银弄光，在海外造一座金山、银山；而他们卖到大陆的冒牌假手表、塑料表，要让它变成一堆废铜烂铁。”

说罢，他将一沓材料递给关穆：“我们正要请你们配合，他们已经发展到武装走私的地步了。”

这时，严方锐走回来，拿了一个由电脑中心填好的卡片。

严方锐说：“罗小蟾是假名字，这是一份偷来的‘回乡证’，照片是后贴上去的。这个被打死的人本名叫单根宝，1978 年出逃香港，在黑社会混了一段，被人家雇用，回大陆走私过两次。去年 6 月 9 日，他再次走私手表，被截获，发现了伪造的证件，被扣留。从此他没有再去过香港。这张‘回乡证’看来是他又一次伪造的。”

“单根宝？刀伤？好熟的名字啊！”关穆又一次拿起照片端详。终于想起来了说：“啊，对了，是他，单根宝！1967 年秋

天，他拦路抢了别人一块手表，判了两年徒刑，后来是从劳改农场跑掉的，原来逃到香港去了。”

骆峰说：“可惜这家伙死了。”

“不要紧。”严方锐说，“我还可以给你们提供一点线索，有一个叫仇阿三的经常同他鬼混，一对难兄难弟。过去，单根宝走私过来的手表、港衫、打火机，都由仇阿三拿到中山路黑市上去出售，坐地分赃，我们罚过仇阿三的款。”

接着他讲述了去年6月9日查获这对难兄难弟走私的经过。

那是在沙头角小镇子上。

沙头角是个怪地方，过一座15米长的小石桥，就是一条街，街面很窄，说是道东道西可以对烟袋火，那是一点都不夸张的。由于历史的原因，使沙头角变成了极为复杂的特区。道的右侧是香港九龙新界所属，道的左面是大陆的一个公社，街道中心线为界，再没有别的标记。在石桥前面设有一个边防分站，一个海关检查所。从前这里是不能带货通行的，因为它并非口岸，只准居住在此地的居民出入来往种田、走亲戚。近几年开放以后，有些走私分子相中了这个小口岸，单根宝就是其中的一个。

去年6月9日，严方锐带领一个查私小组到沙头角检查所去帮忙，那里平时只有5个人，忙不过来。

9点钟左右，单根宝从街里推了一辆带变速闸的飞利浦车子走过桥来，一边走，一边同等候在检查站外的仇阿三打招呼：“阿三，车子我给你带来了，英国飞利浦的！”

仇阿三喜笑颜开地应道：“太好了！这回上下班我有单车骑了。”

单根宝把自行车推到检查台前打关税，本来车子放在无人的地方是丢不了的，可他贼人胆虚，一边掏港币打税，一边不时地回头斜睨着自行车。

站在远处的严方锐觉得单根宝的行迹可疑，就注意起他来。

童小娣给单根宝收过税钱，把税票子交到他手中，单根宝急不可待地推起车子就走。

严方锐走了过来：“等一等，还要检查一下。”

单根宝一愣，说：“你们还有没有完？好，查吧！”说罢，将吊在自行车把上的一个马桶兜底朝上一抖，里面的东西稀里哗啦地落了一地，有电动刮胡刀、录音磁带、香水、打火机、一条健牌香烟，还有一卷卫生纸。

严方锐不动声色地望着他。

为了掩饰内心的慌乱，单根宝点起一支香烟，连着吸了几口，说：“常来常往，海关的规矩咱懂！还能干走私的勾当？”

仇阿三隔着栏杆在帮腔讨人情：“我表哥特地给我捎来一辆车子。”

严方锐伸手压了压自行车带，说：“把气放掉，可以吗？”

“干什么？”单根宝脸上的疤痕一下子红亮起来，十分紧张地说：“放了气，怎么骑？”

童小娣说：“那没关系，我们再帮你打上气嘛。”

单根宝脸上沁出了冷汗，不得不让人家放气，可嘴里还在说硬话：“好吧，你放气好了。看来你们是怀疑我带走私货了，是不是？你们若查不出来，你得给我赔礼道歉！”

严方锐一笑，说：“我若是查出来呢？”

单根宝把上衣拉链哗地拉开，手指朝胸口一戳，说：“那，你给我俩枪子儿！”

严方锐也不去理睬他，弯下腰，拧掉车圈上的螺丝帽，哧地一声放了气，双手轻轻一托，把车子倒扣在地上，像自行车修理铺的手艺人一样，麻利地把内外带剥开。

周围瞧热闹的人没有一个不佩服严方锐的。原来，在自行车内外带之间，密密麻麻地夹带着几十块走私手表。单根宝傻了眼，低下了头。

由于这一查，才查出单根宝根本不是港澳人，是不久前从大陆偷渡过去的。他被送到收容所去教养，仇阿三坦白以后，交了罚款才算了事。

关穆说：“好，没有白来。只要仇阿三还在南屏，同单根宝就不会没有联系。我们回去再顺蔓摸瓜。市局正在请示市委，准备同海关组成联合破案小组，我们随时互通情报。你们再把紧点关口，防止这批黄金走出去。只要地上有眼儿，就不怕找不到蛹。对了，黑十字架集团的鸦片又往大陆运了，量不大。”

彭明光张大了眼睛：“是吗？”

关穆说：“我们发现白云饭店的一个香港阔家子弟又在吸毒。”

严方锐说：“走私集团真可恶，非把这些人害死吗？”

原来香港有好多纨绔子弟在“黑社会”鬼混以后，好些人吸毒成瘾，他们的家长想出了一个办法，纷纷花钱送子弟到大陆来住。他们都知道，大陆是没有吸毒的国土，想买烟土、烟膏或者白面儿都没处买。有一些多年吸毒的人在大陆住上一年半载，居然戒了烟，面色红润地回到父母身边。

但是，鸦片走私集团无孔不入。他们竟开始小量向大陆走私鸦片，偷偷卖给那些来大陆强行戒烟的人，比香港的价格要高昂得多。吸食方法越来越奇，把白面洒到香烟锡纸上，底下点火，吸上一口，叫“追龙”，一次高达 100 港币；把白面卷到香烟丝里吸叫“打高炮”，一支烟 250 港币；在胳膊上打吗啡，叫“蚂蚁上树”，一针要 300 港币！

黑十字架集团是贩毒的大本营。他们雇用大量马仔，小量带鸦片混入大陆。有的塞到鼻孔里，叫“上天桥”，有的塞到肛门里，称“入柜”，方法五花八门。前一段经过打击，黑十字架集团走私鸦片暂时消停了，想不到近来又开始活动。

如果不加紧严厉打击，黑十字架集团猖獗起来，将来可能会

腐蚀一些意志力薄弱的青年下水，他们会把大量金银搜刮出去，这比倾销洋杂货的危害更要大得多。

海关的人怎么能不着急呢？

香港末流演员的命运

集装箱的 30 吨大卡车排成了一条长龙，从九龙方面开过来。

这是离南屏海关火车通道 5 里地外的文锦渡分关。由于最近大陆同港澳方面合资办了好多企业，从香港方向过来的运料车和装有建筑器材的货车每天从早上 8 点起，一直到下午 4 点，总是络绎不绝，平均一秒钟达到两辆。文锦渡关口像北京西单路口的交通一样，经常堵塞。

这天上午，公路上又堵得满满的。

查私科长严方锐带了几个个人来到这里了解出入境情况。

他刚站到边检站栏杆前，瞥见一辆流线型乳白色高级轿车从汽车的空隙里左拐右旋地开过来，一路揪着轻音乐似的喇叭。

严方锐认出了这辆车子，这是一辆相当阔气的带有空调装置的雪佛兰轿车，它的主人叫黎曼，是市里一家土特产公司驻香港的工作人员。他们在香港开办着一个大商号。黎曼每周总要回来一次，过周末，兼办公司的国内业务。

严方锐早就认识黎曼，他们年岁相仿，初中、高中都是同学。黎曼从前家境很贫寒，父亲是码头搬运工人，很早就去世了，只有一个母亲靠卖雪条、看自行车维持生计，黎曼就没有机会升大学了。

当严方锐从外贸学院毕业回到这个城市以后，黎曼走了运，她嫁了一个很有才干的丈夫，如今是市政府的一个处长。

雪佛兰轿车轻捷地开到检查站闸口，黎曼刹住车，推开车门下来，向边检人员摇了摇手里的证件，笑容可掬地绕到车后，打

开后仓盖，说：“请检查。”

边检人员对她熟得很，坐着没有动，只斜视了一眼打开的后货仓，里面除了一只备用轮胎和随车工具箱而外，没有其他东西。

边检人员说：“别客气。怎么，又回来过周末了？”

黎曼鼻子里哼了一声，说：“忙得晕头转向，还有闲心过周末？这不，最近日本的一批瓷器倾到香港来了，把咱们景德镇的货给顶住了！我是回来请示降价的。我就不信，咱们国营顶不过日本商人，看他怕赔，还是咱们怕赔。”

她一边说，一边朝车子走去，回头问了一句：“看见严科长了吗？”

其实严方锐就在人群里站着，见她问，就走近几步打招呼：“你好，黎小姐，找我有何事吗？”

黎曼格格笑着凑过来，握握他的手，说：“什么小姐？你总拿我开心！”

“香港习惯称呼嘛！”严方锐笑着说，“常在染缸边上转，小心叫染缸染了裙子！”

黎曼笑着拍拍衣服：“一丝不染！我不相信臭钱能把所有的人迷住。”

严方锐敬佩地望了她一眼，普通的的确良短袖衫，普通的米色裤子，也没有烫时髦的长发，和在大陆时一样朴素。严方锐对黎曼从前就有好感，她帮了海关不少忙，去年为了表彰她，海关还发给她200元奖金呢。这当然都是分外的事，她常在香港转，了解情况，常常给海关提供一点情报，使得一些走私分子一入境就被查获。

她今天既然主动要找严方锐，一定有情报，严方锐就坐到她的车子里去，顺路谈谈。

黎曼驾着车，一边目不斜视地盯着车辆拥塞的路面，一边

说：“你注意，10点30分从九龙过来的那列火车里，有一个从新加坡过来的老太婆，她在水果里夹带了大量走私手表。”

严方锐说：“谢谢你。”

黎曼不介意地一笑：“我是为了得到你一句谢谢吗？唉，人在外边才有感触，看到国内商品竞争不过外商，心里急呀！如果听任走私分子任意把洋杂货往国内市场倾销，我们的手表工业、电子工业还怎么发展？”

她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是忧虑的神情。其实，身在海关的严方锐，感受会比她浅吗？

走了一程，到了海关门口，黎曼停住车，让他下去，说：“你总是那么忙，有时间到家里去玩。”

严方锐向她摆摆手，说：“好，有时间一定去拜访。”

雪佛兰汽车开走了，严方锐来到火车站检查口。

一走进休息厅，小卖店的楚肖雄笑着同他打了个招呼：“你忙啊，严科长？”

严方锐走过玻璃柜台，笑着问道：“买卖兴隆吗？”

“还行。”楚肖雄说，“玉器卖得快点。”

“有你这老古董在这儿，没问题。”严方锐说着向检查口走去。

他来到6号检查口前，通道上，梳两条小辫子的查私员薛文清正在指挥入境旅客分赴各个通道候检。

薛文清虽然才26岁，在海关却有8年的工作经历了，沉稳、有心计，是严方锐的得力助手，凡是交给她办的事，都能叫他放心。

他把薛文清叫到一旁，小声说：“注意新加坡来的一个老太太，带水果的。”

只这么简单交代几句，他就走进了6号检查口。对薛文清，是无须废话的。

薛文清开始注意搜寻，果然，她发现了一个 50 多岁的老太太，皮肤黝黑，穿一身黑色香云纱衣服，挑着一副担子，两边各拴有二十几个大个的椰子，看上去有百八十斤分量，她早已经汗流浃背了。

薛文清见老太太走过来，指点她说：“请到 6 号检查口。”

老太太笑了一下，换换肩，走进了 6 号检查口。

6 号检查口一共有 10 张检查台，每张台子上有两个查私员，多数是女的，都在礼貌、认真地检查着旅客的行李包裹。严方锐站在查私员们身后。

挑椰子的老太婆将担子放到童小娣面前，擦了一把汗，解释地说：“自家产的，拿给亲戚家尝尝。”一边说一边主动地把证件、外币拿出来放到台子上。

童小娣看了背后的严方锐一眼，向远处臂戴绿色袖章的人点了点头。那是海关的联检单位：动植物检疫所的，专门负责检验进口的水果、动物是否发霉变质或带有传染性病毒。

童小娣看了看老太太的护照，拿起一个椰子，在手里掂掂，严方锐也拿起一个仔细察看。这椰子同一般的椰子没有什么区别，看不出破绽，但分量似乎重了点儿。

老太太解释说：“自家椰子园结的，壳薄水多呢！”

严方锐和动植物检疫员咬了一阵耳朵，对老太太说：“我们要剖开看看。”

老太太惊慌地说：“这、这……一剖开，我还怎么送人呢？”

动植物检疫员拿刀子当场剖开一个椰子，汁水滴了一地。他用刀子在厚厚的木质纤维层里剝了一会儿，剝出 3 块包在塑料薄膜里的手表。

老太太吓得一屁股坐到地上，连忙分辩：“我、我不知道……这、这椰子是我买的。”

“你不是说自家园子里结的吗？”严方锐一边说，一边又接二

连三地剖开几个椰子，里面都有手表。

黎曼的情报真准！

这老太太的走私是有预谋的，用这种办法藏带走私表，需要在椰子刚刚有拳头大的时候，就剖开果肉，夹到里面，椰子长大，刀口就自然愈合，再也看不出痕迹了。

严方锐叫青年查私员徐晓林去处理老太太这件事，自己又到休息厅去转转。

看样子，这个老太太不过是个跑单帮的，并不是走私集团雇用的小马仔。他急于要找到的是黑十字架集团的蛛丝马迹。

严方锐在旅客中间转了一圈，一边客气地回答着各种各样的问讯，一边打量着旅客们的行李。

他发现了两个神态异样的人。

这是一男一女两个打扮时髦的人，男的叫吕颂，二十七岁，五官端正，很有风度，只是脚有点跛，吃力地拄着一支沉香木手杖。女的叫范盈盈，梳着披肩长发，一套剪裁合体的白色衣裙。

他们像是夫妇，挤坐在靠窗子的长椅上，唧唧咕咕地说着什么，好像担心有什么事情要发生的样子。

凭着多年海关工作的经验，严方锐已经习惯于通过旅客的脸色判断各种各样内心活动。

这一男一女为什么事焦虑不安呢？

严方锐向薛文清说了几句，薛文清点了点头。

过了一会儿，吕颂和范盈盈向检查厅走来，薛文清指了指6号通道口：“先生、小姐，请到这里来。”

吕颂看了看范盈盈，两个人尽量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走了进去。

恰好童小娣的台子空着，吕颂向那里走去。

范盈盈把随身带的两个衣箱打开，里面都是衣物、日用品，

还有一架照相机。

吕颂指指照相机，说：“我申报登记了，是自用的。”

童小娣在箱子里摸了摸，问道：“先生，小姐，没有需要打税的吗？”

吕颂落落大方地说：“谢谢关照。若有打税的，就不走这免税口了。”

严方锐踱过来，继续打量着这两个人。

童小娣帮他们收拾东西：“对不起。”

范盈盈轻松地嘘口气，口气变得诙谐起来：“我和密斯特吕都是演戏的，请不要相信我们的话，说不定在你们面前演戏呢。”

童小娣笑笑，也用半开玩笑的口吻说：“假戏真做，真戏假做，毕竟都是戏，迟早都要卸妆的。请二位不要开工作以外的玩笑，影响我们执行任务。”

吕颂哈哈腰，说：“对不起。她总是这样，不拘小节。”

范盈盈提起箱子，挎起吕颂的胳膊要走，对童小娣点点头：“再见——”

严方锐灵机一动，伸出左脚轻轻一勾，把吕颂倚在检查台上的手杖碰倒了。没等吕颂自己去拾，严方锐早已哈下腰替他拣起来。他只觉得这根手杖出奇地沉重，他心里有了底，就一面奉还手杖，一面说：“我想同二位谈谈，可以吗？”

范盈盈望望丈夫，很不情愿地耸耸肩膀：“那好吧，但希望不要耽误我们太多的时间。”

严方锐把他们夫妻俩带到现场的一间不到 10 平方米的小房子里，请他们坐下，谈东扯西地同他们聊着天。无非是问问他们的职业，到大陆干什么。

范盈盈说：“我们是电影演员，我丈夫去年拍‘飞天女侠’时受了伤，这才有机会到处走走，观观光。”

墙上的红灯闪了三下。

这是只有严方锐才能看得懂的信号。原来这间房子的隔壁是一间安装着电脑探测仪器的监控室，只要这个屋子的旅客身上或箱子里夹带着走私物品，仪器都可以准确无误地显示出来。

方才的红色信号告诉严方锐，吕颂和范盈盈身上带有走私品，而且数量不小。

有了把握，严方锐才把童小娣叫进来，他不好单独对女人搜身的。

严方锐拿起桌上一个巴掌大小的方盒子，带着一根磁性天线，这是专门检测金属的仪器。他拿起吕颂的沉香木手杖，打开探测仪开关，一试，探测仪响起了滴滴的报警声。

吕颂和范盈盈吓得面面相觑。

严方锐说：“这里面有东西，是吧？我希望你们能自己说出来。”

吕颂的脸腾一下红了，他结巴了半晌，才说：“我们……错了，不该无视祖国海关的法律。”

他扭开手杖上部的金箍，原来手杖是两截，镂空的手杖里面装了二十几块手表。

接着，范盈盈从腰带上又拿出了十几块手表。她说：“再没有了。先生，高抬贵手，千万不要罚我们，我们这三流演员，被逼得没有活路了啊！”

童小娣给他们倒了两杯白开水，说：“你们能自己拿出来，还是好的。”

吕颂说：“去年我受伤后，影业公司老板把我一脚踢出摄影棚，光看医生就欠了人家两万港币。唉，丢脸啊，真是‘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啊！”

范盈盈说着说着哭起来：“表没收了也行，千万放我们回去，若能按期回去，还能得一笔钱看病……”

严方锐听她话中有话，就说：“怎样处理，主要取决于你们

是否说真话。我很想知道，你们回香港去，怎么能得到一笔款呢？

吕颂瞪了范盈盈一眼，似乎是埋怨她多嘴多舌。可是话已说出口，他只好实说：“其实，这次到大陆来，是受人之托。国泰果品公司上官老板求我们给大陆捎来一样东西，只要捎到，答应给两千港币。”

“国泰果品公司”几个字在严方锐脑海里就像一个雷管那样易爆。上官，不就是外号叫“梟老大”的走私集团的头子吗？真是无心插柳柳成阴，说不定从这两个电影演员身上可以抓到黑十字架的活动线索呢。

严方锐装得不太介意的样子随便问道：“捎什么东西，值这么大价钱？”

范盈盈说：“一张名片。”

“一张名片？”严方锐说，“可以给我看看吗？”

吕颂点点头，从手袋里拣出一张名片来，递到严方锐手里。

这是一张用铜版纸印的名片，很普通，中英文字写着吕颂的名字、住址、电话号码，看不出有什么特别。

严方锐问：“是上官老板替你印的？”

吕颂点点头。

严方锐把名片交给童小娣，使了个眼色。童小娣会意，走了出去。

吕颂有点惊慌。

严方锐说：“不要紧的，会完璧归赵的，不会使你们为难的。上官老板交给你们这张名片，没有嘱咐你们什么吗？”

范盈盈说：“嘱咐了，叫我们不准带一点走私品，不能露馅儿，事关重大。上官老板是吕颂的远房表舅，从前对我们冷得像冰霜，借一块港币都不行，这回不知怎么这么慷慨。”

那还用问吗？这张名片至关重要，也许就是黑十字架的行动

步骤。想到这里，严方锐兴奋得热血直往头上涌，他决定争取这两个演员。从他们的素质看，不像品质坏的人，是大有希望的。他决定请示关长后，送他们到医院去看病。

他好像找到了打开漆黑暗道的钥匙。

20 两大烟土吞在她胃里

傍晚，严方锐把复制出来的名片交给吕颂，打发走这对电影演员，同彭明光商议了一下，召集了一个紧急会议，破获走私集团特别小组全体成员都到了会。

严方锐拿出吕颂交出的那张名片，已经用显影药水涂过，露出几行写在名片天地头的密信，是粉红色字迹：

老 K：近日黑妹将回家探亲，请妥为接待。黄姨、白姐何日来港，望速告。泉。

严方锐让人们传看了名片以后，说：“黑妹显然是暗指鸦片烟土，黄姨、白姐无疑是黄金、白银代号。看来香港的‘泉老大’同大陆‘老 K’是挂钩的，我们要争取一网打尽。”

彭明光说：“今晚 8 点半，那两个演员要去送名片。他们并不知道老 K 的下落，老 K 可能是个隐藏得很深的家伙。他们搞走私采取的联络办法，几乎全是特务手段。公安局有人配合我们行动，我们要虚心向他们学习。”

接着，严方锐宣布了各自的任务。大家正要分头行动，桌角的电话响起来。

严方锐拿起电话，对方的声音大得很：“我是夏浦码头分关的老蒋，对。请严科长马上来海员医院，有紧急情况。”

严方锐放下电话，看了彭明光一眼。

彭明光略加沉思，说：“你按计划干你的去吧。我到海员医院去，晚上 10 点，到海关值班室来碰头。”

人们呼啦一声散了。

年轻的海关查私员徐晓林几乎是蹦跳着下楼的，兴奋得不行。要知道，这次能被选为破获黑十字架集团特别小组的成员，说明自己头上的“嫩帽子”已经摘去，是个名副其实的老海关了。是嘛，从集体户抽到海关，也快 3 年了，还说嫩？

徐晓林哼着电影流行歌曲，来到自行车棚推自行车。

小卖店的楚肖雄也在自行车棚里，不紧不慢地在给车轴上黄干油。

徐晓林叫了一声：“老楚，这么晚了不回家，在这修单车？”

楚肖雄紧了紧轴挡，用油污的麻布揩揩手，站起身来，笑道：“不是等你吗？”

“等我？”徐晓林眉开眼笑起来：“莫不是又搞到一瓶法国‘人头马’酒请我？”

“就认得酒！”楚肖雄从自行车后座上拿起一个报纸包，递给徐晓林，说：“拿去吧，一条‘三五’牌，一条总督牌。哎，可得交外币兑换券啊！我那卖店可是收外币的。”

徐晓林明知他开玩笑，就说：“用外币买烟，用得着求你？”

楚肖雄乐起来：“不过，你别大吵大嚷。你们老严够抠的了，海关没收的烟堆成山，干嘛都交给商业局处理呢？分给大家抽点嘛。”

徐晓林说：“那还行？那不是成了‘近水楼台先得月’了吗？”

楚肖雄推起自行车，说：“你们真够革命的了，不吃饭连轴转开大尾巴会，有什么好开的？”

徐晓林有几分神秘地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被吸收参加特别破案小组了！”

“我以为你当关长了呢！”楚肖雄不以为然地说，“你们天天查呀查、翻呀翻，哪天不在破案，有什么新鲜的！”

徐晓林用鼻子哼了一声，说：“这回可不一样，要对黑十字架集团下手了，还有大陆老 K，知道吗？老 K 这家伙是个相当狡猾的家伙……”

正说到这儿，又有几个人朝自行车棚走来，徐晓林忙打住话头，低声叮嘱：“千万别乱说呀。”

楚肖雄一笑：“我可不像你，狗肚子盛不下二两酥油。再说，同一条战线，目标还不是一致的？”

徐晓林把香烟夹在后座上，刚要走，童小娣追上来：“小徐，等等。到梅沙湾的班车走了，看来我又得坐你的‘二等’车了。”

徐晓林把香烟拿起来塞到童小娣怀里，说：“来吧。我这是高级单排座凤凰轿车，比大‘奔驰’还舒服呢。”

楚肖雄问：“你们不回市里？”

徐晓林不无得意地说：“哪像你们卖香烟那么自在？按点上下班，店闭人走。这不，梅沙湾又抓了一只走私船，我们去卸洋杂货。”

楚肖雄说：“这走私犯越来越嚣张，不打击怎么得了！我有个侄儿在西安一家手表厂，前几天他来信说，由于走私表充斥黑市场，他们厂的表卖不出去，连工资都是从银行贷的呢。”

楚肖雄骑上自行车先走了。

徐晓林点上一支香烟叼在嘴上，跨上车子对童小娣一歪头，说：“请吧，童小姐！”

童小娣跳上后座，说：“你呀，总没正经的，说起话来嘴上又没个把门的。你方才又同老楚说什么来着？是不是又在小广播？”

徐晓林蹬着车子说：“这有什么？老楚整天在海关卖货，他啥不知道？一个目标嘛！你忘了，上个月楚肖雄还检举了一个澳

门商人，他把非法带出口岸的玛瑙、玉石塞到石膏像底座里了？”

童小娣倒也说不出楚肖雄不好，可她仍然说：“即使有必要告诉楚肖雄，也只能由组织上打招呼。”

徐晓林吐掉烟头，说：“你和我一起进海关，人人都说你老练，果真不假。”

童小娣笑了：“我算什么老练？过奖了。你看人家薛文清大姐，那才叫老练呢。”

再说南屏海关关长彭明光赶到海员医院，夏浦码头分关关长蒋岐山把他直接带到外科手术室门前，早有一个护士等在那里，给彭明光披上一件白罩衣，轻轻为他推开房门。

彭明光换上拖鞋，走进凉浸浸的四壁砌着白色瓷砖的手术间。

无影灯熄掉了，手术床上躺着一个人，从头到脚盖在白被单里，周围站着几个医护人员，像在静静地等待什么。

手术室里静极了，只有顺着光滑的墙壁流下的去尘长流水单调地响着。

主持手术的医生脱去口罩，向彭明光点点头，示意要他到手术台前。

一个护士轻轻揭去白单子一角，露出一张女人铁青的面孔。眼睛紧闭着，嘴张得很大，人已经死了，却仍然留有痛苦不堪的影子。

“怎么回事？”彭明光掉头去问蒋岐山。

蒋岐山说：“这个女人叫郜凤芝，48岁，今天午后四点，乘香港水翼船来到大陆。下船时她已经晕倒，我们以为她得了急症，叫车送到医院。”

主治医生伸出手去，一个护士托过一个方盘。主治医生从方盘里提起一个牛肚状的薄膜袋子，里面装着黑乎乎的东西，像是沥青模样。

医生拿镊子拨了拨塑料口袋，露出一个铜钱大小的洞。他说：“这个女人什么病症都没有，是鸦片中毒死的。她把二十两烟土吞到胃里，看样子是准备到大陆后再呕吐出来的。意外的是塑料薄膜出现了破口，烟土渗出的毒液浸到胃粘膜组织液中，经过慢性渗透，丧了命。”

“有身份证吗？”彭明光问。

蒋岐山说：“身份证有。但是人已经死了，到哪儿去接头，交给谁，都无法查到。”

彭明光忽然想到两个电影演员的接头方法。会不会是同一个人接收呢？他本想试一试的，却又考虑到冒险性很大，弄不好会打草惊蛇，只好作罢。

扫垃圾的和拾垃圾的人

南国的春末夏初，已经是酷热难当了，白天气温高达30度。人们在工作一天以后，都喜欢夜里到倚山傍水的秀海公园来消热纳凉，常常深夜不归，这正是秀海公园游人如蚁的旺季。

8点钟刚过，严方锐和老婆柴云萍就领着7岁的小女儿彤彤早早地来到了海滨游泳场。严方锐今天换了一套便装，网篮里提着游泳衣，汽水和点心，完全像个悠哉悠哉的闲人。

一家人在海滨浴场里游逛了一阵，坐在七彩遮阳伞下喝汽水。

远远的，他看见关穆了。他也是一身便装，戴着一副太阳镜，手里提着一架两个喇叭的收录机，一边在海滩上闲逛，一边开着录音机，咿咿呀呀地放着流行歌曲。

严方锐和他打了个照面，见他走远，这才穿上衣服，对柴云萍说：“9点钟前后，你在公园门口等我，我还有点小事。”

柴云萍说：“我就知道你又是拿我当幌子！十多年来，你啥

时候像人家那样真心实意地陪我出来玩过？”

严方锐了解妻子，她虽然心直口快，却从不干涉自己的工作。所以每当她发牢骚的时候，他只是让步、再让步，理亏嘛，有什么办法？

见爸爸扔下她们要走，正在拍皮球的彤彤跑过来抱住他的大腿：“我也去，我跟你去看猴子！”

严方锐说：“彤彤听话。”

柴云萍说：“猴子都睡觉了。来，妈妈带你去逛花市。”

彤彤不干。严方锐想了想，觉得带孩子倒更不容易让人怀疑，就答应下来，叮嘱彤彤说：“你可得听话。”

彤彤又蹦又跳，高高兴兴地换上了连衣裙，抱着皮球跟上爸爸。

父女俩转过公园假山，看见关穆蹲在湖畔看小孩子们喂红鲤鱼。但关穆却一直在注意着一个拾垃圾的人。

拾垃圾的人是个不超过 30 岁的年轻人，穿戴不脏不破，很不相称地提一只破竹筐，走走停停，不时地把人们扔在地上的雪条纸、废报纸用三齿铁丝钩勾到筐里去，一副心不在焉的神态。

严方锐觉得奇怪，他故意走过关穆身边，关穆低低说了声：“不认识了？表弟！”

严方锐一点就透了，啊，他是指单根宝的表弟，在沙头角海关被罚过款的仇阿三。

严方锐领着女儿走开，他想到了上午关穆告诉他的情况。在海关提供了仇阿三的线索以后，骆峰很快就查到了仇阿三的下落：他单身一人住在秀海区一栋 5 层楼里，那是南方纺织厂的家属宿舍。因为仇阿三死去的父亲曾经是这家纱厂的老钳工，所以照顾仇阿三一间。仇阿三本来是按手续办了接班的，两个月前因为酗酒打伤了车间主任，还有在家设赌等违法的事，被工厂清了出来，从此到处鬼混。

派出所和居民委员会倒没有提供出仇阿三干坏事的证据。但他很反常，刚被工厂清除出来时，天天到市委“上访”，要求“落实政策”，近来却再也不去了。前半个月居委会办了个街道木工厂，想安排仇阿三进去，他死活不干，宁可在家闲逛。令人不解的是他一不偷、二不摸，花钱却像流水一样。这引起了公安派出所的注意，可也没有发现他干什么违法的事。最近有人发现他在拾垃圾，同废品收购站打上了交道。为此，邻居有人猜疑：他可能捡破烂儿捡到了宝贝，发了洋财。

那么，仇阿三与黄金抢劫案、黑十字架走私集团有没有关系呢？他为什么不去找工作，年轻轻的非要捡破烂儿过活呢？骆峰暂时还没有找到答案。

天渐渐黑下来，公园里灯火通明，尤其是花市那里更热闹，人声鼎沸。

严方锐带着彤彤一直向人迹罕至的芭蕉林里走去。在这条僻静的路上，只偶尔碰得上躲在树后喁喁私语的情人。

严方锐看见了吕颂和范盈盈挽臂走来，他们是8点20分准时在秀海公园出现的。

关穆也跟了上来，坐到竹丛旁的长椅上，半眯着眼听一曲奥斯卡金奖曲。

吕颂和范盈盈当然早已发现了严方锐。他们向前走了几步，买了两根雪条，慢慢剥去包装纸，正好走到一座塑像下，把雪条纸丢下，同时把那张名片不经意地丢在地上。

他们若无其事地向前走去。

严方锐看见一个清扫公园的中年妇女提着铁簸箕走过来，冲吕颂他们的背影嘟囔了一句：“没规矩！烂纸不丢在垃圾箱里，随地乱扔！”并顺手把两张雪条纸、一张名片扫到簸箕里去。

吕颂显然听到了女清扫工的抱怨，就掉过头来说了声：“对不起。”走掉了。

关穆站了起来，严方锐也牵着女儿的手尾随着女清扫工走去。

女清扫工左手提着垃圾撮子，右手拿一把扫帚，径直朝公园门口走去，头也不回，有几次路上的废纸都飞到她脚上，她都不理睬。

在公园门口，她站住了。

现在的时间是 8 点 35 分。

仇阿三在垃圾箱前翻捡破烂儿，却不时左顾右盼，好像他要捡的东西不在垃圾箱里。

女清扫工大模大样地走过去，斜了仇阿三一眼，斥责地说：“没出息！这么棒一个小伙子，干什么不挣一碗饭吃？跑这来翻垃圾！”

说罢，她像赌气似的将撮子里的垃圾全扣到仇阿三的破竹筐里了。

中年妇女一走，仇阿三伸手在竹筐里翻找起来。

严方锐灵机一动，夺过彤彤手里的花皮球一掷，不偏不斜，皮球正好落在仇阿三的垃圾筐里，砸得纸片子乱飞。

仇阿三恼怒得正要发作，严方锐早捅了彤彤一把，彤彤会意，一路喊着“我的球，我的球”，扑到垃圾筐前。在她伸手拿球的瞬间，正看见仇阿三将吕颂丢在地上的那张名片慌里慌张地掖在怀里。

一切都证实了！

清扫公园的中年妇女、仇阿三，这是联系香港黑十字架集团的“交通”。那么仇阿三要把这张名片转交给谁呢？会直接交给老 K 吗？

跟踪，必须再跟下去。

仇阿三得了名片，把垃圾筐丢在公园售票房门后，拍拍身上的尘土，挤出公园，跳上一辆开往北郊的 28 路公共汽车，走了。

关穆同严方锐在门口碰了头，同时跳上等在那里的一辆北京牌吉普车。

彤彤只好委屈地同妈妈一道回家去。

吉普车很快追上了尾号为“088”的28路公共汽车，却无意超它，只是跟着。

公共汽车里的乘客越来越少，看得清仇阿三坐在最后面的五人座上，高高地翘起二郎腿，很得意的神态。

仇阿三一直坐到终点站新侨村才跳下来。他警惕地四下望了望，才向居民大楼走去。

他穿过几个居民大院，来到369号住宅门前，伸手摁响门铃。

关穆坐在吉普车里大吃一惊！

369号，这不是南苑县银行黄金收购员戚宾如家吗？他的伤不重，昨天刚由市立医院接回家里休养。

想不到，黑十字架竟插到了他的门前，怪不得发生了黄金大抢案，原来他是内应！

门铃响了一阵，从米黄色小楼里走出一位中年妇女，没有开门，问道：“谁呀？”

站在门外的仇阿三说：“是我。”他递上了那张名片，“给老戚的。”

女人拿了名片返身要走。

仇阿三叫住了她：“怎么，也不放我进去喝杯咖啡？”

还没等女人答话，拄着一根拐杖的戚宾如出现了，他把一沓钱塞到仇阿三手中：“现在不方便，嘿嘿，你去自己喝吧……”

仇阿三掖起钱，打着口哨离开了。

严方锐在车里问关穆：“要不要动他？”

关穆说：“回去研究一下。有了臭水塘，不怕没有猪来打溺！过早动了，没有好处，况且戚宾如又不一定是老K。”

严方锐说：“彭关长 10 点等我们呢。”
他们掉转车头，一阵风般驶向市区。

给他一个定心丸

关穆和严方锐回到海关，彭明光正在办公室里等着他们，公安局桂局长也在。几个人汇总了几方面的情况，不但没有决定马上动戚宾如，反而要进一步稳住他。很明显，戚宾如是泄露向市银行送黄金时间的人，或者说，他就是抢劫犯的内线、同谋者。不过施行苦肉计把视线往会计马会德身上转就是了。

这对破案是个不小的进展，香港黑十字架集团和大陆老 K 走私集团两条线都拴到了戚宾如身上。他是个很关键的角色。

公安局桂局长在全面分析了案情后，补充说：“咱们的估计没有错。南苑县银行的马会德找到了。”

“在哪儿？活的还是——”这情况关穆还不知道。

桂局长说：“死了，人被埋在公路边的树林里，土坑上面覆盖了草皮子，可见完全是预谋的，有意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到马会德身上去，叫我们怀疑是马会德作案，然后携带大批金银潜逃。”

接着桂局长介绍了发现马会德尸体的经过。这几天天气晴朗，太阳一晒，埋人的地方，松土下沉，竟然露出了死人的一只脚，被一个割橡胶的女工发现，报告了公安局。

根据严方锐的建议，他们决定给戚宾如一个定心丸吃，让他产生错觉、麻痹起来，放长线钓大鱼。

第二天上午，关穆约了市银行行长李旭同彭明光、严方锐一行四人，坐上一辆上海牌轿车，来到新侨村 369 号门前。

李旭第一个走下车去按门铃。半晌，戚宾如的女人才从甬道深处慢吞吞地走出来，从栅栏缝隙望出去，见有几个人都提着水

果、罐头和点心站在那里，就问道：“各位……是找哪一个呀？”

李旭说：“你不认识我了吗？我是市银行李旭呀！我们是来探望老戚的呀。”

那女人认出他来，赶紧开门：“哟，是李行长啊！叫您惦念着。唉，幸亏枪子儿长眼睛，若是再偏一点，我们家老戚就没命了。唉，知人知面不知心，谁能想到马会德那个小王八羔子，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来！你们可得撒下天罗地网，把强盗抓住呀！”

李旭一边随她往院里走，一边说：“你放心吧，干坏事的迟早要、要受到制、制裁的。”

关穆不禁望了严方锐一眼，他的话不是生生坐定了马会德的罪名吗？

戚宾如拄着单拐，早在会客厅门前迎候客人了。他一迭声地说：“唉呀，谢谢，谢谢，你们工作这么忙，还劳驾来看我。”

彭明光说：“你是同坏人搏斗的英雄嘛。”

“哪里，哪里，”戚宾如一边给他们让坐，一边让老婆去烧水。

来人当中，戚宾如只认得银行行长李旭和公安局的处长关穆。

李旭指着彭明光说：“来，介绍一下，这位是省银行的老李同志。”又指了指严方锐，“这位是市委的老王同志。”

戚宾如同彭明光、严方锐热情地拉拉手，把他们让到长沙发上。

彭明光说：“这几天工作忙些，来迟了。”

严方锐接上话碴儿：“市委领导过几天还要来看望你的。”

戚宾如换着手杖，说：“惭愧，惭愧，我只是做了一点每个国家干部都应当做的事情。”

严方锐一直在打量这间客厅。很宽敞，至少有 45 米，够排

场的了。屋中的陈设也是标准的现代化，电视机是 29 英寸彩色的，收录机是声宝三五牌的，电冰箱、电铝壶，都是国外高档商品。

李旭说：“你安心养伤。常委已经请示市委，决定在最近召开一次表、表彰大会，你、你得写一份发、发言稿呢。”

戚宾如搓着手谦虚地连连摇头：“不行。我比起牺牲的司机小刘，还有那位民警同志差远了。唉，我只有一个心愿，若能把抢劫犯逮捕归案，我就心满意足了。这伙强盗光天化日之下抢劫国库黄金，这还得了！”

他比他老婆要油滑得多，没有开门见山地点出马会德的名字。

关穆趁机问道：“有些细节，我们正想找你了解。那天汽车是怎么坏的？”

“这事蹊跷啊！”戚宾如扬起头像是在努力回忆，“本来小刘的车子是好的，刚从外贸公司买来两个月，从来没出过故障。等到 5 点钟我们要装车时，司机突然发现油路不通，又打不着火，现拆开发动机检修。”

严方锐问：“有什么人可疑吗？”

戚宾如说：“向市行金库上交黄金的事，只有我和马会德知道详情。”

说到这里，他停住了，似在思索。其实，他是把思考留给了别人。你想，只有两个人知道底细，那怀疑对象不是再清楚不过了吗？

关穆问道：“据你了解，马会德表现得怎么样？平时有没有什么劣迹？”

“不好说。”戚宾如字斟句酌地说，“他刚从财贸学校毕业不久，工作倒还认真。年轻人咱摸不准，常来常往的人倒不少。”

戚宾如突然发现所有人的眼光都冲着自己，他觉得言多语

失，就一反被动为主动地反问了一句：“怎么，破案的线索一点没有吗？”

彭明光做出胸有成竹的一笑。

关穆说：“马会德的潜逃还不说明问题吗？我们已经发了内部通报，一定要把马会德捉拿归案。”

戚宾如脸部的肌肉放松了，他叹口气说：“人哪，往往都是事后诸葛亮，当时我若是心细一点，也不会出事了。马会德一上车就看表，眼睛一直盯着车外，好像有心事。现在想来，那是生怕他的同伙不来劫车。对了，枪一响，他第一个钻到车座底下去了。”

关穆说：“你提供的材料很重要。我们已经找到了马会德留在湿地上的靴子印，你放心，会抓到的。”

这时戚宾如的女人端着茶盘进来，上面放了五个盖碗，客气地说：“喝点茶。是青茶尖子，刚上市的。”

彭明光喝了两口茶，最先站起来：“我们得回去了。”

大家也都站起来。

戚宾如把点心、罐头拿起来：“这个……我说什么也不能要……”

严方锐说：“这是组织上的一点心意嘛！”

李旭说：“你、你甭客气，只、只管留下。我可警告你，千万把、把发言稿写、写好，说不定哪天就要用的。”

“真是强人所难啊！”戚宾如拿手杖敲着地板说，“你还不解，我像个锯了嘴的葫芦，就怕讲话呢。”

他高高兴兴地送走了客人。

他心里的石头是不是落了地呢？看样子他是被稳住了。

没家贼引不来外鬼

夕阳西下，出入境的旅客班车都过去了，这是海关最安静的时刻。

海关钟楼的钟声正在打点，像音乐似的那样好听，打了6下。

海关关员们下班了，陆续乘班车、骑自行车离开了海关大院。

斜阳照到海关大楼墙角下，石台阶上坐着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正在修理一把扫帚。那把扫帚已经散了，老头用热水泡了一些竹篾，用牙咬着把扫帚把儿一道道扎起来。

所有出入海关大楼的人都亲热地同他打招呼，称他为郑阿公。

郑阿公本名叫郑来福，去年就满60岁了。他从一建南屏关那天起，就进了海关，称得上三朝元老。他干过仓库保管员，干过行李检秤员，退休前是海关办公室的勤杂工。

郑来福没儿没女，孤身一人，向来以海关为家，他一年到头说的话，抵不上一常人一天的话多，不管你说什么，他只是一笑，或者简单地答个“是”或“不是”，小青年都说他说话比打电报还要节约。

郑来福干什么像什么，是老黄牛式的人物，除了“文化大革命”的岁月，凡是评劳模、选先进工作者，他是阵阵不落的。从关长到搬运工人，没有一个人不尊重他，每逢年节，他便被大家拉去吃百家饭，同关上的人感情极为融洽。

正因为这样，人们都不希望他退休。他身体满结实，60岁的人了，还能举起百十斤重的杠铃。据他自己说，早年他拜过师傅，学过武术呢。

不过，按照文件规定，他还是退休了，让出位置好安排待业

青年。而他，照旧天天到关上来，什么活都插手。没办法，彭明光给他工资补差，让他去烧开水。

他一烧起开水来，关上的人就享福了。一天 24 小时开水壶哗哗叫，水什么时候都是开的。

这会儿他扎好扫帚，正要起身回到开水房旁边他的小屋子去。徐晓林噤噤地从楼里跑出来，手里拿了个干面包，边走边啃。

郑来福笑着指指他：“瞧你，吃饭也不正经吃。”

徐晓林说：“回家也没热饭吃了。郑阿公，我不回去了，你那儿有酒没有？咱爷俩喝二两，我到食堂去买点酱牛肉、猪肝。”

郑来福摆摆手：“去去去！我那儿没有酒给你喝。”

徐晓林跑到自行车棚去推车子，发现车后座上夹着一张字条。

徐晓林打开字条，只见上面写着：晓林，我弄了一瓶古井贡酒，你高兴就来喝两杯。

没有落款。还用落款吗？一下子就认出来了，那是楚肖雄的字。

徐晓林把吃剩的半个面包朝车货架子上一夹，跨上车子，乐颠颠地冲出大门，直奔楚肖雄家去了。

他和楚肖雄并不是在海关相识的，是 5 年前在秀海公园小酒馆认识的。那时徐晓林在农村插队，队里一个劳动日不过几分钱，干一年连口粮都领不回来。于是徐晓林私自跑回城里，卖点烟丝、水果赚点小钱。他手很巧，后来干脆用竹节做“竹蛇”卖。那竹蛇做得活灵活现，扯着尾巴，能左盘右转，又怕人又惹人笑，一毛钱一个，居然生意兴隆。

赚了钱，他就下酒馆。有一次喝醉了酒，同市场管理所找他来补税的人吵了起来，摔了盘子砸了碗，闹得不可开交。当时楚肖雄正和一个什么客人在这家酒馆吃饭，楚肖雄出来拉架，还替

徐晓林赔了餐具钱，然后把醉醺醺的徐晓林拉走了。

他们很快混熟了。那时楚肖雄还不在于海关卖货，他在市里一家玉器店工作。他答应帮徐晓林的忙，把他尽快从乡下抽上来。他真有本事，仅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这事就落实了，徐晓林穿上了海关关员的制服。

其实，徐晓林除了爱喝酒、喝了酒就胡说的毛病而外，你倒也挑不出别的，工作起来还是能吃得了辛苦的。楚肖雄家底挺富，又愿意喝两杯，就常常拉徐晓林到他家去对酌。为这事，楚肖雄的老婆很不高兴，他们一端起酒杯，她就躲出去，他们乐得耳根清静。

楚肖雄住在北纬头道街，房子是旧式带骑楼的，又临街道，吵得很，他是那种不显富的人，屋子里也没有什么现代化的陈设，书架里倒是摆了好多泥的、陶的、瓷的、玉的古董。徐晓林觉得这些破瓶子烂罐子大煞风景，楚肖雄却说这都是价值连城的瑰宝。

今天，楚肖雄比往常预备得丰盛些，除了几筒罐头而外，还炒了几碟青菜，果然有一瓶古井贡酒摆在桌上。

徐晓林一进屋，楚肖雄就说：“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那可该着我独享！”

徐晓林洗了手，帮他剥蒜：“不来？我是闻着酒味就上的。”

楚肖雄边在蒜缸里捣蒜，边问道：“又开会了？破案有眉目了吧？”

“哪那么简单？”徐晓林似乎不大愿意谈这个话题，坐到桌前，操起筷子夹了一块午餐肉放到口中，说：“过几天，我过生日，请你到北国酒店去吃龙虎斗。”

楚肖雄坐过来斟酒：“算了吧！你一个月挣的钱，还不够吃一顿龙虎斗的呢，别打肿脸充胖子了。”

徐晓林喝酒从来不用人劝，不一会儿就喝干了四五杯。

酒劲上来，他敞开怀，说：“你别看不起我，只要破了黑十字架集团，就能拿到一笔奖金，别说吃一顿龙虎斗，就是吃龙凤斗也吃不了啊！”

楚肖雄接着他的话碴儿说：“你这笔奖金怕不易得。黑十字架集团远在香港，就怕有劲使不上啊！你们连眼皮底下发生的黄金抢劫案都破不了呢！”

“破不了？你等着瞧吧！”徐晓林把筷子重重地一撂，一只脚踩在凳子上，眉飞色舞地说：“鸟飞还有个影呢，800两黄金，3000块银洋，这么大案子还能叫它逍遥法外？”

“是啊，”楚肖雄说，“没家贼引不来外鬼，银行内部肯定有人通风报信，不然强盗怎么那样准确地知道汽车行动时间？”

“群众怎么猜测的？”徐晓林有几分神秘地问道，“你说说看，智力测验。”

楚肖雄说：“这可不能乱猜。”

徐晓林说：“假正经。又不要你负法律责任，在家里随便说说嘛。”

楚肖雄剔着牙，说：“反正大家都猜疑那个失踪的会计。我看，人家早携带黄金逃到国外去了。”

徐晓林哈哈大笑起来：“浅薄！这正好中了敌人的声东击西之计。”

楚肖雄大吃一惊：“这么说，不是那个姓马的会计？”

“复杂呀！”徐晓林还没有全醉，说话尽量留有余地，“斗争真是复杂啊！喊捉贼的可能正是贼。你怎么知道马会德是失踪、是逃亡？不会有别的结果吗？”

楚肖雄又给徐晓林斟了一杯酒，说：“看来真是复杂呀！既然不是马会计，就只能那个姓戚的，反正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送库时间。”

徐晓林笑而不答，但给人的感觉，那笑是默认。

徐晓林吃着菜，说：“你可不能乱说，我什么都没同你说。万一传出去，打草惊蛇，放长线钓大鱼的全盘计划就都吹了。”

“我吃饱饭没事干了？”楚肖雄一仰脖喝干了一杯酒，“哪说哪了，我的嘴比你严得多。”

徐晓林的解释，恰恰证实了楚肖雄的猜测。

徐晓林毕竟还是太嫩啊！

黑十字架魔影

一辆三排座高级奔驰牌轿车夹杂在汽车洪流里，缓缓地行驶在危楼夹峙的香港皇后大道上。

香港之夜，给人一种扑朔迷离的感觉。地面的灯火远比天上的繁星要密集，天体是暗的，光怪陆离的霓虹灯反射到暗蓝的天幕上，使人看上去不像黑夜。映入眼帘的是目不暇接的夜总会、酒吧间，巨幅电影广告上画着女明星几乎全裸的广告画，大字标出“七彩、香艳、肉感、现代性解放新女性”等字样。

五彩斑斓的光影掠过奔驰牌轿车挂着茶色乔其纱的车窗，在座客脸上涂出迅速变幻的色块。

车上有两个人，一个胖得叫人发愁，没有穿外衣，吊裤带几乎吊不住将近四英尺的裤腰，肚子几乎顶到司机后座上。他有着一副油光发亮的脸孔，由于脂肪沉积太厚，有三层下颏，眼睛都被挤成了两条细缝。他就是香港国泰果品公司的总经理上官求。他是包揽大陆各种干鲜水果的大经纪人，从南方的柑桔、菠萝、荔枝、龙眼、芒果、柚子，一直到北方的苹果、山楂、大枣、黄梨，以及北京的果脯，他没有一样不经营的。他几乎年年广交会都到广州，春秋两次，从不间断。

你很难抓到上官求有什么违法的事情。但是海关却从好多渠道得到证实，上官求当面是人，背后是鬼，他同香港黑社会势力

结为一体，经营着一个庞大的走私集团，大量向大陆走私贩运手表、收录机和各种洋杂货，牟取暴利。特别是近一年来，上官求同国际上的毒品走私集团挂上钩，利用香港是世界四大无税港之一的便利，从泰国、缅甸偷运鸦片到香港，通过黑社会的流氓恶棍们出手。港方当局虽对他的事情有耳闻，一来抓不到他的真凭实据，二来他有能力花巨款打点行贿，竟然太平平。

他旁边的那个人，四十五六岁，大眼睛，浓眉毛，高鼻梁。如果只看五官的局部，都不失为漂亮，但比例失调，显出一种凶相。这个人叫冯翼三，挂着副经理的名儿，实际他对水果行一窍不通，也从来不到商店去，是专门给上官求经营走私的助手。

汽车转过帝国大酒店，来到星星夜总会门前，离很远就听得到迪斯科音乐疯狂般的旋律传出来。

车子慢慢停住。

冯翼三说：“上官经理，进去喝两杯威士忌吧，加点苏打。”

上官求伸手松了松领带，疲倦地说：“累了，不如回去。”

冯翼三知道他的心情不好。方才在皇后酒店同一个韩国人接头，得知最近从北非启运的货船被国际反毒品委员会扣住，将近10吨的大麻和两三吨鸦片全毁了。这里面有他上官求的股分呢！

他怎么能不犯愁呢？在他手里，目前还存有两千多斤烟土，打算全部运进大陆的，因为海关查得紧，很难成批带过去。重赏之下有勇夫，他倒是出高价雇用了一批马仔，携带鸦片去大陆，十之八九被破获了。没有这批烟土，他很难换到黄金，从前靠洋杂货，大陆海关一紧，连洋杂货也不容易进了。

为了给上官求解闷，冯翼三才百般劝他到星星夜总会来玩上一玩。

见上官求无心下车，冯翼三又说：“听说星星夜总会新雇用一港姐，嗓子压倒张小英、邓丽君，又十分标致，是在翡翠电视台干过的。”

上官求勉强鼓起兴头，移动着肥胖的身体，钻出了汽车。

疯狂的世界，疯狂的人！

杂乱无章的、类似非洲人最原始的打击乐的音乐声中，几个舞女正在表演脱衣舞，到处是喧嚣、吵嚷，到处是冒着沫子的黑啤酒……

上官求是夜总会的上宾，他一到来，老板亲自出迎，侍女们雁翅般排列两厢，一迭声说着：“谢谢上官老板光顾”。她们都明白，只要这个有钱的大亨高兴，她们都有油水可捞。

但今天上官求一个侍女都不要，在一间雅室一落座，就问老板：“那个新来的歌女呢？叫什么？”

老板说：“叫曲新枝。可惜她光唱不陪客，方才出去了。”

上官求一肚子不高兴。

老板说：“这样好不好？我挑两个标致的歌女来陪您喝两杯。”

“不要，一个都不要。”上官求挥了挥肥厚的手，“让我安静一会儿。”

老板只得告退。冯翼三跟出来：“总经理心绪不佳。来点对苏打的威士忌，要法国陈酿的。”

老板答应一声，下楼去了。

上官求皱着眉孤坐了一会儿，突然说：“准备货，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把洋杂货都装上船，黑妹也上船，看准机会运过去！”

冯翼三说：“您气糊涂了吧？现在大陆缉私艇日夜在海面巡逻，那不是拿肉包子打狗吗？”

上官求火了：“依你怎么办？大陆老 K 手里的黄金，我们不要了？”

冯翼三说：“从长计议。等那两个电影演员回来，有了消息就好办了。咱同老 K 打交道不是一天两天了，那家伙鬼点子多

得很。”

“哼！”上官求说，“老 K 的骗术也够高明的了。去年他运过来的黄金，十成有九成不够等级。”

冯翼三说：“咱们运过去半船塑料机芯，没钻石的表，不是以牙还牙，捞回来了吗？为这事，老 K 还骂不绝口呢。他这次的黄金迟迟不出手，一来不好运过来，二来他声称非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可。”

“不行。”上官求说，“他得先拿黄金样子来。”

冯翼三说：“那好办。老 K 说他手里的黄金全是九成九的，据我访察，他们干了一起抢案，大陆报纸都报了。”

“我不管他是抢的、偷的，”上官求说，“只要是黄金就行。他有本事，把大陆银行的金库给我端来，我才高兴呢！”

正说到这里，一个侍女在外面说：“上官经理，有您的电话。”

上官求放下酒杯，来到电话间。

电话是家里打来的，看样子事关重大，他老婆叫他马上赶回去。

上官求对冯翼三说：“走，马上回去！”

上官求的别墅建在风光秀丽的铜锣湾，面向大海，是一幢乳白色中西合璧式的建筑。大屋顶和绿琉璃瓦是标准的中国古典风格，阳台、柱廊和内部格局却又是西式的。

上官求一进客厅，他老婆马上送过来一张名片，已经用显影药水显过，卡片上出现几行字迹：

黄姨身体尚好。无奈婆婆病危，医生说是绝症，弄不好会使黄姨受传染。另，近日正值台风登陆之时，黄姨、白姐断断不敢出门，还望能提供舟车之便。K。

上官求看着看着，额角渗出冷汗，无力地把名片递给冯翼三。

这是上官求一看便懂的暗语。

所谓“黄姨身体尚好”，是指黄金还在老 K 手中；“婆婆”是指老 K 集团的架桥人物戚宾如；“台风”，无疑是说大陆海关和公安局追查正紧。那么，“婆婆病危”，不就是说戚宾如有暴露的危险吗？只要他一被捕，黄金就可能被发现，这不成了恶性传染了吗？

上官求又添新愁。

他同大陆老 K 搞黑交易，要的是黄金、白银或者麝香、珍珠。人民币对他来说是没有用的。倘若老 K 手里号称两千两黄金一注大财落了空，不也等于上官求蚀了本吗？

冯翼三也紧张起来：“戚宾如这个笨蛋，老 K 还说他快成为英雄了呢。”

上官求忧心忡忡地说：“得帮老 K 一把，万一老 K 倒了霉，不但咱们即将到手的黄金没了，将来同谁搭桥？黑十字架也就起火了。”

冯翼三燃着打火机，烧掉名片，说：“最妥贴的办法是尽快把黄姨弄到手。”

“谈何容易！”上官求说，“即或没有太大风险，老 K 那个狐狸精也断不肯先交黄姨、白姐的。”

“那，怎样帮他一把呢？”

上官求想了一阵子，说：“你给老 K 的助手挂个电话，不好。去拍明码电报，派人去来不及了。”

“到电报局去拍明码电报？”冯翼三以为他在说胡话。

上官求说：“我会叫别人看不出破绽的。好了，你找纸笔，我拟电稿，你记。”

冯翼三只得铺上一张纸，拿起笔来。

上官求在屋子里踱着步，双手插在吊带裤的空隙间，念道：“既然黄姨有可能被婆婆传染，须及早实行彻底隔离。近日台风骤起，海路欠安，拟使黑妹改期，改乘陆车，详期另告。”

冯翼三写完，问道：“这就去拍吗？”

上官求说：“去吧。”

冯翼三走到门口，又被他叫了回来。上官求说：“你再加两句，台风不足畏，借借东风，改改向就好行船。”

冯翼三眨着眼：“这是什么意思？”

上官求说：“老 K 一看就懂的。海关威胁最大的当然是老 K。既然海关已经摸到了戚宾如的门口，离老 K 的门槛儿就不远了。为什么不能挑唆他们内乱，来个鱼目混珠呢？”

冯翼三说：“好是好，就怕共产党不会轻易上这个当，他们精着呢！再说，即使他们一时糊涂，干掉了姓严的那个把门虎，新换上的查私科长也不会比严方锐手软！”

“权宜之策！”上官求说，“先保老 K 混过这一关，借乱浑水摸鱼，把黑妹送过去，把黄姨嫁过来再说。”

冯翼三点了点头：“也只好这么闯一下试试。”

冯翼三走后，上官求把老婆叫出来，问道：“方才那张密写名片，是哪个捎过来的？”

他老婆说：“吕颂和范盈盈。”

上官求眼一亮：“没想到，这种人倒安全。是啊，共产党对这些演员还是客气的。”

他老婆问：“你还有意用他们？”

“利用而已。”上官求说，“给他们点小便宜，让他们稀里糊涂为我当交通。只是，黑幕后头的事，要纹丝不露，他们只能用，是不能拉过来入伙的。”

他老婆“啊啊”地虚应着，连着打了几个哈欠。

一步来迟，戚宾如被杀

既然戚宾如是作为钓饵放在那里诱捕老 K 的，不用说，戚宾如是被当作一级监护对象对待的。

但是，自从昨天晚上吕颂和范盈盈把从公园妇女手中拿到的名片交到公安局复制以后，关穆紧张起来。

他连夜找到了严方锐，把吕颂准备捎给上官求的密写信拿给严方锐看。

他指着上面晦涩的文字说：“婆婆病危，是指谁？我觉得像是指戚宾如。你看，黄姨怕传染，是不是说黄金抢劫案有暴露的危险呢？”

严方锐拿在手里反复琢磨了半天，觉得关穆的分析很有道理。不过他也提出了质疑：“假使是这样，老 K 为什么要告诉香港的‘枭老大’？莫非‘枭老大’是同时指挥大陆老 K 的吗？”

“这暂时还不能解释。”关穆说，“我主张，马上找个借口，让戚宾如住疗养院，把他暂时孤立起来，我担心敌人有杀人灭口的可能。”

“可是，”严方锐对公安业务毕竟不那么内行，他只是从破获走私案考虑的，“那戚宾如就失去了钓饵的作用。我以为你神经过敏了。假使老 K 要干掉戚宾如，早下手了，用不到请示上官求。何况，这封请示的信还是通过戚宾如手交出去的。”

不能说严方锐的分析一点道理没有。关穆犹豫了一下，决定采取措施，布置居委会的治保主任严密监视戚宾如，同时打算明天早晨把这件事提交公安局党组讨论。

有谁能想到，他们一时的疏忽却成全了老 K 呢？

半夜时分，有一个穿风雨衣的人，骑着自行车来到新桥村 369 号门前。

这个人没有贸然去叩门，躲在暗影里吸了一支烟，看看确实没有可疑的征候，他才走了过去，轻轻地摁了几下门铃。

过了好一会儿，楼下的灯才亮。戚宾如披着一件外衣，穿着拖鞋睡意朦胧地走来开门。

当他走到院门前时，清虚的月光正好照到来人脸上，他大吃了一惊，打了个踉跄，惊慌地四顾，低声问道：“你、你怎么到这儿来了？莫非老 K 那里，出了什么事吗？”

穿风雨衣的人双手插在衣口袋里，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是老 K 叫我来的。”说时迟，那时快，他从口袋里拔出戴手套的右手，手起枪响，一颗子弹从戚宾如的左太阳穴打进去。

戚宾如叫都没来得及叫一声，像根朽木桩子，扑通一声扑翻在一丛龙竹下。

穿风雨衣的人掀起衣领，不慌不忙地骑上自行车，消失在树影重重的小街深处。

清晨，关穆带着骆峰从出事现场回来，赶到严方锐家，柴云萍说他昨夜在关上值班，根本没有回来。

他们又赶到海关，关员们刚刚陆陆续续上班来。

海关值班室在一楼，门关得紧紧的，关穆敲了半晌，不见有人开门。

郑来福提着开水壶正给各个办公室的暖水瓶灌水。除了机要室外，郑来福能开所有的门。他对关穆说：“小严大概太累了。平时，他不到 5 点就起床了，这会儿早在阳台上念完英文了。”

关穆有点疑惑，就问郑来福：“你能打开值班室的门吗？”

郑来福掏出一大串钥匙，摸到一把，向锁孔一插，门轻轻开了！

该死！严方锐还在蒙头大睡！

关穆和骆峰走到他的床边，见床头几上搭着他的衣服，放着半杯剩开水。

关穆摇了摇严方锐，他的眼皮无力地欠了欠缝，又闭上了。

“真是大觉迷。喂！火上房了，还睡呀？”关穆继续摇他，只是叫不醒。

骆峰突然看见从严方锐枕头底下露出一角红绸子，伸手一掏，是一支“五四”式手枪。这是一支新枪，亮面上的烧蓝一点都没褪，锃亮照人。

公安局是有登记的，骆峰知道，为了工作需要，这支枪发到严方锐手里还不到 20 天。

骆峰完全出于喜好枪的癖好，打开绸布，在手里把玩了一下。

咦，什么味道？火药味！

莫非这支枪用过？而且时间很近？

这使骆峰紧张起来。他把枪口凑到鼻孔底下嗅了嗅，火药味很浓，他咔嚓一声退下梭子，里面刚好少了一颗子弹。

关穆数了一遍托在他掌心的子弹数目，心里顿时一惊，接过手枪也闻了闻。

他们一句话都没有交流，但想法肯定是碰到一起了。这支枪可能就是在新侨村 369 号门前作案的凶器！

经过尸检，法医已经提出证明，射穿戚宾如颅骨的是“五四”式手枪子弹。子弹头在后脑壳枕骨缝间，已经取出来。

是巧合吗？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

关穆本来对戚宾如的死就感到十分恼火。他后悔昨天晚上没有坚持己见，恰恰是严方锐再三提出反对意见。

难道他是为了争得干掉戚宾如的时间吗？那就是说，他是戚宾如的上级，即或不是老 K，也是相当接近老 K 的角色。

多么可怕的设想！

不，不可能！怎么能胡乱猜疑同自己朝夕相处的同志呢？可是又怎样解释呢？从前电影里不是有好多这样离奇的情节吗？领

导破案的人，正是作案的元凶！

啊，不堪想像！

关穆心里一有了这个猜想，不禁用另一种眼光侦察起这间不到 10 平方米的小屋子来。这也是职业病！

骆峰早就在各处巡视了，他从壁橱里拉出一双鞋来。是长征牌胶鞋，很新，鞋底花纹上印有少许泥土。

关穆的心几乎停跳了！

这鞋印同现场作案人留下的太相像了。他一方面叫骆峰赶快把手枪、胶鞋拿回局里化验，一方面给公安局桂局长和海关彭关长打了电话。

意外而又意外！

查私科长是走私犯吗？

这是个大问号，耸人听闻的消息。

见鬼！严方锐一直睡到上午 9 点还没有醒来。如此反常！

这期间，桂局长来过，彭关长来过。拿去化验的枪支、胶鞋又送回了值班室原处。

一切都证实了关穆和骆峰的判断并非神经过敏。化验结果表明：严方锐的“五四”式手枪是杀人凶器，从戚宾如头骨里取出来的子弹是从这支枪的枪管里射出去的；印在 369 号住宅门前的鞋印，也是严方锐的长征牌胶鞋。

骆峰情绪激动，已经在用怀疑的目光看着彭明光。他甚至胡思乱想起来：你这个关长若就是老 K，那才滑天下之大稽呢！

关穆毕竟老成得多，他提问题多，肯定的话一句没有。他当然不会排除敌人使用反间计的手段，但他的倾向性意见还是在话里话外表达出来了。

桂局长始终背着手在屋里沉思，一句话没有说过。末了，他

拿走了放在床头几上的半杯剩水。

彭明光是有口难申诉，他本想挺起胸脯给严方锐打包票的，可又觉得为时过早。只要公安局方面不正面提出问题，他有意保持缄默。

人陆续走开，彭明光按照桂局长的意思，把薛文清叫来，吩咐她守候在值班室屋子里，只要严方锐一醒，立刻打电话叫他。

薛文清是一点内情都不知道的人，她还以为严方锐犯了病呢。严方锐有低血压的病症，前年在夏浦码头检查外轮货舱时，他就昏倒过一次，住了7天院呢。

忽然，童小娣和徐晓林慌慌张张推门进来。

童小娣问：“看见严科长了吗？”

薛文清朝床上努了努嘴，轻声说：“彭关长叫我守在这儿，看样子严科长又犯病了。怎么，找他有事吗？”

徐晓林说：“方才铝合金厂打来电话，叫严科长赶快回家呢。他爱人昨天夜班，铸件砸伤了脚。”

薛文清为难起来，想了想说：“这样吧，你们俩到彭关长那告诉一声，先代表关里到严科长家去看看。等他醒了再回去。哎，千万别当他爱人乱说呀！”

童小娣答应一声，同徐晓林走了出去。

柴云萍并没有住院。

经过X光照相，脚骨没有伤，只是扭伤筋了。大夫给她开了休息一个月的诊断书；同车间的工人雇了一辆三轮车，把柴云萍送回家来。

创口火烧火燎般疼得钻心，开着电风扇，汗水还是直往下流。

彤彤从外面跑进来，手里提着一个挺漂亮的桔红色的提兜，一进门就喊：“一个叔叔捎来的，说是给爸爸的。”

柴云萍接过提兜，觉得很沉重，她疑惑地把东西掏出来，一

下子傻了！天哪，这是怎么回事？竟是各式各样手表，有四五十块！

她发了一阵愣，发现里面还夹着一张字条，打开看时，只见上面写着：速将样品转交老 K。婆婆既已隔离，可通过第一套办法同公司联系。

柴云萍怎么也琢磨不透这字条上写的是什么鬼话。她不禁自言自语地说：“老 K？什么老 K？”

彤彤说：“老 K 都不知道？老 K 能管老 Q 呗！”

“小孩子不兴乱说！”柴云萍心急如火，首先想到这可能是有人栽赃陷害，往丈夫头上扣屎盆子。干查私科长，那是惹人恨怨的差使，从前丈夫就接到过匿名信件，就说“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嘛，今天又来了这一手！

柴云萍刚要让彤彤到海关去叫爸爸马上回家来，门开了，童小娣、徐晓林，还有一个没见过的人走了进来。

童小娣说：“嫂子，伤得重吗？”

“不重，没有伤着骨头。”柴云萍一边收拾堆在床上的表，一边掩饰地笑笑，请客人坐。

但是那堆亮晃晃的手表早被进来的人看见了。

柴云萍没有掩藏的意思，但也不希望别人看见，事情没有弄个水落石出，万一叫人讲出去，清不清、浑不浑，不好听。

童小娣看了看柴云萍包着纱布的脚，说：“伤筋动骨一百天呢，你可千万不能下地干活。有活我们来帮你干。严科长得知你脚伤了，急得不得了，但他工作暂时脱不开，打发我们先来看看。”

柴云萍埋怨说：“这死鬼！支使人不当回事。”

一直没有说话的楚肖雄说：“你太见外了，都是好同志，谁家有事，还不该来帮一把？”

柴云萍问道：“这位是……我怎么没有见过呢？”

童小娣说：“他叫楚肖雄，是海关小卖店的，和我们都熟得很。”

柴云萍说：“谢谢你们了。我不是扯老严的后腿，我有点急事，请你们带个信给他，叫他无论如何回来一趟。”

童小娣答应一声。

楚肖雄冒了一句：“我好像看见公安局的人穿梭一样在严科长屋里转，不是有点什么事吧？”

“净瞎说！”徐晓林有意遮掩地说，“严科长睡了没醒，薛文清守在那里呢！”

童小娣想制止他已经来不及了，只能狠狠瞪了徐晓林一眼，赶忙解释说：“严科长昨天打夜班，太累了，我们不忍心叫醒他。”

柴云萍心里却犯了寻思。他们三个人说话吞吞吐吐、支支吾吾，一说就有岔头，到底是怎么回事？大白天睡觉还要人守着？莫非是低血压犯了？还是出了别的事？

一时她心里七上八下直打鼓，一想到方才这兜子来历不明的手表，更不落底了。

见他们三个人起身告辞要走，柴云萍留童小娣说：“小娣，你先留一步，你帮我干点活。”

童小娣答应一声，对徐晓林他俩说：“你们先走吧，我呆会儿再回去。”

徐晓林同楚肖雄下了楼，楚肖雄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看见了没？”

徐晓林站住：“看见什么了？”

“你呀！真是没心没肺的人！”楚肖雄说，“没看见方才在床上那一大堆手表吗？”他挤了挤眼睛。

“别胡说。”徐晓林起来维护他的科长了，“没有调查研究，可不能瞎猜疑。”

“是呀，”楚肖雄边走边说，“那表若是好来的，严科长老婆为什么那么发慌？又藏又掖，不是说明问题吗？”

“不可能。”徐晓林虽然嘴硬，心里也开始画魂了，“兴许是没收的走私手表呢。”

楚肖雄不阴不阳地笑起来：“笑话，你没收的手表也带到家里去吗？”

一句话问得徐晓林张口结舌，答不上话。

楚肖雄说：“知人知面难知心哪！人心隔肚皮，你还太嫩啊！你不是说薛文清奉命守在他床头吗！这是好兆头吗？不反常吗？”

徐晓林不做声了，可他无论如何不敢相信，他的顶头上司会是走私犯！

当你老婆都不相信你的时候

彭明光关长足足和严方锐关在值班室里谈了四个钟头！

谈话极为秘密，连中午饭都是叫郑来福从食堂打来送去的。

接着有人证实，严方锐一口饭都没有吃，有两碗饭菜是原封不动退回到大食堂的。

流言蜂起！许多人都在交头接耳，私下议论，说严方锐“犯了事”、“同走私集团有关系”等等。尽管大多数了解严方锐为人的人不信，可是三人成众，这风越吹越硬。

也确实有几分特别迹象，严方锐居然一上午没有走出值班室一步，从前他总是泡在检查站现场的。再说，有什么事好谈，要关在房里谈一上午呢？

徐晓林坐卧不安，心里直发毛。童小娣一听到有人背地嘀咕就生气。最后连向来沉稳的薛文清都坐不住板凳了，亲自去问彭明光。

应当说，整个一上午彭明光是沉闷的，但一听了薛文清说到

外面谣言四起，他反倒心里踏实下来了。

彭明光已经听薛文清汇报了严方锐家有大量手表的事，他对严方锐说：“你回家一趟吧，你爱人脚砸伤了。”

对事物反应特别敏感的严方锐站起身来，说：“我回去，方便吗？”

“那应当问你自己。”彭明光表情很严肃，“世界上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越是在复杂的情况面前，越需要有冷静的头脑。你回去吧。”

严方锐回家去了。一跨出海关大楼，他碰到的全是莫名其妙的目光，也许是神经质？不，那些目光都是异常的。他的心在紧缩、在绞痛。

他尽量做出同平时没有丝毫两样的姿态，可是这努力没有多大效果，连他自己都不满意。

走在路上，他才发现自己没有骑自行车，该死，这就昏了头了吗？

真怪，有好几次，他都下意识地回头望望，他总觉得会有人跟踪他。是谁呢？骆峰？还是关穆？

他不傻，彭明光虽然没有明说，他也能从谈话中得出结论，公安局方面怀疑他严方锐是作案人，是枪杀戚宾如的第一个嫌疑犯！

一时，一种灰溜溜、酸溜溜的滋味从心头涌起，他差点掉下泪来。

推开家门，屋子里静悄悄的，彤彤躺在小床上午睡；妻子柴云萍半躺半坐在床上发呆。

见丈夫进来，柴云萍没好气地说：“你还想回来呀？”

严方锐疲倦地坐下，勉强做出笑容问道：“脚伤得重吗？我来看看。”

柴云萍把伤脚缩到被单里，说：“你先甭管我。我问你，你

出了什么事，在海关叫人家看着？”

一句话触到了严方锐的心病，他又气又恼地说：“连你都不相信我吗？”

“相信？”柴云萍提起装手表的兜子哗啦一声丢过去，“这是怎么回事？”

严方锐看了手表、字条，反倒冷静下来了，他说：“这是有人栽赃陷害。”

“我也这样想。”妻子说，“可我觉得你有事瞒着我，你脸色那么难看。”

严方锐张了张嘴，似乎想说句什么，终于没有说出口。他能告诉妻子，连公安局都怀疑他吗？事情没有弄清，他既没有向老婆泄密的习惯，也羞于说出口，就只是长长地叹了口气，说：“你相信我好了，以后我会告诉你的。”

“身正不怕影子斜！”柴云萍说，“走，提上这兜子表，给彭关长送去，我和你一道去！别叫人家讲起来，好说不好听，人活在世上名声要紧。”

“你别着急，让我想想。”严方锐意想不到，家里又出了这么一档子事，他说：“烂肉是贴不到好肉上去的。”

“那不行，你不去，就是你心里有鬼。你去不去？”妻子的嗓音提高了。

“我当然要去。”严方锐站起身来，“你好好躺着，不用激动，我会处理好的。”

柴云萍嘘了口气，说：“快去快回。对了，你请彭关长来咱家一趟，我要当面问他。”

严方锐苦笑一下，答应了。他把提兜装到自己的皮包里。他已经到了连老婆都不相信他的地步了。

严方锐离了家门，在酷热难当的电车站候了10分钟车，赶到海关时，已经是午后三点多钟。

彭明光不在关长办公室，听秘书说在会议室开紧急会议。秘书见他要走，就嘱咐说：“你到会议室去吧，彭关长叮嘱，叫马上找到你呢。”

会议室在五楼，门紧闭着。

严方锐在门口犹豫了好一会儿，几次伸手要敲门，都又缩了回来。

人真是怪物！谣言当真那么厉害吗？是的，谣言可以让一个清白无辜的人抬不起头来，你总不能四门贴告示，去为自己辟谣；何况即或四门贴告示，还有不识字的呢，并不能制止不胫而走的流言蜚语。

严方锐心里像一面镜子那样明白，可是事情那么巧，你能拿出什么证据说服别人呢？

他除了良心，一无所有。

枪是他的，子弹平白无故少了一颗，甚至作案人穿的鞋都是他的！

有什么好说？

在彭明光同他谈话的时候，他本想提醒关长注意，可能是敌人的借刀杀人计，可一想又大可不必。彭关长又不是3岁孩子，基于他对自己的了解，对周围事物敏锐的洞察力，他需要自己去提醒吗？

严方锐相信最终能够水落石出，可是眼下对工作的损失呢？正值要破获黑十字架走私集团和老K抢劫集团的紧急关头，却从暗里射出一支冷箭来，他感到苦恼。

突然，会议室里传出彭关长的声音，说得激昂慷慨：“我们没有半点理由怀疑小严同志，那样我们就中计了。”

一个沉稳的调门在说话，那是公安局桂局长的声音：“经过化验，严方锐床头几上那半杯剩水里掺了烈性安眠药，他肯定是喝了水后沉睡过去的。也就是说，有人利用这个机会盗走了他的

手枪和胶鞋去作案，这是敌人扰乱我们部署的一个移花接木计、反间计。我同意海关党委的意见，将计就计，不过这要征得严方锐同志的同意。

严方锐鼻子一酸，热泪哗哗地淌下来，他鼓起勇气狠狠地去敲门。

门开了，随着一团呛人的烟雾，彭明光出现在门口，一见了他就说：“怎么，来自首吗？你来得正好，快进来。”

严方锐大步跨进了会议室。

海关和公安局的联席会议开了几个小时，直到下班以后才散。

严方锐忽然觉得很饿，一口气吃了两个干面包，喝了半暖壶水，这才骑自行车，一阵风似的跑回家来。

妻子见丈夫脸色开朗起来，就开门见山地问：“东西呢？交了吗？”

“当然交了。”严方锐兴冲冲地说，“你放心好了……”说到这里，他闭了嘴，唉，差点说露了嘴。

柴云萍问：“弄清怎么回事了吗？”

严方锐眨眨眼，说：“你相信我好了。不过，你别大惊小怪，明天早上，海关可能传出一个爆炸性新闻。”

他说得很轻松，好像与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柴云萍问：“什么新闻？能透露一点吗？”

严方锐笑着说：“查私科长严方锐撤职反省，暂时放到基层，去扫地！”

柴云萍一愣，说：“你开什么玩笑？一点正经没有！”

“不是玩笑，”严方锐说，“是真的。”

柴云萍见他又严肃起来，有点半信半疑：“我不信，凭什么撤你职？”

严方锐说：“别人给你栽赃，一时又查不清，不适合当查私

科长，暂时回避一下，对工作有利嘛。”

听他说得有理，柴云萍可沉不住气了，霍地一下掀开被子坐起来：“你是软面团任人家捏圆搓扁吗？你干吗受这份窝囊气？”

严方锐说：“只能这样……”

柴云萍火了：“我看，你是心里有鬼！你一定干了见不得人的事！不然，你就去找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再不，马上去告，告到北京海关总署！你告不告？”

严方锐无论如何不能把实情告诉她，只好搪塞地说：“要相信组织嘛。”

“谁相信你呢？”柴云萍越来越火，她是点火就着的脾气，向来眼里揉不下半粒沙子的。她已经认定丈夫心里有鬼，只是不敢向老婆承认而已。

是啊，组织上能够在没有查清问题的时候就随便免人家职吗？彭明光会那么不负责任？

她恨不得一步飞到彭明光那里去对证明白，可惜她脚疼下不了地。

严方锐给她泡了一碗鸡汤笋面，端到她面前，说：“你别发火，你只记住一条就行，你的丈夫不会走错路的。好了，有些事暂时还不能向你公开。来，吃点东西……”

咣一声，柴云萍打落了饭碗，面条洒了一地。她伏在床上呜呜地哭起来。委屈、怨恨，一迭声叫着：“你出去！你走开！你别在这个家里落脚，我和孩子不能跟你背这个黑锅！”

严方锐还以为她说气话。后来柴云萍干脆把他的行李卷抛到了地上。

严方锐叹了口气，说：“你呀，头脑这么简单。你将来会后悔的。”

柴云萍一边哭一边说：“我后悔，后悔嫁给你丢人现眼。你走！”

严方锐怕她闹下去惊扰四邻，只好夹起行李卷，离开了家。

他们在寻找“核潜艇”

自以为得计的人，常常像注射了吗啡一样自我麻醉。

上官求现在正是处在这样的状态。

老 K 捎来了消息，戚宾如被干掉，掌管破案的关键人物严方锐已在昨天宣布撤职，边劳动边审查，也许公安局和海关的人正从严方锐那里追查老 K 的根系。

“南辕北辙，叫他们误入歧途去吧！”上官求乐不可支，对冯翼三说：“这个心黑手狠的老 K，干得真漂亮！”

冯翼三用银匙搅拌着咖啡，提醒道：“时机倒是成熟了，不过那么大量的黄金、烟土从海关过，到底要担风险。”

上官求说：“这你不用担心，我早已物色好了一个人，只要肯给咱们干，万无一失。这好比是潜伏在深水下的一只核潜艇，人不知鬼不觉。”

“噢，我猜到了。”冯翼三一对离得很远的眼睛亮起来，“只是，怕不那么容易上钩吧？”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上官求很得意地说，“何况，我已经抓到了核潜艇的把柄。只要脚底下沾了泥的人，再叫他往泥坑里踩几脚，没有关系，只要给他钱！”

冯翼三佩服地点了点头，问：“趁乱可以混水摸鱼了，是不是先把黑妹叫核潜艇运过去？”

上官求手里摆弄着放在桌上的一个黑十字架，摇摇头说：“不，小心上当。老 K 是个十里洋场的大流氓，不可低估。核潜艇只能用来接应黄姨、白姐，黑妹不可走同一路线。”

“可是，”冯翼三说，“老 K 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不见黑妹和洋杂货，他肯把黄姨嫁过来吗？”

上官求似乎也很为难，他在屋子里踱了一阵步，站到阳台门口，拉开落地大窗上的窗纱，望着黑涛翻滚的铜锣湾，半晌才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笔交易事关大局，只要黑妹顺利过去，北非克劳斯集团就会信任咱们，下一批货就会送到咱们手上来。咱们的黑十字架计划就能成功，你不是对大陆恨之入骨吗？”

冯翼三不语。他是 15 年前从大陆劳改监狱逃出来的，他因为组织反革命“大同党”被捕，判了死缓。

上官求说：“大同党算什么？国民党够兴旺的了吧？还不是缩守台湾孤岛那么一块弹丸之地？大船烂了还有三千钉，共产党是不易摧垮的，十年折腾，都没有怎么样。可是，大陆的百姓穷怕了，他们不是要搞四个现代化吗？咱给他来个釜底抽薪，叫他们干不成四化，这比你那光杆司令的大同党要实惠得多。”

冯翼三问道：“老板好像有什么事要小弟办。”

上官求说：“你很能洞察愚兄的内心。唉，这次交易，成败关系甚大，远在香港遥控怕不灵。我是在大陆广交会排号的人，又不宜轻举妄动。所以，想来想去，欲借助老弟之力，到大陆走一趟，把这笔生意做成。当然，为兄是不会亏待你的。”

冯翼三吓了一跳。他万万没有想到上官求会叫他亲赴大陆。可是又不好拒绝。15 年前，他冯翼三趁清晨大雾，从深圳河游到九龙新界，那时不过是个不名一文的亡命徒。十几年来，由于投靠了上官求，他已经是腰缠万贯的富翁了。为了报恩，他没少为上官求卖命。去年夏天，他自告奋勇押送一条船上路，满载着从东南亚装上的鸦片，经过咆哮的好望角，遇到 10 级风浪，差点送了命。后来在哥本哈根锚地抛锚时，又被国际反走私组织发现，出动了十几条快艇追击他们，如果他不是套上救生衣跳海逃走，他也早被押上国际法庭了。

他为上官求，什么风险没担过？

但他惟独不敢重返大陆！

公安局和劳改监狱有他的档案、照片。在他的祖国，他是个死有余辜的人！

冯翼三沉默了半晌，才吞吞吐吐地说：“小弟为老板理应两肋插刀，只是此去凶多吉少，小弟性命事小，万一败露，认出我来，仁兄的黑十字架计划，不就付之东流了吗？”

上官求笑笑，说：“为兄又何尝没有考虑到你的安危？不要紧的，老弟尽管放心。我请来一位高级化妆师，是太平洋电影公司的高手，经过他化妆之后，就是天神也将认不出你来。你那时的身份，将是马来西亚的橡胶园经理曹正威先生了。”

冯翼三只得唯唯听命。

上官求说：“这次，你要带一台微型发报机去，与我直接联络，这样安全可靠些。”

冯翼三大惊失色：“带发报机？那要叫海关查出来，可不是经济案件了。”

“知道。”上官求说，“能叫你冒这个风险吗？有人替你带过去。万一出事，他们也不会把你供出来，他们没有见过你，你只需要用暗号同他们联系就是了。”

替上官求带发报机的人正是电影演员吕颂和范盈盈。

上官求通过手下一个管事的人，把一台卡依牌相机已经交到了吕颂手中，告诉他们交接相机的暗语和办法。合同上写着：只要把相机安全交到应交人手中，回香港后，他们夫妇就可以得到5 000元港币。

发财，这倒是个好机会。

可是范盈盈却十分害怕，这是在刀子尖上练把戏呀。

吃晚饭的时候，范盈盈说：“我看算了，不义之财，不挣也罢。上次如果不是海关宽大为怀，丢人现眼不说，还要交一笔罚款。”

吕颂一笑，说：“你以为我是为了那5 000港币铤而走险吗？你没听海关上讲吗？走私集团为了破坏大陆四化建设，不惜走私鸦片害人呢！咱们是中国人，应当帮助大陆做点有益的事情。”

范盈盈说：“可是，你要明白咱们的处境啊，前面有虎，背后有狼。帮助大陆干事，这固然好，万一事情露了风，他们能饶得过咱们吗？你那个远房表舅心狠手辣，又同黑社会勾搭连环，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

吕颂放下饭碗，又拿起相机端详，他说：“你放心，我先打招呼，咱们一到海关，我就给他们使眼色，叫他们抓接货的人。只要相机不从咱们手上失落，咱们就惹不来祸。”

范盈盈拗不过丈夫，只是长长地叹了口气。

突然，吕颂叫了起来：“嗨！我说他们肯定有鬼呢！这是一台微型发报机，嵌在暗箱里。好，我叫你发报！”

吕颂拿起一个尖嘴钳子，伸到相机暗箱里，夹出两个小零件，丢到地下，嘿嘿地笑了。

黑手从哪里伸出来？

严方锐落魄了！

撤掉他查私科长职务的决定，是前天午后大张旗鼓宣布的。

严方锐一下子耷拉了脑袋，拿起一把扫帚，当了清扫工。这还不算，彭明光和人事处的人每天都声严色厉地叫他几次，看样子是叫他到楼里交代问题吧？

别人倒还可以，童小娣无论如何不相信严方锐会一下子堕落到这种地步，千里长堤的崩溃，会没有洞穴的吗？

她找彭明光询问，彭明光笑着说：“生活是复杂的，脑子也得复杂一点啊。好了，你来得正好，破案小组还要开个会。”

破案小组的人都陆续到齐了，一个个都像被抽了大脖筋，查

拉着头，往日那种兴致勃勃的劲都不见了。也难怪呀，群众的舆论受得了吗？人家说得不对吗？还抓走私集团呢！你们的查私科长就是个走私犯！唉，真丢脸，海关关员的帽徽那是国徽呀，都仿佛因为严方锐而蒙上了灰尘。

出人意料，最后一个到会的竟是“下了野”的严方锐。他和从前一样，习惯地坐到彭明光旁边，顺手抓起彭关长的香烟，凑到鼻子底下闻闻，算是过瘾吧！大家都知道，原来严方锐是海关第一号“大烟筒”，一天能抽两包！后来因为血压出了问题，医生和老婆里外夹攻，不得不戒掉，因为不十分情愿，落下个闻烟味的毛病。

他来干什么？是他走错了门，还是他神经错乱了？

不，都不是，彭明光在推他主持会议！

全场哗然，徐晓林几乎要喊起来了。

彭明光说：“奇怪吗？是的，严方锐同志查私科长的职务是撤了，可是，破获走私集团专案组长的职务没有撤吧？”

童小娣最先明白过来，她忘情地扑过去，抓住严方锐的手，说：“对不起，委屈你了……”

她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

像刮来一阵大风，把满天的乌云刮了个一干二净！

严方锐笑了笑，说：“同志们，我一点都不委屈，撤我职，是我自己最先向党委提出来的。如果海关内外的人都骂我、啐我，那说明我们将计就计成功了。当然，这对我的名誉是一个损失，连我爱人都不准我回家去住，我没有权利向她泄露机密，也只有这样，敌人才更会相信他们的得手。”

徐晓林不好意思了，他说：“唉！我简直是木头脑袋，少根弦儿！严科长，你要批评就批评我吧，我这两天在背地没少给你小广播，也骂过你……真对不起你。”

严方锐宽厚地一笑，随即严肃地说：“要批评你的，倒不是

这个。你的自由主义已经直接危害到海关的工作了。你为什么向楚肖雄泄露机密？戚宾如是不是因为这个被杀，虽然不能十分肯定，但你这种错误的性质是十分严重的。”

其实，这件事徐晓林根本没当回事，是他自己反过来又向薛文清、童小娣讲的。

徐晓林一听严方锐说得这么严重，有点害怕了，就改口说：“我没有详细同他说，我只是透露一点点，我是对楚肖雄搞搞火力侦察，我总感到这个人不那么地道。”

彭明光喷了一口浓烟，一字一板地说：“在酒桌上喝着人家的古井贡，搞人家的火力侦察？你不感到羞口吗？你不是想立功吗？我看你们共青团首先应当给你处分。好了，你晚上要写检查交到团支部，不，直接交给我，处分以后再研究，我们今天是研究下一步行动计划。”

徐晓林蔫了，他散漫惯了，却没想到捅了这么大的娄子。

在彭明光、严方锐分别分析了香港黑十字架走私集团和老K集团的动向以后，公布了他们的“将计就计”方案，造成误把严方锐当成侦破对象的错觉，引蛇出洞，一鼓歼之。

会议结束前，严方锐对大家说：“收到吕颂的一封来信，11点那班快车里，吕颂夫妇入境，带一台发报机，但却不知道接机子的人，我们要充分注意，很可能是黑十字架的什么大人物过来了，不然不会带发报机过来。”

彭明光补充说：“要密切监视楚肖雄，这是个十分可疑的人。然而要不露形迹才行，不能让他紧张。”

为了将功补过，一直闷头吸烟的徐晓林说：“监视他的任务交给我吧。”

童小娣首先反对：“你？算了吧，你还嫌娄子捅得小吗？”

徐晓林的脸一下子红到脖子根。

严方锐望了彭明光一眼，说：“我看，倒可以信赖小徐，不

过你要演好这个角色，你能麻痹住他，就算成功。”

徐晓林受到这意外的鼓励，腾地跳起来，打了个立正：“保证完成任务！”

人们都忍不住笑了。

会议结束以后，严方锐照旧拿起扫帚去扫地，又恢复了那副沮丧的样子。当他扫到小卖店前时，机灵的徐晓林甚至给他配了点戏，对严方锐说：“光扫地不行。你必须把你的后台老 K 交代出来！”

严方锐唯唯称是。

趁顾客稀少，楚肖雄两个胳膊肘子伏在玻璃柜台上，挤眉弄眼地问徐晓林：“怎么样了？堡垒攻破了吗？”

徐晓林想起了严方锐的嘱咐，为了麻痹他，就胡编胡诌地说：“没有铁板一块的，别看他现在抵赖，用不了几天，他就得供认。告诉你，你可别乱说，我们怀疑，他就是老 K，同香港直接联系的可能就是他呢！”

楚肖雄眨了眨眼，说：“真想不到，那可是天下奇案了。”

徐晓林接过一支香烟，走开。

旅客入境处人声鼎沸，11点的班车进站了，香港方面正在一批批向这边放人。

严方锐已经扫完候检休息厅，正要走出屋门，看见吕颂和范盈盈满面春风地走过来，像第一次入境时一样，吕颂的脖子上吊着一架高级照相机。

严方锐又在打量别的旅客。他发现，有一个戴巴拿马草帽的老头走过来，一脸大胡子，鼻梁上架着一副麦克镜，镜片颜色很深，带着安有长焦距镜头的相机，提着一只十分考究的带自动报警器的经理箱。冲这只箱子，就可以断定他是个富翁。严方锐知道，这种能够在被抢时连续报警几个小时的高级保密箱，是美国得克萨斯州刚刚问世的新产品，价格昂贵到一万多美元，一般人

是用不起的。

这个提着檀香木手杖的老头所以引起了严方锐的注意，因为他一直不离吕颂、范盈盈左右，而两个电影演员又根本不像认识他的样子。

严方锐怕被吕颂他们认出来，就退出候检厅，到休息厅去了。

一出门，正碰上郑来福担着一副开水桶迎面过来，他是给公共开水壶添水的。

见了严方锐，郑来福脸上现出大有不忍的神色。他放下水桶，盯了严方锐一眼，说：“你真的叫人家整趴下了？我死也不相信，你是那号吃里扒外的人。你若心里没鬼，你就去上访，到纪律检查委员会去！”

说完，他看看跟前没人，从口袋里抓了一把糖塞到严方锐手里，匆匆挑起水桶走了。

严方锐什么也没有说，一直望到郑来福满头白发的背影在自由门后头消失，才迈动步子。

吕颂和范盈盈顺利地通过了海关检查，来到了休息大厅。在这里，去往广州的要换车，去往汕头、东莞和海丰、陆丰的也准备改乘中国旅行社的旅游专车，只有到本地小住的人才匆匆离去，到华侨大旅社去找下榻处。

吕颂和范盈盈所以走进休息厅，是为了接头交出照相机。他们心里极为坦然，从童小娣的眼神中找到了安全的答案。

休息厅里人很乱，几乎所有的座位都有了人。

薛文清正在休息厅里回答人们的问讯，一见两个电影演员走进门来正东张西望地寻找座位，就主动迎过去，给他们找了一个靠窗子的座位。

吕颂道了谢，将挂在脖子上的照相机放到小茶几上，从马桶袋里摸出两听可口可乐，扭掉铅封片，递一筒给范盈盈，两个人

吸着可口可乐，眼睛却始终盯着门口。

同时盯着门口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薛文清，一个是严方锐。

门开了，白胡子戴巴拿马草帽的人走了进来，用手杖扶手向上掀了掀草帽，很有风度地环视了一下休息大厅，便径直朝靠窗子的座位步去。

白胡子走到吕颂和范盈盈面前，右手扶着手杖，露出无名指上一颗足有5克拉重的钻石戒指，中间镶着一个黑宝石十字架。

啊，这是标志！吕颂眼睛一亮，等待他发话。

白胡子哈了哈腰，很有礼貌地问道：“可以坐吗？”

吕颂向范盈盈那边挤了挤，说：“不客气，请随便坐。”

白胡子将手杖倚好，放下经理箱，又把挂在脖子上的相机卸下来，放到茶几上。

白胡子其实就是化了妆的冯翼三。他打量吕颂一眼，鉴赏地拿起吕颂放在茶几上的相机在手里摆弄着，问道：“是日本卡依牌的吗？”

吕颂对答如流：“不，康艺佳牌。”

冯翼三说：“哦，是世界最新的，第一部电脑自动照相机。”

吕颂说：“是的，小西六写真工业有限公司出品。”

冯翼三趁机把自己的那架相机摆到一起，说：“我这台是汉斯，德国货。”

一边说，一边很自然地来了个掉包计，将吕颂带的那台挂到自己脖子上说：“我是在新世纪大厦买的。”

说罢站起来，提起手杖、经理箱：“再会，我要进城了。”

吕颂说了声：“再会。”马上环顾左右，他发现薛文清、徐晓林、童小娣几个人跟踪过去，他嘘了口气，挽起范盈盈，向门口走去。

冯翼三很敏感地发现有人跟踪他，快走到门口的时候，倏地

趑回来，向男厕所走去。

这下子，童小娣、薛文清不好跟进去了。童小娣给徐晓林使了个眼色，徐晓林三脚两步跟进厕所。

冯翼三一进厕所，随手将挂在脖子上的照相机挂到盥洗池旁边的衣帽钩上。

好多旅客在男厕所里进进出出。

严方锐看见，冯翼三从厕所走出来，手上提着高级经理箱，照相机仍然吊在脖子上。徐晓林跟在他身后，一脸得意神色。

童小娣、薛文清和徐晓林迎上冯翼三，童小娣客气地说：“先生，请查一下您的箱子。”

冯翼三掩饰不住得意神色，却故意装出老大不悦的神情说：“喏，刚刚检查完嘛，你们还要检查多少次？”

童小娣说：“只要需要，随时都可以检查，因为先生还没有离开海关。”

薛文清认真看过冯翼三化了名的马来西亚归侨护照，签发年月日及照片、钢印、号码都对，找不出纰漏，只好还给他。

为了表示不那么有目的，童小娣例行公事地又查了一遍他的经理箱。里边无非是钞票、支票存根和商业往来合同书之类。

当他们几个人抑制住狂跳的心，开始检查冯翼三照相机的时候，冯翼三脸上—丝惊慌都没有，悠然自得地点起一支香烟，吐着烟环，向他们说：“汉斯牌，镜头是一流的，可惜我忘记把广角镜带上了。”

晦气！徐晓林差不多要目瞪口呆了！这台汉斯牌照相机普普通通，暗箱里空空的，哪有发报装置？

真见鬼了，难道在厕所里，老 K 派人拿同样型号的相机又搞了一次掉包计？

没办法，童小娣他们只好向人家赔礼道歉，把冯翼三送出大门外。

傍晚，破案小组的人一个一个地先后溜进海关值班室，这里已经成为“反省人员”严方锐的临时居所。

童小娣又埋怨开了徐晓林：“你真笨得要死！一个大活人眼睁睁叫人家在你眼皮底下捣鬼！”

徐晓林唉声叹气地说：“简直神了，和变魔术差不多。我一进厕所，看见白胡子把相机挂在盥洗池旁，他去解手，我心想，还怕相机飞了吗？谁能想到，又搞了一回掉包计？我还信心十足呢！”

薛文清皱着眉头说：“真怪，是什么人把相机接走了呢？”

徐晓林说：“我还以为肯定是楚肖雄来接货呢。”

童小娣讥讽地说：“你的判断总是那么正确？人家楚肖雄根本没离开小卖店柜台。”

严方锐说：“不要吃后悔药了。这件事，说明我们的对手是相当狡猾的，他们的行动，几乎全是采取特务活动手段。从这件事可以判断出，除了楚肖雄、仇阿三和公园女清扫员，老 K 在我们左右还安插有人。小薛，马上查清那个曹正威住在什么地方。”

薛文清说：“白云饭店 8 楼 21 号，是个套间。”

严方锐说：“要密切注意他同什么人来往，及时与关处长取得联系。”

徐晓林叹口气说：“简直是捉迷藏！干脆通知公安局，先把楚肖雄抓起来，一审，大鱼小鱼不就一网端了吗？”

人们都笑起来。

童小娣说：“你就会抓！那是最简单的办法。不拿到真凭实据，抓人容易放人难啊！依你，还主张把严科长抓起来呢！”

童小娣捂起嘴笑个不住。

徐晓林挠挠头皮，说：“真没想到，海关还这么复杂，看来我得进政法干校进修进修了！”

严方锐说：“我们守卫的是国门啊，这里虽然不是军事、政治的冲突，可是挖建设的墙脚，也有挖倒社会主义大厦的危险啊！”

幽灵在公园里出现

傍晚时分，骆峰发现仇阿三到白云饭店去了一次。

仇阿三并没有以来访者身份出现，在后花园人工湖畔转了转，把一个小提包放到月洞门旁长椅上，走开。直到看见冯翼三取走提包，仇阿三才离去。

骆峰知道，那提包里装着的便是发报机，老 K 派人送还了。

骆峰已经同吕颂、范盈盈谈过，知道发报机的零件已经被拆掉几个，冯翼三想发报那是不可能了。因此，他没有必要去截获发报机。

冯翼三回到 8 楼那间豪华的房间，将房门从里面锁死，把写有中文、英文“休息，请勿打扰”的门牌挂在门外面拉手上。

他还不放心，将洗澡间的热水龙头打开，让水哗哗流淌；再把电视机、收音机同时打开，床头柜立式音箱扭到最大音量；天不算热，空调机开放到最高档。

整个房间充满了震耳欲聋的声响。

他要利用噪音作掩护，开始发报，直接同上官老板联络。

但当冯翼三从相机暗箱里拉出发报机时，冒出了冷汗，这是一台不能使用的发报机！

冯翼三十分恼火，又无可奈何。

现在，留着这台相机式的发报机已经没有什么必要，只能给他增加危险，他决定把它扔掉。

冯翼三是惊弓之鸟，一入境就感到窒息般的压力。海关的人为什么单单要对他进行复查？是他们知道了照相机里的秘密吗？

他现在想起来还有点后怕！如果不是诡计多端的老 K 使了点手腕，派人从厕所里换走相机，恐怕此时他也许坐在公安局预审室的板凳上了。唉，真是想一下都叫人毛发发髀、脊背发凉啊！

冯翼三脖子上挂了照相机，从 8 楼坐电楼下来，通过前后楼间的廊道，穿越过去，来到花开正浓的后园。

游人寥寥无几。冯翼三装作散步的样子，来到人工湖畔。他为了试试池水深浅，拣起几块石头，咕咚咕咚地向水中抛着。当他判断水深至少有两米的时候，四下望望无人，迅速把照相机取下，扔进水里，为了掩饰，又一连气扔了几块石头下去。

水面的涟漪渐渐平静，他的心也一块石头落了地。

他看看表，7 点 10 分。

按约定，他要在 8 点 30 分在秀海公园花市左侧第一条长椅上同老 K 的人会面。他与上官求约好，是要老 K 亲自出场的，谁知道这个老狐狸会不会又来个金蝉脱壳？

一想到老 K，冯翼三又联想起被破坏了的发报机，他的心又提到了喉咙口。是什么人干的呢？是那两个演员，不，不大可能。一来他们不知道内幕，不会拆看相机；退一步说，即或怀疑到照相机有问题，他们也不敢拆掉零件，他们是为了雇佣金才来大陆冒险的，何必干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那么，一定是老 K 支使手下人干的了？他为什么要阻断我和上官求方面的直线联络呢？啊，是了，他要同我当面讨价还价，不希望上官求遥控。

他虽然感到气愤、恼火，却又稍稍放宽了心。只要发报机的秘密不被大陆公安局和海关掌握，我冯翼三的安全系数就很大。

冯翼三当然不会知道，在他扔掉相机的时候，公安局侦察员骆峰一直在盯着他，冯翼三取上另一台相机，叫上出租车开往秀海公园践约的时候，骆峰早已把照相机从水里捞了上来，作为罪证替冯翼三保存了起来。

冯翼三赶到秀海公园，距接头的的时间还有半个多小时。他逛了逛花市，又到公园游艺厅新开辟的电子游戏馆玩了一阵“激光炮打军舰”，这才向花市走去。

冯翼三的行踪一直在童小娣和关穆掌握之中。

他们像一对情侣，在草坪上打着羽毛球。不过又不像谈情说爱的样子，童小娣把严方锐的小女孩彤彤带来了，将要让她扮演重要角色，她正在草坪上玩花皮球。

严方锐既然是“反省待审查”的身份，当然不好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只能在海关值班室里坐镇等电话。

8点25分，冯翼三向左侧第一个长椅走去。

本来，纳凉的人多得很，公园的长椅是座无虚席的，惟独花市左边第一个长椅空着，因为上面放着令人讨厌的垃圾簸箕、扫帚之类。这无疑是公园清扫女工奉老K之命为接头人单独留下的座位。

果然，女清扫工幽灵似的从树后转出来，拿走了清扫工具，用抹布掸了掸长椅上的尘土，走开了。

冯翼三坐到长椅上，拿出相机，对着焦点，好像要拍什么入夜的景致，闪光灯闪了几下。

楚肖雄出场了！

童小娣的眼睛都快冒火了！果然是他！这个披着好人外衣的家伙，当真是走私集团的要犯。

楚肖雄今天披了件薄料风雨衣，戴了一副太阳镜，四下望望，径直向长椅走去。

为了不被楚肖雄发现，正在打羽毛球的童小娣和关穆走得远了一点，躲到树后去。童小娣抓起小彤彤的花皮球一掷，皮球向长椅底下滚去。

彤彤是事先经过他们训练的，马上追踪皮球跑去。

皮球钻到长椅底下了。长椅底下长着一尺多高的青草。

彤彤也不管冯翼三、楚肖雄用什么眼睛看她，借着天黑看不清面孔，孩子一头钻到长椅底下，迅速把童阿姨装到她兜里的无线小话筒塞到乱草堆里，然后抱起她的花皮球弓腰钻出来，一溜烟儿地跑了。

冯翼三和楚肖雄怎么会想到一个孩子会对他们构成威胁呢？他们坦然地落了座。岂不知，树林里面，由长椅底下话筒传出来的对话，正录到关穆的录音机磁带上。

先是对暗语，老一套。

楚肖雄问：“是日本卡依牌的吗？”

冯翼三拍了拍照相机：“不，康艺佳牌。”

楚肖雄：“哦，是世界最新的、第一部电脑自动照相机。”冯翼三说：“是的，小西六写真工业有限公司出品。”

楚肖雄问：“有货吗？”

冯翼三回答：“我是在新世纪大厦买的。”

接下去是实质性会谈。

冯翼三说：“我要见老 K。”

楚肖雄说：“我就是。”

冯翼三有几分恼火：“胡说！你不过是‘么鸡’！你们太不够朋友了！为什么机器还来时已经破坏？”

楚肖雄似乎一惊：“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没人动一下。这……会不会有什么别的危险？”

两个人同时惊悸地左右望望，没有人注意他们。

冯翼三这才说：“我全权代表上官先生。你转告老 K，我要亲眼看到黄姨。”

楚肖雄说：“君子交易，老兄又何必这样不放心呢？况且，样品明天早班车就送过去，由我掩护，万无一失！我们事前实在没有料到你会大驾光临。”

冯翼三说：“不，我一定要亲见黄姨、白姐。”

楚肖雄反问：“可是黑妹呢，什么时候过来？黄姨怎么走法？”

冯翼三说：“明天夜里 11 点到达，地点另告。我必须等上官老板派人来，才能告诉你黄姨出走路线。”

正事谈完，两个人又扯了一阵天气炎热，该吃豆沙消暑之类的话，站起来各自走去。

“么鸡”被杀在海关

楚肖雄到底亮相了。

关穆和严方锐连夜研究了行动方案后，向市公安局、海关党委作了汇报，决定利用第二天楚肖雄作案的机会当场逮捕他，从而打开缺口。

早晨一上班，楚肖雄就处在严密控制之中了。外松内紧，他本人一点都觉察不出来，仍然点头哈腰地同熟悉的关员们打招呼寒暄。

楚肖雄到底用什么办法掩护黄金样品走私出口呢？

这暂时还是个谜。

一个带着大陆乡物、特产的长发旅客顺利地通过了出境检查口，来到小卖店前。出境旅客通常在这里买上一点东西，把剩在口袋里最后一点人民币花光，何况这是免税商品，比市面要便宜三成。

长发旅客凑到陈列着许多玉器的柜台上，吊在脖颈上的金链黑十字架垂下来，摇晃着。

啊，这是接头的标志！

楚肖雄打量他一眼，走过来。

在一旁扫地的严方锐偷偷注视着他们，薛文清也盯着这里。

郑来福挑了一担水站下。开水壶就设在小卖店柜台外面，郑

来福倒着开水，有意无意地瞥了小卖店柜台几眼。

长发旅客的眼光在货架子上搜寻了一阵，问道：“有康艺佳牌照相机吗？”

楚肖雄摇摇头：“那是世界第一部电脑自动相机吧？”

长发旅客：“是的，日本小西六写真工业有限公司出品。”

楚肖雄：“这是高档商品，我们不经营。先生可以到香港新世纪大厦去问问看，那里会有。”

长发旅客说了声“谢谢”，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包硬纸盒精装“三五”牌英国香烟，弹出一支，自己叼在嘴上，又把香烟盒递给楚肖雄：“请吸一支。”

楚肖雄客气地接过来：“多谢。”然后伸出手去摸衣兜，看样子是在找打火机。

趁人不备，楚肖雄从兜里掏出些什么，迅速装到“三五”牌香烟盒中，还给了长发旅客。

啊，他们用这种办法逃避海关检查！这是很难露马脚的，出境旅客到了这里，是检查完毕，马上要上车出境的，再不会有什么麻烦了。

今天却是例外。

徐晓林走近柜台，对楚肖雄说：“老楚，你来一下，海关办公室那里，彭关长找你有事。”

楚肖雄虽然皱了一下眉，还是答应了，向另一个女售货员说了声：“我去去就来，”推开半人高的柜台小门，同徐晓林走去。

薛文清和童小娣这时拦住了正要出境登车的长发旅客。

童小娣说：“先生，请您跟我们来一下。”

长发旅客有点紧张：“干什么？”

童小娣说：“谈谈。”

“有什么好谈的？”长发旅客向后退了几步，说：“误了去九龙的火车怎么办？”

薛文清看了看腕子上的手表，温和地说：“不要紧的，你若肯合作，咱们只需要三五分钟就谈好了。”

担起空水桶的郑来福这时插了一句：“去九龙的火车还有好几趟嘛！”

长发旅客还是不肯去：“我、我是你们仔细检查过了的呀！”

童小娣针锋相对：“谈几句话，总不会遭到你的拒绝吧？”

长发旅客脸色发白，鬓角的汗都淌出来了。他有什么办法金蝉脱壳？没有。惟一可以给他救驾的售货员楚肖雄又不在柜台里，他只好硬着头皮在两个女关员挟持下，向海关大楼走去。

一楼海关值班室里，严方锐坐在椅子上。听到敲门，他应了声“请进”，童小娣、薛文清带着长发旅客走进来。

严方锐打量长发旅客几眼，说：“请坐，我要看看你的‘回乡证’。”

长发旅客从小提包里掏出“回乡证”，丢到他面前，一屁股坐到对面椅子上，跷起二郎腿，故作镇定地抖颤着。

严方锐合上“回乡证”，盯着他的上衣口袋。这是一件薄得透亮的尼龙绸港式衬衫，大尖领，方口袋。右边口袋里可以看见是一包“三五”牌香烟，但却显得特别沉，口袋被坠下来，比左边的口袋低了5公分的样子。

长发旅客的腿不抖了，愣愣地望着严方锐。

严方锐说：“先生，咱们还是长话短说为好。你身上带有非法出境的走私品，请你交出来。”

长发旅客矢口抵赖：“没有，你们都查过了的啊……”

童小娣在一旁说：“查过了再装上走私品嘛！”说罢，从桌子上拿起有天线的电子检测仪，在长发旅客胸前一晃，检测仪的红灯立即闪亮，发出清脆的“滴滴”声。

长发旅客下意识地捂住了口袋。

严方锐说：“拿出来吧。不到万不得已，我们不愿意采取强

行搜身的办法。”

长发旅客囁嚅地说：“这、这、是一包香烟啊……”

严方锐说：“重金属的香烟，我们还没有见过呢。”

赖是赖不下去了，长发旅客只得哆哆嗦嗦地掏出“三五”牌香烟，放到严方锐面前，说：“这……这不是我的……”

严方锐也不理他，将香烟盒盖打开一倒，里面只有五支香烟，其余的是三块墨块大小的金条，黄澄澄的耀人眼目。

薛文清问：“哪里来的？”

长发旅客：“我卖走私手表……在海丰县乡下同老乡换的。”

严方锐说：“说谎，只证明你认罪态度不好。这种成色的黄金，民间根本没有，这是国库的！”

童小娣补充说：“交给你金条的人，已经被我们扣起来了，你还想抵赖吗？”

严方锐觉得童小娣的话过于生硬，会吓住他，就说：“你不是主犯，你不过是贪图点小便宜替人家干了错事，我们相信你能说实话。”

长发旅客垂下了头。

严方锐对童小娣说：“你到隔壁去一下，看看那里的情况，随时来告诉我。”

隔壁房间是查私科长办公室，只有徐晓林陪着楚肖雄坐着。

楚肖雄几次想出去，借口小卖店忙不开，徐晓林板着面孔，就是不放他走。

楚肖雄有点慌神了。他了解徐晓林，这是个脸上有晴雨表的小伙子，喜怒哀乐溢于言表，从来不会掩藏。徐晓林今天的脸为什么这样冷？简直像对付一个在押的犯人。

为了试探自己的判断是否准确，楚肖雄说：“怎么搞的？晓林，你开什么玩笑？”

徐晓林弦外有音地说：“我不会开玩笑。拿法律开玩笑的人，

那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楚肖雄心惊肉跳起来，他决定来硬的，就攥起拳头擂起写字台：“干什么？我有上级，我不是你们海关的人，你们有什么权利对我实行变相软禁？拿出公安局的拘捕证来，不然我要控告你们！”

正在这时，童小娣推门进来。

她知道，公安局的关处长他们还在途中，没有赶到，就吓唬他说：“希望你不要大吵大叫，其实，你比我们要明白得多！”

楚肖雄大喊起来：“你们血口喷人！我到底犯了什么法？你们拿出证据来！”

“证据嘛，会有的。”门推开，严方锐笑吟吟地跨进来。

楚肖雄傻了。

你看，严方锐那神态不又是和平时一样了吗？哪里有一点被审查者的样子？啊，难道他们在玩儿花样？那太可怕了！上当了啊，上了大当！可惜老K还蒙在鼓里，连通知他都来不及了！

楚肖雄像预感到末日到来的人一样，颓丧地跌坐到椅子上。

“奇怪吗？吃惊吗？”严方锐大大方方地坐到写字台后面的皮转椅里，“你一定奇怪，我不是被撤了职吗？告诉你吧，那不过是给你们一个错觉，我们的眼睛却始终没有被你们迷住，水，是搅不浑的。”

楚肖雄渐渐冷静下来，他咄咄逼人地反问：“什么意思？我要控诉你们的诬陷罪！”

严方锐冷笑一下，刚要说话，关穆带着几个公安战士跨进房门。

楚肖雄吓得从椅子上蹦起来。

关穆拿出一张逮捕证，给他看了看，说：“铐起来！”

公安战士铐起了他的双手。

楚肖雄还想挣扎：“我没有犯法……”

黎曼猛然记起来了：“啊，是楚肖雄借去兜风了，半夜时分还给我的，满车身是泥，我还很不高兴了的。不过，他用车去干了坏事，我可不知道。”

严方锐又问：“你什么时候同白云饭店的人接头？”

黎曼说：“今天下午4点，在水晶餐厅。”

关穆问：“告诉你，接头的人是冯翼三，你认识他吗？”

“业务上打过交道，”黎曼说，“但不太熟。上官求没有告诉我他同我接头。”

严方锐拿起冯翼三化了妆的照片，问：“是这个人吗？”

黎曼摇摇头：“不是。冯翼三比这个人要年轻得多。”

严方锐望望关穆，没有说什么。

关穆说：“你由于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已经堕落到可怕的地步。你如果愿意改悔，我们可以给你将功赎罪的机会。”

黎曼说：“请你们相信我……”

黄金梦

晚间10点钟，黎曼驾驶着雪佛兰汽车沿着海滨公路奔向梅沙湾。

车窗玻璃摇下去，带有咸腥味的海风扑面而来，吹乱她的头发，吹拂着她那发烫的面颊。她的双手死死地握着方向盘，像抓住一块救生板一样。她既紧张又踏实，去同走私集团的黑帮们打交道，那是叫人胆战心惊的；但她知道，透过迷茫的暗夜，关穆、严方锐……还有其他人好多双眼睛在注视着她、鼓舞着她，她是有强大后盾的。

梅沙湾是个渔村，从前并不繁华，在地图上也不是引人注目的，不过是个荒凉小村。近几年来，这个同香港小岛隔海相望的渔村却显赫起来。除了香港方面的机帆船常在这里泊岸外，很重

要的一条原因是海上走私造成了梅沙湾的畸形繁华。好多外乡人都千方百计地钻到这里来，到黑市场去买点洋杂货，尽管水过地皮湿，他们要受到转手商人的层层盘剥，毕竟还比国营商店的价格要便宜几成。于是这里再不是从前点电石灯的景象了，居然有了一片片灯火。

黎曼要去的地方离梅沙湾 3 公里，是个热带植物丛生的地方，当地人叫它“黑十字湾”。因为在荒漠的海滩上，孤零零地矗立着一座黑大理石纪念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当时苏联派出库里森科飞行大队到中国 and 南洋一带与日本法西斯空战。1941 年 6 月，在一次空战中，苏联优秀飞行员格里奇在梅沙湾上空中了日机机关炮，失事坠毁。为了纪念他，在这里建立了这座格里奇纪念碑。

按老 K 的电话指令，黎曼准时到达这里，她的车里还半躺着冯翼三，他们是来取黄金、银元的。

冯翼三半躺在车后座上，也许在做着金元美梦，他哪里知道，他乘坐的“核潜艇”正把他带到布满深水雷的水域里去啊！

到了指定地点，透过晦暗的星光，已经可以看到格里奇纪念碑黑乎乎的十字架了。

黎曼把车子停在一丛蒲葵下，关了车灯，走下车来。冯翼三却没有动，趴在车窗口向漆黑的暗夜中张望。

没有人来接应！

晚潮拍岸，发出凄凉而单调的声响。黎曼忽然觉得冷气袭人，抱着肩向树丛走了几步。

两个黑影从树隙间钻出来，猛然扑上去，一面墙似的把黎曼压在草地上，一个人紧紧地掐住她的喉咙。

第三个人是个矮个子，尼龙罩蒙面，一步步走过来，沙哑着嗓子冷笑着说：“你这个臭婊子！你今天都到什么地方去了？”

掐着脖子的手稍稍松了一点。黎曼反倒不怕了。她挣扎着

说：“从香港入境后直接回家了。”

“胡说。”蒙面人低声吼道，“你是9点过两分入境，一直到11点45分才到家！”

黎曼说：“我到公安局去了！你害怕了吗？告你这个老K去了！你信吗？如果是这样，你还能安然地站在这里吗？海关的人要搭我车子进城去，我能不笑脸相送吗？呸！”

蒙面人“唔”了一声，摆摆手，那两个人闪到一旁。蒙面人说：“对不起，我们都是惊弓之鸟，海关太厉害了，不得不防一手啊！”

黎曼扑扑身上的尘埃，站起来，走向雪佛兰汽车，说：“算了，我何必两头受气呢？”

蒙面人缓和地说：“不要意气用事了。冯老板来了吗？”

冯翼三应声推开车门，走下来。

蒙面人同他握握手：“老K。”

冯翼三说：“敝人姓冯。怎么样，黄姨可以上车了吧？”

蒙面人点点头，一挥手，几个强盗从十字架纪念碑底下抬出绿色金库保险箱和一个长帆布口袋。

手电亮了，冯翼三看了黄金和银元，点点头，说：“11点黑妹和其他货物上岸，信号如旧。”说罢就弓起腰要往车里钻。

“且慢！”老K一把扯住冯翼三的袖子，说：“老兄留一步，等我们接到黑妹以后，再走不迟。”

冯翼三怔了一下，说：“这不够仗义吧？难道要留下我当人质吗？”

老K说：“哪里，在一起有个商量嘛！”说罢，他把一个匪徒叫过来，说：“你同黎曼一起走。明天早上5点，我给你信，让你走，你再放黄姨出口岸。”

冯翼三明白得很，这是老K的精明之处。万一鸦片和洋杂货到不了手，或者半路被海关没收，他老K绝不肯吃这个大亏，

他还可以把黄金收回来。

可惜眼下都是老 K 的人，冯翼三势单力薄，只好听任。

黎曼开车沿原路走远了。

这时，四周响起一片“不许动”的喊声，同时各种强光灯交叉亮起来，把蒙面强盗们陷在白昼一般的光圈里。

老 K 见事不好，拔出短枪放了一响，高喊：“隐蔽，还击！”还没等匪徒们清醒过来，四外枪响了，登时有两个强盗倒下去，其余的人纷纷举手投降。

十几个匪徒，包括冯翼三和老 K 在内，都无一漏网。

关穆、严方锐带着武装公安战士、海关关员、民兵和边防军，团团围上来，缴了他们的械。

严方锐一把撕去老 K 的面巾，童小娣等人也都大吃一惊，原来罪大恶极的老 K，就是在大家心目中厚道、善良的退休工人郑来福！

严方锐冷笑道：“老 K，你到底现原形了！”

老 K 不语，只是冷笑。

关穆扯掉了冯翼三的头套和假胡须，说：“你这个越狱犯，也该卸卸妆了！”

冯翼三扭过脸去骂了老 K 一句：“你这个混蛋，全坏在你身上了！”

郑来福大笑：“可是，也别高兴得太早，黄金、白银，没有我的手令，你们得不去的！”

严方锐说：“你马上会看到的。”

果然，黎曼又驾着雪佛兰汽车兜了回来，打开车门，两个公安战士押着戴上了手铐的一个匪徒走下车来。

郑来福仰天大叫一声，扑倒在草地上，拼命啃着青草。

关穆叫人把他们一个个铐了起来。

海上夜雾沉沉，透过夜幕，可以看得见一个黑影越来越近，

啊，听得见马达的声音了。

冯翼三长叹一声，颓倒在那里。

不用问，上官求的走私船来交货了。

关穆问冯翼三：“叫他们靠岸的信号是什么？”

冯翼三说：“亮五下手电，绿色。”

然而，五下绿光亮了以后，走私船反而掉头向公海逃去。

冯翼三自以为得计，狂笑起来。

严方锐亲手打出了三颗红色信号弹，红火球拖着光尾冲上天空。他对冯翼三说：“你笑得太早了。你们的走私船逃不掉的。”

像印证他的话一样，海上突然灯火齐明，十几条缉私艇、海上公安快艇正开亮大灯包抄上去，走私船已经陷入重围，走投无路了。

冯翼三和老 K 都绝望了。

一场黄金梦破灭了。

我们的海关关员们笑了，迎来了南屏海面一个新的黎明。

(原载 1981 年 8、9、10 期《芒种》)

热 土

活着要比死掉惹人憎恨

四月的巴黎是动人的。

在薄暮中，巴黎圣母院的钟楼、艾菲尔铁塔、七月圆柱、意大利广场，还有蒙马特尔高地巴黎公社英雄们遗留下的铜炮……全都浣在红绸一样的晚霞中。温馨的海风从大西洋的比斯开湾徐徐吹来，漾起法国梧桐的清幽和紫罗兰醉人的芬芳。

这时，乳色窗纱轻轻拂动的一台昂古列姆大轿车驶过塞纳河大桥。

从车窗里探出一个姑娘丰采秀逸的脸庞，这个纯东方脸型、28岁的姑娘叫陶解放，是作为中国农机考察团成员来到法国的。明天，她就要飞回祖国去。现在，她和同伴们应老华侨万斯民先生邀请去赴晚宴，她将同旅法的侨胞一起度过最后的一个黄昏。

令人奇怪的是，宴会的主人不是万斯民，地点也不在他的郊外别墅。大轿车把客人拉到了哥德伏化街17号。

对这个古老的街道，陶解放并不陌生。前此不久，她还来瞻仰过这座旧式建筑。半个多世纪以前，周恩来、赵世炎等中共旅欧支部成员就住在这家旅馆的二楼。

主人是谁呢？

陶解放扫了一眼铺着洁白的桌布的餐桌，正在纳闷，主人露面了。这个穿一身中山装的青年人是那么年轻！他很消瘦，眼睛里的表情挡在墨镜后面，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

当人们与主人寒暄后重新落座时，年轻的主人拦住要为他作介绍的万斯民先生，摘去宽大的墨镜，露出一双英俊、深邃的大眼睛，也露出眼角、额头深深的皱纹，这使得他的相貌虽然年轻却又像未老先衰了。

在主人摘去墨镜的瞬间，陶解放的心猛然一沉，几乎叫出声来。他……难道是他吗？不，不会，死者岂能复活？他……他早在9年前就和姐姐陶和平双双投海自尽了，他怎么会跑到法国来？

正当陶解放目不转睛地盯着他胡思乱想的当儿，只见主人高高地抱起双拳，操着好听的腔音说了声“请”。随即率先举起一杯五粮液醇酒，高举过顶，用纯粹的北京腔说道：“尊贵的、来自慈母身边的同胞兄弟、姐妹们，请接受一个至今戴罪流落异乡的不肖子——顾萱的祝愿，为了母亲，与诸君痛饮三杯！”说毕，他避开每个人探询、惊讶的目光，独自一饮而尽，把空杯向上举了举。人们清楚地看见：顾萱眼里热泪涔涔而下。

陶解放完全呆了！当她听到“顾萱”的名字时，耳畔如同响了一声霹雳，震得她周身发抖，酒都从杯子里泼洒出来。啊，顾萱……真的是他？他还活着！而且竟是活在……她分明看见，顾萱正用一双泪水模糊的眼睛盯视着她。那是一双9年来一直在暗中盯视自己的眼睛啊！她无需什么印证了，就是他，从户籍卡上注销了9年的顾萱！

猛然间，一股无名的怒火从陶解放心底升起。多少年来，封存在记忆厚门里的怀念、忧伤，一霎间被羞辱、仇恨的浪潮淹没，冲毁了她理智的一切防线。

恰好，顾萱向她走过来，悲怆地叫了声：“陶——解放，你难道不认识我了吗？”

陶解放手扶椅背抖抖地站起来，还没等别人明白将要发生什么事情，她已经向顾萱展开闪电般攻击了！随着一声震撼屋瓦的呐喊“无耻”，一记响亮的耳光重重地打在主人脸上，然后她掉转身，双手蒙面，噤噤地跑出了餐厅。

席间的气氛顿时降到冰点以下。友谊、欢快一扫而光。万老先生慌忙离席，尴尬地张着两手，不知道怎样居中调停、排解。

只有挨了耳光的主人顾萱，反倒格外安静，好像这一切都在意料中，不挨一个嘴巴才是咄咄怪事似的。

他紫涨着脸，用低沉平静、略带凄然的语调说：“请大家不要扫兴，我一点都不责怪陶解放……她……打得对……请原谅，我此时心里乱得很，难以把我的一切往事公布于众，但在各位飞回祖国之前，你们会……明白的。”

顾萱还像方才一样，彬彬有礼地给每个客人斟满家乡酒，给每个客人布上中国菜。才赧颜抱惭地说：“请万老先生暂陪诸位，我先告辞，我不能不去见见她……请原谅。”

陶解放并没有离开哥德伏化街旅馆。她在凌乱的、种植着几株中国玉兰的后院，伏在长椅上哭得伤心极了。晚风越过篱笆墙，簌簌作响，把开谢的玉兰花瓣洒在陶解放的浓发和肩上。

有人说，哭是女人软弱的天性，其实并不尽然，哭又何尝不是抒发痛定思痛的一种方式呢？陶解放恨顾萱，恨入骨髓！感情和理智像一对孪生姐妹，形影不离，又互相排斥。有谁能想到，在感情上，陶解放曾经是顾萱的俘虏呢？顾萱虽然被认为离开了人世，可9年来，他一直是姑娘心目中怀念的圣洁形象，可现在，这圣洁的形象倾颓了。他没有“玉碎”，却厚颜无耻“瓦全”在异邦！他欺骗了柔弱而善良的姐姐陶和平，也欺骗了陶解放那

颗热烈而赤诚的心。

陶解放真恨不能把顾萱千刀万剐才解恨！

她该怎么办呢？她嚤嚤地啜泣着，她真不愿意承认这严酷的现实，假如他真的死掉那该多好啊！

现在，无论是陶解放还是顾萱，都无法自拔，都禁不住向记忆的底层去搜寻昔日种种遗迹——所有的欢乐、痴情、辛酸和痛楚！

让有幸的读者同我们的主人公一道，带着追忆的泪水去看看封锢在时间仓库里的往事吧……

松潘草原月夜的童话王国

陶解放与顾萱的相识，是以姐姐陶和平为媒介的。这段悲欢离合，实在具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戏剧色彩，她不知道应当感激姐姐对，还是怨恨姐姐对。

陶解放和姐姐陶和平是仅仅以 10 分钟间隔来到人间的，时值她们的父亲正带着一支队伍从东直门开进北京举行入城式。闻讯后，将军在敞篷汽车上给这对姐妹起了名。她们姐妹相貌酷似，有时连母亲都常常张冠李戴地喊错。她们一样苗条、漂亮，一样聪明、俊逸，但性情却迥然不同了。从小在妈妈膝下长大的姐姐和平，文静、恬淡而娇柔，感情从不外露，人如其名。而自幼在长托班保育院长大的妹妹却截然相反：火辣、热情而胆大，事事喜欢拔尖，也是人如其名。文静也罢，火辣也罢，在历史大潮推起的时候，她们凭着青年人的锐敏和热情，都站到了潮头。那是 1966 年冬季，陶和平穿起爸爸的旧军装，乘火车赶到江西。从兴国县步行出发，决心沿着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路线走遍大半个中国，目标当然是延安。可惜妹妹不能同行，她有文采，有组织才干，正担负着红卫兵战报副主编的重任。这当然是不能须

史离开的角色。

转年春天，当陶和平的小长征队进抵贵州遵义时，发生了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她被同伴开除了！理由是陶和平反对点火串联、揪斗一个市委副书记，她不同意到处当救世主。

陶和平是个外柔内刚的姑娘，当年爸爸走过的路神奇地呼唤着她，她被同伴抛弃后，哭了一阵，就只身上路了。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坏天气里，陶和平在黔北山里迷了路。她在一座方圆不到 5 里的山头兜了一天一夜，直到冻饿交加昏倒路旁。幸好有一个带着指北针的大学生救了她。这个大学生是 1965 年考入北京农业大学农机系的顾萱，他是给农大长征队打前站勘查路线的。

人总是感激援救过自己的人。虽然感激并不等于爱情，但感激的河海里却常常能陶冶出爱情的真金来。单纯的女中学生发现，顾萱和所有的长征队员都不一样，他的背包重得出奇！他随走随采各种植物标本，甚至连各种土壤都抓起一捧，他常常落到大队后头很远。后来，当陶和平得知他是借长征机会研究中国土壤结构分类和地表植被状况时，她肃然起敬了。大约出于感激和敬意，当顾萱邀请她加入大学生长征队时，她快乐地答应了。

从此，陶和平像个小妹妹一样尾随在顾萱身后，一路上替他泡制、保存标本，度过了一百多个日日夜夜。

好景不长。有一天，陶和平在驻地刚给妹妹拍去一封电报，下午就收到了妹妹的加急回电。她拆开报纸，先是发愣、发傻，后来便抽泣起来。尽管大家围过来追问事由、百般抚慰，都无济于事。这个城府深严的小姑娘死也不肯把电报拿给别人过目。她哭过了，拴束好背包，固执地要马上回北京去。

没有人能劝住这个温柔而又执拗的姑娘，又都不放心让她一个人赶山路。要知道，从长征队驻地赶到通班车的最近的小镇刷经寺，也有一百多里路啊！最后大家商定，只好由她信赖的顾萱

送她赶到刷经寺之后，他再赶到阿坝与长征队会合。

长征队北上了。顾萱和陶和平站在开满鲜花的草地上，直到望不见长征队的影子，顾萱才哄劝道：“我们走吧！太阳都快平西了……”随后像往常一样，接过她的背包。

女孩子的心，有时像一泓春水那样清澈，一眼见底，有时却又显得深不可测。以前，陶和平在长征队里成了顾萱的影子，好像只有顾萱才能护卫她。可是，一旦脱离了队伍，她反觉生疏起来，仿佛此时惟有她自己才能护卫自己了。

春天白昼短，他们走了一程，已经是黄昏时分。前面仍旧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茫茫草原，听不到鸡鸣、犬吠，望不见一缕炊烟。浓重的暮色轻捷、迅速地从草原边际垂落下来。他们不得不露宿草滩了。

顾萱解下背包，拿出面包、果酱和行军壶，摆放到陶和平面前，自己一边嚼着干面包，一边到远处拾了一抱干柴、枯草，寻找一个背风的洼地，铺下去，然后打开两个背包，一条被子铺在干柴草上，另一条卷成被卷。

草原的初春，寒风料峭。高原的夜空蓝得出奇，不像是天穹，倒像是一幅在暗光下涂厚了颜料的油画，有些假。

顾萱燃起一堆篝火，两个人在火堆旁孤坐了一会儿。顾萱拍拍尘土站起身，对她说：“睡吧！”

陶和平本来应当问一句：“你到哪里去睡呀？”可她问不出口。又想问，又怕问，犹豫之间，顾萱已经走远，身影消失在蓬草丛后面。姑娘忽然感到一阵战栗，不知是夜寒还是恐惧，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孤寂。她真后悔，却又不愿张口喊他回到身边。

突然，顾萱又折了回来，他在快要熄灭的篝火里又加了一把耐燃的湿树枝。犹豫了一下，蹲下身拾起两根背包带，接系在一起，一端扔给陶和平，另一端拴在自己手腕上，轻声说道：“别害怕，我就在你跟前——喏，两根背包带这么远。你害怕的时

候，就拉一下绳子，行吗？

不知为什么，陶和平的鼻子有点酸，她想哭，可又哭不出来；她想点头应允，脖子僵直又点不下去，她真不知道应当怎样感激这个有些腼腆的大学生。她到底什么表示也没有，眼望着顾萱渐渐走远，手里拖着那条长长的背包带。

陶和平仰面躺在散发着潮土和野草幽香的草地上，望着万点银星的苍茫河汉，恍如置身童话王国里，浮思纷繁，哪里能够入睡啊！她觉得那又高又深、又蓝又亮的天宇就是顾萱那坦荡的胸怀，那闪着耀眼光亮的星辰，就是顾萱那诚挚的、不搀一点杂念的眼睛……她思前想后，越想越不能入睡，用最笨拙的办法，一颗一颗地数星星吧：一、二、三、四……可是数着数着，却禁不住走了神：他……现在睡了吗？他没有铺盖，露水要打湿他的衣服吧？唉，你在想什么呀？查数！五、六、七、八……我太不尽情理了，为什么对人家这么冷漠？为什么不该把他叫回来？两个人围着火堆谈上一夜不行吗？不，不，该死！一个女孩家，尽想些什么！呸！查数！十、十一、十二……

星星是数不过来的，像女孩子心里的情丝理不清一样，她第一次陷入了又甜蜜又伤神的烦恼之中。

茫茫的松潘草原真静啊！陶和平忽然觉得，自己走进荒漠、离奇的神话天国里，令人神往而又不可思议。

她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拉动了背包带。

像掀动机关一样，顾萱守护神一般立刻出现在她面前：“怎么了？害怕了吗？”

陶和平慌乱地摇摇头，脸孔烧得厉害。

顾萱望了她一眼，宽厚地笑笑，鼓励她几句，悄然走开。

过了一会儿，陶和平又拉动了背包带。这一次她可不能用莫名其妙的摇头来蒙混了。她清清楚楚地听见自己心房怦怦地跳动着。她明白，这里没有狼嚎虎啸，她又不相信鬼怪，有什么可怕

呢？一点言之成理的根据都没有。她不得不暗暗承认：她愿意顾萱留在自己身边。

这次顾萱没有发问，只是探询地望了她一眼，添过湿柴，转身要走。

“你……”陶和平觉得自己的喉音都在打颤了，“别走了，就坐在这儿吧……”

顾萱似乎感到有点意外，再次把探询的目光在她那绯红的脸颊上扫了一下，刚要拣个地方坐下，只见陶和平坐起身，向一边靠靠，让出半个铺位，用手拍了拍。

顾萱悄悄坐下来，他们之间保持了一点有限的距离。散发着陶和平体温的被子使顾萱感到周身一阵温暖，他仿佛嗅到一股清幽好闻的气息。

篝火重新燃旺，陶和平替顾萱烘烤着被重露打湿的外衣。两个人都缄默着，只有火舌被夜风鼓荡着发出噼啪的声响。在这广大而静谧的草原之夜，言语显得多余，彼此不是可以听到心跳吗？心照不宣的话儿一经说破，也许就乏味了。

过了一阵，陶和平把烘干的外衣替顾萱披上，发现他正在摆弄一个有机玻璃盒子。这盒子很漂亮，里面是丝绒衬底，如果用来镶嵌首饰、珍宝，不会令人奇怪的。可是陶和平知道，盒子里的许多小格里，却填充着青、赤、黄、白、黑各种颜色的土壤，她曾经嘲笑过顾萱：“什么破宝贝！”可是顾萱却说：“这是祖国从南到北的热土，靠着它，中华民族的子孙得以生存，这是无价之宝啊！”

现在，他难道又在琢磨这无价之宝吗？

陶和平柔声问道：“你……又在想热土吗？”

顾萱顺手抓起一把黑黝黝的腐植土，像珍视珍珠一样在手心里搓弄着，说：“多好的团粒结构土壤！可惜啊……”他顿了一下，像诗兴勃发的诗人一样说道：“你看，松潘草原的夜多么迷

人啊！你闻到沃土的香味了吗？我在想，三十多年前红军脚步从它这厚实的胸膛上踏过的时候，它就是如今这榛莽遍地的样子吧？再上溯到更久远的年代，怕更是荒凉无人问津了！总有一天，松潘草地要结束蛮荒未开的处女梦。祖国大地将要用机械化代替刀耕火种，把几千年来祖宗留下来的弯钩犁请进历史博物馆！”

陶和平本来认为种地是最简单的劳动，甚至认为它是可以不要文化、科学的。顾萱为什么要考农业大学？今天，从他热得烫人的话语里，她悟出了真谛。

见陶和平不语，顾萱反问了一句：“你不认为我说得对吗？”

陶和平轻轻一笑：“我可没想那么远。”

顾萱道：“和平，你高中毕了业，就考农学系吧，研究土壤也有趣，植保专业更吸引人，要不，就学园艺……”

陶和平听他无休无止地谈起本行来，不无悲伤地说道：“你心里除了土壤、植物和农业机械化以外，再没有别的了吗？”

顾萱歉疚地笑笑，道：“我……不敢问哪！我当然想知道你收到了一封什么电报，但我不强人所难，我不愿意去触动别人不打算公开的事情。”

陶和平被他的诚实打动了，她含羞带笑地斜了他一眼，用温和略显责备的口吻说：“你呀……我不愿意在大家面前说的，不等于对一切都保守秘密……”

这是埋怨，然而有时候埋怨的语句比恭维和奉承来得亲切、真挚。

顾萱不由自主地向她靠近了一点。陶和平呢，却是毫不掩饰地推他一把，自己向一边挪了挪身子，重新拉开了距离。但是，空间拉开，两颗心却几乎没有间隔了。

姑娘出于自尊而不愿让人知道的事情，未必想瞒过亲人。她告诉顾萱，爸爸、妈妈在同一天被捕入狱，原因不详，妹妹再莽

撞，当然也不会在电报里直言不讳。

她告诉了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偷望着顾萱，生怕他会因此而看不起自己。

意外得很，顾萱没有惊奇，也没有一丝一毫的轻慢：“这……是应当想到的。游街的、示众的‘走资派’何止万千！连我父亲——一个一生埋头学术的人都住进了牛棚……”说到这里，他转换成安慰的口气说：“别难过，回到北京就知道原委了，天塌不下来……可惜，我帮不了你什么忙。”

一席话，说得陶和平伏在他肩头上低声啜泣起来。理解，往往比拔刀相助还要暖人心肠，她还能有何求？

代写情书的人

陶和平一路并不顺风。由于进京上访、告状的团体一再包占火车，她足足在路途中多耽搁了半个月。

陶和平的家在北京城东南郊龙潭湖畔，本来就是个清幽所在，此时就格外冷清、凋敝了。春天来了，院庭几株杏树迟迟不开，丁香树丛在寒风中瑟缩地抖动着枝条。

她从光明楼 8 路汽车站一走出来，心情就阴暗得很。打开门锁，到处是劫后的景象：废纸飘零，一股霉味。警卫员、司机、厨师全都走了，她的家和 960 万平方公里大地一样，翻了个个。

她沉郁地从书房、客厅走到自己的卧房，一点生气都没有。看来妹妹这个疯丫头不常回家，厨房里盆朝天、碗朝地。她痛苦地坐到客厅中那满是尘灰的长沙发上，疲惫极了，不知道该怎么办。

闷坐了一会儿，她决定先到几个熟悉的伯伯、叔叔家里去探询一下，正要锁门，却见房门信报箱里倒插着一封写给她的信，字迹生疏，发自延安。啊，难道是顾萱寄来的吗？不会有别人！

她心跳得不行。

果然不错，她先看了落款，正是他。

可是读下去，陶和平不能不满腹狐疑了。看信中的语气，好像他们之间已经通过了两次信，见鬼！他疯了吗？他干吗要这样写？“……两信俱收，免念。我万万没想到，你那恬静、温和的胸中藏着一颗热烈奔放的心，你的每一字、每一句都是一把火，把我周身的热血点燃……”

陶和平百思不得其解。你说他神经错乱吗？他甚至知道爸爸、妈妈是报纸上正在“揭露”的“61人叛徒集团”里的，是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出来的“投敌变节分子”……真是叫人纳闷。详情，连陶和平自己还不得而知呢。

她真的坠入五里雾中了。

晚上，跑了一天的陶和平回到家里，见房门半开半合，从厨房风窗口透出一股炒菜香味。不用问，妹妹陶解放回来了。

姐妹俩在厨房门口猝然相见，陶和平忍不住一阵心酸，一切委屈都化成了眼泪。妹妹呢，却嘻嘻哈哈，替姐姐擦去泪痕，摇晃着菜勺子说：“哭什么？爸爸、妈妈还都活着，没到送花圈的时候呢。”

陶和平责备地瞪了妹妹一眼，说：“你什么时候能懂事呢？”

妹妹顺手解掉围裙，向厨房一甩，说：“哭鼻子如果算懂事，那太容易学了，我一出生就会。来，吃饭，民以食为天嘛，我给你接风、洗尘。饭后，我带你去探监，你敢不敢去，和平？”

因为姐俩同龄，陶解放对姐姐向来是直呼其名，她甚至顽皮地当妈妈面说过：“凭什么叫她姐姐？也许是我比她早到人间10分钟呢，说不定是助产士记混了！”连妈妈都拿她没有办法。

和平吃了两口饭，说：“听许伯伯讲，爸爸、妈妈的案子是中央文革那个顾问亲自抓的，不容易探视吧？”

“屁，顾问算老几？”妹妹一边盛饭，一边把铝勺敲得叮当

响，“怎么叫叛徒？那是中央批准、北方局三令五申命令履行手续出狱的。这么颠倒是非，今后还有没有个真理？”

“你要找死啊！”陶和平吓得要去捂妹妹的嘴，“你说话总是这么没深没浅……”

陶解放夹起一块黄花鱼塞到姐姐碗里，说：“秉性嘛，上帝也拿我无可奈何！你是和平型，我可是解放型，什么框子都别想束缚我，我是齐天大圣！”

妹妹的话，能说一点道理没有吗？午后和平听许伯伯说，61个“叛徒”的事，是旧事重提而已，远在中共召开七大时就有人提出过指控，当时中央包括毛主席都表示知道这件事，而且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在通过爸爸代表资格时，有审查结论。为什么事隔二十多年，又可以把同一个中央的结论推翻呢？

吃过晚饭，陶解放一边拾掇碗筷，一边问姐姐：“和平，长征路上新鲜见闻多吗？南朝北国，都讲给我听听。”

陶和平望望妹妹嘻天哈地的样子，轻轻叹口气，说：“我哪有心思讲什么新闻？”

陶解放仍旧嘻嘻哈哈地揩着手，说：“那你就哭好了，哭上它十天十夜，也许能把牢狱的砖墙泡塌……哈哈，没心思？我的心绪可并不坏，你想听吗？我还要给你讲，我是怎样由响当当的‘红五类’的金字塔尖上掉到‘黑五类’无底深渊里去的……”说到这儿，她冷丁瞥见姐姐臂上还佩戴着红卫兵袖章，口气又转为讥诮地说，“大小姐，你已经不配戴它了！你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你是‘黑五类’了……”

陶解放的讥刺像锥子扎她的心。她难过地撸下袖章，用手抚平……突然伏在桌上失声地哭起来。

姐姐哭，妹妹却在乐。陶解放抱着肩在客厅里踱来踱去，说：“哭也算一种战斗吗？有哭的精神头，还是多想点‘为什么’吧。从前，我们在父母的红罗伞下，享受着保护。现在，不管真

假，红罗伞没有了。我们该想想，今后怎样做人、怎样生活？”

陶和平止住了哭声，她不能不细细地品味妹妹的话，她不得不承认，妹妹是有思想的人。

陶解放不但有思想，也有能量，她有五关斩六将的本事，居然带着姐姐会见了狱中的父母。据陶解放自己说，她从来没有靠别人帮助，就见过父母三次了。

回到家中，陶和平渐渐安静下来，不过仍然免不了愁眉深锁，长吁短叹。

陶解放在桌上描图，很专心，姐姐感到奇怪，问道：“你这是……”

妹妹说：“我退学了，在黎明农机修造厂当了描图员。我得自立了，不能吃白饭，造反派的混战，我早就腻了。”

陶和平的脸埋在手掌里，心头阵阵酸楚。

陶解放回头望望姐姐，忽然想起什么似的跑到书房去，旋即拿来两封信，在手里摇着，说：“和平，你的信！同一个人的笔体，我怀疑你在长征路上找到……朋友了！哈，你坦白不坦白吧？从前咱俩可有君子协定，针鼻儿大小的事不行互相隐瞒！”

陶和平夺过信，不用拆封，也知道是顾萱的头两封信，信沉甸甸的，厚得超重一倍。她觉得妹妹稚气得好笑，儿时的“协议”现在还有什么约束力？于是她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把信顺手丢到茶几上，说：“你净胡扯，什么朋友？”

精明的妹妹却不饶她：“你敢嘴硬？找朋友又不是见不得人的事。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天经地义。哼，我可不像你，口里说一辈子不找，谁知道心里咋回事？若是我，就敢做敢当，假如明天碰上个对心思的，后天就领回家来让你相看。你有这份胆量吗？”

“死丫头，”陶和平红了脸说，“不害羞。”

“我是不害羞的。”陶解放挑战地说，“你说不是朋友，你当

我面拆读，敢不敢？’

陶和平真拿这个调皮的妹妹没办法，没心思跟她胡缠，又想尽快了结这场不合时宜的谈话，叫妹妹释疑。就假作无所谓的神态扯开两封信封口，抖出信笺，煞有介事地皱眉看了看署名，故意绷起面孔说：“顾萱？笑话！我从来不认得这个人。”

陶解放见姐姐在作戏——居然显得讨嫌的样子把信掷下，就一把拾在手中，说：“哪来这么个一厢情愿的讨厌家伙。既然你不认识他，干脆烧掉，免得看了叫人恶心！”说完抓起火柴就要点火烧。

陶和平脸都吓白了，心里一阵怦怦乱跳。她知道，妹妹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她赶紧夺下信，说：“算了，谁要你多管闲事！呆会儿我自己烧。”说完，走向自己的卧室，关上门，门外传来陶解放放纵的笑声。

姐姐有内秀，妹妹更是精明毕露。她淘气地躲在姐姐房门后，隔着门玻璃观察陶和平如醉如痴地反复看信的神情，忍不住想笑。

夜已经深了，陶和平还在台灯下出神。桌上散乱地扔着几页写了半页的信笺，她觉得纸短情长，不，是力不从心。写上一封复信，比从前中了进士以后在金殿上当堂会试写“对子”还难。她要说的太多，而一落到纸上又太少、太干瘪，她恨不能笔下生花。唉，假如自己有妹妹的才思敏捷，有妹妹的文采、手笔，该有多好啊！

正当姐姐被甜蜜的苦恼困扰着的时候，妹妹笑嘻嘻地赶来救驾了。她披一件长长的睡衣，头发披散到肩后，疏懒而又玩世不恭。她飘飘然地转到桌前，一阵小风带起桌上几页废信纸满地飘飞。陶解放顺手抓起一张，看了一眼，念道：“哈，顾萱同志，信悉，免念……喔唷，酸得我快要淌口水作呕了！和平，你真行啊！用哲学家的冷静，道学家的古板，酸腐书生的八股尺牍模式

写情书吗？我打赌 100 次要失败 99 次！”

陶和平轻轻夺下信纸团成一团，脸刷地红到耳后，啐了妹妹一口：“你顺口胡诌些什么呀？你还像个姑娘家吗？”

陶解放抱起双肩笑道：“我嘛，是个百分之百的姑娘家。心里是一团火，放出来的高温是五百度，表里一致。不像你，自己心快烧焦了，奉送给别人的却是一根冰棍！”

陶和平被妹妹一语道破了苦恼的症结，语塞半晌，反唇相讥道：“别贫嘴了！等你自己碰上这种事，你还不如我呢！”

陶解放格格一乐，道：“不见得吧？我不是空谈家，是有过实践的。你信不信？我写过两封洋洋万言的情书，能熔化一切！拿出去发表都够水平。”

陶和平的脸红得像萝卜，她被妹妹这种不知羞臊的话弄得羞臊不堪。她自己也不知道，是替自己还是替妹妹羞臊。

陶解放的脸却不红不白，一本正经地说：“不过，我写情书是替他人做嫁、代人抒情。实话告诉你吧，你看了这两封信该明白，你和顾萱的一切，包括松潘草原用背包带结起来的情丝，全都掌握在我手中了。我坦白，我私拆了这两封信，看过又糊上了封口。你别骂我，反正我们的宪法也不保护你的人身自由，我也不担心受到法律制裁。你应当感谢我，我替你给顾萱回了两封长信！”

陶和平尖叫了起来，随后双手掩面，好像她听到了大逆不道的事情。恨妹妹吗？恼妹妹吗？不，不，都不是，自己不是断言过吗？为了满足好动、好奇的个性，妹妹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虽然是不可思议的。这个疯丫头，不但私拆姐姐的情书，还要捉刀代笔，真是叫人啼笑皆非……

哭也罢、笑也罢，世上好多事都是在哭与笑当中存在的。谁也不能想像，陶和平在万般无奈时，竟然冒出一句连她自己都吃惊的话来：“你别净说嘴儿！你有本事，当我面再给顾萱写一封

复信，我不信你能知道我心里想什么、要写什么？

妹妹哈哈一笑，居然大模大样地坐在陶和平方才的位置上，说：“试试看吧。你所有的神经兴奋点都在我心里呢！你信不信，和平？”

不能说陶解放口出狂言。你看她只把顾萱的信粗略浏览一遍，便刷刷点点、如行云流水般地写下去。那些饱含着深情的话语像淙淙流水，从她的笔尖流到纸上，直到把陶和平看呆了！妹妹居然能洞穿自己的内心，把自己无法表达的感情化成语言倾泻纸上，这使她产生了一种幻觉：那支刷刷移动的笔，仿佛是受自己神经支配的。

终于，妹妹掷下笔，逢场作戏地一歪头，道：“满意吗？你看我是不是可以在王府井街口摆个摊子，挑上个‘代写情书、酬金凭赏’的幌子？”

陶和平就势俯下身抱住妹妹，吻着她的头发，轻轻笑骂一声：“死丫头！”

虚构的爱情和实实在在的科学

爱情也能虚构吗？除非是小说。

然而，生活中却真有这种似乎过于离奇的事情发生。

半年来，代写情书的陶解放被一种初恋的大火包围着，她无论怎样左冲右突，都无法逃脱可怕的火网。她真想跺跺脚高喊一声：“自作自受！”是啊，这能怪谁呢？她觉得自己是玩火者，被焚是自然的。

与素昧平生的顾萱通信，不知不觉间已经成了陶解放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名义上她仍旧是替姐姐传书递筒。可是，她不能不承认，每当她提起笔来给顾萱写信时，她不再像开初那样悉心尽力地去揣摩姐姐的内心情感和陶和平具有的

独特秉赋了。她几乎按着自己固有的喜怒哀乐，任性地抽掉心扉的闸门，把浩大的青春波涛潮水一样倾到纸上，去冲击那个滞留在汉中农场的既熟悉又陌生的大学生。从这时起，她再也说不清，是在替姐姐言情，还是传递自己心灵深处的呼唤，她陷入了不可自拔的境地。

陶和平当然热切地盼望顾萱早日回京。陶解放就有点莫名其妙了。她又想尽早见见这个与自己“笔谈”了半年的虚幻的影子，又盼望他永远呆在汉中，希冀这甜蜜的、虚幻的爱情之塔能像沙漠中的蜃影一样长存……

终于，陶解放不能不做出最后的抉择了。

这一天，陶和平接到一个电话，是顾萱从火车站公用电话间打来的，说他已经从汉中回到了北京，并约陶和平午后两点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前会面。

再腼腆的人碰上久已悬望的喜事，也会有些忘情的。陶和平第一次想到打扮自己，站在穿衣柜前，拿出几件衣服比量来比量去，到底拿不定主意，就大声喊隔壁房间的妹妹来当参谋。

其实，妹妹就呆愣愣地坐在她身后不远的沙发里。姐姐喜盈盈像去迎接天使，妹妹戚戚然宛如要去开追悼会。

有人说，世上惟有爱情是自私的。从前，陶解放没有去探讨这个说法的真伪，因为她没有发言权。可现在，目视着着意梳妆的姐姐，她不得不承认这句话是有道理的了。不然的话，你这个当妹妹的应当替姐姐高兴，何以内心有一种酸楚、悲戚和莫名的嫉妒呢？陶解放觉得脸颊烧得厉害，她意识到，自私的、可卑的是自己，而不是姐姐。自己在和平与顾萱当中，是多余的第三者，是感情的贼！想到这里，她不觉战栗了一下。但是，她又不能骗哄自己的心，那日益滋长起来的绵绵之情，是现实的，不是用理智和几句自我谴责就能够平息掉的。是啊，在书来简往中，她把自己的一切、一切都托付给了那个顾萱，她也从顾萱的字里

行间，看到了一个理想的化身。一想到这些，她又有点麻木了：书信往返中的海誓山盟到底是自己的呢，还是姐姐的？应当说，是姐姐的形体、自己的灵魂。可惜呀，这为顾萱所熟悉的灵魂是不可能附托给他所熟悉的形体了。

走，远远地走开！忘掉这一切！

突然间，陶解放心中升起一个无比坚定的信念，道德、良心以及姊妹间毫无猜忌的信赖，一霎间推倒了陶解放面前一切虚构的、五光十色的爱情的楼阁！她不能像贼那样从姐姐手中夺到自己不应当得到的东西。如果说这是痛苦的，那就让种下苦瓜的傻瓜自己去品尝吧……

陶解放这样做出了决定，仿佛移开了压在心扉的巨石，长长舒了口气，但止不住流下两行泪来。

妹妹从家里出走了，再也没有回来，她没有胆量和勇气见上顾萱一面。而后来当顾萱从陶和平口中得知所有的情书都是出自解放手笔以后，他倒极想见见这个具有特殊秉赋的妹妹。为此，陶和平三番五次给解放打电话，但陶解放一再寻找托辞，始终没有回来过。顾萱也好，和平也好，哪里会想到这段公案呢？

有一天，顾萱邀陶和平到家里玩，陶和平很想看看学者的居宅是什么样子，她痛快地答应了。

如果说顾萱的家也叫家的话，那要比劫后的陶家狼狈多了。和平这个从不关心科学的人，却知道顾萱父亲顾仰泽的大名，据说，这个农学家所著的专著、论文和大学讲义堆起来比他本人的个头还要高半尺。陶和平无论如何想不到，这个著名学者是在这样一间不足 10 平方米的房间起居、会客、工作、著书立说……

陶和平差点流出泪来，她在乱七八糟堆满中外书刊，摆满零乱土壤、农作物标本的小屋子里几乎没法转身，顾仰泽被关进牛棚，他儿子的床就架在书堆上，歪歪斜斜，像随时都可能坍塌的

样子。

过了一会儿，从公共厨房里端来两碗盖浇饭的顾萱走进屋来，用胳膊肘子把桌上散乱的书藉向一旁推推，腾出刚能放下两只碗的地方，对她说：“吃吧，我惟一的手艺，就是千篇一律的盖浇饭，你别嫌弃。”

陶和平一点食欲都没有，她凄然问道：“你们……一直住在这里吗？”

顾萱大口吃着饭，说：“从前有四间房子，父亲被关起来反省，就扫地出门了。”

陶和平沉默着，为了不使顾萱扫兴，她勉强吃了半碗饭，比吃药还难过。她望着桌上摊开的资料、笔记，还有有机玻璃的土壤盒，她知道，这都是子承父业的见证。顾萱啊，你哪里来这么一股劲头，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从事农业科学研究呢？

顾萱的回答是朴实无华、甚至有点出乎陶和平意料之外的：“凭良心，对母亲的良心。父亲在牛棚里还在著述呢。”说毕，他从一本厚书中抖出一片香烟盒纸壳，在背面有一行字：萱儿，不要辜负了爸爸给你起的名字。萱草象征母亲，要把一切时间都花在为祖国农业现代化上，切莫为父担忧。对科学的恒心、对人民的赤子之心，还有做人的良心不允许你中辍。倘你荒芜了学业，无论什么原因，祖国都不会宽恕你的。父示……

陶和平的目光久久停留在几行潦草的字迹上，一个受尽屈辱的学者从牛棚里捎出来的字条没有一丝一毫的忧怨，反倒是对社会主义祖国不贰的忠贞，多么难能可贵呀！难怪顾萱有别于同龄青年，他有一个多么正直的爸爸啊！

她突然说：“我给你当徒弟、当助手，你要吗？”

顾萱没有说什么，望了她好久，突然把她搂到了怀里……

他们不是殉情者

转眼到了秋天。

重阳节这天，陶和平把打了几个夜班替顾萱复制好的图纸卷好，等他来拿，她还特地跑到崇文门花店买来两盆金菊花，摆放在客厅中央。她已经半个月没见到顾萱了，他忙得不可开交。据说，一家农机研究所对顾萱设计的圆形喷灌机、电子操纵精量播麦机很欣赏，认为这是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农业机械。陶和平推断，说不定这批图纸交上去，就可以投入试制呢。

为了顾萱的成功，陶和平打算搞一餐丰盛的晚饭，可惜打了几次电话，妹妹都不接。

一切都准备就绪，单等顾萱光临的时候，电话铃急促地响起来，是妹妹陶解放打来的。一听是妹妹的声音，陶和平就又气又疼地说：“死丫头，找你比见皇上还难，你快回来……”

但是，妹妹又尖又响的嗓子抢去了话头：“和平，别说不咸不淡的话。你干吗半个多月不去见顾萱？我告诉你，他都快疯了！”

只有这么短短的几句斥责，妹妹就撂了电话。陶和平半信半疑，是妹妹有意夸大其词吧？再说，她怎么会知道得比自己还清楚？见鬼！

事实证明，陶解放没有谎报军情。

当陶和平夹着图纸赶到顾萱那里时，他把自己锁在屋子里正在发疯，他大声叫喊，好像跟谁吵架。陶和平趴窗一望，屋里除了他自己再没别人。只见他一拳一拳地砸下去，把标本打得七零八落。

陶和平拼命叫门，他不开。后来她都快要哭出来了，顾萱才猛地拔掉门闩。

屋子里充满烟雾辣气，满地烟蒂。多可怕呀，他几时学会抽烟了，不，还有酒瓶，酒气正从他身上散发出来。你看顾萱的神色，更是骇人：头发和胡须蓬乱得像个囚徒，脸颊消瘦，眼睛充血。他又着腰，可怕地瞪着陶和平，好像和平是他心中的魔鬼！

陶和平又惊又怕，心疼得落下泪来，一迭声叫着，“顾萱，顾萱啊，你……怎么了？”

顾萱不认识似的盯着她，突然可怖地大笑起来，笑得陶和平毛骨悚然。笑够了，他大声问道：“你来干什么？你拿的是图纸吗？把一切直线、曲线给我统统抹掉，留下一张白纸好了！因为，当权者不需要文化，不需要科学。人们越愚昧越好，那样，母亲就可以任其宰割了！母亲啊……”他忽然又捶胸顿足地哭起来。

陶和平把图纸夹得紧紧的，惶悚地后退一步。她真怕他一时鬼迷心窍，会把心血的结晶毁于一旦。

难道他真的精神失常了吗？应当说，至少是轻度的，你看，他把平日视为生命的书籍、标本都砸烂了。陶和平一眼看到了盛装各种土壤的有机玻璃盒子，她真怕顾萱把这个也砸掉，就悄悄走过去揣在兜里。

如果说，一切肉体的、物质的苦痛都可以克服，惟有剥夺你为科学献身的权利，叫人无法承受。

顾萱怎么能够不急痛攻心，怎么能不万念俱灰？

他的爸爸被毒刑拷打，吐血死了。在老学者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儿子在场。顾仰泽声音微弱地提出了生命终止前的最后要求，他抖抖嗦嗦地从枕头芯里摸出一束学术论文原稿，要求交给中国农业科学院。可是，当他的儿子顾萱跪下去双手承接时，有一个狂徒凌空夺走论文稿，他狂笑着说：“无产阶级稀罕你这反动权威的臭东西！你听着，顾仰泽，让你的稿子化成纸钱、阴大洋，去打发西南大路的拦路鬼吧！”说毕，划根火柴将这束凝

聚着科学家血和汗的文稿付之一炬，烧成了灰。就这样，老科学家睁着一双闭不上的眼睛惨死了。顾萱扑上去失声恸哭：“爸爸啊，爸爸，你闭不上眼睛吗？你一生的心血都浇在祖国的热土上了，难道，你只是求得让一隅黄土埋掉你的一把骨头吗？爸爸呀……”

父一辈被剥夺了从事科学研究的自由，子一代的命运并不比父亲强。过了几天，当怀里揣着一盆火的顾萱拿着第一批草图到农机研究所去洽谈时，又是兜头一瓢冷水浇下来。还有什么研究所可言？所有的门窗都钉上了木板，只有一个留守人员坐在冷冷清清的大树下喝着冷茶，看着落叶飘飞的院庭……

完了，研究所被解散了！所有热心于农业现代化研究的人员一律被遣送到遥远的雷州半岛“五七干校”，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去改造了……

爱情，据说是回天之力的。可是，爱情在科学工作者的天平上，只不过是个小小的砝码。尽管陶和平把顾萱拖离了那个会使他触景生情的小屋子，可他仍然平静不下来。他实在承受不了这个打击。他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中国会不要科学。他连夜写了一封给中央文革小组的信，一式几份。有一份公开贴到了中央文革接待站的门前，他署的是真名实姓。

顾萱闯下了大祸。当天晚上，公安军事管制小组的摩托车包围了顾萱的家，搜查了他学校的寝室。他有幸呆在陶家，才没有被拘捕。

此时，夜阑更深，吞了几片安眠药的顾萱正在熟睡，陶和平哭得泪人一般守候在他床前。她刚从市里回来，她意识到顾萱的下场是进监狱。难道她所有的亲人都与监狱结下了不解之缘吗？

陶和平走投无路，无法张开爱的羽翼来保护她的亲人，她一点办法都没有。

正在这时，一直避而不见的陶解放突然闯进家门。一进屋，

见姐姐守着顾萱流泪，就用鼻子哼了一声，走过去拼力把顾萱拖起来。她气不打一处来，把一张传单样的纸片往桌上一拍，说：“我以为英雄早就投案自首去了，却在这里扔眼泪炸弹！呆子们，看看这张通缉令吧！”

果然是一张印有顾萱照片的通缉令，罪名是“攻击中央、攻击社会主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求务必捉拿归案，只差一条“悬赏”了。

陶和平心里乱得不行，只好向妹妹求救。她知道，妹妹的点子比自己多。

陶解放又挖苦了他们几句，一挥手，说：“好了，离开北京，到大连去！到咱姨妈家去，那里是乡下，不至于草木皆兵。走法，我都安排妥帖，天亮前，工人造反司令部有一辆吉普车去大连捉拿在逃的走资派。你们快收拾吧。”说毕，从挎包里掏出两套旧军衣、袖标，扔到床上：“快换。”

顾萱无可奈何，只好逃。他戴起眼镜，又卷起图纸，揣起土壤标本盒，哪样都舍不得丢下。

陶解放又气又笑地走过来，一把抓下他鼻梁上的近视镜：“你是生怕人家认不出你来呀！还要戴眼镜！”

顾萱不得不佩服临危不乱的陶解放，回想起她从前信里铮然有声的话语，感到文如其人。他真想和她长谈一次，可惜，离别时刻，也许永远不可能了……

就这样，山穷水尽的逃犯，就搭乘捉拿“逃犯”的车子来到了大连湾。

这回，连陶解放都疏忽了，她忘记了这是“统一意志、统一步伐”的岁月，哪里有世外桃源？顾萱和陶和平一到了大连乡下，就傻了！姨妈家的村口就张贴着一张捉拿顾萱的通缉令！他们真正感到了“法网难逃”的滋味。

姨妈不顾风险，倒是收留了这对苦难的情侣。可是他们在大连

连湾渔村还没有吃上一顿海味，北京公安军管会已经按着线索跟踪追来。幸好姨妈看到了停在大队办公室门前插着军管三角旗的吉普车，跑回家通知了陶和平。

于是，他们连夜划着小舢板子再次出逃。

这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大海黑沉沉的，偶尔闪出几点鬼火似的磷光。这对青年人在荒凉的海滩相对而坐，继而是抱头痛哭。中国之大，竟无一对热血青年的立锥之地！

陶和平抱着一卷子图纸，顾萱打开有机玻璃盒，凝视着从祖国东西南北中汇集而来的热土。他们凄凉地听着海涛的喧响。那海涛好像替他们呐喊，一声声喊出了他们心中的不平：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啊？

巨浪在黑色礁石下层层叠叠卷起来，发出柁人的吼声，又好像要把两个青年人一口吞掉。陶和平依偎在顾萱身边，感到心都要碎了。

不知过了多久，顾萱忽然在陶和平耳边说：“和平，从前人都说，人死如灯灭。你说，真会这样吗？”

他的声调凄楚而低哑，但在陶和平听来，却有如五雷轰顶那么可怕。她似乎明白，是一种什么念头正在顾萱的心底渐渐聚拢成形。她感到恐怖，紧紧地抱住他，好像一松手，顾萱就会永远、永远离去似的。

顾萱苦笑着。他抚摩着陶和平柔软的头发，轻轻吻着她冰冷的额角，语气里带着伤感地说：“还记得松潘草原的月夜吗？和平，我永远感激你。我在事业上失败了、失败了……只有你……还是属于我的，你……答应我，你能记住我吗？”

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他……当陶和平意识到顾萱有意结束自己的生命时，禁不住热泪横流，心痛欲裂。她想劝他，可是怎么劝呢？能说：“你活下来吧，先去坐牢吗？”

她突然迸着哭声说：“要死，我们一起去！你不能丢下我一

个人啊……”

看着哭得哀哀欲绝的陶和平，顾萱肝肠寸断，他心底吼出一个声音：不，不能让她殉葬，她还有希望，……可是，怎样支开她呢？

在生与死的抉择上，顾萱并不聪明，他对她说：“我有点饿了，你回村里姨妈家弄点吃的行吗？再要一点酒驱驱寒气更好了。你别胡思乱想，为什么要死呢？”

不知是陶和平过于幼稚呢，还是过于老实。听了顾萱的话，她当真答应下来，而且对他说：“你就在原地等我，我拿点吃的东西就回来。”

陶和平走远了，被无边的黑暗吞噬了。

顾萱心底呼唤着陶和平的名字，一步步向大海走去，带着他的图纸、盛着热土的盒子。

忽然，他身后响起一片溅水声。他猛回头，见一个黑影迅速追踪而来。啊，是她，陶和平！

陶和平不哭、不叫，她挽住顾萱的胳膊，平静地说：“走吧，咱们一道走！”

在这一瞬间，顾萱犹豫了。他感到自己无形中成了戕害陶和平的凶手……可是，他却身不由己地被陶和平挽着一步步走下深海……

然而，顾萱并没有死。意外地，他被一艘法国货轮打捞上来。不过，等他清醒过来时，轮船已经行驶在公海上了。……

良心的律师

夹着紫罗兰香味的晚风轻轻地吹过篱笆墙，陶解放从不堪回首的往事中抽身退步，感到备加迷惘和痛楚。她当然不了解事情的本来面目，她恨。应当恨谁呢？恨顾萱吗？是的，他是可恨

的，她多么希望眼前发生的一切不过是一场噩梦啊！然而这是事实。

陶解放始终不渝地爱着顾萱，即或是她得到顾萱与姐姐双双投海的凶信、辗转从姨妈那里得到他们写给自己的绝命书的时候，她也没有减淡一分对他的怀念。她曾经在1976年10月的日子里专程赶到大连湾，临风把酒，隆重地浇奠过顾萱、和平一回。她多少次在梦中看见他活了，不过梦境中他是作为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的科学家出现的，而不是以一个祖国的叛逆者的形象留在人间！

但是，骗人难，骗住自己更难。陶解放明白，一记耳光，它不过是安抚一下自己那受了伤害的心罢了，打在记忆深处的烙印，是刮不掉、洗不去的。她始终还保存着为顾萱开脱罪责的幻想，她甚至后悔自己过于鲁莽，为什么不可以通过万斯民老先生了解一下底细呢？现在怎么办？他会怎么样？

一条影子缓缓地向长椅伸延。

顾萱走得十分缓慢、吃力，每一步都似乎带着沉重的分量。

陶解放分明听到了沉重的脚步声，她没有回头，也没有躲闪，一阵阵风吹树响，飘荡在空间的细碎的玉兰花瓣悠悠然不肯落下。

顾萱在她背后停了很久，连叹数声，终于说出了下面一番话：“……我知道，你恨我，恨一个苟活者，被我害死了的和平……在九泉下也不会饶恕我。你们恨得对，我不想求得任何人的宠宥。不过，我积存在心中9年的苦衷，我得说出来，不是对你，是对我的母亲——祖国说的：我不是母亲的叛逆！”

陶解放头也不回，冷冷地说：“可你毕竟是站在法兰西的土地上！”

“但我从来没想到过加入法兰西国籍。”顾萱像为自己的良心辩护的律师那样说。

陶解放狠狠地说：“走开！我不认得你！我认识的顾萱早已经死掉，我在大连湾祭过他的忠魂。”说罢，她又委屈、又伤心地哭起来。是啊，从前她所熟悉的顾萱是试图把每一滴汗水、每一滴热血都浇灌在祖国热土上的有志青年，她崇拜他。正是为了这个，她才特地申请到了神秘而壮丽的松潘草原，为的是承继顾萱的未竟事业。可是，有谁能想到，这个人却在异邦的土地上屈辱偷生！

不管她听不听，顾萱只顾一口气说下去：“……我是有罪的，可我每一天都在用良心赎罪。在我给饭店洗盘子的时候，在我给人看葡萄园的时候，我的心一直向着东方。我曾经相信，总有一天，母亲被捆住的手脚会解开，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我多么想跟随你们一道飞回祖国去啊！但是……想不到你……也许你是对的，可是，我要说，投海的念头是绝望者的不理智表现……”接着，他像摆年表一样，陈述着自己被打捞到法国货轮以后的种种遭际，他说得很慢、很苦痛。

当陶解放听过顾萱这凝着血泪的陈述之后，她慢慢地转过头来，目视着显得憔悴、苍老的顾萱。

风儿悄然停歇，远处塞纳河也似乎平息了波涛。天地间奇静，仿佛留给人们更为理想的环境去回首往事、探索未来。

顾萱双手抖着，打开了一个有机玻璃盒子，从里面抓出一撮泥土，情不自禁地捧到鼻子底下嗅了嗅，一往情深地说：“这是祖国的热土，9年来，包括我投海的时候，都没有离开过我。一撮泥土虽少，可它是96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一部分，它是带着母亲体温的。”

陶解放觉得鼻子阵阵酸楚，她不得不侧过脸去，她不愿意让他看到自己的泪水。她的心乱极了，她不知道自己是同情他呢，还是仍旧像从前一样地爱他。该怎样评价顾萱走过的这9年呢？

顾萱拿来一束用红绒绳扎起来的图纸，双手捧起，轻声说

道：“我……多么希望能同你一同回到母亲的怀抱啊……这，也许永远不可能了。替我问候母亲吧。母亲可以不要她的不肖子，可是她的儿子却永远思念着母亲——无论醒时梦里。只要有一分可能，哪怕是以叛国罪被押上审判席，只要那审判席是设在祖国的土地上，我都心甘情愿……”说到这里，顾萱泣不成声了。

不，他不是叛逆！陶解放心灵深处头一次吼出了这个令她震颤的声音。她流着眼泪，双手替母亲接过那卷图纸，是否也同时替母亲接过了儿子一颗破碎的心呢？

良心是最公平的律师，正如历史本身的功过一样……

（原载 1979 年 10 期《长春》）

在水一方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诗·秦风》

香 巢

送往迎来，有欢乐，有眼泪，更多的却纯粹是应酬。

早年，白月娴几乎每天都跑北京站和东郊机场，像乘坐多年不变的市内交通车去上班的人们一样，来来去去，没有什么格外的激动。那时，她当着一个大部的办公厅副主任。

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1976年她从湖北干校回来以后，就没有再工作。机场、火车站同她的血缘关系断了，她连新落成的国际机场还没有机会去观光呢。

今天，这个68岁的老太太非要亲自来接站不可，而且要孙子多买了一张站台票，亲自走过地下道光线既暗、又硌脚的倾斜地面，来到第六站台上。

“倾巢出动”，这是儿子冯骏安的一句戏谑言辞。不假，几个儿子、女儿、孙子，全都跟白月娴来了，差不多塞满了一辆大象

牌面包车！

白月娴所以有这样的豪兴，完全因为今天的举动，将意味着结束她的未竟心事，像九层之台担完最后一簣黄土。

不是吗？长子冯骏安的媳妇江澜波将从那遥远的长江西陵峡飞回来，飞到白月娴垒成的香巢里，从此不再远离膝前了。老太太曾经开玩笑地说过，儿媳妇的名字犯讳，三个字都带水字旁，所以命中注定同江河湖川打了半世的交道。

白月娴站在充满柴油味的月台上，感到心里很踏实，她一点都不怀疑自己是个核心，或者说是个有巨大引力的恒星，子女们都像行星、卫星一样在她规划好的轨迹上运行，一步都不能偏离。

天不冷，大孙子冯安江却拿了一件斗篷给她披上，孙女冯丹江则打开一个活动马扎，叫老太太坐下歇歇腿。她都没有拒绝，笑眯眯的，心里甜丝丝的。她像雕塑师欣赏自己的杰作一样，把站在身前身后的儿孙们逐个打量一番，个个是仪表堂堂，都操着一口柔和的、稍带卷舌音的北京话，她听着极为舒服——地道的北京人。虽然她自己在这古老的都城住了30年也没有改掉扬州腔，可她却自认为是北京人，填写原籍她都这样填。她有自己的逻辑，一生中在什么地方住得最久，什么地方就是当然的籍贯。

她不封建，所谓“父母在，不远游”这样的孝道，她也不赞成。不过她千方百计把子女从四面八方调回到北京来，规划到自己的轨道上来，这是事实。说千方百计，一点都不过分。想起这些事，她难免打几个唉声。假如丈夫如今仍然坐在部长的椅子上，那她就无须费一方、施一计，子女的事自有人赶着去办。可惜老头子1974年死在监狱里，没有来得及看到那一纸平反公文，自然也没有再回到他应当坐的椅子上去。

用白月娴的话来说，她是“破上老脸到处托人”的。还好，多数战友（丈夫的战友、自己的战友）都还赏脸，连正在服役的

小儿子冯骏骥，都从遥远的地方调到北京来了，军人不好调，那就进北京步兵学校，上学深造还分什么军兵种？

讲起今天要接的儿媳妇江澜波，老太太并不太喜欢。这既不是因为她的没学问，也不是因为她不漂亮，隔膜是在气质上。她觉得，江澜波的气质不像冯家人，清高寡欲，天生一副寒酸相。在老太太的记忆中，只在结婚那一天，她穿过一套笔挺的毛料衣服（还是老太太逼她穿的），客人刚散，她又换上了“三紧”工作服。天晓得，老头子在世时，为什么惟独那样钟爱江澜波，两个人一有空就坐下来探讨什么居里夫人，仿佛那个死去的波兰女科学家离她更近、同她更亲。大概就是那时候吧，冯骏安给江澜波起了个并不难听的译号：“居里夫人。”

“居里夫人”就要到站了，也许火车过了丰台吧？也许她在收拾行李，把茶杯都装起来吧？她能想像得到北京车站第六站台上的隆重欢迎场面吗？她能想像得到就连经常卧病在床的婆母也到车站躬迎吗？

白月娴想像不出儿媳妇会是什么模样。仍然穿着褪光了本色的“三紧”工作服？仍然是从不擦发油的一头干涩的头发？她有七八年没回北京了，也许是个半老太婆了吧？唔，可能的，她今年不是45周岁了吗？属牛的，儿子骏安属鼠，大她一岁。风风雨雨中的45岁的人，同城里搽着高级护肤霜的同龄人比，那可大不一样了。啊，江澜波呀，你真像一只不驯的打渔郎鸟，半生漂泊，追逐着长江大河。如今，你总该厌倦了，想飞回到舒适的香巢里小憩了吧！

想到这里，白月娴替儿子高兴，替孙子、孙女高兴，自己自然也高兴。

“到12点了吗？”白月娴又去问孙女冯丹江。她嫌手表带勒手腕子，自己已经多年不戴表了。

丹江把戴着方形小坤表的手腕伸到奶奶眼前：“您刚问过还

不到两分钟，又问！”

白月娴故作恼怒地说：“你倒烦了！你这死丫头，对你妈一点都不亲！好像你不希望你妈妈回北京来似的。”

冯丹江：“只怕你们用这种手段骗妈妈回来，倒弄得不愉快——我是预言家！”

白月娴瞪了她一眼，说：“你小心点，你若多嘴多舌，我跟你没完！”

冯丹江向爸爸扮了个鬼脸说：“我严守中立，不结盟就是了。”

家里人全被她的外交辞令逗乐了。

只有爸爸冯骏安没有笑。妻子自远方归来，若讲高兴莫过于他了。但他一直是处在惴惴不安的欢乐之中。方才丹江的话不能说没有道理，她的预言，也正是冯骏安的担忧。女儿是最了解她妈妈的，她出生在湖北丹江水电站，在妈妈膝前长到16岁，才回到北京来读高中，这孩子身上有着她妈妈那种品性。她好强，看不惯哥哥叔叔们的待人接物，斥他们为“小市民”、“京油子”，而她也被别人讥笑为“土包子”。

冯骏安喜欢女儿的上进心，却不喜欢她的执拗劲。啊，她太像她的妈妈了。是血缘关系呢，还是后天的影响呢？他也分不清。

这时，北京站钟楼恰好开始打12点，配有乐声的余韵在钟楼上方回荡，火车就快进站了。

列车上也有“北京热”

19次特别快车正风驰电掣般地向北京前进。随着一节节退后的钢轨，距离终点站的里程在迅速缩短。

这趟车是昨天晚上7点钟从武昌发车的。硬席车厢的旅客经

过一夜闷热、拥挤和困倦的折磨，这时都纷纷打开了车窗，车厢里充满烟雾的污浊空气从车窗里卷出去，好些人反倒歪歪扭扭地互相倚靠着睡着了。

只有从保定上车的那个饶舌老头总在找话头同别人说东谈西。

还有一个特例，那就是坐在车长办公席旁边的江澜波，此刻一丝睡意都没有，瞪着两只凝神的眼睛望着窗外，兜来的车风飘摆着她的齐耳短发。不知是由于长时期的工作环境不佳引起的，还是火车上的劳顿、少眠所致，她的眼圈发黑，眼窝有点塌陷，一副病容，使她显得有点苍老。她确实不年轻了，眼角有了明显的鱼尾纹，在她眯起眼睛的时候，鱼尾纹简直聚成小扇子形状。脸很瘦削，皮肤黑而粗糙，那是没有很好保养的缘故。但你稍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江澜波并非生来就这样的。她的颈项往下，肌理就相当白皙、细腻。无论穿着和面貌，她都不会引人注目，不像个知识分子，也许更像哪个大集体行业里砸黑铁皮的钣金工。只有她那双仍然深邃、明亮的眼睛，可以使人想像得出她年轻时候的风采。

一路上，江澜波始终是一副忧心、烦躁的样子，邻座的人没看到她喝一滴水、吃一片面包；也不像多事的旅客那样扶着别人肩头在窄小的过道上挤来挤去地买食品、上厕所。她安静极了。

但她心里是不平静的。

那封电报来得多不是时候啊！正当长江即将截流合龙，在围堰外打防渗墙工程达到高峰时，那封电报来了！

母病危火速返京 骏安

如果不是开挖分局的张局长亲自打开电报封套看了电文，人们相信江澜波会把电报揉成一团，悄悄丢进大江，偷偷掉几滴眼

泪，而后投入到打防渗墙的战斗中去……

电报既已公开，那就由不得她自己了。

局长亲自派人去给她订了由宜昌去武汉的车票，当即要通了长途，命令葛洲坝工程局驻汉口办事处立即给女工程师预订去北京的接续列车车票。

一切安排就绪，孟总工程师才带着李敬等一大群工程师、推土机手、50吨卡车司机们，拥到江澜波与人合住的四人房间里，强行为她收拾行装，几乎是把她押送到火车上的。

年近花甲的孟总趴在车窗口嘱咐她去一下清华大学水利系，请水利专家们用最新式的电子设备测算一下防渗墙的数据。他要江澜波一百个放心。他说：“该坚持的我不会让步，我不会拿国家的钱打水漂的。”其实，江澜波明白，孟总是不希望他的助手在这个节骨眼儿上离开的，可他说不出口，谁没有父母呢？

江澜波也是人，有血有肉的人。她难道不想回北京去看一眼吗？什刹海后头一座古香古色的小四合院，在那株大柿子树下，她曾度过值得留恋的童年，蚩蚩、纺织娘，甚至墙角下的污水沟，都常在梦中再现。更何况，北京有她的家，一个物质和精神都很充实的家。铁道学院毕业的丈夫在铁道设计院工作，儿子在邮电学院读书，女儿即将迈进大学的门槛儿——据说考取是不成问题的。还有关心她的婆母——一个有胆识、有别于一般老太太的女性。

人过中年，家庭的吸引力往往胜过刚成家的时候……

婆母病危？这种电报她是随时有思想准备收到的，像当年接到公公病死监狱、爸爸在清华大学批斗会场心肌梗塞而死的电报一样，这最后一次打击终于降临了。公公是1974年病故的，她试图告假，回去看一眼已经不会说话的好老头儿，然而不准！理由有二，一是公公是报纸点了名的“二月逆流”小爬虫，二是丹江电站脱不开身。她只能到荒郊野外去哭上一场——不能见人的

眼泪！父亲也是死不逢时、死不得其所。1976年春天，在全国教育界大反“右倾翻案风”的时候，清华水利系二级教授江肇开竟然大叫“运动太多了，学生学不到什么”，于是批斗，于是同刚刚出国访问归来的教育部长一样，死在批斗会场。那一次，江澜波连提出告假的勇气都没有。纪念她父亲的惟一办法，是在接到电报的那天，她大胆地提出了兴建冲沙闸的方案，可慰的是，这个方案居然被采纳了。

只有江澜波自己明白，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纪念！动水拉沙，是她父亲5年前通过大量模拟试验后得出数据，提出的一项新设计，但被丹江电站的总指挥否定了。他们的理由是，丹江不是黄河，含沙量不大，建立冲沙闸是劳民伤财，多此一举。后来事实证明，因为没有冲沙闸的防淤堤，丹江航道被淤死，库尾高出水面，造成几千公顷土地的淹没。

父亲活着时被粗暴摒弃了的科学设计，在他不安地合上眼睛以后，由他的女儿付诸实施了！这是除掉江澜波自己以外，别人无法领会的痛苦的满足！

邻座一个穿着挺括的人伸出双臂，打了两个很响的哈欠，拿手巾揩揩脸，把茶具、茶盒都塞到书包里。

从保定上车的那个饶舌老头大概一直没机会同这个瞌睡者搭上话，这时就问了一句：“您是出差吗？”

那个中年干部模样的人抻了抻根本没有折皱的衣襟，一副春风得意的神态，说：“噢，不是的。我调北京工作了。我，考取了民族文学研究所的副研究员。我在西藏工委工作过6年，多少懂点藏语。”

他的藏语可能不坏，普通话却说得十分蹩脚，还不如干脆讲他的四川话叫人舒服。

“你呢，小伙子？”饶舌老头又去问一个刚从洗脸间回来的小青年。这小青年穿一件瓦尔特式上衣，条绒的，肩膀上扣着带

子，钢钮扣亮闪闪，像武官的肩章。小伙子从皮包里摸出一个桔子，剥去皮，一下子扔到嘴里五六瓣，他对老头的话带理不理，只是随便地“唔”了一声。

老头子还要多嘴：“家住北京？”

穿瓦尔特服的小伙子敞开衣襟，说：“忒热！没准到了北京就风凉了。我是被甩出去十几年的知青，刚活动回来，光送礼就花了好几百块。”

接着是扔桔子皮，大言不惭地介绍他的“活动”。没人吭声，人们都明白，这个“知青”是个老牌号的，神态、气质都可以证明。

只有那个老头咂咂舌头，说：“哟，送礼？这年头怎么讲究起这个来了？”

小伙子不屑地哼了一下鼻子，说：“送礼算什么？买一张户口，没听说要500元吗？”

老头说：“北京再好，我也不花这份冤枉钱。怪不得北京这么难进，前两年我要进京，不光车票，还要什么进京证明呢！”

小伙子似乎有意瞟了那位副研究员一眼，说：“外地人都拼命往北京挤，恨不得把防空洞都塞满了！老北京反倒四处流浪，回不去！”

言下之意，他的迟归完全归咎于外地人占了他的地盘，北京人的优越感溢于言表。

江澜波掉过头去看窗外。她惟恐饶舌的老头问起她的身世，她感到厌烦。她不明白，为什么天下之大，惟独北京、上海最拥挤？好像天下的好风水都被北京占去，只要一踏进北京的城门，仿佛就高人一头似的。是呀，难怪有人说北京的小营业员一听到外乡口音就哼鼻子，称他们为“老土”。话又说回来，自己家的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前几年儿子安江要回北京时，不是公开宣言过吗：即使去卖大饼、背粪桶，当环卫工人，也要回北京吗？

幸而女儿丹江还是她的安慰。她是为了上学才去北京的，户口至今还在葛洲坝呢。

“有志者，志在四方”、“革命者，四海为家”，难道都成了被历史波涛淘汰了的语言吗？1954年，江澜波离开清华附中时，校门口就挂过这样的标语牌；1960年，当她吃完大学里最后一餐粗粮细做的告别饭之后，走进举行毕业典礼的圆形大厅时，见到的又是这两条动人心魄的标语。

这不仅仅是号召、口号，它们是熔铸在那一代人心底的信念，她就是抱着这样的信念走过来的。

如今，这些口号也变成垃圾了吗？

奇怪，老的、少的，还有中年的，很多人都削尖了脑袋往北京钻，使北京大有下沉的危险。“北京热”究竟意味着什么？难道仅仅为了东单菜市场有活鱼可买、王府井大街走路不用迈步、有人拥着你前进吗？

她，一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也不能理解这是怎么回事。是的，北京有颐和园、故宫、长城、十三陵，还有西山、香山……可是没见哪个北京人每天去逛风景、览名胜。倒是有好多老北京压根儿就不知道颐和园是什么样子。江澜波除掉在小学时参加夏令营去香山玩了半个月，平时就很少去，她还没去过长城呢！

除掉商场大、人口多、风景名胜多而外，还因为北京是首都吗？假如当初奠都在南京或者西安，难道也会有“南京热”、“西安热”吗？

江澜波百思不得其解。

一直坐在江澜波对面的那个小姑娘回来了，脸上汗浸浸的。当保定上车的老头发现自己占了小姑娘的座位时，欠欠屁股说：“噢，这是你的座？”

“您坐吧。”姑娘礼貌地摆摆手，示意老人坐下，她一口宜昌口音，这是江澜波听得烂熟的语言。

老头朝里挤了挤，侧过身去，腾出一小块地方，说：“来，挤一挤，看你累得满头大汗，你擦地板，我还以为你是列车员呢？”

姑娘笑眯眯地坐下，和老头搭讪起来。

老头好像有询问籍贯癖，总是从这切入话题：“小姑娘，听口音你是南方人？”

小姑娘点点头：“宜昌人。”

小姑娘和江澜波一样，说话同打电报一样节省，因此一路上她们基本上没有交谈什么。江澜波看书，小姑娘也看书，只不过江澜波看的是《流体力学与应用》，小姑娘看的是从列车员的小图书箱里拿来的一本《东方快车谋杀案》。

“上北京串亲戚？”老头抽着苦涩的旱烟问。

小姑娘又拿起了《东方快车谋杀案》，说：“开会。”

她的回答，多少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这个看上去不过十八九岁的小女孩，即或有工作，大不了是个二级工，或者还没有出徒，二级工到首都去开会，似乎有点不可思议。

“开什么会？”踌躇满志去上任的副研究员问道。

“青年会。”姑娘赶紧打开书本，似乎生怕别人再追问下去。

副研究员偏偏要研究下去：“你是做什么的？”

姑娘说：“电焊工。”

老头插问：“什么厂的？”

姑娘说：“葛洲坝水利工程局的。”

人们啧啧赞叹起来，葛洲坝好出名啊！提起它，人们的感情像前些年在火车上讲起珍宝岛、大庆和大寨不相上下。

江澜波也被吸引了，自己这么粗心？想不到这个和自己座号挨着的小姑娘也是葛洲坝人！

江澜波问：“你是浇筑分局的？”

小姑娘说：“不，安装分局的。”

江澜波心里一动，冷丁想起一件事来。从宜昌上车的时候，恍惚听送她的人说了一句：“李一芳也是这趟车走。”

李一芳可是在葛洲坝工程局 5 万职工中震天响的人物，声望远比她这个副总工程师要高。还比总工程师、总设计师们都要出名。

可惜江澜波并不认识她。江澜波知道李一芳是省劳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听说最近又选上了全国青年新长征突击手。莫非这小姑娘就是李一芳？莫非她到北京去开新长征突击手奖励大会吗？

江澜波忍不住问：“你叫李一芳吧？”

小姑娘抿嘴一乐，稍有点羞涩，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却反过来说：“我认识您，您是总指挥部的江总……”

旅客的视线一下子集中到江澜波身上，她成了核心。她看得出，人们的目光里有惊讶、怀疑，也有几分是探询的。是呀，她这样一个着装寒酸的中年妇女，看不出有什么大学者的风度。在人们眼中即或不被误认为是家庭妇女，也不过是个家属工，有谁会吧副总工程师的桂冠轻易试戴到她头上呢？

否认有什么意思？江澜波又从来不会说谎，她的脸微微红了，仿佛听了什么不体面的话。为了摆脱窘境，她只得同李一芳攀谈：“你怎么会认识我？”

李一芳绯红了脸，拿书本挡住半个脸孔，说：“您……忘了？您批过我，在焊船闸人字门的时候……”

是她？这可是江澜波意想不到的，这件事她是不会忘记的，她曾经把那个小电焊工批得呜呜直哭呢！可惜她当时没有问小姑娘的名字，因为她当时批的只是马虎作风，并不是张三或者李四某个人，因此没必要问。

2 号船闸下闸首的人字形铁门，大概要算是世界上最大的门了。每扇门由十块钢板焊接而成，总重量为 600 吨，从上海造船

厂启运时，一节车皮只能装一块，四扇闸门的钢板整整使一列火车满载，要把 10 块厚钢板焊接起来像 11 层楼房那么高。为了确保质量，每条焊缝要求的精密度和变形误差，小到头发丝那么细，那是连一个沙眼都不允许有的。

那天，江澜波冒着大雨同上百名工程师来到下闸首施工现场检查闸门的焊接质量。

焊接质量远远超过设计师们图纸上所要求的精度。当工程师们要离开现场时，江澜波突然从钢管脚手架上喊了起来：“这是谁焊的？”

工段长慌忙爬上去，随后大声叫一个女焊工。

李一芳捂着大口罩从用芦席临时围起来的简易厕所里跑出来，手里还提着扫帚，有几分惶惑地站到了严厉的副总工程师面前。

工段长试图为李一芳解围，附在江澜波耳边小声说：“她是标兵，工间休息从来不闲着，给大伙热饭盒、拣废旧物资，这不，又去扫厕所了。”

江澜波却不买账，她指着出了沙眼的焊缝，大声训斥道：“这是百年大计的事，如果你的焊接不合格，你就是把天下的厕所都打扫干净，也抵偿不了你的罪过！”

江澜波记得，当着好多人的面，小姑娘委屈地哭了，哭得肩膀一耸一耸的。江澜波并没有缓口，她冷冷地说：“割开，重焊！”然后掉头同工程师们一起走了。

江澜波批评过的工人太多了，过后早丢到脑后了，却不料她留给被批评者心目中的印象会如此长久，如同学生不会忘了老师的批评一样。

现在，这件往事经李一芳猛一提起，回想当时的情景，江澜波才感到自己当时的确过分严厉了些，尤其是对一个刚走上社会的小姑娘。你看，人家就是如雷贯耳的李一芳！也许人家处处都

好，偶尔出了那么一点纰漏，就那样声色俱厉地批评她，不是太叫人下不来台吗？

想到这里，江澜波微微一笑，对李一芳说：“你还记着这回事？当时，我太粗暴了，伤了你的自尊心。”

李一芳倒没有计较的意思，她不好意思地喃喃说：“不，江总批评得对。”

“你进业余大学了吗？”江澜波很关切地问。她想，这是不成问题的，葛洲坝有各行各业的业余大学，有志者没有几个不去深造的。

万万没有想到，李一芳摇了摇头。

江澜波皱起了眉头：“为什么不进？”

李一芳说：“没有时间，天天开会。”

人一出了名，时间就不够支配了。记者、作家的采访，电视台录像，新华社拍照，共青团、工会、妇联她都挂着衔，甚至计划生育办公室也要她这个没结婚的女孩子去挂个副主任！

江澜波曾经看到过工程局小报上登过李一芳的先进事迹，她扫厕所、助人为乐，她退回超额奖金，她星期天加班，一年之中拣废铜烂铁为国家节约二百多元钱。

啊，二百多元，……二百元与两千万成比例吗？为了把2号闸门的闸室墙壁由整体浇筑改为分块设计，江澜波整整花了两个月时间，到底成功了，光节约钢筋一项，就是两千万。

然而，没有人给她宣传过，更没有发过奖品。

怎么引起了这种联想？江澜波觉得耳后一阵阵发烧。20年来，她把整个青春都贡献出去了，难道要的是一张奖状吗？怎么突然闹起小家子气来了？

生活是凄苦的，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有家等于没家，她都没有计较过。她有没有内心的不平？有的。她至今还不是共产党员，虽然即或在“四人帮”肆虐的年月里，她仍然执著地在每年

的7月1日向党支部递一份入党申请书。她永远不够标准，她永远在接受考验。像李一芳这样的小黄毛丫头，早就是共产党员了，而且是出席省党代会的代表。

人家单纯啊！江澜波常常这样自我安慰。可是她到底无法骗自己，自己又复杂在什么地方呢？

她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她所在工段的总支书记在一次醉酒后的谈话。他是对另一个工程师说的：“你们这些大知识分子呀，轻易不能发展，有了党票，如虎添翼，更没法治了……”

江澜波为这句话委屈了很久，但她相信这不是党的政策，党章不可能有两个标准：工人标准和工程师标准。

但她总是失望，那些毛孩子们仅仅加几个夜班，或者带伤工作几天，就能入党，她的心总在隐隐作痛。

你想些什么啊？

江澜波的脸孔又灼热起来，仿佛邻座的人都窥探出了她心中的暗影，她觉得害羞。

列车广播员在播送首都风貌和换车时刻表了。没有哪个人耐住性子去听，车厢里一片慌乱，好像进北京站也有定额。

江澜波看到最后一个小站闪过去了，正在修葺的建国门城楼在望了。东城一带火柴盒一般突兀耸立的高层建筑，立体交叉桥上疾驶的摩托车……突然使江澜波感到好像到了一个很生疏的地方……

“居里夫人”回到陌生的家

车还没有停稳，车厢中已形成忙乱的高潮。江澜波问明团中央有车子来接李一芳，放下心来，给李一芳写了个字条，画着路线图，要她在开会余暇时间到家里去玩儿，又一再叮嘱她：“我们家好找得很，前三门，一排大楼，我们那栋在新侨饭店对面，

8楼2单元。对了，你从京西宾馆坐地铁方便得很，到崇文门站下车，一角钱。过横马路时要小心……”

李一芳答应着，要替她拿东西，江澜波催促她：“你先走吧，省得接你的人着急。”

李一芳这才下车去了。

有人在砰砰地敲车窗。啊，是丈夫冯骏安，他喊的什么听不见，手一个劲向车门那里指。江澜波回头一望，才看见安江、丹江兄妹俩正从下车的人缝中挤上车来。安江毕竟是上大学的人了，文质彬彬，一笑，问了声“妈妈好”，过来提行李。女儿丹江就不同了，扑上来勾住妈妈的脖子，撒着娇大声叫着：“我还寻思妈妈早把我忘了呢！人家高考，您都不在跟前。”

这时又挤上来一个二十四五岁的姑娘，叫了声“嫂子”，随后玩笑地说：“可算把咱家的‘居里夫人’盼回来了！”

江澜波认出是小姑子骏逸，笑了：“哟，你长成大姑娘了！我都不敢认了呢。”

骏逸说：“你再不回来，我就变成老太婆了呢！”

连周围的旅客都被她逗乐了。

望着骏逸的装束，江澜波不知是一种什么滋味。她和女儿丹江简直形成鲜明对照。丹江穿的是挺受看的那种直筒裤，还和在葛洲坝时一样，梳着两条丫角辫，浅格半袖衫，平跟布底鞋，像个朴素典雅的学生。骏逸就不同了，长长的披肩发像一道黑色瀑布，披散在肩后，闪着蓝缎子似的光泽，散发出檀香型的香水味道。她的上衣说不清有多少大大小小的口袋，花格子的，男式的大尖领，裤子是接近太阳红颜色的大喇叭裤，裤脚摆开，真像裙子。还有那高跟白色皮凉鞋，高且不算，后跟只有手指头那么粗，使人担心重心会不会随时出问题。更奇怪的是，骏逸的脖子上还吊着个晃来晃去的金十字架项链。

现代派！江澜波内心里不由得叹息起来。好在女儿没有这

样，儿子也还不出大格，小姑子毕竟远了一层。鞭长莫及，她管不了，也不好去管的。

几个人提了旅行袋往车下走着，江澜波问儿子：“奶奶是老病犯了吗？住日坛医院，还是首都医院？”

骏逸望着丹江，格格地笑起来：“嫂子一定以为生活中的公式，都像牛顿定律或者阿基米德原理吧？生活中的误差，可能大得惊人呢！”

江澜波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她严厉地望着儿子和女儿，丹江垂下头去，儿子却坦然地一笑。

江澜波料定自己上了圈套，就问：“奶奶根本没住院？是你们拍了假电报？”

丹江噘起嘴来：“我事前一点都不知道，是姑姑和爸爸搞的鬼儿。”

“小叛徒！”姑姑骏逸戳了丹江脑门儿一下，说：“这可得给我平反，天大的冤枉，电报是我发的，可主持这次阴谋的核心人物就是我妈妈本人。不信你问安江！”

安江证实说：“是的，奶奶想您了。不用这个法子，您可能从记忆的屏幕中把北京抹掉了。”

江澜波没有怪婆婆荒唐，更没有责备孩子们弄虚作假，她何尝不想回家来看看呢？事已至此，发脾气有什么用？总不能再打一张车票星夜返回葛洲坝呀！

走出车厢，江澜波先去看婆婆，然后才见了小叔子骏骧和骏骥，自然是一番寒暄、一番快乐，只有这一瞬间，重力坝、副坝和防渗墙、泻水闸之类的东西暂时从女工程师的脑海中退隐了。

他们乘坐的面包车像蜗牛一样爬行在马路上。骏骧是不坐面包车的，他有一台漂亮的铃木牌摩托车，戴上玻璃面罩，走在面包车前面，像给元首开路的仪仗队。北京街面上的人好像比前几年猛增了几倍的样子，车辆也多了。记得她离京时，她可以随时

随地过横道，现在就不行了，汽车如走在传送带上，一刻不断，非等亮起红灯不可。一拐出北京站口，她就看到了建国门外高耸的立交桥，还有一片片平地而起的高层建筑，北京再不是从前一片低矮的四合院小砖房的时代了。现代化的一切，正从这座古老的大都市里兴起，这里比起荒凉的葛洲坝来，那自然是令人向往的。也许这正是吸引人们争相来京的一个因素吧？

丈夫就坐在她身旁，脸上挂着笑，一副悠闲的神态，望着乱糟糟的街市，好像特别习惯。他自鸣得意地侧过头来问江澜波：“一进北京，心都要醉了吧？这才叫生活，沸腾的生活！”

当着大家的面，江澜波不好说什么，只是笑了笑。

她忽然觉得丈夫还和从前一样年轻。他穿着春秋呢的薄大衣，头发一根白的都没有，脸是光滑的，只是比前几年稍稍发胖了一点。假如她和他并肩走在马路上，陌生人很难一下子想到他们是夫妻。

江澜波心底生出一种酸楚的味道，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她想，这就是“不知老之将至”吗？丈夫是很会保养的，讲究健身之道。自己的未老先衰，能怪谁呢？20年来，她和一切化妆品都无缘，她不但没有用过近年才有的冷烫水、高级护肤霜，就连雪花膏都从来不用。在野外作业的时光，她的脸倒是涂得亮晶晶的，那是驱蚊油……

见她精神有点抑郁，冯骏安说：“旅途太累了吧？你该买一张卧铺票的，这不是年轻那时候了。”

一句话恰好触到她的心事，她勉强笑笑，问道：“我老得不成样子了，是吧？”

冯骏安似乎无心地说：“你再钻几年山沟，恐怕就是十足的老太婆了。”

她很反感，本想说一句“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会年轻的”，可又怕太刺激了，就忍住了，笑笑说：“你搞什么名堂？和孩子

一样，拍假电报。”

冯骏安说：“孩子想你了，老人念叨你，你还没有义务回来看看吗？”他没有提自己。

“只是……不早不晚！”她说，“正赶上打防渗墙的高潮，有些问题还没有解决……”

冯骏安笑道：“问题是，我们永远找不到‘居里夫人’的空闲时间啊！”

江澜波也叫他说乐了。

车子开到前三门第一幢8层楼房前面停住，大家扶着白月娴下车。

已经过了早午晚上下班的高峰，三部电梯全部停运了。

白月娴坐在前厅一张长椅上开始骂娘：“真缺德，该死的建筑师是存心叫老头、老太太吊在半空里永世脚不沾地呀！”

冯骏安说：“不能怪建筑师，该骂电业局，他们限电，总有一天，北京得复古，点蜡烛、煤油灯。”

丹江的二叔叔冯骏骧说：“我们电子管厂一周有两个礼拜天——嘿，和法国一样了。停电，不休也得休，能源危机呀！”

江澜波说：“等葛洲坝电站建好，并网发电就好了，一下子增加了270万千瓦，若是三峡电站落成并网发电，就更可观了，2500万千瓦！”

白月娴打诨道：“等那电站建成再开电梯吗？那只好叫他们吊我的骨灰盒了。”

一家人都乐起来。

丹江噘起小嘴埋怨奶奶说：“都怪奶奶，非上8楼，有老人都可以照顾在低层的嘛！”

“你懂什么？”白月娴说，“我是点名要8层的，我脑袋上边不允许有人，丁丁冬冬跳什么……斯科……”

丹江笑着提示：“叫迪斯科。”

骏逸说：“迪斯科能使全身运动，比打太极拳强多了。”

白月娴说：“管它什么斯科，吃饱饭撑的，扭屁股玩，越来越不像话！”

丹江望着姑姑，大笑起来。

玩笑归玩笑，终究代替不了爬楼梯。

骏骧和当兵的骏骧哥俩自告奋勇，同冯安江三个人轮换着背起老太太一层层爬上去。等爬到8层，三个棒小伙子早都汗流浃背了。

冯家整整住了两个单元，一共5间屋子。这在人烟稠密的北京来说，已经近于豪华了。可是冯家仍然感到紧张，白月娴一推门就发牢骚，说：“又回到鸽子笼来了！”

白月娴是年长者，住了阳面一间15平方米；冯骏安是实际的家长，住了另一间12平方米的，也是阳面；骏骧在步兵学校读书，家里不用准备他的房子，一间8平方米的阴面房间给了骏骧、安江叔侄俩，好在安江在邮电学院寄读，只有节假日才回来；还有一间12平方米的，本来老太太是指令骏逸和丹江同住的，但骏逸常常在周末邀来好多人通宵达旦地跳迪斯科、探戈舞，或者看录像电影，弄得丹江不能复习功课，于是丹江“造反”了，把行军床搬到18平方米的会客厅里。这样一来，五间屋子全部成了卧室。

一走近客厅门，从厨房里迎出一男一女，都扎着围裙，男的二十八九岁，冲江澜波叫了声：“大姐姐好”，女的只是笑了笑。

丹江附在妈妈耳朵边说：“这是二叔叔和姑姑的朋友，今儿个负责上灶！”

丹江的“悄悄话”，几乎全屋的人都听到了，又引起一阵哄堂大笑。

江澜波打开一个绽了线的黄帆布旅行袋，旅行袋上面印的官厅水库图案已经脱落了，这是标准的50年代的老式样的鳖脚货。

骏逸在一旁打趣说：“这包，是‘三八’式，从延安带来的吧？”

人们又是一阵大笑。

冯骏安说：“1957年，我送她到古田电站实习时，就是这个旅行袋，那时可是新的。”

江澜波笑着，拿出两盒武汉云片糕、两盒麻筒糖，说：“大家尝尝，这是湖北特产。”接着又拿出一个塑料包，递给白月娴，“妈，这是上好的天麻，您用得着的。”

丹江打开云片糕盒子，给每人分了一块。骏逸拿了一片在手中翻过来调过去地看看，咬一口，皱起眉头，说：“丹江天天吹，宜昌的云片糕多么好吃，我以为是什么好玩意儿呢，比绿豆糕都难吃，噎嗓子！”

白月娴有滋有味地嚼着，说：“把你狂的……”

冯骏安接过话碴儿说：“像三年灾害时，叫你吃上几顿代食品窝窝头，保准你就不狂了。那年你五六岁，爸爸每月发5斤黄豆，差不多都叫你炒吃了！”

骏逸说：“我怎么不记得了？”

白月娴说：“你是有甜忘苦啊！我们参加革命那年月，一天发半斤小米……”

“又来了！”骏逸撇撇嘴说，“又要给我们吃忆苦饭啊！一开口就是你们那时候！现在不是80年代了吗？”

白月娴爱昵地点点她的鼻子，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丹江说：“妈妈，您怎么不给我带几个菱角来？我忒爱吃那个。”

江澜波说：“着急，忘了，那得上水塘里去现捞啊！”

这时，餐桌摆了上来，四凉八热，色、香、味三优。老太太亲自给江澜波布菜，冯骏安亲自给她斟了一小杯泸州老窖的绿豆大曲，看上去绿盈盈的像是果酒，可是冲劲儿一点不比北京二锅

头差。冯骏安喝白酒，骏骧、骏逸几个喝黑啤酒，老太太和丹江只能喝桔子汁儿汽水。

杯子举起来，一家人乐乐融融，由骏逸祝酒：“为给咱家的‘居里夫人’接风洗尘，为合家团圆，干杯！”

老太太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破例地喝了半杯绿豆大曲，非要儿媳妇陪着不可，江澜波只好勉强喝了一杯。

一杯酒下肚，江澜波有点晕乎了，别人还在兴头上，她不好马上离桌，又给白月娴斟了酒，说心跳得厉害，由安江扶着，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了，别人还在喝。

窗上掩着湖绿色窗纱，地灯发出的也是绿幽幽的光，配上一套乳白色家具，显得舒适。当她躺到蒙有绿毛毯和白色泡纱床罩的席梦思床上时，整个身子都凹陷下去了，好像掉进了棉花垛，又像浮游在五里雾中。

这才是安逸的家吗？屋子里多安静啊！除了客厅的碰杯声、嘻笑声不断传来，屋子里静极了。

啊，那张照片还悬挂在最醒目的地方！那是她和丈夫分别走出大学校门结婚时的纪念照，自然不是穿什么曳地的纱礼服，也没有戴漂亮的花冠，一对朴朴实实的大学生！啊，还有那题字，是别具一格的，既不是普通的“并肩前进”、“永远在一起”，也不是俗不可耐的“结婚纪念”，却题了一句宋代范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应该说，他们当初是实践了诺言的。他们的蜜月还没有度完，就分手了！拿了清华大学水利系毕业文凭的江澜波奔向了新安江水电站。而学铁路桥梁隧道专业的铁道学院毕业生冯骏安，当然也不可能留在长安街上修涵洞，他奔向大西南，去勘查宝成路、成昆路的线路去了。

有人说，恋爱是甜蜜的。他们有过三年半马拉松式的恋爱，平平淡淡、安安稳稳，既没有轩然大波，也没有如胶似漆的白热

化阶段，谈事业、谈未来的篇幅要远远胜过谈情！

有人说，蜜月是幸福的。他们的蜜月有一半时间各奔东西，一个在大西南海拔两千米的帐篷里，一个在蚊蚋成阵的新安江电站潮湿木板房里。

有人说，只有青春的恋情才是最强烈的。可是他们的恋爱几乎没有什么耳鬓厮磨，没有调笑，没有愠气。他们没有时间，仿佛他们的结合不是由于感情的需要，倒像是生活中人人都要走过的一个进程。

从前，丈夫和自己一样，过惯了这种长别离的生活，没有怨言。可是这几年来，他的牢骚日渐多起来，写给她的信比当年的情书要厚几倍，他开始怀疑自己做出这种牺牲的价值，甚至认为这是一种苦行僧的日子。因此，他急不可待地要改变它。

是啊，人大概天生具有一种惰性。此时躺在柔软的床上，她觉得周身的肌肉、关节全都放平了、放松了，神经末梢都松弛了……早晨起来到东单花园去打打太极拳，假日全家到全聚德吃顿烤鸭，到北海去划划船，按部就班地踩着钟点到研究所去上班，谈谈市井新闻，看看《参考消息》，一杯酹茶足够消磨一上午的光阴。然后是回家、看电视……别人不都是这样过的吗？平心静气地说，她不能说这个安乐的窝不舒适。再不要打一桶冰冷的长江水洗衣服，只消把脏衣服丢到洗衣机里，在电键上一摁了事！再不发愁画图纸画到半夜口渴得喝冷水，热茶、咖啡，还有冰镇在雪花牌冰箱里的汽水、冷饮和时鲜水果，不是随手可取吗？再也不用挖一篮子黄土提回来，掺上煤粉团土造煤球，再担心泥坯炉子呛风倒烟熏得人辣泪直流了，只消扭开煤气阀，用电子点火枪打一下，立刻冒出瓦蓝的火苗……这一切，对于正常人来说，都是具有吸引力的，难道有人天生愿意吃苦吗？

可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呢？

女儿轻捷无声地走了进来，她大概喝了不少酒，两颊宛如开

了两朵桃花。

这个生在丹江电站工棚里的姑娘，身上还保留着丹江人的气质，她还没有忘却那里的野菱角！这对妈妈是个不小的安慰。

丹江坐到妈妈身旁，说：“他们还在喝，我逃走了，今天全家人都高兴得不得了，妈妈再去陪一小会儿吧。”

江澜波没有起来，她说：“我头有点晕……对了，丹江，我还忘了问你，你的高考，怎么样了？”

丹江将小辫子甩到肩后，有几分自得地说：“考取倒是不成问题的。爸爸托人到招生办公室查问过了，已经‘投档’，录取到北师大中文系了。”

“不错，”江澜波感到很欣慰，“这是靠你自己的努力考取的，师大是重点大学呢。”

女儿噘起嘴说：“可爸爸不喜欢，非逼着我换个学校，哥哥也支持他。”

“换学校？”江澜波坐了起来，有几分惊讶：“统一分配，按成绩录取，怎么能说换就换？况且，进师范有什么不好？振兴我们的国家，我看首先得振兴教育。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场所，你不是从小就立志当教师吗？”

“爸爸倒不是讨厌师范，”丹江解释说，“他是……反对进师大。他要我自愿降格，换到北京师范学院去。录取分差50分呢！当然了，降低标准走后门，总比提高标准走后门容易得多。妈妈回来得正好，您千万别叫爸爸这么做。”

江澜波更糊涂了。自愿降格？她简直闹不清这其中有什么奥妙。一个人自愿从重点大学换到一般院校去，那除非是傻瓜才干得出来，冯骏安是念过大学的人，他会不懂这个？

还是女儿丹江揭了谜底：“妈妈，你感到怪，是不是？爸爸这么干，是经过电脑计算的。按他的逻辑是吃小亏占大便宜。北师大固然是重点，可它面向全国，毕业分配时谁知道甩到天南

地北？北京师范学院就不同了，它是属于北京市办的，爸爸说，说到底也不过分到房山、通县，留市里的可能性更大得多。”

江澜波简直有些瞠目结舌。她明白了，越是明白，越是痛苦。这就是现实吗？城里的人死也不肯出去。外边的人千方百计往城里钻，真好像人生为之奋斗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挤进北京城。

她叹了口气，问女儿：“那么，你怎么打算呢？”

丹江说：“我明确表态了，听其自然。分到什么学校算什么学校。”

江澜波又问：“万一进了北师大，你不怕将来分到天南地北吗？”

女儿狡黠地笑了：“那您哪？您不是在天南地北吗？”

一句话，说得江澜波心里热乎乎的，她把女儿揽到怀里，含着热泪说：“妈妈给你撑腰。只要是祖国需要，你将来能留在北京也好。妈妈也并没有吃苦的嗜好，只是妈妈的专业是不能留在北京的呀！”

丹江仰起头来，说：“妈妈，您知道这次叫您回京的真正目的吗？”

江澜波心里一动，却故意不以为然地一笑，反问：“莫非这里还有什么阴谋吗？”

丹江欲言又止，半晌，才格格笑道：“您瞎说，哪有什么阴谋。妈妈，您太苦了，您身体又不好，该好好去看看病了。”

江澜波忽然想起了儿子面临毕业分配，就问：“你哥哥快分配了吧？他也打算泡在北京？”但她知道，儿子泡在北京的理由是不多的，他在邮电学院是学微波的，全国有上千个微波站，没有几个是建筑在大城市的。

丹江说：“瞧您问的，多有意思！谁不想泡在北京？哥哥的事不用犯愁，他才诡呢，找了个女朋友，全家人都喜欢，是同班的同学，家住合肥。可最近突然吹灯拔蜡了！”

江澜波又是一惊，她曾恍惚从丈夫的信中得知儿子交了一个女朋友的事，听丈夫的口气，那是令人满意的。

江澜波问道：“为什么吹了？”

丹江说：“也可以说什么都不为，哥哥怕叫她拐到淮河边上去！他用闪电战术新交了一个女朋友，是西单商场卖洗衣粉、牙膏的，一脸雀斑，从背后看，脊梁像一口大缸，三句话讲不出来，就会骂人‘那德性’……”说到这里，丹江哈哈大笑起来。

江澜波皱起了眉头：“这么说，你哥哥喜欢她？”

“您真傻！”丹江笑得前仰后合，“爱情是有条件的。您知道我未来的那个丑嫂子的根底吗？她可有一个好爹呢！她爹是主管学生分配的副院长，她叔叔是人事局的常务副局长，难为我哥哥摸得这么准，一个星期就把卖洗衣粉的追到手了！这不，已经十拿九稳留北京了，很可能是分到卫星地面站！”

江澜波突然感到浑身发冷，周身战栗，她还能说些什么呢？望着挂在墙上的范仲淹名句，她感到悲哀，那句千百年来鼓舞着仁人志士的警句，如今连装潢都够不上，简直是嘲讽！

一时，她感到这笼罩在一团绿光中的鸟巢像坟墓一样窒息、可怕，她仿佛掉进了一个朦胧的、不可思议的陷阱……

人生的引力

江澜波做了一个可怕的梦。

那是北京古老的城墙吧？是的，用糯米面砌缝的虎头青砖完好无损地垛起的外城墙，像是李闯王还没有打进北京的年月，女墙上站满了手持鬼脸盾牌的武士，还有古老的用引火绳引发的铜白炮。不，那里还有一排喀秋莎炮，带拨风摆的火箭炮……

亿万人在攻城！

她自己仿佛也夹杂在攻城的人海中。一张张让人目眩的云梯

竖起来，人们蜂拥而上，向梯子上攀登。人们互相揪扯着、踢打着，后面的人把前面的人掀翻在地……但这丝毫没有挫伤人们的斗志，还是争先恐后、前赴后继地往城上爬。

城墙上的卫士们神秘地笑了，他们用竹竿挑着一个大饼，叫嚷着：“上来吧！这里有大饼，天上掉下来的……”

不知怎么，她自己爬上了云梯，在拥挤和相互践踏中爬上去了，眼看就要伸手攀住墙垛了，忽然天崩地裂一声响，云梯折断了，她“啊”地大叫一声，跌进深不可测的护城河里去……

“喂，你醒醒，你叫噩梦魔住了！”

江澜波一脸冷汗，她睁开眼，才听到丈夫在叫自己，知道是一场梦。

夜已经很深了，窗外的汽车笛声都不容易听到了。她发觉自己躺在被子里，外衣已经搭到了床头。她闻到了一股烟油子气息，丈夫上半身露在被子外头，倚在床栏杆上，正在抽烟。只有床头那盏三瓦的小灯亮着，像萤火虫。

丈夫将大半截香烟捻灭在烟灰缸里，哧地一笑，说：“这么多年的闯荡，还是一点进步没有，一小杯酒就醉得人事不省了？”

江澜波想努力做出笑容来，可是笑得勉强极了，她说：“没什么，酒不醉人人自醉呀！”

冯骏安双手枕到脑后，无限感叹地说：“澜波，我们结婚二十多年了。可是让我们算算，我们在一起的日子，大概还不到两年吧？”

这是一个令江澜波很讨厌的话题。

可是她不愿意在久别重逢时伤丈夫的心，就笑了笑，说：“你没听人说过吗？新婚不如久别。天天在一起，柴米油盐酱醋茶，也许早就腻了。真的，我无意中考察过好多家庭，这常常是吵架的内在因素。没有信仰，没有追求，没有事业心在支撑，只好吵着过日子。”

“我们倒是吵不起架来。”冯骏安笑了，“一个天南，一个地北，永远唱不完的‘天河配’。”

江澜波问道：“哎，你这几次写信怎么没提你的胃病？溃疡好了吗？我给你带回来一个偏方。”

冯骏安又点起那半截香烟，吐了一口烟雾，说：“胃溃疡对长年在野外的人来说，不过是一种职业病，饥一顿、饱一顿，冷一顿、热一顿，不锈钢的胃也受不了。现在，胃溃疡不治自愈。调回北京，生活安定了，比什么偏方都灵。你的关节炎好些了吗？”

江澜波的风湿性关节炎也有十几年的历史了，她从来没有认真治过，也没有时间天天去针灸、理疗，一到阴雨天，常常痛得她坐立不安，可她从来都不把实际病情告诉丈夫。

听了丈夫的询问，她说：“关节炎算什么，我按你的办法，天天针灸，现在好多了。怎么样，你的工作还满意吗？怎么你在信里从来不提你的工作？”

冯骏安叹口气说：“有什么好说的！年轻的时候，很多人都有自己的追求，都有五光十色的理想，但是达到目的的毕竟是少数，平庸无奇的是多数。我发现，我自己不过是个凡夫俗子，不是什么天才，梦醒了，才能更实际一点。人到中年万事休，这不是灰颓，是从幻想中回到人间来了。你的梦还没有醒吗？”

江澜波披上衣服坐起来。听了丈夫这番话，她又打了个冷战。这就是当年心里烧着一团火踏上征途的冯骏安吗？这就是自己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丈夫吗？

江澜波突然产生一种莫名的孤独感，尤为可怕的是这种孤独感恰恰萌生在温暖的家庭温床上。她习惯于一个人坐在清冷的绘图桌前，半夜深更在江水滔滔的伴奏下工作，虽然只有她和自己的影子相随，可是她觉得那是充实的，好像自己背后靠着一个宽厚而又宏大的、温暖的胸膛；然而，当她淹没在天伦之乐的氛围

中时，却感受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孤独和寂寞。儿子、丈夫，还有退休在家的婆婆，没有一个人理解自己，自己不过是他们嘲笑和怜悯的对象，这使她感到难过。

“你感到我很可怜吗？”过了好一会儿，江澜波才这样问丈夫。

冯骏安说：“我们确实应当自己可怜自己了，别人的怜悯只不过是一种没有半点实际意义的安慰。人生一半以上的途程走完了，我们把能够贡献的一切都贡献给国家和事业了，我们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事业啊，艰苦奋斗啊，现在谁还稀罕这廉价的口号？惟有像你这样沉醉不醒的人还在傻干，还在消磨自己有限的青春。将来，当你骨埋荒郊的时候，活着的人谁会说你一句公道话呢？”

江澜波尽量控制着自己的激动，说：“骏安，我真没想到，你这样轻易地缴了械，这样糊里糊涂地坠入了可怜的生活小圈子。难道你调回到铁道设计院，也正是为了逃避艰苦的生活，来寻求安逸的吗？”

冯骏安周身一震，半晌没有说话。

过了一会，他才说：“我不否认，就算是一种逃避，也并不是耻辱。假如山高水远的地方需要人，也总不能靠我们几个人吧？服兵役还有个年限呢！难道搞事业的人就应当一生一世两分离吗？我们也是人啊！你比有些党员都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可你至今还没有被吸收入党吧？”

能说冯骏安说的一点道理也没有吗？她的心一下子被触痛了。

每当江水被夕阳染红，水利工人们扔下安全帽、坐上班车回家的时候，江澜波不也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惆怅吗？假如她在工地有个家，那么，孩子的嬉闹、家务事的繁琐，还有夫妻间的关切，不都是消除疲劳的兴奋剂吗？

她扪心自问：到底是同图纸亲，还是和丈夫亲？一个数据搞不准，她可以通宵达旦不眠，为了丈夫，她花过这么大的精力吗？

可是，她是个女人，工程师毕竟是外在的。作为女人、妻子，她到底给了丈夫多少体贴温存？

她忽然觉得自己是有愧的，欠着好多好多感情上的债务。这样一来，本来要脱口说出来的一些责备丈夫不求进取的话，又都被一股感情的潮水冲得无影无踪了。

她依偎到冯骏安的怀里，轻声说：“你别发牢骚了，是我不好。你心里一定在后悔，找了我这么个不懂感情的人，还不如……”说到这里，她脸红起来，说不下去了。

冯骏安抚摩着她那干焦的头发，说：“不，我不后悔。你并不是不懂感情，你的感情只是被江河的大水冲淡了。现在补偿还来得及，我希望我们不再分开，不再过那种颠沛流离的日子，我相信你能答应我的。”

江澜波笑着说：“傻瓜，你以为我不希望你和你在一起吗？有你在跟前，我就有了诉苦的地方，真的，能少哭多少回鼻子呢！”

“副总工程师哭鼻子？”冯骏安笑着用手指头刮了她的鼻梁一下。

江澜波说：“女人就是女人，我也是一样。有人说，女人就是软弱的代名词，我不同意，可又总是逃不脱的，眼泪常常跑出来帮倒忙。”

“有我给你当后盾，你再不用哭鼻子了。”冯骏安说，“这么说，你同意调回北京了？”

江澜波半闭着眼睛说：“总有这一天的，树高千丈，落叶归根，我总是要落到你这棵树下的。”

冯骏安说：“什么叫总有一天？”

江澜波笑了：“葛洲坝不过是三峡电站的一个梯级坝。等三

峡电站建成，你拿鞭子赶，我也不离开你了。”

“你推的真远，”冯骏安笑道，“幸亏还没达到用天文数字计算的地步。葛洲坝从1974年第二次动工以来，已经用掉了7年光阴，这仅仅完成了第一期工程。第二期工程，总还要二三年吧？”

“外行！”江澜波说，“你说少了。第二期工程预计5年，最快也得4年。”

“那三峡呢？”

“三峡要15年左右。”

冯骏安咧开嘴苦笑说：“只怕到了那时候，我们的骨灰可以团圆，肩并肩地摆在八宝山火葬场一个什么架子上。”

“你胡说什么！”江澜波伸手捂住他的嘴。

冯骏安就势握住她的手，说：“这回呀，你来得去不得，可由不得你了。我已经给你联系好了接收单位，明天一早就带你去看，虽然比不上水利设计院，总还是当你的工程师。”

江澜波觉得丈夫不是开玩笑，他说了这么一大堆的话，绝对不像每次那样只是发发牢骚、发发感慨，看来他是采取了一系列主动措施以后，给她一个突然袭击，让她就范的。

江澜波正色说：“你说些什么？你真想得到，现在把我从葛洲坝撤下来，那不是等于战役打了一半就往下撤兵吗？”

冯骏安有点耐不住性子了：“得了吧，我的‘居里夫人’。我绝不相信，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少了一个江澜波，就会崩溃，长江水就会倒流不成！”

江澜波说：“可我学的是水利，总不能回北京来卖大碗茶呀！”

“你说话的口气怎么总有点过时呢？”冯骏安说，“我告诉你吧，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你如果还要家，还承认共产主义者也不排斥爱情的婚姻，那你就屈服一次吧，否则，你

办了离婚手续再走。你可以没有丈夫，我不能没有妻子。”

他显然是动气了，说罢往被筒里一缩，蒙上了脑袋。但她也知道，这不是他的真心话。

这等于给她摆好了一步棋，不论成败，都势必走这一步，没有选择的余地。她不否认，冯骏安是爱她的，正是为了爱，才这样安排。如果妻子不是江澜波，而是另外的什么人，那也许是欢呼雀跃般地高兴，多少人积足精神，采取各种手段，还未必能钻到北京来，而她，多么幸运！她不伤一下脑筋，坐享其成，甚至办关系、落户口也绝不会让她自己跑腿。

可她是“居里夫人”，北京城的舒适安逸，比起葛洲坝的喧嚣声浪来，吸引力是不成比例的。她没有理由离开水利工地，正像一个战士没有理由退出战场一样。她此时的苦恼不在于压力和困难的大小，倒是因为不被人理解。多少年以前，曾经和她一样有志趣的丈夫，也突然变得不能理解她了，她怎么办呢？

看样子，现在就这个问题再讨论下去，不会有什么乐观的结果，江澜波就换了一个话题。她正色地说：“听说你要给丹江换学校？这是很不好的，你给孩子灌输利己主义的东西，你不感到害羞吗？”

冯骏安没想到，她这样快就知道了这件事，他说：“丹江这丫头，光图学校牌子好听。好吧，既然你同意她进师大，将来分到外地，你们娘俩都不后悔就行。我可没有能力再把她运动回北京来。”

“不害臊！”江澜波说，“亏你还是个共产党员呢！”

这一条，算是顺利达成了协议，但江澜波估计，这是冯骏安妥协的姿态，退一步，也许是为了进两步呢！

他站在世界屋脊

冯骏安走得很早，好像说单位有什么事急待他去处理。临走，他在江澜波枕畔留了一张写在台历上的字条：你等着我，中午12点我赶回来。

看看表，已经8点了，各个房间都上了锁，各人都忙各自的事去了，只有白月娴是闲人，在阳台上给菊花浇水。

北京的秋老虎天气还是够厉害的，虽然已经是八月底，外面还是热烘烘的，反倒是躲在屋子里凉快。

白月娴对儿媳妇说：“早点在厨房里，油饼、火烧都有，还给你留一碗豆汁儿呢，这年头，吃碗豆汁儿要跑到天桥！”

老北京人才吃得下那酸臭的豆汁儿。在这点上，江澜波可够不上“老北京”的标准，她连闻都不敢闻，只拿了一个油饼来到阳台上。

白月娴对她说：“你给我好好歇几天，养养秋膘。天南海北跑了20年，还没有跑累吗？我老了，什么都不盼了，就剩你这一件心事了，晚上骏安对你说了吧？我就像个老母鸡似的，张开翅膀，把小鸡雏都揽到膀子底下护起来，风吹不着、雨淋不着，也就心静了，我还能有几年活头？”

又是这一套！可是江澜波不好像驳丈夫那样驳婆婆，只能说：“我在外面挺好的，没遭什么罪。”

白月娴说：“你自己去照照镜子，不怕你不乐意听，都老成啥样子了？”

江澜波深怕又陷到不快当中去，就笑着说：“妈，骏安要我12点钟在家等他，还有几个钟头的余闲，我想出去看看老同学、老朋友，就回来。”

“去吧，去吧，”老太太放下小喷壶，挥挥手，说：“真是野

惯了的鸟儿，笼子里一会儿也圈不住啊！”

江澜波笑了笑，带上房门，一口气从8楼下到底层。

说真的，江澜波中学、大学时代的伙伴们，在北京工作的少说有七八十个，从司、局长到普通工人都有，只有极个别几个同她保持着联系，更多的都是冯骏安提供给她们的。昨天晚上，他指着她保存了多年的几张毕业合影，逐一介绍。江澜波真没想到，她旧时的伙伴竟集中在北京这么一大群！像倦鸟归林一样，那些毕业时喊着豪言壮语走向四面八方的青年人，还有“文化大革命”年月因种种原因被注销了城市户口，遣送到天南地北的老同学，近几年都用各种各样的手段陆续回到了北京。

说实在的，江澜波只要有时间，都想去拜望拜望他们，她甚至想搞一次热热闹闹的同学会。

但是，她首当其冲的任务是去清华大学水利系。听着各种现代音响组成的市声噪音，她仿佛听到了西陵峡长江水宣泄的声浪，卷扬机、推土机和震捣器的轰鸣。她苦笑了，她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事实上无论走到哪里，她都是水利工程协奏曲里的一个音符！但她不乐意把去清华大学复测数据的实情告诉婆母，她从白月嫒的言谈话语里得出结论，老太太讨厌这个话题。

为了避免在平安里换郊区车耗费许多时间，她破例地叫了一辆出租车，直驱清华园。一踏进校门，她像回了娘家一样，连张光斗那样的水利专家她都很熟，有好些教授是她爸爸生前的挚友。何况，这些人又是她的业师，一听她提出的要求，教授们都乐意为她大开绿灯。

整个一上午，她是在电脑中心站度过的。有的老师为她搬来足能拉半车的资料，有的亲自帮她测算。测算结果在中午吃饭铃响时出来了，她几乎乐得跳起来，打一道防渗墙是毫无问题的。有些人硬是不相信人的大脑，而相信由人设计出来的电脑，这回电脑不是出来作证了吗？

她将数据抄下来，又反复核对了几遍，才同几个老师一同走出中心站。大家争相拉她到家里去吃中饭。她怕12点钟赶不回城里，丈夫不高兴，就推说有急事，改天再来叨扰，告辞了。

这回，她无论如何不肯破费，再叫出租车了。看看表，她有些着急，只差10分钟就到12点了，她还滞留在清华园门口，等车的长龙排出有一华里，转了好几圈。如果换三次车到家，即或遇上西单口的大堵塞，怕也要迟到一个半小时。

她决定先到丈夫的所在单位——铁道设计院去，从那里再打电话给家里，耍一个小小的滑头。表明自己并没有失约，是在这里等丈夫的。

少女时代喜欢促狭的心，一刹那间仿佛复活了，她跳上车，赶到了设计院。

正赶上下班的人们到食堂去用午餐，她逢人便打听丈夫的下落。

一个不认识，两个不认识，几乎所有的人都摇头。她觉得奇怪，丈夫即或是烧锅炉的季节性临时工吧，也总不至于谁都不知道呀！

后来，一个好心人把她介绍给一个中年胖子，说：“花名册都在他脑子里呢，劳资科长。”

劳资科长听了江澜波的询问，皱起眉头想了想，说：“绝对没有这个人。不但现在没有，文化大革命前也没有。除非是1952年以前转走的，我是1952年到院里来的。”

江澜波觉得索然无味，正要转身离开，胖科长拿筷子敲着碗边又甦了回来：“他叫什么？冯骏安对不对？”

江澜波说：“是的，骏马的骏，安全的安。”

“有印象。”胖科长敲着饭碗，回忆着说：“有这么个人，几年前，来联系过，好像是从大西南来……”

“对，对。”江澜波说，“是1959年铁道学院毕业的，学的专

业是桥梁隧道。”

“啊，想起来了。”胖科长拿筷子向上捅了捅眼镜，说：“前两个月他还来找过我们人事处长，说他现在的专业不对口，学非所用，可我们这儿超编的三十几个，都还没办法解决。当时，我记得他很风趣地笑了，说：“那好吧，我只好再卖几年萝卜白菜了”！

江澜波大吃一惊：“您搞错了吧？什么卖萝卜白菜？”

“错不了。”胖科长说，“我印象挺深嘛，当时问了他现在干什么，他咧咧嘴，说在市蔬菜公司。”

这时，食堂门口有人在喊：“胖科长，再来排队，扣肉可卖光了！”

胖科长答应一声，对江澜波说了句“对不起，回头见”，敲着碗，一溜烟儿钻进了大食堂。

江澜波似信非信地在铁道设计院花坛前站了好久，为了弄清真伪，她真的到市蔬菜公司去了，至于给家里打电话的事，忘得一干二净。

连门卫打更的老头都认识冯骏安。他扁着没牙的嘴，说：“你找冯科长啊，你是调白菜呀，还是调土豆？你得去找李科长，李科长是管调运、批发的，冯科长管政工。”

江澜波真有点怀疑这是不是变戏法！为了弄清楚，她还是走进了那栋小红楼。根本不用再问任何人，政工科门口挂着个防火、卫生负责人的小木牌，上面赫然写着冯骏安的大名，而且她认得出，那就是冯骏安本人的笔迹！

宛如在她眼前爆炸了一颗原子弹，烟浪、气浪、火焰……一下子把她包围起来，天旋地转，她费了好大劲才算勉强扶墙站住。

一切都明白了！怪不得冯骏安向来不在信中提及他的专业！怪不得他千叮咛万嘱咐，要她寄信写家里的地址，这一切原来都

是圈套！显而易见，家里人一定都知道“冯科长”的秘密，他们订过攻守同盟，只瞒住江澜波一个人！

为什么这样呢？家里人对冯骏安为了回北京甘愿丢下他的专业去和白菜、萝卜打交道，是同情和支持的，于是对他们眼中惟一的反对者严加封锁消息。

她再也没办法原谅冯骏安了，不是不想原谅，是理智不允许原谅。

她没有转回家去，与丈夫的约会此时对她仿佛没有一点意义了。她自己也闹不清楚，她是怎样来到颐和园的。

颐和园的游人永远是那么多，时值晴秋，不像春天那样风沙蔽日，也不像夏天那样酷热难当，实在是游颐和园的最佳时光。

她寻到了一个僻静的角落。那是石舫后头的一块洼地，长满发黄的野草，江澜波用脚踢干净一块地面，疲乏地坐下去，身子倚到一棵刻满“××到此一游”之类铭文的柳树干上。

到底该怎么办呢？

她觉得有两根绳索同时套在她身上，一根拴在葛洲坝，另一根拴在亲人的手里；一根是事业，一根是亲人之情，有时双方的拉力势均力敌，就更加使她有如五马分尸一般的痛苦。

像丈夫一样背叛初衷，去过那种随波逐流的日子吗？那容易得很，听其自然就行。逆水行舟除了要勇气，还要有一种牺牲精神呢。

在很早以前，当丈夫还没有回北京的时候，她曾经提议丈夫调到葛洲坝来，到处都有铁路，却不可能到处都有水电站啊！

她落空了。那么，现在再提议让丈夫到葛洲坝去安家落户，岂不等于把他从天堂赶下地狱那么难吗？

去迁就冯骏安吗？她不能想像，离开了水电站，离开了她能够为祖国尽力的地方，她怀疑自己会精神失常的。可是，万一自己执意永远留在异乡，她将会给家庭带来多大的阴影呢？

不听话的眼泪涌出了眼眶。她想起了冯骏安从前的誓言，想起了彼此献身事业的志向，一切都恍如昨天。啊，真的是昨天吗？怎么昨天显得这样遥远了呢？

“明天我带你去逛长城！”突然，一个粗嘎的嗓门在江澜波身后响起来。

她侧过脸去，看见一个很壮实的汉子领着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向草丛走来。那小男孩穿着维吾尔族的长条格子袍，头上戴一顶多角彩帽，孩子脸色煞白，一副孱弱的病态，不像是化装跳舞的小演员，显然是地道的维吾尔族孩子。

只听那孩子用极不流利的汉语问道：“爸爸，那个的……咱那里怎么不修长城呢？”

当父亲的很严肃地说：“有啊！咱那里有一条看不见的长城，从北疆一直到南疆，解放军不就是保卫我们的长城吗？”

这一大一小坐到了江澜波不远的地方，当父亲的拿出一包葡萄干，递给孩子：“吃一点吧。”

可能是出于礼貌吧，那个爸爸碰碰儿子的手，说：“去给那个阿姨送点去，尝尝咱新疆的白葡萄干。”

孩子真的捧了一捧葡萄干过来，说：“阿姨，你的……吃吧。”

江澜波笑了，摸摸孩子的脸，说：“你自己吃吧，真乖！家在哪儿住啊？”

孩子说：“新疆。我们走了，过几天的，上火车。”

江澜波不由得注意起那个男人来，暗暗猜测，他是到北京出差吗？他长的样子怎么像汉族呢？

那是一张典型的北方大汉的脸，颧骨和额头都很突出，整个轮廓是粗线条的，头颅棱角分明，像是雕塑家随意砍出个雏形，尚未来得及精雕细刻的样子。可惜，他的脸有点歪斜，确切点说，左脸比右脸要小一圈，原来从眉脊骨一直延伸到腮边，有一

条长而深的疤痕，手术做得不太好，肌肉紧缩向刀口，形成亮闪闪的凸起的紫疤。

长时间注意别人的生理缺陷是不礼貌的，她意识到这点，刚要转过头来时，那男人向她走过去，盯了她好久，突然问：“假如我没有记错，你是姓江吧？清华附中毕业的？”

莫非是旧时的同学吗？江澜波没有急于作答，又把他仔细打量一番，没有在心底搜索到半点熟悉的影子。她摇摇头，反问了一句：“您是……”

那中年男人高兴得咧开嘴笑了，刀疤显得更亮：“你面貌改了不少，可声音一点没变，你是江澜波，你爸爸是水利系教授，对吧？”

他既然说得这么具体，无疑是对自己相当熟悉了。江澜波说：“您猜对了，我是江澜波。我可是无论如何想不起您来了。”

那人摸摸脸上的紫疤，大笑道：“你怎么认得出？苏联大兵的马刀在我的脸上修饰了一下。别说你呀，那年我从新疆回来，站到妈妈跟前，她还问我：同志，你找谁呀？”

江澜波说：“说了半天，你到底还没有报姓名啊！”

他好像在搞记忆力测试，偏偏不告诉她：“你忘了吗？有一年你们家遭了一次飞祸，足球飞到你家阳台上，把落地大窗的玻璃砸了个粉碎……”

啊，她记起来了：“足球大王？你是足球大王楚志民？”

楚志民哈哈大笑起来：“看样子，你的大脑皮层除了装电流、电波而外，也还装点别的。我记得，因为飞起来的玻璃碴子划破了你的脸，使你的脸上贴了两块十字形胶布，同学都叫你‘蒋介石’，你恼火极了，整整一学期不跟我说话。”

江澜波欢快地笑起来，少年时代生活的爽风，暂时驱走了现实生活的乌云。

江澜波问他：“你很早就到新疆去了吗？我记得你高中毕业

以后考到南京大学天文系了。”

“不是天文，”楚志民说，“是气象专业。毕业后我自愿到新疆，在世界屋脊的气象观测站工作，吃手扒肉吃了这么多年！”

江澜波问：“你怎么受的伤？是伊犁事件吗？”

楚志民点点头。他说：“叛匪们想把我裹胁走，我同他们拼了一阵，被马刀砍伤了。”说到这里，他拍了拍那个孩子，说：“这孩子就是那时候成了孤儿的，他的父亲母亲都是共产党员，他爸爸是县委书记，都在那个晚上被杀害了。”

“我还以为他是你的儿子呢。”江澜波说。

“儿子？”楚志民哈哈大笑起来，“我还没结过婚，哪来的儿子呢。”

江澜波猜得到，因为他的面貌毁伤，没有哪个姑娘肯嫁给他，她不好就这个话题深谈下去，正思索一个愉快的题目，楚志民又哈哈一乐，说：“你一定猜，没人肯嫁我这么个丑鬼，是吧？其实，想找一个女人，还是找得到的。我不乐意，累赘。即或有愿意找一个有疤丈夫的姑娘，却难找到一个愿意在冰天雪地里度过一生的女人。真的，我呆的地方，古时候叫葱岭，自古以来路断人稀，一般人在那住上半年，就和出家人一样难熬了。”

“你哪？”江澜波很佩服他的豪爽、乐观，她终于找到了一个有共同语言的人，一个在她看来还保留着从前那种气概的人。她笑着问他：“你没有想过下山吗？没有人替你使劲，把你调回北京吗？”

“我也是人，”楚志民拧着眉头说，“我也没有吃苦的嗜好。可是，总得有人去干吃苦的事啊！若说没想过下山，那是骗人的，可我留下来了，而且相信会留到生命终止那一天。你知道吗？我们那里实行冰葬，把尸体摆在海拔六千多米的冰川上，空气稀薄，没有菌类繁殖，几千年都不会腐烂，比埃及的木乃伊要完好、干净得多。将来我要写一本自传，临死时掖到怀里，等待

后来考证，省得他们费事，别把我误当成什么猿人。哈哈哈哈哈……”

他笑得那么开心，那么无忧无虑，连那沉郁的孩子都受了感染，也咧开小嘴笑起来。

他们谈起了老同学，谈起已经当了司局长的同学，谈起了在国外专家组服务的同学，也谈起死在越南战场的同学……

江澜波感慨地说：“好多旧同学都变了，像竹节虫一样，能够随着竹叶的青黄改变颜色，他们是深深懂得生存学问的。”

楚志民很懂得江澜波的意思，他笑着说：“我不管别人。人微言轻，我谁都管不了，但我能够管住自己。地球有一天可能会变冷、毁灭，可是美好的与丑恶的东西总不能同时毁掉。当阴转多云、多云转雨的时候，我能预报出明天是万里晴空。”

他说得那么自豪，那么自信，仿佛他是主宰世界命运的人。

“你是对的，对的。”江澜波讷讷地说着，“都是对的，只有你才真正管得了自己……”

楚志民一时摸不透她的内心世界，但看得出她处在深深的矛盾漩涡之中。

他诚恳地说：“你要我帮助吗？你不管有什么困难，只要我办得到。我有力气，足球大王的力气；我有钱，不多，千八百块还有。”

“谢谢！”江澜波笑了，“你已经帮助过我了。走，咱们去吃饭，去吃烤鸭，我请客。”

她本来想邀他们父子俩到家去的，倒不是担心家里人对她的老同学不热情，她只是不希望另一种境界和追求的人来打扰他们的谈话。

江澜波的邀请，马上被楚志民接受了：“不谋而合。回新疆前，我本来打算要带这孩子去吃一顿烤鸭的。这孩子得了胆结石症，住了半个月医院，开刀后正需要吃点好的补养补养呢！你什

么时候能到新疆就好了，我会做手扒肉、烤羊肉串，保险你吃了第一回想第二回。”

江澜波格格地笑起来，说：“你哪天走？”

楚志民说：“大概还得住三五天。我们站里买了一批仪器，发了货就走。”

江澜波说：“来得及，我也要呆几天，我到时候去送你。”

三个人一起走出颐和园大门。

铁路工程师在蔬菜站安身立命

这一天过得真快活！江澜波同楚志民父子在和平门新建的烤鸭店门口分手后，坐上电车回家去。

下班的时间早过了，电车上仍然处在拥挤的高峰，她的胸脯抵在别人的后背上，她的脊背挤在电镀栏杆上，她透不过气来，仿佛就要压成人干的样子。可她仍旧很快活，脸微微有点发烧，那是她喝了一杯加饭酒的缘故。在闹闹嚷嚷的电车里，江澜波的思绪忽而飞上禽鸟绝迹的葱岭雪峰，忽而飞到长江的源头。对了，长江不是也发源在很高的雪峰吗？她从来没有意识到帕米尔雪山这样亲切。搞水利，露宿风餐算是艰苦的了，可是比起楚志民来，实在不算什么。

再过几天，楚志民就要回到世界屋脊去了，越过茫茫的戈壁滩，走上冰天雪地的帕米尔。他不能再多耽搁了，过了九月份，天山那里就大雪封山了，他必须赶在封山前回去。

她觉得，楚志民身上有一股热力，这热力足以把他周围的人熔化！可是，当江澜波一站一站地接近前三门住宅时，她又坠入了现实的冷静中……啊，和楚志民这种人好像不是同在一个地球上的人……还有，她的冯骏安呢？可笑，萝卜、白菜能和桥梁、隧道合二而一！这本身并不可笑，可笑的在于冯骏安那样心安

理得！

她害怕回到那舒适的安乐窝里去。一张张充满爱的脸，对她是个抵御不了的威胁，她的意志经得住荒野的狂风骤雨，却经不起家庭镪水的浸泡。

决裂是很容易的，叫他们去骂几声“怪人”、“冷血动物”、“傻瓜”，她仍旧可以回到她的重力坝上去。她不愿意伤害亲人，因为她爱她的丈夫、孩子，有时不免连他们明显的缺陷都能够原谅。

她终于又绕回到家门前了，这已经是万家灯火时分，对面新侨饭店里的外宾大概正在举办舞会，打击乐的声浪一阵高似一阵。

她游移了一阵，抖擞一下精神，爬上了8楼。

她看得出，丈夫是把满肚子不快压在心底的，脸上尽量做出宽容的笑，问她：“你呀，跑到哪里去了？我差点叫骏骧和安江到派出所去发寻人启示了。”说到这里，他叫了声“丹江，咱家的‘居里夫人’回来了，快把火锅拿进来。”

丹江答应一声。

冯骏安对江澜波说：“你大概很久没吃涮羊肉了吧？今天你尝尝我这份汤吧！肥鸡汤，外加海蟹子肉，除了我，别人可搞不来这海味。”

江澜波忽然想起蔬菜公司的冯科长来，不禁在心里暗笑：你是蔬菜商店的嘛，买菜当然是方便的了。

不过她没有说出来，只是说：“我在外面吃过了，和一个老同学吃的烤鸭，真的，你别麻烦了。”

冯骏安不由得信，她脸上带着酒，他向端着火锅进来的女儿挥挥手，说：“熄了火，留着明天给你妈妈吃。快去烧一杯浓咖啡来，多加点糖。”

他一边说，一边伸手拉开冰箱，拿出两个冰镇的蜜桔来，

说：“尝尝，我刚买的，江西无核桔。”

你能说冯骏安不够热情吗？照说，老夫老妻是用不到这样周到、客气的。

有时候，江澜波真希望他发火，那她就可以同他争吵、乃至于出走！

可他偏偏像哄孩子一样哄着你，叫你想发火都发不起来。真别扭死了！

江澜波剥开一个桔子吃着，问：“有没有我的电报？”

冯骏安乐起来：“你呀，家里也拴不住你的心！你们单位会那么不通情理，前脚到家，后脚就发金牌叫你？”

江澜波说：“这是我同孟总约好的。究竟是打双层防渗墙，还是打一道，方案在动工后也没有最后定，投料和工艺都是中国独创的，有些洋教条们口口声声说：外国没有先例，万一一道防渗墙被大水冲垮，谁负得起责任？因此好多人主张打两道，万无一失。”

冯骏安一听便懂了：“不用问，你是主张打一道防渗墙的。”

江澜波说：“当然。我算出的数据，是保险的。今天我到清华去了，专家们又帮我测算了一遍，我心里更有底了。”

冯骏安说：“你别忘了，图纸上，你这副总工程师要签名的，多打一道防渗墙对你有什么损失？倘若因为少打一道而出了大事故，你就是千古罪人，知道吗？千古罪人！”

江澜波有些吃惊：“骏安！你怎么说这种世俗话？你知道多打一道防渗墙要多花多少钱吗？3 000 万，盖民用住宅楼可以盖一百幢。一个工程技术人员，可以这样拿国家的钱打水漂吗？”

冯骏安见她认真起来，便妥协说：“好，好，这儿不是你的设计室，你打几道我都不管，这行了吧？”

江澜波从抽屉里找出一张纸，从笔记本上抄下密密麻麻两大篇测试数据，掖进口袋，说：“我去火车站，连夜拍个电报。”

冯骏安说：“你的腿就那么不值钱？叫孩子们去拍还不一样？”说罢喊来了丹江，“去，给妈妈拍封电报。”

丹江捧着咖啡壶进来，说：“什么了不起的事不能过夜？我明早晨去拍吧！”

江澜波皱皱眉头，说：“算了，还是我自己去吧。”

冯骏安搅拌着咖啡，又叫儿子冯安江。

妹妹丹江说：“别叫了，他放下饭碗就同女朋友玩儿去了。”

冯骏安摇摇头，披上一件外衣，对江澜波说：“走吧，去散步，我陪你去拍报。”

当他们来到楼外时，恰好小叔子冯骏骧进来，头上还罩着骑摩托的玻璃罩，浑身是汽油、机油的混和味。江澜波早听说了，冯骏骧买了一辆日本铃木牌轻骑摩托车，追上了北京的“摩托热”，白月娴给了他500元，骏安支援他500元，听说他还外借500多元呢。嫂子很不理解，他买摩托车干什么？他工作的地点就在花市大街，从家里出发步行，5分钟就到，连骑自行车都大可不必，他却要高速车代步！据丹江挖苦他说，每天早晨上班，他要向相反方向走，从前门直奔珠市口、天桥，再绕到体育馆，然后经幸福大街，沿8路汽车线路绕到花市。

一想起这件事来，江澜波感到好笑，她问道：“大概今天是从东郊绕回来的吧？”

骏骧一点不害羞，说：“比那要远，再不过瘾，就骑不着摩托车了！”

冯骏安问：“怎么，玩儿厌了？”

冯骏骧摘去玻璃面罩，大发起牢骚来：“厌不厌，反正过几天我就得拿到王府井寄卖商店去卖！”

冯骏安反倒乐了：“阿弥陀佛！你总算觉悟了。骑这玩意儿终究悬！钱花多少是小事，我就亲眼看过好几回交通肇事了，都是摩托车同汽车相撞！”

冯骏骧说：“谁撞上谁倒霉，我倒不是因为怕死才卖车。你到寄卖店去看看，都在往外抛，卖不掉，八折都扣不住。”

“怎么，”哥哥有几分惊讶，“热浪这么快就过去了？”

“去他妈的吧！”冯骏骧忍不住骂了起来，“真阴损，真缺德！穷急了，又想出花花点子从我们身上榨油！老子不骑了，你还榨个屁！”

听了半天，江澜波也没听明白他在骂谁，经他一解释，才恍然大悟了。

原来，北京城有几千辆私人摩托车，这本身倒无可非议。可是最近税务局到各油料门市部全面调查一次，结论相当惊人，一年之内，全北京市只卖出几十公升汽油，不够一台摩托的消耗。那么，这些私人摩托总不会拿凉水当燃料吧？仔细一摸底，终于发现了秘密。车主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偷、摸、换、要……反正全是从公家汽车库的油桶里倒出来的。高级一点的向人家要加油票，损一点的和汽车司机挂好钩，在某个胡同口，打开油箱盖，用胶皮管子往外抽，抽进摩托车的油箱中。于是，北京市新制定了一条政策：出售摩托车的商店，同时在车价以外核收一年的汽油费，发给油票，而且逐年要像收税一样收油费。哪怕你的车在家里放着10年不骑，哪怕你一滴油不去买，但油料费还是要按年度照缴！

于是摩托车热降到了冰点以下。这就是冯骏骧破口大骂的原因。

听了他的讲述，江澜波反倒哈哈大笑起来：“这个办法真好！把你们这些揩国家油的窟窿堵上了。”

冯骏骧撇撇嘴说：“明目张胆大摸大拿的倒合法，我们揩点油就犯法？屁！我爸爸若活着，坐在部长椅子上，我还用骑摩托车？上海牌轿车就有我一半使用权。”

江澜波说：“别说这没出息的话。干吗要学那些纨绔子弟的

作风？一个人活着，要为国家做事情才对，靠老子活着，有什么意思！”

冯骏安说：“快去吃你的饭吧，我同你嫂子去发封电报。”

“你怎么不早说？”冯骏骧又罩上了玻璃面罩，“我骑摩托车去。”

冯骏安做主说：“你去吧。”骏骧从江澜波手里要来电报稿，江澜波千叮咛万嘱咐，提醒他一个字码都不能抄错。冯骏骧答应一声，跑到一楼的大餐厅后院去推摩托车。他有本事常常给餐厅的管理员搞到几张内参影票，代价是代存摩托车。否则，他再强壮，也没有本事天天扛着摩托车上下8层楼。

冯骏安忽然想起了什么，追到餐厅后院，同冯骏骧嘀咕了一阵。

冯骏安走回来，对江澜波说：“屋子里怪闷的，咱们翘翘弯儿吧！”

江澜波不反对，夫妻俩沿着崇文门大街一直向北走。

这正是鸭梨和大柿子上市的季节，沿马路摆着一溜溜儿的水果摊子，叫卖的都是小青年，还有手上挑着港衫、喇叭裤的，卖大碗凉茶的。

江澜波说：“想不到北京这么热闹了。都是待业青年吗？”

冯骏安说：“是呀，总比结伙打群架、撬门破锁叫人放心些。唉，中国人实在太多了。听说最近在给马寅初老先生过百岁生日，平了反。唉，假如当初不批他的‘人口论’，据说现在中国的人口只能到6亿，整整少4个亿，你看那有多轻松！北京断不会挤到这种程度的！”

江澜波说：“当然是这样。人多了是困难多，可人越多越不干活，才是更大的坏事。即或全国只有一亿人口，大家都争先恐后拥到北京来享福，都不想去建设艰苦的地方，那同样是灾难！”

冯骏安敏锐地感受到妻子的弦外之音，他说：“也不能说要

进北京的人都是为了坐享其成。乡土观念也是一个因素。咱不谈这些了。今天你叫我白白等了一个午后，你知道我的工作多忙，几条干线正在改电器化设备……”

他不继续圆谎，江澜波原也没有急于戳穿他的意思。她明白，丈夫被迫离开本行去经营蔬菜，心里未必不烦恼，可是他还在硬充！

于是江澜波说：“是呀，你是很忙。一个下午不去，也许会影响两火车皮卷心菜脱手，要烂掉一批吧？”

冯骏安突然站住了，样子十分尴尬，假如不是路灯昏暗，她会欣赏到她全部的狼狈相的。

江澜波格格笑了起来，笑过，她觉得眼里一阵阵酸楚，滴出泪来。

冯骏安挽起她的胳膊，走进东单公园大门。江澜波甩脱了他。

冯骏安说：“我……并没有想永远对你瞒下去。你知道，我心里更不是滋味。为了回北京，有什么办法？就得降格。当时，即便铁路系统同意接收，也办不了进京户口。幸好蔬菜公司的乔经理过去当过爸爸的警卫员，这才在他们系统仅有的三个落实政策进京名额里挤了我这么一个……”

江澜波苦笑着，坐到一张白漆长椅上，说：“你以为我会同情你吗？你不感到害羞吗？像骏骧，像安江他们，他们即使再过分一点，我都能够理解。可是，你是50年代的大学生啊！你走到这一步，实在是叫我寒心啊！”

冯骏安不安地说：“这……不过是权宜之计。我正在抓紧联系归队，已经有了眉目。同在北京市，户口问题不涉及，就好办得多了，这是曲线……”

江澜波问道：“你是不是也想运用‘曲线轨迹’把我弄回北京呢？你别吞吞吐吐的。”

“我知道你的脾气。”冯骏安说，“在事业上，你比我坚强，我斗争了好久，我不敢勉强你。你如果可怜我，你如果还念夫妻的情分，我相信你自己会有一个妥善的考虑。真的，我不勉强你……我只是觉得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江澜波说：“老一代革命家付出的代价不比你我大吗？”

冯骏安苦笑：“这我承认。可是我们得到了什么？62元的工资吗？”

江澜波霍地跳起来：“你真说得出口啊！你这样算收入和支出的账吗？那你应当去走私，去投机倒把，那不是更合算吗？”

冯骏安像被霜打了一样，双手埋手掌里，半晌才讷讷地说：“你，这样看我吗？”

话说出去，江澜波又觉得有些后悔。是不是太过分了、太挖苦了？从感情上讲，她无论如何不相信，或者说不愿意相信丈夫已经堕落到这种可怜的地步。

这是从前的冯骏安吗？

她不由得追忆起往事来。

那是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江澜波得了讨厌的腰椎结核病，住进了积水潭医院。她自己翻查了大量医书，知道这场病的后果是什么，搞水利的难道可以不爬山涉水吗？她痛苦、绝望，她流着眼泪写好了退学报告。她知道，培养一个大学生，国家每年要支出一万元的学费，5年就是5万元。她不忍心让国家花上5万元造就一个拄双拐或者坐手摇车的废物！

这时候冯骏安跑来了，给她带来了一本新翻译出版的书：《居里夫人》，他不准江澜波说自己的想法，他说：“我每天来给你念一段，等书念完了，咱们再谈下一步。”

从那以后，每当黄昏降临的时候，冯骏安便夹着《居里夫人》来到她的病床旁边，他含着热泪低声吟读，她流着泪静静地听……一直读了20个黄昏！

江澜波哭了，她觉得居里夫人的伟大，不在于她发现了放射性金属元素镭；她的荣誉，不在于两次获得诺贝尔奖金。她的伟大和荣誉，恰恰首先因为她是一个坚强的人，是个把自己的身心都献给了人类科学事业的人。

顽强地学习下去，顽强地锻炼起来，江澜波居然没有残废，奇迹般地走出了积水潭医院！

她永远感谢在她困难的时候给她以力量的冯骏安。他们是清华附中的老同学，他们此前不过是一般的同学关系，她的住院成了媒介，她爱上了冯骏安。

她自认为自己没有长错眼珠。

尽管他们走出大学校门的年代，凭关系、走后门还被人们认为是可耻的，但毕竟不能说一点没有。只要冯骏安稍稍动摇一下，凭他有个当部长的爸爸，他只消找到学生科长说一声，他就可以留校当助教，或者到铁道设计院去。事实上，内定名单里，他果然是留校的，他的学业、操行都是无可挑剔的，不会引起任何非议。

可是他一连打了5次申请，执意要去建设大西南。当校党委通知他如愿以偿的时候，他连车都没坐，从铁道学院跑步进了清华园，竟然当着江澜波同寝室三个女同学的面，把江澜波抱了起来，在屋地上转了三圈，那股子狂热劲儿，真让人振奋！

这才是她的冯骏安啊！

二十多年过去了，难道无情的时间风雨把他的刚劲都洗刷净尽了吗？难道恶劣的世风把他全部污染了吗？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浑身“冒傻气”的人

安逸有时候比劳累更消耗机体。回到北京仅仅几天，她就病

倒了。她不发烧，也没有什么急症，浑身倦怠，腰酸腿软，所有的骨节缝都痛，吃饭不香，闭上眼睛就是一连串的噩梦。

全家人都慌了，老太太主张送她去日坛医院全面检查一次，女儿丹江则认为友谊医院的医术高明。但是江澜波一口咬定自己没病，说躺躺就好。没办法，冯骏安只好以朋友之情，请来一位北京医院的内科大夫，叫王浣，也是江澜波的老同学，北京医学院毕业生，如今都当了内科主任了。

江澜波从床上爬起来，一边给客人斟茶，一边说：“没想到老冯把你搬来了，听说你当科主任了？”

王浣还是孩童时代那无忧无虑的样子，双手抱肩，打量着江澜波笑道：“恕我直言，若在街上见到你这副尊容，我真是死也不敢认了。你简直是个老太婆了！你大概从来都不照镜子吧？”

这句话说得江澜波心里一阵阵发凉，脸上挂着笑，心里却不是滋味。只有对比，才看出高低上下。她和王浣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同桌，王浣还大她一岁呢！可是你看她春风满面的样子，简直像三十挂零的人！她只有在笑着的时候，眼角才现出几条浅浅的鱼尾纹，也许由于王浣天生乐观，也许因为她一直处于顺风佳境，也许她的职业给了她防衰秘诀，你看她的脸蛋，又红又白，绝不比年轻姑娘的皮肤逊色。而自己呢？何用照镜子？伸手摸一把，就能感受到皮肤的粗糙，那是野外的风沙、强烈的紫外线留给她的纪念。

王浣不也是科主任了吗？她每天穿着软底鞋、白大褂，出入于一尘不染的办公间、化验室，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她是幸运的。据说，她早在1974年就入了党。自己呢？至今还只是一个党外积极分子——保持了20年的积极分子资格，那一步，无论如何迈不过去，有时她自己也弄不清，自己的致命弱点在什么地方。从前，江澜波在每个月的思想汇报材料里，很容易写上几条缺点，诸如知识分子的脆弱啊、小资产阶级情调啊、清高啊……

后来，她发觉，她无法再违心地重复写下去，她更不愿意为自己捏造几条罪状。可是，话又说回来，难道可以说自己没有毛病了吗？难道一个没有毛病的人会被关在党的大门之外吗？

这只是缠绕她心灵的苦恼罢了，每当苦恼不可排解的时候，她惟一的办法就是拼命去工作。

王浣从大衣兜里掏出听诊器，放到茶几上，刚拿起热茶杯，冯骏安早从雪花牌冰箱里取出一杯果子露来，送到王浣面前：“这热天喝茶，要出汗的，来，喝这个。”

王浣啜了一口果子露，说：“澜波递茶，老传统；骏安从冰箱里取果子露，是现代生活方式。你们俩好像有半个世纪的距离呢。”说到这里，她格格地笑了起来。

冯骏安趁机说：“创造是一种美德，这，我们都知道的；消费，也是一种美德，这对于我们当中的一些人，还是不易接受的呢。”

王浣对江澜波说：“我顽固的小妹妹，难道你真立志要葬身在荒郊野外吗？从前，你是对的；现在，你大可不必了，应该由青年一代去接替你。”

江澜波本来不打算让王浣替她做身体检查的，不知怎么的，她默许了，甚至自动解开了衣扣。

王浣熟练地调动望、闻、问、切的各种手段，给江澜波做了通体检查，连关节都用小锤子敲过了。

当她直起腰来，从耳朵上拔下听诊器时，用夸张的语气说：“你还想回你的水电站工地吗？你回去吧。我可以着手为你准备花圈、挽联了。”

望着王浣故意绷起来的面孔，江澜波扑哧一下笑了：“你真会咒人，你这叫什么医生？”

王浣说：“医生的最宝贵性格是直言！绝不会因为级别、同情或者别的世俗原因而谎报病情。我不骗你，由于你的风湿性关

节炎日趋恶化，已经累及心脏，三度湿性罗音，连见习大夫都听得出来！你的舒张压和收缩压之间仅有 20 个毫米汞柱的级差，这比任何高血压、低血压都危险。你的循环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泌尿系统，都有毛病，要化验、要透视。我看，你的全部机件都超期服役、过早地磨损了，需要大修。这好比一部老爷车，你不送工厂大修，反倒让它翻山越岭，那结果是不难想像的，我的工程师同志！

这一番话，王浣说得很严肃，她从大襟上拔下圆珠笔，在台历上扯下一页，翻过来写了一行字，交给冯骏安说：“后天……啊，星期五才行。周五早晨 8 点，你拿条子找这个人，替她联系体检。”

王浣又坐了一刻钟，谈了好些市井新闻，眉飞色舞，她知道得真多，真假却无从考证。

她只顾自己演说完毕，站起身来告辞：“我走了，欢迎你到寒舍去，我住在百万庄，对了，老冯知道。哈哈哈哈哈……”

随同一串响亮的、无忧无虑的笑声，伴着急雨点似的半高跟鞋踏击水门汀地面的清脆响声，王浣跑下楼去，使起身送她的主人追都追不上。

返身回房的冯骏安说：“唉，瞧人家多会生活！我断定，王浣还能活半个世纪。”

江澜波知道，丈夫是说给自己听的，她没有搭腔，觉得心里很乱。

客厅里在放电视，是朝鲜系列电视片《无名英雄》。江澜波推说困倦，没去看，冯骏安端了茶杯自去了。

房间里又出现了畸形的寂静，从前街隐约透进来的一两声柔和的汽车笛声，简直像来自遥远星球的电波，一切都变得不可思议起来。

高明的医生，可以一眼洞穿患者的隐疾，但对病痛最有体会

的莫过于患者自身。难道江澜波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病吗？应当承认，王浣虽然尽力夸张，可她没离大格。也许，她是冯骏安特意请来的特殊类型的“说客”，能够否认王浣的一片好心吗？

年龄不饶人，疾患也是不饶人的。

多少年来，江澜波从不在人前露出病人的征候，她生怕别人赶她住医院。她明白，迟早有一天，自己会因为支撑不住，倒在大坝上、防渗墙下，或者水利工程的其他什么地方。她从来没有为此害怕过。

今天，她有点忧心忡忡了。

江澜波才 45 岁，还不到风烛残年的地步啊！

真的是“浑身上下冒傻气”吗？

平心而论，她是太清苦了。粗茶淡饭，油污的工作服，风吹雨淋，偶尔出差坐一次硬卧，她都感到过于浪费了。可是，那些躺在卧铺车厢里二十几岁的青年人，他们不是声称“买不到卧铺不走”的吗？

青年人比自己会生活得多。你看骏逸，她洗头发嫌香皂不好用，非要用美加净牌洗发精，冲掉后，还要抹上护发素，停留两分钟再洗掉，然后涂上一二点檀香型的发乳。难怪她的头发那样光洁、柔软、漆黑。就拿卫生间的手纸来说吧，家里人用的是一元多钱一卷的软得如同丝绸般的纸，而自己呢，只是把废纸用力搓上几下，几十年如一日。再如身下这柔软的沙发床吧，无论如何比只铺一条薄褥子的硬板床要舒服得多，躺上去绝不会硌胯骨！

也许自己真的有点犯傻吧！当年“志在四方”的旧同学，如今一批又一批地回到北京、上海去了，那里需要他们，他们也需要那里，既不是犯错误，又不会被人指责为“贪图安逸”，有什么不对？不能要求做苦行僧，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舒适一些，没有谁会脸红。像自己这样依然循着 20 年前的轨道行走的人，全中国还有多少？还能不能多起来呢？

当然，少的，不等于不对，问题在于你的一切不但不被人理解，反倒成了人家的笑柄，连你的亲人都说你“冒傻气”。

骨埋荒郊？这是耸人听闻的词儿。

当然，人死在什么地方都是可能的，可你对得起你的亲人吗？

冯骏安是个不错的丈夫，他没有外心，这么多年的分居（而且是处在韶华青春阶段），他没有什么怨言，还是那样爱自己。可是，自己对这爱，投放了多少蜜糖呢？不，投放的却是苦味的黄连。一个人究竟有多少时光？难道自己真的要等三峡电站落成，再披着满头白发回到丈夫身边来吗？

江澜波好像头一次想这个问题，她竟然吓了一跳。随之而来的是压倒一切的内疚。尽管冯骏安为了回城不惜荒废自己的专业，尽管他为了让自己回到温暖的家来有点“胸无大志”，可他毕竟是人、是丈夫；而自己也毕竟是人、是妻子啊！王浣说得对：“从前，你是对的；现在，你大可不必了，应该由青年一代去代替你……”难道不对吗？葛洲坝走掉一个工程师，电站会建不成吗？

这一瞬间，她仿佛已经承认了自己的犯傻！

回来吧，该是回来的时候了，组织上会同意，同志们会谅解，家里人会兴高采烈，根本用不到像做了亏心事那样自惭。

想到这里，江澜波忽然觉得周身轻爽，她喝了一口冷茶，推开门来到客厅门口，说：“骏安，你来。”

冯骏安意外地发现她脸上漾着笑意，吃了一惊：“你没休息？什么事这么高兴？”

“我决定了。”江澜波像庄严宣告一件震惊世界的发明一样，大声说：“马上办回京手续，再也不离开你了。”

“你在说反话吧？”冯骏安不敢相信，他最了解妻子的脾气了，屋里看电视的人也都掉过头来，敏感地注意着下边的动态。

“我又不是机器人！”江澜波第一次用玩笑的口吻说话，“就是900号的机器人，也有回厂检修的时候啊！”

冯骏安乐得发狂了，以至于忘了是在老人和孩子面前，竟然像当年听说批准他们上大西南一样，把江澜波拦腰抱起来，就地转了三圈，连声喊着：“上帝哟，上帝——”

丹江捂上嘴吃吃地笑起来，哥哥捣了她一拳，奶奶叫着：“安江，把门关上。”

屋里屋外充满了笑声，幸运之神好像突然走进了8楼的这个单元！

同雪山白头偕老的人

人的心情好，可以使人允诺许多他本来不会允诺的事情。对这几天的安排，江澜波只告诉丈夫四个字：“悉听尊便。”

于是日程表经过全家协商，公布于众了。明天游香山，在外野餐；后天逛长城，也有野餐；大后天去周口店看古猿人遗址，这可是北京人很少去的地方，离市区太远，而且没有什么意思，人们对那亿万年前 的骷髅远不及菜市场的新鲜黄瓜感兴趣。

对于游山玩水，江澜波历来没有兴致，她说，她走过的江河大川，哪一处都比北京城经过人工雕琢的要壮观，所谓“曾经沧海难为水”。可是这次她没有扫家人的兴，痛痛快快地答应了，而且自告奋勇要煮一点酱牛肉，她说她的手艺是家传，多年不用，可以一试，大可与“月盛斋”媲美，又惹得一家人大笑不止。

至于今天的安排，那是经过了妥协的。冯骏安所以空出来未设科目，是因为要到北京医院陪她去全面检查身体。江澜波说：“不行，我要为楚志民送行，我答应过人家的。”

也是由于高度兴奋，冯骏安当即同意体检改期，大不了求王澍再开一张便条，她的便条又不是出国护照，不能随便作废。

江澜波本来要冯骏安同她一起去送楚志民的，冯骏安推说不认识，不肯同去，江澜波只好自己去。

去乌鲁木齐的火车是傍晚时分才开的，本来约好在车站见面，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她想到“足球大王”的家去看看。

楚志民留给江澜波一个地址，在崇文门外揽杆胡同，江澜波在新侨饭店门前坐上开往光明楼的 8 路公共汽车前往。

揽杆胡同附近几乎没有两层楼房以上的建筑，除掉一家男女浴室的门面涂了红油漆，其余是一片灰，灰的房脊，灰的围墙，灰的门楼，灰的马路……

江澜波费了好大劲，才在一个大杂院里找到了楚志民家的门牌号。

这个大杂院极大，好像原来是几个分门别院的小四合院合并而成的，院墙的墙基犹在。看来这里的居民都是干杂活的，平板车、三轮车停在窄小的过道上，满院子堆满蜂窝煤、引火柴和各种杂什家具。院子中间有一个自来水龙头，水管底下砌着水泥的盛水槽。大杂院房屋里显然都没有上下水设施，人们排着队在这里接水。

江澜波一眼看到了楚志民的养子，那个维吾尔族的小男孩，他头上戴着五色方顶小花帽，穿着长衫、马皮小靴，正和一群半大孩子摔纸人。大概这孩子第一次见到这种游戏，把印在硬纸板上的水浒人物头像剪下来，扔在地上摔，脸朝上就算赢了。

江澜波没有惊动维吾尔族孩子，她向一个提着菜篮子走出门的老太太问了一下，朝最里面的一间走去。

这是一间紧靠院墙的厢房，坐东朝西，窗子都是“彡”字形木窗棂，没有改造过，一色是窗纸糊的。有一面墙是重砌的，大概是 1976 年唐山大地震余波震塌过的。江澜波听楚志民讲过，他家只有 70 岁的母亲和一个年近 30 的妹妹，妹妹在石景山钢厂当化验工，每天早晨 4 点就得起床做饭，五点半在蒜市口等班

车，晚上到家最早也要七点半钟。她不敢住宿，家里不能扔下一个孤零零的老太太。江澜波还知道，楚志民的父亲原来是国家体委的干部，1968年，因为被株连到“贺龙线”上，送到青海劳改农场，1974年死在苜蓿草场，听说是心肌梗塞，楚志民一家人是3年以后才得到父亲凶信的。

江澜波登上台阶，刚要伸手敲门，猛听得屋里有一个女人嚤嚤的啜泣声，一边哭还一边悲伤、怨艾地数叨：“事业！事业就可以不要妈妈了吗？我看你的神经太僵化了，少有的傻瓜！”

江澜波在门外怔住了。她猜得到，这是楚志民的妹妹在发牢骚。

又听到一个老态的、嘶哑的声音说：“别说了！让你哥哥走吧。男儿大了，报效国家是正经，哪能都绑在床腿上。”接着是长长的一声叹息。

听了楚志民母亲的话，江澜波像触了电一样，浑身上下麻酥酥的。她猛然想起了《说岳全传》里岳母为儿子刺字的情景。

江澜波推门走了进来。

坐在方凳上的楚志民大喜过望，站起来，说：“你真是君子一言啊！妈，这就是我常说的那个江澜波，她抛家舍业，在大西南干了20年了。”

楚志民的妹妹抹抹眼睛，站起来给客人冲茶。老太太颤巍巍地起身，把江澜波拉到床头坐下，抚弄着她的头发说：“好闺女，人活着为争一口气，有出息的人不恋家，人都说我儿子傻，这也有傻做伴的吗？”

楚志民大笑起来，江澜波却觉得脸孔一阵阵发烧。

老太太同江澜波唠起家常，问她有几个孩子，问她婆婆身板是不是硬朗……最后老太太叹口气说：“你比志民强，出去工作无一牵挂。唉，我倒不是想叫儿子在膝前孝敬我，老人还能跟他几年？有出息的人自己去闯荡！就是……唉，四十多岁的人

了，不说上个媳妇，我死了也闭不上眼睛啊！”

“又来了！”楚志民抓一把五香瓜子放到江澜波面前，说：“您又不着急抱孙子，不是有一个艾买提了吗？”

妹妹插言说：“就你这傻里傻气的劲儿，瘸子、瞎子都不肯嫁你。”她转对江澜波说，“这几天左邻右舍、亲戚朋友先后给他介绍了十几个对象，有的见了面就吹，有的一听说他在雪山上工作，人家说，那座雪山化成银山，也不肯跟他去。”

楚志民哈哈大笑：“谁要你们瞎操心？有福不用忙，我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我就不相信没有人愿意上世界屋脊去。若一辈子碰不上，我就和雪山白头到老！”

这话把江澜波都逗乐了。

其实，妹妹埋怨哥哥，还有另外一层意思。据老太太说，她早在4年前就交了个女朋友，是清河毛纺厂的助理工程师。按男方的意思，早就该成亲了，可有一宗事总也谈判不妥。妹妹要求男方入赘，当上门女婿，而男方父母坚决不允，他们在北太平庄干涸的太平湖畔有五间漂亮的四合院大瓦房，又是独生子，当然不愿意儿子远走高飞，事情就一直拖了下来。

楚志民的妹妹不忍心扔下妈妈一个人冷清清过日子，于是迁怒于哥哥，自从他从新疆回来，几乎没给他好脸。

听老太太提到这档事，楚志民乐呵呵地说：“这回你该满意了吧？我的谈判天才虽然第一次显露，却证明是非凡的。”他告诉江澜波，他为这事，鞋底儿都磨薄了一层，总算达成了协议，退掉揽杆市的一间房子，妹妹带着母亲搬到北太平庄去，两家合成一家，他可以一心无挂地回他的雪山了。

江澜波看到地上有两个装得满满的旅行袋，还有几件气象用的小型仪器，看来楚志民是按原计划动身的。

但是，出于好心的“小动作”是家家都有的。正当老太太动手煮长行面，要为儿子饯行时，屋里闯来一大批人，有男有女，

都是楚志民的亲朋故旧，江澜波只认识其中的一两个。

经过简短的寒暄，楚志民的一个表弟郑重宣布说：“表哥，你可以打开旅行包了！北京气象台已经正式同意调你，答应马上发函商调，只要你们那里肯放。怎么样？想不到我们的神通吧！拿来，把火车票给我，我去给你退掉。”

妹妹紧张地注视着哥哥的脸，想找出一点惊喜的表情。

楚志民笑着，却很平淡，他说：“你以为我是因为找不到门路才滞留边疆的吗？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了，北京气象台的副台长，就是我在南大的同班同学，我若找他，不比你方便？你大概绕了不少冤枉道吧？”

表弟大为惊讶，瞪大了眼睛说：“你怎么不早说？人托人，我少说托了十几个，才摸进气象台的大门！最后拍板的正是李承祚，他这个人爽快极了，他说：‘老楚啊，我们要！连档案都不用调看。’原来你在暗中早就使上劲了，干吗叫我们瞎操心？”

楚志民说：“北京比新疆好，这我知道；正因为新疆很苦，才没有多少人乐意去。我在那里流过血、流过汗，我离不开那里。我已经给李承祚写了信，要他千万不要去调我，人即使回到北京来，心也留在雪山上，那是痛苦的，因为我最清楚，那里需要我。”

江澜波看到，泪光在楚志民的眼里闪烁。啊，一个执著的“浑身上下冒傻气的人！”他多像一面镜子，一下子照出了自己身上的污垢啊！她甚至怀疑，楚志民已经知道了自己将永远不再回到沸腾的葛洲坝工地去的事，所以她莫名其妙地脸红心跳起来。

小小的房间里又充满了沉重气氛，人们默默地聚到方桌周围，没有那么多座位，大多数人站着，陪即将长行的楚志民吃了一餐没滋没味的饯行面。

江澜波只勉强吃了半碗面条，喝了一口酒，却烧得周身像在冒火。

她不知道是怎样同大家一起赶到火车站的。开车前楚志民向她说了些什么，她都记不清了。啊，好像有这么几句：“……别忘了我，咱俩是可以心心相印的傻瓜！傻瓜有傻瓜的乐趣，聪明人有聪明人的烦恼，你说是吧？你说，达尔文不是满可以坐在伦敦舒适的房间里喝咖啡，像别人一样生活吗？可他却不惜飘洋过海，去过最苦的日子。只有后人才明白他的伟大，同代人不也嘲笑这个傻瓜吗？”

列车开走了，它载着乐观的楚志民，穿过茫茫的大戈壁，一步步爬上世界屋脊。他是充实的，义无反顾的，当然也就没有十字路口上徘徊者的苦闷。

返回崇文门的时候，江澜波没有乘车。她低着头走在钠灯桔黄灯光笼罩的马路上，一直被纷杂的思绪包围着，以至于走过了家门口都没有发觉，直到越过台基厂，到达前门箭楼，她才茫然地收住脚步。

北京的黄昏是醉人的，街心公园和便道上漫步的都是喁喁私语的情侣，他们在谈论什么？有没有像楚志民的那种人呢？应该不会太少吧！

啊，这时候，葛洲坝大坝上的灯光早就亮了吧？从西陵峡口顺江而下的客轮、拖船正亮着前照灯向2号船闸驶近吧？那焊花、弧光闪烁的工地，那推土机隆隆的大江基础工地，那蚊蚋飞舞的绘图桌前……那是令她心跳的所在呀！

安逸的生活是诱人的，天伦之乐是人人向往的；乐以忘忧的事业不是更能使人的生命得到充实吗？

到底应当怎么办呢？她觉得，她心里的天平在失去平衡，一头是事业，一头是家庭。她承认，自己比追求安逸、无所事事的人强，然而比起楚志民来，那就逊色得多了……

她不只是个女人

自从送走了楚志民，江澜波内心情绪的水银柱又开始了大幅度波动。本来她已经向家人宣布要调到北京来了，却总不踏实，好像她干了一件对不起人的事。既然决定离开葛洲坝，那里的一切，应当说都与她没有关系了，天晓得是怎么回事，她几乎天天梦见自己站在重力坝上，听着震捣器的轰鸣！她背着冯骏安，天天几次跑到一楼信报箱那里去查电报。她发往葛洲坝的电报已经好几天了，怎么如同石沉大海、杳无消息呢？

又是兴高采烈的出游！大象牌面包车就停在公寓前面。吃过早点，全家人都忙起来，骏骧、丹江在往车上搬收录机、帆布蘑菇伞，安江把整箱的啤酒、桔子汁塞到车后面的行李箱中。今天恰逢星期天，他们要到香山去欣赏开始泛红的枫叶，还要在那里野餐。生牛肉和各种作料都带齐了，那是叫江澜波煮酱牛肉的。只有军人身份的冯骏骧告不下假来，缺席，其余的全部出动。

江澜波早都答应下来，不愿意扫大家的兴。她最后一个下楼，又照例到信报箱那里去看过，仍然是失望。

她尽量装成极其快活的样子，可是内心却很焦灼。

走出楼门口，女儿丹江招呼她上车，她却见李一芳远远地从汽车站跑来，正挨个楼门看门牌号。

江澜波喊了一声：“李一芳！”

李一芳向她奔来：“你家好难找啊！住这么漂亮的房子，可比咱葛洲坝强多了。”

江澜波突然感到李一芳格外亲切，像他乡遇故知一样。从前在葛洲坝低头不见抬头见，从来没有这种感受。她拉住李一芳的手，问：“今天你们休会吗？”

李一芳摇摇头：“我是告假出来的。今天全天是分组会，

讨论。”

江澜波猜到她可能有事，就问：“有什么事吗？家里……”

她指的“家里”，当然是葛洲坝了。这使站在一旁的冯骏安听了很不舒服。

李一芳望了一眼坐在车里等着的人们，发觉那些射向自己的目光很不友善，就惴惴不安地对江澜波说：“你有事，要出门吗？那……就改天再……”

“不，”江澜波说，“没正经事，和家里人到香山去郊游，迟早没关系，你快说吧。”

李一芳这才说：“李敬来了，他要我给你送封信来。”说着，从口袋里摸出个字条，交给她说：“他到水利部去了，他说晚上来同你交换意见。”

李敬是1964年武汉水利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工程师，是属于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的，一直和江澜波在一起搞设计。江澜波有点奇怪，打防渗墙正是紧张阶段，他跑到北京来干什么呢？

她疑惑着打开了李敬写给她的字条：

江总：

你走后，一直在盼你的测算结果。他们坚持要打两道防渗墙，孟总不得已派我到京来请求水利部……

江澜波的头嗡地响了一声。几天前她就叫骏骧把测算数据拍回去了！只要技术组的人看到那些数据，一定会放弃打第二道防渗墙念头的，莫非电报误投了？

想到这里，她扶着车门问她的小叔子：“骏骧，电报地址你没有写错吧？”

冯骏骧把抱在怀里的声宝三五牌收录机交给丹江，斜了骏安一眼，嘟囔着从上衣口袋一堆烂手纸当中摸出一张电传机打出来

的电报收据，塞给她，说：“这还有错吗？天下又没有第二个葛洲坝！”

这张收据，只有宜昌字样和钱款金额，看不出什么名堂。当她看金额时，发现只有七角多钱，她犯了寻思：密密麻麻的数据，至少要花三五块钱，怎么会这样省？

江澜波对李一芳说：“上车。先送你回去，我顺路到站前电报局去查查底子。”

李一芳说：“我坐地铁回去更方便，晚上再陪李工一起来。”

“那也好。”江澜波同李一芳告别后，跳上车，说：“拐一下，先到站前。”

冯骏安当然把江澜波同李一芳的谈话听得一清二楚了，这时劝道：“有什么好查的？错不了的！”

江澜波变得十分固执：“你们若不愿意拐一下，我坐公共汽车去查。你们先去香山，我随后赶来就是了。”说着要推门下车。

白月娴出来打圆场了：“叫小司机拐一下嘛，又不费什么事。唉，电站啊，电站，咱们家都带电了！”

冯骏安有些不自然，他说：“现在服务部门的态度，哼，他给你查？不损你几句是好的！半个月也查不出个子午卯酉来！”

冯骏骧在帮腔：“这不假。非要查，等明天我去找个熟人。”

江澜波没做声。她多少有点后悔，那天晚上本来应当自己亲自去发报的，这么多数据，抄差一个都不得了啊！

5分钟后，面包车到了站前广场。没等车停稳，江澜波就跳下来，越过横道向电报局跑去。冯骏安拉了冯骏骧一把，赶紧追了上去。

车子里，丹江嘻嘻哈哈地说：“看来，妈妈一旦调回北京，说不定要患电站型神经病呢！”

人们都笑起来。

电报大厅里，满地塞满了大大小小的包裹、旅行箱，没法下

脚。拍电报的旅客挤得水泄不通。江澜波挤不到柜台前，急得团团直转。冯骏安煞有介事地埋怨着电报局的作风，一再劝江澜波晚上再来查。

江澜波一点都听不进去，她终于趁一个工作人员开门的机会，钻进了办公室，把冯骏安弟兄俩甩到外面了。

她急切地对一个干部说：“同志，我是葛洲坝工程局的。5天前，拍了一份电报，如果错了或误投，将给工程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想麻烦一下，查对一下原稿。”

那个干部接过收据看了看，说：“请坐，我去给你到报房查查看。”

两分钟后，那个干部捧了一厚沓归了宗的发报底稿走来，放到桌上，按顺序号一查，很轻易地抽出了冯骏安拟的底稿。

当这份底稿递到江澜波手上时，她瞪大了眼睛，像接到了噩耗电报一样，只觉得天旋地转，眼前一阵阵发黑。

天哪，这是真的吗？

白纸黑字，署着江澜波的名字。

电文是这样的：

返京后卧病不起住进医院特告长假

过了好一会儿，江澜波才恢复了常态，她想重新发一份电报，却又没带那些数据来，只好对那个热心的干部说：“谢谢了，拍错了。回头我再来重拍。”

她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摇摇晃晃地走出办公室的，直到冯骏安发现她脸色煞白扶住她：“澜波，你……怎么了？”

江澜波推开冯骏安，咬牙切齿地说：“你真卑劣！你这是犯罪，懂吗？我真想不到，一个人自私到这种地步，可以拿国家的事开玩笑！”

冯骏安还想打马虎眼，就向冯骏骧使了个眼色，假作生气地说：“你是怎么搞的？”

冯骏骧是哑巴吃黄连，只能代兄受过，替哥哥圆谎：“我……是不愿意嫂子再回那种地方去……”

冯骏安跺跺脚：“你呀，好糊涂，还不快向你嫂子道歉？”

“够了，”江澜波冷冷地说，“这出戏还不该收场吗？导演何苦叫演员代受罚？”

她大步走出电报局，没有奔向面包车，却向 103 路无轨车站走去。

冯骏安追上来，拦住她：“澜波，你不能这样。你可以对我发脾气，你得考虑一下，不要使老人太过不去呀！多少年来，妈妈都没有出过门，只有你回来，她才提起了兴致，要去旅游，你不怕妈妈难过吗？”

江澜波迟疑了一下，泪水吧嗒吧嗒地掉下来：“妈妈那里，我去道歉、解释。可是万一给工作带来损失，我连道歉的机会都没有了。骏安，你的共产党员的党性哪里去了？拍拍你的良心吧！”

冯骏安脸色蜡黄，说：“你要到哪儿去？”

江澜波说：“还用问吗？回去拿我的笔记本，重拍电报！”

“那好吧，”冯骏安丧气地说，“再拐一个来回好了。走，上车。”

“不，”江澜波说，“完了我还要去找李敬，我没有心情去玩香山了，我没有你那种雅兴。”

冯骏安垂头丧气地站在马路边上，眼睁睁地看着江澜波跳上了 103 路无轨电车。

可以想见，这次香山之游，那是大煞风景的。冯骏安在白月娴面前百般周旋，说江澜波碰上了急事，不得不去处理，老太太还是满脸不高兴。她说：“野马野惯了，这么难合群。”

在老太太面前赔笑脸，冯骏安的心里却窝了一股无名火。他感到江澜波越来越不可理解，她全不把感情放在心上。他能预料得到，通过这件事，江澜波又会反悔。这几天她的情绪一直飘忽不定，他知道，她虽然一咬牙决定回北京，可是心却留在了葛洲坝！他怪自己这件事干得不妙，画虎不成反类犬！说不定，弄僵了，她会走向反面，用不了几天，她也许会买一张火车票回她的葛洲坝去。这牛郎织女的生活，也许要过到垂暮之年，到她不得不退休的日子。

冯骏安觉得很恼火，一上午他吸了一包香烟，他在想最有效的办法。

冯骏安毕竟是最了解妻子个性的人，他的预料完全得到了证实。

傍晚时分，当一家人从香山归来时，发现过早秃顶的工程师李敬和小电焊工李一芳都在江澜波的房间里，谈得很亲热。地板上铺了一张设计图，江澜波和李敬脱了鞋子，在硕大的图纸上来爬去，不时拿放大镜看看细小的局部。

冯骏安脸色铁青地走进来，脱掉风衣，坐到沙发上摸出香烟，一声没响。

江澜波向两个客人介绍了丈夫，李敬慌忙爬起来，笑着说：“对不起，我们太不拘小节了。部里总算批准了打一道防渗墙的设计文案，心里落底了！”

李敬的高兴是溢于言表的。连江澜波也好像忘掉了早晨的不快，笑吟吟地望着丈夫。

“好啊！”冯骏安冷漠地说，“祝贺你们！”他不管有人没人，鞋一甩，躺到了沙发床上，拿起一本《大众电影》看起来。

李敬和李一芳不好久坐，站起来告辞。冯骏安只是欠欠身做出要下地送的样子，当客人摆摆手说“不要送，您休息”时，他便就势又躺了下去。

可以想见，江澜波是憋着一肚子气把客人送到楼下的，她一再解释：“他这个人哪……唉，是对我有气，早晨我们吵了一架，我又没去香山。”

李敬说：“其实，你该去的，多少年不回来，好不容易团聚一次……”

送客人到了地铁车站，看他们上了车西去，当她一步步升到地面上来的时候，眼泪再也止不住了，她感到委屈。

回到家里，江澜波第一眼就看到印着官厅水库图案的旧旅行包打开了，原来是塞到床底下的，她已经收拾好的东西全都底朝上翻了一遍，钱夹丢到茶几上，买到的一张预售车票扔在桌子上。

冯骏安发现了她的秘密。

此时，冯骏安脸朝里，正躺在床上，听见开门声，也没有掉过脸来。

江澜波的心又软了，她觉得自己好像做了对不起丈夫的事，究竟在哪一点上对不起他，江澜波自己也说不上来。

她难堪地在屋子里站了片刻，说：“骏安，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我就希望你能谅解我。那里……实在需要我。”

冯骏安躺在床上没有动。

江澜波又说：“是呀，我知道你对我好，不愿意放我走，可是……”

冯骏安猛然从床上坐起来，大声说：“我对你好什么？我对你一百个好，也换不来你半点温情，你心中还有这个家吗？还有丈夫、儿女吗？你应当去和大江大河结婚！”

江澜波内心是痛苦的，可是她抑制着自己，带着笑容说：“瞧你，说了些什么？不怕孩子们听了笑话。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你是有过抱负的人，我还用得着对你晓以大义吗？我明天就得赶回葛洲坝去。没有人命令我，没有人强迫我，我可以不回

去，也可以永远留在北京，可我的良心受不了。国家培养我，使我掌握了一点知识，国家不是让我带着这些知识躺在床上望天棚掉馅饼的！”

“你好大的口气！”冯骏安跳到地上来，狂吸着香烟，说，“你不要以为我会拦你，我不是绊脚石。这个家，也不是说离了你就要拆灶散火，孩子都大了，在需要你来料理的时候，你没有回来；在你回不回来无所谓的今天，我还会跪在地下乞求你吗？你走好了，我绝不拦你，但你得把话说明白！”

江澜波的心咕咚一跳，她一时不知道丈夫的“说明白”何所指。她呆了一下，才问：“你……指的什么？”

冯骏安仰脸长叹一声，说：“我是个傻瓜，我们从前都是在误会中生活过来的。好像恩格斯说过，‘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只有面对今天的现实，我才明白，我们之间并不是爱情的结合。我不愿意牵扯别人，也不希望把我当个牌位供奉到底！”

江澜波听懂了，丈夫下了最后通牒：在她走前，要办离婚手续。

人碰到意外情况，有时思维会陷于混乱。江澜波目光迟滞地站在那里，一时竟不能判断明白，这是丈夫的真心话呢，还是气话？抑或是让她屈从压力的最后一张王牌？

真的像他说的那样，他们的结合从来没有什么爱情基础吗？难道他们之间是用阿拉伯数字或者什么数学恒等式连结起来的吗？不，他是说谎！她可以回忆起一桩又一桩有着热烈爱恋的往事来，平淡中的热烈！

是自己日渐对丈夫的感情淡漠了吗？这只有她自己知道！在荒凉的葛洲坝席棚子里，一端起饭碗，总要想起丈夫的胃溃疡；一捧起介绍铁路建设消息的报纸，她总是一字不漏地看下去，好像字缝里到处闪耀着冯骏安三个字，好像整个铁路都与丈夫有关系；更为可笑的是，每当她的眼皮跳一下时，她都不可自制地想

入非非，惟恐是丈夫出了什么事……这一切，能说是她心目中只有图纸吗？

想到这里，江澜波感到万分委屈，她滴着泪说：“随你怎么说吧。假如你认为同我在一起不会有幸福，你可以自便，我绝不拦阻。现在不是有了新婚姻法了吗？一方坚持要离婚，也可以办到的。”

冯骏安听她说出这话，就又缓和下来，说：“何苦呢？我的心都操碎了，难道你不知道？我若想同你离婚，我干吗要费这么大的力气给你办调转？好了，别哭了，留下来吧，我们的青春都过去了，安安静静地度过下半生，这总不过分吧？”

“像你那样生活，我会憋死的。”江澜波说，“我希望你不要再劝我了，你还不了解我的脾气吗？我明天中午12点50分才上车，还有一段时间，我陪你去逛天桥夜市，明天上午全家人去逛北海，行吗？”

冯骏安苦笑了，只能长叹一声。

尾 声

像9天以前接她归来时一样，又是举家出动，到北京车站为江澜波送行。人们虽然尽力扮着笑脸，但那笑总有点勉强。

原先，只有丹江一个人支持“居里夫人”重返葛洲坝的，谁也没有料到，昨天晚上，冯骏安出人意料地到东单菜市场采办了鲜鱼、活鸭，亲自上灶，说要办一顿丰美的宴席为江澜波饯行。这反倒使江澜波大为不安，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本来，她走前打算同丈夫好好谈一次，虽然可能不会有什么愉快的结局，她毕竟不能像孩子怄气那样一走了事。由于这转变太突兀，江澜波一时摸不着底，甚至引起她的胡思乱想。

她正犹豫着想进厨房同丈夫搭话时，白月娴抢先进厨房去

了。江澜波只好缩住步。

老太太没好气地训儿子道：“怕老婆也没你这么个怕法呀！她说一声走，你倒赶着给她炒菜送行！你就甘心这样下去了？”

门外的江澜波真不知丈夫能说出什么话来！

殊不知，儿子在妈面前坦然地笑起来。他麻利地收拾着鲜鱼，说：“妈，是我叫她走的，昨天我到水利部去了一下，才知道，那里实在离不开她，就叫她在那里再干几年吧！”

江澜波的泪水刷地一下涌出眼眶。她知道，冯骏安压根就没去过水利部，可他在老人面前给自己打了圆场，把担子轻轻地挑过去了。一时，她心里有如碰翻了五味瓶，什么滋味都有了，她觉得自己错怪了丈夫，他毕竟还有一点 50 年代大学生的热力在心中啊！

只听老太太长叹一声，说：“那你们就唱天河配吧，唱到老我也不管，别再找我。”

儿子笑嘻嘻地说：“她可以请探亲假，我也能请呀！她答应了，从明年起，每年都回来探亲。”

老太太无话可说了。

儿子又说：“澜波离不开水利第一线啊。妈妈，现在真正干事业的人太少了，我不如她，再扯她的后腿更不成样子了！”

江澜波的泪水流得更凶了。

老太太走了。她跨进厨房，扑到丈夫怀里，呜咽着说：“骏安，谢谢你，你总还是了解我的。请你原谅我，我将来，会用十倍的努力来报答你……”

冯骏安却绷起脸来，说：“你别来哄我了！弄得我里外不是人，英雄你来当，丑角我去演，连丹江都在责怪我鼠目寸光了！”

江澜波破涕为笑，说：“你本来就是往回缩嘛！”

冯骏安长叹一声，说：“你放心走吧，我不会再拦你，你比我有出息，你别把我们忘了就行。”说到这儿，他也流下了眼泪。

但是，他们双方都知道，各自都没有使对方绝对折服，只不过都出于教养和体谅对方的涵养，在家人面前掩盖了矛盾，使矛盾没有表面化。这，江澜波已经相当满足了。

开车的铃声响了，丹江抱住妈妈，说：“将来我大学毕业了，也要求分到葛洲坝去！”

哥哥安江说：“别狂热了，到时候才见高低。”

妹妹顶了他一句：“我才不会出卖爱情，专找管分配的老丈人！”

哥哥又气又恼，过来抓她，被妈妈拦住了。

上车前，别人都有意闪开几步，让冯骏安夫妻在最后几分钟里话别。

冯骏安走过来，苦笑着说：“我想起过去读过的一首诗：‘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你又要飞到遥远的地方去了，这是叫我多么心碎的一方……”他有点凄然。

江澜波说：“别这样啦！在屋檐下生活，那是渺小的幸福；为了自身的温饱情愫，那是猪栏的理想。这不是我的话，是学来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也不是我的话。我们共产党人应当比古代的士大夫更高尚些。有人说，照耀心灵的第一束光，永生都不会熄灭。我，正是靠这束光去生活的……”

她的这些话留到了站台上，留给了她的丈夫和女儿，是否也是留给更多人的箴言呢？

火车开走了，带着江澜波夺眶而出的泪水，她毕竟是人啊！

（原载 1982 年 3 期《东方》）

追花人

不得不攷唆几句

人生并不是一支消耗了自己照亮别人的蜡烛；人生应当是一支熊熊燃烧的火炬，自己倒下去的时候，火炬仍然亮着，带着光和热传递到下一代人手中，照亮更多人脚下的路。

盗火者必先见光明。给人类以光明和温暖的普罗米修斯却被锁在高加索的狃岩上。但火种一经传到人间，毕竟是再也扑不灭了。

提起盗火者，人们都会肃然起敬，包括那些协助宙斯天神把普罗米修斯锁到山岩上的人在内，都以自诩为盗火者的崇拜者、志同道合者为荣，不足为奇。

有一种人倒是常常被忽略，他们帮助过盗火者偷启过藏着天火的大门，为此受过天神的鞭打。而在世人都赞美普罗米修斯的时候，他们却远远地走开，只有在鲜花盛开的地方，才能看到他们的脚步，他们是追踪鲜花和春天的人。

这篇小说没有着力歌颂有口皆碑的盗火英雄，写的是有些人并不一定感兴趣的另外一些人。

经常遇到这种人，在文学作品里寻找自己的影子，此可谓常

情。有的人在作品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想到些什么，接受裨益，那当然是笔者的愿望；也可能有另一种人，他们另有所思，专门在作品中寻隙觅缝，一厢情愿地对号入座……那只好有言在先：对号者，如果你在本文中找到了座位，入座后感到有芒在背，你不要发火。这便是小说的作用。

小说毕竟是小说。

应该接站的人没有来

春花、秋实，当然都是供活着的人赏心悦目和享用的。可是不知为什么，胡浩却觉得自己不配，这一切都似乎应当归死者占有——一个时刻萦绕在他心头的死者。

凤凰花和山茶花开得多美啊！简直把流花河和临河的马路都染红了。流花河，什么人给它起的名字呢？过去胡浩怎么没有注意考证过？你看，随风散落到碧莹莹河水里的落花，不是真的使这条穿城而过的河流变成了流花河了吗？啊，河水并没有什么奇特的地方，都是因为这座南方城市的花树太多了。

你看，黑色上海轿车的车身上不是都落上片片红花瓣吗？还有几片竟然从敞着的车窗飘到胡浩的身上来了。

胡浩不是喜欢花草的人。其实这并不是天性，他虽然生长在北方，童年时每当春天到来的时候，胡浩总是同小伙伴们随心所欲地采撷一把一把的迎春花、桃花拿回来插到水瓶里供起来，直到它们萎缩凋零。

是什么时候开始，他讨厌起花来了呢？啊，历史够悠久的了。1950年他随军南下，从当上这座城市的军管会主任开始，他就同花草无缘了。不惟胡浩这样，机关里的人都练就了这种本能，革命者的情操怎么能同小资产阶级一样呢？省政府大院原来是有花坛的，那是国民党伪党部的遗迹。胡浩执政的第一件事就

是把花坛里的上百种花卉、花树诛伐净尽。太空旷了煞风景，于是 58 年种上了玉米、红薯。

然而华序却爱花成癖！为这事，在她入党转正时，差点被取消预备党员资格。

爱花同入党组成一对矛盾，真是不可思议！

想到这里，胡浩嘴角浮现出自己都能觉察出来的嘲弄。唉，如果有必要，他真想把自己关两星期禁闭，狠狠地自我嘲弄一回。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现在胡浩认账了，他觉得现在一生中赖以支撑的自信力在悄悄瓦解。比起华序来，自己到底有多少分量呢？当然，在别人眼里，胡浩仍然是一种化身、一种象征。不是虚幻的，而是炙手可热的存在，自我嘲弄的那股潜在力量，常常没有勇气推倒那种化身和象征的客观存在。

这实在是一种他人无法理解的苦恼。

现在，胡浩带着这种深深的苦恼驱车来迎接一个小人物了。如果不是特例，接一个 20 岁的女孩子，连胡浩的秘书都不必代劳的。

是亲人吗？不是。是不同凡响的角色吗？更不是。为什么要亲自到东郊火车站恭迎呢？胡浩心里只有一个朦胧的意念：求得良心上的慰藉，减轻一点说不出来的苦衷。

唉，有时胡浩不免恼恨自己，是什么时候变得多愁善感起来呢？他不得不怀疑自己的意志在衰退，可是这衰退却又使他快乐、轻松，人真是一个怪物。

他坐在弹簧很软的轿车里，想像不出他的客人的模样。好多年不见了，蕾蕾已经是大姑娘了，她那对好看的笑窝还那么逗人吗？还有那一对水滴似的大眼睛，本来是天真烂漫的天窗，生活的磨难却给那对眸子遮上了一层沉郁的云翳。现在，这层云翳总该消散了吧？

蕾蕾的长相应当像她的妈妈华序，她的内心像不像呢？

华序早已经是另一个世界上的人了。不，用唯物论的观点说，她已经是消亡了的形体，完全变成另一种物质并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于宇宙间，和人类社会根本没有丝毫关系了。可是，华序哪怕变成灰烬，她的形象也在胡浩的脑海中占据着一个重要位置。从胡浩的角度说，那联系是时时刻刻的、千丝万缕的。

她死去整整 10 年了。胡浩不敢、也没有资格去同她的遗体告别。听妻子周菁说，华序倒在一片花海中。胡浩当时哭了，一个酷爱鲜花的人，却了结在花下。

华序是省委书记胡浩的秘书。胡浩过去自认为是了解她的，其实他并不了解这个女性，以至于他一直误认为她的死，是由于她的固执和任性，这当然是他抛开原则私下得出的又自认为是错误的结论。

这个结论现在也靠不住了。

又是春天到来了，1980 年的春天，好像比 30 年前自己带一个团开进这座城市的那个春天要动人。

花儿依然那么红，胡浩却由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走到了人生的晚年途程。

不知不觉，车子早停了，挤在站前广场车丛中。司机小刘已经拉开了车门，他这才从纷杂的思绪中惊醒过来，像回味梦境那样，神色恍惚地跨下车。

出站口那里人声鼎沸，扬声器广播着到站车次预告，一片噪音。

按老规矩，司机小刘走到软席候车室门口，同服务员说了几句什么。首长惟一逃避噪音和汗臭味的领地就只有软席候车室了。

胡浩例外地没有去坐那里的软沙发。他跑到问事处的小窗口前，像普通的人一样，跷起脚跟，伸长脖子问了好半天，才买了

一张站台票，还受了售票员一顿抢白。原来这里有一个土政策：凡不持有电报的人，一律不售给站台票。

胡浩苦笑了一下，抹了抹前额的汗珠，不禁回眸望了望坐在高背硬椅子上那个盛气凌人的女售票员一眼，心里想：“假若她认出我是省委书记呢，那么会是什么结果？”

胡浩又有点烦恼起来，赶快走到长长的队列里去，等候进站。

月台上有一座足有二层楼高的标语板，大概由于口号的更迭频繁，写了又涂，涂了又写，油漆能有一指厚。过去这座专门漆写最新指示的语录板上，现在画上了华序的半身巨像，下面是花海衬托，右边写着仿宋大字：向优秀的共产党员、思想解放的先驱华序烈士学习。

一股热流传导，迅速流遍了胡浩的周身。一个星期以前，他在全市广播大会上做了《学习华序同志》的报告，末尾他要求各机关、单位要立即掀起学习烈士的运动，像他以往号召掀起别的运动一样不容置疑。说句公道话，这次运动和要求，不完全是照上级意图办事，多少掺杂了一点他个人的感情因素。也正因为这样，现在仰视这座气势宏大的宣传画，他才激动得周身像触电一样。他甚至扮了身旁的人几眼，企图在他们脸上找出激动不已的神色。

可是，又有谁知道，10年前这同一个标语板的某一角，同样张贴过枪毙华序的黑字布告呢？胡浩不由得打了个冷战。昨天的死刑犯，今天的英雄，华序仿佛是个可以随意捏弄的面团儿。啊，历史这个庞然大物也是可圆可扁的吗？不可思议！

一个四十几岁的中年人朝胡浩走来，相距两步远，各自站下。两个人都习惯地伸出右手，默默地拉了拉，都没有说什么。各自心里想什么，那是心照不宣的。

这个中年人叫毕云阶，曾经是华序的丈夫，所以选择“曾

经”这个词儿，那是因为他通过法律程序和华序离了婚。不过包括胡浩在内的许多人，仍然把他当作华序的合法丈夫看待，虽然一想起毕云阶解除婚约的一幕，大家都有点遗憾。可人们又不能不谅解他，何况他当了10年鳏夫，没有再娶，按中国人评论男人、女人的道德常规，这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

毕云阶原来是号称省委宣传部的“白面小生”，可以想见他当年风度的不凡。眼下的毕云阶却使人无法想像他那值得夸耀的过去。他已经未老先衰了。顶发大半脱落，头顶形成难看的黄土冈，周围的残发像汗毛一样细软，无力地贴在头皮上。额头有几条又深又长的皱纹，本来清癯的面容，再架上一副增加老迈感的黑色宽边眼镜，更显出了几分暮气。

生活的坎坷和磨难，简直把这个精明干练的秀才击倒了！胡浩每逢见到他这副憔悴的面容，总是情不自禁地发出这样同情的叹惋。这样别人灌输给省委书记责难的毕云阶的话，便瓦解了，对他恨不起来。胡浩甚至想对那些非议毕云阶的人来个反问：“不要说嘴，你若处在毕云阶的位置上试试看，你能做到他那样吗？”

在胡浩看来，人都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谁能没有过失？为什么从报纸公开宣传华序烈士事迹以来，从各种渠道贬斥毕云阶的舆论越来越盛？胡浩感到愤慨，事后诸葛亮和指手画脚的英雄，实在是中国的特产！

胡浩惟一能给予毕云阶的同情和支持，便是给他创造抛头露面的机会，诸如安排他去演讲烈士生平，在报纸上发表纪念、回忆文章。这对胡浩来说，是有经验的。正面树，是组织上不表态的表态，要比兵来将挡、水来土屯的消极辟谣奏效快。

毕云阶对于胡浩的感激之情是不必说了。他惟一能够报答的，便是在各种场合、各种机会里宣传胡浩，把胡浩描述成华序的靠山。这是不会招来舆论反感的。尽人皆知，胡浩因为华序受

过株连、迫害。胡浩曾被指控为华序的后台，他们本来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从遥远的北大荒开来的直达快车还有十几分钟才能到站，胡浩和毕云阶绕着月台花坛漫步。米兰和白兰花开得正盛，花气似乎把煤烟都搅成了香醇的。

毕云阶突然说了一句：“我真有点怕，心里像打鼓一样……”胡浩同情地瞥了他一眼，猜得到他心里被什么折磨着。

用一句小说语言来形容，对于毕云阶来说，是惴惴不安的幸福，是未卜吉凶的期待。

照常理来说，他的惶恐不安是没有道理的，从关山阻隔的北方某个角落归来的人，是毕云阶的女儿，他惟一的亲人。

可是，女儿蕾蕾对他来说，完全是陌生的字眼，陌生的形象。毕云阶看过好多电影小说，那些父女如同陌路人的情景、父女如寇仇的景象，实在叫他胆寒。他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好像作家们编造和虚构出来的可怕场景，将要降临到他和蕾蕾之间，他即将成为小说中才有的人物！

女儿离开他5年了，不，正确点统计，比5年还要长！

如果说抚养子女就算尽到了父亲的情义，毕云阶连这点资本都没有。女儿在荒凉的北大荒插队落户以来，凡是寄去的钱款、衣物，女儿都原封退回，连一个字都没有写过。

不用问，女儿仇视他这个父亲，或者还有轻蔑。

毕云阶的心被深深地灼痛了，被同事们误解，他是难过的；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不理解自己，那是他醒来梦里都无法摆脱的痛苦啊！

现在，一个反革命的女儿，一个死囚犯的女儿一夜之间成为英雄的女儿、烈士的女儿，她就要从远方飞回南国故乡了，她会原谅她的父亲吗？时过境迁，一天云彩会散尽吗？

毕云阶感到这答案很像银河系以外的星云，太庞大又太渺

茫了。

胡浩和毕云阶绕着花坛走着。这时，胡浩用安慰的口吻说：“你要振作起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毕云阶叹了一口气，一肚子的恼恨不由自主地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他用怨恨的语气说：“都是顾方知搞的。没有他在中间插一杠子，孩子不会有这么大怨气。”

一提到顾方知，胡浩马上问了一句：“顾方知的下落你找到了吗？”

三天以前，胡浩在电话里告诉毕云阶，要想方设法查到顾方知的下落。他说，顾方知是最了解华序的人，即或从搜集烈士生平事迹的需要出发这也是必要的，报社、电台的记者们也在找这个失踪的人。

胡浩这样看重顾方知，毕云阶的内心是反感的，可他没有理由反对。顾方知是华序的朋友，为她的事坐过牢，为替华序辩解和向中央申诉，顾方知四次进京上访。在这一点上，毕云阶自愧不如。他如果言语之中稍稍流露出反感来，舆论将对自己不利，人们会说毕云阶嫉妒，他只能消极对待。

所以他回答说：“顾方知是个很古怪的人，他只要决心不露面，别人就很难找到他。”

这是模棱两可的回答，胡浩无法责备他。他不能说毕云阶的话没有道理。是啊，华序现在是全国万众瞩目的英雄，说是家喻户晓，那是一点都不夸张的。那么，顾方知即或躲到天涯海角，都会知道这个令人喜悦、振奋的消息，他却仍然不露面，那不是有意的了吗？

不知为什么，胡浩突然宣布：“明天我就下去，亲自去找顾方知，把他接回来。”

这个突兀的决定，使毕云阶大吃一惊。他一时还弄不清楚，胡浩亲自出马有什么必要，是要显示他器重人才的气度呢，还是

表白他彻底平反冤假错案的决心呢？抑或是另有隐衷？

毕云阶当然不好深问。几天来朦朦胧胧在他心中酝酿的一个方案，被省委书记的决心铸成了。不过他没有说出来，他要抢在省委书记前头找到顾方知，他有他的设想，而且他很自信，从顾方知平素的厚道、无可无不可的劲头看，毕云阶感到自己是能够成功的。

往前方的进站绿灯亮了，月台上电铃响起来。毕云阶情不自禁地按住胸口，心跳得难过极了。唉，跳什么呢？接自己的女儿还要这么受折磨吗？这心情多像 1958 年的春天！也是在这个月台上，也是米兰花盛开的季节，毕云阶站在这里，心儿狂跳着，翘首北望，即将开来的列车上有刚从北京某大学毕业的华序，比自己低一级的女友飞到这花一般的城市，飞到自己怀抱里来了……

现在，他却有点心酸，眼泪都快溢出眼眶了。不，不一样，两种不同的心境！

在他胡思乱想的当儿，天蓝色的列车长龙已经兜着风驶进车站。毕云阶向每个打开的车门张望着，手心都攥出了汗。

胡浩夹杂在接客人流中，也在举踵张望着喷吐旅客人流的车门。

毕云阶耐不住了，从一个车厢门口跑到另一个车厢门口，焦急渐渐被失望所代替。

好多车厢门口清净起来，只有列车员在打扫车梯踏板，嘈杂的出站旅客渐渐远去。

“难道蕾蕾误了车？”毕云阶刚刚向胡浩说了这么一句扫兴的话，眼睛突然亮了起来。他看见最末一节车厢门口，有一个衣着朴素的女孩子手里提着行李、旅行袋，脚步沉重地步下车梯。她在最低一节梯子上停住了步子，有意无意地向空荡起来的月台扫了一眼。

啊，蕾蕾！是她，不会错的！她的面目与她的妈妈多么酷似啊！她那一举手一投足的姿势，多像 22 年前从北京赶来的华序啊！

毕云阶呼喊着重蕾的名字，奔跑过去。他自己一点都没有理会到那声音有点变态，以至于引得列车员们都奇怪地望着他的背影。

胡浩跑不快，也在跑，也在呼喊着重蕾的名字。

同胡浩、毕云阶的热烈气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蕾蕾仿佛无动于衷，好像喊的是与她毫无关系的另外什么人。她缓步跨下楼梯，把行李包裹放到月台上，又左顾右盼地搜寻着什么。

毕云阶的心咯噔一沉，凉了半截。可此时理智已经控制不了感情，他发疯一般扑过去，抱住女儿，颤抖地叫着：“蕾蕾，蕾蕾！苦孩子！你不认得爸爸了吗？爸爸来接你来了！”

蕾蕾像个木头人，只是浅浅地笑了一下，胡浩觉得那笑是很苦的，那对深深的酒窝里好像注满了黄连！啊，还有那双好看的眼睛，仍然蒙着一层云翳。这层半透明的物质，似乎把孩子的心同他们隔开了。

毕云阶拉着女儿的手，转身对胡浩说：“快叫胡伯伯呀！这是你妈妈的老首长胡伯伯呀，你忘了，小时候你还爬过胡伯伯肩头呢！”

蕾蕾又是浅浅的一笑，礼貌然而稍嫌冷漠地向胡浩伸出了手：“胡伯伯，您工作那么忙，还来接我……”

胡浩心里落了底，胡伯伯在这孩子的心中总还有位置的。他笑眯眯地说：“再忙也得来哟。这是省委给我的任务嘛！”

说毕，胡浩替她提起了行李。

蕾蕾却没有马上走的意思，她又一次环顾月台。

胡浩问道：“你找谁？”

蕾蕾没有回答，显然大失所望，垂着头看自己的脚尖。

毕云阶只感到自己的心在往下沉，向寒冷漆黑的冰窖里沉……他明白，蕾蕾要找的人是顾方知，可是他不愿意说破，或者说没有勇气点破。情人之间，嫉妒之火随时都可以爆发，争夺女儿的嫉妒心，也许是毕云阶独有的。

蕾蕾倒是坦率的，她对胡浩说：“我以为顾叔叔在城里，他能来接我的。”

果然不出所料，毕云阶的脸上肌肉都在痉挛，心在收缩。

胡浩赶忙打圆场，说：“他可能有事拖住了，咱们先回去吧。”

蕾蕾说道：“您见到顾叔叔了？”

胡浩不好说谎，望了毕云阶一眼，说：“没有，我们正在找他。”

蕾蕾沉吟了一下，说：“我有一个要求，能提吗？”

胡浩爱抚地伸出手去，把粘在蕾蕾衣领上的一根头发摘下来，说：“尽管提。你是英雄的女儿，你有权提出任何要求。”

蕾蕾感激地笑了笑，说：“追悼会不是定在5天以后开吗？我觉得，开妈妈的追悼会，不能没有顾叔叔参加，他是最有资格参加的人。严格地说，只有他，够得上是妈妈的真正战友。”说到这里，蕾蕾流出了泪水，她对顾方知的深情厚意，全都无保留地表露出来了。

她的话，对于毕云阶来说，无异于一记耳光。他觉得脸上热辣辣的，不能劝阻女儿，又不甘心承认女儿的话是事实，只能尴尬地僵在一旁。

“这是起码的、正当的要求。”胡浩说，“一点都不过分。我们也一直在找他。10年来，他先后给省委和中央写过17份申诉材料，全都是要求给你妈妈平反的，却没有一份涉及他自己。这个好同志啊……从他发信地址的流动性来看，他好像是个养蜂人，记者们也都这样分析。我想，我们能够、也应当尽快找到

他，还涉及到他自己呢，省委已经决定为他平反，恢复名誉呢。”
蕾蕾感激地望了胡浩一眼，随他们走出了站口。

小巷里的垃圾箱

如果说这座南国城市是一座花园，那是一点都不过分的。夹路全是绿树、红花，白色的楼群掩映在翠绿的槟榔树、柳叶桉和紫荆树之中，缀满红花的凤凰树像燃起的一片火。

前面有一台漆成冷调子的洒水车，向后喷射着扇形的雨帘。蕾蕾乘坐的上海牌轿车擦着水渍渍的柏油马路轻捷地行驶着。

回来了，花的城市。在那遥远的、天苍苍野茫茫的北大荒，蕾蕾度过了5个寒冬和酷暑。她睡梦里都没有忘记家乡的绿树红花。妈妈是喜欢花的，即或在监狱被囚的年月，蕾蕾每次去探望妈妈，总要给她带一束新开的花。

一年一度春草绿，一年一度百花红，妈妈却再也看不到这样美的花了。

蕾蕾有点凄楚，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她怕叫胡浩看见，就掉头掉向了车窗。

十字路口是红灯，车停了下来。现在交叉路口的指示灯改用电子自控了，电子分不出哪是首长的车。

蕾蕾透过湖绿色的窗纱，隐约看到了小巷深处一个淡奶色的垃圾箱。啊，那条窄小得走不开两辆汽车的小巷子不是叫晚香玉巷吗？对，是晚香玉巷！名字倒是很美，可是再美的巷子里也有垃圾箱。在那垃圾箱里蕾蕾栖过身，有过像三毛一样的流浪生活呢。

你看，有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手里拿着一截铁钩子，正探身到垃圾箱里往外勾废纸，这是个拾破烂儿的孩子。

这孩子就像是蕾蕾的影子。

垃圾箱，曾经是她辛酸的乐园！

为什么蕾蕾会沦落到这种地步？那是因为爸爸要把她送回到济南姥姥家引起的一次逃亡。

孩子心目中没有法制的概念，但却不得不服法律的约束。

自从华序被捕入狱以后，蕾蕾每天放学后就跑到楚城监狱门前去。时间久了，连监狱附近烧饼铺子、水果摊子上的人都认得这个小姑娘了。

她每天折一束鲜花，家里有上百盆花，都是妈妈亲手栽的。星期天她用自行车驮着小女儿，到十里郊外的翠华山去取来山土，细心地过了筛子，给盆花换土，用泡臭的麻酱渣给花施肥。说真的，蕾蕾家阳台上的花，比公园花市的花还好呢，一年四季，这盆谢了那盆开，从来没有断过开花的日子。

蕾蕾只有一个念头，每天给妈妈送一支花。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她在狱警面前哭哭啼啼，她赖在门岗楼里不走，有时甚至想趁劳改犯人进出铁大门的机会夹到队伍里钻进去。

当然，小孩子的狡猾，不过是大人眼里的小把戏，她从来没有成功过。

有一天，傍晚下起了雨。蕾蕾守候在监狱门口足有两个钟头，手里那束马蹄莲花，都被雨水浇散了，她还不肯走。

不知什么原因，爸爸怒气冲冲地冒雨赶来了。他连伞都没有打，雨水顺着他的眼镜片往下流。他一把扭住蕾蕾的胳膊，厉声说：“跟我回家！”

“我不！”孩子哇一声哭了。

爸爸仿佛不再是从前拿糖果哄她的爸爸了，他一脸凶相，不由分说地把蕾蕾手里的花往泥地里一摔，挟起她就走，走得很快。蕾蕾在爸爸怀里又踢又抓，到底拗不过大人，委屈得哭了一路。

回到家里，爸爸把门锁上，黑着脸，那模样真像小人书上画

的雷公。他吼叫着，声称如果再看见蕾蕾到监狱门口去，就打断她的腿。

蕾蕾吓得止住了哭，眨着眼躲到了墙角。爸爸为什么发脾气她弄不太懂，但他骂妈妈的话，孩子却听得明明白白。他狠狠地说：“你去看她干什么？她是反革命、是敌人、是要枪毙的！她不是你妈妈，你也不是她的女儿！”

他差不多把世上最恶毒、最肮脏的字眼儿都用上了。末了，他把阳台上所有的花盆：瓷的、瓦的全都推到了楼下，那摔家什的动静简直像打雷一样骇人，好多邻居都推开门探头出来看热闹。

蕾蕾呆住了。

这就是爸爸吗？这就是从前只会乐不会生气的爸爸吗？

蕾蕾从记事的时候起，看的全是爸爸的笑脸，听的全是“好乖乖”一类的话。每到周末，打扮得整整齐齐的蕾蕾就守望在幼儿园门口，爸爸总是不迟不早在时钟打6点的时候骑自行车来接她。她是在花儿与笑脸中长大的。

天地一昼夜间就大变了吗？爸爸对妈妈那么好，为什么要恨她呢？妈妈真的是反革命吗？

孩子懂得，这一切骤变的起因都是因为妈妈坐了牢，好像亲人一旦被抓去，就从此恩断义绝了。

爸爸哭了，坐在一张板凳上，拿起他和华序、蕾蕾欢笑着的合影，流出了眼泪。骂了人自己还哭，真怪！

蕾蕾是从小任性惯了，她不理睬爸爸的威风。一旦爸爸去上班，她仍然要到监狱门口去守候，她希望有一天侥幸能看到妈妈恰好像别的犯人一样从监狱大门里走出来。

下一次蕾蕾被爸爸拖回来时，她挨了爸爸两个嘴巴，脸都被打肿了。

蕾蕾没有哭，爸爸却抱着孩子的头哭个不住。怎么大人还要

哭？而且哭得真难听！恨他！

终于，毕云阶作出了决定。那天早晨，他对女儿说：“咱们坐火车看妈妈去。”

蕾蕾说：“不用坐火车，坐公共汽车。”

毕云阶说：“你妈妈不在城里，送到外地去了。”

蕾蕾高兴了，用积攒起来的早点钱给妈妈买了一袋奶油巧克力，妈妈顶喜欢吃奶油巧克力了。

父女俩上了北去的火车。

奇怪，验票的那个阿姨怎么告诉爸爸，明天午后8点半到达济南呢？还有怪事，爸爸带的那个鼓鼓囊囊的旅行箱里，全是自己的换洗衣服，连冬天穿的风雪衣也没有忘记。

蕾蕾是被周菁阿姨称为“人精灵”的，她一下子猜到了爸爸在骗自己，是要把她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叫她再也见不到妈妈。

蕾蕾哭起来。火车已经开出四五个站了，她觉得阴森森的楚城监狱的高墙电网都是值得留恋的。

大约毕云阶再也不怕她闯祸了，这才哄她说：“蕾蕾听话，爸爸带你去姥姥家，济南府有趵突泉，可好玩儿了……”

蕾蕾哭乏了，趴在小茶桌上不出声。毕云阶附在她耳畔小声叮嘱说：“到了姥姥家，插班上学。不论谁问你妈妈，你就说，妈妈死了，是得癌症死的。”

蕾蕾真恨透了爸爸！你才得癌呢！

她的一双眼睛盯着车窗外，她想到了逃走，用什么办法呢？过去看过的一本小人书提醒了她，她决心像甩掉黑狗子警察一样甩掉爸爸。

过了中午，毕云阶抱着肩膀，头靠在椅背上睡着了，脑袋随着列车的轻微颠簸摇晃着。

为了试试爸爸是否真的睡熟，蕾蕾故意用脚向他腿上踢了一

下，他居然没有反应。

蕾蕾悄手悄脚地迈过爸爸的大腿，连大气都不敢出，顺过道溜到了两节车箱连结板处。正当她心里发慌一步三回头时，列车在一个小站停靠了。

蕾蕾不等乘务员收好车踏板，咚一声跳了下去，跑到一堆枕木垛后藏了起来。

列车开车了，带着打瞌睡的、可恨的爸爸开走了。蕾蕾觉得又开心又好玩儿。

孩子哪里懂得等待她的未来却是严峻的、险恶的呢！

蕾蕾扒上了相反方向的一趟货车，藏在焦炭堆里，等到达车站时，她快成了炭人！这已经是黄昏时分，溜出车站时，她才感到又累又饿。她已经是无家可归的孩子了，自己讨厌的“野孩子”！

流浪儿的本事是无须拜师的。

饿了，蕾蕾就钻进弥漫着炒菜香味的饭馆，站在人家背后，眼巴巴地看着别人大吃大嚼，等酒足饭饱的客人一欠屁股，她立刻伸出一双小脏手，把盘盏里的残汤剩饭抓起来填到嘴里去。

夜里，她去蹲火车站的票房子。她只享受了几天，就被堵死了这条路。工人民兵纠察队一到下午6点就坐在候车室门口，新规矩：没有火车票的人是进不去的。

蕾蕾到处游逛。在一个雨天，她为了避雨，溜到晚香玉小巷，钻进了垃圾箱，在废纸堆中间扒一个坑，躺在上面挺舒服，扣上铁盖子，一点雨都淋不着。

不知怎么搞的，那天蕾蕾睡到半夜，正梦见自己和妈妈一起在流花河里划船的时候，猛听到咕咚一声闷响，随后一束刺眼的光照到脸上。

“这小家伙倒会找地方！”这是一个不很凶恶的声音。

蕾蕾躲开手电筒的强光，看见一个披雨斗篷的警察半弯着腰

站在垃圾箱跟前，像欣赏公园白叶猴那样朝她挤眼睛笑着。

完了，狭路相逢，连逃走都没有一点希望了。蕾蕾只好乖乖地随警察走。她想，也许把我抓到楚城监狱去吧？那可好了，不就天天和妈妈在一起了吗？

蕾蕾没有猜对。她被领到西郊一个红砖墙大院里。啊，认得，去年老师带她到这附近的荒山种过梧桐树的，红砖大院里是少年收容所，那些无家可归的孤儿、跑丢了的孩子，还有打群架的坏孩子们都圈在这个院子里。

怎么办交接，她不懂，她只看见送她来的那个警察在膝头上铺了张纸，一边问她一边往上写字。

“你叫什么呀？”

“毕小燕。”蕾蕾说谎的本事真可以，一点没有现编现想的痕迹。不过她也有点后悔，为什么不把“毕”字也换掉呢？听妈妈说，姓毕的人不多，万一他们找到爸爸头上怎么办？唉，妈妈说过“张王李赵遍地刘”，在这五大姓中编一个多好！

“几岁？”

“9岁。”这是无须说谎的。

“你爸爸叫什么，在哪里工作？”

这可难住了蕾蕾。这谎是很不容易编圆的，你只要说出地址、工作单位和姓名，明天早晨警察就会去对证明白。

说得越远越好，叫他们查不着！对！

于是蕾蕾说：“我爸爸是济南公……公安局的，他带我来出差，出火车站走丢了。”

几个警察信以为真。一个笑着说：“干咱们这行的也有‘马大哈’，不过，他很快会找来的。”

蕾蕾被安置在一间大屋子里去睡觉，里面有十几个和她年龄相仿的小女孩。男警察们把她交给一个女警察。蕾蕾看她年纪很轻，心想，还是警察呢，顶多算是个大姐。女警察给了她一条被

子，还带她去上厕所，嘱咐别的孩子半夜解手时叫她一声。

这女警察真和气，说话的声音有点像妈妈。蕾蕾的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女警察还以为她想爸爸了呢，就一边给她揩眼泪一边哄劝：“别急，明天一早我们就广播、登报，你爸爸比你还要着急，会来领你的。”

不说还好，一提到爸爸，蕾蕾更哭得不行了。

一连三天过去了，没有蕾蕾的爸爸登门来领孩子，收容所的警察们都很着急。蕾蕾却一点都不急，像没那么回事一样。

这天白天，蕾蕾被分配去给西山的树木浇水，她们一群小女孩抬着塑料水桶，在山坡小道上走着。蕾蕾突然停住脚步，惊恐地放下水桶就往收容所大院跑，弄得小伙伴们摸不着头脑。

原来她看见了顾方知，不知道他去干什么，风尘仆仆地骑着脚踏车从郊外赶回来。

顾方知是蕾蕾家的常客，蕾蕾家所有的玩具都是这个叔叔亲手做的。他的手真巧，木马会跳高，坦克会喷火，布娃娃的眼珠会转哩！

照说，蕾蕾是不应当怕他的。可是现在和从前不同了，他既然同爸爸、妈妈那么好，只要一发现自己，肯定会去告诉爸爸的。

这一整天，蕾蕾都提心吊胆，一见着有大人的影子，她就想往别人身后躲。

吃过晚饭“天天读”以后，女警察笑吟吟地走进来，对蕾蕾说：“走，跟我到值班室去。”

蕾蕾向后退了几步，问：“去干什么？”

女警察故意卖关子：“到那你就知道了，当然是好事。”一边说，她还一边把蕾蕾拉到怀里，替她把头梳光，编了个翘翘辫儿。

事到如今，蕾蕾只好硬着头皮去了。她真担心，会是爸爸等

在值班室里，警察们连特务都抓得住，能找不到爸爸的下落吗？

啊，来人不是爸爸，是顾方知。他没有看见蕾蕾走进屋子，他正伏在桌上写什么，一转身，惊喜地奔了过来：“蕾蕾，叫我好找！”随后，他对几个警察解释道：“就是她，小调皮鬼，不知怎么走丢了。”

蕾蕾正在发愣的当儿，女警察拍了拍她的头：“快去呀，爸爸来接你回家了！”

顾方知手里提着个衣盒，打开，是一件白底小红花的连衣裙。他抖开，蹲在蕾蕾跟前，眼泪先流了出来。

蕾蕾忘记了危险，扑过去，紧紧搂住顾方知的脖子，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顾方知抱起蕾蕾，在她脸蛋上亲着，说：“走，咱回家去，回家去……”

顾方知的家，蕾蕾并不陌生，那是典型的单身汉住宅。一间兼作多用的房间只有12平方米，有一半被图书占据，一张钢丝床被挤到一个角落里。他是属于对生活没有苛求的人，吃穿都马马虎虎，煤油炉子、高压饭锅堆在床下，和鞋子为伍。

今天他是提着饭盒从菜馆买来的饭菜，用来款待饥肠辘辘的蕾蕾。

蕾蕾刚刚洗过澡，换上了顾方知给她买的连衣裙，坐在床边香甜地吃着饭。

顾方知问她：“你为什么从家里跑出来？”

蕾蕾说：“不是从家，是从火车上。爸爸打我，还骂妈妈是反革命，他不许我到监狱去看妈妈。”

不用再问，他已经懂得了孩子的心。

见他沉默不语，蕾蕾仰起脸来问道：“叔叔，你也说妈妈坏吗？”

顾方知的眼睛凝视着窗外遥远的星云，沉默了许久，才说：

“不。你还小，你长大了就懂得了，你妈妈是最好最好的人。”

蕾蕾有点诧异，为什么他对妈妈的看法与爸爸那么不同呢？她央求地说：“带我去看妈妈，好吗？”

顾方知安慰地说：“看妈妈不能是说去就去的，要打报告，要等日子。我一定带你去。”

孩子几乎雀跃起来。就冲这一点，蕾蕾与顾方知之间的距离一下子就缩短了。

顾方知让她睡在自己的床上。他在地板上铺了一条粗毛毯，拿了几本书当枕头垫在头下，仰面躺着，一支接一支地吸着劣等香烟，眼前弥漫着呛人的青烟辣雾。蕾蕾把这几天的经历跟他讲了，他很不理解，毕云阶怎这么忍心呢？孩子不愿离开妈妈被囚禁的这个城市，他偏偏要送她到姥姥家去！

蕾蕾喊起了令人心悸的梦呓：“我没有爸爸！我才不姓毕呢！”

顾方知从地板上爬起来，替蕾蕾掩好被子，久久地坐在床头，端详着孩子的睡相。梦中的蕾蕾怎么能揣测得出此时顾方知纷乱如麻的心绪啊！

大概过了半夜吧，蕾蕾突然被一阵唧唧喳喳的说话声吵醒了。她没有吱声。从前，她夜里醒来，常常是出声地偷听爸爸、妈妈说话的。

屋子里没有开灯，漆黑一团，但蕾蕾努力张大瞳孔，可以分辨出有两个黑影坐在书架前的小板凳上。一个是顾叔叔，另一个是谁呢？

听，顾叔叔的声音：“华序是你的妻子，你应当比别人更了解她。当然，压力是有的，压力就能够泯灭良心吗？你为什么耍昧着良心告诉蕾蕾，说她的妈妈是反革命呢？”

蕾蕾弄明白了，顾叔叔把爸爸找来了，她吓得不行，拉着被子盖住了脸。

毕云阶沉重地叹息一声，低沉地说：“虽然我了解她，却不能原谅她。有些问题，是谁都看得出来的，别人能够装聋作哑，她却要逞英雄。她害了她的丈夫，害了她的女儿，把我们的一切都葬送了。”

沉默。只有划火柴的音响。两个香烟头一闪一灭，像鬼火似的。

过了一阵，顾方知说：“蕾蕾才9岁就失去了母爱，孩子的心灵不能再受挫伤，你应当把双份的爱给孩子。”

毕云阶说：“这孩子太危险了，她随时都可能给我闯祸。真是怪事，难道性格也能遗传吗？我是不得已才决定把她送到外地去的，不然她天天到监狱门前去守候，张扬开去，这罪名当然不是9岁的孩子来担，我不又成了教唆犯吗？”

“你还要把她送到济南去？”

“只有这一个办法。”

顾方知无可奈何地说：“那你应当同华序商量一下，让她见上孩子一面。”

不知为什么，毕云阶突然火了。他站起来，在狭小的屋地瞪瞪地迈着重步，说：“我为什么要去问她的意见？她如果真的关心她的孩子，爱她的孩子，她应当早就在干校学习班上检查，不至于继续公开放毒，直到走进监牢！”

对于蕾蕾来说，没有比送到济南去更为可怕的了。她伸手摸摸窗户，大敞四开着。她悄悄坐起来，掀掉身上的被子，借着夜暗的掩护，猛地一跳，从窗台跳了出去。

她连鞋子都没有穿，一口气跑出大门，顺着空旷的马路向林阴里跑去。她分明听到了后面的脚步声，她知道两个大人在追她，她连头都不肯回！

自然，垃圾箱又成了蕾蕾的栖身之处。

绿灯亮了，上海轿车的启动，中止了蕾蕾童年的记忆。

她忍不住又一次回眸望了望小巷深处的垃圾箱，仿佛那最脏污的容器里锁着她许多美好的、值得留恋的回忆。

宽容是不是美德？

这是一个蝶舞蜂旋的所在。小巧雅致的院落，棕榈和蒲葵拱卫着一个立体花坛。花坛正中砌成花篮形状，栽满了亚热带花草，其中以仙人掌科和菊类居多。连白垩粉壁的一楼一底小楼都爬满了爆竹花的藤叶，正开得旺盛。那垂挂下来的一串串花朵，真像挑在竹竿上正在爆裂的爆竹。

在蕾蕾的记忆中，这幢房子是有点神秘的。这条街临近韶秀峰，街两侧栉比鳞次地坐落着各种各样的小洋楼。听妈妈讲，从前都是外国人修建的，这里是洋人的乐园。解放后，省市领导干部们搬了进来。在蕾蕾的印象中，胡浩伯伯的住房就有点像这个庭院。不过他住的房子是德国式的，房顶有五个尖尖的日尔曼式的小钟楼；而今天成为自己的家的这幢，却是法国式的，门前有柱廊，房檐下有浮雕。

蕾蕾懂得，这种破格的安排，是胡伯伯的主意，是为了安慰死者，也为了安慰死者的亲人。她有点反感，不是对组织的照顾反感，而是因为自己以这种方式借了妈妈的光而反感。这无异于用妈妈的白骨奠基，修造起这栋房子来。

胡浩是忙人，把毕云阶父女送到家门，就告辞走了，临走交代蕾蕾，要她写几篇回忆妈妈的文章。

蕾蕾没有答应，也没有推卸。她心里不免苦笑。妈妈活着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当英雄，现在捧她为英雄的人蜂拥而来，正像当初她不想当反革命，而对落井下石的人一拥而上一样自然。

蕾蕾为什么要凑这个热闹呢？她的背包里装着几十份中央和地方报刊，有多少人写妈妈的纪念文章啊！那些文辞凄婉动人的

笔者，大多数是蕾蕾熟悉的，这些死者的战友们一个早晨全从地平线下冒出来了；而当初整理揭发妈妈的材料、写批判妈妈的发言稿，甚至是捏造罪名的人，同样是他们，他们都是客串在人生舞台上不甘寂寞的两栖人。

由于这样的原因，蕾蕾近来忽然反感起来，有点替妈妈不平和难过。她感到自己再掺和到这群“战友”当中去鼓噪，妈妈的在天之灵会愈加不安的。

胡浩为毕家准备的客厅是排场而考究的，蕾蕾几乎不敢相信，这全套捷克式家具装设起来的家是属于她的，也许是强烈的对比造成的错觉，她眼前的客厅显得极为空旷、遥远，她像跨入了一个隐伏着危机的陌生的殿堂，以至于愣在门口许久不敢坐到丝绒沙发上去。是啊，北大荒插队青年的红砖小房比起这轩敞豪华的客厅，像不像狭小的鸽子笼呢？16个人一间屋子，挤下8张双层床以后，剩下的空间只够一个人侧身通过，以至于一进屋就得跳到床上去。那蒸腾着汗碱味和霉气的鸽子笼与眼前这弥漫着茉莉花香的大厅，不是霄壤之别吗？

花，花的世界！阳台又宽又大，挤满了盆栽的奇异花卉，还有景泰蓝盆景。这是娱人眼目的，最容易唤起蕾蕾对妈妈的回忆了。是的，当年蕾蕾家的住室虽然只有可怜的15平方米，却愉快地和香花同处一堂。

啊，那些打碎花盆的令人心碎的声音还在蕾蕾耳旁回响，如今这些花卉并不是妈妈亲手栽培、浇灌的。很容易理解，毕云阶是尽力使这个家恢复成原来的样子。你看，全家福照悬挂的位置，冷水杯里装果子露的习惯，都依样画葫芦地复制下来了，连妈妈生前喜欢的那种软底没带拖鞋，都摆了一双在门边——只不过不是那双旧的罢了。

蕾蕾仍然感到像看到舞台演员化妆一样不真实，打碎了的花盆不可能再粘合起来，破碎了的生活能够重新铜起来吗？

晚风掀动着乳白色落地大窗的窗纱，吹乱了写字台上的纸页。

蕾蕾走过去，下意识地瞧了几眼。那是一篇没有写完的文章，标题是：我同共产主义战士华序一起生活的日子。啊，多么亲切，多么含蓄，而蕾蕾却感到恶心。还有一堆照片，妈妈是喜欢照相的。从前她自己有五大本厚厚的影集，闲来没事，就从头到尾翻给小女儿看。一个年代，一群人物，像历史的挂钩，连缀起华序从童年到壮年的有趣历史。说真的，蕾蕾了解妈妈，是从影集教学起始的，像读绣像小说一样易懂。

然而，一把火无情地摧毁了五大本影集。那是妈妈被捕后的第三天傍晚，在干校宣传部长陆霜青带人来抄家以后。毕云阶半夜三更把华序的影集、书籍、日记本，全部放到搪瓷洗衣盆里，浇上汽油，付之一炬。本来蕾蕾是睡在床上的，忽然觉得眼前又热又亮，烟雾呛得她从梦中咳醒了，于是看到了火的一幕。

那么，这些妈妈的单人照以及合影，是从哪里来的呢？呃，是了，可以发动群众，在档案袋里、朋友的相册上找来翻拍！

是爸爸要重新替妈妈恢复一套影集吗？不，不是，桌上摆着一些装硫酸纸的小口袋，上面分别写有报纸和刊物的名称，啊，是供给报刊登载用的。

蕾蕾背靠着写字台，转过身来，恰好毕云阶从厨房走出来。厨房的门开着，可以看到一台日立牌电冰箱。他手里托着个轻酸蚀花的玻璃长盘，一杯果子露，几个香蕉，还有一堆金桔。

毕云阶说：“快到盥洗间去洗洗，然后吃点解渴的东西。”

蕾蕾没有到盥洗间去。她感到有点疲乏，顺势坐到写字台旁的一把折叠椅上，拿起妈妈的一张照片看着。

毕云阶看见女儿在流泪，就把水果托盘轻轻地放下，默然坐到女儿对面的沙发上去，双手蒙面，说：“我真后悔，那时胆子太小了，为什么让他们把影集烧掉呢？现在东一张、西一张地找

起来，像大海捞针一样。”

蕾蕾本想抢白他一句，一抬头，却看见毕云阶也在抹眼泪。

女人总是见不得眼泪的，眼泪有时候是最理想的软化剂，一看见毕云阶流泪，蕾蕾差不多可怜他了。

毕云阶说：“别的人，也许包括自己的女儿在内，可能都在咒骂我胆小怕事，其实，有谁能理解我呢？如果那些照片落到‘四人帮’爪牙手里，说不定有多少人受株连呢。”

他的话是对的。蕾蕾望着毕云阶那清癯的面孔和稀疏的顶发，忽然怀疑起自己来，是不是自己对他太冷酷、太过分了呢？

毕云阶从托盘里拿起一个金桔，托在掌心上，送到蕾蕾面前，柔声地说：“吃一个吧，你小时候最喜欢吃的。”

只有杏子那么大的金桔，是长花盆里的，金黄金黄的，连桔子皮都能吃的，吃到口中，满嘴的薄荷味。蕾蕾从小就喜欢嚼金桔。

蕾蕾从咿呀学舌到懂事那段时光，正是毕云阶连续两年到外县去搞中心工作的時候，蕾蕾一张小嘴叫妈妈叫得忒甜，喊爸爸却十分笨拙，大约好长一段时间不知爸爸为何物。

突然有那么一天，陌生的爸爸带着满身尘土从乡下回来了，一进屋扔下挎包，不由分说，抱住玩积木的女儿，就把长满硬胡茬子的下巴往孩子的脸蛋上贴。蕾蕾被扎痛了，吱哇叫着，双手往外推那张胡子脸。

华序在一旁笑了，告诉女儿这就是爸爸，蕾蕾撅起小嘴，对这个爸爸的第一印象很坏，不管华序怎样哄劝，也不管毕云阶怎样软硬兼施，孩子就是不肯叫他爸爸。

后来，还是华序给丈夫出了个好主意，毕云阶跑到水果摊上买了两斤金桔，藏一把在背后，弯着腰对蕾蕾说：“叫爸爸，叫呀！”

“不叫，不叫！”蕾蕾骑在顾叔叔给她做的电动木马上，理也

不理地说：“就不叫！”

毕云阶像玩魔术似的突然举起了一把诱人的金桔！

蕾蕾一对小黑眼睛亮了，从电动木马上跳起来，叫着：“给我，我要！”

就在蕾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跳过来，就要夺到金桔的当儿，毕云阶直起了腰，蕾蕾够不着，跳到椅子上，毕云阶又举过头顶。

父女俩僵持起来，开始艰难的谈判。毕云阶说：“叫爸爸，给你。”

蕾蕾先时不肯，还要求助于妈妈，她觉得这个有胡子的人在妈妈面前像小猫那么听话温顺。妈妈不肯帮忙，一边伏在桌上写什么，一边头也不抬地说：“我不管。”

蕾蕾没有了后援，又想吃到馋出了口水的金桔，只好妥协屈服，又委屈又不情愿地说了声：“叫爸爸还不行吗？”

毕云阶哈哈大笑，得寸进尺地说：“这不行。你得说：爸爸，好爸爸。”

蕾蕾狠狠瞪了他一眼，别过小脸说：“爸爸，好爸爸。”声音小得像蚊子哼哼。

童年脑海中留下的印象，和眼前的景象叠印在一起，唤起蕾蕾的是一种什么感情呢？

她明白，毕云阶希望听到她甜甜的一声“爸爸”。出于礼貌和对别人的谅解，蕾蕾不妨顺水推舟地叫一声。可是她从走下火车到现在，确实没有称呼过，即或不得已同他对话，也都一律省略主语、宾语。她的牙关封得死死的，她几年就铸就了这样的决心，不承认这样的爸爸。

啊，金桔，托在那只裸露着青筋手上的金桔，它能换来一声爸爸吗？那廉价的交易只适用于童年的她；现在，她是有思想的、大可不依赖父母生存的独立的人了。

毕云阶不是心理学家。可是，在女儿面前，他像所有的父母一样，又都称得上心理学家。他难道不明白女儿心头的痛苦和隔膜吗？

他的手剧烈地抖颤着，那颗金桔滚落到地板上，滚到酒柜底下去了。

毕云阶的脸埋在一双瘦骨嶙峋的手里，肩膀在轻轻抽动。啊，他哭了。

蕾蕾的心像被电殓了一般焦痛，她甚至想搜索出几句安慰他的话了。

可是……“你妈妈是反革命”呢？推到阳台底下去的花盆呢？开往济南的火车呢？……

蕾蕾是复仇主义者。她的灵魂被妈妈主宰着，为了正直可怜的妈妈，她准备原谅一切人的一切努力，常常是破产的。

毕云阶说话了，声音里带着极度的凄伤，像叹息，像自言自语：“我活在这个世上还有什么意义呢？原谅我吧，华序！不，你不该原谅我，连我的女儿都不肯原谅我呀！有谁能理解我？你是勇敢的，你向邪恶势力宣战，你背上了真理的十字架，一切都置于不顾了，可是孩子留给我！那是什么年月呀？稍一不慎，我就会到监狱里同你做伴，留下一个孤儿吗？我的压力比你小吗？反革命的丈夫！天天逼我写揭发材料，天天叫我划清界限，我没有进疯人院，已经是不容易了！在十年浩劫当中，像我这样一个小人物，能有回天之力吗？许多比我有资历、有功劳的老干部又怎样？不是一样进牛棚？为什么对我这样苛求？这公平吗？这公平吗？”

是表白，是控诉，也是痛苦的申辩、呻吟！

蕾蕾垂下了头。她又一次软下心来。是啊，任何人都不是圣人，只要不出卖良心就称得上好人了，为什么一定要求爸爸像妈妈一样呢？可是，顾方知叔叔为什么能呢？他只不过是爸爸妈妈

的朋友，一个普通的党员，一个研究昆虫的学者，他为什么不顾个人安危呢？

不，还是不应当苛求。10年了，妈妈死掉10年了，他没有再娶别的女人，就冲这一点，也可以说，他对妈妈还有感情。他还年轻，一表人才，他会找不到一个女人吗？然而他没找，他给女儿寄过钱、寄过邮包，唉，也许不该给他退回去的，那退回去的邮件，对于一个父亲，是不是一支支的伤心箭呢？

蕾蕾在战栗，脸孔发热了，就在她快要扑过去喊一声爸爸，从此忘掉过去的怨恨的烟云时，不速之客冲击了她。

有人在叩门，声音很轻。

毕云阶揩掉泪水打开房门。进来的人是个矮胖子，长着一张娃娃脸，虽然他也快有40岁了，却要比毕云阶显得年轻。蕾蕾认识他，他叫陆霜青，从前是家里的常客，柜子里待客的锡纸烟，至少有一半是他抽了。

陆霜青一进屋，就是一阵大吵大叫：“蕾蕾在哪？让我看看，长高了没有？女大十八变，一定出落成漂亮姑娘了，错不了的，小时候就长得水灵。”

毕云阶勉强笑着说：“蕾蕾还记着你哪，刚刚到家，来不及去看大家。”

蕾蕾心头的阴云暂时扫去，她站起来，叫了声：“陆叔叔好！”

陆霜青哈哈笑着走过来，拉起蕾蕾的手，拍打着说：“这孩子记性真好！还记得你小陆叔叔呢！小时候就聪明得惊人。蕾蕾，还记得我给你讲过的故事吗？‘狼来了’哇！对了，我讲一遍，你就能倒背如流，跑到省直机关托儿所去贩卖。坐，快坐下，叔叔不要你立规矩。”

大家都坐下了，毕云阶忙着给他点烟，蕾蕾给他倒了一杯桔子汁儿。

毕云阶无论怎样努力，都做不出笑脸来，蕾蕾对陆霜青倒是有好感的，她回来之前，见过陆霜青发表在报上的五六篇文章，最长的占了整整一版。他也真算有心人，居然把他与妈妈在土高炉前大炼钢铁的照片找了出来登在报上。陆霜青是从前被蕾蕾称为“小陆叔叔”的，那是因为机关里的人一律喊他小陆的缘故。

如果说他是妈妈的战友，倒也不离大格。他原来是省委宣传部的通讯员，每天骑一辆挂白牌的公用自行车，跑机关，跑学校，分送省委文件。人很精灵，又会来事，人人都喜欢他，蕾蕾就常坐在他的自行车大梁上跟他到处去兜风。华序是陆霜青的入党介绍人，还出过两年学费，供他进综合大学的政治专修科念了两年书。华序认为这个人是很有才干的，当一辈子通信员怪可惜的，假如他文化水平高一点，他倒是宣传部门的一把好手。果然，他从大学校门出来，华序就把他要到秘书处去了，华序手把手教他，直到1965年他成为独当一面的宣传处的干事。

蕾蕾问了一句：“陆叔叔还在宣传部吗？”

陆霜青说：“一无所长，只能吃这碗干巴饭喽，哈哈，这点本事，还是你爸爸、妈妈花钱供我的呢。”

蕾蕾听他这话为妈妈感到几分安慰。事隔多年，他不忘记妈妈的好处，这就不错了。

毕云阶似乎并不喜欢这些。他轻描淡写地介绍说：“那不值得一提，都是组织的培养嘛。你陆叔叔进步很快，现在是新闻报道处的处长了。”

“是吗？”蕾蕾第一次露出了笑容，“怪不得陆叔叔的文章写得那么漂亮，敢情是新闻专家了。”

陆霜青挥挥手，说：“听你爸爸胡扯！我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罢了。”说到这里，话题一转，带三分神秘色彩地对毕云阶说：“权威消息！真的，可以说，是从消息灵通的人那里得来的，你就不要问来源了。你的令快发了！唔，可能是宣传部的

副部长，快是我们的顶头上司了，到时候多指示啊！哈哈……怎么，你皱眉头不信？真的，前天常委讨论了第二盘，当然有争议，有人有点异议……”

说到这里，陆霜青打住，一对圆眼珠转着打量毕云阶。

毕云阶先前是不大在意地听着，听到“有人有异议”时，从沙发里坐直了身子，虽然没有脱口追问，那神情已经暗示给对方了。不过，他说出来的话是另外一层意思：“别瞎广播了。我这点水你还能不知道？”

陆霜青两只手有节奏地拍打着沙发扶手，说：“这用不着谦虚！异议，什么异议？我看是一种斗争。有人眼红！像话吗？他们说，华序被打成反革命时，你表现得消极，甚至……算了，人嘴两张皮，不说它了。我是爱放炮的，我直接闯到胡老头子那去了，我连桌子都拍了。干吗呀？就凭资历才干，这么多年也该升了，我一个小公务员都当了处长，人家毕云阶怎么了？为了华序的事，吃了多少苦头？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你们站出来比一比！退一万步说，就冲你是华序的丈夫，也该提拔！”

陆霜青很激动，嘴角都泛出了白沫，他仿佛在和一个缺席者辩论。

毕云阶斜了女儿一眼，他觉得陆霜青有些话说得太走板了，就搪塞地说：“你扯哪儿去了？别人议论什么，我都不去计较。有时，连自己的亲人都不一定理解呀！”

后一句，当然是说给蕾蕾听的。

陆霜青当然听不出来，喝了一口果子汁，只顾说他的：“叫他们当一回反属，就理解了！岂有此理！有人还攻击我呢，说我出卖过华序！问问良心！是啊，在干校二区队那阵子，不单我，大家都帮助过华序嘛，那叫出卖？那时咱们都是奴性十足，上边说什么是什么，华序反对林彪，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文化大革命，为走资派鸣冤叫屈，公安六条上就说是反革命，我们能对抗

吗？话又说回来，如果我有华序那么高的觉悟，我不也是英雄了吗？唉，说真的，老同志谁不了解谁？不瞒你说，我偷偷托一个熟人，走后门给华大姐送过两回吃的呢。”

说到这里，陆霜青的眼圈红了。他是否给在押的华序送过吃的，毕云阶无从查考，只好点头。

陆霜青口若悬河地谈了一个多小时，才站起身告辞。走到门口，他对蕾蕾说：“明天上我家去玩儿，当然没你家这么阔气，可也不是当年独身宿舍那个穷酸样子了，床底下塞着臭袜子，你还给提出来笑我呢……哈哈，去我家，给你包饺子吃，对了，还要买上一篮子金桔……”

陆霜青走了，关门的时候，毕云阶叹了口气。

蕾蕾疑问地望了毕云阶一眼，毕云阶欲言又止，半晌才反问一句：“你去他家串门吗？”

蕾蕾摇摇头：“想去，不过暂时去不成。”

“不去也好。”毕云阶说，“你知道就行了，不要出去乱说。当初，你妈妈的言论都是在干校分组会上提出来同大家探讨的。后来上边追查下来，好多人替你妈妈遮掩，陆霜青却拿出了全部记录。他记得全极了，这下子惊动了‘四人帮’的黑爪牙，下令要严办。材料报到公安局军管会，退了回来。那时陆霜青是专案组长，他大骂军管会是右倾，又连夜重新写了综合材料，第二次报了上去，这才发的逮捕令。”

蕾蕾倒吸了一口凉气，联想起方才陆霜青那一派坦荡荡的气度，她真想啐上几口。她对毕云阶这个当父亲的又有了几分好感，他毕竟还有一点泾渭之分啊。难道由于自己的偏激而对爸爸误解了吗？

宽容是不是美德呢？

他要同死去的人复婚

时钟打了七下，天黑了。

毕云阶对女儿说：“你饿了吧？我弄点吃的。吃什么呢？送行的饺子接风的面，你不是最喜欢吃煎面吗？再加点芝麻。”

蕾蕾刚想到厨房去，又有人来敲门了。

毕云阶无可奈何地望望女儿，走过去开门。

进来的两个人都穿着的确良卡叽中山装，前头那个戴眼镜的腋下夹着个黑塑料公文包。

蕾蕾从毕云阶的表情观察，这是两个生客，或者干脆不认识。

毕云阶客气地伸手让座，说：“你们是……”

夹皮包的人点点头，十分客气：“我们是，皇城区人民法院的，今天来找您谈谈关于……”

毕云阶连忙打断客人，一连说了几个“不忙、不忙，请坐，请坐。”

蕾蕾在一旁冷眼看去，毕云阶脸上的肌肉跳了几跳，很慌张、很不自然，手忙脚乱地去拿压式暖水瓶，忘记了去按压水阀，竟向茶杯里倒起来，当然一滴水也倒不出来。

夹皮包的伸出手捺住茶杯口，笑笑说：“别客气，我们还是谈正事吧。”

“不急，不急。”毕云阶有意无意地扮了女儿一眼，又去拿出一盒中华牌香烟，是玻璃纸包着的金色盒子。他方才给陆霜青抽的只是牡丹牌烟，而且没有过滤嘴。他撕开封口，拿出两支烟，说：“尝尝，这是胡书记拿来的，一包一元六角多呢，味道倒是不大一样。”

夹公文包的人摆摆手：“我不会吸。”大概觉得空气有点紧

张，就接了一支递给他的同事：“老邱抽一支，你还是有个半仙之体的。”

几个人都笑了，人们都能觉察到的那种不和谐的气氛总算暂时被中华香烟冲散了。

父亲同他们有什么事呢？是妈妈案子的善后事宜吗？那爸爸用不着紧张啊。

蕾蕾正在胡猜乱想，毕云阶对她说：“你累了，坐了两天车。等会儿我再弄吃的，你先吃点点心垫补一下，回到卧房休息一会儿。”

毕云阶拿了一筒什锦饼干，硬塞到女儿手中。

蕾蕾敏感地意识到，父亲有事背着自己，或者说不便于她在场旁听。她只好抱了饼干筒推开客厅北面的门，那是通向她卧室的。

蕾蕾的卧室也够气派的了。她小时候见过这种格局的卧房，那是在云湖宾馆，省里开劳模会，妈妈给省长们起草文件、讲话稿，就住在宾馆里，陆霜青常常把蕾蕾带到那里去玩，两个人在一压乱颤的席梦思床上滚来滚去，惹得桌前写材料的妈妈不时地回头斥责陆霜青：“孩子王！去吧，再领她闹，都赶走你们。”每逢这时候，小陆叔叔总是挤挤眼睛、吐吐舌头朝她扮个鬼脸，逗得她更加疯笑。

现在，蕾蕾的房间也有铺着白单子和绿毛毯的席梦思床了，也有床头柜、立式床头灯，镶在门上的穿衣镜。啊，对面五斗橱上还有一台菲力普牌彩色电视机。

哪来这么多钱呢？省里照顾的吗？还是毕云阶自己购置的？是用的哪笔钱？妈妈的抚恤金吗？还是补发妈妈的工资呢？

她觉得，可能是妈妈的抚恤金。

她的心又沉重起来，直想哭。女儿的享乐，用的是妈妈的抚恤金，这种享乐和蘸着妈妈的血挥霍有什么两样呢？妈妈的一张

放大照片挂在墙上，大概有二尺，一比一的人头像。妈妈凝视着女儿的床，嘴角挂着深沉的笑意，穿着白色的连衣裙……啊，在蕾蕾的记忆中，妈妈最喜欢穿白衣服了，特别是夏天，上公园的时候，不单衣服是白的，连遮阳帽、皮凉鞋和手提袋都是白的，像她的肤色一样白，真不亚于象牙色泽。

妈妈长得真美，如果妈妈当电影明星，也会轰动的。对了，北大荒农场的—个好朋友这样称赞过。真怪，当那个走资派的女儿在被窝里亮着手电偷偷观看了蕾蕾妈妈的照片时，非但没有斥责这个反革命，却发出了这样的赞美。蕾蕾那时保存妈妈—张二寸小照，是挺冒险的，—直藏在钱夹的最里层，只有在晚上才敢拿出来偷偷看上几眼。她下乡前得到这张照片不容易啊！那不是爸爸给她的，而是顾方知叔叔珍藏的。顾叔叔说：“我只有这么—张照片，你保存着吧。这还是1959年春天你妈妈和你爸爸结婚前夕照的呢。”

蕾蕾想起顾方知来，坐在床沿上发呆。他为什么音讯渺茫呢？他可能是有意不来见自己的，他写的那些信，就从来没有写过详细地址，不是托张三转交，就是委李四代递，他到底在干什么？在什么地方？还在农村改造吗？这太不公平了！粉碎“四人帮”都快4年了，他的问题怎么还没有解决？

蕾蕾坐不住了，假如可能，她真想立刻跑出去寻找顾方知。明天，明天—早就上路！

无意中，她听到了客厅里谈话的声音，思绪被牵了回来，好奇心使她有一种偷听别人谈话的欲望，虽然那是不该的。愈是不叫她知道的，她愈是想知道，她从小就是这个脾气。

“你们这是故意刁难。”这是毕云阶十分激动的声音，从客厅里传过来。

蕾蕾禁不住凑到门口去细听。

法院来人中的一个在说话，声音平静而不失礼貌：“请你不

要激动。不但我们区法院认真研究了幾次，还把你的复婚申请书递交给市中级人民法院、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过了，上级驳回来了。”

“为什么？”毕云阶气冲冲的声音，“这是不公道的。”

还是法院的人在解释：“总要根据婚姻法条文办事呀，离婚如此，复婚也一样。当然，你的心情，我们是充分理解的，也希望你能理解我们具体工作上的困难。复婚当然无可非议，可是按照法律程序，要征得女方同意，要有男女双方的复婚申请。遗憾的是，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征得华序同志的同意了。”

蕾蕾听到这里，只觉得头轰地响了一下，像灌了铅汁一样沉重，两脚像踩在绵软的棉团上一样，轻飘飘的。她费了好大气力，才走到5步以外的床边。她想哭，却又哭不出来。

一切都明白了。原来如此，毕云阶在申请同妈妈复婚！同一个离了婚又已经死去10年的人复婚！连小孩子都知道，这种复婚没有丝毫实际意义。毕云阶不过要通过那一纸合法的复婚证书，猎取到合法的“烈士丈夫”的称号，名副其实地享受起一切由烈士带来的好处。那么一切讥讽和一切街谈巷议便会烟消云散吗？

蕾蕾感到周身发冷，上下牙捉对儿打架，这是爸爸灵魂的写照吗？

差异和对比常常是最好的鉴定书。

当年毕云阶逼着妈妈签字离婚的时候，他不是同样主动、积极吗？

那是蕾蕾第二次逃走以后的事情。当她又成为垃圾箱里的流浪儿的时候，又被警察送进了收容所。不久，顾方知第二次又从收容所把她领了回来。蕾蕾死也不肯回到爸爸身边，顾方知为了不使孩子伤心，只好暂时带着她。有一天，毕云阶找上门来，声称要带蕾蕾去监狱看望妈妈。

这是蕾蕾许久以来的心愿啊！

她乐得忘记了对爸爸的恨怨，跑到商店里买了一盒巧克力糖，一步三跳地同爸爸坐车到了楚城监狱。

毕云阶填了一张什么表格，岗楼里的那个哨兵虽然还像平素一样绷着不习惯笑的脸，却朝父女俩点点头，替他们打开了铁大门上的那个小门。

在一个有铁栏杆的空房子里，蕾蕾见到了妈妈，旁边有两个警察来回走动。

妈妈瘦多了，象牙般洁白的脸变得更加惨白，像蒙了一张白纸，只有那一双眼睛还和从前一样。

蕾蕾哭了，从栏杆缝隙里伸进手去，抱住妈妈的胳膊不放。她看见，妈妈也哭了，眼泪落到蕾蕾的手上。

妈妈说什么来着？啊，她向爸爸道歉了，她说：“云阶，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蕾蕾。在我面前有两条路，我明白。为了求得真理，对得起一个共产党员的称号，我深思熟虑过了，我只能选择让你和孩子失望的这条路——也许你不能理解。”

这些话的内涵，那时只有9岁的蕾蕾是听不懂的。她惟一执著相信的是妈妈，妈妈不会是坏人。

毕云阶皱紧眉头，在铁栏杆前踱来踱去，好长时间都没有说话。

华序似乎觉察到了什么，她柔声问道：“云阶，你好像有什么话要说……”

毕云阶长叹一声说：“你的个性，我知道，我已经不希求什么了。我想了很久，我撑不住各方面的压力……你应当理解我，为了孩子，为了你一直爱着的孩子，我不得不这样做了，相信你能理解和谅解……”

他打的是什么哑语呢？她不了解这是为了爱！蕾蕾一会儿看看爸爸，一会儿望望妈妈，不得要领。

妈妈是听明白了的。她苦笑了一下，文静而平和地说：“你

有这个权利，也许你是明智的，只是我没有想到你会这样快地决定下来。”

妈妈哭了，她说：“我白当了一回母亲。生儿育女，生只是生物的本能，教育才是应尽的责任，可惜这副担子都落到你肩上了。如果你不认为我是愚钝的人，我希望你记住我的最后一句话：不要迷住孩子的眼睛，要叫她分清黑白、善恶……”

她松开了蕾蕾，揩去眼角的泪水，抖抖地从铁栏杆中间伸出一只骨瘦嶙峋的手，对毕云阶说：“拿来吧，我签字。”

毕云阶像做了见不得人的事一样，一脸惶愧神色，双手插在风衣口袋里，踌躇半晌，才掏出一张写得密密麻麻小字的纸，递了过去。

华序连看都没有细看，好像很轻松，向毕云阶要过自来水笔，在那张纸的地角处草草地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在交还给毕云阶时，她甚至苦笑了一下，可是蕾蕾还是看到了。在妈妈转过身去的一瞬，从她的眼里淌出一串像血一样的泪……

这是一张什么纸呢？逼得妈妈这样痛心呢？蕾蕾弄不清。

该走了，狱警在催促。

蕾蕾想起了那包巧克力糖还在手里，赶忙塞给妈妈：“妈妈你吃，是我用卖旧罐头瓶子的钱买的……”

妈妈再也忍不住了，痛哭失声……

啊，可怜的小傻瓜！蕾蕾哪里知道，妈妈的哭声中浸透着母女间生离死别的哀伤啊！她爱女儿，也许正因为强烈的爱，她才不得不在那张纸上签上名字……这种滋味，只有蕾蕾长大成人后的今天才能理解，而理解的代价却是切肤般的疼痛啊！

这就是离婚，断绝一切家庭的、经济的和感情的来往。蕾蕾很难明白，妈妈在那张纸上写上几个字，从此她就不是妈妈了吗？

是的，爸爸是这样向孩子解释的。

那天，毕云阶很反常，又像悲伤又像高兴，他买了好多小菜，还买了一瓶白兰地酒，坐在桌前喝了一杯又一杯。他喝得眼睛都红了，还在喝。

蕾蕾抱住他托酒杯的手央求说：“别喝了，爸爸，妈妈不是不叫你多喝酒的吗？”

“妈妈？”毕云阶拍着孩子的头哭了起来，哭过了又笑，苦笑着说：“没有妈妈了！记住，谁再说你妈妈是反革命、坏人，你就对他说，爸爸和妈妈离婚了，我没有妈妈！”

蕾蕾哇的一声哭了起来。这就是那张纸的宣判吗？到这时，孩子才明白“离婚”对于她意味着什么。她哭、她闹、她喊叫，一迭声地喊着要妈妈。

这时候，陆霜青进来了。

小陆叔叔没有忘记给蕾蕾带来一把金桔，不过没有像从前那样，把蕾蕾举到头顶上去耍。

陆霜青坐在毕云阶对面，说：“你的材料写好了吗？”

毕云阶好像很怕他，酒不再喝了，赶忙去给陆霜青找香烟，絮絮叨叨地说：“彻底划清界限了！我同她办手续离婚了……”说着，拿出了蕾蕾认为最可怕的那张纸，抢走她的妈妈的那张纸片子。

陆霜青看了一眼，轻描淡写地说：“这，只是形式。关键在于你能不能揭发出她的干货。对你的等待，不算短了。”毕云阶听了这话，呆在那里，好久才醒过来。

毕云阶几乎是用哀求的语气了：“小陆，啊，陆组长，你还了解我吗？”

陆霜青冷笑着说：“知人知面难知心啊！谁能想到，华序连副统帅都恶毒攻击呢！这样吧，你明天一早就回干校去，有事直接同专案组说吧。”

他捻灭烟头站起来。

毕云阶说：“孩子还带到干校去吗？给我 5 天假，我把孩子安置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去吧。”

听到这里，蕾蕾浑身发抖起来，她决心再次出逃！

往事是不堪回首的。

当年蕾蕾不能尽解的一切，她都像牛羊吃草一样储存到庞大的胃里面去了。此时她像牛羊反刍似的重新咀嚼这些无法消化的东西，终于品出了滋味，分解了一切营养和糟粕。

撇干净自己的最好办法是离婚！

给自己脸上贴金的上策是复婚！

这就是自己差不多被他感动、对他寄予同情的爸爸吗？不，蕾蕾不需要这样一个被市侩哲学充塞着头脑的爸爸，那是耻辱，是对妈妈的背叛！你爱你的妈妈吗？那你就该承认你的爸爸。他们是水火不相容的。你看，妈妈的一双眼睛盯着你呢，你敢正视那一双正直的眼睛吗？是啊，你只能爱你的妈妈。她走过的路，尽管对她自己来说是绝路，可那是一个真正的人走的路。她并不一定像报纸文章中写得那样高大完美，她是人，是普通的人，是个柔顺的妻子，慈爱的妈妈。那大概是陆霜青的文章吧？他说，妈妈是个具有钢铁般意志的英雄，是叱咤风云的闯将，是无产阶级原则性的化身，即或在最黑暗的牢狱中见到女儿时，她都没有流过一滴泪水……谎话！妈妈的泪水并没有少流呀！

一霎时，蕾蕾感到这间体面而舒适的卧房像冰窖一样寒冷，陌生极了！叫她一刻都待不下去。

她伏在床上啜泣起来。

房门轻轻推开了，毕云阶送走客人以后，来到了女儿房间。

他轻轻坐到女儿床头，悲伤地说：“别哭了，好蕾蕾，你把我的心都哭碎了。这些年你吃尽了苦头，说来说去，只能怨爸爸不好。可是现在好了，我有条件尽一尽当爸爸的责任了……”

蕾蕾的肩膀抽动着，毕云阶伸出手去抚摸着她的头发，哽咽

着说：“我知道，你恨爸爸。是啊，爸爸叫你吃这么多苦，是应当憎恨的。爸爸对不起你，也对不起你妈妈。你以为我的压力小吗？你以为我容易熬过来吗？你为什么不能设身处地地替爸爸想一想？你为什么就不能体谅爸爸的难处呢？有个反革命的妻子，别人都拿白眼看你，写不尽的检查、交代，谁会信任我？我把心都掏出来，人家仍然不相信我啊。爸爸就是块钢，也压成粉末了……”

蕾蕾从床上坐起来，侧过脸去。

毕云阶又深深地叹了口气，说：“我失掉了你妈妈，我不能再失掉女儿了。在这个世界上，我还有什么亲人呢？老天啊，你为什么要这样残酷地惩罚我啊！蕾蕾，叫我一声爸爸吧，哪怕只叫一声也行……”说到这里，他几乎泣不成声了。

蕾蕾揩一把眼泪，望着毕云阶凄凉的面孔，觉得他确实很可怜。可是，那路不是他自己走的吗？

此时支配蕾蕾感情的重心在妈妈那边，她不能背叛妈妈。她除了同情和怜悯爸爸以外，其余的都是鄙视。那一声爸爸实在是叫不出口！

她推开房门跑了出去。

爱情的终点裁判

毕云阶像一截朽木，无风自倒，跌坐到椅子上。晚风摇撼着窗子、半敞开的门，送来邻家一阵似强似弱的音乐声，像从浩茫的太空送来的与人间毫无关联的乐曲，又像敲击他心脏发出的凄凉的颤音。啊，啊，是电子琴吗？还是凄凉的箫声？

他实在受不了啦！

世界对他太残酷了，他感到有一只在冥冥中捉弄自己的利爪时刻在抓他的心，抓了10年，旧创未平，又抓出了滴滴鲜血。

他恨女儿，最深的爱有时就是恨！她这样薄情吗？她连最起码的一点安慰都不肯给爸爸吗？

毕云阶几乎绝望了。在华序被抓起来的时候，他绝望过，那是对爱情和前途的绝望；现在的绝望，却是心灵的绝望。

还写什么纪念文章？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连你的女儿都不肯原谅你、理解你，世界还有谁能给你以温暖？

毕云阶近于歇斯底里地发作了，他走到桌前，把摊在那里的稿纸稀里哗啦全都扫到地，用脚踩！

一张翻拍的照片飘落到地上，正当毕云阶要踏上几脚时，他的脚猛地又收了回来。

他心底生出的疯狂之火顿时熄灭了，他抖抖地拿起了这张照片。

这不是原版照片，是陆霜青翻箱倒柜找出来，送到省新闻图片社翻拍后重印的。当陆霜青把这张照片送给毕云阶时，毕云阶竟一连串说了十多个“谢谢”。当然他也奇怪，陆霜青既然是华序专案组的负责人，怎么敢窝藏华序的照片？是偶然的疏漏，还是没当回事？

都不是。陆霜青说：“哪个人心底没有一个算盘？光明总有一天会战胜黑暗。这不是，这张照片又回到了你手中！”

说谎！陆霜青把自己打扮成了先知先觉的人物，毕云阶根本不信。但仍然感谢他，这是一张看上去滑稽，却真实地再现了毕云阶同华序爱情起跑线上初会的照片。

你看，照片上不是题着这样的话嘛！“百米的终点，让它化做人生和爱情的起点吧。”

是的，照片上的背景确实是百米田径赛场上的终点线，好多握着秒表的终点裁判员弯着腰、瞪着眼、伸着手，像在量运动员的脚步。

奇特的画面！滑稽！年轻时代的毕云阶竟然背着欢笑的华序

在进行百米冲刺，终点绳像一根柔软的飘带缠在毕云阶的腰际。

不知是哪个淘气的人为他们摄下了这样一个珍贵的历史镜头。啊，这张照片，曾经是作为摄影作品展览在学校图书馆的玻璃橱窗里的。后来，当他们果真相爱以后，那位摄影的同学郑重地取下了这张照片，题上了那句俏皮的、含有几分人生哲理的话，当做贺礼送到他们手上。

为了这张令人高兴又令人害羞的照片，华序和毕云阶不知互相戏谑、调笑了多少次，只要一有机会重温大学校园里的旧事，总要拿出它来大笑一番。

啊，罗曼蒂克式的爱情，罗曼蒂克式的照片，却不是罗曼蒂克式的结局！

毕云阶是学新闻的，华序比他低一年级，学的是中国语言文学，不同系、不同专业。他们的相识实在带有传奇色彩。

那是 1956 年春天，在先农坛体育场召开全市大学生运动会。毕云阶以着他的优美的体形和娴熟的技艺，在获得男子木马总分第一名以后，来到竞赛场地，参加饶有风趣的百米寻物赛跑。百米跑道的中间，都用砖头压着一张字条，上面写着运动员需要寻找并带到终点的东西，那是要运动员不仅有体力、速度，还要有反应迅速的本领。

欢声雷动，拉拉队在呐喊助威，大学生们虽然不知道字条写的是什么，但都觉得这一定是很新鲜的玩意儿。

当毕云阶最先跑到 50 米处的横线处，哈腰拾起字条时，眼波一闪，只见上面写了三个字：“小女孩”。哟，竟是运一个大活人到终点！

大约所有的字条都是写着“小女孩”，毕云阶稍一迟疑，就近的小女孩都被别的运动员抢光了，有一个大力士把一个正在吃冰淇淋的小女孩扛到肩上，不管小孩子怎样哭叫，他还是严肃地拐上跑道，引起一片又一片的哄笑。

晚了，附近再没有小女孩了！人墙后面有，那太迟了！毕云阶突然灵机一动，发现一个娇小的女孩子正低头写运动场战地快报，穿一件白色连衣裙，戴着白色遮阳帽……毕云阶不由分说，背起她就跑，连脸面都没有看清！

哄笑，雷鸣般的哄笑！女孩子先时在挣扎，后来反倒格格格地笑起来，跟他合作得很好。

毕云阶后来居上，竟然第一个撞上了终点红线！

天哪！若知道这是一个女大学生又是这样漂亮的大学生，啊，毕云阶绝对没有勇气背的，当他把她放到地上时，脸红得像萝卜，结结巴巴，半晌才说了一句：“对不起……”

华序呢，当然也很羞。可是当终点裁判员们议决毕云阶的“第一”无效时，她走上去了，问道：“为什么？”

裁判长笑了：“字条上写的是小女孩……”言下之意，华序是大姑娘了。

华序格格一乐，说：“那你们应当注明以什么年龄为限，否则，就应当承认，因为我也不是男的啊！”

华序舌战群儒，居然为毕云阶争得了冠军。

啊，多么有趣的相识！

现在，当毕云阶重新拿起这张饱和着甜蜜的照片时，眼里含着的却是苦涩的泪！

人生最难忍受的痛苦是什么？是你在最痛苦的时候偏偏要去回首早已逝去的甜蜜的往事！

毕云阶长叹一声，倒在沙发里，僵卧着。

他不爱华序吗？不，爱她，即或在她身陷囹圄的时候，毕云阶的脑袋里也有两个阵营在对垒；理性的、“党性”的同感情的、儿女情长的。

啊！为什么被别人指为“负心人”呢？有谁能了解自己的心啊！

华序如果有在天之灵，她会了解自己的，她毕竟同自己一起生活了十几年，她深知自己的长处和短处。

毕云阶得承认，自己太怯懦、太僵化了。假如，当初自己能像顾方知那样，又会是什么样的结局呢？啊，那现在自己就是当之无愧的英雄，不会像今天这样惴惴不安地去迎接痛苦的荣誉！

想这些干什么？

他想甩脱这一切纷杂的意识，想沉沉地睡一觉，可惜他根本闭不上眼睛。走马灯一样的往事逼着他一次又一次领略苦痛的惩罚。

是哪个诗人的语言呢？他说，爱情像甘醇的酒，越是陈酿越纯净。

毕云阶从前背过这首诗，当然是背给华序听的。他爱她，运动场那尴尬的一幕，真的成了他们爱情长戏的序幕，启幕那么迅速，双方都没有一点化妆的时间。

他爱华序，他口问心地问过千百遍了，自己从来没有过动摇。华序漂亮得像电影明星，经常有人误认为她是哪部电影里的哪个角色。她有思想、有见地、有文学才华，开朗正直。如果新中国也兴选校花的话，毕云阶认为华序一定获得全票！

北京西郊的夏夜是醉人的，从校园西门到南门，那幽静的路上，印过他们多少足迹啊！

是什么时候表白爱情的呢？那是毕云阶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他从布达佩斯参加完世界青年联欢节回来，在大礼堂做了出国访问花絮报告以后。散场出来，他远远看见华序的背影在树后闪现，他跟了过去。

短短的半个月，毕云阶从遥远的欧洲接连给华序寄来九封热得烫人的信，一律航空邮寄。可惜，直到他本人回国，还有最后两封信滞留在途中。

要表白的，在信里都表白了；要发誓的，都在信里发过了，

毕云阶不用再开口。知识分子真怪，用笔来表达求爱的心，总比用口来得潇洒自如。

华序是怎么说的呢？啊，她说得有点俏皮：“即或是在热恋的情人当中，海誓山盟也是不值钱的，这结论，应当到我们当中的一个人先闭上眼睛的时候去做。”

她说完笑了，那样甜蜜，微微闭起了眼睛，月光下，那长长的睫毛轻轻地颤动着。他第一次吻了他。

毕云阶给她带回来一件礼物，是多瑙河边的橡木做的火炬。毕云阶说：“青年人是火炬，发光、发热，把光和热给我们的党，给祖国，给人民，直到它最后熄灭。”

华序纠正他说：“不对。它是熄灭不了的，火炬要一代代传下去。”

青春的火炬照亮了他们的前程，他们高举着火炬走过来了……

火炬真的不能熄灭吗？不，华序的火炬熄灭了……毕云阶感到眼前一片漆黑。

蕾蕾是不会相信爸爸的。在孩子眼里，爸爸不过是忘恩负义之徒，是个软骨头。不，比这还要坏，是个出卖爱情、出卖灵魂、出卖人格的小人！

毕云阶浑身又打了个冷战！

他内心有一个声音在反抗，在为自己申辩：“不，我冤枉啊！”

没有那场浩劫，会有今天妻离子散的结局吗？不，绝不会的。那他毕云阶会和华序白头偕老，一直过完幸福的一生！

毕云阶同华序十几年共同生活，没有同她吵过嘴，他坚信这爱情是真的！

1962年，毕云阶得了急性黄胆型肝炎，工作队的同志把他送回省城住了医院。他多想见到妻子啊！可是他克制了自己，他

不能把肝炎病毒传染给华序。他特地嘱咐医护人员，不准华序进来。华序还是趁人不备溜进了肝炎病房，手里拿着水果。毕云阶慌忙戴上口罩，离很远就喊：“你千万哪都别摸、别碰，站一会儿就走。”

华序笑了笑，坐到床边来，替他摘下口罩，说：“你呀，神经过敏！”

这难道不是纯真的爱？

是的，没有水分。几年来，在华序死后，他常常把往事翻腾出来，用爱情的化验器化验一遍，他觉得只有一点可以说是不纯的，那就是他所以狂热地爱华序，第一印象是她惊人的美丽。他曾经扪心自问过：“倘若华序是个奇丑无比的女人呢？尽管开朗、热情、正直、诚恳，自己会选择她作为终生伴侣吗？”

结论是：不。

这结论曾使他吓了一跳。但同时他又原谅自己说：“外在的美和心灵的美统一于一身不是更好吗？”

最精密的仪器总有误差，最纯的酒精中乙醇含量也达不到百分之百的浓度，何况爱情呢！被描绘得洁白无瑕的爱情，是作家们的创造，在世间也许根本就没有过。

自我谴责和自我原谅，常常是一对孪生兄弟，交替地折磨和安抚着毕云阶的心。

说真的，如果没有女儿给他带来新的感情打击，旧日的创痕也许会慢慢平复的。他已经暗下决心，为了女儿，为了人格，也为了赎罪，不再娶妻子，他这是做出一种牺牲啊！他才四十七岁，以他现在的地位、年龄和境遇，他甚至可以找到一个30岁的大姑娘。机关里就有几个待嫁的姑娘主动向他靠拢过，他未尝没动过心，但他克制了。他从前是笃信人生只有一次爱情的（当然指真正的爱情），自从他从十年麻木、冰冷的木乃伊状态中醒过来，再生出侧目漂亮女人的心时，他常常后悔，怀疑自己是不

是变坏了。他下了多大的狠心，回绝了多少登门为他拉线的媒人啊！难道这一切不是为了叫女儿的心不再受半点伤害吗？

可是蕾蕾伤害起爸爸来，是那样残忍！

毕云阶真想大哭一场。

从前，他哭过，那是在他办完了同华序离婚手续后，既轻松又沉重，他独自一人到荒郊野外孤坐了整整一天。望着天上的行云，回想逝去的美好岁月，望着河里的流水，饱受着感情波涛的冲击！他默默地向华序赔罪祷告：“原谅我吧，你是爱我的，正因为爱，你才能原谅我。我的心，永远爱你，直到你化成灰烬！你被抓走的时候，我没有去送你，不是我自私，我们还有孩子。为了我们的蕾蕾，我不得不这样做了，当然也为了我的前途，你一定不会同意我和你一样去坐牢的，是吗，华序？是的，不然你的一切反常举动，为什么对我一丝都没有透露呢？你坦白吧，你争取从宽吧，也许，将来我们还有复婚的那一天……”

他趴在草地上哭了，像同亲人诀别，不，同爱情诀别。

该死！假如当初自己坚持不离婚呢？他们至多说我立场不稳，难道还能把我投入监狱？

不，他们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顾方知又怎么样？他不过出于正义、同情，不是就被关起来了吗？

不要当事后诸葛亮了吧！你当时不是也感到华序太过分了吗？她怎么会鬼迷心窍地攻击文化大革命？

但毕云阶仍然认为她不过是一时冲动，把局部当整体，不是立场反动。一个50年代末就入了党的青年，一个历史上没有半个污点的大学生，会一下子走上反党道路吗？

他幻想着，有一天她会得到从轻处理。

这幻想终于破灭了！在毕云阶面前，出现了一架无法平衡的天平。

一边的砝码是“政治”、阶级斗争、前途、党籍，包括他全

部的信仰，另一边是爱情、爱情，还是爱情。

爱情的砝码太轻了，像一根羽毛！无论如何压不过那一边的“政治”！

他必须抉择，而且在人们面前必须装得一点留恋和彷徨都没有的抉择！

是陆霜青来找毕云阶了，他是双重身份，既代表党，又代表朋友。

陆霜青说：“你的内心痛苦，不同样是我的痛苦吗？你和华序给了我多少帮助啊，这是我终生不能忘的。可是，在每一个共产党员面前，都有一个小道理服从大道理的问题。你还记得吗？文化大革命初期‘破四旧’的时候，我从一个资本家身上扒下来一个钢背心，那家伙做过胸腔大手术。据说不穿这件背心他就活不成，资本家真有钱，妈的，什么钢背心，那是从法国进口的镀金的背心！我给他卸下来了。但华序反对，她劝我：‘那是矫形和治病的工具，不能算‘四旧’，即使是纯金的，也应当留给人家。这样干，是不人道的。’今天想来，她变成后来的样子，还是有历史根源的。”

毕云阶没有出声。

陆霜青拿出一份材料，那是省委翻印的材料，中央文革一个首长最近的讲话，有一段陆霜青打了红杠。

多么可怕呀！华序居然惊动了中央文革！文件上面称华序的案子“是建国以来最反动、最恶毒的一起反革命案件”。

天哪，这不是定性了吗？这无异于最高法院的最终裁决，毕云阶心中那根幻想的游丝被彻底斩断了。

陆霜青劝他立即争取主动，提出同反革命分子华序离婚，不要等群众都知道了以后再被动地举白旗，那就太迟了。

毕云阶仍在犹豫。但是陆霜青的另一番话打动了她：“我知道，你们是有感情的。如果她真的爱你，就不应当害你，她会欣

然同意和你断绝夫妻关系。相反，如果她不干，说明她自私，想把你也拖到泥坑里去一同毁灭。那，她还有什么值得你留恋的？你就该下狠心甩掉这个即将淹死的人！”

打冷战，打哆嗦，但毕云阶也觉得有一点道理。他平生第一次感到爱情同“政治”是这样的水火不容，这样的势不两立！从前看戏，爱情向来同金钱、门第、势力构成矛盾，他碰到的却是新课题。

陆霜青见他沉默，又说：“你别忘了邱江的前车之鉴！”

啊，何等可怕！

邱江是1935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燕京大学毕业生。凭他的革命资历和才干，一进城，就是这个省的教育厅长。可是现在呢？信访办公室的一个普通接待员，满头白发，被遗弃在最不引人注目角落。

为什么由党员厅长的椅子上被掀到非党接待员的冷板凳上去？就是因为爱情和“政治”的天平失去了应有的均衡，确切地说，他是个“爱情至上主义”者。

这一切，只是一昼夜的事。

南征北讨、从戎马生涯走过来的邱江，一直没有结婚，战时没有时间去考虑这种私事。进了城，他像好多干部一样，开始物色对象。

天知道，他为什么单单相中了一个图书馆的资料员！如果邱江不爱看书也许就惹不了这个麻烦。

当邱江正式向党委打报告要同女资料员结婚的时候，三个省委书记同时找他谈话，先是骂了他一通，当然是好朋友之间那种骂，其中要数胡浩骂得最凶、最挖苦，他同邱江的经历几乎是相同的。

原来，经过调查了解，那个圆脸漂亮的女资料员是日本人，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随她父亲到这座城市开办洋行的。“九·三”光

复后，她父亲下落不明，这个日本女孩子举目无亲，无力远涉重洋回她的祖国，便客居在中国寻到了一个职业。

胡浩骂邱江：“鬼迷心窍！搞对象连火力侦察都不搞！亏你还是个行伍出身！别是小资产阶级的温情病又复发了吧？光看脸蛋不行啊！”

邱江却笑了：“她没有瞒我，她的日本名叫长野谷子。”

“什么？”三位书记都震惊了！明知道她是日本姑娘，邱江却还要打报告申请同她结婚，简直是乱弹琴。

邱江说：“党章上并没有这么一条，规定党员不准同外民族、外国人结婚。我爱她，这是最根本的。”

当然又是一顿友爱的臭骂。

车轮战术，劝他，开导他，甚至由胡浩和妻子周菁出面，找那个日本姑娘谈，他们尽到了战友的一切努力。

邱江却执迷不悟。

省委不得不召开党委会慎重研究。

结论是由胡浩向邱江宣布的：“咱们是出生入死的老战友了……可是我还是不得不代表省委向你宣布：要老婆还是要党籍，这是只能取其一的，你有选择的自由。”

邱江哭了，他沉默了好久，才喃喃地说：“我……要长野谷子……”

像挥泪斩马谩一样，邱江的伙伴们开除了他的党籍，撤销了他党内外的一切职务。邱江去过他自认为美满的爱情生活去了。

毕云阶曾经同华序嗟叹过：“邱江太傻了！为了一个女人，一个日本女人把党籍丢了，值得吗？”

华序是这样回答的：“不是为了一个女人，是为了爱情。我不明白党籍和爱情究竟有什么矛盾？因为长野谷子不是敌人……不过，邱江可能是错误的，他没有摆正最起码的关系。”

机关里的人没有一个人不说邱江傻的，虽然这话都是拌在叹

息中说出来的。

现在，毕云阶不是也面临着这种可怕的抉择了吗？要做邱江那种傻子吗？他的抉择要比邱江严峻得多，邱江的爱人至多是另一个血统、另一个国籍的女人，毕竟是清白的；华序呢？！是中央首长心目中挂了号的囚徒！

华序是一艘即将倾覆沉没的船，毕云阶是拴在船舷上的救生小艇，砍断缆索，他就可以逃离厄运险境；再迟延一刻，只有随同那船一起被汹涌的海潮所吞没！

邱江丢掉了党籍、官职，尚可以当一名普通职员，还有一个温暖的家；自己一旦效法邱江，就只有坐牢，只能守着空屋子幻想着爱情，难道华序还能获得自由吗？

代价太大，而所得太微乎其微了。更何况毕云阶心目中还有党性呢！

于是，后来的一切都发生了。他不是出于自愿，也不那么心安理得地同华序结束了夫妻关系。爱情的马拉松刚刚起跑，就被终点裁判罚下去了，而且永远！

这能怪我毕云阶吗？换个别人试试！也许还不如我呢！多少年来，大家不都认为这样处理是天经地义的吗？为什么惟独我就要承受没完没了的压力，永世不得消灾免难？

不管同华序解除婚约是否出于自愿，在毕云阶看来，毕竟可以松一口气了，孩子的履历表上再也不用填上一个反革命妈妈的社会关系了。

但他很快发觉了自己的书生气。那是“老子反动儿混蛋”理论流行的时代，同妻子离了婚，难道蕾蕾就不是华序身上掉下来的肉了吗？

接二连三的打击击碎了他的天真。

头一天华序被拉上刑场，第二天蕾蕾臂上的“红小兵”袖章便被工宣队长当众撕去，孩子哇哇哭着回家找爸爸。

毕云阶带着女儿来到学校，那么认真地向工宣队长解释：“可能你不知道，我已经同反革命分子华序离婚了，孩子没有这样一个妈妈了，这是法律上承认、生效的。请你们考虑一下，应当重在孩子的表现……”

工宣队长说：“你也是搞宣传的，这样糊涂？摘了帽的右派能叫左派吗？地主婆娘带着狗崽子嫁给贫农，狗崽子就不想变天了？！”

毕云阶木然地走出校门，比决定同华序离婚的那天夜里还要痛苦难过。

蕾蕾中学毕业应该下乡了。大家都下，本来没有什么。

但是蕾蕾又是哭着回家来的！

她被编到“可教育好子女班”里，单独送到最艰苦的北大荒边陲去。什么是“可教育好子女”？地、富、反、坏、右的孩子！离了婚以后，蕾蕾仍然是“可教育好”的子女，这样教育，怕是永远也教育不好的！

这一次，毕云阶没有再去找任何人，他渐渐醒悟了：离婚与否，无关紧要，这如同被大雨淋湿了衣服后想起打把伞，湿了的衣服不会因此而变干！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他真想找到华序的坟场去大哭一场，她在哪里呢？

现在，一天乌云都散尽了吗？

不，心头的乌云还在！

多少人在讥笑他自私、不忠于爱情，多少人在指他的脊梁骨骂他是英雄身边的败类！这公平吗？

有的人原谅他，有的人不肯原谅他，他不知道自己究竟错在哪里？离婚不对，复婚也不对，做人不是太难了吗？

他痛苦，他怨恨，他不得不恨恨地想：我不过是代人受过。代谁呢？也许不是哪个具体的人，是一种什么概念吗？

胡思乱想！去找蕾蕾吧，应该把这一切都讲给她，她难道还不能谅解她苦难的爸爸吗？

不，还是去找胡浩想想办法，有些话，从他口中说出来，那效果可能比当爸爸的更见成效些。

毕云阶关了灯，轻轻走出门去。

垃圾千金和疯女人

春天的南国之夜是安谧宁静的，行人稀少，只有末班电车驶过，在电线上划出一道道绿色的弧光。

蕾蕾漫无目的地踟躕在弥漫着白兰花芳香气息的骑楼下，清虚的月光透过街树的叶隙，在她眼前洒下斑驳的光点。

她的脚步声惊起一条小狗，倏然间一闪，闪到小巷子里不见了。那条小狗是在垃圾箱里寻觅食物的。

蕾蕾站在垃圾箱前很久、很久。啊，这散发着霉味的所在，当年曾经是她安身的地方。

到哪里去呢？蕾蕾在空寂的马路上走着，尽管脚步放得很轻，仍然很响，她觉得自己很孤独，多年来，向她不断袭来的孤独的黑浪差点吞没了她。先时她感到恐怖，想极力摆脱掉，久而久之，她反倒习惯了。10年来，她看惯了冷漠的白眼，饱尝了精神上没有爱的痛苦，她几乎成了畸零人。

一夜之间，天翻地覆了，人们像众星捧月一样围着她转，世上一切美好的誉词差不多都戴在她头上了。她感到迷茫、不适应，像一个北冰洋来的寒士受不住赤道线上的酷热，像一只在冥暗中摸索飞翔的蝙蝠见不得雪亮的阳光。啊，那送行的场面，可以说是空前的，不但分场场长、总场场长都来了，连她从来不认识的农垦局长、副局长们都来为她送行。记者、摄影师们前呼后拥，她成了新闻人物！

这一切，当然是因为妈妈成了英雄，正如她被遗弃在生活的死角里也是因为妈妈成为反革命一样，这是天道自然。啊，她的荣辱是紧紧依附于妈妈的兴衰的，她觉得自己不过是一株藤萝，树有多高，藤萝就能爬多高，而一旦大树倾倒，藤萝便随之倒伏枯死。

人为什么要这样依附、寄生呢？

妈妈就不是这样的。

蕾蕾感到苦恼，她为自己分享到妈妈的荣誉而自愧。

走，远远地躲开。是啊，明天一早，就会出现门庭若市的场面，报社、电台、电视台的人会把她包围起来。傍晚陆霜青临走时，不是打过招呼了吗？他预言，明天你们家的门槛儿可能被新闻界人士们踏破。

陆霜青是好意，对这个人应当怎样去评价呢？他干过好事，也缺过德，又能够自我解嘲，并不隐瞒自己失足的一页，难道也用七分功三分过的常法去评说吗？

蕾蕾觉得陆霜青和爸爸一样，都是使她又恨又同情的人。她喜欢用好与坏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来套用一切事物、一切人，可她总是失望。摆在她面前的人，绝大多数不是按壁垒分明的好与坏的尺码塑造出来的，大概上帝造这种人的时候，精神有点错乱吧？

那么顾方知叔叔呢？他也是这种人吗？不，不会的。

蕾蕾来到了凤仪街的尽头，这里有一幢旧式楼房，灰颜色的。

她不由自主地站住了。

这是她住过几年的地方啊！

从前，顾方知的单身住宅就在这里，在紧西面的一楼，现在，顾叔叔早已搬走，人事皆非了。

一阵喜悦的笑声从顾方知的旧居窗子里传出来，蕾蕾忍不住

向窗前走去。窗子开着，屋里亮着灯，看得见台式电扇呼呼地转着。啊，一个多么和睦幸福的家庭！一对夫妇正给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在澡盆里洗澡，孩子的头发上鼓起一团团肥皂沫，淘气地把一团肥皂沫抹到了爸爸脸上，惹起了一片笑声……

蕾蕾也有过这样快乐的童年，但是过去了。即或残存一点甜甜的回忆，却被黄连水一样的苦涩所淹没、抵消了。自己若有这样一个爸爸多好啊！不，哪怕爸爸再坏，只要不叫女儿知道也行啊！唉，自己偏偏知道得一清二楚。让自己违心地去爱爸爸，那是多么别扭的事啊！

你能说在这间曾经堆满了图书的小屋子里，自己没有过拾回来的幸福吗？有过的。

自己是怎样走进这个家门并且长期待下去的呢？

那是爸爸屈服了以后，是的，他对倔强的女儿屈服了。

在蕾蕾第二次从家里出走以后，顾方知又从收容所里把她领了回来，她死也不愿回到爸爸那里去。为了不使自己的孩子沿街乞讨、流浪，也因为那时毕云阶第二次被送到干校去改造，他不得不同意暂时把孩子寄放到顾方知那里。

但是不久，顾方知就被捕了，就在这间屋子的门外，发生在梧桐树下面。

有一天，蕾蕾放学回来，背着小书包，跑得风快，她还拿着一朵白茶花呢。明天是星期天，顾叔叔要带她到楚城监狱去看妈妈。

跑到家门口，蕾蕾愣住了。楼前面围了好些人，指手画脚地议论着什么，梧桐树下停着一辆绿篷吉普车。

出了什么事情吗？

蕾蕾跑到跟前，已经迟了一步，戴着手铐的顾方知正被推到吉普车里去。

手铐，对于蕾蕾来说，是不陌生的，她懂得手铐和自由的

关系。

她尖叫一声，向吉普车扑过去。

她看见，顾方知挣扎着，叫着什么，从车窗里探出半截身子。

然而，汽车卷起一阵尘埃，向着城郊楚城监狱方向驰远了。

她哭叫，她爬行，嗓子都哭哑了。

邻家一个老钳工把她带回家里。

顾方知为什么被抓走？蕾蕾不明白。为什么她认为好的人都要被关起来呢？这原因，直到半年后顾方知被放出来，他也不肯对孩子讲，她只听顾方知说：“你长大了就明白了。”

前年，当顾方知千里迢迢到北大荒农场去看望蕾蕾时，才说明白了。据说华序的一个什么上书材料，保存在顾方知那里，他是华序的同谋者罪名被捕的。据顾方知说，这件事情，只有他和华序知道，他一直弄不清是谁揭发了这件事。

有人说，顾方知是个傻瓜，哪里是泥坑，专往哪里陷。

不能说这种说法没有一点道理。是啊，自从华序被捕，她的案子惊动了中央文革以后，凡是平素同华序有过交往的人，不是站出来揭发便是远远躲开，连她的丈夫不是都匆忙办了离婚手续吗？

偏偏有顾方知这么个怪人，他到处代她去申诉，光蕾蕾就同他进北京上访过两次。

如果不是因为顾方知确系华序的同盟者，常人是无法理解的。他与华序有什么关系？一无亲二无故，人家是搞政治的，顾方知是生物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不研究昆虫却要研究人，这真是奇事。

也正因为这一点，蕾蕾把他看得和妈妈一样亲、一样重，她宁可随着顾方知过着半饥半饱的凄苦日子，也决不愿回到毕云阶那里去。

日子怎么会好呢？顾方知是刑满释放分子，自从他入狱那天起，他的名字就连同职务一起，在研究所人事处的花名册上注销了。他只好去拉平板车，天天给街道住户送蜂窝煤过活。

一个知识分子拉煤车，那艰难是可想而知的。何况他还要勒紧裤带，积攒一笔路费到北京去上访呢！

顾方知有一个装昆虫的标本箱，他积存起来的钱，全都放在里面，加了锁，藏在床底下。蕾蕾知道那钱的用途，是为了救妈妈的。从那以后，蕾蕾一个夏天没有吃过一根雪条，她买来一个大肚青蛙烧瓷的储蓄罐，把顾叔叔给她的零用钱一分一分地投到里面去，每隔两天，就拿起来晃晃，听着那豁朗朗清脆的硬币撞击声，孩子觉得就像妈妈扔掉手铐的响声一样。

一个雨天，顾方知在拉车过铁拱桥时，因为车载过重滑坡，被后面刹不住闸的卡车撞伤住了院。

积蓄金变成了一张张无处报销的医疗费单据，他抱着蕾蕾痛哭起来。

蕾蕾不上学了，她背着书包当幌子，书包里却藏着一只尼龙线口袋，背着顾方知，拾起破烂儿来。她成了“垃圾千金”。这行当，对蹲过垃圾箱的蕾蕾来说并不陌生，她见过好多穿得又脏又破的老头、老太太背着破竹筐，拿一把三齿铁丝钩，从一个垃圾站转到另一个垃圾站，把废纸、硬纸箱、旧铁丝、酒瓶子搜集起来，拿到废品收购站去换钱。

一个多月以后，顾方知出院了，一条左腿还有点跛，就又拖起了平板车。

他大概到蕾蕾的学校去了吧？一定听老师说过，这孩子已经逃学一个多月了。他能不又惊又气吗？

顾方知偶然在西胜门大垃圾站那里碰上了蕾蕾。

蕾蕾快红了眼了，正和几个拾破烂儿的人抢热门货。不知是哪个管理不善的大工厂，在这里卸了两卡车工业垃圾，除了油污

的抹布，几乎全是铜屑和小零件。

蕾蕾嫌用铁丝钩得太慢，干脆用手在垃圾堆里抠，两只小手淌着血，沾满油垢。

顾方知把孩子拉起来，眼泪刷刷地流了满腮，他能责怪孩子吗？

蕾蕾对顾方知说：“叔叔，你养病吧，我能挣钱的。我的小罐里都装满了钱，摇不出响了！”

他们不知在垃圾堆那里呆坐了多久，后来碰上了胡浩低头走过来。

那时的胡浩是全省天字第一号的大走资派，一直在干校办“长托”。所谓长托，就是永远不许回家，是隔离受审。

顾方知很奇怪，难道胡浩被结合了吗？

没有。通过短短的几句交谈，蕾蕾才知道，胡浩最近心脏病发作，险些没有死掉，经他老婆周菁再三交涉，才允许胡浩回省城医院住院。西胜门离省立医院不过三五十步远，他不知怎么转了出来。

胡浩坐下来，把蕾蕾揽在怀里，替她梳理着头发，好像自言自语地说：“把孩子弄到这步田地……都是大人的罪过啊！”

蕾蕾不懂，大人指的是谁，是妈妈呢？还是爸爸？或者是别的什么人。她不敢问，她眼里的胡伯伯和从前大不一样了，脸又黄又黑，眼镜不戴了，眼睛凹陷着好像都缩小了好多。从前他一见到蕾蕾，总是把她举到空中，耍一阵子再放到肩膀上，笑着喊“卖猴”。他那时的脸是红的，充满笑容的，可现在能刮下一层霜来。

胡浩只顾同顾方知唠嗑：“听说你还要进京去替华序上访？”

顾方知说：“是啊，这是一个公民的权利。”

胡浩苦笑了一下：“公民的权利？是的，写在宪法里的。肉刑和非法的监禁，宪法里有吗？”大概他觉得这些话有点离格，

就又改换了口气：“不一定去上访了。有些事情，过后会真相大白的，群众运动嘛，相信党最后会给每个人做出公正结论的。”

顾方知声音不高但很固执：“不，那太消极了。华序跟你多年，你是了解她的。”

胡浩沉吟了一下，说：“过去应当说了解。人是会变的。她有些观点，我都感到吃惊。怎么能怀疑文化大革命呢？当然，偏差是有的，任何运动能一点误差都没有吗？她太偏激了，政治上还是不成熟啊。我感到，你这样毫无批判地支持她，对她的错误情绪是一种助长，你不是帮助她，倒是害了她。”

顾方知不再说什么了，拉起蕾蕾起身告辞。

胡浩叹了口气，说：“你们这些书呆子啊，真没办法！你进北京有路费吗？你一个月拿多少钱？”

顾方知说：“有，我正在筹措。”

提到路费，蕾蕾一听便懂了。她抢着说：“我攒了一罐子钱呢！”

胡浩又是一副苦笑相。他说：“我也是贫雇农了，一个月只发给 20 元生活费。”他四下环顾了一圈，突然把腕子上的手表撸下来，往顾方知手里一塞，头也不回地走了。

蕾蕾看见，顾方知握着那块表，又流出了眼泪。

多好的胡伯伯呀，蕾蕾心目中，又增加了一个好人。

那是一块劳力士表呢！据顾方知说，新表要卖到 600 元一只，是瑞士产的一类一等表。

蕾蕾抱着顾方知的腰跳了起来，仿佛那块表就是打开妈妈手上铁铐的钥匙！

胡伯伯是好人，不折不扣的好人。

蕾蕾怪自己粗心，今天胡伯伯去接站的时候，怎么没有注意他腕子上有没有手表呢？“投我以桃李，报之以木瓜”，这不是顾叔叔常常为此事挂在嘴边的话吗？对了，应当买一块劳力士或者

欧密茄送给他，不是偿还，这是一种表示。不，他不会要的，他如今又是省委书记了，一个月拿几百块钱，会没有表戴吗？

那怎么办呢？这人情怎样来替妈妈偿还呢？

对，应当还给周阿姨，以另外一种方式偿还。

一想到周菁，蕾蕾的心又隐隐作痛了。

周菁对蕾蕾没说的。她同妈妈是最知心的朋友，比亲姐妹还亲。蕾蕾记得，妈妈常常翻周阿姨的箱子，去找人家箱底的衣服穿。周阿姨箱底的存货真多，呢子大衣、貂皮大衣，一股打鼻子的卫生球味。可她从来不穿，一年到头总是那几套千篇一律的蓝干部服。

妈妈就不同了，什么都敢穿，穿起来真好看。周阿姨总是一边啧啧地称赞，一边劝她：“你呀，收敛点儿吧！就不怕人家说你小资产阶级情调？”

每逢这时候，妈妈总是格格一乐，说：“难道无产阶级的标志就只能四个兜的干部服吗？”

周阿姨说不过妈妈，总是妈妈胜利。

周阿姨的胆子太小了，什么都怕，妈妈说她是“怕树叶掉下来砸破了脑袋”。树叶那么轻，怎么会砸破脑袋呢？儿时的蕾蕾当然不懂。

现在，她懂了。

听人家说，是周菁第一个告了华序的密！

天哪！她们不是好得像一个人似的朋友吗？世界为什么尽出怪事呢？

胡伯伯那么好，周阿姨偏偏那么不好，这两种人为什么出在一个家庭呢？她从前好，后来又不好，真奇怪！

蕾蕾真有心看看周阿姨。妈妈说，她小时候还吃过周阿姨的奶呢。每当妈妈下乡去搞调查时，到幼儿园去接送孩子的任务就落到周阿姨身上，华序甚至都无须交待。

有人说，吃过谁的奶，性情、品格都像这个人。蕾蕾不信这说法，但又有几分恐惧，万一真有这个科学道理呢！

啊，别胡思乱想了，走你的路吧！

顾方知旧居里的新房客已经拉上了湖绿色的窗帷子，人家大概要睡觉了。

带着无限怅惘，蕾蕾离开了这幢凝结着多少凄苦和快乐的灰楼。

拐过一条横街，她来到了楚城监狱门口。

这里已经是郊区，黑沉沉一片，附近没有住户的灯火，只有高墙电网上的探照灯成各种角度缓缓移动，不时地照出整个监狱的轮廓。

监狱是一所旧教堂改建的。

这是一片西方宗教建筑群，5个铁皮屋顶像大南瓜扣在青砖楼的房顶，原来大南瓜顶上显然有5个大十字架的，解放后被敲掉了。连孩子们都知道这里叫“老教堂”，据说是鸦片战争以后，英国一个叫亨利·兰柯的传教士主持建起来的。教堂的钟声一直延续了差不多一个世纪，直到1950年这座城市回到人民手中，披着黑色法衣的神甫们才跑得无影无踪，上帝从此绝迹。

大概因为这座笨拙而坚固的教堂本身就具备监狱的特点，稍加改造，变成了楚城监狱。

这里是囚禁过妈妈肉体 and 灵魂的地方。在这里，妈妈的生命史被拦腰斩断在31岁的极限上，这是个对于人有生杀予夺权威的工具所在。无产阶级国家机器法制的齿轮，本来是用来碾压仇视社会主义的敌对者的，它应当是对一个共产党员专政的场所吗？但这一切还是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一切啊！

那个时代过去了，毕竟过去了。妈妈年轻生命的代价也许就在于此吧？

蕾蕾沿着张着电网的监狱墙根缓缓地向前走着。再往前是一

片幽暗的莽莽苍苍的草地，越过沼泽，就是流花河了，那里是妈妈喋血的地方。

突然，一个幽灵似的黑影颠踉着向她走来。蕾蕾从不迷信，却也有点毛骨悚然。那鬼影似的人仿佛害着重度舞蹈症，四脚摆动的角度大得出奇，但走路却没有一点声息。

蕾蕾三脚两步走到路灯照得见的地方。恰好颠踉的黑影跳过来了。呀，是个穿一身休养员服装的女人，头发披散在肩上，光着脚，看不清面孔，脸被散发遮住了半边。

蕾蕾本想让过她去的，却不料女病人凑到蕾蕾跟前，站住了。她仍然保持着古里古怪的舞蹈样动作，只不过是原地踏步罢了。

蕾蕾浑身上下的毛孔一下子枕起来，头皮发麻，一时断不出这女人要干什么。

那女人用手捋了一下鬓发，露出了白纸样的脸，朝蕾蕾笑了一下，那笑是苦涩的，她喃喃地说：“够了，够了，我该投案自首了！”

这不是疯话吗？咦！这声音怎么这样耳熟呢？

蕾蕾不禁仔细地打量起她来。天哪，这不是用她的奶水喂养过蕾蕾的周菁阿姨吗？

恐惧感一扫而光。蕾蕾跨前一步，叫了一声：“周菁阿姨！”

那女人的眼珠几乎没有转，好像对她的呼唤毫无反应，两只胳膊呈120度角水平摆动着，只顾梦呓般地说下去：“够了，够了！我早该替她去的……”

蕾蕾再仔细打量一下，证明她确是周菁无疑。她怎么会落到这一步田地？她因病住院了吗？为什么深更半夜独自跑出来？胡伯伯怎么没有说起她的病？是没来得及吗？

蕾蕾注意到了周菁左胸上的红十字符号，符号下面没有像通常那样写着医院和科别，却写着一串拼音文字。蕾蕾在心里拼了

一下字母，啊，那不是“精神病院”四个字吗？

蕾蕾吓了一跳。是了，从楚城监狱转过去，不是有一所岭南出名的精神病院吗？

蕾蕾心里很不是滋味，在此之前，她对周菁阿姨是恨的，现在还恨得起来吗？她是一个弱者，一个被生活激流抛出来的弱者。

蕾蕾大着胆子凑到她面前，说：“周阿姨，你不认识我了吗？我是蕾蕾，我是蕾蕾呀！你忘了吗？我是你的好朋友华序的女儿呀！”

据说疯人在特定情况下也有某一对神经是正常的，可能有几分道理的。你看，周菁似乎听懂了，灰黯、呆滞的眼球迅速转了一圈，舞蹈样的动作似乎也间歇性地停止了，蕾蕾期待着周菁某一个突然清醒的动作。

可是，周菁双手抱住了头，像害疟疾发冷一样，全身抖索着，低哑而颤抖地连连说：“够了，够了，别来骗我，我不上你的当，你去找华序，她要我主持她的追悼会呢！”

说罢，周菁逃也似的跑开了，在蕾蕾眼前留下一片凌乱的狂舞乱跳的模糊影像。

蕾蕾惆怅地叹了几声，摸不清周菁为什么会精神错乱？

她真想找一个公用电话，马上打电话告诉胡伯伯，走了几步，却又改变了主意。她刚刚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到处是面貌全非的印象，万一这其中有什么不便的地方，那不是太冒失了吗？

蕾蕾又累又饿地回到家里时，已经是深夜两点。

她万万没有想到，胡浩在客厅里坐着，同毕云阶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满屋子是辣烟雾。

看来是毕云阶不放心，打电话把胡浩惊动起来了。又不全象，因为他们并没有撒下人马去找自己。

胡浩埋怨地瞪了她一眼，说：“你这个小野马，刚到家就叫你爸爸操心。”

蕾蕾淡淡地一笑，替他们打开风窗。

胡浩见蕾蕾背靠窗台站着不坐，就对闷头吸烟的毕云阶说：“你去睡吧，我同蕾蕾谈谈。”

好像胡浩和毕云阶之间有过默契，他一发话，毕云阶便捻灭烟头站起来，向他自己的卧房走去。

不用问，毕云阶是搬动省委书记的大驾来当说客的。出于对胡伯伯的敬重，蕾蕾只好坐过来。

胡浩瞥了蕾蕾一眼，说：“你 20 岁了，不是小孩子了，怎么还那么不懂事呢？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连好多革命家都犯过错误，何况你爸爸？你不应当这样冷酷地对待他，那是不公平的。有些事情，是历史造成的，是带有时间局限性的，不能单纯地怪哪一个人、哪几个人。”

蕾蕾没有料到胡浩说得这样开门见山。她不愿意欺骗她所爱戴的人，就直率地说：“伯伯，我的感情过不来呀。一想起从前的事，我就……为了脱干净，就离婚，为了沾光，就要复婚，这种人格可取吗？”

胡浩笑了：“孩子话！当然，爱憎分明是每个人都应当有的品质。可是你又脱离了历史背景看问题。你知道你爸爸当年的压力吗？‘四人帮’的那些爪牙们公开叫号，叫你爸爸离婚，他怎么办呢？何况，那时候我们的头脑还都僵化着，既然‘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一手发动的，即使有怀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难道不应当拥护吗？”

蕾蕾抓住了漏洞：“照你这么说，我妈妈反倒是错的了？”

“断章取义。”胡浩笑道，“像你妈妈这种善于独立思考、敢于坚持真理的人，毕竟是少数，所以今天才称她为思想解放的先驱。”

蕾蕾闷头不语。胡浩显然意识到，一时说服对方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她的感情。有理论权威，向来没有感情权威，只好慢慢来。他觉得这十年来，人们感情和心灵上的创痕实在太深了，很难平复的。

于是他转了话题：“蕾蕾，今后你打算怎么办呢？”

“没想好。”蕾蕾认真地说，“或者说，我没有认真考虑过。”

“看来，要我为你安排一切了！”胡浩笑眯眯地望着她。

蕾蕾忽闪几下长睫毛，忽然用玩世不恭的腔调说：“其实，用不着考虑的，我的前途是充满阳光的，妈妈用她的血给我铺平了路，我只消舒舒服服地躺在妈妈的纪功碑上睡大觉，就行了。这是好办法吧？”

胡浩扑哧一下乐出声来：“亏你说得出口！路，要靠你自己来走，你妈妈是榜样，不是靠山。”

蕾蕾狡黠地笑了起来。

胡浩喜欢她这种笑，这是令他放心的表示。这几天，他为即将见面的蕾蕾设计了好几套方案，当然这不过是为她提供一个事业的上马石罢了。他相信从小在离乱、颠簸中饱经苦难的孩子，是离不了大格的，何况有自己的监护呢。对待蕾蕾和毕云阶工作与生活的安排，省里有过特别关照的决议，这是任何人不会反对的。作为胡浩个人，心底还有另一层心思，这一切优抚，都是对自己的安慰，好事做得愈多，他会愈感到轻松。当然，这意思从来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

蕾蕾在胡浩沉默的时候，一直在端详着他。他已经老了，和10年前相比，简直判若两人，那时他的精力多充沛啊！说话带着金属样的声音，诙谐、幽默，干部们都怕他、服他。

现在呢？两鬓布满了银丝，眼睑下的肌肉松弛地下垂着，形成个弧形肉泡；青筋裸露的手背上长出了一片豌豆大小的老年色素斑，像个久病初愈的人。是啊，这10年，他所受的折磨和打

击，肯定是别人无法比拟的。可是，他没有气馁，还在干，没有什么怨言，至少比年纪轻轻的蕾蕾肚子里的积怨和牢骚少多了。

他也许是孤独的，他的家庭是不幸福的。怎么会幸福呢？当省委书记在万人大会上号召人们抚平伤痕奋勇长征的时候，有谁能知道这个精神抖擞的人，正有一个妻子住在精神病院里呢？

蕾蕾眼前不由自主地又闪出了周菁阿姨那苍白、呆滞的面孔。

她忍不住说：“伯伯，方才在楚城监狱那里，我……看到周阿姨了，光着脚。我同她搭话，她不认识我了……”

胡浩问：“她向哪里去了？”

蕾蕾说：“向流花河大桥那边旷野里跑去了。”

胡浩叹了口气：“疯了快 10 年了。你周阿姨的神经过于脆弱，经不起打击的。”

蕾蕾问道：“周阿姨是因为什么失常的呢？”

胡浩的脸部肌肉抽搐了几下，说：“也只能说是极其复杂的综合因素。唉，前几年，精神病院大有人满之患，时代的特产。”

蕾蕾没有再问下去，她说：“应当派人马上找到阿姨，深更半夜跑出来，会有危险的。”

胡浩说：“这是常事了。方才病院用电话通知我了。他们正组织人去寻找。”

时钟打了三下。

胡浩喝了一杯冷茶，站起身来说：“天快亮了，你抓紧时间睡一小会儿，早饭后，那些记者们就会把你包围起来的。你不能任性，为了宣传嘛！过一两天闲了，我再叫你到家去给你包三鲜馅饺子吃，咱爷俩自己动手。怎么样？学会擀皮了吧？不会像从前那样用手压面饼了吧？”

蕾蕾笑了，起身送胡浩到门外，这才发现院子里没有车，问道：“您的车呢？”

胡浩说：“同一条街，不到 300 米，坐车干什么？”他向前走了几步，突然站住，从手提兜里拿出一沓笔记本，交给她，说：“我这脑袋！差点忘了。这是从你妈妈卷宗里拿出来的，是你妈妈的日记。当年，曾经是作为她的罪证存档的。你拿去看看，我看过几遍了，每次看了，几天都平静不下来，一个人，应当这样活着。没有思想的人，活着实在是没有价值的。”

蕾蕾送了胡浩一程，才返回家来。

她一点睡意都没有，和衣倒在床上，扭亮床头地灯，拿起妈妈的日记本，一页一页地看下去。

妈妈的字真漂亮，行云流水一般，干净利落，偶尔有勾抹的地方，都勾得很整齐。

说真的，蕾蕾并不敢说自己真正了解妈妈，那时她太小了。她获得的印象不过是直觉的、本能的、带有浓厚的母女之情色彩的。

如今，展现在这姑娘眼前的，才是妈妈的灵魂，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

前面 5 本，是文化大革命前的，生活上的琐事都记载得极为详尽。她急于要看妈妈观点的由来和形成，就打开了被捕前后的那一本。

咦，奇怪。她顺手翻了翻，发现有两处断条缺页的迹象。是妈妈偶尔没有按天记下去吗？不，不会的。你看，她即使在狱中，没有笔，用牙膏皮的铅皮做笔，都记得详详细细，没有间断过一天，前面怎么会有十几天的日记缺了呢？

她终于弄明白，有几页日记是被人撕下去了。不是顺手扯去的，是精心干的。你看，连缝线里面都撕得很干净。但因为日记的页子是对折钉起来的，这面的扯掉，后面的单张纸页就自然松动了。

是妈妈自己撕的吗？不像。妈妈是敢于说真话的人，她的座

右铭不就是“做一个思考的人”吗？她敢立言，又何必怕呢？

是公安部门或搞专案的人干的吗？有可能。那除非因为这几天的日记把他们当中的哪一个牵涉进去，对他们不利。

有没有第三种可能呢？

蕾蕾一时判断不清。

人，总都有好奇心，愈是不叫看的或者看不到的，越激发兴趣，蕾蕾也不例外。

她真恨不能一下子弄清楚，这几页逸失了的文字到底是什么。

困意袭了上来，日记本从她手中掉到被子上，蕾蕾不能自制地沉入了梦乡。

寻找流星的人

同一个天体下，同一个安谧的夜空下，总同时发生着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饮酒作乐的、痛苦的、良心发现的和玩弄阴谋的……据说，没有善良、丑恶集于一体，就构不成社会。

毕云阶在为女儿而忧伤，蕾蕾在为妈妈的遭遇而痛苦。

陆霜青呢，他正在一所大学里演讲，他比任何人都忙。如今他又成了负责整理华序生平事迹材料的负责人。

大学生的血液燃点是最低的，血分子最不稳定，震动和摩擦都会发热、爆炸。他们敏感、有正义感，也因此常被随意地利用。

近些天来，陆霜青亲手拆阅了几百封群众来信，几乎都是充满火药味的。他们要求严惩迫害华序烈士的凶手。

这呼声愈烈，陆霜青心中愈慌。

他曾经是华序专案组的组长！当然，外界并不知道内中的实情，但是公安干警是瞒不住的，他们有第一手材料。

当华序的材料第一次报到公安部门时，很快被退回来了，结论是：属于思想意识问题，没有现行活动，不够追究刑事责任。

那时的陆霜青和现在一样发慌。

他是第一个主张将华序材料上报，要求公安部门逮捕法办的人。

华序并没有抱他的孩子下井，反而是他的恩人。机关里的人都知道是华序两口子出钱供他念了两年大学的。

大义灭亲，这是拯救自己的最好办法，他心里虽然觉得对华序有愧，但为了保护自己过关，他还是这样干了。假如他不显得比别人更左呢，人们就会怀疑他是华序的“死党”，至少要办他的“知情人学习班”。

公安局把材料退回来，那他将落个里外不是人的下场，他不甘心。他牢记父亲留给他的处世哲学：“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淤泥，这就是人生。你错了，你蚀了本，也不能认输，你得老是往风浪前头抢，别人坏，你要比他更坏才行。良心，值几个铜子？从前我是讲良心的，可老是吃亏上当，无毒不丈夫。”

他的父亲从前是开小杂货店的，小本经营不容易，他靠着这条做人的准则，竟然保住了那个小小的门面，直到公私合营前夜。

小时候，他从父亲那里得到的身教是什么呢？在白酒缸里兑凉水，在醋坛子里掺酸菜汤，熬出小米饭汤混到香油里去，隔三差五要抓几把沙子搅到咸盐筐箩里去。

陆霜青在念小学时就是个鬼点子很多的学生，他从来不吃亏，老师并不喜欢他。

有一年冬天，他偷吃了家里货架子上的一个熏鱼罐头。他的偷法很怪，轻轻揭去商标，在商标后头割开一个三角口子，将熏鱼抠出来，然后灌上凉水，拿到外面冻上冰坨，再把商标原样贴

好，托在手上，拿到集市上卖掉。为这事，父亲骂了他几句，但同时也有表扬：“唔，你这个精明劲还挺够用。”

只要利己，损人无所谓，这是他从小坚信的信条。

在他考上省委机关的公务员以后，父亲教他：那里是大衙门口，不同于乡下小镇，天外有天，人上有人，你要见人先点头，不笑不说话，要讨人喜欢，就要学乖。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他讨了好多人的喜欢，嘴甜，勤快，连住独身的干部们的洗脚水他都抢着给倒。他管华序叫“华姐姐”，帮她带孩子，人们都认为这小伙子朴实、憨厚。

华序供他念过书，他心里未尝不感激她。华序的为人，他也认为好，不过觉得她傻气。

如果没有什么风吹草动，他会永远保持同华序一家人的友谊。

但是风浪一起，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他内心有一杆秤，假如有两个人在他面前，他必须出卖一个，他不会出卖华序，只能舍弃另一个人。

若是只有华序一个人呢？不出卖她，自己就有危险，那，就讲不得什么义气了。

如果说他第一次揭发华序纯粹出于保护自己，第二次上报材料要求逮捕华序，那就是为了证明自己第一次上报的“正确”了。他有一个信条：即使自己错了，也不能轻易认错，必须把错当正确来办。

他尝到了甜头！像吸鸦片的人一样，开初可能只是因为拉肚子久治不愈吸了一口，觉得解乏，于是再来，上了瘾。反过来拿鸦片劝别人吸，一点都不要再觉得别扭了。

动乱的10年，他是一帆风顺过来的。

不久前当公安局和司法部门首先提出华序问题应当复查时，

陆霜青很是紧张了一阵子，但他很快看准了风向。他不甘沉默，还是要抢在风浪前头。

他起草了一份洋洋万言的报告，故意把年月日提前两个月，悄悄塞到主管公检法的一个副书记屋子里去。这位副书记到中央党校学习去了，秘书抽调到乡下去搞中心工作，他明明知道那屋子空了好久了。

随后，他去找胡浩，追问省委对他的报告讨论过没有。胡浩大为奇怪，问明了原委，叫人打开那间空屋子，总算找到了，看之月日，还是那位副书记进京前交出的，大家都猜疑那位副书记给压下了。为什么压下？不是因为拿不准，就是工作马虎。

巧妙的栽赃！

他一下子成了为华序平反呐喊的“发起者”，差不多抢到了专利权！

先发制人能够迷惑不明真相的人，也能够堵知情人的嘴。陆霜青在第一次控诉大会上就声泪俱下地控诉“省委前主要负责人”如何迫害华序，说到华序的好处，滔滔不绝，他讲出的细节远远超过毕云阶，比他生动，比他富于感情，讲起自己，他哭得伤心极了，他骂那条极“左”的路线，他把自己说成是政治上的幼稚，骂自己“忘恩负义”，说真的，当时被押到会场上的“省委前主要负责人”的认识远没有陆霜青深刻。

杀人不过头点地，别人在背后骂他的话，他自己都当众骂出来了，你还有什么好说？那些对他反感的人虽然在感情上仍然别扭，也只能背地里互相苦笑，说陆霜青油滑，拿他没办法。是啊，认真追究起来，他能负什么主要责任吗？还能拿一根绳把他捆起来吗？

但是陆霜青怕公安局的人。是真怕。在华序的卷宗里，有大量陆霜青提供的文字材料，如果认真一一核实起来，那就很不妙。譬如陆霜青写的一份证实材料里，证明华序在干校说过“有

心逃到国外去，重新组织共产党（马列），我要当总书记，搞二次革命”。这是很致命的，曾是逮捕华序的一条主要理由，这算是“企图叛国，组织反革命组织”。

陆霜青有办法，他以省委名义要调华序的全卷。头几次公安局不给，直到省委正式作出为华序平反的决议，那厚厚的 11 本案卷才转到陆霜青的办公桌上，但只是借阅。

既是借阅，他就没有胆量销毁，但他会重制。凡是亲手写的揭发材料，一律找来当时的外调专用纸，重新写些模棱两可的、似是而非的材料，都是鸡毛蒜皮上不了纲的，间或留下一两个大问题，也一定是历史已经证明华序是正确的。他原来写的材料，一律抽出来毁掉了。而且处理得页码相符。

他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但是，陆霜青担心，公安局、法院办过华序案的人，记忆力并不会消退，他们可能回忆得起来。

他决定利用民意、民情，把矛头引到公检法那边去，他只在一旁煽风就行。

在前几天一次偶然的会里，他从一个监狱退休干部那里意外地得到了一个消息，据说对华序行刑前，中央文革有过电话指示，要防止华序在行刑现场呼喊反动口号。

根据前省委第一书记的密令，在验明正身之后，找来法医，在华序下颏下注射了大量的普鲁卡因麻醉剂，这还不够，又割断了舌下的发声韧带。

这情节对于陆霜青来说，无异于原子弹爆炸。

他秘密地向胡浩做了汇报，胡浩脸都气青了，拍了桌子，指示他马上查清。

陆霜青来不及去调查，就急不可待地在工学院大礼堂搞了一场报告会。他在会上没有讲多少华序的事迹，一跳上台就像一头怒狮子，振臂呐喊：“同学们，你们能想到吗？在公安部门里，

有法西斯的强盗，他们在执行华序死刑的时候，拉断了她的舌头，这太残忍了，就连国民党屠杀共产党都没有这样干过！”

他获得了百分之百的成功。

他在青年大学生中间点起了一把大火。

第二天，全市主要街道都出现了矛头指向公安局“一小撮法西斯分子”的大字标语，工人还举行了要求惩办凶手的示威游行。

神经衰弱者是有的，但他们却是无辜的。奉命去执行任务的法医突然自杀了。

这消息一传出，更助长了这个示威浪潮，公安局很被动，好像迫害华序都是广大干警干的，而陆霜青这些人却成了英雄的代言人。

他今天演讲的范围更大些，包括医学院、财贸学院和地质学院，设了七八个分会场。

会议仍然是成功的。陆霜青认为法医的自杀说明问题，要求揭开黑幕！

当会议结束的时候，已经是深夜 10 点了，他刚要钻进汽车回家，有人送来胡浩手中的字条，叫他到胡浩那里去一下。

胡浩一直在等他，客厅里亮着一盏台灯，他在看一本什么书。

见陆霜青进来，胡浩放下了书，问他：“你又跑到大学里去胡吹什么？你这不是胡来吗？给烈士平反，有中央指示，省委亲自来办，你不要到群众里去煽动嘛！你把省委搞得多被动，你把公安局一些同志也搞得很难堪，你看，连执行枪决华序的小战士都受不住压力了，一连给省委写来三份检查书。

说着，哗啦一下把桌上的几张纸丢过去叫陆霜青看。

陆霜青看过，说：“我欠考虑了。不过，一听说割舌头的事，我的肺都快要气炸了，实在忍不住……”

胡浩对这个人不大了解，只是有些浅淡的印象。文化大革命前，陆霜青当公务员时，来往送文件，那时知道有这么个小陆，毛头小伙子罢了。后来他当了宣传部的干事，也不是什么出头露面的角色，部里有好多15级、16级的大干事，胡浩甚至以为他出出入入仍是个通信员呢。

稍稍有一点印象，那是到了“五七”干校以后。级别越低的干部越容易成为依靠对象，陆霜青当上了连长。他的土政策比哪个连都多，黑帮们干活时互相要说一句话都要喊报告。

但他也没有太介意，只是认为这小伙子幼稚，容易接受极“左”那一套罢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胡浩先被安排在外省当了两年副书记，去年才调回本省，那时陆霜青已经是省委宣传部的处长了。

对陆霜青的反映，胡浩听到了不少，有人说他是“双突干部”，应当在清洗之列。“双突”显然不是，胡浩查问了一下，他文化大革命前在部里当通信员的时候就是党员。他当处长，倒是“四人帮”后期的事，但胡浩觉得打击面不能过宽，不分清红皂白的“一律清洗”也是不对的，他在暗暗地考察陆霜青。好多人说他是陷害华序的元凶，有好多事实根据。胡浩有自己的想法，他觉得这些同志言过其实，能说华序的死是他一个人陷害的吗？有好多观点，不用任何人揭发，恰恰是华序本人公开在法庭、在监狱里写出来的。

最近围绕给华序平反的事情，胡浩有点警惕起来了，他感到陆霜青反常的积极，好像在借机抬高自己、掩盖什么。至少可以说，他的思想意识不够纯正，甚至有品质上的缺陷。

真正把胡浩惹火的事，是由那个法医自杀引起的。公安局那边反响很强烈，胡浩这才弄清是陆霜青在大学生们中间点了火。

陆霜青究竟为什么这样干，胡浩还不太摸底，他今天想同他谈谈。

胡浩说：“群众对你有些反映，你知道吗？”

陆霜青说：“知道。”

胡浩没有料到陆霜青这样坦率地承认，就说：“你说说看。”

陆霜青说：“有人说我是风派，弹簧脖子豆腐腰，头上插着风信标。”

胡浩扑哧一下笑了，觉得陆霜青很单纯。

陆霜青委屈地说：“我承认我是风派，别人是不是呢？我看只有华序不是。是不是当时拥护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应当杀头呢？当时糊涂，干了些错事，现在认识了，想改了，还是不行，那么，去当‘四人帮’的死党倒不是风派，值得歌颂了？”

胡浩说：“说你是风派，帽子可能大了。我们每个人都应当端正意识品质，只要不是为了个人捞取什么，那就好。我希望你少出些风头，多检查自己，那样群众就会原谅你。就我所知，你无论如何够不上是华序一个战壕的战友，可是你连篇累牍地写文章，到处演讲，当然要引起非议。说真话，对华序，对那场运动，连我都有个认识过程，你再不要吹嘘我是什么‘华序的坚强后盾’，我不是。我比起有些人清醒得早一点，但比起华序，那就差得远了。”

陆霜青说：“好吧，我一定谨慎，考虑影响。”

省委书记谈话的基调还是善意的提醒，批评是有的，但忽略了陆霜青的险恶用心，他无论如何没有料到，这样一个年轻的干部心灵深处有那么多见不得人的垃圾。

陆霜青呢，在回家的路上动开了脑筋，他多少有点发毛。跟他谈这类事，只消宣传部长出面就够了，为什么省委书记亲自谈？为什么批评得那么温和？

陆霜青终于认准了谈话基调：书记是爱护自己的，提示多于批评。他是个和善的老头儿。但是，陆霜青不敢再张狂了。

该捞到的资本已经捞到，该转移的视线已经转移，该抽掉的

材料已经抽掉，他满可以偃旗息鼓了。

他仍然担心来自各种渠道的渗透，万一胡浩或者别的书记们知道了内幕，他就不香了，处长还当得成吗？

抱住胡浩的粗腿，这是惟一的办法，只要胡浩对自己有好印象，哪怕刮十级风浪，也沉不了船。

但是，求得胡浩的保护，想打动胡浩，那可不大容易。他在省委大院里是出名的“清官”。比如有些人总有个突破口，诸如爱听吹捧、喜欢送礼、怕老婆等等，可是对胡浩来说，却是无懈可击。

陆霜青有点犯愁！

天无绝人之路。陆霜青冷丁想起了借给蕾蕾看的那几本日记。他觉得自己真有点先见之明，事前扯下了几十页日记。华序的日记里多次提到陆霜青，称他为“变色龙”，是“穿着钉子鞋踩着别人肩头往上爬”的“势利小人”，她说，不能看成是个人品质问题，这种人一旦窃据了党的重要岗位，就会像林彪一样表面上万岁不离口，背后下毒手，干着险恶勾当。

多可怕！这不是把陆霜青比成了小林彪了吗？他能把这样的评价亮给华序的女儿吗？

他断然地撕去，连同她对胡浩的看法的部分同时撕去了。

他有恃无恐。一旦公安局追查起来，他就放赖，矢口否认，反正在借阅这些日记时，双方并没有逐页核对。到时候他还可以倒打一耙，说是公安局办案人心中有鬼，是他们撕掉的呢，无头官司，打不出个输赢来。

何况，他要找个后台，胡浩会不站出来维护自己吗？胡浩只要接受了那几页与他有关的日记，并且不肯声张，本身就证明他也怕人知道他的短处，那就万事大吉！

胡浩会不会接受呢？

会的。他现在是最红的时候，人人都把他看成是华序的支持

者，是个了不起的老干部。他愿意往自己脸上抹一把灰吗？

他打开抽屉，翻出撕下来的两沓日记纸，看了看。自己那份，毫无顾忌地烧掉，涉及胡浩的那一份，郑重其事地封到一个公用信笺里，像封缄一份绝密的公文一样。

他打算明天一早就亲手交给胡浩，什么都不必说，转身就走，胡浩会毫不由衷地感谢这个下级吗？

他兴奋起来，点上一支香烟，在地上来回踱着步。

他狠狠地吸了一口香烟，肚子一收，短裤差点掉下去。他赶紧伸手去提裤子，就在这一刹那，恰好有一颗雪亮的流星从窗外漆黑的夜空滑落下去。

他狂喜起来，这不是吉祥的预兆吗？

一颗流星，又一颗，天天提着裤子站在院里仰着脖子等流星……那是小时候的事了。

不知道听谁说的，据说，在流星发光坠下去的时候，恰好碰上你提裤子，你就把吉祥的福星兜住了，因为那是一个大人物陨落，他的福气将转让给你。

流星常有，提着裤子傻等的次数也不少，却一次都没赶上机会。流星陨落得太快，常常叫人来不及反应。而且人家说，有意去等不行，要在不经意时碰上才算数。懊丧，然而没有办法。

今天，不是赶上了吗？是不经意的。那颗拖着光亮尾巴的流星，不是吉祥的福星吗？是，这福星就是胡浩。

当然，这有点迷信，可还比做噩梦叫人喜欢。

他打了个哈欠，下意识地又提了提裤头。啊，流星！他要上床安睡了，高枕无忧。

爱的露珠消失在阳光下

这是荔枝花盛开的季节，整个田野都是甜香味道，那条穿越

原野而去的流花河，仿佛流的不是水，而是甘醇稠醪的荔枝蜜。

这里已经是流花河最末一节河道了，流过这一块草地，就要注入到南海去了，因此河道特别宽，特别平缓。

沼泽地逢旱季便被打渔人、赶海人踩出一条白花花的碱路；但一落雨，脚板辟出来的蹊径便会被疯长的野草欺住，说它本来没有路也并不过分。

在这条没有路的路上，此时有一辆大篷四轱辘牛车自茫茫无际的草海深处驶出来。

那真是风韵天成的一张自然水粉画：水洗似的蓝天一尘不染，有几丝轻纱般的薄云在高空缓缓飘移，云影不时地掠过野花绚丽的草坪。

这幅天然图画里惟一的人物，就是赶着牛车的人了。

他四十二三岁的年纪，肤色吸收紫外线显然过量，出现深深的色素块，有的地方在爆皮。他的相貌决不是惹人注意的，五官虽然端正，但眼睛略小点，嘴唇偏厚。但人们只要看上他一眼，就会猜到这个人厚道——中国人是不喜欢奸相的，包括那些本来奸猾的人也常常这样品评人。

这个头戴一顶软檐养蜂帽的人，正是人们竞相寻找的顾方知。

他的表情是恬淡的、无所追求的样子，跨坐在车辕板上，隔一会儿拿竹鞭竿捅捅懒水牛的屁股，听着铁轮车瓦辗压大地发出的单调的嘎吱嘎吱声，像听一曲神乐般的陶醉。

啊，真是自得其乐的生活。牛车上满载着二十几个乳白色的蜂箱，还有分蜜机、喷烟器和工具箱。勤劳的工蜂，即使在行旅中也不会中辍它们的甜蜜事业，你看，它们飞去飞来，振着黄绒绒的翅膀，围着蜂房嘤嘤鸣叫。有几只蜜蜂大概过于疲累，干脆落在顾方知的头上、肩上小憩。

难道顾方知是桃花源中人吗？

不，20世纪80年代的人，哪怕在地球任何一个死角，都不可能是与世无争的世外人。顾方知有一个梅花牌的半导体收音机，那根1米长的磁性天线等于是顾方知的触角或未梢神经，他凭着它，可以感应到由政治漩涡中心放射出来的任何微弱的信息。他一点都不闭塞。

他是人，有血有肉的人。他有自己的爱和恨，有自己的幸福和悲伤，他有他独特的生活方式。

他不孤独，他生活在一个勤劳的集体当中，这个集体有天文数字的成员，那就是蜜蜂。他喜欢蜜蜂，喜欢得发狂，这是他在研究了生命史上几万种生物以后产生的兴趣。爱它们什么呢？爱它们各有专职，分工合作，过着一种团结友爱的群体生活。特别是那些工蜂，承担着采集花粉和花蜜，酿制蜂粮，哺育蜂儿，修造和守卫巢房，调节巢房的温度和湿度等繁重的工作，任劳任怨，辛劳至死。顾方知喜欢，甚至可以说崇敬这种伟大精神！

他选择养蜂的职业已经有5年的历史了。他吃得了辛苦，风餐露宿正是他喜欢的，他没有家室之累，走到哪里就安家在哪里，随遇而安。从前，生产队最犯愁的是养蜂这一行当，保养不好，会连蜂王都死绝。春花一过，雨季来临，养蜂员要包上一节车皮，把蜜蜂运到遥远的东北去，采集质地成色最好的椴树蜜、葵花蜜、百花蜜，到老秋，再装运南旋，谁都不愿吃这分辛苦。

顾方知是自告奋勇的。

他是全村人放心的人，他可以春天出去冬天归来，拉出去的是几十箱蜂子，拉回来的会是几汽车满载的蜜桶。

人们称他为“追花人”。

再形象不过了。哪里花开，哪里印着他的足迹，他一年四季追踪着鲜花走，跟着春天的脚步走。

他甚至逃避了改造。

他是刑满释放分子，又是政治犯。当年他被专政机关遣送到

花溪大队来的时候，只差没有戴手铐了。上边交待给大队，对顾方知的表现，大队治保会每月要按期向上级做一次书面报告。嗨，这真是非同小可的人物。

他绝没有逃避改造的动机，是农民们自动把他升格为“自己人”的。有时他出外追花养蜂，几个月不在，治保主任依旧在书面报告上写他“遵纪守法，一星期检查一次，改造有成绩”云云。

他凭什么博得这一切呢？他有点呆笨，不会说拜年话，也不会看人眼色行事，但人人需要他。他什么都会干，嘴笨心灵。村里凡是沾点技术的活儿，他是哪用哪到。有一年刮台风，正赶上一家女人难产，没法送到市里去，眼看着要母子双亡了。在这紧急关头，顾方知竟然做了个内倒转术，救了母子性命。

他孤身一人，但什么都不缺，他是全村人最有口福的人，无论谁家吃点新鲜东西，他是必有一份的。

人们了解他，又感到他怪，怪在什么地方呢？又没有哪个人能够三言两语地说得清楚。

近来发生的事，不就令人费解吗？

3天前，公社书记亲自下来，要见顾方知，叫人带着他找遍了村里所有的地方，包括牛圈、沤粪场。公社书记这么下力找他，好多人都替他捏一把汗，怕是又有什么大案子挂上他了。但后来发现公社书记始终没有发火，脸上挂着笑，还不时地问起顾方知的生活苦不苦，人们才隐约感到不像凶事。谁知道顾方知钻到哪里去了？他那天没有出去放蜂，是留在村里修理蜂房子的啊！公社书记临走时说，叫他们通知顾方知，过一两天再来看他。

这一个“看”字，彻底解脱了人们的担心。公社书记前脚一走，顾方知后脚就出来了，他好像是有意躲起来的。为什么呢？他任凭大家追问，只是憨憨地一笑了之。

这一笑有学问！号称万事通的护林员常阿公神秘地逢人便说，顾方知肯定事前知道公社书记的来意，说不定要请他的大驾出山呢！是啊，怎么不可能呢？前几年下放到花溪村的大小干部，这两年来不是纷纷官复原职了吗？轿车接走的、吉普车接走的，最差劲的也是坐公共汽车走的。

那顾方知就不兴时来运转吗？

证实这种猜测的高峰，终于在昨天下午出现了，整个村子沸腾了，大人孩子都奔走相告。大队党支部书记一下午几乎没离开电话机，从省委、市委、省委宣传部、法院和报社、电台，先后打来一连串加急电话，都是打听顾方知下落的。支部书记不傻，当然要问一问找他什么事，对方几乎都是一个口径：“好事，到时候就知道了。”

怎么能不轰动呢？花溪村从打有人家那时候起，就没出过什么风光事。1956年，常阿公的小儿子考上了华南工学院，那是全村头一桩大事了，光鞭炮就买了两箩筐。

这下子，花溪村又要出状元？

人们已经自觉不自觉地把顾方知看成了花溪村土生土长的人。

大队长和支部书记已经下令打扫街道了，还叫小学校连夜写标语，他们是跑了一趟公社，才从公社书记那里讨来了风。

公社书记说顾方知是“活着的华序”，并且说明天一早，省委书记胡浩将亲自到花溪村来接顾方知回城。

华序，是有线广播天天宣传的英雄，谁不知道？有谁能想到小小的花溪村竟是藏龙卧虎之地呢？

最有趣的是顾方知本人，他像没事人一样，仍旧在养蜂场做他的巢础。人们相约都不去惊动他，天一亮就抬上用箩筐盛的鞭炮去大闹养蜂场。队长还擅自决定，宰两口猪，拨出五百斤糙米，来一次全村大宴呢。

有谁能想到，天刚蒙蒙亮，顾方知就赶上蜂车上路了呢？他只留下个字条，托耳聋眼花的老饲养员送到了大队书记手中。

那字条上写着：

我转地放蜂去了，不管谁来，都无须找我，夏天再见。

扫兴，全村人都大为扫兴。

对每个人来说，这又成了个猜测纷纭的谜。老年人说他是“看破红尘”的人，年轻人说他“不居功”，一时莫衷一是。

其实，顾方知未必有人们分析的那么复杂。

此时他坐在牛车上，显得十分逍遥，好像他周围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似的。

对于华序的宣传，他怕要算花溪村第一个敏感和关注的人了。

半个月前，当电台第一次播发省委为华序平反昭雪，并且追认她为烈士的新闻时，他是流着眼泪听完了，第二套节目重播时，他又听了一遍。

他破例地到饲养房那里讨来几张辣烟叶，卷了一颗又粗又长的土雪茄，抽了个够。

他没有失眠，反而睡了一宿好觉，睡得沉极了，直到第二天日上三竿才起来，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起得这样迟。他曾经在自己心里发过誓，一旦华序的沉冤昭雪，他要美美地睡上一觉，他觉得那是他能放下心安睡的时刻，这一天终于到来了。说实在的，他从来就没怀疑过这一天会来的。

第二件事，他写了长长的一道祭文，跑到流花河畔，焚烧了。他不迷信，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使自己心安。

别的还有什么呢？没有了，他从来没想过别的。

他照旧去放蜂、去绞蜜，没有一个人知道震惊全国的华序同他顾方知有什么关系。

若说顾方知压根儿没有想过自己，那也是不客观的。他先后四次进北京上访，去为华序申诉，他是被中央文革批件上写有“同谋嫌疑”“省委认真查清”的人物，他为此坐过牢、丢了公职。

他留恋他的生物研究所，在那设备齐全的科研殿堂，他的工作卓见成效，1963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学术著作。现在，他的大学同学们，都是副研究员，有的甚至是研究员了，他呢，还是一个头戴草笠的农村养蜂员。

他相信，有一天组织上会让他回到生物研究所去的，而且自己也能够理直气壮。他盼望这一天的到来。

这一天真的到来了，随着华序的名扬天下，他的好运到了。

但是，事到临头，他反倒犹豫起来。他为这事苦恼，昨夜一宿没有阖眼。

去滥竽充数，去戴那顶副研究员的桂冠吗？

他感到自己的业务早已荒疏了，十年来远离研究中心，自己是个落伍者。一个多月前，他看到了从国外归来的学者牛满江的一篇论文，是探讨遗传工程和生物变异的，有好多地方他都看不懂。从前他是学俄语的，现代科学的重心并不在苏联，他不懂英文，怎样从事研究呢？当然，他可以学，但他已经不会是天才了。不是天才，却要占据那把天才的交椅，这是对人类科学的亵渎。何况，从身体条件来说，他也不适合搞科研了，他的眼力越来越差，500度的近视还要配上半片散光镜片。

他决定放弃他向往的但可能是滥竽其间的位置，这当然是十分痛苦的。

最好的办法是悄悄走开，研究养蜂不是很有基础了吗？

天边的流云那样洁白，像不像白色的纱衣裙呢？

顾方知觉得，那就是纱衣裙，是华序临死前要的那套白纱衣裙，但那太浪漫了，当然不会允许一个死囚犯穿上一套纯白的纱衣裙走上刑场。

啊，报纸上把华序说得神乎其神，几乎不是人，而是天生的神！

不，华序是人，是有着七情六欲的人。

她临刑前为什么要顾方知给她做一套白纱衣裙呢？她明白，他也明白。那不过是一种象征、一种表白。白颜色不是世间最纯正最干净的色彩吗？她太罗曼蒂克了！顾方知明明知道，即或做成了这套白纱衣裙，她也穿不成的，但他还是替她做了。

是的，华序向来是喜欢白颜色的，顾方知同她第一次相见，她不就打扮得像素女观音一样吗？

真有趣！一个省委书记的秘书，竟然穿着这样与众不同的服色。要知道，白颜色在中国并不是人们崇尚的啊！

牛车轻轻地摇荡着，嚤嚤的蜂喧像是和谐的伴奏，把顾方知积存在记忆深井里的水汲上来，洒开去，啊，像“虹视”一样，在他眼前展现出一幕幕色彩鲜艳的往事。

他同华序的相识，那是极其偶然的，他们彼此的行当风马牛不相及。

事情的起因是因为顾方知的挨批，50年代末，他被拔了白旗。

他觉得委屈，却没有办法推倒事实。顾方知为了研究昆虫，整天跑野外、钻书堆，有一次在传达反右倾文件时，他竟然睡着了。

他得承认，他不大关心政治，如果说不热心政治只啃业务就是白专道路，他是当之无愧的。他只是犯愁往后的路怎么走。每周一三五的午后是法定的政治学习时间，他是共青团员，要开一次团会，这些已经让他够伤脑筋的了，如果再抽出一些时间去找

人交心、谈思想、开批判会，那还谈得上什么科学研究了？

谎话说上 3 遍，也能变成真理。批来批去，当顾方知自己都觉得走过的道路像“白专”的时候，他消沉了。

那是 1959 年春天，一个星期天，顾方知把自己关在 6 平方米的宿舍里，不是搞学问，而是仰面朝天地望着房梁呆想。

有人在敲门，声音又轻又缓。

因为他的“白专”，向来是门可罗雀的，是什么人光顾呢？也许又是家属区的孩子们来向他借纱网的，这是常事，孩子们拣起他搁置不用的昆虫网，拿去扑蜻蜓。

顾方知懒懒地、没好气地应道：“进来吧。”

门轻轻地推开了，他只觉得亮光闪了一下。

啊！他惊讶得从床上坐了起来。

来人是一个苗条的姑娘，明眸皓齿，头发披在肩上，像一匹闪着蓝光的缎子。她的装束也够出众的了，白色小开领西装，前边招褶的西服裙也是白的，还有一双半高跟的白麂皮凉鞋。

顾方知在研究所的院子里，至少是见不到这种装束的，除非在舞台上。

他猜想，这可能是个演员，一定是走错门了。

于是他问道：“你找谁呀？”

那姑娘径直走进来，打量一下凌乱、肮脏的屋子，转了个 360 度的大圈，双手抄在前面，抓着同样是白颜色的拉链小提包，笑容可掬地说：“假如你是顾方知同志的话，我就是来找你的。”

莫名惊诧！顾方知只好起身让座，忙用手扯直揉皱的床单，一拍，尘灰飞扬得更厉害了。他很不好意思，脸上火辣辣的，他这个充满汗酸味的单身汉小屋，哪有天仙般女子落座的地方啊。

没想到，打扮得“洋气”的姑娘，却没有那么多娇气，她把

椅子上的图书向后推了推，坐了下去。

顾方知局促不安地问道：“你……是歌舞团的吗？”

姑娘格格格地笑了起来，她那双又黑又亮的眼睛里闪动着天真而又诡谲的光点，说：“为什么我应当是歌舞团的呢？因为我的服装吗？”

顾方知平时很少接触姑娘，更不要说对付有点调皮的女性了，他简直是一筹莫展。为了掩饰狼狈相，他从床底下拉出竹壳暖水瓶，想给客人倒一杯水，嗬，倒出来的只有半杯残水，全是水锈。他更加狼狈了，忙说：“我到水房去打点水。”

姑娘拦住了他：“别麻烦了，咱们先谈正事吧。我叫华序，是省委的。”说罢，拿出一张盖有省委办公厅公章的介绍信给他看。那是写给研究所党组的公函。

“你、你是省委的？”顾方知眨着眼，禁不住又打量了她一眼，不知为什么他觉得有点滑稽。

华序一眼就看穿了顾方知的心思，当场戳破：“哦，看我不像吗？依你看省委机关的人，都应当是穿灰褂子的清教徒？穿别的衣服就大逆不道了吗？”

这张嘴真厉害，她的笑里总有一点幽默的味道，这使顾方知很不习惯，科技界的书呆子们考虑问题，不大使用形象思维。他只好扭转话题问道：“找我有什么事吗？”

华序收敛起笑容说：“来复查你的问题。省委书记胡浩同志亲自看了7所大学和5个研究所一些‘白旗’材料，当然包括你的在内。觉得有必要重新复查，我是来征求你意见的。”

“我？”一时顾方知摸不着头尾，甚至摸不清华序此行的目的。是属于处分下达前的那种复查呢，还是带有甄别性质的复查？所以顾方知觉得自己不好谈，就说：“你……是不是应当找组织上去了解、核实好些？”

华序又笑起来：“你以为我会越过组织先来找你吗？对了，

你研究的生物激光倒挺有意思，不过我弄不明白，那怎么能消灭害虫呢？”

只有谈起业务，顾方知是津津乐道的。他像讲科普知识那样说：“哦，是这样的。我发现，昆虫类，包括害虫，在飞翔的时候，都能放射出一种极其微弱的激光信号，它有固定的频率。当雌性昆虫放出信息后，雄性的就能收到信号，彼此就吸引到一起，交配、产卵。我想按照害虫雌性生物激光的频率搞出人造生物激光，把所有的雄性害虫吸引过来，一起药杀，使它们不能繁衍后代，这不是一劳永逸的办法吗？”

华序听懂了，连连赞道：“好主意，这比洒农药好多了。农药用多了，对农民身体有害。怎么样，你一直在研究吗？”

顾方知叹了口气，摇摇头。

华序显然是明知故问：“为什么？”

顾方知说：“我是白专道路。”

“噢，这是‘白专’道路。”华序又采用了幽默的口吻，“那么任害虫满地爬、满天飞，咬吃庄稼，我们的科学工作者坐在擂台上高喊着口号，而不去从事研究，就是‘红专’道路吗？”

顾方知大吃一惊。省委的人可是专门研究政治的啊，她怎么会这样解释问题？不过，说心里话，顾方知对她产生了好感，这姑娘说话虽说有几分挖苦，但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而且敢于直言不讳。谁都得承认她说得有道理。

有理的不一定都能行得通，省委书记是不是这个口气呢？

华序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她说：“胡浩同志是抓农业的，一直为病虫害而苦恼，虫口夺粮是年年喊的口号。他对你的研究很感兴趣，他说：这样的‘白专’专家，别人不要，我要。”

顾方知的心怦怦地跳起来，他几乎要去同华序握手了。

用不着再怀疑了，华序是代表省委来给他甄别、平反的，他当然喜出望外。

华序又开了一句玩笑：“科研嘛，省委是支持的，炒金龟子吃可不能支持啊！”

一句话说得顾方知开怀大笑起来。看来，她找自己以前，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连几年前自己在桑园出的笑话她都知道呢！原来那天有几个研究员要到蚕场去观察蚕蛾破蛹的情形。去桑园蹲点的顾方知打算炒一盘蚕蛹招待大家。他的眼力不好，上灶时，竟把提来的一箩金龟子大甲虫倒在油锅里爆炒一番，乐颠颠地端到桌上，人们先是愣住，随后捧腹大笑……

华序还不肯饶他，放下手提包，环顾一下乱七八糟的房间，说：“看来，在给你甄别以前，首先应当给助理研究员的屋子恢复一下名誉，我替你当卫生助理，你不会反对吧？”

当然，华序这是对他的不修边幅、不讲卫生的嘲笑和批评。顾方知说：“我自己来吧。”

华序已经脱去了外套，缩起紧身开司米绒线衣的袖子，推开窗子，拿起了拖布。

顾方知又感激又不好意思，一时竟不知是阻止她对还是听任她对。

华序搬动着积着厚厚一层尘土的图书，又诙谐地说：“你愣什么？你不想动手？我可不是你的义务奴仆！”

顾方知被她说得哑然失笑，连忙从床下拿出洗脸盆去打水。他对华序说：“我这间屋子里，可是好久没有笑声了。”

华序说：“窗子不是打开了吗？晦气和叹息声都赶出去了。你愿意听笑声并不难，我笑起来没完，你别讨厌就行。”

顾方知又笑了。这一上午，他干得十分卖力，他觉得周身轻松，好像积存在躯体里的尘埃和污垢都被彻里彻外地清扫干净了一样。

她是怎样的人呢？是了，她自己说过，大学毕业生。她有文化、有涵养、有她自己的风度，更重要的是有她独到的见解。她

不大像在省委机关坐板凳的干部。他甚至有点纳闷，这样的人，领导会喜欢她吗？不，能喜欢的，你能挑出她什么毛病？工作不热情吗？这样春光明媚的星期天，她不去和同伴春游，却跑来做工作，她够得上一个好同志。

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莫过于第一印象。顾方知正是这样。天真、爽直而又明快、诙谐的华序，使他大吃一惊地看到：天地间还有这种有吸引力的女人存在！

跟华序相比，顾方知未免太小家子气了，他甚至有点自惭形秽。

那天忙了一上午，到了吃午饭的时候，顾方知当然要留华序在食堂吃饭。令他可以自慰的是食堂每逢星期天总要改善伙食，红焖肉、红烧鱼是准有的。他原打算自己拿了饭盒去把饭菜打回来，在宿舍里吃，可是华序反对。她一边洗手一边说：“干吗要费二遍事？你们食堂门口没有挂着‘外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吧？”

顾方知被她逗得撑不住又大笑起来，只好依她。

走出宿舍大门，顾方知有意落后几步，想尽量使人看不出他和白衣姑娘是同行者。谁知道华序大方得出奇，偏要不时放慢步子等他并行。

顾方知的心里很不得劲，他用眼睛的余光四下一看，那些拿着饭盒、碗筷的人，都在盯着他们，不，都在咬耳朵议论。

顾方知知趣地对华序说：“我给你饭票，你先走一步。”

华序站住：“怎么了？”

顾方知老实地说：“这样不好……这一年来，谁都不敢沾我的边，你又是省委下来的人，主要是对你会有影响……”

华序完全不理睬周围人好奇的目光，竟然纵声大笑起来，她说：“怕什么？你又没拿研究成果到西方去卖钱，你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抬起头来，当你有自信力的时候，你的脚步就走得

坚实了！”

坚实的脚步，是要靠自信力的，华序 19 年前说的话，直到今天还激荡着顾方知的心。

蝶舞蜂旋的草原，醉人的荔枝花，啊，四个铁轱辘在嫩绿的草丛中间辗出一道辙印，倒伏的小草又从车辙里昂起头来……野草的精神！

华序倒下去了，她还能像小草一样复苏吗？肉体是不能了，但精神是永存的，那是烧不尽的野草。

好人，在他离开人世以后，会有好多人怀念他。

华序呢？怀念她的人何止千万？认识的、不认识的，都在怀念。但每个人的怀念都不会相同，那是由了解一个人的程度决定的。

流花河的水多平稳啊，但奔腾的激流可能在深水底下。

顾方知对华序的情谊，不正像隐伏在水下的潜流吗？

这感情，原来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后来，是两个人知道，一个活着的，一个死去的。死去的又怎么能算知者呢。啊，仍然是一个人知道。

华序没有留给他什么，有过一张照片。那是华序结婚时送给他的，后来他转送给了蕾蕾，他觉得孤苦伶仃的蕾蕾比自己更需要她。

再没有了吗？不，有一封信，只能说是一个字条，还不够严肃，是写在一张草纸上的，那算得上是华序写给顾方知的诀别信了。

几年来，这个字条一直带在他身上，那是一团鼓励他向上的火。

水牛累了，已经来到了流花河边，牛一见到碧绿的水，就伸长脖颈，不肯再走了。

卸下轭具，让水牛泡在凉丝丝的水里纳凉。顾方知躺在一棵

荔枝树下歇息。蜂儿倾巢出动了，它们在利用途中放蜂的机会，紧张地采水、采集花粉和花蜜。

一张草纸拿在他手中，看的次数太多了，破了，重新裱糊过的。那几句话他能倒着背诵下来，可是还想看她的亲笔字。

他了解华序吗？

应当说是了解的、理解的、志同道合的，但并不指当初，当初甚至有点别扭呢！

那套蹩脚的西装……啊，可笑，然而又值得追忆。为什么要把西装改成中山装呢？不该的。为什么后来把那套衣服当成劳动服穿破呢？不该的。

假如现在那套衣服还完好地保存着，那该多好啊！

他忘不了研究所宣布为他甄别的日子，是周末。华序来了，陪着省委书记胡浩来的。那已经是初夏季节了，顾方知还穿着一套厚衣服，热得直流汗。

不知怎么的，华序提议，要他买一套漂亮的夏装，而且自告奋勇替他选择色泽、样式。

于是，生平第一次，他同一个漂亮的姑娘并肩走在人群熙攘的商业区。

顾方知感到不自在，他生怕路人会误认为他和华序是一对恋人，那太丢华序的面子了，他与她太不般配了，可他又希望别人误认为他们是情侣，这也许是供他偷偷享用的幸福吧？你看，不是有好多行人把艳羡的目光投向他们吗？不，不是的，那分明是追踪华序的目光，她的长相和服饰都是出众的。

华序倒好像没有闲心去注意行人的神态，只顾谈笑风生地同他交谈。

顾方知小声提醒她说：“你瞧，人家都在看你呢。”

“是吗？”华序不自主地看了看自己的衣服，笑着说：“那怕什么？人有各自的审美观点。”

“你就不怕人说你是那个……”

“说我小资产阶级情调吗？”华序真精灵，一下子就猜到了他要说什么。“听得多了。我是个独立的人，我要穿什么别人无权干涉，但有权品评议论，那同我没有关系。是什么阶级，难道是按着衣服样式来划分的吗？”

顾方知当然驳不倒她。

华序好像出于灵机一动，当她带着顾方知跨进中山路最大一家服装商店时，突然说：“你应当买一套西装。中山装不扣领钩太懒散，扣上又太勒脖子。况且——你别生气，你的脖子短，穿无领的西服一定很漂亮。”

顾方知像听到教唆犯教他行窃一样，吓得连连摆手、摇手，引得华序哈哈大笑。

不晓得是由于华序的雄辩力呢，还是由于她的魅力，顾方知在柜台前妥协了。尽管他未必情愿，却任凭华序替他选好了一套浅米色的西装。滑稽！还配上了一条带有七星瓢虫样斑点的领带！

今天思忖起来，顾方知仍然费解，是一种什么力量促使他改变生活习惯，竟然做了这一次违心的让步呢？

当然，西服没法穿，不，裤子是穿了的，上衣只好改。

不，确切点说，那套米色西装是穿过一天的，仅有的一次。

他当时虽然处于朦胧状态，却也意识到自己的举动有讨好华序、取悦姑娘的成分，骗得了别人，骗不了自己。这是不是爱情呢？他即或在内心里也是矢口否认的，他不敢正视这个现实。

但是，潜在的、活动的感情的祸水是会促使人干出种种蠢事的，而且你在干蠢事的时候又不能自制，还自以为聪明！

你为什么要给她写那张字条呢？啊，真愚蠢！即或在19年后，他现在躺在空旷无人的河边，他都觉得脸红和心愧！

啊，她是热情开朗的，也可以说是没有一点邪念的。顾方知

啊，你这个笨人，怎么会把人家的热情误认为是爱情呢？

那不敢回首的一幕啊，幕布拉开是那么迅速，闭幕比拉开还要快呢！

南国的花市是迷人的，她也许不该同他一道去逛花市！

在华序把手提包放到白漆长椅上，跑到冷饮摊去买冰淇淋时，顾方知昏了头，竟然写了个字条，悄悄塞到华序的手提包里，完全像个贼！

可笑，真是头脑发热，冰淇淋都没能使自己冷下来。还好，她没有当场发现那张字条，没让他当场献丑。如果可能，他真想再把那张字条偷回来，可是，她带走了。

那张字条上写了几行什么字了？时间太久了，记不清了，但意思是记得的，邀请华序下个星期六傍晚，仍然在花市白漆长椅这儿同他见面。

滑稽！这不是从小说和电影里学来的一套吗？她会不会把腰都笑弯了呢？她会不会嘲笑自己蠢头蠢脑，从而不再理他呢？后悔极了！

这一个星期真长啊，等得他心焦梦乱，比盼望甄别平反的一个月时光还长！

字条既然写了，就得打肿脸充胖子去践约。有人家姑娘爽约的，自己不能食言。

真见鬼！怎么穿起那套西装到花市去了呢？是不是为了讨她喜欢？你不敢承认也是的。

光滑的长椅好像生出许多芒刺，叫他坐不安实，他既盼她来，又怕她来，时间一分一秒地在流逝。

突然，他的头像炸开了一样，眼睛都涨得疼痛起来。那不是来了吗？她真的来了，在左顾右盼，走路都带有青春的弹力。

昆虫学者的头脑出现了空白，他不知道该起身跑上去迎接好，还是老老实实在那里等好。

华序看见了他，加快脚步走过来，笑着埋怨他说：“你真呆！干吗塞字条，当面说不更好吗？本来我今天晚上要听音乐会的，为了赴约，只得迟到半小时了。”说着，她掏出三张票，递一张给顾方知，说：“走，到音乐堂要坐 15 分钟车呢。”

顾方知还没来得及细品她这一串话的意思，从花房那里走过来一个青年人，穿着笔挺，是个美男子。他显然刚去买了一束花，抱在胸前，径直朝长椅走来。

这个人彬彬有礼地朝顾方知点了一下头，扭过脸去望着华序，显然是等她介绍。

华序笑吟吟地说：“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好朋友，生物学者顾方知。这个嘛，是省委宣传部的毕云阶，我的未婚夫。”

被雷殛的人，表情一定同当时的顾方知差不多的。他不知他是怎样伸出手去同风度潇洒的毕云阶握过的，他也不知道怎样稀里糊涂同他们听完一场音乐会的。

顾方知觉得对不起华序，好像他亵渎了一个圣洁的姑娘。你看毕云阶那一表人材，只有他和她才是相匹配的。小丑，啊，自己不是在扮演小丑吗？

从那以后，他把这萌芽状态的感情深深地掩埋起来了，那是朝露，结得快，消散得更快。他惟一庆幸的是华序好像没有发觉他想入非非。

那天音乐会散场时，华序朗朗地笑道：“下周日你有闲空吗？请去参加我们的婚礼，在省委机关礼堂。”说着递给他一张印着双喜字的大红请帖。

“我……会粉刷房子，你用我吗？”这是顾方知的回答。

毕云阶客气地谢绝了，他不好意思劳动别人。华序倒是满不客气：“好啊，你刷，我给你提灰桶！”

顾方知真的去了，弄了满身石灰浆，出了一身汗，那一整天却没有说过 10 句话。他觉得心里稍微踏实一些，这是他悄悄向

华序赎罪的独特方式。

人可以互相欺骗，却骗不了自己。

顾方知懂得，他在心底滋生起来的是什么，是朦胧的爱情吗？大概是的。有人常常形容爱情的幼芽被扼杀，而顾方知感到自己心底只埋了一颗没有来得及萌发就枯死的种子。

有人说，初恋的挫折就足以导致一生没有爱情，这当然指的是真正的爱情。不知道别人信不信这话，反正顾方知是深信不疑的。从那以后，他就没有爱过任何一个女性。他心中有一把尺子，就是华序，总是自觉不自觉地用华序的标准来衡量别的女人。衡量的结果，当然都是等而次之。

于是，他孑然一身地生活到过了不惑的年龄。

一朵朵白云飘逝了，往事像瞬息即逝的花朵一样，是追不回來的了。

顾方知却一点都不后悔。他为没有看错了华序而高兴。

他觉得自己过分相信小聪明了。当初，他那愚笨的表达感情的方式，不是自以为没有引起华序的留意吗？是的，华序表现得太平常了。可她不是傻瓜，在男女之间，女孩子其实比男人要心细得多，更何况华序这样绝顶聪明的女性呢！

他这样说是有根据的。

手里这张写在草纸上的书信，既是华序的诀别书，又是真挚的情书，人在死前总是喜欢把真情留在人间的。

谁说她对顾方知的痴情一无所知？

她的短信里写得再明白不过了：

……当你渴望得到一个女人的爱的时候，她把第一次的爱轻易地许诺给了别人。如果说无意的伤害是可以原谅的话，她得到了你的谅解，但她并不是白痴。现在，当你已经不屑于得到那被蹂躏的爱情时，她愿意把

这爱的残余奉献给你——这完全是她个人的事情；你可以不接受——那是你的事情。她一生追求的、寻找的精神，潜藏在一个最普通的人身上——就是你。找到了，即使得不到，她都是满足的，可以闭上眼睛了。古往今来，凡是追求真理的人没有几个能得到好下场的，她也不例外，将要被绑在宗教式的火刑柱上。你不是说过吗？第一个宣布地球是圆的人，却落了个活活被烧死的下场。如果连这点代价都舍不得付出，那人类社会还怎样前进呢？永别了，你将是不会唾弃她的惟一的同志……

华序是用第三人称写的，叫人读起来比第一人称还要心酸，这便是顾方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爱的结局。

云在飘，河在淌。此时也许省委书记他们正在寻找他。

这一切同他有什么关系呢？写纪念文章、充当华序战友的人不请自来，顾方知不愿意去沾这个光，他的所有怀念，都蕴藏在心底。他觉得这是华序在天之灵能够得到慰藉的。她的死，没有为她自己捞到半点好处和实惠；如果为了得到人活着时享用到的好处，那她一点都不乏某些人的本事和才干。

她是普罗米修斯，是盗火者。

啊，她说过，在所有古希腊神话里，她最喜欢的神就是普罗米修斯，虽然他被锁到了高加索的悬崖上，下场不那么美好。她也说过，盗火者必然首先看到光明，她愿盗天火给人间，宁愿自己被锁在狃岩上。

她实践了自己的诺言，用血，用宝贵的生命。

啊，顾方知曾经是盗火者的同谋，他支持过华序。难道所有的支持都是为了自己沾光吗？那是可耻的。

他坦然，躺在草地上，心胸像博大的苍穹一样冷静，流花河

的水像在他心上漫过去……

疯，说明她还有良心

一场寻找顾方知的马拉松比赛正在分头进行，不过没有裁判。

胡浩捷足先登，他有上海牌轿车。

蕾蕾慢鸟先飞，一清早就搭公共汽车到乡下去了。

毕云阶声东击西，他向省委办公厅要了一辆吉普车，打出的旗号是到华序殉难地看看，其实是直奔花溪来了。

他们都扑了空，又各自追寻下去。

谁都不曾料到，最先摸到顾方知踪迹的倒是从疯人院逃出来的周菁。

她可不是来找顾方知的，她虽然见过他，那是早年的事情了。现在，顾方知的影像在她那颠倒了的神经理网里，可能没有半点印象了。

周菁不过是无目的地胡跑。她喜欢恬静辽阔的旷野，她怕那些穿白大褂的医生护士们的一脸凶相，她怕关在那四壁皆空只有一张铁床的病房里。

这里是一片华山松树林，是花溪大队培育的，远处起伏的峰峦才是国有林，因为这一带都是老年山，山势徐缓，常常是流动蜂场落脚的地方。

昨天傍晚，顾方知赶着牛车来到了这里安下营。他早晨到看林人小竹寮前汲泉时，看见了周菁。

顾方知认出她是省委书记胡浩的老婆，并且知道她住精神病院已经多年了。在干校的时候，周菁同华序在一个连队，本来就要好，吃饭、出工向来形影不离，后来听说周菁告发了女友华序，顾方知起初还不肯相信呢。

她为什么疯了，传说不一，但有一点是可以相信的。她是在华序被绑赴刑场后枪响的时候疯的。在场的人说，她先是瞪着惊恐的眼睛盯着站在野草丛中的华序，接着拨开人群扑向华序，叫着一连串凄厉的“好妹妹”，当华序饮弹仆倒的时候，周菁惨叫一声，便张牙舞爪地叫起来：“枪毙我吧，我有罪……”

有人说，周菁毕竟是女人，胆子小，见不得血，特别是亲眼看到女友倒在血泊中，更经受不得刺激，所以精神失常了。这当然是维护和开脱周菁的人们的语言。

也有人说，周菁揭发了女友，原是没有想到会判死刑的，心里有愧，吓疯了。这无疑是那些对周菁的行为嗤之以鼻者说的。

顾方知是详知内情的人，他相信后者是真的。

他曾经恨过周菁，自从她疯了以后，他反倒同情起她来。

确实，第一个起来揭发华序的是周菁，但她又马上向组织要求，希望不要把事情公开，只在支部会上帮助华序一下就够了。

掘开河堤的人，一旦开了口子，洪水会听掘堤人指挥吗？

客观上，等于是周菁把朋友推上了断头台，她疯了！

这不是良心发现促成的疯癫吗？比起那些干尽了坏事却仍旧能够吃得饱睡得香的人来说，周菁仍不失为好人，有良心，而且良心毕竟能够发现，直至因为内疚而精神失常。

这便是顾方知推导出来的公式，他早有心去看望看望这个疯子，真想对她说：“你是好人，你比那些整了人还心安理得者强多了！”

想不到，他在花的原野上与疯人猝然相逢了。

顾方知像与老朋友他乡相遇一样，热情地迎过去，伸出手去给她。

周菁惊骇地躲到竹林后头。

顾方知说：“我是顾方知啊！周大姐，你不认得我了吗？”

周菁说：“够了，够了，我是出卖耶稣的犹大，出卖的代价

是 30 块金币，哈哈哈哈……我早该上十字架了。”

顾方知就地采了朵小野花，递给她：“不，你不是犹大，你比犹大有良心。你放心吧，华序一点都不会怪罪你，她昨天对我说了，是在梦里，她说，你不该疯。”

顾方知两眼发直，心像被传染上了疯病，同她傻愣愣地站在一起。

天晓得疯人的神经是怎样构成的！周菁嘻嘻地笑起来，伸手接过那朵小花，像村姑娘那样，将野花插到右面云鬓上，乖乖地随着顾方知跨过山间小溪，绕过一片竹林，来到流动蜂场。

顾方知拿了条毛毯铺在青草地上请她坐，她坐下了，盘着腿。顾方知取出储存起来的蜂王浆，舀到杯子里叫她喝，她有滋有味地吮吸着。

顾方知说了一大车话，像对牛弹琴那样，完全不去理会对方是否听得明白。

也许是语言或蜂王浆起了镇静作用，也许周菁有某一根神经是同顾方知相通的，她安静得很，听着听着，她阖上了发红的眼睛。

顾方知将一领棕绳纤维编的蓑衣盖在周菁身上，戴上面网，到蜂箱前去检视蜂框了。

和谐的嗡嗡声像地平线上隐隐的春雷，伴着一个疯人杂乱无章的记忆和幻觉，展开奇异的梦境。

那是什么？黑色的旗杆？不，那被火烧得焦黑的木头，不是矗立在旷野的一根十字架吗？对的，有横梁的。十字架下黑乎乎的是什么在蠕动？狗熊？不，是人，他们都披着黑袍子，手里持着黑十字架，有的撑着蘸了牛油的火把。啊，一群神甫，他们是中世纪罗马教庭宗教裁判所的执法者。那个有着大胡子的人在喊什么？听不懂，不是希腊语，便是古罗马语，他们是在喊“消灭异端”吧？肯定是。他们不是烧死过布鲁诺，囚禁过伽俐略吗？

谁叫这两个狂人宣称地球是动的、是圆的呢？

又一个人被推出来了，穿了一身白衣服，难道是哥白尼吗？不，那是华序。她流着血，被吊到了十字架上。

神甫们在十字架底下堆着干柴，倒上油料。一个大法官把火把掷了过去，砰地一声巨响，烈火平地腾起，火苗顺着黑色十字架向上蔓延，燎去了华序的裙子……

啊，她哭了，不，是笑了，她好像在喊：“地球是圆的！”

是圆的就该被烧死吗？

模糊了，那红彤彤的一片，是大火掩住了华序。不是的，那是一树凤凰花，开得艳极了，华序不是从树上冉冉降到草地上来了吗？

下跪，快给她下跪，对不起她！犹大在给她祝福，犹大的灾难只有在耶稣复活的日子才能赎尽。今天不是复活节吗？

华序下来了，哎，真年轻，这么多年，时光没有在她脸上留下一点痕迹！

她不是在笑吗？她在说什么？

啊，听清了，听清了，她说：“周大姐，你太脆弱了。脆弱也许正是你没有变成老奸巨猾的可爱处。你是不得已的，人谁没有一时的过失呢？你比那些假充正经的强盗要高尚多了。我爱你，怒其不争，哀其不幸。”

周菁回答了吗？好像有人在掐自己的喉咙，发不出声来，呃呃，真难过啊。

华序仍旧站在花海中述说：“来吧，跟我来。他们都能脸不红、心不跳地成为我的战友，你为什么不能？走，咱们一起去参加我的追悼会去，我自己扎了一个纯白的花环。你用鲜活的百花扎一个七彩的吧？像那年清明节你套在我脖子上的那个一样……”

周菁眼前像海浪般地涌出一片姹紫嫣红的花朵，采啊采，编

啊编，只有嗓子有点堵，说不出话来。

华序变脸了，她走过来，劈手夺去快编好的花环，扔到地上说：“不要这个，那不是有罂粟花吗？用罂粟花来编！”

呀，罂粟花里含着高量吗啡，它是有毒的啊！

华序在冷笑：“有毒的花，才能以毒攻毒嘛！”

一阵风吹来，风吹草低。

花不见了，华序不见了，白茫茫一片旷野，何等干净！

啊，像跋涉在茫茫的戈壁滩上，没有绿洲，没有坎儿井，没有生的气息，快窒息了啊，快渴死人了。路在哪里？绿洲在何方？

那不是路吗？赫褐色岩石中间，不是有一条白色的路吗？

走啊走，爬啊爬，到了，来到了路边。天哪，这是路吗？一片暴弃荒原的白骨，延伸下去的白骨铺成了一条崎岖的路，不能算路，没有延伸多远，白骨铺成的路就像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地下暗河一样，无影无踪了。

路在哪里呢？

流水声！是的，没听到吗？是坎儿井还是地壳下面的暗流？

不，是河，流花河！

那一排排简易的竹棚，那用芭蕉和野芋叶子遮住房顶的住宅，不是“五·七”干校锻炼的地方吗？

水声，有节奏的哗啦哗啦的响声。

呃，有一架笨式水车架在小河同水田渠道相连的地方。

华序在车水，自己同她踩着同一架水车。轮子飞转，水声淙淙悦耳。天上的云多白，云后的天多蓝，还有从南海海面飞翔过来的海鸥！

一对患难的女友！

无忧无虑地一起度过了多少时光？什么都不多想，有时觉得长一个大脑都是多余的，有了小脑支配运动神经就够了。走平道

的时候，人们从来不去思考：摔了跟头却要研究一下绊倒的原因，是脚步歪了呢，还是有人在路上放置了障碍？

华序为什么不会像别人那样生活呢？学语录、背“老三篇”，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下田去插秧，把75岁的地主从床上拉下来斗上一个回合……然后是干校毕业，回到已经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的老办公桌前，掸去浮灰，再去过不用动脑筋的日子！

她真怪，却要问为什么！

她掏出厚厚的一沓稿纸，什么题目？吓人！竟然是“我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天哪，你怎么还应当有“看法”？不理解的在执行中加深理解也未必能够理解，你却还有自己的看法！

劝她，骂她，气得差点把那沓原稿抛到流花河里去！死丫头，这是玩儿的吗？你自己不要命了，也该为我们家老胡想想，你是他的秘书，你是树叶、树根，他是树枝，一枝动百枝摇，那会把根子从土里摇出来的！

华序笑了，古怪的笑！稿纸揣起来了，她说还没有考虑成熟，只等成熟了，她要直接上书给中央文革，上书给中央主席。她太天真了，说什么“这不是写在党章里的党员的起码权利吗？”

坏了，要坏事！

这丫头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她一个人自焚已经叫人痛心，万一送殡的都一起被埋进坟墓呢？

到了选择的时刻了，阵阵蛙声叫得心烦意乱，爬起来吧，到山冈上男人们的大工棚里去，叫起丈夫来吧，他这个老革命，应该能够对付新问题。他的秘书，他总能制服的。

火亮的大榕树底下一闪一闪，不是鬼火，是香烟头。“走资派”胡浩不知连续吸了多少支辣烟，周菁谈的情况使他心里隐隐作痛，好像是心脏病要发作的前兆。炸药桶摆在面前，导火索已

经点燃，不当机立断掐断导火索，就是一场灾难！

救大家，也为了救华序。

她是一个好姑娘，单纯、热烈。她怎么会走上怀疑文化大革命的死胡同呢？挂牌子、剃鬼头、喷气式，难道不是文化大革命赐予这位省委书记的礼品吗？啊，那只是支流，挑鱼刺的时候，难免要剔除一点好肉，好肉毕竟不等于鱼刺。几十年的经验证明，这么大的运动不会错的，何况不理解也要执行！

丈夫没有支持周菁。他说什么来着？啊，他说：“不要遇事先考虑个人得失，小华出事牵不牵连你我，那是小事一段。我们应当相信党，哪怕再审查我们10年都没关系，这也是一种特殊的考验。”

真急死人。那么，就瞪着眼睛等着华序去闯下这个弥天大祸吗？

丈夫胡浩的党性到底比自己强。他说：“最叫我忧虑的是小华的思想倾向。一个共产党员，什么时候站到党的对立立场去考虑问题，那就是背叛的开始了。她的素质很好，我们是她的同志、朋友，不能看着她陷到泥坑里不管。”

你能说服她吗？

苦笑。他甚至无权找她谈话。华序尽管是个被改造的对象，那改造却是泛指，活到老、改造到老，人人有份的。而走资派则不然，他头上的那道改造的禁箍，是专政的标记，和黥面差不多。

怎么办呢？

胡浩说：“只有通过组织。”

出卖吗？告密吗？

胡浩批评了妻子和同志：“你扯到哪儿去了？如果我有类似的苗头，你难道不应当汇报给党，取得党对我的教育、帮助吗？个人的力量、朋友的力量都是有限的，对她这样一个年轻党员，

组织会善意帮她正过来的，这一点都不用怀疑。搞土改那年，我‘左’得厉害呢，杀了富农，队长叫我检查，我不服，组织上开了两个会，和风细雨，我不是很容易就接受了吗？

假如……出现对华序不利的因素呢？譬如挂上牌子关牛棚？

“笑话。”胡浩说，“你还有一点政策观念吗？运动重点是什么？走资派。我不是走资派，毕竟有人是。干吗要整一个普通党员？即或不处在运动中，对每个党员的思想毛病随时随地掐尖、打权、整枝，也都是经常的嘛。不过，你还是叫华序自己去找干校党委谈好，万一她想不通，你去谈，也要说是替华序来谈的。”

懂了。这样就不会陷华序于被动，就会使她处在与组织亲密无间的地位。

水车页子风车般地转，又是同华序一起车水的日子。蓝天、白云，悠悠的河水。溅起来的水珠跳到两个女人的赤脚上。

华序双肘架在水车扶手上遐想；周菁机械地移动双脚，忧心忡忡。

怎么能不忧心呢？按照第一方案的劝说无效！第二方案已经付诸实施，尽管自称是代表华序向组织汇报思想的，毕竟是伪造的“代表”，万一事情闹出来华序翻了脸呢？

真想对着上苍向冥冥中的神祈祷，但愿这件事化险为夷。

“哎，你还没对我那份材料表态呀！昨天我给顾方知看了，他说，这些看法‘人人心里有，人人嘴上无’。我心里更踏实了。”这是华序仰望着深邃的天穹说的话。

可怕的执迷不误！周菁只能说：“你呀，不见棺材不落泪。”

华序莞尔一笑，说：“看把你吓的。当然，我想的不一定对，对与不对，都应当报告给中央。我是人，一个独立的人，这么多年我没有用过自己的大脑，现在，有人从反面打开了封闭已久的思维大门，我恢复了思考的本能。装聋作哑是幸福的，不过那幸福也太可怜了。”

沉默，两个人望着花的原野。

“你还记得咱们背诵过的那首诗吗？”华序不知又想到了什么。

愕然！周菁简直搞不清华序是怎么回事。

华序背诗的声音那么甜，那么深沉：

纸扎的花朵，
骗不了采蜜的工蜂。
有毒的罂粟花啊，
却能使人清醒。
光明与黑暗本是孪生兄弟，
乌云力图遮住太阳
却不幸在大地留下自己的黑影……

是诗歌感人肺腑呢还是华序的水晶一般的心灵感召了朋友？

反正，泪水溢出了眼眶，流下了腮帮，一种预感犹然而生，心跳、发慌，像白云后头潜藏着雷雨一样。

生活中带有唯心色彩的先兆，常常带来真的事实，但愿那都是偶然。

脚步声不是从背后响起来了吗？杂沓的、急促的、不吉祥的。

偷偷地回眸看上一眼，眩晕了，心悸了，周菁差点从水车上掉到河里。

她呢？那水晶般的人儿却仍然俯在水车扶手上深沉地朗诵着诗。她有没有注意到，乌云正把阴影罩到她的头上来呢？

来得太突然了，那三个来人仿佛是拿勾魂索的人。你看，本来就是马脸的干校第一区队长脸拉得更长，他身后跟着两个警察。

啊，真可怕，为什么要向区队长汇报呢？他不是答应过自己替华序严守秘密吗？

鼻子在发酸，周菁哇地一声哭起来。华序踩着水车的脚停下来，她还不明白呢：“周大姐，你怎么了？”

周菁除了伤心地哭而外，有什么好说的？讨药的人是为了给亲友治病，自己讨来的药却是虎狼药！她哪里知道呢？

区队长干涩的声音在叫：“你下来，华序！”

这一刹那间，华序似乎什么都明白了，她有意无意地瞥了周菁一眼，跳下水车，在河水里洗了洗手，捋捋被风吹乱的散发，可能还看了看映在河水中的美丽的影子……从容地向公安人员走去。

周菁也跳下了水车，奔到区队长面前嘶哑着嗓子叫喊：“千万不能这样，咱们讲好的，只是要帮帮她呀……”

区队长甩脱了她。

一个64开的硬纸片朝华序亮了亮，那盖着朱红印章的东西她还是第一次见过呢，大概就是逮捕证吧！一副镀镍的亮闪闪的手铐向华序两只腕子上轻轻一磕，咔一声锁上了，仅仅一秒钟，华序的自由就锁到铐子里面去了。

区队长问了一句：“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华序摇了摇头，走了两步，又说：“我想看看孩子，孩子昨天从幼儿园刚来干校看我……”

周菁哭着、跟踪着，跑在花的草原上。不，那不是花的草原，那是铺满冰雪的路，也不是冰雪，那泥滑难行的路，不是到处流动着暗红的血浆吗？

枪声，怎么是隆隆的声音？连大地都在抖动！地震吗？火山熔岩从死火山口喷射出来了么？半边天都是红的，那是卷向黑十字架的大火！

“走，咱们一起去参加我的追悼会去，你给我扎一个罌粟花

的花环吧！”

……

疯人的梦只有疯人自己懂得。

周菁醒来了，脑门儿沁出了冷汗。她悄然地爬起来，从竹林里钻出去，随手采集着大把大把的野花。一定编一个又大又好看的花环，压过所有那些一个战壕的战友们的花圈，是华序邀请我去参加她的追悼会的，像陆霜青他们，未必接到华序的请帖呢！

她嬉笑着，抱着那束野花，漫无目的地走了。她早已忘掉了还有个顾方知，更想不到要告别一声。她走了，像是这就要去参加华序的追悼会，也像是在这旷野上、山冈上、树林中去寻找华序。山路上留下了她遗落的一朵朵野花。

当顾方知再来看她时，她早已走掉多时了。顾方知不想再去找她，他留不住这个疯人，也没有办法替她医治心头的深深的创伤。他只有发自肺腑地一声长叹……

良心、道德、法律

多像一块硕大的地毯啊，它铺在两山中间，是一道徐缓的山坡。绿茵茵的野草是地毯的基本色调，成簇的野花构成了地毯上照人眼目的图案。那白漆蜂箱呢？像是错落有致地摆在地毯上的围棋子儿。

顾方知头上罩着面网，从蜂箱里提出灌满茶褐色蜜浆的蜂框，冲着阳光察看，贴在巢础上蠕动着吐着花粉的蜜蜂们那样秩序井然。

什么声音？深山里会有鸣笛声吗？

顾方知把满蜜的蜂框下到箱里，拉起面网，循着鸣笛声回眸望去……

不是幻觉。你看，在一丛黄皮竹前，不是停着一辆草绿色车

篷的吉普车吗？随着砰砰两声关车门的声响过后，有一个人朝他走来了！

他们的先遣队找上来了！

这是顾方知的第一个推测。那么他是哪一个呢？看车子量级别，不会是胡浩。说真的，他弄不明白，胡浩干吗要劳动大驾来找他。

在他犹豫的当儿，来人走近了，站在顾方知十步开外。他面目清瘦，卡着一副黑边镜子，颇有风度。

这不是毕云阶吗？啊，他老多了、瘦多了，和当年在花市邂逅相遇的时候比，真叫人不敢相信前后是一个人。

他来干什么？莫名其妙。

毕云阶是个不屑一提的人，没有必要理他，顾方知宁愿把他忘掉。可是一见了他这副久经磨难的样子，顾方知心里又不忍起来。

“是你吗，老毕？”顾方知迎上去说，“几年不见，你怎么瘦成这个样子了？”

毕云阶动了感情，眼圈一红说：“可怕的日子！不死也得剥层皮。你还说我呢，你照照镜子吧，你快成老头了。”

两个人都好像忘记了从前他们之间的不快和隔膜，拉着手来到临时看蜂房前。其实，这不能算房子，不过是砍了六根龙竹，埋在地上，竹竿上头支起块遮光挡雨的帆布罢了。

顾方知惟一能够招待客人的就是蜂蜜了。他现去提了半桶凉冽的泉水，将蜂蜜在杯子里搅匀，递给他：“喝一杯吧，去去暑气。”

毕云阶啜了一口，感伤地说：“吃的是黄连，酿的是蜜，不知是苦中有甜，还是甜中有苦。”

顾方知抱膝坐在他对面，安慰地说：“过去的都过去了，还去想它干什么！现在不是好了吗？”

他本想问问蕾蕾的消息，话到舌边，又滚了回去。他不愿意伤毕云阶的心。再坏的父亲，也都希望儿女把爱百分之百地献给自己，岂能愿意叫别人分享？这是顾方知能够理解他的。

其实，他们当中的不快，还不是因为孩子引起的吗？

那还是顾方知第三次从北京上访回来，带着蕾蕾走出火车站的时候，迎面碰上了一脸怒容的毕云阶。他几乎不顾周围有多少生人，一把拉过蕾蕾，打了孩子一个嘴巴，大声吼道：“我叫你野！在家里给我闯祸还不够，还要到北京去给我上眼药！你再乱跑，我打断你的腿！”

指桑骂槐，谁还听不出来呢？

顾方知看蕾蕾哭得委屈，就解围地说：“这不能怪孩子，她才有多大？你要怪就怪我吧。”

“我能怪谁？”毕云阶说，“只怪我自己没有家教。”

顾方知苦笑：“这何必呢。其实，你去干校前，不是同意把孩子放到我这吗？”

“不同意又有什么办法？生米煮成了熟饭！”毕云阶说，“你抓住孩子想妈妈的弱点，好像惟有你最同情她们，你不就是靠这个征服了孩子的心吗？我请你不要再插手别人的事了吧！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孩子再背上一个刑满释放分子的社会关系！”

顾方知的脸都气黄了，他气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可是事后一想，他觉得应当原谅毕云阶，他虽然说得粗鲁不近人情，可仍是出于对女儿的爱，在这一点上，他仍然是个父亲。

这是促成顾方知连夜搬到乡下去的原因，他打算远远走开，狠心不再见到蕾蕾，不夺走别人的父爱。

可是，感情不是里程所能阻挡的。蕾蕾追到了花溪。

大约是为了永远地把他们分开吧，1976年动员应届知识青年到北大荒去插队落户时，毕云阶把刚刚15岁的女儿送到遥远的北方去了。

顾方知想念孩子，也料到在华序平反以后，孩子肯定已经回到了故乡，他多想见见蕾蕾啊。可是，这感情不好在毕云阶面前流露，那会伤他的心。

没有想到，却是毕云阶首先涉猎了这个谈话的禁区，他手里转动着蜂蜜杯子，说：“我应当感谢你。过去，我太自私了，你能原谅我的，你的肚量很大。唉，那时我的心乱极了，其实我还不是违心地告诉孩子一些话吗？不提这些了。我来找你，是来谢你，你替我照料蕾蕾好几年。”

顾方知心里一阵阵发热。乌云过去了，阳光毕竟能够照亮每个人阴冷的心。你看，毕云阶不是都感到内疚了吗？顾方知最听不得别人道歉、致歉，那他会觉得自己欠了对方一笔债务似的。他赶紧摆摆手说：“你说哪去了？我们应当互相谅解。”

他们互相谅解了。在这幽静的竹林下，谈了好多，大多是回味无穷的过去。

后来话锋一转，毕云阶笑着说：“你是最喜欢急人所难的。这些天我都被记者们、编辑们快逼疯了，你还得帮我一次忙。”

“我能帮你什么忙？”顾方知说，“拙嘴笨腮，手笔也不如你，加上这几年又都荒疏了。”

“你总是那么自谦。”毕云阶说，“其实，对你来说容易得很，既不要你去演讲，也不用你去洋洋洒洒地写大块文章。你只消把记忆仓库的大门打开，帮我回忆一点事情就够了。”

顾方知似乎听明白了。不知怎么回事，挥汗如雨的热天，他却冷得发抖，是从心里往外冷的。

见他不语，毕云阶又补充解释说：“我明白，你同华序在好多观点上是志同道合的，你是真正了解她的人。我虽然是她的丈夫，却了解得寥寥无几。为了宣传好烈士，你一定愿意提供一点素材，会帮我一把的。”

冷，冷得顾方知越发发抖了！

这是毕云阶说的话吗？分明不错。他怎么说得出口呢？

不假，对于华序，他知道得太多了，若写起文章、做起演讲来，目前在台上活跃的那些与华序“一个战壕的战友们”，怕都是不能比拟的。

告诉他又有何妨？一来使华序的光照日月的品格昭彰天下，二来也使毕云阶心满意足。

可是，人是有记忆的，是会对比的。

能忘了从前的那一幕吗？

也是在荒郊野外，不过是黑夜，毕云阶把顾方知拉到一棵树下，哭着求他帮忙。什么忙呢？让他提供一点华序“反动言行”，以求过关。不过毕云阶没有说得那么露骨。他说：“我太难了，专案组每天都在挤我、压我，要我揭发华序，过不了这道关，我就得和华序一样去坐牢。那孩子就更可怜了……你知道，华序从来不同我探讨政治，她说我平庸。我连她评论林副统帅的字写得不纯熟都揭了，别的我实在不知道了。可他们不信。看来，我不拿出一个重磅炸弹，是不行的……”

那次，顾方知也是周身发冷的感觉。叫他提供“重磅炸弹”去换得毕云阶的安然无恙，却要炸毁自己的人格。顾方知半点考虑的余地都没有，他一句话没说，赶着水牛群走了。

今天，历史的镜头在重复运用，又掘出了他积沉在心底的隐痛，他的反感压过了伤感。他本来已经打算忘掉过去对毕云阶的厌恶感了，现在却不得不重新来评价这个人。

可鄙的人格！从前企图用落井下石的办法拯救自己，现在又想用移花接木的手段给自己贴金，他与华序的情操有一点相近的地方吗？

顾方知真想痛骂他几句，他骂不出来，憋了半天才问道：“你风尘仆仆地来找我，就是为了这个吗？”

毕云阶终于发现了他脸上的鄙视神情，一时哑口无言。

顾方知说：“像从前我不能为你提供重磅炸弹一样，今天我也不会向你提供高升的阶梯。其实你的文章写得不少了，空洞一点也不要紧，你会从华序的身上得到好处的。”

说完，他拉下面网，扛起绞蜜桶就走。

毕云阶一翦脚从地上站起来，拦住他的去路：“等一等，我还有话。”

顾方知放下了绞蜜桶，等待下文。

毕云阶扭转了话题：“蕾蕾回来了。我知道你一定很想见她。她恨我，始终不承认我这个爸爸，这是我的罪过吗？这太不公平了。在那种高压下，除非我们都陪华序上断头台！要想活下去，谁没干过一点违心的事？天下有几个华序呢？”

实话。虽然实话不一定是真理。

说到这里，他流出了眼泪。

“你想要我怎么样呢？”顾方知冷静地望着他，他的眼泪不再能够打动顾方知了，那是鳄鱼的眼泪。

毕云阶说：“我请你帮我一下，让孩子原谅我，你是有这个能力的。”

顾方知说：“是的，我有这个能力。周围的人，都可以原谅你，因为还可以用高压的客观原因为你开脱。我倒想问你一句，即使道德和法律都能原谅你，良心能宽宥你吗？假如你自己首先原谅了自己，又没有一点内疚的话，我看你会幸福的，何必再求助别人？”

毕云阶仿佛只听懂了“可以原谅”几个字，他忘情地抓住顾方知的胳膊，说：“这样说，你也能原谅我吗？”

顾方知轻轻地拂掉他的手，像驱赶一只讨厌的苍蝇。他别过脸去，说：“原谅你了，你走吧。”

毕云阶瞪着痴呆的眼睛，急不可待地说：“太好了！谢谢你！那你就远走高飞吧，不要进城去，不要去参加追悼会，不要抛头

露面，不要同蕾蕾见面，你答应吗？我求求你……你不能夺走我惟一的女儿了。我知道，她会找你，只要你一露面，她就从我身边跑掉了。我失掉了华序，我最好的妻子，我不能再失掉女儿了。你不能太自私……那，我将怎样活下去呢？

顾方知震怒了，五脏六腑都翻腾起来。这才是他的最终目的，他是为女儿来设路障来了！

不能太自私，自私的难道是顾方知吗？一时他忘记了自己的诺言，他从齿缝里挤出了这样几句话：“你真可耻。人的心，人的感情，也是可以当作商品出卖和转让的吗？”

大约毕云阶没有料到向来心慈面软的顾方知会说出这番硬话，他呆了，旋即想到顾方知是要夺走他的女儿，于是他退后一步，歇斯底里地大叫起来：“那就试试好了！法律、道德都摆在那里的，蕾蕾姓毕，是我的女儿，这是法律保护的！你抢走别人的女儿，抢去别人的爱，你算道德吗？”

顾方知觉得阵阵反胃，再同他多纠缠一分钟都是人格的耻辱，他赌气地说：“你走吧，我发誓不再见蕾蕾的面总可以了吧！祝福她永远永远爱你这个可怜的爸爸。”

毕云阶还不识趣：“你说话算数吗？”

顾方知：“当然。”

毕云阶跳上吉普车走了。

站在草丛中的顾方知却流出了眼泪，气愤、耻辱，还有对蕾蕾的依恋之情，把他的心都快搅碎了。

折磨，无尽无休的折磨，这种摧残人心的折磨，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

自愿跳“染缸”的人，有

向来没人问津的护林站小竹寮突然热闹起来。在疯人周菁失

踪和毕云阶的吉普车开走以后，傍晚时分，蕾蕾赶到了这里，她是步行了很长的一段路以后，才搭上了长途汽车。自然赶不上毕云阶的专用吉普车。

蕾蕾站在小石潭前，望着掩映在象牙芒果、檳棕和一片龙竹里的小房，仰头望望树冠，沐着夕阳余晖，正有一批迟归的蜜蜂振翅飞来，像一条不断头的流水线，漫过竹寮上方，飞进了林子。

她欣喜地乐了，这不是寻常田野所见的马蜂，一定是人工喂养的。看样子顾叔叔果真在这附近，说不定护林站小房就是他下榻的地方。

她踏着一半踏倒的野草，悄然来到小竹寮前，刚要张口叫门，猛听到屋中有人聊天，而且主题恰好涉及到她和妈妈，便不由自主地停住步子。

屋子里一片淡蓝色烟雾，常阿公在吸竹筒烟袋，整个嘴都堵在碗口粗的竹筒上，呼噜呼噜地吸着。屋子当中有一堆残灰。

一身猎人打扮的青年人手里拿着一张报纸，上面刊登着华序的大照片，还有介绍烈士生平的事迹。

他显然刚刚给两个老者读完这张报纸，慨叹地说：“好人不得好报，可惜她还扔下一个姑娘。”

一个老头说：“可惜华序的岁数了。”

常阿公说：“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人家华序有骨气。”

青年人说：“听说方才那个坐吉普车来的人是华序的丈夫，叫毕云阶，他来找顾方知干什么呢？”

常阿公说：“这里头有点说道。顾方知是个好人啊，昨天我回村里去，都哄扬开了。”

竹门轻轻推开，蕾蕾出现在门口。她环顾了一下屋子里的三个人问道：“对不起，我打听个人。”

小青年目不转睛地打量着蕾蕾，觉得这姑娘面熟，在哪里见过这个眉清目秀的姑娘了呢？啊，报纸！他拿起地上的报纸，稍加对照，立刻叫了起来：“你，你姓华，不，你姓毕，是华序烈士的女儿蕾蕾，对吗？”

两个老者也同时发现了这个秘密，都擦擦眼睛盯着她。

猜得真准，蕾蕾也出名了，人们不认识她，却在报纸上熟知了她的名字、经历。

常阿公挖着竹筒水烟袋，说：“坐吧，那里有小竹凳。姑娘，你叫阿公猜猜看：你也是来找顾方知的，对吧？”

“是呀！”蕾蕾又惊又喜，“你们认识他？他是不是在这附近放蜂？”

常阿公点点头：“这倒不错。离这儿不远，老顾常到小泉子这里来打水。一个村子里住着，谁手上长着几个茧子都知道，还能不认识？”

蕾蕾坐到小竹凳上，青年人给她倒了一杯酃茶，说：“天热，喝一点吧，这是自己弄的烘青土茶，去火开胃，能比得上上等毛峰，全是青茶叶子尖。”

蕾蕾得领受人家的好意，喝了一口，茶叶水苦得她直皱眉头。她说：“阿公，带我去找找他行吗？”

常阿公说：“世上肯雪中送炭的人少见啊，他是个好人。待会儿我带你去找他。不过，我先去通个风，他这个人有点怪毛病，不去打个招呼，他会不高兴的。”

在他们说这番话的时候，恰好顾方知提了个胶皮水桶来到看林小屋门外汲泉水，刚把水桶倾到泉水潭中，猛然被屋里的谈话声吸引了，他揭去防蜂面网，侧耳谛听。

竹棚里有人说：“怪不得你和报纸上的照片一模一样呢，原来你是她的女儿呀！”

另一个人的声音说：“这么说，你妈妈平反，是老顾四处奔

走弄成的？’

蕾蕾说话了，那声音多甜！他一听就听出来了：“是啊，世上没有比他再好的人了，他给别人的太多，他从来没要过别人什么。至今他自己还背着个‘刑满释放分子’的罪名呢。”

顾方知真想立刻推门进去，可是他走了两步又改变了主意。他眼前浮现出方才毕云阶那令人生厌的表情，因为痛苦，顾方知的脸都扭曲了。去见她吗？这孩子的心是向着自己的，她果然亲自来寻自己了。可是，那不是果真把她从毕云阶身边抢夺过来了吗？不管你有意还是无意，在客观上那都是不道德的。

不去见她吗？近在咫尺如隔天涯，对自己这颗孤寂的心不也是打击吗？太残酷了。啊，不要这么想，把苦果留给自己尝，把香瓜拿给别人吃，做人，应当是这样的。

他走开了，提着半桶水，向竹林深处走去，他觉得腿像没筋了似的，每一步都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蜜蜂仍然在头上盘旋，野花开得还是那么绚丽，这是多么好的一片自然蜂场啊！连蜜蜂都会留恋这地方的，你看，残阳已经坠到地平线下去了，还有一批蜜蜂从蜂房扁形出入口里爬出来，振翅飞去。

然而，他得离开这里去另辟蜜源。

他遗憾地望望这一切，放下胶皮水桶，从林阴底下牵出水牛，驾上轭具，他必须马上把蜂箱装上车运到别处去。

常阿公不知什么时候悄然来到顾方知背后，他穿的是软底靴子，走起路来一点声音都没有。

“怎么，又要走？”常阿公咂着嘴说，“这里的花开得多盛！山坳那一片荔枝花就够采半个月的了。”

顾方知低头拴着绳套，说：“南坳的花更盛。”

“你是不是有意躲呀？”看林老汉说穿了，“别人你躲，华序的女儿特地来看你，你都不想见吗？我知道你的心，心太善了。

名利都是身外之物，丢了都不可惜，可人心、情分，那可是金银财宝换不来的呀。”

这道理顾方知能不懂吗？常阿公一席话说得他阵阵心酸，泪珠儿噙里啪啦顺脸颊往下滚，他双手捧住头，坐了下去，他的心难受极了。

林子里黑得快，夜幕像一道弧形的黑纱幕，轻捷迅速地掩严了天穹，几个疏淡的星星从天体深处钻出来。

山泉水滴滴答答地落到水潭中，清脆悦耳，在寂静的夜晚，显得格外宏大。小竹棚前，常阿公点起了一堆篝火，长长的火苗被徐徐的晚风鼓荡着旋转升腾。

看林人小房的竹篱笆门半开着，常阿公不在，静悄悄的，蕾蕾一直在等顾方知，她太困顿了，坐在竹凳上靠着墙睡着了。

五彩斑斓的梦！

是白色的云朵从蔚蓝、深邃的夜空垂降下来了吗？不，那是妈妈，穿着一套婚礼服似的纱衣，肘弯挎着一只精巧的花篮，花篮里盛满绚丽的花。

降下来了，像散花的天女。

蕾蕾变小了，退回到童年的模样，她奔出竹棚子，张着一双小手，向妈妈扑过去：“妈妈，带我一起走吧，我要跟你去！”

华序嫣然一笑，她不是向蕾蕾招手吗？

蕾蕾跟踪妈妈的脚步跑去。不，腾空了，脚下生风，踩着岚雾般的祥云。

妈妈在干什么？是给女儿做路标吗？你看，她不断地伸手从花篮里抓出一把把鲜花，向身后撒去。真怪，那花篮里的花怎么总也撒不完呢？像漫天飘洒的雪花，坠落着，在蕾蕾脚下铺起一条花路，耀眼生辉。

梦里的人往往比现实要幸福。

你看，她的睡相多甜啊，那对笑窝在轻轻地颤抖。

顾方知轻手轻脚地走来了，披件棕绳蓑衣，拿一根赶车鞭子。他已经赶着牛车走了几里路了，又趑回来，他不能不看她一眼。

他把夹在腋下的一件褂子给她盖在膝上，晚风凉啊！

他不肯惊动她，蹲在蕾蕾跟前，久久地端详着，几次想伸手把粘在她脸颊上的一绺散发撩开，都怕惊醒她而罢手。

又是几年不见了，转眼间她长成了大姑娘，长得像华序脱个影。

这是蕾蕾吗？不，是华序。她双手抓着狱中的铁栏杆，在向 he 微笑。

他递上了一朵洁白的玉兰花，说了句什么？探监的人是不准多说话的，尤其与案情有关的话题。啊，他只是说了一句：“玉兰花开了。”

她懂了，心有灵犀一点通。她接过玉兰花凑到鼻子底下嗅了嗅，笑了。然后，把那朵花簪到乌云般的鬓角上。

每次监房里的会见，都是必须节约语言的，他们不得不把语言浓缩到最稠的程度。

镣铐丁丁当当，她走动，双手提着磨得锃亮像电镀的那一截，深沉地说：“谢谢你，再不要来了……为了你永远看得到鲜花盛开。”

他不理解，这句话的背后是什么呢？

但很快就明白了，他不久就同她一样，失去了自由，一堵又黑又高长满绿色苔藓地衣的厚墙，挡住了鲜花。

为什么被捕？不知道。为了替华序上访吗？并没有张贴标语，那是宪法条文允许的公民权利啊！

为什么要追问华序日记的下落呢？啊，是了，他是为这个被捕的，替反革命分子窝藏罪证。

不错，日记在他手里，但他不能交出去，那是在华序被捕的

时候，他替华序保存的。华序并不怕宣传自己的观点，但她要保存一点原始材料。

从哪个渠道泄露出去的消息呢？

除掉华序和顾方知，再没有第三个人知道藏匿日记的事情了，难道会是她自己供出来的吗？

可怕的抄家，连老鼠洞都会掘开看看的，日记本到了审判长的桌子上。顾方知悔恨交加，太傻了，干吗不把它埋在野外呢？他感到对不住华序。

毕竟查不出顾方知有什么其他反动言行，坐了半年牢，释放了。不是“无罪释放”，而是“就地监督改造”。

夹着行李卷出狱的那天，他一步三回头，多想见到华序啊！失望，她没有出来放风，她是住单监号的重犯，是中央文革挂号的人物，从一个月前起，就不同其他犯人一起放风了。

最后一面是哪一天？啊，清明节的前5天，天下着淅淅沥沥的春雨。他腋下夹着一个塑料包，里面包着他为华序做的白纱衣服。

这是诀别。要衣服的人正因为知道走到了生命尽头，她才要的。送衣服的人一点都不比她迟钝。

衣服被看守拿走了，几个看守抖开了纱衣，都忍不住大笑起来。能不笑吗？这太浪漫了，他们眼里的这一男一女，一定都是精神分裂症患者。

她说什么了？啊，她说：“衣服我是穿不着的，但我又看到了最洁净的颜色，谢谢你。我没有什么要说的了，我是值得的，我为什么而死？为思考而死。将来，总要有有人思考一下，为什么思考是一种犯罪，那我就心满意足了。你是一个厚道的人，希望你不要为世俗而熏染，万人皆醉我独醒，这是一种痛苦，然而也是一种享受。我相信，中国的未来是光明的，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民族，一个修筑过万里长城的民族，会沉沦下去吗？

不，不会，历史的倒退只能是暂时的，我见不到明天，不等于明天不会到来。”

一个思想解放先驱的宣言，掷地如金石声！

她没有重申孩子托付给自己的夙愿，不是忘记了，是不必要再谈的，从前不是交代过了吗？

那是在干校简陋的宿舍里。

顾方知同华序不是一个连队，但属于一个区队。那天中午他赶着一群水牛回来，看见华序门前围了好些人，有干部，也有当地的农民，都在窃窃私语。

出了什么事吗？

他把牛群赶进牛棚，挤了过去。

啊，是华序出事了。她像平素一样开朗、安静，坐在一张木椅上，戴着手铐的双手放在膝上。

几个公安人员和干校的人在搜查她的箱子、书架，无疑在查找反革命证据。翻得最认真的是陆霜青，他那张娃娃脸比任何时候都严肃，几乎是一页一页地查看着书架上的书。

闲杂人等是不能随便进入的，顾方知被视为闲杂人等之列。但是他拨开拥在门口的人群挤了进去，像回他自己的家。

一个公安人员发现了他：“你是干什么的？”

顾方知说：“五七干校三区队放牛的。”

公安人员低声而严厉地说：“请你出去。”

顾方知没有理睬，径直走到华序跟前去，问道：“你，要走了？”

华序像要出远门那样安静，只是表情上未免有点依恋，她淡淡地一笑说：“早料到了的——只是没有想到会这么快。这回，有时间好好想一想了。这些年静下心来动脑筋的机会太少了。”

想一想，指的是什么，顾方知清楚。前几天，她把曾给女友周菁看过的那份材料拿去跟顾方知探讨过。顾方知又惊又喜地发

现，表面看去活泼天真的华序，内心是那么深沉。他说：“你的观点我赞成。其实，好多人都对这场革命画过问号了，只不过朦朦胧胧，没有形成系统，或者说不敢亮出来。你给毕云阶看过了吗？”

当时华序只是轻描淡写地说：“给他看？还不把他吓出神经病来？”

顾方知不能不替她捏一把汗，他分析说：“万一这份材料寄不到主席手里、总理手里，落到文革那几个人手中，你意识到后果了吗？”

华序说：“一式几份，本来要给他们看的，共产党人还怕阐明自己的观点吗？”

“你是不是太乐观了？”顾方知对她说，“第一个说地球是圆的人，落了个被火烧死的下场。”

华序说：“最后证明地球是圆的，地球在运转！我并不乐观。我可能因此而坐牢，如果这算一种追求真理的代价，总得有人去付的，那就从我这开始好了。”

应验了！现在不是从华序开始了吗？一个共产党员上书给他的中央机关，材料还没来得及装到邮筒里去，她就被铐起了双手！

顾方知问她：“有什么事要我办吗？除了……那件事？”

他指的“那件事”，彼此心照不宣，他手里有华序那份上书的副本，他答应过她，一旦她出了事或者万一中央接不到，他将再次付寄，直到有反响为止。现在，这任务果然要由他来完成。

华序相信他不会食言，她是放心的。想了一会儿，她才说：“我……把蕾蕾托付给你了，我希望她理解妈妈……”

言语不多，顾方知全都明白这几句话的含义，他深沉地点了点头。

陆霜青查到了几本华序的笔记，同公安人员咬耳朵说着什么，笔记本被当作什么物证收起来了。

华序的眼睛一直望着窗外，像在等待什么。等她的丈夫吗？不，丈夫不会来了。她提出过这个要求，希望临行前同他说几句话，请他谅解，请他照顾孩子。

他没有来，根本不会来了。方才区队长走进来对华序说：“不要等了。方才我到水田里找到你丈夫了。他宣布同你彻底划清界限，绝不来见你。你如果有什么话，向我说好了，我替你转达。”

即或曾经预料到的事情，一旦真的变成现实，仍然有它与预料不同的效果。华序眼里含着泪水。但她努力控制着自己，泪水到底没有流下来。她要人家转达什么呢？一句都不需要。

孩子，她是坚持要见一面的。

区队长尽量同公安人员周旋、商量，同意再等一小会儿。

顾方知听说，周菁到野外去找蕾蕾了，孩子同几个当地农村的新伙伴去抓大蝴蝶没有回来。

毕云阶不来，谁给华序捆行李送行呢？这地方交通很闭塞，要在沼泽地垫起的土路走上5里路，才能到达江边，公安局的吉普车停在大江对岸。

难道可以劳动公安人员替华序背行李卷吗？

当区队长感到难以派人干这差事，决定改天有便车捎去时，顾方知走到华序床边，说：“我来吧。”

声调平静，像是干一件理应由他干的事情那么自然。

在场的人都愣了一下，但这不违反什么现行规定，只好由他。

门外的围观者却议论开了。有人说顾方知太傻，别人躲还躲不及，他却往染缸里跳。也有人说顾方知心眼儿好。

他的举动是立竿见影的，公安人员把陆霜青拉到角落去问：

“这人叫什么？同华序什么关系？”

陆霜青回答说：“他叫顾方知，生物研究所的书呆子，一个糊涂得不能再糊涂的人物。半个月前，一个走资派受了点刑，心脏病犯了，半夜死掉，谁都不肯去抬尸。他呢，据说他根本不认识那个死掉的文化局长，却一声不吭地在野外掘了个坑，给死人净了脸，用手推车推出去埋了。政治上的白痴！他还可能自以为学雷锋呢，哈哈哈哈哈……”

陆霜青越说声越大，连顾方知本人都听见了。

陆霜青的话，本意是要贬斥一下顾方知，却起到了另外的作用，暂时开脱了顾方知，公安人员不再注意他了，不过是一个糊涂蛋罢了。

顾方知乐得装聋作哑。他在替华序捆行李的时候，从褥子底下摸到了几本硬硬的东西，他像触了电一样，没有动。华序一直盯着他，这时向他投了一瞥暗示。

顾方知明白了那无声的要求。他趁人不备，把那几本日记掖到了怀里。

他看见，华序的眼睛里露出了别人无法觉察的深情。

蕾蕾没有来，公安人员一再催促起身，华序站了起来。

她向原野远处望了一眼，回头对顾方知说：“我上衣口袋里有一把野草莓，是给蕾蕾采的，替我交给孩子吧。”

这一次，她的眼泪流了下来，她是人，是母亲啊。

顾方知征得了押解人员的同意，从她的衣袋里掏出一大把红艳艳的草莓果。他感到她的一颗心在跳，她的心胸是火热的。

华序头也不回地跨出屋门。

一条多么崎岖难行的小路啊！这里原来是一片水鸭子的领地，到处是白茫茫的水、乱蓬蓬的硬秆芦苇。既然越是艰苦、越是原始的劳动，越是能改造人，所以这里就被选择干校地址的革命派们一眼看中了。于是省直机关和文化、科研系统 1 000 多名

干部和“臭老九”们被驱赶到这里，在深水里挖掘臭泥，垫起了这条五华里长的土路。

没有雨，这是旱季，路上的浮土能没鞋帮，灰尘呛人嗓子。

华序在这条土路上走着，像平时走向田野一样，只不过频频回首，她总抱有一线希望，在走到江边以前见到女儿。

在她身后二十几步开外，走着顾方知，他替华序夹着行李卷。

啊，风吹草摇，零星的野花俯仰高低。她是喜欢铺花草径的，她走过去的路，却是坎坷的。

顾方知突然想起了一首歌，那是华序最喜欢哼的，调子还在其次，顾方知特别喜欢那两段歌词，他曾经问过华序，这是一首流行歌曲吗？词作者是哪一位？华序笑了，词曲作者就是她自己。

诗言志，不错的，那首歌不是华序心声的表露吗？

顾方知是五音不全的人，否则，他真想唱起来为她壮行色。他唱不出来，那歌儿是他在心里默默唱的：

寻觅，寻觅，
北面谢了南面继。
寂寞开，悄悄去，
你与春天不离弃。
赶走严寒唤春雨，
留给人间是春意。
啊，
问君何所求？
莫非是，
挽住春光永不去？

寻觅，寻觅，
飞到东来飞到西。
采花蜜，越万里，
只有蜂儿是知己。
留得辛酸自己尝，
留给人间是甜蜜。
啊，
你寻找什么？
莫非是，
追踪鲜花是目的？

啊，华序站住了，她在回眸凝望。莫非她听见了那心中的歌？

不是，身后正有一个小女孩稚声稚气的呼唤传来：“妈妈！妈妈——”

她猛地回过头去，是蕾蕾。她张着两只小手，光着小脚丫，撕心裂肺地喊着，追上来了。

顾方知扔下行李去迎接蕾蕾，孩子在奔跑，他也在奔跑。为了争夺母女相见的机会。

迟了。当顾方知背着哀哀啼哭的孩子赶回来时，发现他撂在土路上的行李不见了，押解人员正把华序押上一艘尖头渡船。她还在挥手，是逆风，听不到她的呼喊，但肯定在呼叫女儿的名字。

待他背着小女孩赶到江滩时，小渡船已经快划到对岸，只看得见华序的身影坐在小舟上。

孩子扑在沙滩上大哭起来。

顾方知从兜里掏出那把草莓，递给孩子，这是妈妈最后的心意，它能弥合孩子心灵上的创伤吗？

篝火一闪一闪，从小竹棚敞开的门照射进来，照着蕾蕾好看的脸庞。

长大了，她长大了，像她的妈妈，不然毕云阶会向自己来下最后通牒吗？

做出这样的判断以后，顾方知心安了，他得走了，他没有勇气叫醒孩子，他怕见到蕾蕾的眼泪。她的眼泪流得还不够吗？她应当开始没有眼泪的生活了。

走吧，掩上房门远远地走开吧！

不，不能这样走。

他轻轻取下了盖在蕾蕾身上的那件衣服。

这是不能留下的，那等于说留下了自己的心，留下了自己的爱，留下了感情的伏笔，既来了又不见，那对孩子的打击不是更大了吗？

走吧，赶上牛车，可以去走自己的路了……

省委书记也是人

一滴滴透明的泉水从水岩的石缝里冒出来，滴到一个脸盆大小的石潭里，发出弹拨琴弦铿锵的声音。小石潭的水面一刻都没静止过，漾出层层浪环，漂浮着几片落花。

守林人常阿公半躺半坐在竹棚前假寝，几只粉蝶围着潭水翩翩飞舞。

一阵汽车喇叭声打破了这里的宁静。蒙了一层灰尘的黑色上海牌轿车在距离小石潭 50 步的小路上停住了。

司机下来用鸡毛掸子掸车，省委书记胡浩背起手向守林人走来，趟了两腿露水。

悦耳的汽车喇叭声唤醒了常阿公。他习惯地摸起竹筒水烟袋，半眯着眼睛望去，他看见了上海牌轿车。

又是来找顾方知的！而且这个人物更大，肯定这车子比毕云阶的吉普车舒服。常阿公这样想着。唉，顾方知这人也是够乖僻的了，何苦躲着呢？别人还巴不得捞到这种好事呢。

山里人不识官也不惧官。常阿公仿佛没看见渐渐走近的胡浩，只管摸出一撮土烟末按到竹筒上的小烟锅里，点着火。嘴堵在竹筒上，咕噜噜一阵响，这才抬起脸来，从鼻孔喷出两股浓烟。

胡浩站在他面前，见他吸水烟这种庄严劲，忍不住笑了，伸手从中山服口袋里摸出一包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出品的双喜牌烟，抽出一支放到常阿公膝头上，说：“吸一支这个试试。”

常阿公也不客气，把香烟拿起来在鼻子底下嗅嗅，夹到耳朵后，又连着吸了两口水烟，这才带理不理地问道：“是找顾方知的，没错吧？”

胡浩蹲下身，自己点燃一支烟，吸着说：“你怎么猜得这样准？”

常阿公说：“你们干吗走马灯似的找他呢？”

胡浩很敏感，问道：“一个女孩子过来了？”

常阿公说：“她也不是打头的。昨天，最先来找的是华序的丈夫，好像姓毕吧。”

胡浩皱起了眉头。蕾蕾来找顾方知，他不但知道，而且是理解的。他却万万没有想到毕云阶也悄悄下来了。他来干什么呢？是因为感到对不住顾方知来致谢？还是来请顾方知去参加华序的追悼会？假如是这样，他为什么对自己只字不露呢？没有隐瞒的必要啊！

于是胡浩问道：“见到老顾了吗？”

常阿公说：“姓毕的倒是见了，也谈了，好像谈得不投机，一个是越躲越远，一个是赌气开车回城了。因为这个，连女孩子都没见到老顾呢。”

“顾方知又从这里走了？”胡浩急切地问道，“他往什么地方去了？”

常阿公从耳朵上取下香烟，在手里摆弄着说：“何苦呢！干什么事，非得周瑜打黄盖才成啊。我劝你们都死了心算了。其实，难得老顾这一片心，大伙成全他算了。世上不愿往自个脸上搽胭脂的人不多啊！”

胡浩叹了口气，正要再细问，搓着油污棉纱的司机小刘凑了过来，一指胡浩说：“别东拉西扯了，快点告诉我们算了，他可是省委……”

下面的官衔还没有说出口，胡浩回手在他腿上狠狠拧了一把，有意制止他说下去。

常阿公早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他不明白这官老头儿为什么不让开车的亮他的官级？但却因为这一动作，对胡浩产生了好感。官衔不是管用吗？公社一个小小的副书记每逢打电话，都先报字号“我是刘副书记”呢。

所以，常阿公说：“他奔百草坪去了，离这里二十多里路，你们有车，能追上的。”说完，站起来指了指路。

胡浩谢过了看林人，对司机说：“来，咱们吃点东西，稍稍休息一下。知道了方向，就等于成功了一半。”

司机小刘从货箱里拿出两听午餐肉、豆汁凤尾鱼，还有一包蛋卷点心，来到小水潭前，一边开罐头一边埋怨说：“这个姓顾的有什么了不起，东躲西闪，好大的架子！有什么事，给他们县委挂个电话，叫他们把姓顾的叫到省里去，不就完了？”

胡浩坐在清水潭边，深情地说：“你说哪儿去了！这正是顾方知值得人们尊敬的地方，凭良心做着一切，不居功，不伸手要任何待遇，这样的同志不多啊！”

司机叉了一块粉红色的午餐肉递给胡浩，说：“值得胡书记这样看重的人，看来一定不简单了！”

胡浩吃了一口午餐肉，说：“不错。你不如他，我也不如他。”

“你不如他？”不知是出于巴结领导的习惯，还是由于觉得省委书记必然是全省天字第一号的人物，小刘停止了咀嚼，瞪着眼睛说：“我不信，吹得太神乎了吧？”

“真的。”胡浩认真地说，“我如果处在他那种地步，没有勇气像他那样为烈士四处奔走。大概也不会有他今天这种品德。啊，我想起了一句话，是什么人说的，可能是一个大文人吧：‘死者的丰碑，给人类以伟大的装饰。’现在，有多少人争先恐后地写文章纪念华序，主流当然是好的，可抬别人的同时，不一定没有同时抬自己的私心。不比，是看不出上下高低的。”

司机小刘更为惊诧了：“在全省广播大会上，您不是也称那些发言的人是华序的好同志、好战友吗？”

胡浩觉得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可以使这个头脑简单的司机开窍的。想了一下，说：“是的，他们都是好同志，有缺点的人也可以称好同志。就拿我来说，也可以说是好同志吧！可我也有缺点，有过苦闷，有过动摇，甚至……”他没有再说下去，放下了手里的点心，脸上现出痛苦的表情。

司机简直糊涂了。在他的印象中，胡浩永远是乐观的、正确的、果决的，胡浩还有深沉、伤感和自我谴责这一面，那是他不能想像的。

胡浩的食欲一点都没有了，司机小刘草草地填饱了肚子，待在缄默无语的书记跟前怪别扭的，悄悄躲到汽车里去听收音机播相声。相声对他来说，是高于一切的、给他带来乐趣的惟一艺术。

胡浩坐在清水潭前，望着倒映在水潭里的影子，显得苍老。他不愿看自己这副尊容，有意伸手去掬一捧水起来，借以破坏水面的宁静。因为他的心是静不下来的。

他刚要舀起清冽的水喝点，突然砰地一声响，一团烂草根、烂树叶子飞到水里，水一下子变得浑浊起来。

胡浩四顾张望，没有发现什么，就伸手捞出那些脏叶子，待泉水澄清以后，又一次去捧水。

“砰！”又是一声响，更大的一团腐叶烂泥落到水潭中，溅起的污水点子弄了他满脸。

他有点愠怒了，肯定有人在搞恶作剧。他站起身一望，吓了一跳！

在他身后不远，在一棵贝叶棕大叶子底下，站着一个人披散着头发、穿着精神病院休养服的女人，手里拿着一团污泥烂草，正无声地傻笑呢！

天哪！那不是妻子周菁吗？怪不得病院的人找了两天不见她的踪影，原来她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了！

爱怜的感情很快驱走了涌上心来的好笑和好气。胡浩像怕惊走了猎物的猎人那样，轻轻地从贝叶棕后面绕过去，突然间出现在周菁的面前，使她没有逃走的机会。

周菁没有逃走的意思，她扔掉了手上的烂叶子，在休养服上蹭蹭，一双凹陷下去的眼睛盯视着丈夫，像陌路人一样。

“周菁，”胡浩抓住她的胳膊，拿出自己的手帕，替她擦着手，说：“你怎么又犯纪律了？跑出这么远，怎么不告诉医生一声？”

周菁没有挣脱，她说：“他们坏，不准我出院。我的病早好了。你也瞒着我，华序平反了，为什么不告诉我？我和她是朋友你不知道？我有对不住她的地方，你不知道？”

胡浩差点惊喜地喊起来。谁说她精神失常？这几句话不是再正常不过了吗？

胡浩紧紧地抓住她的手，说：“你听我说，我们正要去向你报喜呢，开华序的追悼会能瞒你吗？你的病好了，这不是更高兴

的事吗？走，咱们上车回家去！”

周菁甩脱胡浩的手，从草丛中拾起一个编得又粗糙、又俗气的特大花环，说：“我不能跟你走，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呢。华序叫我去参加她的追悼会，她要的花环是罂粟花编的。可是我找不到罂粟花呀！你说，我是不是缺乏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你说，我是不是得狠斗私字一闪念？”

胡浩脸上的兴奋表情一扫而光。她又说起了疯话。

胡浩打算去喊司机，两个人才有可能制服她，把她押到车里去。

疯子似乎看透了胡浩的用意，向林子里一钻，没影了。

胡浩随后钻进竹林，寻了好久，没有找见，这才气喘吁吁地钻出来，揩了一把热汗，顺势跌坐到那棵贝叶棕下。

疯女人疯了9个年头，成了胡浩最大的精神负担。他能不知道她精神失常的原因吗？他只能怪周菁心胸太狭窄了，他凭经验得出结论，凡是得精神病的人都是气度小、过于偏狭的人，她所遭的罪抵得上自己的百分之一吗？

胡浩即使在重新当了省委书记以后，也严格恪守从前的习惯，每周六拿上水果去探望她一次，有时一个人去，有时带着上大学的儿子同去，从没叫别人代劳过。

当然，他总是心情阴郁地走出精神病院，赶快用工作的担子压住自己才能逃开精神的磨难。据医生讲，周菁是属于抑郁型的，比亢奋型的更难治愈。还有人断定，周菁可能要在精神病院一直住到死。

注定了晚年没有幸福的家庭，这已经够使胡浩伤心的了。当他想起周菁得病的原因时，更有一股悔恨自己的浪潮在袭击心房。

有几个下级提议胡浩再找一个老伴，理由是为了照顾胡书记的身体，以利工作，名正言顺。

胡浩火了，把他们训斥了一顿：“你们真说得出口，抛弃疯老婆不违反道德吗？”

这一骂，从此耳根清静，这种建议此后石沉大海。也因为这一骂，他博得了机关许多人的称道。是啊，在生活和作风上面，人们历来是挑不出胡浩一点瑕疵的。

胡浩确实太不幸了。

他太疲倦了，躺到了绿草地上。

为了救华序，他曾经暗示过华序装疯，却没有想到，自己的老婆倒是疯了。

周菁是感到对不起华序才疯的，自己是否也有对不起华序的地方呢？

华序是自己的秘书，应当说对她的一切思想意识，是了如指掌的，她历来有一股与众不同的思想，难道这就是她成为过去的“反革命”、今天的英雄的因素吗？

她和周菁完全是两种人。周菁从来不肯做一点引人注目的事情，她胆子小、谨慎。在机关支部生活会上，她会为了儿子误用了公家的信封而检讨自己的“公私不分”，能说周菁不好吗？

那么华序不好吗？

她在胡浩面前一出现，就是带有某种不同凡响和调皮神情的。

胡浩从北京开中央工作会议回来，刚下飞机，就来到了机关办公室。他打算把北戴河会议的重要精神马上传达给省委常委们。

他的办公室门半掩着。是谁在屋子里呢？莫非新来的秘书到任了吗？他去北京开会前，听说要给他新派一个刚从北京某大学毕业的学生当秘书。

胡浩轻轻推开了门，果然有一个穿一身白衣服的姑娘坐在外间秘书办公桌前，案卷在桌上堆积如山。

这个打扮得出众的姑娘会是省委书记的秘书？见鬼，办公厅主任是给我选演员吗？

胡浩把皮包重重地放到茶几上，意在引起专心致志的华序注意。

华序果然抬起头，笑盈盈地站了起来。

胡浩故意皱起眉头问：“你找谁？”

华序倚在桌子角上，浅浅一笑，露出一对调皮的笑窝，说：“找我的办公桌——假如你欢迎的话。”

“这么说，你就是新来的秘书了？”胡浩挂起大衣，声调里明显地带几分不悦。

华序说：“是的，秘书华序，春华秋实的华，井然有序的序。”

胡浩说：“好吧，欢迎。”可那口气，实在太勉强了。

华序又调皮地笑了：“看来，第一印象并不好。那怎么办呢？我的专业是文学，可不是秘书专业。”

胡浩差点被她的调皮逗笑了。他点上一支烟，用研究古董似的目光打量着白天使一样的华序。

华序真是个精明人，她早注意到了省委书记的目光焦点，自己抖了抖白裙子，微笑地说：“研究我的穿戴吗？我看，蒋介石也是穿中山服的，可他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

调皮！多么调皮而俏皮的语言！

是讨厌她呢？还是喜欢她？喜欢胜过讨厌。她还是个孩子嘛！当然不可苛求，难道可以因为她的衣着特殊一点就把她退回去吗？

胡浩到底被她逗乐了，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这是省委机关，即或衣着外表，都不能太刺眼。我可是挺厉害的，不信你问问小鬼们，咱把丑话说在前头。好了，你把这些人民来信处理一下。”说罢给她捧来一摞积压的信件。

华序把信件摊放到桌子上，随手拣视着问：“怎样处理？”

胡浩说：“登记，造册。”

华序瞥了他一眼：“只是造册？”

胡浩说：“你真会问！我倒成了你的秘书？这不是有规定的吗？”

华序说：“规定我懂，分门别类，把信件分别转送给各有关部门、室、厅局，大事完毕。可是，这些人民来信是直接寄给省委书记胡浩同志的，寄信人并非不知道还有主管部门。这种处理办法，除了养成省委领导同志的官僚主义而外，还有什么好处呢？”

好家伙，来下马威了！胡浩不能再以貌取人、小看她了。

胡浩满意地斜了她一眼：“依你呢，怎么办？”

华序说：“我可以代阅，不能代转、代批，您拿出具体处理意见，我到各有关部门去督办，您还得了解处理结果。”

“这当然是上策。”胡浩为难地说，“不过，难度太大，你刚来不清楚。人民来信会压得你喘不过气来的，到那时怕你就一推六二五了。”

“忙，这个理由不成立。”华序一本正经地说，“什么时候能放省委书记两个月长假吗？您在北戴河疗养，不还有一架专用电话处理家里的重大事情吗？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那样空前严峻的日子里，还坚持每星期六接待包括富农在内的来访群众呢。何况，据我所知，有些干部还有不算少的串门儿的时间呢。”

胡浩被她再次说笑了：“好厉害，给我上了一堂传统教育课。好吧，按你说的办。”

事实证明，华序是个得心应手的秘书，她常常按图索骥追到基层去。她被胡浩称为“上拄天下拄地”的人物，经常为他顺利地解决了不少棘手的问题。不过，他也得承认，跟前有这么个秘书，想偷懒是办不到的，她甚至在星期天也为书记安排好了深入工厂、学校去的日程，胡浩也确实因为这个颇得好评呢。

这样一个作风朴实、工作深入的干部会站到反对中央的立场上去吗？当然，人是可变的，可总得有变化的因子啊！胡浩几年来一直不肯相信华序会变坏。可是白纸黑字，写着她许多叫人瞠目结舌的言论，特别是她入狱以后，更甚于前，竟然把“供词”当成她宣扬观点的宣言。她的全部卷宗胡浩看过，他头疼了，想维护她都实在是困难的，但是她又是有理论根据的……是啊，公安六条上明文规定，反对中央文革就是现行反革命。她呢，何止是反对中央文革，对整个的这场大革命都持否定态度！

躺在贝叶棕树阴下，胡浩冷丁记起了三国时代曹植的两句诗：“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那是曹植哀叹自己手中无权，眼看挚友身陷囹圄却不能救援而发出的苦恼的叹息。

对于华序，他未尝没有过曹植之叹。但他对华序的言论的认识又是矛盾的。那些事，他何尝没有想过，然而那又是可怕的。当初他也曾认为华序的思想“反动”。

胡浩是个有头脑的人，有理论修养，有党性，而且还有丰富的感情。他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几十年来，他跟着党在枪林弹雨中穿过来了；他又踏着一系列运动的浪头走过来了。他是佼佼者。但是，他自己明白，他也曾犯过这样和那样的错误。然而这错误又常常是他和党一起犯的，对于他个人似乎并没有什么损失。所以，有些下级把他看成是党的化身，开始他觉得别扭，时间长了，也就习以为常。这正像他把高一级的领导的话当成党的指示一样正常。

小小的华序，居然要否定“史无前例”的一场运动，得了吗？

那么，对于这场特殊的运动，胡浩是怎么看呢？这有一个过程：开始他不理解，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生产关系改变以后，是应该很好地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正是这样主张的。以后逐渐发生了变化……那是对形势的认识

发生了变化，不能忘记阶级斗争；可是他无论如何也弄不通这阶级斗争，怎么会斗到自己的头上来……共产党员不应该想到自己，这大概就是有私心！那么不理解的只有在执行中加深理解了……他看到刘少奇、邓小平都被打倒了，陈老师，贺老师也都不行了，当权派绝大多数都被打倒或靠边站了，自己还有什么说的呢？当他被关进牛棚，后来又被送进干校，他有更多的时间思考过去来不及思考的问题了，思想上出现了反复。这时，他自然想到了华序，难道她提出的那些观点，不值得每一个共产党员认真思索吗？

从私人感情上讲，胡浩又多么惋惜华序太缺乏斗争经验啊！他和她完全是两种性格不同的人。她的与众不同，她的“错误”不是同党一起犯的。就因为这样才显得那么突出吗？

胡浩在进入“三结合”的1969年，干了一件给自己的良心留下墨点的事。那回突然被新省委的人把他从干校弄回城里，迅雷不及掩耳地塞到班子里当副书记，确实带有戏剧性。等到他一年后再次下台住牛棚以后才弄清楚，他的起落都是借了中央一个老首长的光。

他去探过监，找华序长谈过，正面教育她、批驳她的错误思想，启发她洗心革面，当时，他认为只能这么做。他不主管公检法，但别人告诉他，怀疑华序把日记毁掉了，据说那更恶毒。

胡浩认为动员她交出日记对她可能有利。

由于对胡浩的了解和信任，那天，华序非但没有被胡浩的劝导打动，反倒滔滔不绝地重申了她那使人震惊的理论，并且劝胡浩“用自己的思维”，鼓励他“向中央反映”。这场谈话使胡浩既惋惜又沉重。

但收获也是有的，她无意间透露出她的日记收藏在顾方知那里。

这个重要情况报告不报告呢？几乎是一整夜的辗转反侧，党

性终于战胜了感情，胡浩向公安局的办案人谈了。

于是导致顾方知的被捕。

如果有人出来指责胡浩出卖了同志，出卖了下级，胡浩是可以大义凛然地为自己申辩的，在公理的法庭上，他是无罪的。

最恼人的是每个人都有一个良心的法庭，它是半点不饶人的。

胡浩一生是光明磊落的，一步俩脚印，即或在艰苦的战争年月，都没有过劣迹、污点。

这一次算不算污点呢？既然你此时承认华序是一位了不起的共产主义战士，你就得承认，你对她的死，有过助纣为虐的一臂之力，没有人去考究和原谅你当时的动机。你不是常用动机与效果统一论来衡量别人吗？

他每次想到这一节，就感到恶心，像吃过一桌丰美的佳肴，最后送到嘴里的一口菜，却夹着一只苍蝇，讨厌、败胃口，大煞风景。

有一次他闲着没事，翻着一本旧诗集，发现了一首古诗，其中有两句好像是写他的：“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一个人能保持晚节，闭上眼之前一点内疚都没有，实在不大容易。

有时夜里失眠，胡浩常常胡思乱想，若能有一个挽回的机会该有多好啊！但是没有。

世间有多少事情往往是不按照人的愿望发展的。不仅如此，还常常会走向反面。那动乱的十年，不就是这样吗？自己没有认识的事情，跟着干了，另当别论；可是明明认为不对，或存在很大的怀疑，还是干了，那痛苦和懊悔是最深了。

正因为这样，他才加倍地感到内疚——人的内疚，而不是责任心的内疚。

每当夜暗包围他的时候，他总是看到华序那双明亮的眼睛！华序既然知道这件事的始末，顾方知会蒙在鼓里吗？何况他又正

是因为此事坐牢。

权衡起来，对胡浩心灵威胁最大的还是顾方知，他活着。死去的，就丢失了哪怕微小的辩护能力，死者自己盖棺论定了，她同别人的一切交往史也翻完了最后一页。那么活着的人呢？

这是他急于找到顾方知的真正目的。卑鄙吗？自私吗？企图永远掩盖自己的劣迹吗？

胡浩不得不承认，在良心的法庭上，他是有愧的；但在公众舆论的法庭上，自己必须维护自己的尊严，一个支持华序的老上级的尊严。

胡浩一生最讨厌那些心怀鬼胎的人，可你自己现在不是怀着鬼胎吗？

天真热，简直像酷暑。热汗像小溪一样在身上流着，有如蚂蚁在身上爬一样难过。

他从草地上直起腰来，解开扣子，手突然触到了内衣口袋里的东西，他触电般地缩回手来。这是什么？鬼胎！你干吗要带在身上呢？

胡浩抖抖地掏出来，那是一沓 64 开有格的道林纸，写满了字，是从华序的日记本里扯下来的。

为什么干这种缺德事呢？蕾蕾在看她妈妈日记的时候，会觉察不到日记有缺页的痕迹吗？她会怎么想？她会不会骂扯日记的人太阴损呢？

应当骂的。胡浩的脸一阵阵发烧，心头却一阵阵紧缩发冷，害了寒热症一般。

假如当初把陆霜青叫来训斥一顿，那多光明正大！可你没有那样做，陆霜青会通过这件事一下子洞穿你的五脏六腑的，啊，讨厌！

那天一早刚上班，陆霜青就溜进了他的办公室，把一个专门用来封缄绝密公文的信袋放在桌上，往胡浩眼皮底下推了推，用

意不明地一笑走了。如此大胆，如此放肆，好像是两个走私的朋友在交换赃物，胡浩心中很是不悦，盯着陆霜青的背影狠狠地瞪了一眼。及至他慢条斯理地打开信袋，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那几张纸，他的心忽地沉下去了，像坠入无底深渊。

天哪！这几页日记，全是华序涉及到胡浩同她狱中谈话和事后怀疑他出卖顾方知的记述。

胡浩很快发现，陆霜青不仅仅撕掉了这几页，他还撕去了涉及对他评价的部分。

应当感谢陆霜青吗？是啊，可以解释为“爱护首长的名誉”，也可以解释为“不让不利于团结的流言扩散出去”。

胡浩容忍了、默许了，也许还自以为此事会包得天衣无缝。是啊，陆霜青会自己把自己卖出去吗？

然而，事后他后悔了。

胡浩惊异地发现，干了这件事以后，心头的重压反比从前加剧，恰恰不是减轻！他时刻都在责骂自己，以为自己是在卑污中做人。

烧掉它吧，事已至此，还能再把这几页耻辱的纸片重新贴到华序的日记本上去吗？

是火柴发潮，还是他的手发抖呢？闹不明白。他一直划了几根火柴，都没有划着。直到第八根，总算燃起了绿色的火苗。

他愣愣地捏着火柴杆，竟然忘了点纸片，又白划了一根。

火光闪烁！火苗在他手上蹿起来，他看见，从他手上飞起几片白蝴蝶般的纸灰，透明，好看。啊，怎么烧不尽呢？纸烧成了灰，华序那娟秀的字迹仍然看得清清楚楚。

伸出手去抓，抓不住，纸片飘飘悠悠地上了太空。

一双眼睛盯着自己，啊，华序的眼睛！

“你真卑劣！时至今日，还要包住自己的痛疽，也因此包住了别人的痛疽，你够一个共产党员吗？”

这是谁在训斥自己？华序吗？顾方知吗？

茫然四顾，只有风声。

火柴和纸片还在他手里，方才的幻觉吓了他一头冷汗。

不，不能烧掉。

烧掉还不会心静，相反倒会更加沉重。像得了麻疹的人硬吃凉药退烧一样，不但不能去病，反倒引起毒火归心，危及生命。

那样做，陆霜青会嘲笑自己的，那是他的阴谋得逞！

从这件事看，陆霜青绝不是用“幼稚”和“出风头”所能概括得了的，他是一个很会耍权术的巧伪人。

可怕，险些上当。假如你连自己承认过失的勇气都没有，你还有胆量清除陆霜青这种隐患吗？

他在内心里对自己发问：你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吗？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不是无所畏惧的吗？

你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吗？

几十年来，他用这话多次问过别人，问过那些犯了过失的同志，惟独从来没有问过自己。那是因为他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从走到革命队伍那一天起，心灵就像一块水晶，坚实、透明，不含一点杂质。

想烧日记算不算文过饰非呢？

仍然让陆霜青占据着关键岗位给自己脸上贴金，算不算对人民的失职？

不，为了良心，为了死去的烈士，为了一个共产党员面对镰刀斧头红旗的誓言，应当勇于承认，透明的水晶里掺进了杂质，需要提纯！

补救的办法是有的，去找顾方知，向他交心、检讨、赔罪，请他原谅。这也许是除了华序以外，惟一可以使自己赎罪的人了。当然要向组织汇报。这时，他早已经把安抚顾方知、防止他泄露天机的本意忘得一干二净了。

顿时，他感到心头欠了一条缝，头脑冷静了许多。

路旁响起了汽车的声音。

他以为是司机小刘催他上路，抬头一看，是一辆绿色吉普车，车前插着红色三角旗，他意识到是公安局的车，站起身来迎过去。

来人是公安局局长，胡浩的老部下，叫刘宁，去年才从监狱放出来重新工作。

胡浩问道：“你来这儿干什么？”

刘宁说：“专程来找你，出了点麻烦事，向你汇报。”

胡浩问道：“华序的日记被人撕去了页码，是不是？”

刘宁有些惊奇：“你怎么一下子就猜到这上去了？”

“因为有一部分在我手里。”说罢，从口袋里掏出那些日记，说：“这是陆霜青交给我的，你拿去补上。人生的历史，都是写过的了，撕不下来的。”

刘宁深为感动，他说：“今天上午我们把宣传部借去的卷宗要回来了。陆霜青不愿还，最后还是勉强交出来了。日记短缺的事我们还不知道，因为日记还在蕾蕾手里。但是我们有所担心。”

胡浩问：“这样说，问题比撕日记还要严重？”

“是的。”刘宁说，“六本卷宗中的十几份材料被他抽出去，重新换了页子，是伪造的新材料。这对烈士的平反本身是没有什么的，陆霜青不过是要把自己的丑恶嘴脸掩盖起来，把自己打扮成华序的战友。”

胡浩问：“你们怎么想到要查对的？事前就怀疑他了吗？”

刘宁说：“陆霜青自以为很精明，不过他缺乏一点常识，这些卷宗在法院那里还有一份副本。”

胡浩沉思良久，说：“一个人想掩饰自己的错误，这还不是最可怕的。假如他并不是为了文过饰非，而是为了达到另外的目的，那却是更为可怕的。这些年来，这种人把我们的党坑害得够

苦的了。好吧，我还要去找找顾方知，你马上返城，把这件事向常委汇报，我最迟今天晚上赶回城里。”

刘宁答应一声，向汽车走去。

他没有画圈

大自然的风光真美，芳草萋萋的旷野是没有污染的，吸到肺泡里的空气真新鲜。

胡浩走在开满野花的路上，是步行，脚踩在有弹力的草丛中，觉得很舒服。好久没走这样的路了，打日本鬼子时走过，是被敌人追得落荒逃走，幸亏沼泽地陷住了日本人的车轮子，草地救了他。进城以后，有车代步，差不多忘记了草地步行的滋味。

他和司机终于找到了周菁，把她强行弄到车中，胡浩委托小刘把她送回精神病院，然后返回来接他。

多年来他周围第一次脱离了秘书、司机们保护性的跟随。真惬意啊，他现在不是在五千万人中间有发号施令权威的省委书记，不过是个和一般人没有区别的老头儿，不是也拄着一根竹竿、顶着一个大斗笠吗？那是好心的看林人借给他的。

安谧、恬适而又幽雅的旷野，没有要求落实政策的各种人的包围，没有雪片一样的文件要他签收、签发，也没有秘书削好了红蓝铅笔要他在什么材料、批件上画圈，这实在是一生难得的偷闲！

偷闲？哈，这古怪的意念还是第一次钻进胡浩的脑海里来呢。倘若华序活着，跟在自己身边，她会说什么呢？她会支持的，她从前不是说过嘛，“省委书记也是人，是食人间烟火的，您干吗总把自己圈在办公室里、埋在看不完的文件堆里？我不信省委书记的乐趣只是批文件、发指示、象征性地鼓掌……您该去游泳、爬山、打棒球……”

是啊，食人间烟火的人不是靠电脑程序控制的机器人，胡浩长期被掩盖了的本性的那一面，不是也时常冒出来吗？是啊，假如华序不过分固执的话，她本来可以混过来的……

但是，华序拒绝了她的首长的良苦用心，他感到遗憾。那一回，他真的流泪了。

是什么原因促使胡浩超越了正常轨道，干了一桩自认为对不起党的事情呢？那是因为他的思想起了变化。真奇怪，原来华序具有的、他也感觉到但没有勇气正视的、在不少人眼里视为异端邪说的好多思想，后来竟然潜移默化地在胡浩的思想里逐渐清晰了起来。他虽然惊骇，但却排除不掉。1970年春天，他与之同荣俱损的那位老上级突然又被点名了，一下子又成了彭德怀的伙。这是信号，意味着胡浩再次被打下去的时日不远了。

这是他信守不渝的真理吗？不，华序说得对，这场革命，已经被某几个野心家变成了任意捏弄的面团儿，变成了他们达到个人企图的打人棍。

胡浩第一次用实践去证明“有权不用，过期无效”的实用主义哲学。

在他还没有被赶下台前，有一天，他冠冕堂皇地到狱中去提审华序了。

华序越来越清瘦了，但是精神很好，她的笔看来没有停过，右手食指上沾着蓝色墨水痕迹。

胡浩觉得自己的心在怦怦跳，跳什么？见鬼，从前自己关在国民党监狱里、在敌人法庭上也没这样跳过呀！他觉得自己在一桩见不得人的勾当，好像是来同危害党的要犯订攻守同盟，又好像企图放掉一个敌对分子……

华序先说话了，她深沉地望了胡浩一眼，用唠家常的调子询问起来：“您的工作忙吗？周菁大姐怎么不来看我？她好薄情啊。其实，我能怪她吗？迟一天早一天，我都会把自己的想法公布于

世，向党交代，我没有干欺骗党的事情啊！”

她说的是实话。胡浩看过她在狱中写的“供词”，累积起来达几十万字，比起当初她叫周菁看过的那份，不知要完整、系统多少倍。你能说她在搞阴谋吗？她没有到大街上去张贴标语，没有去散发传单，她是按照党章许可的范围，向自己的党报告的呀。

胡浩不敢看她那一双深邃的眼睛，避开她的视线，倒了一杯白开水，轻轻放到她面前。他想了半晌，才问了这么一句：“小华，你……不后悔吗？”

马上意识到这是句废话。她有半点后悔的表示吗？

华序笑了，眨动着长长的睫毛，说：“这些年来，我一直工作在您身边，我追求什么，您会一无所知吗？我的个性您也是清楚的。”

胡浩点点头，说：“难道……你一点都不怀疑你自己？没有偏激的地方？没有危害党的地方吗？”

“每天都在怀疑。”华序真诚地说，“开初我想的，后来不是有所修正吗？也许，我是错的，我乐意接受党的处分。可是这跟监狱有什么关系？人有大脑，会思考，这能算犯罪吗？”

胡浩不想再同她探讨下去，时间、场所都不合适，何况隔墙有耳。

胡浩鼓起了勇气，站起身来，在屋中踱着步，突然站在门口，说：“你全是胡说八道，精神错乱！我明天就叫人把你送到精神病院去！”

态度是严厉的，声调是冷漠的，而那暗示、期望的眼神是再明白不过了。

华序的眼里滚下了泪水。

她能不懂得胡浩的用心吗？她还不明白这是胡浩冒着危险，来给她指点走出牢狱大门的一条生路吗？是的，她明白，对于疯

人，法律是没有约束力的。她只要装疯卖傻，只要获得精神病院大夫的一张诊断书，她就能获得自由。

她带着泪水苦笑了，她说：“不，我的神经比任何时候都正常。我不希求开脱。确切点说，我的所有罪名都是自己罗织的，并不是别人告发，这是别人暂时还不能理解的一种幸福，我终于不憋闷了，我什么都说出来了，我认识了真理。”

这话使胡浩敬佩，但当他想到后果时，他很失望，可并不死心。他决定采取非常手段强行实现自己的计划，他在医院里也还有市场，他可以打动几个医生出这个伪证的。

啊，华序也许还太乐观了，她哪里晓得事态的险恶？原来连胡浩都掉以轻心了，以为她不过是思想犯，思想“反动”，判上三五年徒刑，如此而已。

可是，华序必须付出死的代价！这是连省委都没有发言权的。中央文革里的几个大人物，亲自过问这个案件，江青指示说：“这是建国以来最严重的一起政治案件，必须严惩，杀掉可不可以呀？”

用的是问号，人们只能当惊叹号去执行。省委里那几个把持着实权的火箭干部当然照办，杀一个华序如同地球上少了个蚂蚁一样无关紧要，而他们的顶子却可能染得更红，无本万利，何乐而不为？

这是胡浩所不能容忍的了！思想即使真的“反动”，就要杀头吗？何况她的许多观点正一天天地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她像敲钟人似的，震醒了好多梦乡人。

要救她！在“三结合”的权力机构中只是一个象征品的胡浩和另外几个老干部，都是手无寸铁者，他们有什么办法力挽狂澜呢？

没有。他思考了几夜，只有用“精神病患者口出狂言”一招营救华序了，他宁可冒着最大的危险。

他突然在常委会上提出，华序精神不正常。这是个爆炸性的问题，那些操有权柄的人首先怀疑到胡浩是在对抗中央首长而捣鬼，可是表面上不得不摆出民主和公正的样子，于是同意马上把犯人送到精神病院去检查。

胡浩明明知道自己在玩火。“玩火者必自焚”，这道理他懂得，但若能够照亮别人，也应当是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

他明白自己的处境，那些执掌实权的人不会对他没有怀疑。华序曾经是他的秘书，由他提出“精神病”的问题，本身就有“瓜田李下之嫌”，他顾不得这些了。

他连夜找到了精神病院院长佟一民。

佟一民比胡浩小十几岁，在解放战争年月，在胡浩身边当过小卫生员。佟一民一直没有脱军装，又远在北京军区当军医院院长，所以这里的人一般都不知道他们有旧关系。

佟一民是随着他所在部队的调防南下的，他去年6月份被派到精神病院“支左”。首长告诉他，精神病院除掉担负一般性的“清队”、“占领”任务外，还要特别注意那些假疯人，以疯为掩护，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

在胡浩的印象中，佟一民是个宁折不弯的人，尽管多年不在一起工作，他仍然对他不怀戒心。

他们的谈话是在漆黑的X光室进行的。

锁好门，佟一民说：“老首长，你开门见山吧。我是坐在X光机面前说话的，五脏六腑你都看得清楚！只要对党、对人民有利，我掉脑袋也干！”

胡浩说：“是的，是有掉脑袋的危险。我今天找你，是要求你保护一个人。她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但她有思想，她的许多乍听起来十分反动的观点，正被事实不断证实着，将来的历史也许要证明她是一个英雄。”

“你是说华序吗？”佟一民说，“听说她反动透顶，我是没看

过材料。你对她有把握吗？我好像听说，她的案子惊动了中央文革。”

胡浩说：“老实讲，我现在已经同意了她的不少观点，这‘部分’正在一天天扩大。我可以凭党性告诉你，她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

“好吧，”佟一民说，“我相信你的党性，掉脑袋也干。其实，像小刘那样，二十多年前就牺牲了又怎么样？人总是要死的，只要不是窝窝囊囊的死就行。”

他说的小刘，是和佟一民一起从卫生处短训班出来的小女卫生员，当年都15岁，大家常逗他俩是“小两口”，因为他们演节目扮过“老两口”。每逢人们这么逗，小刘准抹着眼泪去找胡浩告状。她是在攻打长沙的战役中，为了抢救一个伤员牺牲的。

两个人在人间最黑暗的地方紧紧地互相握着手。但是他们相互都看见了彼此的心，那是火热的。他们都有一双X光的眼睛。

胡浩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多么心焦的等待和盼望啊！他担心佟一民莽撞坏事，他在家吃不下，坐不稳，不断地看表，就像当年带兵打伏击时等待总攻命令下达一样急切。

妻子周菁和胡浩一样急切，她把这关键一举看做是赎罪。

这是一个没有风的黄昏，天阴着，像要下雨的样子，白腰雨燕特别亢奋，唧唧啾啾地鸣叫着，在黛色阴云下飞上飞下。

闷热得人都快要窒息了，客厅的窗户开着，座式电扇开着，还是热，电扇搅起来的风都是热乎乎的。

胡浩枯坐在电话机旁，一支接一支地吸着烟，舌尖都麻木了，还在抽。

但愿华序能够同医生合作，不合作的病人，即使碰上华佗也无济于事。

胡浩不敢往桌上看，桌上那盏绿罩台灯亮着，在桌面上投下

一个绿幽幽的光圈，一张红头文件就笼罩在那惨绿的光环里。那是公安军事管制小组送到省委待批的公文。刺人眼目的标题是：为呈请判处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罪犯华序死刑的报告。

呈请只不过是走走形式罢了。自从中央文革的要人们批了字以后，实际等于做了高于法律的最后裁决。权力高于法律的时代，或者说是没有法可循的时代，有什么法子呢？形式还要走，他胡浩甚至要在这张虚应故事的文件上画圈，那上面开列着他的名字。

胡浩几十年来画过好多圈圈，铅笔的、钢笔的，圆的、不圆的……一环一环地连结起来，怕也有几公里。他从来没有感到画圈圈是什么负担，有什么压力。

但是，这次的圈圈怎么画呢？是处死应该活着的人，处死跟随自己多年的好秘书，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不画是不行的。握着权柄的人们早都画在上面了，违心画圈的人也画了，仿佛他们的手在发抖，胡浩看得出那几个圈不圆，笔力不匀，墨水也不流畅。

为什么要违心去画这个圈？难道一个党的负责干部不可以提出相反的意见吗？

挂钟的摆有节奏地咔咔响着，响得胡浩心里烦乱。

外面陡然起了风，窗扇被摇得丁当作响。胡浩和周菁都没有心思去关窗子。哗啦一声，一块窗玻璃打碎了，碎玻璃片子散了满地。

周菁惴惴不安地看了丈夫一眼，细声细气地问道：“你说，华序不会一条道跑到黑吧？我真担心，万一出了娄子，不但我们完了，连佟院长也……”

胡浩心里一跳。这也是他的担心，只不过不愿意说出来就是了。他没有出声。

停了一会儿，周菁又梦呓般地嘀咕起来：“怎么我左眼皮总

是跳个不停呢？男左女右，哎呀，女的左眼可是跳祸呀……”

若在往常，胡浩准会嘲笑妻子“唯心”，现在他却没有闲心去纠正她。说实在的，连他都希望妻子眼皮最好是“跳喜”，人都喜欢讨个吉利，尽管未必信它。

一阵卷地折树的黄风过后，豆大的雨点稀里哗啦地下起来，胡浩走到窗前关紧了窗子。

敲门声。是敲门声，两人都听到了。胡浩神经质地从椅子上弹了起来：“来了，来了！”

周菁比丈夫更要神经质，她三脚并做两步，奔到走廊里去开门。

随着猛雨闯进一个人来，全身都淋湿了，头发贴在头皮上，滴着水。啊，不是秘书，也不是佟院长，这不是顾方知吗？

他好像木头人一样，幽灵似的来到客厅门口，站住了，一只手扶着门框子，地板上很快汪了一滩水。

胡浩说：“是你？快进来吧，换换衣服。”

顾方知没有动，周菁拿来干衣服他也不伸手接。

胡浩本想安慰他几句，可又怕讲出口。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最有效的安慰也是苍白无力的。又有谁能安慰得了自己呢？

顾方知嘶哑着嗓子说话了：“胡浩同志，您不能再沉默了，您是最了解华序的。她是个好同志。难道一个党员向自己的党说了几句真话，就犯了杀头罪吗？”

胡浩只能苦笑。问得好！你问我，我又去问谁呢？

胡浩本想告诉他，自己正在设法营救华序，可是又觉得不妥。这种被别人看做是非组织活动的事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顾方知没有坐沙发，披了件干风衣坐到写字台旁小凳上。

不知怎么的，他看见了台灯下的那张纸。他的眼睛恐怖地张大了，如同见到了处决死刑犯的布告一样恐怖！

他发疯一般抓起那张纸，冲到胡浩面前，抓住他的胳膊，大

叫起来：“这字，您不能签，这个圈您不能画，那您将成为人民的罪人，人民给您的权利不是要您残害人民的呀，胡书记，您不要签啊……”

胡浩扶他坐下，拍拍他的肩膀，转过身去，胡浩止不住热泪滚淌，他的心都快要碎了。对于华序的量刑轻重，胡浩的这个圈儿画与不画，都是无足轻重的。不画，一样把她押赴刑场；画呢，只对胡浩本人有好处，那是他顺应潮流的一个姿态。

顾方知的呐喊不对吗？千古罪人，是的，他这一个圈是代表人格与骨气的，他会不明白吗？

沉重的敲门声响起来，这次是胡浩亲自跑去开门。

进来的是个披军用斗篷的人，快有50岁了，额头很高，颧骨也高，整个脸庞都是棱角。他就是精神病院的院长佟一民。

佟院长的脸阴沉着，脱雨衣、擦脸、拿香烟、点火柴。他知道胡浩和周菁一直等他开口，他却故做不慌不忙的样子。

胡浩了解他，越是表现沉着，越说明他心里发慌、沉不住气。

胡浩的心咕咚一沉，宛如落进了冰窖。他甚至连发问的勇气都没有了。

周菁战战兢兢地问道：“没、没成功？”

佟一民喷出一口浓烟，说：“我真佩服华序，她是个有骨气的人。她不管我们怎样暗示，都不肯承认自己精神失常，她比正常人表现得还要正常。”

“完了。”周菁尖叫一声，双手捂起脸，跑出了客厅。

胡浩吸着烟，没有出声。

佟院长说：“你骂我吧，老胡！我这人性子急，干事好露馅儿。妈的，今天有七八个人跟在华序后头，他们已经怀疑你和我是有包庇华序了。”

胡浩仍旧没有出声。

他能说什么呢？露馅儿了！也许要在走资派的牌子上再加一个反革命黑后台的衔儿。

他一点都不后悔，再进牛棚好了。人总得有人的尊严。

胡浩把一个帆布手提袋从衣柜里拿出来，打开拉链，里面是一些换洗衣服。他感到好笑。这是他从干校回来带回家的，竟然一直没有打开，好像预见到有一天他还要重返牛棚似的。

他把牙具找出来，扔到手提兜中，拉上拉链，把周菁喊了出来。

他问周菁：“补发的工资在手边吗？”

周菁点点头：“你要干什么？”

“拿来给我。”胡浩这样说。

周菁从抽屉里拿出一沓票子交给丈夫。

胡浩掂了掂那沓票子，看来有1 000元左右吧。他把票子分成两半，一半扔给妻子，一半塞到在一旁发愣的顾方知手中，声音哽咽地说：“拿去吧，替我抚养蕾蕾，将来我能吃上一口饭，就不会饿着孩子。我……除了这点力量而外，都无能为力了。”

周菁呜呜咽咽地痛哭起来，她明白了丈夫的处境，明白了丈夫的意图，她一边哭一边说：“你不能这么破罐子破摔呀！这不是自己往死路上走吗？”

胡浩说：“这选择是痛苦的，又是干净的，即使我自己不去选择，有人也会替我安排的。但是，我不相信历史永远会倒着写。”

说罢，他把那份呈请报告的红头文件拿起来，又压到台灯底下，嘱咐妻子说：“明天早晨送到省委值班室，交给党办秘书。就说我胡浩不能画这个圈！”

周菁哭得更厉害了，连佟院长都落了泪。

一直处在麻木状态的顾方知一下子清醒过来，他痛哭失声地扑过去，抱住胡浩大喊起来：“胡书记呀，为什么好人都会被逼

上绝路呢？’

为什么呢？彼时的答案是朦胧的、令人思索的。随着时光的流逝，一切都过去了，答案像一加一等于二那样简单！可是为了寻求这个答案，华序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她走了，留下的人有的在争夺她留下的余荣……胡浩越发觉得顾方知是难能可贵的。

荒原在他脚上铺展、延伸，如今，已经是铺满鲜花的路了……

但愿蜜糖不被拿去酿醋

胡浩有趣地发现，跟随着采集花粉归来的蜂群，很轻易地找到了顾方知的流动蜂场。

现在，他站在两株开着长蕊粉花的合欢树下，看到了摆在草坪上的两排白色蜂箱，轰雷般的蜜蜂嗡嗡声淹没了一切音响。顾方知真会选择地方，这里是神话般的境界，蜂场选在一片盆地上，中间是鲜花盛开的草地，三面围着爬满扁藤的榕树、龙果树。东面是一汪碧水，流花河环抱着这块宝地悠悠而去。

没有车，就不容易惊动顾方知。他完全没有注意到背后有脚步声，只顾低头观察着巢门蜜蜂的出入，以此来判断箱内的情况是不是正常。

胡浩暂时不想惊扰顾方知，他走了这一段路，感到浑身绵软无力，久病初愈一样疲惫。他意识到自己老迈了！从前呢？跟鬼子在青纱帐里周旋，一天能跑百十里路，还要打仗……唉，好汉不提当年勇。

他坐到放着养蜂器皿的小凉棚下。

奇怪，怎么竹竿上挂着一件女式的衣服？莫非蕾蕾来到这儿了吗？

胡浩不禁左顾右盼起来。不错，他看见河湾里有一个苗条的身影，穿着白色上衣，正伏在一块卧牛石上捶洗衣服。果然是她来了。

胡浩同样不想惊动她。他不声不响地躺在遮光的小竹棚里，点起一支香烟，望着淡淡的烟雾在竹棚里飞翔。

不知过了多久，顾方知走了回来，站在门口望着胡浩。

胡浩从地上爬起来，向他伸出了手：“方知，你叫我好找啊！你好吗？”

顾方知眼圈红了，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他虽然下决心躲避人们的追赶，却又希望见到他。

现在，他扑到胡浩跟前，真有点像孩子见到了娘那般兴奋：“好，好啊。我一切都好，谢谢您惦记着。这不是大家都好了嘛！全国都好了嘛！”

“是呀，”胡浩感慨地说，“乌云压顶的日子总算过去了，华序的预言变成了现实。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能认识到思想解放先驱者的血没有白流。”

顾方知说：“如果华序有在天之灵，她也未必同意这样宣传她，她的死，原不是为了出风头的。”

“那当然。”胡浩说，“可是我们都不能忘怀她。烈士多像采蜜的工蜂啊！辛劳采花、酿蜜，直到悄悄死去，却把蜜糖留给人间。”

顾方知嘴里叼着一片草叶，说：“但愿那蜜不被人拿去做醋。”

胡浩心里一动，忍不住去看他的脸孔。胡浩多少有点怀疑，顾方知这话是不是弦外有音，是不是讥刺自己的？

胡浩说：“所以，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是我们生者的责任。在真理面前，我们都曾经是无知的孩子。当初，处死华序，有几个人认为不应该呢？历史兜了个圈子。这是常有的事吗？啊，历

史常常同人们开玩笑，为了这个玩笑，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几乎是革命事业的崩溃。”

顾方知说：“不过，历史最终只捉弄那些玩弄历史的人。您是喜欢听老实话的，我觉得，有些宣传又过头了，把华序描写成了神。据我了解，她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只不过她不肯像猪狗那样生活。如果这样下去，使她成了一具偶像，叫青年们无从学起，可敬而不可效仿，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你说得对，”胡浩赞成说，“这是老毛病了。包括我在内，一说好，便好得白璧无瑕；一说坏，便坏得一塌糊涂，也正因为这个，我才来请你，你是华序的真正战友，你应当做点符合实际的工作。”

顾方知笑了：“不，不。您别给我出难题吧。一个人做了一点应当做的事情，却享受到不该享受的荣誉，那会心里不安的。您说，我为华序做的哪一件事，不是一个正直的人应当做的？如果这也值得大喊大叫的话，说明我们这个民族的民族精神太堕落、太低下了。所以，我还是觉得不宣扬好些。”

能说顾方知的话一点道理没有吗？但胡浩心里却很不是味道。他想，多半是他不肯原谅自己，才这样推托搪塞的。到时候了，将心比心，你还不应当向这样一个忠厚的人敞开心灵的窗户吗？

胡浩沉吟了一下，说：“你别急，我找你来，当然是来请你出山，这不是我个人的意思，省委已经研究了对你落实政策的事情。我找你来更主要的目的还不在于此……”

突然，胡浩脸红了、气短了，赶忙咽住了下一句话。

顾方知惊疑地盯着胡浩，无论如何琢磨不透这位省委书记找自己还有什么别的意图。

胡浩终于又鼓起勇气说下去：“当然，你也许直到现在还不肯原谅我，我希望得到你的谅解。是的，我当初是追究过华序日

记的下落，华序也确实出于对我的好感和信赖，如实告诉我了。就我当时的思想水平来说，我是想要她竹筒倒豆子，一下子把问题说清楚，没想到，却害了她，也株连了你……”他说不下去了，闷头抽着烟。

起初，顾方知像听天书一样听着，感到离奇、出乎意料。听到后来，他听懂了，却不免大吃一惊。原来是他吗？这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入狱以后，顾方知对日记的被泄露有过种种推测，惟独没有把胡浩画到圈子以内。

在顾方知印象中，胡浩是个有骨气、有正义感的老干部，他后来冒着罢官、坐牢的危险，铤而走险去营救华序，直到拒绝在判决书上画圈，终于二次被打倒，有哪一点迹象证明胡浩像个叛卖者呢？

可是自己的坐牢，毕竟是由他引起的，这又该怎样来解释呢？

不，他是个好人。这件事情自己压根就不知底细，他肯于找自己当面说明这一切，他和那些只顾往自己脸上贴金的人相比，不是霄壤之别吗？

想到这里，他对胡浩说：“胡书记，您太多心了。这件事情谈不上请人原谅。您说得对，当时您那么做，是因为您认定华序步入了歧途，是为了挽救她。可是您把那个时代看错了……以后，您看明白了，您为挽救她而做出的种种努力和牺牲，都无济于事。这也是人们有目共睹的。哪个人都不是神，谁能一生一世一贯正确呢？问题是看他肯不肯认错，只要不包着祸心，佯装正经，那就是好同志，不知我说得对不对？”

这是从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口中说出来的话，使人信服。胡浩心头轻松了，从来没有这么轻松过。

胡浩开始扭转了话题：“你应当回城，去干你的本行。搞四个现代化的建设，需要人才！我想，这你不会拒绝吧？省委已经

决定起用你担任昆虫研究所的副所长。我想听听你的意见、要求。”

顾方知连连摇手说：“不行，不行。我真的不行。离开研究室太久了，落伍了，勉强去充数，白占了一个位置。尤其不能当头头，我一来不是那块料，二来平步青云没道理，我的科研有什么成绩吗？没有。还不是因为华序的事，大家认为应当照顾我！这种照顾，对我个人来说，是一种不光彩的事，我一生都干不得脸红的事。您是了解我的，千万别这样，我现在不是很好吗？说到要求，我……省委是不是考虑一下，应当恢复我的工资，我不忍心再分吃农民那一点粮食了……”

胡浩鼻子一酸，泪水再也抑制不住，多好的人啊！他应该说一句什么呢？

蕾蕾头上顶着一叠洗好晾干的衣服从河边回来了。见到胡浩，自然是一番高兴，他们的交谈不得不中止了。

为了招待胡浩和蕾蕾，顾方知决定搞一顿野餐。他有一张网，下到河边浅水里，网上吊着一块拴着红布条的芝麻香饼作为鱼饵。不到半小时，先后起网三次，鱼不大，却有五六斤，够吃的了。

胡浩动手点火，蕾蕾去收拾鱼，顾方知到草地里去拣了半篮子鲜菇，大家烧起一锅鲜菇鱼汤。

吃饭的时候，旧话重提，胡浩希望与蕾蕾形成统一战线。他说：“怎么样，蕾蕾？你同顾叔叔订了什么和约了吗？”

蕾蕾说：“只有人的志向是最难改变的。我试图说服顾叔叔回城去，失败了。我看，不必勉强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道路，当一个养蜂的追花人，不也很好吗？”

胡浩不好再说别的，改变话题问道：“蕾蕾，你打算干点什么呢？升学，还是就业？”

“让我挑吗？”蕾蕾调皮地一笑，眼睛闪着狡黠的光点，“我

有这个特权吗？

“不是特权。”胡浩认真地说，“是党和人民给予的优待、照顾，这和干部子女走后门不同，不会有任何人非议。”

“是啊，”蕾蕾说，“不会有任何人非议。可是自己要不要自我非议呢？妈妈的死，如果只是为了换得光耀门庭，使她的女儿享到特权，那妈妈的血，不是流得太不值得、太廉价了吗？”

胡浩说：“这是两个概念。你，当然不应当伸手要；党和人民应当给予你照顾，这都是合情合理的。我替你选择了地方，去念大学，学你妈妈的专业，好不好？”

蕾蕾严肃地摇了摇头：“不。我不上大学，即或要念，也要凭自己的能力考取。还是让我走自己的路吧。”

她说得很恳切。胡浩有点奇怪了：“你自己的路？什么路？”

蕾蕾微微仰起头，双眼凝视着花的原野，无限向往地说：“铺花的路。跟着鲜花走，不是很好吗？”

胡浩明白了。跟着鲜花走，这是一句表面听来很虚的话，可它带有深深的哲理。鲜花是什么？一种人世间最纯洁最高尚的象征，是春天的标志。追花人，不就是要永远追踪着春天的脚步、追踪着真理的脚步走吗？

毕竟这概念是抽象的啊！

很快就具体化了。

饭后，大车小辆来了一大群人，陆霜青带队，端着装有长焦距镜头的新闻摄影师和举着录像机的电视摄影师们一齐拥上来，要给顾方知、蕾蕾和胡浩拍照。多么难得的机会，这是三个处在舆论漩涡中心的新闻人物啊！

但是，顾方知最先躲开了。随后，蕾蕾跟他走开了。

陆霜青觉得奇怪，问胡浩：“这是怎么回事？”

胡浩站在草地上，像自言自语地说：“追花人，只有你真正懂得这三个字的含义时，你才懂得应该怎样做人。”

陆霜青几乎怀疑省委书记是在说疯话，胡浩却流下了热泪。
花海，花海，还是花海。

顾方知和蕾蕾向茫茫花海深处走去，跟随着一群漫天而去的
蜜蜂。

天是蓝的，云是白的，流花河的水清悠悠。

难道这不是人间一幅最美最美的画吗？

（原载 1981 年 5 期《十月》）

生物圈

飞向“透明的世界”

“在不幸中回忆幸福的时光，再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了。”

这是哪一位文学大师的格言？啊，记起来了，是但丁留给后人的。假如反过来，变成“在幸运中回忆幸福的时光”呢？那恐怕就要沉湎在少有的欢娱之中了。

此时，坐在翔云一万米的三叉戟飞机上，覃泓的快乐是溢于言表的。她，一个正值芳年，还没有尝到人间苦涩味道的姑娘，总以为一切美的东西都是天道自然。

覃泓有理由骄矜，她刚刚 25 岁，却是中国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了。她没有吃过什么苦，她没到过天山脚下或者科尔沁草原去插队。她高中毕业的时候，已经是人们意识到科学与文化价值的年代，她凭自己的本事考取了北京大学生物系。

覃泓有一个当着森林研究所副所长的爸爸，一个在北京从事教育工作的妈妈，家境优裕，从小在父母亲溺爱下长大，她几乎没有什么不顺心的事。

她崇拜天才。北京人才学会成立的时候，她虽然没有接到请柬，居然也混到民族文化宫会场去旁听。

她万万没有想到，她居然在首次执行业务时，就发现了一个天才！她不知道，那些发现过行星、恒星的学者们有过什么样的心情，反正她觉得那颗新星仿佛属于她私有，至少是同她的荣辱密切相关，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飞机航行在起伏的云床上，在机翼下翻滚的云朵真像冲到船舷上的海浪，飞机好像相对静止了。和谐的、千篇一律的马达声，使覃泓陷入梦一般的心境中。不，这不是幻梦，在白云间时时闪烁的不就是她发现的那颗新星吗？

她倚在舷窗旁，高空耀眼的阳光刺得她不得不眯起眼睛。

“他会想到吗？我仅仅离开那无涯的绿色王国一个多月，就又驾着五彩祥云飞回来了！”

覃泓忍不住又从手提包里拿出那张报纸来。这张报纸，她竟买了一百多份，交道口卖报老太太的当日报纸叫她全包了。

这是前天的报纸，是不是已经到了他的手中呢？据说各个省都会根据传真版开印的，昆明当然也不会例外。

覃泓惟恐自己到得太早。假如他和他的同事们尚未看到报纸，那多没味儿？话又说回来，假使是这样，她不就可以用突然袭击的办法叫他们处于狂热的浪潮中吗？

特别是爸爸覃怀元，他的高兴自然是双份的——既为他部下的成绩而兴奋，也为女儿的发现人才而高兴！

一时，覃泓竟不能判断，到底是那里的人早知道好，还是晚知道好。真像一道数学题有两种解法一样，难分优劣。

她轻轻抽出一张报纸，头版头条印着醒目的大标题：绿色王国王冠上又嵌上闪光的新钻石。副标题是：助理研究员黎大品发现了世界罕见的化石树，对植物分类学做出新贡献。

旁边是一张4寸照片，黎大品看上去四十多岁，脸膛瘦削（其实很黑，那是高山紫外线强烈照射的标记，当然脸的黑白照片上反映不出来），不漂亮，甚至可以说有点丑。只有那双不大

的眼睛却是有神的，还有那凸起的前额，那几绺不大驯服的头发，给人一种坚毅的印象。

这篇报道，是覃泓执笔的，报社编辑给她名字前面加了个衔：本报特约记者。从初稿到改稿，到看清样，一直到报纸从轮转机里流出来，这篇稿子，她不知看了多少遍，说能背下来，一点都不夸张。

这是覃泓有生以来第一次把手稿变成铅字印行全国（当然也会流到国外）。她有着所有青年人揭晓处女作的同样心情，更何况她的作品，不是随意编纂的一个什么无益无害的故事，她是向世界公众发布科学公告！

爸爸上次就曾经说过，这是个重大的发现。找到了化石树，大西南热带、亚热带地区的气候学、地质地貌学、古生物学以及植物分类学，都将得到推进。至于化石树本身含有一种治疗高血压药物的价值，几乎降到了极其次要的地位。要知道，在此前若干世纪里，科学家们还只是从古代化石上看到这种植物的样品啊！

千里马常常同伯乐是分不开的。爸爸不是常引用韩愈的那句话吗？“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于是，覃泓自然成了人们瞩目的人物。其实，情报所的人早就催促她快点上路，二访绿色王国了。她担负的使命是把发现化石树的人同珍贵的化石树资料一道接回北京，将为黎大品提供讲坛，让他宣读科学论文。

只不过覃泓有意拖延了几天，名目上是因为“机票一周只有两班，要等”，其实她等的是文章的问世，她不能空着两只手去见黎大品和爸爸。

现在她真正踌躇满志了，她带来了见面礼。她一路上都在虚构着这张报纸将给那个偏远的地方带来何等的狂热……

那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偏远角落。在那远离人群的地方，只有几幢活动木板房，作为省森林研究所分类研究室考察队的驻

地，总共不到二十几个人，没有电影、没有音乐会，连商店都没有，如果不是在二里地以外有一个傣族的村寨——芒寨，他们简直就同在南极大陆考察一样孤独了。

覃泓酷爱那个地方，幽静、清新，连空气都没有一丝一毫的污染，终日里听不到现代文明带来的喧嚣。婉转的鸟鸣，清越的水声，覃泓觉得那是一处经过过滤了的所在。

是呀，她虽然只在那里逗留两个星期，却深深地留恋着那里。一草一木自不必说，人，更是纯净的。记得上次在大西南林区，她曾经向爸爸说过，森林研究所的研究者们是经过大自然的陶冶、净化，不求名，不求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默默无闻地为科学事业献身的……不知为什么，爸爸听了只是用意不明地笑。覃泓感到爸爸的笑是一种潜在的嘲弄，她很不舒服。

她有发言权，她是从对比中得出自己的结论的。一走出校门，就碰上涨工资、调房子。她希望见到的是书上描绘的谦让、洁身自好；她看到的却是斤斤计较、尔虞我诈。堂堂的科学殿堂里，居然有人夜半更深夜去砸坏劳资处长的窗玻璃、去给总务处长门前挂上志哀的花圈……

她同芒寨考察队的人们很熟，她羞于把这些人间秽闻告诉他们，她怕引起他们的反感。

可是，为什么是赵士函到北京去开会了呢？

这个令她烦恼的想法刚一冒出来，她立刻被牵回到了前几天的不快中去。

三天前，她大清早带了刚出版的报纸，跑到西苑大旅社去看望黎大品。那里正召开为时一周的植物学会理事会，黎大品将作为新补选的理事出席会议。这当然与化石树的发现是密切相关的了。

覃泓万万没想到，黎大品没有来！尽管打印的会议名册上仍然是黎大品的名字，而来与会的却是赵士函！巧妙的移花接木！

那是怎样尴尬的相见啊！她把披载着惊人消息的那张报纸背到身后去，一口气跑到2号楼103室门口，平静一下自己，才伸手敲门，却不料，开门出来的是赵士函！覃泓怔了一下，才不得不问：“啊，你来了？黎大品呢？”

赵士函倒是落落大方地请她到屋里坐，一边给她倒水，一边说：“大品正在省里开学术交流会，他又没有分身法呀！”

听到这里，覃泓才稍稍心安。这个赵士函，她认识，是黎大品的老同学，多少年来的红专典型。她虽然有点古板，但覃泓对她的印象还不算太坏。可是从赵士函那里出来，她从会务组打听到的情况，可就不像赵士函说得那般轻松了。据说，开会通知下达到昆明后，森林研究所的李所长打了一个长途电话，要求换赵士函当学会理事。原因嘛，李所长说是复杂的，不能从一时一事考虑问题！当然，植物学会只能尊重党组书记的意见。

听了这话，覃泓的心情也变得复杂起来了。她首先想到了李所长或者她爸爸覃怀元的偏见！难道黎大品除了找到化石树的“一时一事”而外，平素表现都不堪一提吗？覃泓不服。她在那里待过两周，她亲眼见过黎大品的为人和工作态度。

覃泓这次除了来完成正常使命而外，她是有“代打不平”的思想准备的——只要真有不平存在。

怎么耳膜开始鼓胀、疼痛了呢？哦，飞机正穿透云层下降，座舱前面红灯亮了，显示出“请系好安全带”的字迹，女乘务员托着一盘子口香糖朝她走过来。

绿树代替了白云，昆明山城像大海中的绿岛，赫然铺展在机翼下。天是那样晴朗，能见度高极了，一切都是透明的！啊，透明的一切……

覃泓在昆明只住了一天，就搭乘长途汽车到林区去，一直要坐上三天！

在昆明，她本来以为会碰上黎大品的，不料在她到达的前一

天，学术交流会就结束了。她倒是见到了李所长，想从他口中了解到一点关于黎大品没能出席北京会议的内幕，可落空了。李所长除了夸奖一番赵士函领导有方、找到了化石树而外，对黎大品几乎只字未提。她只好上路。

山路奇陡，有时汽车喘息着爬上山岗飘拂的山巅，行驶在九曲十八转的盘山路上，好多乘客都吓得闭上眼睛，不敢朝下看，万一坠下深不见底的悬崖深谷，当然是连尸骨都很难找到的。覃泓有过一次经验了，她信赖司机走山路的技巧和认真，他们绝不像城里司机听着收音机里的相声，或者同乘务员咒骂着菠菜涨价，满不在乎地掌握着舵盘。他们晓行夜宿，750公里的途程，司机同旅客就要在墨江和思茅各住一夜。对他们来说，安全比正点更重要。尽管那些急性旅客不时发出“抢点”建议，司机连听都不要听。

覃泓倒不急，急也没用。从前，这是一条崎岖得连驮马都要失蹄的马帮路，从昆明到缅甸，居然要走一个月呢，有对比，人才能知足。

望着闪过车窗外的三尖杉、华山松和柳叶桉，望着红霞一般燃烧在山间的杜鹃花、山茶花，覃泓觉得自己进入了诗一般的境界。她本来可以坐飞机的，从昆明到思茅，每天有一班安24型飞机。森林研究所的李所长劝她飞，她谢绝了。覃泓觉得滇南公路的风光，只有细细领略才更有味道。假如坐在飞机上，来往于山间背柴的布依族老人、汲水的傣族少女、刀耕火种的阿佤族青年，能看得见吗？假使现在还有马帮存在，她真愿意骑在架有盐驮子的马背上，听着悦耳的马帮铃声，走完这漫长的、不断变换着景色的滇南公路。

这大概都与人的心境有关吧？她觉得自己是在进行一次格外轻松的旅行，兴之所至，随遇而安，脸上始终漾着笑意。

她很快成了车上人人注意的人物。

她的装束，在飞机上还很一般，但在汽车上就有点刺眼了。

在家里，她是不穿奇装异服的，妈妈不喜欢，工作单位容易惹人议论。她毕竟是年轻人，她喜欢喇叭裤、披肩发，喜欢那件束紧腰身、露出全身线条的开司米高领衫。离京时，她把这些“见不得世面”的衣服全穿起来了。她不是一个十足的勇敢者，她的裤脚只有八寸五，膝盖以上既有曲线，又不会使人疑惑穿裤子要不要有人帮忙。头发原是两条丫角辫，现在打开，用卷发器自己卷出几道浅波浪，再向回弯，是那种颇不俗气的“荷叶式”，不敢打发蜡，香味太浓，抹了少许的发乳，淡淡的幽香。进入热带，戴上太阳镜是防止紫外线直射眼球的好办法，这不比在电影院里也戴太阳镜的人。

就是这样有所收敛，她仍然是有鹤立鸡群之感。山里的干部、农民望着她，一则是惊奇她的大胆，二则是赞叹她楚楚动人的风姿。她的睫毛特别长，大有令人怀疑粘假睫毛之嫌。一双眼睛是会说话的，你稍加注意，就会觉察出那眼神是不驯的、有思想的，这使她天生给人一种不敢高攀的印象。她的皮肤很白、很细，没经过风吹雨淋的人才会有这种皮肤。

难怪有几个人拿着一本电影画报在指指点点地翻看，他们误以为覃泓是电影明星，是有几分道理的。

夜宿过后，从思茅启程时，一个干部模样的中年人补充了覃泓身旁的位置。那人四十多岁，脸型扁圆，不苟言笑，始终抱着他那惟一的文件包。

覃泓问他：“到允景洪去吗？”

允景洪在傣语中是“黎明之城”的意思，是傣族自治州首府，位于美丽的澜沧江畔，允景洪是这班车的终点站。

那个干部点点头。

覃泓真想同别人聊聊天，此前她的邻座是一个佤族老太太，耳聋眼花，抱着一篓药材，语言不通，她觉得憋闷。于是她又

说：“我也是到允景洪去的。”

那男人又点点头，仿佛他是哑巴。

覃泓又问：“您是哪个部门的？”

那男人似乎警惕地用眼睛的余光扫了她几眼，模棱两可地说：“啊，搞政工的……”

覃泓索性把头掉向车窗外。僵尸！她心里说。看他的神气，还是个负点责任的干部呢，谁在他手下工作，每天看他的哭丧脸子，非短命不可。

好在从思茅到允景洪只有 120 公里的路途了，下午一点多钟就到达了。

奇怪，那男人在距离允景洪还有 10 公里路的一个临时小站匆匆地下了车。

这是一个岔路口，向东南，可以直通罗梭江畔的热带植物研究所，属于勐芥自然保护区范畴。覃泓要去的芒寨原始林，也在勐芥境内。只是芒寨距离允景洪还有 70 公里，要明天才能赶上班车，她必须在允景洪住一夜。

白屋绿树，家家门前爬满盛开的爆竹花和叶子花，蓝汪汪的澜沧江环抱着允景洪静静流去，一些傣族姑娘卷起长长的筒裙下到江里野浴，坐在汽车上都可以听到她们的嬉笑声。快到泼水节了，江边有人在修造赛船用的龙舟，有人在树阴下扎着“高升炮”。仅仅一个多月没来，澜沧江大桥旁又新盖起几座白色楼房来。

这个边塞小镇来往旅客不多，好多旅店都十分清闲，只有赶上泼水节盛会，才会出现畸形的拥挤。覃泓下了汽车，不用机关介绍，就凭工作证和边防证，就顺利地住进了州宾馆。

这宾馆，简直是一座花园，院墙下栽植着千竿翠竹，爬满香气扑鼻的七里香，楼前有几株吊着长穗子的槿棕、苏铁、金钱松、挑着粉色长蕊的合欢树；楼后堪称热带植物园，象牙芒果、

滇琼楠、菠萝蜜、木瓜，应有尽有。

吃过饭，覃泓提了个塑料水桶，到淋浴间痛痛快快地洗了个冷水浴，这才跑到澜沧江边散步。

她正伏在澜沧江大桥上看风景，一个骑自行车的小伙子猛然在她跟前刹住闸，惊喜地叫了声：“小覃，是你？”

覃泓回过身来，认出小伙子。他叫李尚年，云南大学毕业，是森林研究所的，给黎大品当助手。覃泓不怎么喜欢他，他不过30岁年纪，虽然连助教都够不上，却喜欢摆出一副大学者的派头，你听，他竟管覃泓叫“小覃”。虽然这样，覃泓仍然很高兴，想不到在允景洪就碰上了考察队的人。

“是你？”覃泓笑盈盈地打量着他，“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李尚年身子伏在车把上，说：“干我们这行的，四海为家呀，哪儿不走？我是来采购点儿仪器。”

覃泓差点笑出声来。她分明看到自行车货架子上吊着的两大包货，粉丝、米线、咸腊肉，还有两个盛满酱油醋的塑料桶……他不过是采办副食来了，还要美其名曰：采购仪器。

覃泓问：“你今天要赶回芒寨？天黑能赶到吗？”

李尚年说：“中间要住一夜，明天午后到家是快的，山路不好走，上坡一步不能骑。哎，小覃，你是到我们考察队去吗？”

覃泓不知为什么，临时说了个谎：“不去，怕吃闭门羹。”

李尚年信以为真，说：“那倒不至于。我倒是欢迎你去。”

“为什么？”

李尚年说：“我已经给你写了一封长信，还没发出去。我觉得，你应当矫正视听，不要片面报道……”

“你们已经看到报上的文章了？”覃泓对这个话题最感兴趣。

李尚年只是冷淡地点了点头，说：“你亲自下来，我就口头说说更好，你有时间吗？”

覃泓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不用听，她也猜得到李尚年要说

什么。

李尚年跟随黎大品在深山里转了半年，连化石树的影子都没有找到。他灰心了，认为跟上黎大品钻牛角尖，可能一事无成，白白虚度青春，因此偷偷下山了，把黎大品一个人扔在山上。恰好在他下山去之后的第6天，黎大品就找到了举世震惊的化石树。可以想见，李尚年把肠子都悔青了。黎大品是个厚道人，他在考察报告里曾经把成绩说成是他和李尚年两个人的，但是这毕竟不是事实，被抹掉了。

听他提起这件事，覃泓很反感。她说：“我很想把发现化石树算成是你和黎大品两个人的成绩，但事实和良心都不允许我这么做。”

好不客气！李尚年的身子从车把上抬起来，说：“好吧。那我就给报社写信，给科学院写信，鲜花还得有绿叶扶呢！”说罢，跳上车，骑走了。

站在风凉的澜沧江大桥上，覃泓感到可气又可笑。他溜下山来时，不是断然宣称过黎大品的研究课题还需要“三十光年”吗？曾几何时，看见桃子红了，就想伸手了！

覃泓忽然不安起来。在那远离人群的地方，也有这种无聊的争夺吗？不可思议。

没有污染的大气和灵魂

这里真静啊！

满眼是绿，满目是花。在这里，一年365天总是有花开放的。墨绿的、深蓝的、淡灰的、白色的山峦一层层透视过去，像一幅最逼真的水墨画。所有的叶片都是干净的，一丝灰尘不挂，绝对不用城里人的水龙头定期洗刷树木。

这是热带原始雨林的边缘，一片片槿棕、短穗鱼尾葵、槟榔

和高大的油棕林，遮天蔽日，一条碧绿的小河曲曲折折绕过山脚，河畔长满密密层层野黄竹和苦竹。覃泓在这条小河里游过泳，那时正是北京飘扬大雪的季节，可卜少河的水温竟高达 25 度！“卜少”是傣语，是姑娘、少女的意思，自从考察队驻扎到这里，汉族的研究人员也叫它少女河。

覃泓走在河边竹林间隙草径上，觉得这河名起得再恰如其分不过了。它永远蒙着朦胧的雾纱，像娇羞的少女不愿让人看清她的真面目一样。河边除了有傣族人割成的红椿木独木舟而外，一只机动船都没有，因此河面上从来没飘浮过油垢和垃圾，几千年来，这条小河一直保持着处女河的贞洁。

覃泓大口大口地呼吸着这里干净的空气，听着雨林深处热带鸟类的大合唱，伴着小河跳过石子滩发出的丁丁冬冬的音响，她真有点陶醉了。

从下车的小站到这里足足有 10 华里，她一点都不感到疲累，像逛香山一样轻松自如地走来了。地道的人迹罕至的地方，一路上她除了遇见一群傣族老乡野牧的牛，一个人都没见过，用不到害怕，这里绝对没有拦路行劫的凶案发生。

啊，她看见了，考察队那几幢白色活动木板房从绿树掩映中跳了出来，恬静、清新，有点像古典田园画上的屋舍。

覃泓蹲到卜少河边掬了两捧水喝下去，洗洗脸，在水里看看影子，捋捋鬓发，一口气登上了山坡。

考察队驻地门前有一片木瓜树，木瓜吊在没有枝、没有叶的秃树干上，样子很滑稽。考察队没有什么牌匾，也像吊木瓜一样，在一棵高大挺拔的槟榔树上吊着一面长条形的白旗，上面写着黑字：省森林研究所植物分类考察队。有点像飘在水泊梁山上“替天行道”的杏黄旗。

覃泓看看表，上午 10 点，还不到开饭时间，难怪考察队院子里只是鸟语声声。门窗都开着，屋子里的空气会和大自然一样

新鲜，这是堪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所在。她钻过一道道晾满被子、衣服的铁丝绳，打算到厨房去找李师傅聊聊。只有他会在家。他拿手的“过桥米线”简直比昆明翠湖宾馆的手艺还要高超。可她忽听香榧树下的那间屋子里有谈话声传出来，这么说爸爸在家？那是他的卧室兼办公室啊！

爸爸真是个好老头儿，为人憨厚、朴实，对人永远是笑呵呵的，好像他根本不会发脾气似的。他除了到北京开会，连探亲假都不请，很少回家，他也不在昆明待着。他本来是主持研究所行政工作的，用不着上第一线来过苦行僧的日子。可他一年365天，倒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消磨在林子里。他什么事都管，食堂的食谱都要由他亲自审定。最大的事，他却不管，不管谁请示有关科研项目时，他总是说：“这个别问我，你是存心叫我犯瞎指挥的毛病啊？为四化，好好干就是了，脑袋削个尖，钻进去！”

看上去他有点外行，实际上他给研究人员很大的方便，从来不会捆住人们的手脚，人人都说他好，哪个考察分队都希望他去蹲点。

既然这次下来没和爸爸打招呼，覃泓仍然想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同爸爸开个玩笑，就弓起腰来，蹑手蹑脚地从香榧树后绕到窗下，正要学一声懒猴叫（学猴叫还是上次来这儿时覃怀元教她的呢），她忽然噤口了，差点当了冒失鬼！

原来屋子里有客人，覃怀元大热天穿得整整齐齐，坐在藤椅里，热汗顺脖子流，他仍然正襟危坐，可见这个客人不是太熟了。

覃泓直起腰来仔细一看，噢，那客人她见过，就是从思茅中间站上车坐在她身旁的那个中年干部，自称是搞政工的，想不到他的“政工”搞到远离人群的领域里来了。

覃泓说不上对他讨厌，却也不喜欢看他那古板的、能刮下霜来的脸子。

她想暂且走开，却不料一抬头碰响了窗上的叶子花，惹得一群蜜蜂嗡地飞起来，窗里窗外乱转。

这声音惊动了覃怀元，他摘掉老花镜朝外一看，立刻又惊又喜地走到窗前来：“小泓？你真是来无影去无踪啊！也不事前拍个电报来！你这淘气丫头，都叫你妈惯坏了，到头来还要说我‘子不教，父之过’……哈哈哈哈哈。”

覃泓冲爸爸挤眉弄眼地一笑，说：“爸爸不是有客人吗？省得您说我不懂规矩，咱在外面先逛逛，风凉儿。”

覃怀元点了点女儿的鼻子，说：“我就猜你该来了嘛！你呀，闯祸精！昨天伙房老李头儿说，他门前那棵山茶冷丁开了一朵并蒂花，一边是红的花，一边是白的花，千载不遇，他说准有大喜事。哈，应到你身上了。”说着给她倒了一杯凉茶，“快解解渴，消消汗，你别喝瞎了，这是一级普洱茶呢！”

覃泓坐到门口一张圆形藤椅上，说：“我们北方人，喝不惯这种苦茶。”

“你爸爸倒成了南方人啦？”覃怀元说，“入乡随俗嘛！50年我随军南下，刚留在大西南时，热得我真想跳河呀！现在不也熬过来了？唉，我真犯愁，过两年退休回了北京，冬天呵气成冰的日子，还能不能过得了！”

覃泓怕他打开话匣子冷落了客人，就顺手抓起桌上的一本《高山植物图谱》翻看起来。

覃怀元又从一个藤筐里拿出几大串香蕉放到藤茶几上，说：“多吃点，泻火去暑呢！你呀，不会赶时候，再晚来两个月，木瓜呀、菠萝蜜呀、椰子呀、酸罌果呀，全下来了，撑得人都不想吃饭。”

覃泓格格一乐，掰下一个香蕉说：“这就知足了，北京要卖八角钱一斤呢！”

覃怀元大笑：“物离乡贵嘛！在咱这儿，一个香蕉一分钱，

没有论斤卖的。你到傣族寨子里，随便吃，愿意给钱就给，不愿意给，抹抹嘴巴走你的，比大萝卜还不值钱！”

覃泓斜了那个“搞政工”的一眼，他正拘泥地坐在桌前，随手翻弄着固定到标本纸上的草木，轻轻晃着葵扇。

覃泓向爸爸递了个眼色，意思叫他先去招呼客人，别冷落了人家。

覃怀元又回到客人面前去了。

“搞政工”的那位说话声音很小，像是很保密的样子。覃泓也不去听，打量着这间重新布置过的房间。这是一套活动板房的三分之一地面，占两扇窗子。因为靠一厢，山墙那面又多出两扇小窗。没有地板，泥地夯过，潮乎乎的粘土踩得亮晶晶的，散发着新土的味道，靠墙角，居然长出一片茂密的青草来。覃泓上次来时，这间屋子一半是器材仓库，堆满了标本箱、测量仪器，只有窗下空出一张床的地方供所长下榻。现在收拾得清爽多了，器材都搬走了，除了吊着圆锥形大蚊帐的竹床，又加了一张手工极其粗陋的白茬木桌，是华山松的。其余的椅子、书架和一应家具，几乎都是竹篾子和藤条编的。覃怀元喜欢养花，窗下摆着大大小小几十个红椿木桶、旱冬瓜木桶，种植着玉吊钟、苏铁、虎皮海棠，还有许许多多覃泓见都没见过的花。

坐在藤椅上，还禁不住出汗。高领白色开司米衫早在路上就脱去了，此时汗水把她的特立灵大尖领白褂子都打湿了一大片。

她正要到外面去风凉一会儿，“搞政工”的几句话灌到她耳朵里，吸引了她的注意力。

那人说：“听说黎大品各方面表现得都不错嘛，真像你说得那样？”

议论黎大品，覃泓就仿佛听到了别人议论自己。

只听覃怀元说：“墙里开花墙外香，这是常有的事呀。报纸上是把黎大品吹得神乎其神了。”

“搞政工”的问：“骄傲？”

覃怀元答道：“有才的人，骄傲是通病，这倒在其次。他这个人群众关系差，抗上，是个软硬不吃的刺儿头。依我说，谁要他就给谁，乐不得放，谁愿意手捧这么个刺猬？这下子一出名，更不好摆弄了。唉，谁敢要他？再看档案，可以说是一白到底，小学没入过少先队，中学没入过共青团，更不要说共产党了……”

覃泓简直坐不住了，屁股底下的藤条好像根根直竖起来，狠狠地扎着她的皮肉。血一个劲往上涌，她觉得脸孔发烧，汗水像一条条小虫子上身痒痒地爬着。她真难相信，这些对黎大品的贬词，会是出自爸爸之口！他从前说过，黎大品将是所长的接班人。仅仅事隔一个多月，就来个180度大转变，究竟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呢？

由于气愤，下面的谈话她几乎一句都没有听清。

覃泓看见那位“搞政工”的告辞了，彬彬有礼，未免有几分失望挂在脸上。

覃怀元送客去了好一会儿才回来，一面喊热，一面把中山服脱下去，里面的短袖白褂子背后早被汗水打湿了一大片。

他抓起一把特大的土造葵扇拼命顺领口扇着风，问覃泓：“你怎么不吃香蕉啊？啊，对了，你妈妈没给我捎衣服来吗？她快把我这老头子忘了！”

“妈妈说，家里没您这么个人呢！”覃泓格格一乐，从提包里抖出几件衣服说：“这是我上王府井大楼给您买的。”

覃怀元往身上比量着，说：“还是闺女疼爸爸呀！”

“也快不疼您了！”覃泓收住笑，一本正经地问道：“方才您对黎大品的评价是出自真心吗？”

覃怀元眨巴着小眼睛，故意怏她道：“怎么了？爸爸评价谁怎么样，还要得到女儿的许可？”

“您背后诋毁一个好同志，这是不公道的！”覃泓气呼呼地说，“特别是出自您这个所长之口。”

覃怀元哈哈大笑起来，他显然明白了覃泓生气的原因，就笑着说：“你呀，你这么个精明人，有时也会鬼迷心窍呢！你知道刚才那个人是干什么的吗？”

覃泓说：“不知道，也没有义务知道。”

“黑嘴的丫头！”覃怀元从壁隔里拿出一个二尺长、足有茶杯粗的竹烟袋来，在烟嘴上摁上一撮烟丝，划火点着，马上把嘴凑到竹筒上端，猛吸了几口，竹筒里用来过滤的水咕噜噜一阵响。这是山里人的抽烟办法，据覃怀元自己讲，卫生，又可以过滤尼古丁，因此10年前他就扔掉纸烟改抽这个了。

过了几口瘾，覃怀元神秘地眨眨眼，不无得意地说：“那个人是热带植物研究所的人事处长。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我一眼就看穿了，别看他什么都没露。你知道的，热带植物研究所是直属你们科学院的，人家是准军级，我们才是县团级！比我们这归林业厅管的小研究所高好几格呢！平素他们对我们这个小庙，不用说烧香，眼皮都不杆一下。这回看黎大品出了名，就想来挖墙角、抠人了！哼，想得美，谁有好孩子往庙上舍？自己不种树，倒想伸手摘桃。哈哈，我把黎大品说成一个刺儿头，看他还敢要不敢要！”

覃泓这才松了口气，说：“您太本位主义了。再说，您把黎大品平白无故地糟踏一顿，传出去好吗？”

“那我怕什么？”覃怀元又抽了几口烟，“大品的档案在我手里，别人想随便点上个黑点都办不到。小泓，你真是个闯祸精啊，你呀……”

覃怀元的眉头皱成个川字。覃泓明白他指的是那篇报道，心里想，别看你表面皱眉头，心里不定多美呢。

果然，覃怀元极为得意地发着牢骚说：“这回我有活干了，

一登了报，昆明植物园、热带植物研究所、药物研究所，还有几个大学的人，闻风而来，我成了接待站长、解说员！哼，说不定将来我还得设立个信访室。”他抓起一大捆信说，“这都是贺信，这是本省的。再过几天，四面八方的群众来信说不定要把我埋起来。你这闯祸精别走了，给我当秘书吧！”

覃泓故意气他：“那好，既然您感到您手下的人有了成就反成为负担，人，我带走！”

“你带走？”覃怀元根本没往心里去，“好啊，你能耐大了！”

覃泓故意气他：“真的，我拿来了科学院的调令，正式和你商量这个事的。李所长已经默许了。”

见女儿说得认真，覃怀元信以为真，便说：“别说科学院，就是顶头上司调也休想。老李怎么搞的！光留赵士函行吗？”

女儿见爸爸动了真，忍不住格格乐起来。覃怀元这才知道了女儿的当，又气又笑地说：“越学越坏！你看你，穿的是什么奇装异服！你赶紧给我脱下来，别在这儿给我制造闲言碎语。”

覃泓说：“遵命就是了。”

覃怀元这才说：“真鬼呀。你说吧，这次来干什么？发奖金？还是请大品到北京去宣读论文？”

覃泓说：“奖金归您发呀，向我要什么钱？我替您吹喇叭、抬轿子，还得给我劳务费呢。”

“我们自己发奖金还用你操心？”覃怀元忽然有些烦躁，自言自语地说：“奖金，奖金，不是什么好玩意儿！我早说过，物质刺激不是正路货。”

敏感的覃泓从他的表情、话语中觉察到了点什么，就问：“所里给黎大品发了多少奖金？”

“啊，啊，”覃怀元支支吾吾地说，“1 000 块。啊，对了，黎大品的论文已经改过几次了，打印了几份，分发下去征求意见了。你来得正好。我把修改意见搜集齐了，改一改就行了。”

说罢，覃怀元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打印稿，递给覃泓：“你先过过目。”

覃泓翻了翻这份大约四五千字的论文稿，基本没有什么改动，只有开头部分用红笔加了这样几句话：“在四化目标鼓舞下，在省委、林业厅和研究所党组织直接领导下，在分类研究室广大研究人员、工人同志协助配合下……”

无疑，这几句话是覃怀元加上去的。不知为什么，覃泓直想笑，这样不伦不类的话夹到学术论文里，叫人哭笑不得。她忍了一会儿，到底忍不住，还是脱口说道：“这不是太狭窄了吗？你们不吃农民种的粮食，不穿工人织的布？”

覃怀元一时没有转过弯来，正经地问道：“这……什么意思？”

覃泓讥笑地说：“应当改成：在 10 亿人民的大力支援下……”

覃怀元这才听出覃泓在奚落他，点点她的脑门儿说：“真拿你没办法。说正经的，你这次打算在这儿住多少天？”

“怎么，不受欢迎吗？”覃泓问。

“你这丫头真刁！”覃怀元搔着花白的头发说，“我是想，还是速战速决的好……”

听他的口吻，好像有什么难言的苦衷，覃泓问道：“您这是什么意思？看来我真是不速之客了？我没有对不住你们的吧？是我那篇报道失真？还是出了别的疏漏？”

见她认真起来，覃怀元赶紧说：“你别多心。那篇文章写得好极了，依我看，赶得上《哥德巴赫猜想》了。我是说，这里……吃住条件都不好。”

覃泓更听出了破绽，抓住不放：“那么，上次我来，条件就比现在好吗？看来，我在这儿可能要惹是生非，那我连夜走，到昆明去等着黎大品，行了吧？”

这一次，她没有鬼过覃怀元。他说：“你别吓唬人。你呀，越是赶你走，你越是想赖在这里。”

“您知道就好。”覃泓说，“是不是有什么节外生枝的事？”她说的比较含糊，一个少女的自尊不允许她将自己的猜想说得更直白了。上次，她同采访的对象黎大品单独交往的时间最多，黎大品虽说是死了妻子的中年人，毕竟是个男人，一个鳏夫，难免有这类议论。她有过这种体验，只要她同哪个男人多说了几句话，就有人传说她有意嫁给对方，她感到好笑又好气，好像除了恋人、夫妻，男女之间就没有什么正常交往，最好都圈到同一性别的集中营里去才安全。

当然，覃怀元不会听不出覃泓的弦外之音，他不好认真，只能含混其词：“你别多心。我是不希望你太多地接触下面的人，完成你的工作就行嘛。有什么事你尽管找我，这对工作有好处，对黎大品、对你也无害。”

这反倒证实了覃泓的猜测，她有些激动起来，脸都涨红了：“这么说，有人怀疑我要爱上你们的黎大品了？天底下男人死绝了吗？黎大品是美男子，还是百万富翁？是个社会名流，还是高门显贵？”

覃怀元吓了一跳，他没料到女儿平白无故冒出这么大一堆话来，不要说女孩子不宜出口，就让他这 55 岁的老头子说出来，都觉得不好意思。他了解女儿的脾气，锋芒外露，从没受过挫折，不知天高地厚，再加上 80 年代“现代派”的风一吹，更是不得了啦。说平白无故也不对，上次临走前那几天，自己不是向女儿暗示过，叫她不要再接触黎大品吗？确实有风声吹到他耳朵里来，无非是说覃泓可能会爱上黎大品。女儿是水晶脑袋，还不是一点就透吗？难怪她今天在爸爸面前发泄了一大套。他生怕再说下去，会引出女儿更不体面的话来，就说：“你说话怎么没深没浅？这是女孩子该说的吗？别人并没议论你什么，我之所以囑

咐，只是怕有瓜田李下之嫌，对工作不利就是了。我们这里的人，心地的纯正，赶得上水晶！真的，一点不吹，你来过，你还不知道吗？互相倾轧呀、你争我夺呀，还有什么角逐名利、耍阴谋、玩儿心眼啊，可以说统统没有。正像你说的，这是大气和灵魂都没有污染的地方，也可以说是真空箱……”

覃泓冷笑了：“我可是带着各种病毒从人间来的，您怕我污染您的小圈子，想把我锁在真空箱里是不是，那可办不到。”

这可使覃怀元为难了，他相信，女儿说得出做得出，他的话，在女儿面前可没有举足轻重的分量。这个随大军南下留下的北方干部，向来以他的宽厚、粗犷赢得部下的信任。可面对这个软硬不吃的女儿，他却一筹莫展。细想，他自己也确实理亏，他有什么理由把一个搞科学情报的人同科研人员隔离起来呢？可是不这样办，他也是忧心忡忡。他想像得到，这个心直嘴冷的女儿，会给他捅出多少娄子来，她拍拍屁股一走了事，修补窟窿的后事都得他去做。上次她遗留下来的乱事还少吗！

但覃怀元又没有堂而皇之的论点说服她，只好对她施行带有“保护性”的措施。于是他说：“当然，这同你毫无关系，给你工作上的方便就是了。你的活动，由我陪你，行吧？这样可以省去很多麻烦。”

“噢，爸爸当我的监护人？”覃泓狡黠地笑起来，“我是带正式介绍信来的工作人员，不是来看望爸爸的女儿。为了您的难处，我可以暂时妥协，只是暂时的。”

覃怀元说：“谨慎一些总不为过。”

覃泓渐渐切入正题：“我想先了解一下，报纸公布了黎大品对分类学的重大贡献以后，你们这里的反响如何？科学院十分关心这件事。”

这自然是覃怀元必须正面回答的，而且这不难回答。按常理，这里的反响自然比别处强烈，就像大寨人见到涂遍全国城乡

的“农业学大寨”的标语必然为之自豪一样。

覃怀元心里明白，女儿为什么这样发问，他回答得一点都不含糊：“那还用说？高兴，还有点不安，感到贡献还不够。”

覃泓又问：“对黎大品呢？”

覃怀元说：“向他学习嘛！”

覃泓正要再说什么，上灶的李师傅趴窗户问：“覃所长，您的饭送过来吗？在植物园有工作的人不回来吃中饭，我挑了去。”

覃怀元说：“做什么好吃的？”

李师傅说：“三夹鱼，云南名菜。”

覃怀元说：“叫她赶上了！”说着，指着站在书橱旁的覃泓说：“你看谁来了？”

“喔，小覃？”李师傅露出两排被烟熏黑了的牙齿笑了，“你真有口福！上回来，第一顿吃‘过桥米线’，这回又赶上吃三夹鱼。哈哈，我说山茶开了并蒂的一大朵呢，怎么样，有贵人吧！”

覃泓向他问了好，说：“回到北京讲起‘过桥米线’，怎么讲他们都不明白，都说是米粉面条，用鸡汤煨，没有什么稀奇。”

李师傅笑道：“不光吃米线，还得听那段‘过桥米线’的故事，才吃得有味呢。”

覃泓说：“怪不得呢。”

李师傅转身回去，搬来三份饭菜。米饭是在瓦钵子里蒸好的，一人一份三夹鱼。

吃着饭，李师傅问：“小覃，又是为化石树来的吧？”

覃泓说：“是呀，可不大受欢迎。”

“哪能呢。”李师傅挑出一个稻壳，在筷子尖上磕着，说：“人怕出名猪怕壮，猪一壮了就有人算计着宰它了。话这么说，还是出名的好，谁愿意一生一世没油没水地白活？”

覃泓看了覃怀元一眼，覃怀元正在给李师傅使眼色，李师傅只顾挑鱼刺，根本没在意，仍旧说下去：“我还等着黎大品请客

呢！这小子，听说拿了1000块奖金，我还连一碗汤都没喝着他的……”

“这么说，黎大品太不够意思了？”覃泓有意往外逗话。

李师傅说：“人家快高升了嘛！党也该向他开门了，听说要升副研究员，还听说出国的名额肯定是他的，也有人说他能当人大代表……啧啧，人走了红运，黄土变成金哪！李尚年可是个倒霉鬼，在山上再多受六七天罪，不是也分一半功劳？”

覃怀元接过话头说：“别尽说些没边没影的事了。今儿个这鱼，好像胡椒放得多了点儿。”

覃泓斜了爸爸一眼，说：“不是胡椒放多了，我看是粉面子放多了，您怎么老在中间勾芡呢？”

她太精了，覃怀元一点办法没有。

覃泓噎回去覃怀元，又问李师傅，说：“入党啊、出国啊，您看应不应该呢？”

李师傅刚要张口，覃怀元狠狠踩了他的脚一下，他连忙改口说：“天太热，汗出得多，我去做一碗酸辣汤来下饭。”

覃泓早看见了爸爸的小动作。

她没有揭破，她已经断定，围绕着黎大品的成功，这里出现了一个谜团。问别人答案没味儿，覃泓要自己去解答。她从小就有这个倔劲。前些天，表妹拿来一个红红绿绿的“魔方”，这正是风行一时的游戏。她听说，有的人研究半生，也没能把这个六面体弄懂；而有的人掌握了其中的规律，仅仅用十几秒的时间，就可以把每一面拼成同样的色块。

覃泓谢绝了表妹带来的说明书，她在屋子里憋了整整一个星期天，终于成为情报所里第一个“魔方专家”。

她决心像研究“魔方”一样把这个地方研究明白，难道生活中就不存在内在的规律吗？

覃怀元只吃了半钵子饭，就吃饱了。他想漱口，伸手到壁架

里拿暖水瓶，却不想拿下一只淡绿色方格图案的鸭嘴暖瓶，整个暖瓶子都摔扁、掉漆了，根本没有瓶胆，难怪覃怀元倒不出水来。

覃泓格格地乐起来：“真节约啊！这破暖瓶还留着呢！”

覃怀元又把破暖瓶放回原处，说：“将来，它是要进陈列馆的，你别小瞧它。”

李师傅解释说：“这是时青烈士的。时青真是个好人啊！她上山，天天背着这个暖水瓶，她丈夫有胃病，不能喝冷水。”

时青？好耳熟的名字啊！啊，覃泓记起来了，时青不是黎大品的亡妻吗？她是烈士？怎么从没听黎大品提起过？

见女儿发愣，覃怀元喝着水，对女儿说：“她死去5年了。为了寻找提炼坦克车用的高效抗凝剂的贺得木坠崖牺牲了。她那种人，是你永远不能理解的。看上去像个普通的家庭妇女，从来不多说一句话，只知道闷头干活。咱们太缺这种人了。”

只有在这种时候，覃泓是严肃的，默默地接受着爸爸的教育。

活化石

征求对论文的意见是首要的，尽管覃泓很想先去看看黎大品，还是同意先同覃怀元去找杨泽泗。可以说，杨泽泗的见解本身就带有权威的性质。他是这个森林研究所惟的一个研究员，如果不是覃怀元把官司打到林业部，杨泽泗也早就调到哪个大学或高级研究院去了。覃怀元深知浅水养不住大鱼的道理，“深挖塘，养大鱼，小鱼变大鱼”，便成了他追求的目标。

覃泓却不怎么喜欢这个65岁的植物学家。由于父母的地位，她家可以说是“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各种学派的教授、研究员、博士，她见得多了，只钻学问走路常撞电线杆子的、不

会煮饭只靠吃面包的、诙谐的、大度的、孤僻的、沉默的，她能给同伴们讲述出一连串令人笑破肚皮的故事，都是她目睹的科学家们的轶事。她爱他们，甚至有一回她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知识分子是我国最优秀的一部分。”为此叫父亲批了一通。

为什么偏偏不喜欢杨泽泗呢？她也难以一下子说清楚。她觉得杨泽泗过于晦涩，他像一个靠厚甲和蜗室生活的蜗牛，只有在他认为最安全的时候，才试图伸出两只触角探探风声，很快又缩回去。总之，这是一个永远叫人无法深交的人。覃泓怀疑他没有知心朋友，怕是他的妻子也难同他相知。

但性格、为人都不影响杨泽泗的学术权威价值。他先后出版了5大本有关森林植物的专著，在森林研究所里，几乎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凡涉及学术上的事，没有杨泽泗的意见，几乎是不生效的，同会计手上的白条子一样无价值。

覃泓和覃怀元穿过一片竹林，来到植物园。据黎大品说，他们这个植物园是一种模拟和仿制。生物学家们认为，大自然有一个经过亿万代选择、淘汰而后遗存下来的生物圈，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生物，都在这生物圈里相互制约、相互依存地生活着。他们目睹近几个世纪以来人们逐渐在破坏生物圈的自然形态，这就使大气、气候、土壤、河川、干湿度、冷暖都相应改变，空气、水源的污染、森林破坏带来的干旱、多风和水土流失、泥石流爆发……已经日益严重地威胁着人类赖以生存的生物圈。据说，他们的植物园，就是仿照大自然中森林自然群落的样子，创造人工群落，借以研究生物圈的规律的。

他们这个植物园，还只是刚有雏型的人工群落，高的是橡胶树，低的是茶树，树蔓盘绕匍匐地上的是药用植物使君子和砂仁。据说，这高高低低的植物群各得其所，互相依赖、共御天敌，是彼此不可缺少的生存条件。

橡胶树正是割胶的季节，几乎所有的树干上都挂有一只木碗

在接胶，树上割出来一条胶口，原胶像蜡泪一样，一滴滴地滴到胶碗中。

覃泓顺手从胶口上扯下一条乳白色干涸了的胶条，在手中扁有扁地捏着，向一片咖啡林子走去。

咖啡林旁边，有几棵刚从热带雨林中移植过来的毒箭木、龙血树，再有一棵就是黎大品背回来的化石树了。这几种稀有树种，在植物学家眼中，如同活化石一般珍贵，它们得到了精心的莳弄，吃小灶，专人护理，哪怕叶片上偶尔爬上一个虫子，都要引起学者们极大的注意力。覃泓曾玩笑地称它们为“植物贵族”，她说，假如其他植物有高级神经，一定会嫉妒得发疯的。

覃怀元没有猜错，杨泽泗教授果然在那株化石树旁实行“特级看护”。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杨泽泗在化石树旁支起三根竹竿，撑着一块方不方、圆不圆的能自动升降的破布，离远看像一块降落下来的帆篷。它一半遮着化石树应得的阳光，一时使人弄不清化石树到底是喜欢阳光还是喜欢荫凉。

再看这位研究员，趴在树下，身子弓曲着，像一只大龙虾。他的耳朵侧伏在地面上，像地震学者在倾听地火运行一样。

覃泓用胳膊肘碰了爸爸一下，差点想笑。她小时候常跟爸爸到郊外农田去，爸爸不是常常趴在玉米地里弄得满脸都是泥吗？爸爸说他在听玉米拔节的咔咔声，小覃泓却怎么也听不到。

化石树还是原来那么高，不过梢头生出一些翠绿的新叶子，不再使人担心它有可能枯死了。那对长得圆而厚的叶子水灵灵的，叶间正开着很不显眼的小白花，花儿比米兰还小。

覃泓对爸爸说：“您看他，多认真！我看搞科学的都有点神经病。”

覃怀元没有笑，一本正经地说：“同他谈话你要管住你那张嘴，有点分寸。”

“叫我嘴上贴封条？”覃泓无声地一笑，“为什么？”

覃怀元冒了一句：“他……是‘九三学社’的，民主人士。”

覃泓捂着嘴乐了：“嗨，我还以为他是没有外交关系的外国官方人士呢！我呀，同外国人谈话都不用别人指定提纲，想说什么说什么。不要把别人都当傻瓜！说实话，古往今来都不丢脸；假虚荣，才真正可怜。”

覃怀元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说：“你呀，幸亏不是我的人……”

言下之意，覃泓当然懂得，她说：“您真敢要我，我不出两月，准给你弄个人仰马翻。”

覃怀元认真地说：“杨教授是从不开玩笑的。这么多运动，他从来没犯过错误。”

“那也许是他最大的错误。”覃泓说，“他保险，无非是缄默，对一切都不表态，看着党和国家出现偏差都不说一句话，这种人即或一辈子安然无恙，即或档案上一条错误没记载过，也不是一个好人。一个标本箱里的活化石罢了！”

覃怀元吓了一跳，生怕她的议论让杨泽泗听到，赶紧摆手制止。

她的话，杨泽泗是否听到不可知，声音他是听到了。他吃力地从化石树下站起来，扶了扶眼镜，向这边茫然地张望。

杨泽泗又黑又瘦，衣服显得肥大不合体，但风纪严谨，他的样子更像算卦先生。

杨泽泗看了覃泓一眼，连招呼都没打，好像根本不认识似的，只是同覃怀元点点头。

比上次还要冷淡！覃泓觉得脖颈后头都在发烧，她是最不堪别人冷落的。

覃怀元很敏锐地注意到了呈现在覃泓脸上的尴尬，马上提示性地对杨泽泗说：“杨教授，你忘了吗？这是上次来过的覃泓啊，科学院情报所的。”

“记得，你女儿。”杨泽泗依然没有什么热情流露出来，“你来的也许正是时候，塞翁失马哟……”

“塞翁失马”的下句不是“焉知非福”吗？这是何所指？真正令人费解的阴阳怪气！

覃泓突然望着杨泽泗格格地乐起来。杨泽泗不明白她为什么笑，以为自己身上出了什么纰漏，赶紧看看衣着，大热天，一个扣子都没解开呀！

覃泓望着老先生张皇失措的神态，笑得更响了。笑声里包含了报复的成分，这是覃怀元听得出来的。

覃怀元从口袋里摸出一方手帕，指指脸颊，递给杨泽泗。

原来杨泽泗左腮上抹了一块泥。

杨泽泗用手帕擦了擦脸。覃泓的报复心得到了满足，像孩子似的蹲下去抚弄着化石树厚实的叶子，说：“上帝，化石树还健在！倘若它枯萎死掉，我可就犯了欺骗天下舆论的大罪了。”

这是真话。化石树的成活一直是悬在她心上的，有几次梦见化石树枝枯叶黄，她都哭醒了。

杨泽泗感兴趣的话题似乎根本不在化石树上，他手搭凉篷看看一丝云都没有的蓝天，说：“明天早晨有雾……”

覃泓真想说：“您老先生就是一团雾！”但她忍住了。

覃怀元也没有单刀直入切入正题，他说：“再过一个多月就到雨季了，移植的任务应当尽早结束。”

杨泽泗点点头：“这没问题。”

覃怀元说的完全是另外的话题：“杨教授，上次我跟你说的事情，你考虑过了吗？选拔中年所长的事再也不能拖下去了。”

不知为什么，覃泓觉得，黎大品就是理想的人选。这不是偏见、偏爱，连伙房的李师傅都猜定黎大品是当然人选，还走这个形式干什么？但覃泓并不担心杨泽泗会作梗，从前杨泽泗在北大任教时，黎大品是他的得意门生，按常理，他会不遗余力地推荐

高足。人，不论多么清高、有学问，感情总是客观存在的。不久前，有些老学者们在批准新提拔的教授、副教授名单时，不是都抢先把自己的学生画了圈吗？这当然也可以解释为“了解”。

却不料杨泽泗采取了顾左右而言他的滑头办法，他望着远山冒起的缕缕烟火，说：“刀耕火种……阿佤人、景颇人又在毁林烧荒了。为了半亩苞谷田，可以毁掉一百棵大树，人们在毁掉自身生存的生物圈……”

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覃泓真难以想像，平时覃怀元同这样一个像活化石一样的人打交道，得有多大的耐性！它永远是供人猜测的灯谜！

覃怀元是锻炼出来了。他绝不像刚从部队转业的干部，带有命令作风的残余，也不像一般人出于尊重老知识分子地走过场。他笑了笑，启发式地说：“从历史和全面看呢，当然赵士函优越一些，而从业务水平上看呢，黎大品更理想一些……还有驯化室的李永，也不错……”

覃泓暗暗好笑，她觉得爸爸也够滑头的了！他一下子端出三个人来，各有千秋，又看不出他的倾向性，看不出厚此薄彼，她猜不到杨泽泗怎样回答。

杨泽泗仍然是模棱两可地回答：“这是组织上的事，我给植物分门别类还差不多。大品不坏，嫩点。他这种人，不当官为好。赵士函也说得出，都各有千秋。”

简直等于什么都没说！

覃泓几乎想同他辩论了！他为什么贬黎扬赵？因为赵士函是分类研究室的副主任兼书记吗？是他怕人家诋毁他“有私心”吗？是他为了表白自己“亲者严、疏者宽”而故作姿态吗？

不论哪一条，覃泓都觉得杨泽泗私心太重，或者说心地不善，她憋了一肚子气。

然而覃怀元无意就此深谈了，他说了一句“再听听群众意

见”，就转入了正题：“杨教授，论文你看过了吧？”

覃泓有意刺他一句：“强将手下无弱兵，杨教授一定给改得更精彩了。”

殊不知杨泽泗无动于衷，说：“我只改有价值的东西。”

这不是公然暗示，黎大品的发现和科学论文是一堆废纸、毫无价值吗？

覃泓想起了上次见面时杨泽泗的冷漠。整个考察队都为黎大品的发现而震动，使这远离人群的角落沸腾起来。只有杨泽泗冷静得使人疑心他有什么阴谋，覃泓几次去找他谈，他总是扯些不着边际的题外话，好像他的学生不是给他带来荣耀，倒是抹了一把黑。

她现在不能再用孤僻、古怪一类性格上的因素原谅杨泽泗了。她疑心他是个嫉贤妒能的人，“弟子不必不如师”，那只不过是书面上的道德，难道学术界里没出现过先生剽窃学生研究成果的劣迹吗？

有了这些念头存在心里，覃泓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情。她是喜怒哀乐溢于言表的人，她还没有学会在人生的夹缝中曲折生存，借以保护自己。

杨泽泗向一排从印度引进的团花树走去。树荫下放着一把桐油伞，掉光了油漆，如同主人的秃头一样难看。一把宜兴泥壶，盛着凉茶，一个饭盒，只剩下三夹鱼的鱼刺、鱼头扔在里边。还有一个浇水用的喷壶，一把铁锹，一个老掉牙的旧式皮包，镀镍的皮带卡子锈迹斑斑，这也许是他留学哈佛大学时的洋古董呢。

杨泽泗打开公文皮包，抽出经他过目的那份论文打印稿，双手郑重地交给覃怀元。

覃怀元如获至宝，迅速翻下去，既没有大段的修改意见，也没有眉批、行间批，只有前面勾掉了几句话。

覃泓凑过去斜了一眼，勾掉的那几句是涉及到杨泽泗的：

“化石树在中国低纬度热带雨林存在的学说，是我的指导老师杨泽泗教授早在1952年提出的。此后，在我将寻找化石树列为科研专题开始行动的几年里，杨先生的理论始终起到指南的作用。”

他为什么要抹掉这几句替他扬名的话？是出于自谦，还是觉得学生这样轻描淡写的一笔不够劲，因而索性不沾这份光？

覃泓当然是后一种理解。

覃怀元仿佛没有什么反感，他很认真地同杨泽泗讨论：“这样看来，杨教授对论文本身没有什么疑议了？”

杨泽泗说：“一手好文章。我更看重的是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指的自然是化石树了。这话怎样理解呢？可以解释为他不重视宣传、出名得利，更注重切实的工作；另外的解释就要令人战栗了：化石树本身是否能站住脚，还值得画问号！

模棱两可的人，永远是模棱两可的话。

杨泽泗拿起铁锹去掘灌渠了，也没有跟客人招呼一声。

向回走的路上，覃泓气呼呼地说：“难为您能忍受这种人在您身边工作！您整天围着活化石猜谜吗？”

覃怀元笑了：“人，不像鞋厂里出的鞋子，几号楦头出几号鞋，人是最复杂的呀！”

见鬼！可以说覃泓的热劲一下子降下去，有点不寒而栗。她开始怀疑爸爸的话的真伪了。他把这里描绘得那么干净，大有美化生活之嫌！

吃过晚饭，覃泓坐在窗下花丛间细心地浏览着黎大品的论文稿，猛听到远处传来一阵摩托车的轰鸣声。她抬眼望望林木掩映的土路，掀起一片黄尘，一个绿衣邮递员正驾着一辆带斗摩托车急驰而来。

摩托车就停在所长办公室门前，邮递员把一份电报递到覃泓手中，问道：“所长不在？”

覃泓说：“不在。”

邮递员将签收簿塞到她手上：“那，请你给代签一下吧。”

覃泓拔出自来水笔签了字，那人讨了一口水喝过，骑上摩托车走了。

覃泓扫一眼电报，是昆明所里打给爸爸的，印着“加急”的方戳。覃泓把电报放到旁边，又去看论文稿。

好奇心却总是分散她的注意力。到底是什么事情这么急呢？她突然产生了偷拆电报的强烈欲望。对，悄悄拆开，再悄悄糊好就是了。她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仿佛这封电报是和她以及化石树有关的。

覃泓真是个促狭鬼儿！她用揭纪念邮票的办法，用清水把电报封套的封口处润湿，轻轻揭开，抖出电文来。

电文是这样的：

速返昆明研究提拔中青年所长事宜。李

覃泓一面找糨糊重新糊好封套，一面猜度着这件事的结局。

正在这时，爸爸从竹林中的小径走回来。

覃泓装作毫不介意的样子，把电报递给爸爸：“有您的电报！”

覃怀元戴上镜子拆看。他一点都没觉察电报是刚刚封上的。看过，他略为沉思了一下，装到口袋里，返身要进屋。

覃泓故意问了一句：“爸爸，什么十万火急的事还要拍加急的？”

覃怀元哦了一声，说得平平淡淡：“所里叫我回去一趟，研究职工住宅修建问题。”

覃泓差点笑出声来。看来爸爸还是那么古板。记得那年他回北京开会，覃泓到前门饭店去看他，他不在屋，覃泓顺手翻开了他桌上的会议文件，被爸爸瞧见，好一顿发脾气呢！他说：“这

是起码的常识，不该你看的東西，摆到你眼皮底下，你都不能看！”

当然，这份电报谈不上有多大保密价值，挑选接班人的工作，全国都在做。覃泓猜得到，爸爸所以瞒着自己，不过是怕自己搅到复杂的人事关系里去，覃泓乐得佯作不知。

大自然的女儿

三月的绿色王国，黄昏后的时光更为宜人，虽然是无雨的旱季，却并不是燥热，热带雨林常绿乔木蒸散出来的水分足够维持空气中应有的湿度。这个季节不用抹驱蚊油，不用吊蚊帐，比苍蝇要大的牛蚊子还没到繁殖的旺季。到处流荡着温馨的花香，可惜好多人只热衷于杭州、桂林、北戴河，尚未发现这里的宜人风光。

覃泓见爸爸临行前又在忙着叫人，研究分奖金的事，就说到卜少河边去散散步，趁便溜出来，她急着要去看黎大品。

黎大品住在半里地外的河边山坡上，是一座木屋。这座原始的建筑，据说是解放前流放傣族“琵琶鬼”的所在。凡是冲撞了头人的家族，便被指为“琵琶鬼”附身，赶出去，赶到孤岛一样的蛮荒地域，任你死在外面。

黎大品所以不住活动板房，据说是为了照顾他。从前，他和妻子另起炉灶，不吃考察队的伙食，他是惟一带家口的研究人员。可惜，几年前他的妻子死去，他无意搬出来，仍然住在那长满苍苔的木屋里。

顺着芳草萋萋的河边小路，覃泓悠闲地走着，不时地闭起嘴巴，深深地吸一口流溢着花香的空气。

月亮从剪纸一样的远山背后升上天幕，挂在弯脚龙竹摇曳的竹梢上。

龙竹真够粗的了，直径竟有二尺，难怪当地的山民拿它当粮食篓、当水桶、洗脚盆呢。

突然，远远地传来一阵清幽的歌音，伴着木铃古朴的丁冬声。

可以听出，这是一个少女，可能她的嗓子具有歌唱家的天赋，但还处于没有明师指点的自流状态，声音里透着原始、稚气，或者说发音与共鸣的部位都不得当。

但那支歌子却很好听，是傣族姑娘泼水节、扔包时唱的曲子，她听过，那是用象脚鼓和芒锣伴奏的，节奏感极强，火热而粗犷。不，这个曲子要婉转得多，含蓄得多，倒像大理一带白族姑娘三月街上唱的小调。

但那歌词却是含混的，有字和没字差不多，反反复复是那么几句：

青山高哎，
绿水长。
啊，
这里是远离人群的地方。
啊攷攷攷攷，
这里是远离人群的地方。

抚弄着河边一枝颤抖的竹梢，覃泓有如饮了琼浆玉液那么清爽、惬意。她听得出，这歌子不是单纯的赞美，还有慨叹。慨叹什么呢？这是覃泓暂时还不能理解的。

她悄然循声走去，听到了哗啦哗啦的水响。

一个傣族姑娘正把筒裙卷起来，左手轻轻捺着裙摆，右手扶着水牛背，正狂过没膝深的卜少河，向对岸走来。月光洒在平静的水面上，像一块闪动的水银镜片，姑娘涉过的地方，水银镜面

破坏了，抖动着碎银屑般的浪花。那清幽的水声、牛颈下木铃的丁冬声，还有傣族姑娘优美无华的歌声，使这水墨画般的环境顿时活起来。

仿佛怕惊动了这自得其乐的少女，覃泓躲到一丛龙竹后头，看着姑娘牵牛上岸，涮脚穿鞋。

月光照出她那姣好的身材、清秀的脸庞。她的装束是纯傣家款式，上衣是月白色的无领紧身衣服，拦腰扎着一条镂空的纯银质腰带，直拂脚面的筒裙是藕荷色的，有白色斑点似的碎花。

她真像个恬淡的、秀美的大自然的女儿！覃泓折了一节竹梢，笑吟吟地从竹林里走出来。

猛然间见到生人，傣族少女惊疑地后退半步，又迟疑了一下，才垂下头，挽紧牛缰绳，打算快步从覃泓面前走开。

山里人的羞赧！覃泓越发觉得这女孩子可爱，就拦住她说：“你叫什么呀？依花还是依香、依兰？”

傣族人男孩都有个“岩”字放在名字前面，女孩则冠以“依”字，这是覃泓听赵士函告诉她的。

傣族姑娘侧过脸去，文静地笑了：“我叫依江。”她的汉语不够纯熟，但也很流利。

月光下，覃泓看见了姑娘闪亮的两颗金牙。她见过的傣族少女，几乎百分之百镶两颗金牙。这不是因为她们的牙齿早蚀，而是象征富贵的一种习俗。当然，没有哪个人的牙齿真的镶上金牙套，不过是价值三五块钱的紫铜皮牙套罢了。这风俗便宜了一些走山串寨的镶牙匠，很发了一笔财呢。

再注意看看她的银腰带上，没有挂着钥匙，钥匙是主妇的标志，这说明她还是个待字闺中的姑娘。

覃泓问她：“你是芒寨的？”

依江点点头：“我去放牛了。”

覃泓说：“你唱的歌真好听啊！谁教的？”

依江羞得双手蒙起脸，头也不敢抬。

覃泓问她：“你十几了？”

“17。”依江开始反问，“你是从北京来的？”

覃泓试着摸摸水牛那对弯得快扣到一块的大角，笑着反问：“北京人身上有记号吗？”

依江说：“你说话真好听，和广播里的声音一样……黎老师说过，你快要来了，上回我没看见你，我到山里采树籽去了……”

“黎老师？”覃泓问道，“是黎大品吗？他是你的老师？”

依江点点头：“芒寨没有中学，阿爸不让我念书了，黎老师有空就教我念书。”

覃泓问：“你今天还去跟他念书吗？”

依江点点头，又说：“不一定。”

覃泓说：“好啊，我正要上他那去，咱们一起去。”

依江这次一反羞涩，拉住牛缰绳，断然地摇摇头：“我不能和你一起去。”

“为什么？”覃泓有点奇怪。

依江不肯说，拉起牛要走。走了几步，见覃泓呆呆地站在那里，她又站住，怯生生地问：“你……怕走夜路吗？”

覃泓想从她口中套出点什么，就顺口答道：“我一个人不敢去，天黑了。”

依江似乎很犯难，脚搓草地，寻思了好一会儿，才说：“我送你去，你不要说我带你去的。”

覃泓口上答应，心里却更加纳闷了。

月光在小河里抖动着迷离的光斑，她的心上也有些迷离恍惚。

在这远离城镇的地方，她的到来能不是头号新闻吗？耳朵再背的人也会知道，何况当事人黎大品呢！

令人不解的是出奇的平淡！她的出现根本没有什么强烈反响，没有人像她想像的那样，人们蜂拥而来，把她团团围住，问北京新闻、打听“小道消息”，上次不是这样子吗？别人倒也罢了，黎大品居然也不露面，这真叫她心里委屈。

听依江吞吞吐吐的话，她证实了自己的直感并非多余，她受得住敌意的挑战，她受不了礼貌的冷漠。

半山腰上，埋在竹林中的木屋只露出苍黑的一角，竹隙中闪烁着窗里的灯火。从木屋到山脚的卜少河，有一百多阶青石板路，年深岁久，风化的石缝中钻出许多野草来，石板路两旁是高大的剑麻，它们大得出奇，遍地都是，北京任何植物园、公园里加意培植的剑麻都要比这里的逊色。

看着覃泓登上石板路，依江牵牛站住。她说：“我看着你上去，别怕。你有空到我家去玩儿吧。”

覃泓只好点点头：“我不害怕了，你回去吧。”

依江极守信用，她一直望着覃泓走近木屋，这才伴着丁冬的木铃声走远，身影消失在竹林中。

木屋是用整根的三尖杉垒起来的，时间久了，木质表面都变成了苍黑色，木缝间长满青苔，房顶爬满龟背藤。住起来，这个潮湿的木屋一定不会舒适，可在画家笔下、诗人眼中，它是捕捉诗情画意、产生传神之作的所在。

覃泓在门外一丛香蕉树下站了一小会儿，她在考虑以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口吻突如其来地出现在黎大品面前。她这样费斟酌地讲究方式、琢磨台词，对她来说，实在还是不多见的呢。

叩门，没有回音。

再叩，还是没人应声。

她轻轻拉开潮湿、厚重的木板门，门轴发出泚人的吱嘎嘎的叫声，吓得她头发根都枕起来。

屋子里真的没有人。

这是覃泓第二次光顾黎大品的陋室。头一次也是不请自来，她意识到，如果等待黎大品的邀请，那她将永远没有走进这居室的可能。

还是老样子：窗台上点着一盏油瓜油灯，有一种说不出的怪味，像烤焦了橡皮或者烧糊了猪蹄筋。窗子上还是蒙着那块白塑料布，只不过已经撕裂了几个口子，在晚风中唛啦唛啦地响着。靠窗，四根庵地的柱子支着一块红椿木板，权当工作台，只闲出放得下两只胳膊伏案的地方，其余的地方全被堆积如山的标本箱、标本夹所占领。靠墙根，铺着一块木板，上面堆着书籍，像劫后的样子。

床，是竹子编的，被褥既破又脏，胡乱卷到一起。主人除了给自己留下 60 公分宽的一条，其余地方也是堆满了书，那书里夹满了纸条、书签。

一应家具、进山的绳索、铁镐以及炊具都摆在东墙下，三块石头底下有几星残火，简易炉灶上还架着一个双耳铁锅，里面发出狷狷的响声。

她打量一下房间，走到灶旁，揭开锅盖一看，里面煮着几块红薯，汤早干了，发出一股焦糊味。

可以肯定，方才黎大品还在，或者还没来得及吃晚饭。

那么他到哪里去了呢？

她决定坐等。

她坐到吱嘎乱响的竹床上，忽然看到了一帧照片，是悬挂在黑乎乎的墙上的。这是上次她没有发现或者说没有注意到的。

她踮起脚，取下镶在石膏框里的照片。她发现，这个相框上一尘不染，看来主人是经常擦拭的。

60 年代的装束，60 年代的照相水平，照片的题词也是 60 年代的。那一行字是：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覃泓仔细端详这帧稍稍泛黄的照片，端详着两个想笑又笑得

十分拘谨的青年人。这无疑是黎大品和他的妻子时青在走出大学校门时的合影，说不定那一行字可以翻译为“订婚纪念”的，知识分子的题字总是含蓄的。

时青说不上漂亮，但却属于那种越看越受端详的脸儿。她的一双眸子远没有覃泓的动人，但却深沉得多、成熟得多。

可惜，她已经骨埋青山了，听说死时才三十几岁，正是为祖国效力的年华。

覃泓有点凄楚。她惟恐这时黎大品进来，会勾起他辛酸的往事，赶忙又把相片挂回了原处。

她又有了新发现，被子上有一件童衣，是和平服，蓝色的。看尺寸，这孩子不超过七八岁，当然是个男孩。

是黎大品的孩子吗？怎么没听他提起过？对了，黎大品是长春人，即或他有孩子，也绝不会放到这荒凉的地方，大城市受教育的条件要好得多，奶奶会忍心让孙子在遥远的森林里同他爸爸一道吃苦吗？

那么，这是谁的衣服呢？

覃泓忍不住拿起了那件童衣，上面还连着针线，钉着一块没补完的补丁。她差点笑出声来，补缀的针码足有半厘米宽，而且贴在肘部的补丁是七扭八歪的。

她几乎没有通过大脑，立即拆除缝了一半的补丁，重新补缀。覃泓没有学过女红，也从来没自己剪裁缝制过衣服，但缝内裤、钉纽扣总是干过，水平再低，缝出来的针线毕竟像女人的活计。

当覃泓把这件童衣补好叠起来的时候，已经快到8点钟了，黎大品还没有回来。

她猛然意识到，黎大品是有意躲起来不见她的，再等下去有什么意思？

她悄悄走出木屋，掩好房门，在院子里站了好一会儿。

月华如水，远近葱郁的林木层次分明，树叶在晚风中飒飒作响。她仰望挂在寂静夜幕上的月亮，沉思了好久，只觉得一阵阵委屈，尔后快步踏着石阶，下了山。

覃泓的住处，被安排在赵士函的屋子里，赵士函去北京开会还没回来。屋子里一股霉味。她没点灯，在床沿儿上坐了一会儿，又走出来，信步来到爸爸的房门前。

屋子里点着一盏汽灯，窗子敞着，各种趋光反应的大甲虫拼命向灯上扑，撞在灯上发出扑扑的响声。

覃泓见有人在同爸爸谈工作，就坐在门口纳凉。先时，她没注意去听，后来，她听出来，那个三十多岁的干部是昆明所里的一个什么科长，争论的问题，就是那1000元奖金的分配问题。

爸爸好像很生气。他抖着一张纸，吼着：“你这业务科长真行啊！按人头平分？撒芝麻盐儿！哼，这又不是综合奖金！”

那位科长赔笑道：“我当然知道，这是绝对平均主义，可不这么做，有什么办法？矛盾重重！”

覃怀元说：“这是科学发明奖，充其量，分类研究室的有关人员各得一点，怎么能连收发室的门卫、食堂的大师傅都沾光呢？”

科长苦笑着说：“覃所长忘了吗？上次综合规划室得的那500元奖金，就因为没分给食堂，结果害得职工两天没吃上饭！”

覃怀元忍着气问：“那么，按人头均分，一个人能分多少呢？”

“4块1角8分，”科长小账算得流利极了，“如果所里要扣一部分的话，一个人可分3元左右。”

“好一个3元左右！”覃怀元愤愤然地说，“叫每人拿回去打两壶老醋吗？科研奖金，是奖励那些对科学有贡献的人的，不能这么用！撒芝麻盐，等于没有奖金。”

科长说：“李所长也琢磨了很久，大伤脑筋，最后还是只能这样。”

“不行。”覃怀元斩钉截铁地说，“如果这样分，宁可不住下发。反正我明天要回省里去，我要把这件事提到党组会上去。分钱事小，这涉及到政策啊！”

科长不再说什么。

门外的覃泓长长叹了口气。她想，怪不得黎大品避而不见，怪不得黎大品的处境并不像她想像的那么乐观，原来这样复杂呀！

月亮最圆的时候

姑娘的敏感不是多余的。

她猜得很对，黎大品确是有意回避她。其实听到了冬的木铃声响进木屋里，他正坐在灶前吃煮地瓜，刚咬了一口，就推门出来看，以为是依江夹着课本来学习的。

当他借着明亮的月光看清一步步走上山来的是覃泓时，他立刻从木屋后头的竹林钻走了，坐到一株短穗鱼尾葵下，吃着地瓜，听着木屋里的动静。

覃泓终于走了，黎大品相信她是抱恨而去的，他有什么办法呢？

按常理，千里马见到伯乐，那是要摇尾长嘶表示亲切的。不能说覃泓是识别千里马的伯乐，这个热心肠的姑娘毕竟是黎大品的赞助人。

他没有想到，覃泓把他寻找化石树的事情在报纸上公布出去。这使得此前默默无闻的黎大品在一个早晨扬名天下，贺信多得他无法拆封、无法卒读，他在天下人们心目中一霎时成了有影响的人物。

黎大品不是木头人，也不是那种心如死灰的老朽，他能不高兴吗？

黎大品不是完人，他的缺点是明显的，下决心改了多年，仍旧无济于事。记得他在大学念书时，毕业鉴定书上就有“骄傲自大”、“自由散漫”两条过错。他逢会检讨，可是半年前他作为党的积极分子征求群众意见时，几乎没人否定他的工作和科学态度，但一提到骄傲和散漫，那也几乎是异口同声的。

他为此苦恼过，这两条过错就像影子一样随着他，甩也甩不掉。

记得有一次带助手李尚年进山，他就十分诚恳地要李尚年帮他克服老毛病。李尚年虽然年轻，却有7年党龄了。他是以品学兼优的资格被保送进大学去“上、管、改”的首批工农兵大学生。

一个月的野外采集工作中，他事事谦虚，处处虚心，差不多快要扭转李尚年对他的老印象了，却不料下山那天他又露了馅儿。他们在挖最后一棵龙血树时，李尚年看看天阴要下雨，就大刀阔斧地干起来，切断了好多须根。黎大品发现了，忍着气要他另挖一棵，李尚年不干，黎大品火了，说：“这是科学，不是挖土石方！你没看见我怎么挖树吗？躺在树下，用小铲子一点点拨土，连一根线头细的须子都不伤才行，我挖一棵树用一天半，你俩钟头就掘出来，太不像话了！就你这样的人还配搞科学研究？”

坏了！可想而知，李尚年对他的印象比从前更坏，由“骄傲”一下子升级为“狂妄”了。

平庸的人也不乏骄傲者，但那是不太显眼的，没人注意他；假如平庸的人突然声名显赫起来，那你的缺点可能比成绩膨胀得还要厉害，就要处在千夫所指的地步了。

黎大品现在就是处在这样的艰难局促之中，如坐针毡，如履薄冰，他十二分小心，仍旧无济于事。

很显然，这是覃泓的好心和多事给他带来的厄运。

从前，尽管他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可并不影响他同人们的和睦相处，他是处在友爱和相安无事的一群人中。

妻子死的时候，所里的人怕他过分悲伤，一天到晚轮换着陪他散步、谈心；那时他的孩子还小，他坚持带在身边，没有人违拗他。以赵士函为首的女同志轮流替他哄孩子、洗尿布，给孩子熬粥、喂饭，覃怀元还特地赶回昆明去为孩子买代乳粉、糕干粉。

他在危难中得到了友爱的温暖。

现在，他处在春风得意的时候，却失掉了这一切值得回味、留恋的东西，他倒像跌进了冰冷的地窖一样。

这变化是从什么时候、用怎样的方式开始的呢？实在没个头绪。

他，向来是头一挨枕头就打呼噜的人，从前妻子开玩笑地叫他为“呼噜大王”。可是近来他尝到了失眠的滋味。

夜里辗转反侧，有时甚至是彻夜合不上眼。他后悔，甚至想尽一切办法补救失去的一切，可他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补起。就像一片网通体烂掉，百孔千疮，无论从哪下手补它都是枉然！

现在，他仰到矮小的、散发出一阵霉味的竹床上，禁不住又想起了那令人齿冷心寒的一幕。

那是前几天发生的事情，黎大品去昆明参加林业系统学术讨论会。他本来不习惯于出席这种会议的，多少年来，这差使当然是赵士函的。赵士函是个能干的女人。学术上虽说一般，可组织能力、理论水平、外交活动能力那是黎大品望尘莫及的。

黎大品真心实意地推辞了几次，无奈覃怀元执意要他去，而且他知道赵士函将要进京参加植物学会理事会，这才答应下来。他是带着儿子青青上路的。青青从小有个肚子疼的毛病，赵士函曾多次劝他带孩子到昆明去看看病，一直没有机会，他这次想起

来了。

会期不长，只有 5 天。会后他领孩子看了病，没发现什么。

启程返回芒寨时，黎大品特地跑一趟东风商场，买了 10 斤高级水果糖和巧克力，还有一大堆罐头。买不买，他是经过激烈思想斗争的。走时，考察队和研究室的人显然把这次会看成一种荣耀，自然和化石树的发现联系起来。人们没有说话，但那眼神是明白的：你黎大品若不是寻找到化石树，这样的美事能轮到你头上？更何况，已经传出风声，省科委将要发给化石树的发现者 1 000 元奖金，叫他请客的呼声更高了。

但是，如果买了糖请大家吃，那不是证明自己居功了吗？不买，人家又会嘲笑你小气。食堂李师傅不是吵嚷着要吃喜糖吗？

虽然买了糖，黎大品却是违心的，好像干了一桩没脸见人的勾当。

坐在长途公共汽车里，青青问他：“爸爸，买这么多糖，是给依江阿姨的吗？”

黎大品说：“都给。也给叔叔、阿姨们吃。”

青青说：“我能猜着，下了汽车，保准一大帮人来接咱们，吉普车能来吗？”

黎大品心里一动，含糊其词地回答孩子：“叔叔、阿姨们忙……”

黎大品知道，所里的人会出车来接他的。好事的所长覃怀元暂留所里没回来，他打电话给考察队，没挂通，又把长途电话挂到芒寨，托傣族老乡代转这个消息。

他们下车的小站叫勐遮，是个小镇子，平时上下车的旅客寥寥无几，车站又在远离小镇的公路边上，有没有人接站，坐在汽车上离很远就能看得见。

勐遮车站的木板房前面，只有三两个等车的傣族人坐在土坡上，吃着甘蔗，冷冷清清，根本没有研究所同事们的影子，更不

要说看见后开门的吉普车了。

不知为什么，黎大品的心一直往下坠，好像汽车轮子离开地面面向崖下俯冲一样难受。是希望别人来接吗？是的。倘若覃所长没打过电话关照，又当别论。从前他跑来跑去，从勐遮到芒寨的十几里路，他背着几十斤重的标本、仪器，也从来没因为无人接送而不开心！

汽车在站牌旁停靠了，黎大品拽着儿子的手跳下车来。几个傣族候车人上了车，那辆几乎被黄土糊住本色的长途客车鸣笛驶远了，把他们父子扔在如火的骄阳下。

确实没有来人，通往芒寨方向的小径也是静悄悄的没有人影。

也许是电话出了故障？也许是接电话的傣族老乡是个马大哈，忘了告诉所里人？

黎大品特别希望出了岔头。

青青从路旁摘了一片大芭蕉叶子顶在头上遮阴凉，仰起脸来问道：“他们怎么不来接咱们呀？”

黎大品从恍惚的神态中清醒过来，掩饰地一笑，弯腰背起青青，说：“懒蛋！咱们走回去嘛！叔叔阿姨们不知道咱们哪天到。”

“覃伯伯不是打电话了吗？”青青问。

“噢，”黎大品说，“电话线杆子说不定又被大象撞倒了。”

这种事情倒是时常有的，青青乐了，引开了话题：“爸爸，你再上山，我也去。依江阿姨说，山上有好多好多大象，我要骑大象。”

黎大品说：“喔，那可不是好玩儿的。大象用长鼻子一卷，把你甩出半里地，还不摔死？”

青青说：“你骗人。电影里，小孩怎么都敢骑大象呢？”

黎大品说：“那是公园里养的象啊，老实。不像山里的那么

野、那么凶。”

没走几步路，热汗就顺黎大品的后脖子流下来，青青一使劲，坠到地上，说：“爸爸，我自己能走。忘了？我和依江阿姨走了好几回了。”

黎大品擦了一把汗，望着孩子懂事的样子，欣慰地笑了。

走了二里路，刚拐过弯，青青跳起来，喊着：“爸爸，依江阿姨来接咱了！你听，木铃！我听得出声来！”

果然，一阵不紧不慢的木铃声传来。还没等黎大品说什么，一辆十分原始的木轮牛车从一丛槟榔树下闪出来，一个姑娘牵着牛走在前面，赤脚狂起一串串烟尘，一个老头倒背脸坐在车尾巴上。

没错，是依江和她的老阿爸。黎大品认得她家的车。一对镶有铁瓦的木头轱辘直径足有一米半，高出车厢板好大一截。

青青张开小手飞跑着迎了上去，依江松开牛绳，把青青揽到怀中，亲了又亲。

老阿爸跳下车，迎着黎大品走来。他本来语迟，汉语又不大通，只是冲黎大品笑了笑。怎么这笑有点苦涩味道呢？是黎大品的错觉吗？

依江发话了：“黎老师，我们来晚了。天热，这条牛太懒，抽一鞭子快两步，一边走一边啃路旁的青草。真急死人。”

黎大品把旅行袋、糖果盒放到车上，笑道：这几步路，多麻烦老阿爸来接。”

依江说：“所里的人……都上山了。”她抬起一双乌溜溜的眸子小心地看了看黎大品，赶紧闭住了嘴。

所里的人上山，这是正常的。可是司机是不会有车子开进热带原始森林的，除非是车坏了。

黎大品没有说什么。

依江带转牛头，赶着吱吱怪叫的牛车沿原路走回去。青青故

意助跑几步，跳到车上，格格地笑着，比坐飞机还美。

依江也跳上车，拿弯刀剖开一个椰子，给青青，青青美美地喝着椰子汁。青青还抓了一大把糖塞给依江，依江不要，两个人在车上扭成一团，欢快地笑着。

心事重重的黎大品和老阿爸走在牛车后头，没有什么话可说。老阿爸在吸竹筒水烟，咕咕噜噜直响。

耳畔忽然传来一阵湍急的水响。

啊，卜少河到了。别看芒寨附近的卜少河只是一条不足道的小溪，水流到这里，水面骤然宽广起来，由于地势平坦，水流平稳，河面上有五六只翘起龙头的龙舟在竞赛。每只龙舟上都有12个小伙子，一样的装束，一样的桨板，划起水来极为协调，随着船尾指挥者的一棒棒锣声，调整着划桨的速度、节拍。

这是在练习！黎大品知道，泼水节快到了，在澜沧江的盛会上，傣族小伙子们都不甘示弱，赛龙舟是最露脸的一项呢。

黎大品茫然地望着锣声、呐喊声时强时弱的河面，心不在焉地说：“啊，在赛龙舟。”

老阿爸刚抽完一袋水烟，敲敲竹筒，说：“争上水头，不容易呢。”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黎大品忽然感到心中一阵阵酸楚……这种感情，他可是从来没有过的呀。

一切按事前的安排办，黎大品很快抑制了内心的莫名委屈。

他要办两桌酒席，招待大家。连炊事员在内，总共所里才有21个人，他出得起这份钱。他本来想请烹调术高超的李师傅上灶，可他记得，李师傅笑着声明过：“你请客，我可不去上灶，油烟子一熏，一口都吃不下。”当然这是玩笑，可为了叫李师傅也正正经经地当个稳吃稳坐的宾客，黎大品决定不去麻烦他。

他请了老阿爸、依江来帮忙。他要办一桌傣族式的丰盛菜肴。依江拿手的甜粑粑、粳米酒、烤鱼，他是尝过的。不单纯是

民族风味，他的旅行袋里还有十几个从昆明带回来的罐头：凤尾鱼、刀豆、红烧肉、猪蹄香菇……酒还是四瓶五粮液呢！

这开销几乎是他一个月的工资，可他不能不这么做。早在所里人风闻他将得到 1 000 元科研奖时，就都要他请客了！有的说：“我们分不到你的荣誉，酒总得给一口喝吧？”有的说：“别铁公鸡一毛不拔，红花还得绿叶扶呢。”

请客，这是庸俗的，黎大品从心里讨厌，可他不能不这样做。奖金虽然他已经声明不要，可客要请，一则不能在别人前背后落个“小气鬼”的话柄，二则可以借此表示自己联系群众，人们不是总认为自己清高吗？

其实，所里的人都没有上山。今天一整天坐在家里研究、落实今年的科研选题和年度规划。黎大品更不会知道，他跟着吱吱的牛车狂过卜少河，所里的人早都看见他了，只是他自己蒙在鼓里就是了。

菜肴整治停当，当他提着糖盒子去找他们的时候，已经是黄昏前的开饭时间了。他必须抢在人们走向食堂前发出邀请。他想像得出，这些终年难吃到荤腥的家伙们，要不欢呼雀跃才怪呢！

走过食堂门口，他闻到一股爆锅的滚油、葱花味道。他有点奇怪，事前叫老阿爸通知过李师傅，叫他今天封灶的啊！

他从开着的窗子探进头去，笼屉冒着热气，蒸着米饭，李师傅汗流满面地在上灶炒菜。

“不是说好了吗？”黎大品焦急地问了一声。

李师傅在围裙上擦擦手，脸色不大自然，远不是从前吵着要黎大品请客时那种样子。他支吾地说：“呃，我怕有人万一……不去你那，别叫人家饿了肚子呀！”

有人不去？谁会不去呢？啊，李尚年是可能不去的。他对黎大品有一肚子意见，他嘴上没有说过，黎大品感觉得到。作为黎大品寻找化石树的助手，他中途当了逃兵，受到了黎大品的训

斥。假如事后黎大品根本没有获得成功，当然不会出现什么不愉快的事，彼此彼此。或者说，即使找到了化石树，只要把成绩算做他们两个人的，那也就万事皆休了。

黎大品没有使李尚年满意，不是不能够，是他不愿这样做。他从来没想过自己要出名，但他也绝不容许事业上的逃兵去冒领荣誉。

黎大品在食堂窗下呆立了一小会儿，叹口气，朝会议室走去。

正好散会，离老远他就听到了主持人的说话声。赵士函去了北京，主持会议的是一个组长，叫李默。有人说他是同赵士函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人，有点道理。你听，他的总结性发言多像赵士函平时讲话的再版啊：“确定科研选题，要从政治上着眼，要端正科研的主导思想，不能搞自由化。以个人名利为动力的研究，是不会持久的……”

这些话，是赵士函经常说的，黎大品听过 20 年了。她在学校当年级支部书记时，就是这么说的，既不新鲜，也不反感。可不知为什么，今天听来，黎大品却不甚舒服，好像是专门说给他听似的。

人们已经从会议室里陆续走出来了，有说有笑，还有敲饭碗的声音。他们要去吃饭了。

僵立着的黎大品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的使命。他提着糖盒子向人们迎过去，带着笑脸，等待着人们的嘘寒问暖。这是自然的，到省城去开会，连同来往路途的 6 天，前后分别了 11 天呢！

人们都看见他了，没有谁同他打招呼，好像没有看见他，又好像他压根就没有离开过……这是怎么回事呢？

黎大品茫然地站在那里，脚像被钉进了泥土中，一动不能动，思想一时差不多成了真空状态。这是自己朝夕相处的同志吗？这是自己生活了十几个春秋的集体吗？怎么一下子变得这样

陌生起来？一下子像到了别的星球，周围的人变得同机器人一样没有共同的情感了呢？

李默拿了饭盒走出来了，他倒是黎大品笑了笑：“你累了，先休息去吧。回头我找你，给你补补课。”

李默头也不回地走了。

哗啦一声，糖盒子从黎大品手中落到地上，纸绳摔断，花花绿绿的各式糖果滚了一地。

最后一个走出屋子的是他的指导老师杨泽泗。杨泽泗面部毫无表情地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才走过去，吃力地弯下腰，将撒地的糖果一块块拣到盒子里，盖上盖，送到他手中，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啊，今天阴历十六了，十五的月亮十六圆，月亮最圆的时候，就该亏了……”

如果此时黎大品不是出于精神麻木状态，凭他的聪明，他肯定能从杨泽泗的话里品出弦外之音的，可惜他什么都没听见，什么都没去想。

泪水模糊了他的眼睛。他像木雕泥塑的人站在槿棕树下。他的心受伤了，在流血。没有听到枪炮声，辨不出枪弹是从哪里射来的，这恐怕是最大的痛苦了。他半生的道路有过好多好多的坎坷。1957年，他才17岁，刚刚进入大学二年级，因为替一个右派分子向党委递交了一份为自己辩解的报告书，他被划成了“中右”，挨过批判；此后，他因为“白专道路”被拔过“白旗”，一直到毕业前夕，他的鉴定里从来没少过“政治上不要求进取”的词儿。“文化大革命”中，他陪着“反动学术权威”杨泽泗蹲过6个月“牛棚”，在这森林里，他的妻子时青献出了生命……这一连串的打击和不幸，都没能使黎大品倒下去。他在日记上写过这样的话：我，不是属于我自己的；我，和我从事的事业，是属于人民、属于祖国的，我没有权利消极下去……

对于黎大品来说，任何一次打击都没有像今天这样令他难以

支撑。这不仅仅因为打击来得突然，更主要的是它来得莫名其妙。从前，他在遭到厄运时，总是有人同情、有人暗中为他鼓劲的，可是今天就不同了，他仿佛被人世、人情所抛弃了，成了一个可怜的弃儿！

黎大品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回到木屋的。那100多磴石板台阶，在他脚下显得那么陡峭，那么遥远，总也走不到头似的，真比走半生的路途还要艰辛！

木屋前流荡着菜香、酒香，五粮液醇酒倒在碗中，在月下闪着光。依江早已摆好了筷子，青青早已摆好了木墩，一桌在木屋里，一桌在木屋外木瓜树下。

谁还会来吗？

黎大品痴呆地坐到竹林下，双手捧着头，泪水从指缝中流出来。

“黎老师，你……怎么了？”依江不安地走过来。

坐在木屋门槛儿上抽水烟袋的老阿爸毕竟是经多见广的，他向女儿使了个眼色，摆摆手，依江疑惑地退下去。

只有天真无邪的青青是不受拘束的，他去掰爸爸蒙脸的手：“爸爸，人怎么还不来呢？菜都凉了！”

一句话勾出了黎大品心底所有的苦水，他的泪水简直像泉涌！他能向孩子说什么呢？连他自己都还不完全懂得的，他有办法使孩子明白吗？

他抚摩着孩子的头，说：“没人来了，他们忙……咱们自己吃！”

青青说：“爸爸，你哭什么呀？若不，咱给他们送去呀？一边开会一边吃也行啊！”

苦笑，还是苦笑。

依江懂事似的把青青拉过去，引他去看门窗上爬来爬去寻找蚊虫的蜥蜴。

黎大品开始动摇了。从前，他是按时青的遗嘱，坚持把孩子留在这里的。他懂得，这里看不到电视，两个月才看得见一次8.75毫米的露天电影，芒寨连一所汉族小学都没有。孩子留在这里会影响智育的，可是他相信妻子的话是有道理的：这里远离人群，像这里的大气一样，没有污染，孩子的成长，可以不被世俗和丑恶所熏染……

真的是这样吗？眼前发生的一连串不可思议的事情，又该怎样解释呢？

这都是往事了！黎大品厌恶它，尽量把这些不愉快的事埋在心底，甚至永远忘掉。但这不可能，随着报纸上对他的宣传，他觉得已经把他愈来愈深地推到了深渊。他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悬崖上。他恨那张报纸，由事及人，当然也恨多事的覃泓！

偏偏在这个时候，覃泓赶来凑热闹了！她仿佛是一颗灾星。她固然是一片好心，这好心却可以使吊在半空中的黎大品掉下深涧，粉身碎骨！

他黎大品要什么呢？什么都不要，他只要工作的权利、安静的工作环境。至于荣誉、地位，他反倒觉得那是破坏性的东西。

记得十多年前，他，还有时青，和一批大学生们随着马帮刚来到原始森林的时候，这里一片荒芜，一切都处在原始状态，懒猴和金丝猴晚上公然背走他们的粮食，大象大摇大摆地卷翻他们的帐篷……没有一所像样的房子，没有一切起码的条件。有的同学灰心了，问杨泽泗：“你不是说，这里有最优良的研究环境吗？”言下之意，杨泽泗和覃怀元诳骗了大学生们。

杨泽泗是这样回答的：“研究热带高山植物，还有比这里更优越的了吗？当然，如果把环境、条件解释为电影厅、洗澡间、饭店，那就是另一回事情了。”

过了几天，有些大学生耐不住这种同原始人差不多的生活，先后悄悄卷起行李卷下山去了。

黎大品和时青也有过动摇。他们走出校门，希望走进大研究所设备完善的研究环境，谁愿意斩草开荒，一切从零开始呢？

那是一个淫雨天，他和时青正在漏雨的破帐篷里捆扎行李，老教授杨泽泗披了一件草编的蓑衣，出现在房门口。看得出，他的眼睛里含着难过和凄楚。他没有说什么重话，只是问：“你们……也要走吗？”

黎大品的心咕咚一下，像干了见不得人的事一样，停止了捆行李，低下了头。

杨泽泗说：“走吧，走吧，人各有志。只是……你们走的时候，不要像他们那样，不辞而别，我……送送你们……”

他流泪了，黎大品和时青也流泪了。倘若他们一走，这个未来的热带植物园，将只剩下一个所长，一个老研究员了！

他们受了感动，硬着头皮留下来了，开初还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念头。是怎样由“试试看”转化为死心塌地的呢？仍然是老教授的影响。杨泽泗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懦弱的人！

别人窃取了他的研究成果，拿他的论文去发表，他一声不吭；一个顶头上司借了他的一笔巨款永远不还，他仿佛忘记了，绝不去问。他在任何会上都一言不发。他自己说，为的是不惹祸。他亲眼目睹了好些有才干的人因为恃才傲物，因为正义感的驱使，好提意见，结果反倒丢失了工作的权利。他是从来叫人抓不住把柄的人，尽管历次运动他都被列为重点怀疑、审查对象，可到头来他还是清白的，那些人除了背地骂他几句“老狐狸精”而外，拿他毫无办法！

杨泽泗却可以骄傲地说：“我的全部精力，都贡献给祖国的科学事业了，没有任何干扰。”

大概，他的学生黎大品，潜移默化地受了他的熏陶吧？黎大品也是怕出风头的人。他乐意工作，至于取得了成绩记到谁人名下，那是另外一回事，可以完全不去管它！

他没想到，覃泓却在化石树的发现上，把他推进了漩涡！
他只能发誓，不再见她！

她心灵中的危机

赵士函从北京飞回昆明 3 天，没有在研究所露面，也没有急于赶回大森林考察队的意思。她在家休息得有点不耐烦了，才决定到李所长家去。

李所长家住翠湖东面，原是市委的房子，推开窗子就可以欣赏水上的荷花，如在画中。

李健所长，并不是森林研究所的元老，“文化大革命”前，是营林处的处长，1978 年才调来的。在林业口，李健是很出名的人物。他所以出名，主要是这个人不好合作，寸权不让，即或担当副职，也总要比正处长说了算数，否则便是矛盾重重。所以“文化大革命”前，他虽然干了 5 年副处长，但正处长一直没有配备，他是实际上的正处长。这倒不是林业厅党组向他妥协、或者很赞赏他的揽权、独断作风，实在因为李健工作起来有魄力，大刀阔斧，从不游移。错了，事后再改，反比那些专门踢皮球的干部好些。因为李健专权、搞一长制家长作风的毛病，“史无前例”的年月里，他吃的苦头比厅长、副厅长们要多，活活打折了他四根肋骨，至今戴着钢护胸。即或他这样吃苦头，他的嘴从来没软过，有的错误或者莫须有的罪名，一概不承认，是出名的“死不悔改”派。时过境迁，他被启用时，这又显而易见地成了优点，人们称赞他骨头硬，他也洋洋自得，本来有的毛病也同莫须有的罪名一同勾销。他到研究所当了所长以后，作风几乎没有什么改变。

赵士函毕竟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怎么会和李健关系这么好呢？一方面同赵士函遇事肯请示、肯听话有关，更主要的是李

健觉得赵士函身上的知识分子气不浓。李健讨厌知识分子身上的呆气，认定他们身上的动摇性那是根深蒂固的，尽管由于工作环境的需要，他不得不天天同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打交道，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惟恐有一天在不知不觉中打白旗。

在赵士函来访的这一天，他刚刚吃过晚饭，拿了一份《参考消息》坐到院里一棵芒果树下。他没法在屋子里待，当工人的大儿子在听什么邓丽君的歌子。他真恨不得砸碎收录机，纯粹的靡靡之音，都能把人的骨头唱酥了。可是你听，湖那面大剧院的广播喇叭放的也是这一套，哥呀妹的……客厅也叫人喘不过气来，《新闻联播》还算好，剩下的可就不堪入目了，什么《加里森敢死队》，什么《三笑》，什么《生死恋》……全是消磨人意志的玩意儿！

这时候，赵士函彬彬有礼地跨进了院子：“李所长！吃过饭了吗？”

像在苦闷、孤独中找到了知音，李健脸上露出笑容，一边搬竹椅让她坐，一边说：“会议结束了？怎么样，听到什么新闻了吗？”

赵士函坐下，微微一笑，说：“李谷一挨批了。”

“早就该批她！”李健恼恨李谷一的劲头一点不亚于恼恨邓丽君。他说：“李谷一，哼，哼哼呀呀，无病呻吟，把青年人都带坏了。”

赵士函是最能摸得到李健脉搏的人。历次她开会回来找他汇报，李健几乎很少问到会议内容，这倒不完全因为他对林业科学外行，他更关心的是政治风向。他总觉得这两年风总不大顺，以至于使他憋气。

果然，赵士函就这个话题说下去了：“出去一趟才知道，外面不少人对许多事情的看法，跟咱们差不多哩！”

“好得很！”李健长吐了一口恶气，说：“咱们这里有人说我

思想僵化，说吧！我宁可要僵化，也绝不要自由化。我态度明确！”

说到这里，李健又想起了选拔中青年干部的事来。上头一个文件接一个文件下达，这是非提到日程上不可了，自己已经接近60岁，即使身体条件允许，再延缓几年离休，毕竟时间屈指可数了。原来党组曾先后考察过十几个业务干部，各有千秋，可李健都不满意。最后，随着黎大品发现化石树，对他的呼声陡然高起来，开头使李健感到很突兀，不适应，像冷丁来到雪线以上的高山一样，因空气稀薄而感到憋闷。黎大品会是当领导的材料？他有理由怀疑。他查过黎大品的档案，一句话可以定论：是一根白线穿起来的人物。当然喽，这种结论现在不时兴，是拿不到桌面上来的。黎大品小学时没有入过少先队，中学时没有入过共青团，大学时连党的积极分子都不是，够典型的了。虽然他的学业优异、个人品德方面挑不出毛病，可这种人平步青云，那总是有点玄乎。难道选拔干部可以不要德吗？那么，20年后，中国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可能和太平洋彼岸就没有什么区别了。这是李健即使闭上眼睛都不放心的。

令李健奇怪的是，党组成员中好多人居然对黎大品极热！而且，一向正统的副所长覃怀元居然有所动摇，也认为黎大品可以考虑！

李健的话，从来都具有权威的分量，他没有急于一锤定音。他有他的中意人，那就是眼前这个赵士函。

赵士函可以说是按照李健所欣赏的模具倒出来的坯子，方圆规矩都可心。有人说她本事不大，李健不认为这是缺点，反倒可能是当领导的优点。完全外行当然不好，太内行了，势必掉到业务圈子里去无法自拔，叫业务牵着鼻子走，还怎样体现高瞻远瞩的政治领导？

方才赵士函的几句话，再一次印证了李健的正确。你听人家

赵士函，绝不随波浮沉，忧心的是当前的各种思想危机呀！

想到这里，李健对赵士函说：“我正想找你谈谈，你来得正好。目前，是政治贬值的年月，好多为伟大的信仰出生入死奋斗过的人，都打白旗了，开始骂大街。人，在这个时候保持清醒的头脑，是不容易的。”

赵士函的眼睛，像是装有红外线摄影仪似的，早把李健的骨子里看得一清二楚了。她知道他喜欢什么、讨厌什么，因此，在他面前讨欢喜是不费吹灰之力的。

赵士函忧心忡忡地说：“您说得对。有时候，晚上失眠，常常想到将来。一旦像您这样的老干部……百年以后，您们曾经扛过的大旗还能不能扛到底？总得找一个解决的办法呀！听说有的单位根本不再讲政治，是业务尖子就提拔，弄不好，我担心有朝一日，我们的各级班子都落到一群目光短浅、个人奋斗的人手中。那，社会主义的大业，不是付之东流了吗？”

一席话，正触到李健的心事。他觉得自己器重这个血管里流着正统派共产党人血液的中年人，是绝对没有错的。他禁不住脱口说道：“党组里，有些人主张提拔黎大品，你是了解他的，你看他怎么样？”

赵士函心里一动，像被钢针刺了一下。这证实了她此前的猜测。果然，随着黎大品的身价日高，开始显露头角了！若不是李健一力阻拦，他肯定取代自己进京开这次理事会，那他更要高人一头了。说真的，她从前并没有把黎大品放在眼里，或者说，黎大品还没有对她构成威胁。他不过是赵士函领导下的一个普通科研人员。尽管他肯干，业务上拔尖，可他依旧是助理研究员，分类研究室只评上一个副研究员，还不是赵士函理所当然地得到！还有一层，黎大品是个没有雄心的人（至少从前赵士函是这样看的），他只求工作，搞出成绩来却不肯出头，你偶尔抬举他一下，叫他出席个什么代表会，不知要动员他多少次，倒像是绑他上

法场！

现在，当他听到有人提名，让他充任未来的研究所所长时，他会不会还像从前那么推辞呢？也许恰恰相反，他会就坡上驴！那么，就证明他是个极有心计的大野心家，从前的一套不过是收买人心、塞人耳目的手段，那就极为可怕了。

不知为什么，赵士函觉得有理由确认，黎大品无疑属于后一种人。无形中，黎大品成了她心目中的假想敌、竞争的对手，一个不可低估的野心家！

但是，赵士函毕竟是赵士函，她没有惊讶表示，也没有在李健面前诋毁黎大品的声誉。她只是随便地笑了笑，说：“这不奇怪，大气都在污染，哪有局部的干净。”

恰到好处，分寸适当。

李健喟然长叹：“只要我坐在这把椅子上一天，我是要圆睁双眼的。哎，听说，你们分类室支部准备发展黎大品入党了？”

赵士函又把球踢了回去：“如果所党组织认为可以突击发展，当然可以。”

“这是什么话？”李健说，“按标准嘛，对知识分子要从严掌握，他们复杂。”

赵士函说：“我征求过党员们的意见。大家认为，人一出了名就发展，总有点那个……况且，我个人觉得，失败对人是一种考验，而成功，则是更大的考验。”

“很对！”李健说，“不要匆忙。党组不搞包办代替，还是你们支部按条件衡量。”

这等于表了态，赵士函的目的达到了。她总有一种偏见，认为多年来黎大品和一些有作为的知识分子，所以那么驯服，无非因为政治上低人半头，一旦他们入了党，他们不骄横跋扈才怪呢！现在，她心目中的那架天平，一头装着自己，另一头装着黎大品，几乎有平衡的危险，而党票，实在是个大砝码，只要一投

给黎大品，立刻就会沉到他那一方去。她再次感到一种不舒服的危机感。

头一次危机是去年，仿佛搞政治的干部都不吃香了，大有被淘汰的趋势。当时，不是好多政工干部在风头上纷纷改行吗？赵士函当然不十分惧怕。她既是政治干部，又有业务职称，进可攻，退可守，她不那么着急。但心里毕竟感到危机，甚至怀疑这么多年来不重视业务的自身建设是个终生的错误。

今天看来，她仍然是宽心的。她已经不再怀疑自己走了几十年的路。

她起身告辞，还打算到覃怀元那里去一下，探探他的口气。当然，到那里，她又得准备另一套完全不同的台词。而且，她必须马上回到考察队去，不能让后院起火，虽然她深信，研究室里的人不会在几天之内都叛归黎大品，但还是尽快回去为妙。

生活不完全适于推理

还是那支歌子，在傍晚飘泛着淡淡炊烟的傣族寨子上空飘逸。

覃泓没有睡意。她是被妈妈讥笑为“夜猫子”的，本来没有早睡的习惯。离开黎大品的木屋，她漫无目的地朝芒寨走来。

芒寨坐落在山坡上，临碧水、枕苍峰，一片竹楼错落在香蕉林、芒果林中，犹如仙境。夕阳最后一缕斜晖已经从山峦间消失，月色照着越来越浓的一片水雾，在卜少河河床上流荡，给人一种朦朦胧胧的感觉。

这倒很像此时她的心境。她耳闻目见的一切，不都像一团朦朦胧胧的雾吗？

她本来应当去找赵士函的，爸爸也同她有约，晚上去见这位很有权威的研究室女副主任。不知为什么，覃泓的兴致提不起

来，她觉得心中郁闷，尽量想独自一人走走、想想，虽然未必想得明白。

今天，赵士函就和覃怀元一起回来了。覃泓听到信儿，到处找，一直没见到赵士函。

赵士函正急着找人谈话。据有人告诉覃泓，她一天之内竟然谈了七八个。覃泓无论怎样聪明，也猜不透是什么事。后来还是听一个老同志说，研究所要选拔中青年干部，过几天要动员群众像填选票那样提候选人。这样看来，赵士函的个别谈话可能与此有关。可是，这种工作事，应当是爸爸的分内工作，怎么会由她去做呢？不可解。

还有更不可解的是，今天忽然传出一种流言，说黎大品自从找到了化石树，旁若无人，目空一切，连走路的姿势都变了！覃泓未免为黎大品叫屈。她已经从炊事员李师傅口中得知他成名后受到的冷遇，黎大品吓得恨不能钻到地缝里藏起来，哪还有心去目空一切呢？

最有意思的是，覃泓无意中发现了一宗秘密，连爸爸这个所长都蒙在鼓里呢！

去年，赵士函曾在学报上发表了一篇《人工群落培植初探》的学术论文，获得好评。事后，科学院组织专家们到这里植物园来实地考察，人们都大为惊讶！赵士函及其助手们，居然仿照自然群落的生性、形态，再现一片人工群落，这对未来保护自然、改造自然，提供了极为可贵的经验，为此，赵士函出国去讲学，还得了一大笔奖金。大概，她能独压群芳评上副研究员，一定与此有关。

可是，事实上，论文和出国讲学的讲义，全是出自黎大品的手笔，而且人工群落也是黎大品创议、一手搞起来的，而赵士函这期间基本住在昆明，在搞“揭批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专案。真是咄咄怪事！更叫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只字不提黎

大品，分类室的人也无微词！

覃泓觉得自己从前太天真了，认为这里远离人群，人的心灵像空气一样经过了滤清，实在有点可笑！

覃泓没有声张这件事，也没有告诉爸爸，她要干点分外的事，等把证据拿到手再说话。

她多想同黎大品促膝长谈一次啊！可是，黎大品一直避而不见，像躲避瘟神一样躲着她。

今天，她偶然记起来，黎大品有个孩子寄养在傣族老乡家里，就想到寨子里走走，说不定还能摸到点什么情况。这样，她就来到了寨子里。

钟声！是的，是缅寺的晨钟暮鼓声。这个小寨子虽然只有二十几户人家，可也有一座圆木盖成的尖顶寺庙，规格、款式完全像缅甸、泰国的庙宇，据说和尚念的经文也是从那边因袭过来的。解放以后，特别是“破四旧”的年月里，大部分的缅寺都被拆毁了，和尚被迫还了俗去种苞谷。不知怎么回事，从1979年起，缅寺又都陆续恢复起来，尤其是澜沧江有泼水节的水傣聚居区，常有外国人来访，恢复得更快些。幸好芒寨的老队长岩火有点预见，他就没有带人拆除庙宇，而是把它变成了苞谷仓库，恢复起来就要容易得多了。

上次覃泓来，本来是要去缅寺观光的，那时庙宇正在油饰、装点，和尚还没有从勐腊请回来，没什么大意思。今天她又动了这个念头，何不到缅寺去看看呢？

傣族人是很懂建筑艺术的。你看那一幢幢竹楼，盖得讲究、大方。其实叫竹楼并不确切，小楼是用青一色上等杉木盖起来的，只有墙壁和楼板上的席子才是用宽竹篾子编出来的。傣族竹楼是悬空式建筑，底下有24根粗木柱支撑起来，空档有一人高，大概是热带雨水多，为了防潮的缘故。

覃泓正在随意浏览别具一格的竹楼，突然在前面响起猛烈的

犬吠声。一条短毛青狗带着锁链子，发疯一样朝她扑来。傣家养的狗可不像别处的狗只吠几声吓唬人，它是真咬！

覃泓吓得连连后退，想从果园的篱笆墙上拔一根竹子防身，却怎么也拔不出来，吓了一身汗。

一个少女伏在二楼平台上用一串傣语喊住了那条狗。它不很情愿地呜呜低鸣着，蹲到院门前，警惕地盯着张皇失措的覃泓。

接着，一个只穿着一条短裤的小男孩从竹楼楼梯上跑下来，抱住狗脖子，说：“别咬，别咬！”

覃泓很奇怪，这小男孩怎么说汉语呢？她走上一步，说：“谢谢你，小朋友，你叫什么呀？”

“我叫青青。”小男孩说。

覃泓似乎猜到了什么，故意说：“噢，不对呀。傣族男的不是都叫岩什么吗？”

小男孩歪起脑袋，露出小豁牙，说：“我是汉族。”说完，他牵了狗要走。

“别走哇，”覃泓说，“带我去依江家好吗？”

“那就是我家。”青青眨眨眼，跑上几步，推开竹篱笆门，向楼上嚷着：“阿姨，有人找你哪！”

覃泓没有猜错，青青就是黎大品的儿子，是寄养在依江家的。

果然，随着一阵楼梯响，含羞带笑的依江出现了。她认出覃泓来，向她深深地弯下腰，说：“请上来喝茶吧。”然后退后几步，闪出楼梯口，叫客人走前面，她冲楼上喊了一句，“阿爸，有客人来啦！”

楼梯上面是四面通风的晒台，通常是放粮食、杂物的地方，上楼的人都在这里脱鞋。覃泓学着青青的样子，把凉鞋摆好，赤脚走进堂屋。

覃泓是第一次到傣家竹楼里做客，处处感到新鲜。这间堂屋

至少有 30 平方米，靠北面一连有三个单间，都垂挂着蓝布印花门帘。她听人讲过，那是卧室，不经主人同意，是绝对不可以闯入或窥视的。堂屋正中有一根顶天立地的粗木柱子，油光锃亮。再往前面，是个用泥坯砌起来的火塘，上面蹲着一只铁锅，冒着水蒸气，火不很旺，但老阿爸又填了几块柴进去。

覃泓知道傣族人家的讲究很多，一时不知该坐在哪里好。

“坐呀！”老阿爸拿出一个有水桶那么粗的竹桶来，里面盛满自家烘制的土茶，正往水锅里抓茶。

覃泓刚要搬小凳坐到柱子旁去，青青嚷了起来：“那儿不能坐，那是神柱，靠也不能靠的。”

覃泓吓了一跳，依江格格地笑起来，爱昵地拍拍青青的脑袋，拿了个矮凳放到茶桌旁，弯下腰请覃泓坐。

依江搬上一大堆水果，除了香蕉是鲜的，荔枝、龙眼和桂圆都是干果。

覃泓夸赞着青青说：“你都成了傣族通了！”她问依江，“他是黎大品的儿子？”

依江说：“是。在我们家住两年了。”

覃泓说：“这多叫你们操心啊！”说完，她马上觉得失口，自己同黎大品什么关系？怎么能用这种道歉的语气同人家讲话？

幸而依江和老阿爸都没有在意，老阿爸给她倒了一碗酽茶，说：“就怕叫人家孩子吃苦啊……”

覃泓喝了一口茶，差点吐出来。真苦！

依江文静地一笑：“苦吧？我们喝苦茶喝长了，你喝不惯。”

青青抓了一把干荔枝塞给她，说：“顷考、顷考！”

依江拍了青青一下，笑起来。

“顷考是什么意思？”覃泓问。

“顷考是吃，他叫你吃。”依江抿嘴一笑，解释着。

覃泓剥着荔枝干，望着火塘，说：“听说火塘永远不能熄

灭吗？”

依江说：“从我懂事那天起，火就一直没灭过。老人说是神火，迷信……”

老阿爸转转悠悠自己忙了一阵，拿来一个竹筐箩，上面放着一撮烟丝、一把白石灰，还有一堆切成碎末的槟榔。

筐箩放到了覃泓身旁，她有点莫名其妙。

依江埋怨地瞪了爸爸一眼，示意他拿开，回头对覃泓解释说：“这是嚼吃的，和吸烟一样。只有家里来了贵客，主人才肯拿出这个的。”

覃泓差点笑出来，石灰掺和生烟丝、辣槟榔满嘴嚼起来，那会是怎样痛苦的滋味啊！好像是给她示范，老阿爸在筐箩里各抓了一小撮，在手心上揉搓一下，扔到口中嚼吃起来，津津有味，依江和覃泓都乐了。

青青在一旁说：“他们还吃剁生呢！”

“什么叫剁生？”覃泓问。

依江说：“现在政府号召不吃，我就不吃。老人过节还要吃。剁生就是把生牛肉剁碎，放上盐巴、胡椒、辣子，再把槟榔拧出水来滴上，肉就变成白色了，就这么吃。”

覃泓点着头，心里想，可千万别请我吃饭，吓死人了。

她们扯了一阵家常，话题很快扯到了黎大品身上。

覃泓趁机问：“你今天不去上课了？”

依江摇摇头：“黎老师这些天心情不好。”

覃泓故意问：“为什么呢？”

依江又摇摇头：“我不知道。”

覃泓说：“你说，他是好人吗？”

依江有点奇怪地盯着覃泓，好像怪她怎么会问出这样的话来。没等依江回答，老阿爸在一旁搭了腔：“百里挑一的好人啊！”

依江说：“去年，长春生物什么所，来过人，接他回去，要提他当副研究员，他都没走。”

覃泓从来没听到所里人议论这件事，更没听黎大品提及。爸爸更不会说了，他把黎大品看成是一只金凤凰，惟恐他飞走呢。但是，不用核实，覃泓就相信这里不会有什么水分。这几年，五六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价码正是看涨的时候，各部门争先恐后去挖别人墙脚，许愿提工资、破格晋级、提高一格的职衔，甚至连房屋条件、安排子女就业都当做前提。

黎大品为什么不走呢？他当然没有吃苦受累的嗜好，他一定也知道大城市、大研究所的舒适。覃泓从短短的交往中，不难理解一个科学工作者的胸怀。黎大品是搞森林科学的，20年来同热带植物打交道，只有这里才是他有所作为的领地，为了事业，他宁愿吃苦，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是啊，老阿爸给她讲的一段故事，不是可以证明黎大品对大森林的厚爱吗？

那还是“清理阶级队伍”的1968年末，黎大品带着“资产阶级黑尖子”、“修正主义苗子”的罪名，在植物园里劳动，妻子时青同时受审查。那时所里的造反者们都忙于在昆明夺权，干脆把林业系统一百多名各式各样的专政对象交由当地贫下中农就地监督改造。老阿爸就是被芒寨大队指定的看守人之一。

转年春天，所里拥有一批大联合后的造反者，勒令“黑帮”们当中三分之二的人立即回城办学习班，黎大品和时青是其中的两个。只稍稍熟悉森林研究所和林业系统情况的人，从人员去留的分野就可以判定，凡回城办班的，都是“罪行”相对较轻的，而那些“敌、特、叛”和带有“死不悔改”头衔的人，一律留下，因为造反者们认定，只有最艰苦的环境，才有利于顽固分子的改造，当然也不无惩罚之意。

被点名回城的，莫不感到欣欣然，连夜收拾行装，迎接对他

们来说至关重要的“第二次解放”。

也有傻子！

那天夜半时分，值班的老阿爸正倚坐墙根抽竹筒烟袋，黎大品来找他了，一见面就拉着老人的双手，恳切地说：“求求阿爸，只有您说话有用，我和时青想……留在大森林里。”

“你疯了？”老阿爸说，“你看不出来吗？回城的都是轻的，我问过那些戴袖标的人，说根据‘九大’精神，要重证据呢，回去要放一批，你们在这里受什么罪！傻孩子，快去收拾东西吧！”

可是黎大品流着眼泪说：“这我们都知道。我们离不开森林，我们学的专业是森林啊！让我们留下吧，只要能天天守着森林，戴什么帽子都没关系！”

老阿爸没有办法，只好答应。第二天，当大队人马上了汽车时，老阿爸突然代表芒寨贫下中农提出，延长黎大品夫妇的改造期限，理由是他们表现不够好。

于是黎大品、时青获准留下，挨了一顿训斥。

从1969年到1971年，当研究所的人都在城里钓鱼、学中医、学木匠活打家具、学烹调术的时候，黎大品夫妇却一日没有间断他们的高山植物研究，竟然找到了好几种珍贵的树木！

听了黎大品这段往事，覃泓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冲动。她感到，自己过去所了解的黎大品，还是过于皮毛了。

覃泓从老阿爸家走出来，天已经很晚了，她顺着弯弯曲曲的卜少河向考察队驻地走去。

月光洒在涓涓流淌的卜少河中，泛起碎银子似的光斑。月色下，有人在河边捶石板上洗衣服。

覃泓走近，发现是刚回到考察队来的赵士函。

见了覃泓，赵士函跳起来，笑着，甩着手上的肥皂沫，跑上来同她握手：“你这个神秘人物！来了一天，我还没见到人影，你也不去看看我？早把我忘到脑后去了吧？我倒是怪想你的呢！”

覃泓很快乐，只有赵士函还和从前一样热情，对她没有反感。

覃泓说：“坐在月光下洗衣服，山青水秀，真富有诗意呀！”

赵士函捋捋短发，说：“当然了，生活不就是一首永远吟不完的诗吗？不晚上洗怎么办？天不亮又要钻森林了。”

“我来帮你洗！”覃泓不由分说缩缩裤腿下了水，坐到了河边的石头上。

赵士函也不推辞，坐到她对面，两人一边聊天，一边搓洗衣服。

据赵士函说，她比黎大品大两岁，那今年应当是44岁了。可是看相貌，任何人都不会猜她超过35岁。她长得不白，但五官端正，举止言谈中的书卷气不浓，倒更像个成熟的政治干部。

赵士函笑着说：“我没想到你这么快就飞到这里来了。我还西苑大旅社傻等呢。我以为你还不请我到家里去吃一顿好饭呀？既有你，又有你爸爸的双重关系呀！”

覃泓不好直说，遮掩道：“所里领导催的紧，走前给你挂电话又挂不通。”

赵士函明知道覃泓是在顺口扯谎，却也不想揭穿，只是问：“看你那天在西苑旅社的神情，好像对我去开会有点反感，是吧？”

覃泓说：“你多心了。”

赵士函说：“你当初要写报道这件事，只有我支持。黎大品坚决反对，杨泽泗模棱两可，是不表态的反对，我还对不起你？”

覃泓笑了一下：“可你并不满意吧？”

赵士函说：“老实说，我是主张以集体名义见报的。不说这些了。看你的文字水平，够个高级记者，文章写得蛮漂亮啊！”

覃泓借机问道：“你别回避矛盾。我正想听听你对这篇报道的反映呢，反对也没关系，我要真实的。”

赵士函变得深沉起来，她把一件洗好的衣服拧干，放到盆子里，说：“就文章本身，那是无可非议的。你知道，我们国家在宣传典型人物时，常常是小不真实大真实，就因为细节的失真，往往导致典型本人的垮台。”

覃泓有点沉不住气，问道：“哪个细节不真实？不都是你们提供的吗？”

“别激动嘛！”赵士函老大姐似的笑了，“你没听懂我的意思。我觉得，黎大品确实是个好同志，我比你了解他，我们在大学一起念过5年书，毕业后又分到一起来。我知道他的优点，也了解他的弱点。他是个有骄傲毛病的人，他需要的不是表扬、出名，恰恰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他的问题。”

覃泓有些不服：“依你这么说，只要一个人有了毛病，就永远不能宣传了，他有了成绩反倒该批评了？”

“你这张刀子嘴够厉害的了！”赵士函又宽厚地笑起来，“你不要断章取义嘛。自从他发现了化石树，对他的反映大极了，叫我都不好做工作。有人说，他狂妄得见人都不理睬了；有人说，他所以把1000块钱的奖金退给覃所长，是他听说别人分到一点有气，是示威；有人说，他连走路的姿势都变了，再有点成绩，说不定尾巴要翘到天上去了……”

覃泓打断她，犀利地问道：“你别重复别人的议论，总有个是非曲直！你是室主任，又兼党支部书记，你又是最了解黎大品的人，我想知道你的正确评价，或者说是接近正确、公允的评价。”

赵士函说：“听这口气，你好像是黎大品高价请来的律师。哈哈……你听我说，无风不起浪，从前为什么没有这么多、这么强烈的反应？我们看问题不能带偏见，你总不能说这里的群众都是群氓、阿斗吧？”

覃泓又打断了她的话：“我不要听这些理论和推理。你说了

半天，到底没有亮出你的观点。”

“你搞逼供信是行家！”赵士函又笑了起来，“我看，黎大品近来情绪不对头。作为他个人，他应当少强调客观，多从自身考虑问题。这次寻找化石树的成功，对热带植物区的分类学，那是有划时代意义的，对于他本人，却可能是失多于得。荣誉和地位，是一块试金石，有的人过得了失败的关，却经不住胜利的考验。”

听明白了。尽管赵士函采用比较曲折的办法说话，覃泓到底还是听出了她的倾向。她觉得不公平，狠狠地搓了几下衣服，突然问道：“他的入党问题，看来又要拖了？我这次来，还以为你们早就发展他入党了呢！上次你不是跟我说过，你打算当他的入党介绍人吗？”

“我将来仍然不改口。”赵士函郑重地说，“但不是现在。群众异口同声对他有看法，组织上怎么可以不听取群众意见，一意孤行呢？”

“这是群众的尾巴，尾巴主义！”覃泓又说，“为了事业，他可以放弃回城，可以把孩子安置在老乡家中，他可以贡献出妻子，这样的人，难道不够一个共产党员？”

“你的手伸得太长了吧？”赵士函半开玩笑地说，“你是情报所下来搞科技情报的，你不是上级党委派下来指导党政工作的。小覃哪，你还太年轻，有些事情，你还不理解，阅历还太浅。不是老大姐说你，任何事不能感情用事，要看长远，不看一时一事。我没有说黎大品不好，但你若让我违心地说他是个十全十美的人，我是永远不会说的。”

覃泓真想反问一句：“那你自己就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吗？”不过，话到嘴边，还是咽了回去，她不能把人都得罪光。为了完成自己此行的使命，她也必须委曲求全。

接收黎大品入党与否，这对赵士函来说，是个相当敏感的问题。

题。覃泓的一连串质问，立刻使她想到从昆明返回考察队路上覃怀元同她进行的那场谈话，虽然是私下非正式的，也足以构成对她的威胁。

覃怀元为什么要追问基层支部何时发展黎大品入党的事情？是不是与提拔黎大品当所长的风声有关？显然不是孤立的，按照惯例，非党员提拔，纵然有个八儿的，也是很不容易的。想到这一层，赵士函再一次深切地体会到自己比黎大品具有先天的优越性！

这时覃泓谈话扭到了正题上：“黎大品的论文你过目了吗？”

赵士函说：“全室郑重讨论过两次。”

“通过了吗？”

“就论文本身，那是通过了的。署名问题，群众意见很大。”

覃泓又激动起来：“难道不是黎大品花了几年时间，终于找到了化石树，填补了分类学的空白吗？”

“问题不在这儿，”赵士函说，“一个研究室12名同志，干什么，是组织的分工，当然也有个人志愿。化石树是客观存在，假如任务不落给黎大品而落给别人，也迟早能找到的。何况，他去找化石树，留下来的工作势必要由大家承担，他所做的，都是分内的工作。这样看来，群众的意见就有合理的一面了，这是集体的智慧、集体的功劳，怎么好记在一个人的功劳簿上呢？”

一时覃泓哑口无言。叫辩证法也好，称它诡辩论也好，赵士函讲出的这一套，你还真难以一下子驳倒！

覃泓为难了一会儿，问道：“那你们打算怎么办？”

赵士函说：“我把室里的各种意见都转达党委了。大家要求署名应当是：分类研究室，不应当是黎大品。当然，最后怎么定，那得听党委的。”

覃泓的心凉了半截，宛如她和黎大品绑到了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似的。

过了半晌，覃泓才说：“我这次是来拿论文的，连同接黎大品一同进京，要他到学部会上去宣读呢！这回我怎么交差？”

“科学成果总是抹不掉的嘛！”赵士函又笑了，“你又没有犯欺骗舆论的过失，有什么不好交差？”

覃泓的手不知什么时候松开的，衣服被水冲出老远，直到赵士函发现跑到水里捞回来，甩她一脸水珠，她才发觉。她真不知自己在想什么，更不知道自己应当怎么办。

赵士函突然扑哧一声笑了，问：“小覃，北京有个婚姻介绍所，你去过吗？”

覃泓怔怔地望着她，摇摇头，不知她要做什么文章。

赵士函说：“我听云南电视台的李导演说，他去看女青年们填写的寻找配偶的表格，有好多二十几岁的姑娘，公开填写：不要求家庭，不要求工资，不苛求相貌，年龄可以在45岁以下，只要求一条，事业上要有贡献，有造诣。小覃，这是真的吗？”

覃泓心不在焉地回答说：“可能是吧……”

赵士函又格格地笑起来，笑得覃泓摸不着头脑。

赵士函把洗好的衣服全都叠放到洗衣盆中，望着痴呆的覃泓，说：“看你这丢魂落魄的模样，你大概是爱上黎大品了吧？”

照覃泓的性子，她听了这话，会用尖厉而得当的话把赵士函顶回去的，可她半晌没有想出什么词来。

赵士函又哈哈地笑起来，在夜空里显得特别响。

第六感官

覃泓几乎一整夜失眠，实在恼人。若是在家里，她可以打开杂品柜，找几片冬眠灵吞下去，这里上哪儿去找？她不愿意惊扰邻床的赵士函。她睡得香极了，被子齐胸盖着，睡前看的那本《飘》，早已飘到了地上。

覃泓真羡慕她的好睡！

是呀，她当然是吃得饱、睡得香了，多年来，她一直是幸运之神的宠儿。听别人说，她的学问平平，在学校时没学好，毕业后更没有时间去钻研，可她比黎大品走红得多，因为她不仅是党员，丈夫又是高干，因此好事都与她有缘，厄运于她向远。多年来，选个知识分子先进代表啊，发现一个模范人物啊，挑选一个进入学会任理事的啊，物色到北京去出席科技大会的代表呀，代表集体去领奖状呀……约定俗成，这些事责无旁贷的都是赵士函。

覃泓明白，倘若化石树的论文真的改署“分类研究室”的名字，那么黎大品自然而然地靠边站了。到学部去宣读论文、去领奖，去和首长约见，去会见国际名流，提拔研究所所长……便天经地义地落到了赵士函的身上，幸运的星光依然照耀着她！

覃泓感到气愤、不公平，听着赵士函那无忧无虑的鼾声，她都有气。

可是平心静气地想一想，这能怪赵士函吗？如果一切荣誉和风光的机会，都是她实施了阴谋得到的，那她是应当受谴责的；假如这一切只是天道自然地飞到她怀里，她有什么罪过呢？

覃泓恨恨地想，连个发泄的对象都找不到，如同俗语所说：只听见辘轳响，却找不到井在哪儿！

现在她懂得黎大品为什么躲着自己了，可以想见，他的处境之艰难。可是躲就能使他摆脱苦恼了吗？应当站出来说话！覃泓对黎大品的心情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覃泓猛然想起昨晚小河边赵士函开得很艺术的玩笑：“你是不是爱上黎大品了？”

这是覃泓从来没有滋生过的念头。虽然过去有人背地说三道四，可她连想都没想过。她不在乎，一个男人和女人哪怕相差一倍的年龄，只要常接触，都会有人怀疑你不正常。

可是昨夜经赵士函半开玩笑地一提，她反倒认真思索起来，仿佛是一件遗忘了的大事，在别人提醒后才恍然大悟一样。你真蠢，昨天晚上为什么不回敬她几句呢？一向以反应迅速著称的你，怎么哑口无言？坏了，那不是给赵士函一个“默认”的印象吗？

你真的默认吗？爱，就这么简单吗？她感到好笑。

这两年，母亲、师友，先后逼迫她去相看男朋友，像到百货商店柜台前去挑选标明价码的商品一样。她一个都没有相中，或者干脆不见，她感到滑稽。给覃泓写过情书或者以各种方式向她求爱的人，也许凑得成一个加强连。有的人，令她动过脑筋、衡量过，但那只是放在丈夫的天平上，是用传统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当砝码的，正正经经，一丝不苟，像对待一门必修课！

后来她发现，没有一个人叫她心跳过、耳热过、失眠过，照小说、电影里的热恋比比，她发现那不是爱。

黎大品是怎样潜到她心底的呢？十足是“潜”！是在你没有发现的时候潜进来的，叫你放不下，常常想着他，甚至偷偷的心跳耳热，这叫不叫爱呢？她是个专门研究科学情报的人，这方面的情报，她的积累实在太少了。

月亮从小小的西窗上沉下去了，屋子里黑漆漆的，唧唧喳喳吟叫着的草虫也都钻到墙角去休息了，只有卜少河的流水愈发响亮，就像它改道从床底下滚过似的。

覃泓看看夜光表，三点半。

揉揉僵涩的眼皮，她从竹床上坐起来，套上那件白色开司米毛衣，趿着鞋悄悄走出房门。

远山近树不再像前半夜那般层次清晰了，黑乎乎、混沌沌一片。好大的露水，她刚走了几步，裤子就被露水打湿了半截。

覃泓在门前伫立一会儿，终于下决心去找黎大品，她急于知道此时此刻黎大品的心境和打算。她想像得到，黎大品一定像个被遗弃在孤岛上的畸零人，只有她，可以与其同舟共济。

她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没膝深的荒草径上，裤子全湿透了，冷冰冰地贴在身上，她不禁打了几个冷战。

一簇灯火！她看得很清楚，那摇曳不定的灯火是从黎大品木屋的窗子上透出来的，真像一片乌黑沉寂的大海上一闪一烁的航标灯。

他没有睡？还是睡不着？苦恼一定像无边的夜暗包围着他、吞噬着他，他需要同情、支持，需要有人向他伸出温暖的手！

覃泓走在凸凹不平的石板路上，在接近木屋时，发现灯灭了，木屋像矗立在夜暗中的一座荒冢！

她正在迟疑，又看见了灯火。

这是一盏风雨灯，正从木屋走出来，向山上晃动。

天还没亮，他这么早起来去干什么呢？

黎大品没有锁门，风把木门扇鼓开了，过堂风一吹，屋子里飘出好些纸片来。

覃泓连忙拣起那些写满了字的纸片，走进屋子，一时不能断定这是有用的资料，还是废纸。

她发现，这些纸片是从竹床底下刮出来的。她摸着火柴，点亮油灯，低头看看那些纸片，上面有数据、有图。她突然心跳起来了！

这不是《人工群落培植初探》的底稿吗？她认得，这是黎大品的字迹。她不正要查清这件公案吗？现在不用怀疑了，赵士函剽窃了黎大品的研究成果和论文——不管黎大品是否出于自愿。

覃泓钻到床底下，把论文底稿都拿上，又翻出一沓赵士函出国讲学的讲义。她走出屋子，掩好房门，直奔植物园而来。

黎大品果然在那里。他把风雨灯挂在化石树四周棚架的竹竿上，正打开野外作业兜，先把地温表插到树下松土中，又去挂湿度表，接着仔细观察叶片，在本子上记着什么。

覃泓本想等他工作完毕再走出来，却不料他忙起来没完，后

来干脆像守护神一样抱膝坐在树前了。

覃泓忽然动了恶作剧的念头。她使劲摇着一棵油橄榄树，摇得哗哗响。果然奏效，黎大品惊异地回过头来。

覃泓压低声音吼道：“大象来喽——”

黎大品一动没动，仿佛她的吆喝是卖冰棍的。

覃泓只得走出来，身上湿漉漉的：“你好啊，自命不凡的植物学家？”

黎大品头也没回：“是你？三更半夜来这里干什么？”

覃泓舒展一下双臂，说：“还三更半夜？你看，东方都发白了，真正的鱼肚白！”

黎大品掉头望了望东山一片玫瑰色衬托的白光，没有做声。

覃泓说：“你好大的架子！三顾茅庐都见不到。怪不得人家说你目空一切。”

“目空一切？那不算什么。如果你给我地球以外的一个支点，我可以把地球撬动！”

听到这话，覃泓反而高兴起来：“说得好！这可不是你的发明，我记不起来了，好像是牛顿说过的吧？”

“你不要给我苦中作乐好不好？”

“歌德说过：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那又何必因痛苦而悲伤？”

黎大品冷笑一下，拿起镰刀割着一片紫色根茎的荒草，说：“我只希望你不要再给我惹麻烦，让我有平静一些的生活，别无它求。”

“你太忘本了吧？”覃泓故意刺他，用挑衅的口吻说，“你不是恩将仇报吗？不是我替你吹喇叭，你能名扬天下？”

“多谢。你再吹几回高调，我就得去上吊了！”

“邪不侵正，你原来是个软骨头！一点儿风吹草动你就趴下了，那你最好学会仰人鼻息过日子，去溜须、拍马，去阿谀、奉

承，去拿原则当交易，把科学变成市侩哲学，那你一定能飞黄腾达……”覃泓的话像连珠炮一样反击着。

黎大品霍地跳起来：“住口！我什么都不要！用不着你来教训我。我知道我该怎样做人，我只求对得起祖国，对得起科学，对得起良心。我从来没想过要出人头地，多年来没伸手要过什么，可我也不愿意把事业搅到乱七八糟的漩涡里去！”

“这是懦夫的宣言！”覃泓说，“我并不同情你！任何一个人，都有净化周围的义务，你不是生活在另外一个星球上，你是在地球的生物圈内！”

黎大品长叹一口气：“你要我怎么样呢？”

“我要你挺起腰来，面对现实，顶住邪风！”

“邪风在哪儿？”黎大品说，“你同谁去斗？同谁去争辩？人家把你怎么了？给你扣了帽子，还是给你下了什么错误结论？都没有。这只是可以意会、不可言传的，是第六感官的感受，你教我的一套，那会被人讥讽为唐吉珂德大战风车，不过是假想敌。”

能说黎大品的“第六感官”说一点儿道理没有吗？就算黎大品可以接受覃泓的建议，他可以去找人大闹吗？他能够说出“一定要署我一个人的名”、“我应当提拔”吗？当然更不能自封为够了党员标准的人。

真令人费解呀！在黎大品平庸无奇的时候，他已经看到党的大门向他敞开；当他做出更大成绩的时候，他反倒目睹那扇门对他封闭了！

覃泓一时找不到什么言词来安慰、劝说、开导他，沉默了。

一阵风摇树响，露水珠雨点一样洒到地上，覃泓吓了一跳，毛骨悚然地回过头去：“别是闯出一只大象来吧？”

黎大品苦笑着说：“大可不必担心。你想见大象都见不到了。”

“为什么？”

“我们这里的热带雨林，一天天砍伐下去，林木越来越稀疏，大象藏不住身，纷纷搬家到泰国、缅甸森林中去了！大象是没有国籍观念的。”

覃泓拔下一根草，咬到嘴里沉思。

黎大品看到忙制止说：“这草有毒。”

“有毒？”覃泓从口中吐出草茎来，“山坡上多的是呀！”

“这是一种灾难，”黎大品说，“一种向大自然王国步步逼近的病毒。有一天，生物圈可能要毁在它身上！”

经他解释，覃泓才弄懂，这种草叫紫茎草，原来在中国是从没发现的。它来自泰国，其蔓延生长的速度十分惊人，只要林木砍倒，露出伐地，它便乘虚而入。这种草一长起来，任何植物都不再生长，它有剧毒，牲畜、动物吃了会毒死，野兽踩过它会得烂蹄症。这是热带植物学者们忧心如焚的一块心病。

覃泓好久没有言语。生物圈在日益受到污染，人的灵魂就不需要净化了吗？

过了一会儿，覃泓说：“你应当找同志们谈谈。特别是那个李尚年，他的意见最大。”

“可以理解，”黎大品说，“但不可以迁就。一个人的寿命是有限的，我不能拿出一半精力去搞关系学，我不怕损害一切关系。”

说心里话，覃泓是赞成黎大品这个观点的，可是她嘴上却说：“看看，清高劲儿又上来了！你别忘了，你是生活在生物圈中，社会、自然对你都有约束力、制约力，不管你承认不承认。”

一提起李尚年，黎大品只能苦笑。

李尚年当初并不愿意参加寻找化石树的课题，长年在林莽中转，在他看来又艰苦、又不讨好，完全是碰运气的事。假如留在科室中，在植物园里观察“人工群落”，那要舒服得多。

李尚年是怨恨赵士函的。他知道，自己分配到森林研究所

时，正是“工农兵大学生”不吃香的年月，像进工厂的人没有门路必定先去当翻沙工、铸工一样，他认为自己是被当“下脚料”甩给黎大品当助手的。

李尚年是属于精通社会关系学这一群的人。他公开向黎大品发牢骚，说黎大品是书呆子，专拣没影的科研项目干。弄好了，是替他人做嫁，弄不好，会灰溜溜。李尚年来得最迟，却把情况摸得最准。

然而，黎大品训斥了他：“搞科学的人没有名利。想得名利，你去投机倒把，你去当电影明星！爱迪生一生搞了几百项发明，他个人得了什么好处？”

李尚年确实跟着黎大品在原始森林中转了几个月，但最终他还是下山了，给黎大品留了个字条，说自己有风湿性关节炎。

李尚年做梦都不会想到，黎大品还有成功的可能！假如他能未卜先知，就是豁出掉10斤肉，他也不会让黎大品一个人独占全功！

在黎大品背着化石树赶回植物园，引起哄动的那天，李尚年带了酒肉、罐头到黎大品的木屋中去了。他哭鼻子，他检讨，他追悔，他许诺通过他叔叔的关系，把黎大品调到昆明去，目的只有一个，分享一半成绩，把李尚年三个字署到论文的前面去。

黎大品震怒了，拍了桌子，打翻了他带去的酒肉、罐头。黎大品拿出刚开了个头的论文原稿给李尚年过目。

李尚年后悔极了！他真想不到，黎大品是以他们两个人的名义在撰写论文的，不惟文章开头就说用“我们”的复合人称，李尚年三个字不是清清楚楚地写在标题下的吗？

但是，黎大品在盛怒之下，当着李尚年的面，把他的大名重重地勾掉了。黎大品赶他走开：“你不要污染了我这里的空气！我想不到你是这样卑鄙的势利小人！看来，为了名利，你是连祖宗都可以折价出卖的家伙，科学界为有你这样的人而羞耻！”

李尚年哭述，自己打自己嘴巴……

但一切都无济于事。在黎大品看来，他只是一个不足为伍的蛀虫罢了！

不过，黎大品从来没向人讲过李尚年的卑劣行径。别人好与坏，他都不愿意从自己口中说出来。当然李尚年本人更没有脸面去说了。

事后，李尚年找过赵士函和覃怀元，要求“公正处理”。赵士函说：“会研究的。你不要过于计较，这功劳也不只是你们俩的。”但覃怀元把他顶回去了：“不种树，不浇水，光想着摘桃子，像话吗？”

听了黎大品这段讲述，覃泓觉得惬意。若换成自己，不是也会像黎大品这样对付李尚年吗！

他是正直的、心地善良的知识分子！覃泓为自己没有看错他而高兴。

过了一会儿，覃泓扭转了话题，问道：“你天天来测试化石树吗？好像杨泽泗也常来。”

黎大品说：“是啊！我越来越发现，好多数据与书上的记载有距离。是化石树发生了变异呢，还是它并不是真正的化石树？”

覃泓吓了一跳，好像听说有人突然宣称地球即将毁灭一样可怕：“你说什么？怎么可能！无论如何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科学可不顺从人的意志。”黎大品用嘲讽的口吻说，“你害怕了吗？假如真的出现那种事情，你的文章可就无法收场了。”

覃泓猛然记起了杨泽泗的那句话：塞翁失马！难道……她像被雷殛了一样，感到周身麻木。

黎大品又说：“现在，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再三阻止你把化石树的事公布出去了吧？当然，这不是惟一的原因，像科学本身一样，科学的新闻也应当是百分之百科学的。”

覃泓不相信黎大品的话，认为他在故意耸人听闻。她虽够不

上专家，毕竟也是学植物专业的，对化石树的大概还了解。

她换了个话题说：“有一件事，我想请你同我合作一下。”

黎大品没做声，疑问地望着她。

覃泓说：“据我掌握，赵士函是个不学无术的人。不学无术，并不害人；不学无术却又冒充学问家，却贻害社会。《人工群落培植初探》既然是你执笔，是你研究出来的成果，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在这项成果上打上了骗子的戳记？”

黎大品矢口否认地说：“你不要听别人胡说！她是研究室主任，怎么能说剽窃呢？”

“像佃户的粮食理应归东家一样的道理吗？”覃泓犀利地反问。

黎大品无语对答，只是说：“我永远不会同你合作。搞科学的人，看重的是成果能否对人类有用，而不是这成果属于谁的专利。”

覃泓说：“不管怎么说，我要过问。”

黎大品说：“但是，你拿不到证据，望风扑影是不行的。”

覃泓有点愤然：“你身上怎么有一种天生的奴性呢？要证据，当然有！”说着，她把从黎大品床下拿到的论文和讲义底稿亮了出来：“这不是第一手证据吗？”

黎大品火了：“你怎么敢这样放肆？马上还给我！”看他的架势，简直要动手来夺。

覃泓早有防备，往怀里一掖，一边走一边说：“我这样做，既是为了让魔术师的魔术还原，也是为了拯救那些可怜的佃户们。”她纵声笑着，跑远了。

直气得黎大品一句话说不出来。

80年代型号的人

难怪覃怀元说他的女儿是“现代派”、“80年代型号”的人，也许不无道理。她一般是不按前人约定俗成的脚步走路的，想到了就要说，说过了就要付诸实施！

覃泓也懂得避嫌。她从父亲言谈中和别人的议论中，或多或少地知道一点内幕，那就是赵士函上头有人，除了李所长赏识她，省委也有人对她青睐、器重。赵士函当然不是那种低级庸俗的人，她的这一切，绝对不是用送礼、阿谀奉承得来的，她走过的道路，和某些赏识她的人太相似了，否定她，当然就否定了同类中的长者。

大概由于这个原因，尽管覃泓发现爸爸更偏爱黎大品一些，可她隐约感到，爸爸奈何不得赵士函，也惧她三分，是不是避免投鼠忌器呢？当然了，在其位有其忧，这也难怪。

可覃泓却是一身轻松，是别人管不了的自由神！她怕什么呢？这里的省委、市委、研究所党组，一不能降她的职，二不能停发她的工资，三不能给她穿小鞋，她觉得自己是个可以说真话的无冕王，是齐天大圣！

她知道，如果把赵士函冒功的事告发到父亲那里，他不惟要说她多管闲事，甚至会使爸爸陷到进退维谷的地步，因此可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她甚至怀疑，常在这儿蹲点的覃怀元，对赵士函的为人、业务功底会一无了解吗？

有了这些念头的心理，覃泓决定越级上告！

她躲到依江家中，足足闷了两天一夜，终于写成了一式三份的揭发材料，一份发给省委，一份发给省科委，一份发给森林研究所党组。

直到她赶到小小的芒寨邮政所，把三封信用挂号寄走，她才

感到卸了重债，打了几个哈欠，又钻到依江家的竹楼里，美美地睡了一整天。

人们常用“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来形容瞬息万变的尘世。

覃泓毕竟太年轻，不谙世故，她哪里知道她这一举动引起的连锁反应呢？这链条中关键的一环，就是赵士函了。

也许就是森林研究所党组书记李健接到覃泓告发信的当天吧，赵士函就接到了他由昆明所里挂给她的长途电话。

李健火气很大，听得出他是极力压着火气的。他先在电话里询问赵士函：“那个叫覃泓的，是什么角色呀？”

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赵士函有点摸不着头尾。她说：“您不是接待过她吗？她是科学院情报所的，是来考察化石树的。对了，我跟您说过，她是覃副所长的女儿呀！”

“我说的不是这个。”李健用不屑的口气在电话里嚷道，“我是说，森林研究所不会去请救世主，也不需要太上皇！”

赵士函是号称具有水晶头脑的人，一点就透亮。只这两句挖苦语句，他就断定覃泓触怒了李健。她心里甜丝丝的，有一种伏天洗浴后的轻快感。但她一时还无法判明，覃泓到底触怒了李所长的哪根神经。

于是，她小心地问道：“出了什么事情吗？都怪我没有注意到，给领导惹了麻烦。”

李健在电话里哼了一声，说：“有人告你状了！告你剽窃别人的研究成果，告你霸占别人的学术论文……”

“有人？”还能有谁？不明点出覃泓的名字，那是领导的艺术。赵士函自然晓得，这告状人就是覃泓。前面不是有了铺垫的吗？赵士函很敏感地想到了，一定是人工群落的事情。这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事，别人即或摸到一点边儿，也只能

是臆测，能够致她于死命的，只有黎大品一个人！天哪，肯定是黎大品向覃泓亮了底牌，或者是唆使这个自命为带着尚方宝剑来的天使替他出这口恶气。赵士函马上联想到，为什么自己再三强调发表化石树的消息时要署集体的名字，而结果是大写特写黎大品？这难道不是黎大品和覃泓达成默契了吗？也许还有更大的背景，那就是覃怀元充当后台老板了！

赵士函拿着话筒的手都在出汗！她深悔自己太麻痹、太大意了。这步棋应当是早就料到了的。现在，再明显不过了，覃家父女拼命吹捧黎大品，覃怀元在党组会上为黎大品评功摆好，目的都是让他当所长继承人，挤掉本来胜券在握的赵士函！这一切都是阴谋！可惜赵士函搞了半辈子政治工作，到头来叫别人算计了还不知道。

现在是不是亡羊补牢呢？亡羊补牢，不是还称为“未为晚也”吗？赵士函不傻，她冷静地分析了此时相距数百公里外的所长李健的心情。他之所以急不可待地摇电话给她（一个被告），说明李健至今倾向自己，这是毫无疑义的。那么，单纯地去解释自己的委屈，多么苍白无力！她觉得应当抓住李健的心理，击中要害，才能扭转败局。

什么是要害呢？她一点都不费力地就琢磨出来了。李健是个一辈子都不懂业务的得力干部，外行当领导，可以骂街，又省力，干对了有功，干错了都推到业务所长身上去，他还保持着批判权，这种本领，其实本身不就是一种绝技吗？赵士函觉得，她此时是与李健荣辱相关的人物，如果自己垮了台，就证明李健以及比李健更大的人物对从前器重的人没有长正眼光，否定了他们自己，如同徒弟的技术被贬斥，会危及师傅的手艺一样，休戚相关。

赵士函脑子里一闪，立刻在电话里说：“李所长不要为我担心，您不是说过吗？若想没人反对，只好不做工作。如果说我有

错误，这错误的第一条，就是当了政治干部！我个人倒是事小，小人物嘛。问题是，覃泓这次下来，煽动只专不红的风潮，甚至散布我们所里风气不正的言论，连上级都否定了，这是我没能力顶住的。前几天，覃所长暗示我发展黎大品入党，我顶住了，顶住的后果就是这样。我看，李所长还是放我下去搞点本行业务吧……”

她说得很可怜，好像她是被人欺侮了的孩子，只有在妈妈面前才敢流泪、诉苦。

赵士函确实是个懂得生活艺术的人，轻轻地把球一拨，拨到了李健怀里，该说的全都暗示给对方了。

李健火愣愣地下令说：“现在还搞什么突击入党？不够就是不够。不能说业务好了政治一定好。照这么下去，我们应当跑到国外去，给那些外籍华人科学家下跪，请他们入共产党了？他们的业务不是都很棒吗？你要顶住！越是在这种时候，越是检验一个人党性的关头……”

李健还唠叨了好多，无非是老生常谈，赵士函没兴趣听。若讲口才，赵士函不在李健以下。她一边“啊”、“是”地应答着，一边早在思考下一步怎样行动了。

赵士函并不怎么惊慌，她那强有力的靠山还在。但她却感到了一种潜在的危机，感到了黎大品对她构成的威胁。从生物圈里自然竞争的角度看，有时候构成威胁的并不一定是仇敌，自发的并行者也可以有这样的效果。倘若这样下去，黎大品真有可能取代她这个当然所长接班人上去的。要知道，这正是政工干部贬值的年月。

她放下电话，走出办公室，一个行动方案已经考虑成熟了。她觉得自己是个仓猝还击的自卫者。别人打你一拳，你还别人一刀，那绝不算过分，因为是自卫还击！法律上还保护呢。

一出门，就碰上了李尚年。

赵士函问道：“你干什么去了？”

李尚年说：“我去植物园追肥刚回来。”

“见到黎大品和覃泓了吗？”赵士函含义不明地问了这么一句。

李尚年眨眨眼，反问道：“怎么，有什么新闻吗？”

赵士函欲言又止，终于还是说了：“听说他们天天晚上泡在一起，引得傣族老乡议论纷纷，这事又不好说，一个孤男，一个未嫁女，真在一起谈情说爱，也没有什么。不过，城里的西洋景，可不适合少数民族的口味呀！”

李尚年说：“我说的呢！覃泓那么下死力给黎大品吹喇叭、抬轿子，原来是有这个勾当。”

赵士函格格一笑，说：“谁让你没本事，不招人爱了？你不要当小广播呀！”

“什么话一到我肚子里，非烂了不可。”李尚年说，“你放心吧。”

他走了。

其实，赵士函还不了解李尚年吗？他是那种被称为“噉嘴骡子卖了个驴价钱”的脚色，狗肚子存不住二两香油，你越是叮嘱他保密，他越是有兴趣广播出去，不信，用不了一天，这消息会传遍每个人耳朵，而且出于对黎大品的不满，他会自觉地添油加醋，把芝麻说成西瓜！

赵士函去植物园的路上，又遇上了中年助理研究员康运风。

赵士函说：“老康，你近来好像有什么心事，是不是？”

康运风拿大竹笠扇着风，说：“我挺好的，就是培养基试验总不理想。”

赵士函说：“不着急。搞科学嘛，总不能像春种秋收那么保险。你有干劲，迟早能成功的。你别瞒我，你没有评上副研究员，是不是有点想法？”

大概叫赵士函说对了。可是康运风敢同室主任赵士函争高下吗？所以康运风说：“没什么。我又不是为什么职称工作。再说，连黎大品都没评上副研究员，我更没什么奢望了。”

赵士函显得极为同情地说：“上面有些人就是教条！必须有多少篇论文，又要有有什么范围的影响。哼，我还要给你力争。回头你把你发表过的论文都整理汇集起来，我再报一次。我就不信，1957年的大学本科毕业生，头发都秃了，还不够个副研究员！”

即或是不追求名利的人，大概也不会对恭维话反胃的，康运风一时对室主任感激涕零。他临走，赵士函又嘱咐说：“你回头叫邵宏一下，说我找他。还有，你告诉刘佩，说我给他带回一个治疗脉管炎的偏方，叫他到我那儿去拿……”

康运风乐呵呵地走了。

赵士函也乐了。她相信，在这个小王国里，她仍然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不信搞搞民意测验，同意赵士函当未来所长的人，肯定占压倒多数。

现在，她可以去找覃怀元了，水到渠成，她相信，连未必称道自己的覃副所长，也将站到她这一边，至少是盟军或者保持中立。她觉得，在自己头脑中，有一种永远不会枯竭的能源，她自己都欣赏不已。

一张肉眼看不见的网已经悄悄织成、张挂起来了。

覃泓呢，活像一只自鸣得意的小昆虫，嚶嚶地飞着，飞向那张可怕的网。

这天傍晚时分，覃泓来见爸爸。确切点说，是覃怀元叫人捎信给她，要她马上来的。

一进屋，覃泓感到空气有点异样，覃怀元面目冷峻地坐在桌子前面，面前放着一堆纸片子，像摆扑克牌一样摆了一大片。风从窗外吹进来，把那些纸片掀得哗哗响。

明明听到了女儿的脚步声，覃怀元却头也没回。

覃泓悄然来到父亲身后，调皮地问：“怎么，爸爸摆扑克牌算命哪？”但她马上发现，那是一些无记名投票方式的人名卡片，几乎所有的纸片上都写着赵士函的名字。

她一下子醒悟了，这是对所长接班人搞的一次民意测验。她的心陡然一沉，很不是滋味，就直通通地问道：“民意测验结果出来了？能给我看看吗？如果不保密的话。”

她刚要伸手去拿桌上的纸片，覃怀元早摀住了纸片，几乎是声色厉地吼道：“你还懂点组织原则吗？”

覃泓吓了一跳，这才发现父亲的脸色铁青。她赶忙站到角落，说：“不看就不看呗，发什么火？”

覃怀元粗重地喘着气，拉开抽屉，翻出一盒雪茄烟来，费了好大劲才点燃，拼命抽着，半晌不说话。

覃泓并不怎么怕他。她以为，覃怀元是因为黎大品的“不得人心”而恼怒，正想借机为黎大品打几句不平，覃怀元挪动一下竹椅子，面对着覃泓，尽量压着火气，说：“泓泓，你听爸爸的话，明天就回北京去吧。机票，我打电话给昆明，叫人代你去订。”

这倒是覃泓根本没料到的。

她问道：“为什么？”

“什么也不为，”看得出，覃怀元在尽力克制自己的冲动，“这样做，对你好，对黎大品好，对工作也有利。”

覃泓可不是省油的灯！何况又是在自己的爸爸面前。她说：“这办不到，我的任务没完成。”

覃怀元说：“那好办。那篇论文，我尽量催黎大品定稿，或寄去，或专程派人送去。至于是叫黎大品去宣读，还是叫别人去，这要由我们所里研究。”

覃泓说：“明白了。不过，我是北京情报所的人，不是您能

管辖的。”

这句话终于把覃怀元积在心底的火气引出来了。他把大半截雪茄狠狠朝地上一摔，吼道：“住口！你别跟我耍嘴皮子！我总是你爹！”

“爹也得讲理呀！”女儿亢声说，“您干吗赶我走？怕我发现、揭露你们的阴暗面，是不是？”

“我的小祖宗，”覃怀元说，“你不在这里，有些事情还好处理一些，你搅到里边去，越搅越乱。听我话，走吧，啊？”

看他的脸色、听他的口气，覃泓意识到可能出现了什么变故，不然父亲不会这样暴怒，因此她缓和下来，问道：“我回北京也可以，不能叫我闷在葫芦里，总得说明白呀！”

看女儿有了转机，覃怀元长叹一口气说：“人多嘴杂，你出去听听吧，好多人说你与黎大品关系……有点、有点不正常。瓜田李下，注意点，少惹烦恼。”

听说是这段公案，覃泓反倒格格地乐起来：“这算什么？我以为天塌地陷了呢！人家长着嘴，爱说什么说什么呗。前一次，不就有人嚼舌根吗？我不怕。为这个走，不值得。”

见她满不在乎，当爸爸的火气又上来了，说：“你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再住下去，还不闹得满城风雨？叫我怎么做人！”

最后一句话深深地刺痛了少女的自尊。覃泓冷笑一声，寸步不让地说：“我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叫爸爸跟着丢脸了？假如我真的爱上黎大品，又怎么样？他不犯重婚罪，我也受不到道德的谴责。”

覃怀元吓了一跳。当然，他知道这是女儿的气话。她正当芳年，即使再降格以求，也不至于找一个比她大差不多 20 岁的、结过婚、有了孩子的男人的。但父亲晓得女儿的执拗脾气，说不上服她，她是不会乖乖上路的。

因此覃怀元苦口婆心地说：“总得照顾影响啊！别人哪怕把

死人说话，我也不相信你和黎大品有什么特殊关系。但是，好说不好听啊！何况，这事传扬出去，对工作不利，那你为黎大品写报道，都成了利己主义私心作怪了，你就是长一千张嘴也说不清。”

覃泓说：“只要实事求是，我宣传我亲爹都没关系，我不怕。我觉得您太懦弱了，您以为退让就能煞住邪风吗？您大概还不知道吧？您最信任的赵士函，是剽窃别人科研成果的人。《人工群落培植初探》就是一例，我已经告发到所党组和省委了。”

覃怀元吃了一惊。他觉得女儿的手伸得确实够长的了，以至于陷自己于被动。他不容分说地说：“你明天必须走，不走，我给你们情报所打电话，叫他们调你回去。”

覃泓说：“我不会打电话说明情况吗？我们了的领导可不怎么糊涂。”

覃怀元气得乱抖，喊道：“你……你不准再去接触黎大品，你不准再……”

第二个“不准”还没有说出口，覃泓早接过话来说：“我偏要去找他，我还要嫁给他，看能怎么样！”说完，噔噔噔地跑了出去。

覃怀元跌坐在椅子上，一筹莫展。

生活中的戏剧结构

覃怀元终于没能赶走女儿。他确实给北京情报所挂了长途电话，但迟了一步。情报所的郭所长居然先发制人，要求覃怀元协助覃泓多做点工作，还说到，她刚走出校门，实践经验少，还可以让她在下面锻炼锻炼。覃怀元闹了个倒憋气，料到是覃泓抢先向她的领导奏了一本。

一连几天，覃泓都不着面，不理他，到处钻。

这天早晨，她拿了牙具到河边去洗脸。赵士函早走了，她起得更早。

研究所的人都在河边洗漱。覃泓觉得人们的目光有点异样，投到她身上的眼光甚至像是幸灾乐祸。先时她以为是自己神经过敏，但后来她否定了！你看，人们端着牙缸刷着牙，拿着湿毛巾擦着脸，都不约而同地往一起凑，交头接耳，好像在议论什么最神秘的事情。

这种事，几年前是有过的，“四人帮”倒台消息没有正式发布前，人们就是这种表情、这种方式。是今天早晨新华社播发了什么头等重要新闻吗？还没到6点半，《新闻联播》还没有开始啊！

很快的，她推翻了这种设想，认定这新闻是属于研究所内部的，不像是凶信，倒像是喜讯，人们惊讶，面露喜色。

接着，覃泓敏感地觉得这新闻与自己有关。不然，人们为什么总是回头回脑、指指点点地看她呢？

李尚年肩上搭着湿毛巾，嘴巴上还沾着牙膏沫，唱唱咧咧地过来了：“春季里来好风光，哪里格哪里格哪里格啷……”当走到覃泓面前时，李尚年闭住嘴巴，嘲弄地一笑，说：“您早，科学院新闻发布官。正等着看您的第二号新闻呢，那一定会轰动全球的！”

覃泓莫名其妙，本想回敬他几句，却又不屑于同这种人较量。

倒是赵士函一本正经地朝她迎过来，说，“莫非你一夜没睡？我真羡慕你，我年轻的时候，也有过你这样精力过人的时光，那是历史了。”

覃泓一直注意审视着她的表情，看不出有什么异样，说话十分轻松。

覃泓惴惴不安地问道：“出了什么事吗？”

“你倒挺敏感啊！”赵士函笑咪咪地拍了她肩膀一下，说：“天塌不下来的。生活哪能都是顺水、顺风呢！你去洗脸吧，回头我在覃所长的房间等你。”

不祥之兆！尽管会做工作的赵士函很平静，覃泓的心底却掀起了汹涌的波澜。莫非是自己那篇文章出了什么漏洞，还是黎大品出了什么大事。

都不像，又都像。

覃泓连香皂都忘了打，在河水里蘸湿毛巾，草草地揩把脸，就直奔覃怀元的办公室去了。

覃怀元的脸色恰好与轻松自如的赵士函相映成趣。他脸色发青，好像雨季不开晴的天体。

见覃泓走进来，覃怀远看都没看她一眼，只顾闷头抽他的雪茄。

“到底出了什么事？”覃泓问。

“等着检讨吧，”覃怀元说，“责任都在我，科学性不够，工作没有做到家，胜利冲昏了头脑！见鬼了！”

赵士函对覃泓解释道：“昨天夜里，杨教授发现，这株化石树是单性花，也就是说它可以不经受精单独发育成子代。而真正的化石树不是这样的。专家们认为这不是我们要找的化石树。”

“假的？”覃泓腾地从椅子上跳起来，本来就大的眼睛瞪得怕人。她像听说地球不再围绕太阳运行一样震惊。

“我不信！”覃泓说。

“你冷静点，”赵士函说，“对待科学不能凭感情用事！你以为我们愿意听到这个结论吗？我们研究了这么多年，流了那么多汗水，我们承受的打击和压力比你大得多。幸亏杨泽泗教授经过多日反复观察提出了质疑，才得出科学的结论。”

“这个老滑头！”覃泓说，“算什么先生？他为什么不先向所长报告？为什么不先把疑点同黎大品商量？”

赵士函说：“你怎么能这样说一个民主人士？他的结论要等开花结果呀。我们应当理解他，正当全所上下一片热的时候，又有你在报上宣传，只有一个人冷静，那是徒劳的。即使他当时提出存疑，也没有人会理会，相反可能怀疑他有什么别的动机。我们总不能说是老教授尊重科学是错误的吧？”

覃泓驳不倒她。是呀，难道让杨泽泗违心，违背科学，那才是值得夸赞的吗？她觉得眼前发黑，地转天旋，仿佛正在发生大地震。她没有时间去考虑自己那篇报道的后果和责任，她可怜黎大品，这不是没打着狐狸空惹一身臊吗？他将怎样在这里生存下去？他能支撑得住吗？可想而知，李尚年这种人会怎样疯狂地嘲笑他、挖苦他、打击他……

覃泓稍稍镇定一下自己，猛地转身往外就走。

覃怀元叫住她：“回来，你干什么去？你去告诉黎大品？你还让他活吗？你这个傻瓜！我们得想个办法呀！”

覃泓眼圈红了，眼泪就要流下来了，爸爸的掏心话使她十分感动。自己这种情绪，不是给黎大品火上烧油吗？

在覃泓犹豫的当儿，赵士函说：“我了解黎大品，还是由我告诉他吧。”

覃怀元点点头：“要和缓，不能刺激他。”

赵士函答应着走了。

剩下覃泓和老所长两个人时，覃怀元长叹一声说：“这叫什么事？这回好！等于把咱仨捆到一块儿打！”

想起耳濡目染的感受，覃泓说：“那倒无所谓……化石树的本身倒在其次，我是担心人才会倒在无声的枪弹下！”

覃怀元倒背着手，在屋子里踱步。

覃泓问道：“您更有理由赶我回北京了。”

覃怀元深深地叹了口气：“还用我赶你吗？不用我说话，你都会要求马上离开这里的。”

父亲的话，何尝没有道理？随着化石树的破产，她的使命也就自然中止了。剩下的，只是回北京向领导检查，检讨自己的“盲目”，也许还要在报纸上发一条更正消息……她感到自己有如被推上断头台那么难过。

可是，黎大品呢？他的处境，不是比自己还不如吗？这一次，覃泓倒是心悦诚服地自供了，是她，害了黎大品，好心换来恶果，把人家推到是非的漩涡里去……

她没有再同爸爸说什么，就悄悄走了出来。她觉得爸爸说得对，她和黎大品这回当真要被人家捆到一起打了，只有他，是自己风雨同舟的患难之交！舆论，这个比万吨水压机还要厉害得多的无形力量，硬是把她和黎大品压到一起了。

她不敢放心黎大品一个人关在木屋中。她甚至胡思乱想，怕他不能解脱，生出轻生的念头。她一点都不感到这设想太幼稚、太好笑。

她小跑起来，一直跑到木屋跟前。

她突然在竹林前面站住了。她面对的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场面。

一向门庭冷落的木屋前面，人都堆满了，屋里屋外都是人，有人坐在窗台上。覃泓暗自清点了一下人数，除了老所长、杨泽泗和一两个苗圃工人外，几乎所有的人都到了，连李尚年也在。他竟然一副悲伤面孔，拿一把葵扇给黎大品扇风凉。

无疑的，这是来安慰一个失败者的，像几年前黎大品的妻子突然死去一样，人们都赶来志哀，陪着主人掉眼泪。

覃泓清楚地看见，有几个女同志不时地拿手绢擦眼睛，没有一个人脸上有幸灾乐祸的表情，这和早上她在小河畔看到的仿佛不是同一群人！

黎大品木然地坐在他那张破竹床上，脸上没有欢快，也没有悲伤，两眼直视，瞳人好半天才能转一下。

赵士函坐在他身旁，正在滔滔不绝地说着宽心话：“你是我的老同学、老朋友了，我比别人更了解你。科研和其他工作一样，有成功，有失败，有欢乐，有苦恼，问题是要经得住摔打。我相信你，你不会倒下去的。”

李尚年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叫那些说三道四的人见鬼去吧！我还跟黎老师上山去找，只要化石树存在，我们就一定能成功。”

一个女同志说：“赵主任，我建议寻找化石树还继续列为科研课题。”

“那当然。”有人立即附和。

有人说：“大品同志做了大量工作，积累了几年的资料，这一点，在我们治学上，是一个鼓舞。”

一个显然是工会小组长的人，拿出5张10元的钞票放到床上，说：“这几年大品同志把自己的钱都用到研究上了，弄得连一套像样的行李都没有，这50元钱，是工会批给你的困难补助费。”

黎大品似乎没看见，也没听见，不知道思绪把他带到了什么遥远的地方。

又一个女同志说：“我看，应当叫大品同志休探亲假了，他5年没有离开过森林了。顺便叫他把孩子安置在城里，不是更能安下心来搞科研吗？”

赵士函说：“这个建议好，一会儿我就向覃所长去汇报。”

这是怎样感人的场面呀！

然而覃泓一点都不感动，反而厌恶得想使劲啐上几口。

人们陆续离开了木屋。赵士函是最后一个离开的。她在门口碰到了表情麻木的覃泓，嘱咐说：“你同他谈谈也好，不要用重话刺他。我们大家的心情是一样的。这个波折，对于我们的科研，对我们的声誉，固然是个损失，但任何事物都有相对性。失

败，是一种考验，而成功，是更不容易闯得过去的考验关。这件事对大品来说，可能是天大的好事。”

覃泓一声没吭，目送赵士函迈着稳健的步子走下山去，她才去拉木屋的门。

黎大品如同傻了一般，仍然呆坐直视，从窗口吹进来的风把5张钞票吹到地上，在墙脚翻滚。

他突然站起来，举臂呼天，哈哈地狂笑起来，笑得刚迈进门槛儿的覃泓头发根都竖了起来，连连后退，以为黎大品疯了！

他没有疯。笑过了，又坐下去，泪水夺眶而下。

覃泓在门外扶着木门也流下泪来。她觉得黎大品太可怜了！她本来是来安慰他、给他鼓劲的，现在自己这个愁眉苦脸的样子，怎么进屋去呢？

正当覃泓打算离开木屋时，黎大品走出门来，发现了她。

黎大品心里更加不是滋味，呆了半晌，才说：“你……别难过了。”

覃泓背过身去，不让他看到发红的泪眼：“谁难过了？我才不会呢。”

黎大品说：“我……最对不起的是你。你的热心肠换来的是一场冰雪、一场玩笑。你骂我吧，恨我吧，我没有能力替你挽回声誉上的损失。你为我高兴、为我流泪，到头来，你不过是受我捉弄的一个可怜的配角。”

覃泓说：“我？……这没什么。要紧的是你，你应当振作起来。有你那种坚韧不拔的毅力，最终会得到成功的。”

黎大品扯下一片竹叶，放到口中咀嚼着说：“你还希望我重演这出悲喜剧吗？够了。你看我现在多好？别人半斤，我八两，别人躺着，我卧着，大家都一样，这回好了，好了……”

覃泓说：“你说这话不感到害羞吗？”

“害羞？”黎大品苦笑道，“方才，你不是看到了吗？我失败

了，却博得了同情，有了人间的温暖，人都是同情弱者的。”

“你想得到我的同情，那你想错了！”覃泓突然把积了一肚子的无名火朝黎大品喷发出去，“你是个没胆量的人！到底是我看错了！我也不稀罕你那几句可怜我的话，太不值钱了。再见吧，黎老师，我明天就回北京去！”

“再见。”黎大品冷漠到了极点，“不送了。”

别提覃泓有多失望、多委屈了。她提出要回北京，原不过是激他，她果然迈步做出生气欲走的样子，也是满心希望黎大品能挽留她的，却不料黎大品麻木不仁，无动于衷。

覃泓一口气跑下山去，倚在一棵槟榔树下，流了一阵辛酸的眼泪，终于下决心，马上收拾行装，明天就上路。为了他这种人，一滴泪水、一丝柔情，都是不值得的。

哀莫大于心死

目送覃泓走远，黎大品感到周身轻松，心里却又不安。她要走了，不会有人猜到他的内心。这机灵的姑娘虽说同他交往不深，却像是多年的知己，什么事很难瞒过她的眼睛。可是，她是含着委屈和怨恨的泪走的。她误解了自己，那没有什么，他感到对不住她那一片火热的深情。

当他知道覃泓第二次到来的消息时，他就抱定冷淡的态度。上次覃泓走后，不是有人用玩笑的口吻问“那位现代派小姐写来情书没有”吗？人言可畏！

黎大品吃一堑长一智，决心在曲曲折折的路障中钻出一条缝来。他怎么能不苦笑呢？在他念大学听报告时，他把《植物志》包上封皮，写上《政治经济学》字样，蒙混别人眼目；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借口“神经官能症”需要安静环境，跑到森林里去采集标本。他走的都是曲线，现在，他不得不再次动脑筋走曲

线了！

他在木屋里站了一会儿，摘下悬在墙上的照片，望着时青恬静的面容，又禁不住落下泪来，喃喃地说：“时青，你能想像到我的处境吗？我真的快要趴下了……”

他好像看见时青文静地笑了，那对深情的眸子望着他，好像在说：“你忘了我们的初衷吗？你怎么能说出这样没出息的话来？一切都可以重头来，只有心死了，那才是真正完了……”

啊，多么熟悉、多么亲切的话语！这几句话，几年来千百遍地在他耳畔萦绕，像是电影里的画外旁白。

时间过得真快呀！一眨眼 20 个年头过去了，可在黎大品看来，一切都像是昨天，昨天……

篝火升腾，乐声飞扬，那是一个星斗满天的秋夜，北大校园正在举行露天狂欢晚会，各系、各专业领到毕业文凭的毕业生们，围着篝火跳着青年舞。尽情地唱、尽情地跳吧，欢度这大学生活的最后几个小时！

明天，他们将背起行装，奔向祖国的四面八方，正像吊在气球上的巨幅标语上所写的：革命青年四海为家，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在人工湖畔，跳得汗津津的黎大品和时青正仰倒在草地上遐想。

时青用草棍捅捅他的耳朵，轻轻一笑，说：“你去大西南不后悔吗？”

原来黎大品本来是留校当助教的，可他坚持要到绿色植物王国去。

黎大品翻过身来，趴在草地上，说：“事业，不一定都在北京啊！”

时青说：“有人议论，你改志愿，是因为……”

“因为你吗？”黎大品笑着接过话头，“又是，又不完全是。”

时青说：“傻！等有一天我突然跟别人结了婚，你才后悔呢！”

黎大品说：“那时，我就打起背包回北京。”

时青说：“你忘了我们的初衷吗？你怎么能说出这样没出息的话来？”

黎大品哈哈地笑了起来。

艰苦，是他们想到了的，但他们去的地方，比想像得到的艰苦还要加倍。他们到达昆明时，是坐一辆马车到教育厅报到的。一共4个人。天晓得怎么搞的，不懂普通话的车夫把他们拉到了公安厅。正当他们哭笑不得的时候，从公安厅大门里走出个人，背着盒子枪，背后跟着十几个戴胸章的公安战士。这人便是草创森林植物园的覃怀元。

真巧！黎大品偏偏向他询问去教育厅的路径。一听说他们是从北大毕业的大学生，覃怀元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热情。当他进一步得知这4个人是北大生物系毕业，都是学高山植物的时候，他简直有点狂热了。他指着等在一旁的公安战士说：“看见了吗？我是来搬兵的，我可以把你们武装护送去。你们根本不用去教育厅了，我就是植物园的，前几天，教育厅就通知我们，来了4个大学生。”

他们将信将疑，面面相觑。虽然他们知道有可能分到热带植物园去，可也不愿意这样半途被人拐走。

覃怀元似乎看透了他们的心，就说：“哈哈，信不着？怕我拐骗？你们当中，哪个叫赵士函啊？”

大学生们心服口服了，他连名字都知道，还有“拐骗”的嫌疑吗？

其实，覃怀元还真是拐骗！他只不过天天跑教育厅去要大学生，偶然看到分配名单罢了。他所办的植物园是属于林业厅的，历年大学生分来，哪怕是林学院的，也都被教育厅优先分给热带

植物研究所、园艺研究所了，人家根本不承认林业厅这个植物园。

事后，等到生米煮成熟饭，4个大学生都已经快活地随覃怀元在公安战士的护送下进山去了，教育厅和热带植物所才发现他们“拐骗”人口的事，于是告状。这边是林业厅长出面，那面是教育厅长出面，官司打成平局。后来省委管文教的书记出了个主意：问大学生们的意见，由他们自己定！

黎大品他们几个谁都不愿意蹲在昆明，他们早已爱上了新的事业！

热带雨林无四季。人们只能根据空气的干湿度、雨量的大小来判别冬夏。

生活是艰苦的，也是有趣的。

记得那是1966年的8月份黎大品他们的小分队9个人走掉6个，只剩他和时青在坚持了。赵士函是队长，自从她同昆明的一个干部结了婚，她大部分时间在林业厅科教处。其他6个人，回去两个造反的，被当牛鬼蛇神揪回去两个，另两个告了长假去养病。

黎大品如今回忆起那难忘的一夜，仍旧像过电影一样，镜头都组接得好好的。

那是一个令人窒息的、没有月亮、没有星光的夜。蚊蚋成阵，咬得人无法成眠，不得不拢起一大堆冒着灰烟的篝火驱蚊。

一棵少说有500年树龄的老榕树上，吊着一个用扁藤编的软吊床，上面铺了厚厚一层树叶，时青就躺在吊床上，手拿一枝芭蕉叶子驱赶蚊虫。吊铺像秋千一样荡来荡去。这种吊铺是防止猛兽侵犯的好办法。

黎大品没有上他的吊铺。他拼命往火堆里加湿柴，以求青烟更多些。

他突然望着时青的吊床问：“哎，你……睡着了吗？”

时青轻轻一笑，说：“睡着了。”

“睡着了还能说话？”

两个人都笑起来。

黎大品心事重重地在树下来回走了好久，突然乞求地说：“我们……结婚吧。”

时青欠起身来申斥他说：“又来了！你怎么老是食言呢？不是说好，到1968年，你写的那本《热带植物分类志》问世时，再举行婚礼吗？”

黎大品说：“我怕……我怕一个人孤独，真的。我怕等不到那一天了。”

“你要死啊！”时青说，“你胡说些什么呀？那么没出息！”

黎大品说：“这次运动，好像……比哪一次都猛，网眼儿越收越小……咱们队两个，加上杨泽泗先生，都关到牛棚去了，我这几天总是坐卧不安，我看我要漏不过去……”

“你又冒充有政治敏感性了！”时青半开玩笑地说，“放心睡你的觉吧。你若真有住牛棚那一天，我就夹铺盖卷儿到牛棚里同你结婚去！”

这是纯粹的玩笑，而生活中使玩笑变成事实的例子还少吗？

政治嗅觉迟钝的书呆子一旦敏感起来，那是相当准确的。在他们开过玩笑后的第5个小时，从昆明林业厅来的造反者们押走了黎大品。他挂的牌子上写着：“漏网右派、修正主义苗子黎大品。”

当着黎大品的面，造反者们把他辛辛苦苦写了3年的《热带植物分类志》手稿付之一炬。他精神上所受的打击，比肉刑更要难以忍受，他晕了过去。

那天夜里，外面是凄风苦雨，屋中是黎大品和自己的影子！

忽然门外传来争吵声，一个是看押牛棚的造反者，另一个像是时青。

黎大品又惊又喜，忍着伤痛走到窗前向外探望。果然是风尘仆仆的时青！她披着一件塑料雨衣，夹着一个小小的行李卷，正在同看守的人交涉。

造反者挡住门说：“黑帮，不准见。”

“我不是来见他的，”时青一字一顿地说，“我刚从芒寨植物园回来，我是来同黎大品结婚的！”

造反者以为她在说疯话，瞪大了眼睛问：“你说什么？”

“结婚！”时青说，“就在今天。”

造反者一时摸不着头尾。他做不了主，一溜烟儿地跑到对面办公大楼去请示头头了。

可想而知，那是一个悲凉的、残缺不全的婚礼。可是他们是踏实的。

黎大品堵在门口，不准时青进来：“你快走！你疯了吗？小心他们把你也关进来。”

“那不是更好吗？”时青走进牛棚，甩掉雨衣，抱住黎大品说：“我知道，你怕孤独，我不是来了吗？我说话是算数的。我知道，你在这个时候才更需要我……”

风声凄紧，冷雨敲窗，这能叫婚礼吗？

时青拿出一个小扁瓶，里面盛有二两竹叶青酒。她分别倾到两只搪瓷缸中，二人碰了杯，和着泪水喝下了这杯又甜又苦的酒。

想着地上那堆残稿的纸灰，时青说：“不要哭，一切都可以重头来，只有心死了，那才是真正的完了。来，我给你唱歌，唱咱们自己的歌。我给你的词谱了曲子，你听好不好听？”

时青带着泪水唱起来：

青山高哎，
绿水长，

这里是远离人群的地方。

……

昨天，昨天，一切都恍如昨天！黎大品不是时时刻刻都听得见时青的歌声吗？

“只有心死了，那才是真的完了！”

黎大品可以形灭，是不会心死的！

他把有关化石树的资料又翻查了一遍，带上门走出来。

奇怪，好像有个人影闪进了竹林，是谁呢？黎大品走近竹林，发现了覃泓，忙问道：“是你？你怎么又来了？”

覃泓似笑非笑地说：“来同你告别。”

黎大品冷淡地说：“你已经告别过了。”

覃泓正想回答，只见杨泽泗迈着方步走来。他提着一个有盖的竹篮子。

黎大品迎上两步，朝杨泽泗点点头，算是打招呼。

覃泓想起他那阴阳怪气的样子，特别是怀疑化石树真假的事，气不打一处来，就嘲弄地问道：“啊，是杨教授，你一定喜上心头了？”

黎大品感到覃泓的话太叫老师脸下不来，赶紧用眼神制止她。覃泓根本不理睬他。

杨泽泗一边迈步进屋，一边说：“也可以说是高兴。踏实了嘛。”

覃泓想看她究竟要耍什么鬼花样，跟了进去，又刺了他一句：“是啊，学生总是超不过老师！学生要跑在老师前面，那么等于地球是月亮的卫星了！”

杨泽泗真是好脾气，一点都不生气。他掀掉竹篮子盖，原来里面装了四只盘子，都是小菜，还有一小瓶装得很考究的董酒。

看老教授一样样把菜肴摆到桌上，黎大品和覃泓都感到惊

讶，互相对望了一眼，黎大品赶紧上来拦阻：“杨老师，您这是……”

覃泓抱着肩站在他背后说风凉话：“还不明白吗？中国是礼仪之邦，素来讲究办红白喜事嘛！”

杨泽泗斜了覃泓一眼，第一次带着笑同她讲话：“这姑娘的一张嘴可真够厉害的了。”

覃泓反唇相讥说：“我嘴虽厉害，不过是说说而已，却不会搞小动作。”

杨泽泗旋开酒瓶盖，笑咪咪地反问道：“依你说，不敢肯定它是不是真正的化石树，我就帮你们硬说它是，这就算大好人啦？”

覃泓尽管谈锋甚健，一时也语塞。

杨泽泗斟了三杯酒，对他们两个说：“来吧，就算我是来办丧事的，这次白喜事办认真了，红喜事就不远了。”

出于礼貌，黎大品哪怕一百个不情愿，还是擎起了杯子。

覃泓是不受约束的，她说：“对不起，不能从命。我是从来不喝无名酒的。”

杨泽泗只得放下杯子，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厚厚的笔记本，戴上老花镜，一页一页地翻下去、指点着，说：“你们过来看。这是你找的这棵树与化石树资料的对比。我最近又详细地研究了第四纪冰川的材料。你们以为这棵树不是真正的化石树，就是失败吗？恰恰相反，这是胜利！经过鉴别，这棵树与化石树属于同一科。据我查阅中外文献证实，它们应当是有血缘关系的近族植物，打个譬方，就像人和猴子的差距。这两种植物原来是同宗，只是由于千百万年来高度、温度、湿度和日照的不同，使其中一支改变了生性、形态。我认为，在同纬度，在冰山洗劫过后的断裂带峪谷的特殊小气候里，肯定能找到真正的化石树！”

黎大品发暗的眼睛突然亮了，忙接过杨教授的笔记本仔细翻

着，又拿出自己的本子对照着。

覃泓终于看到她所希望看到的那种眼光：上进的、不屈不挠的……她笑着对杨泽泗说：“看来，我得给您恢复名誉了！”

杨泽泗说：“骂老滑头了是不是？这用不着平反，马老奸，人老滑，就是这样。”

覃泓开怀大笑起来，拿起一只杯子，坛一下，在杨教授的杯沿上一碰，一仰脖，喝了下去。

覃泓平时可以喝几杯啤酒，不过是和朋友们取乐，白酒却从来没动过。天晓得她为什么这样兴奋，一连喝了三杯。

杨泽泗走了以后，覃泓一边收拾碗筷，一边注视着埋头看资料的黎大品，故意把杯盘弄得丁当响。可黎大品连眼皮都不抬一下。

覃泓调皮地把筷子朝地上一掼，哗啦一声，这才使黎大品抬起头来，茫然地眨眨眼，发现覃泓脸色潮红地站在他面前。

黎大品问：“你，还没走？”

覃泓拾起筷子，就势蹲在他跟前，说：“喝醉了，你摸摸，我脸烧得烫人。”

黎大品是过来人，一眼就看见了闪烁在她眼中炽烈的光焰。他低下头去，说：“那，你回去休息吧。”

覃泓失望地噘起嘴，站起身，说：“我走了。”却站在那里不迈步。

黎大品巴不得她说这一声，赶紧说：“好。你不是明天走吗，快去收拾一下吧。”

“走？”覃泓说，“那是方才，现在我改主意了。”

黎大品吓了一跳，问：“什么改主意？”

覃泓说：“不走了！我要同你一起上山，去寻找化石树。”

黎大品怔了一下，马上说：“你以为杨教授的几句话，就能点起我心上的死灰吗？你过于天真了。是的，科学的成功，是我

向往的。但如果这成功只会给我带来痛苦，我宁愿当个碌碌无为的人。”

“你说谎！”覃泓嚷道，“你心里不是这么想的，你另有一本账！”

黎大品说：“那你就在这住上十天半月，乃至半年、一年，你看着好了。”

覃泓的心又凉了，在屋里呆立了一会儿，走了出去。

她一路上心神不定，看黎大品的样子，又像霜打的独根草一样一蹶不振，又觉得他是有意不说真话。她决定缓几天再走。

为什么不肯走呢？你是一个科学情报所的工作人员，哪里有成绩，你到哪里去，化石树、黎大品究竟和你有什么利害关系？除了那篇报道外，还有别的吗？

只有她自己明白，她即使人走了，心也早留在这里了，这可怎么办呢？

河畔围了好些芒寨的人，那里有一台流动售货车。她遇上过一次，是景洪百货公司的，一星期来卖一次货。

她突然想起什么似的朝售货车走去。

纯洁的灵魂安睡在瘴疠之乡

青青赤着膀子，头上戴一顶大竹笠，正和老阿爸、依江在竹楼里面的果园里割香蕉。今年的香蕉长得特别好，最小的一串都有10公斤，青青扛不动，在地上拖着走。

突然街上有人喊他：“青青——”

青青答应一声，看见篱笆墙叶子花间露出一张美丽的脸来。他回头对依江说：“你看，是覃阿姨来了。”

依江跑过去，打开篱笆门，覃泓抖开一套海军衫裤，还有一顶带印着金锚的无檐帽。

青青一下子跳过去：“这是谁的呀？”

覃泓说：“流动售货车来了。方才你爸爸给你买的，叫我给你送来。快穿上，看大不大？”

“不大！”青青没等试，就喊了出来，惟恐到手的衣服再飞了，惹得老阿爸和依江都笑起来。

人是衣，马是鞍，一点不假。青青一打扮上，可比从前精神多了，和百货商店橱窗里摆的时装模特儿一样好看。

覃泓说笑了一阵，吃了两根香蕉，告辞出来往回走。

刚走出不远，她看见黎大品手里甩着一件衣服，脚步轻松地走来。她认出，那件衣服正是她帮着缝补起来的，看来他是去看青青。

黎大品没有看见覃泓，像个毛头小伙子，走路带一股野劲。有一只别人丢弃的破竹篓扔在道上，他飞起脚，坛一下踢到小河里去；路旁一棵黑心树，树桠伸到路上，他顺手咋巴一声折断，也远远地扔下河去。看他那样子，好像他面前摆上一座大山，他也能一脚踢翻，有一身使不完的力气似的。

覃泓暗暗好笑，迎上去说：“反常啊，这么高兴？”

黎大品斜了她一眼，酒力已经褪了，脸颊的红云没有了。撒谎说：“是高兴啊！五六年没回去看看老妈妈了！现在总算有机会了，同志们和组织上照顾我，我也正好暂时改换一下环境，散散心。唉，这几年怎么过来的呢？别人都说我傻，可能有点傻吧……”

覃泓的心咕咚一下，像掉进了冰凉的河底。她再没有刺伤他的意思了，剩下的只有可怜。你能劝人家不去看妈妈吗？

停了一会儿，她问道：“定了吗？”

“定了。”黎大品说，“不会有人反对的。我去告诉青青一声，叫依江把他的换洗衣服准备准备。”

覃泓轻轻地闪到路旁，让他走过去了，一阵阵说不出的

惆怅……

但是，黎大品却感到分外轻松。他像甩掉了背上的包袱一样快乐，他可以无忧无虑地上山了。

当他从依江家竹楼里出来时，听覃怀元说，覃泓已经决定明天回昆明，他就更落底了。

说真的，黎大品多想去送送她，同她长谈一次啊！这姑娘的心，就像一块透明的水晶，一点杂质都不含！她有进取心，有正义感，有同情心，他看得出她对自己的感情开始逾越正常的界石，只要他向前靠拢一步，那就会……这怎么可能呢？黎大品想都不能往这上想，想一想，都是对她的亵渎。她几次三番试探自己的心，激励自己不要中辍事业。她的用心，难道自己看得出来吗？还有她给青青买的那套海军衫……

他觉得对不起这个纯洁的姑娘，伤了她的心，让她带着误解和失望踽踽凉凉独自离去，这未免太冷酷了。

可是，他只能这样办。覃泓是个点火就着的性子，她什么事都办得出来。她是不会搞什么迂回战术的，只要自己向她公布真实方案，那她肯定留下来不走。她只会把娄子越捅越大，把自己推向更深的漩涡。黎大品倒不在乎这些，只是他不愿花费哪怕百分之一的精力去从事事业以外的应酬。

可惜呀，他连送都不能送她一下，这几乎有点不尽人情了。有什么办法呢？只好将来写一封长长的道歉信，请她谅解了。好心人之间的误会只不过是朝露，太阳一出，就会消失的。

黎大品连夜找了覃怀元，又拉着杨泽泗当保驾的，说出了自己下一步的计划。覃怀元一百个赞成，并且答应保密，只说他上山去移植一棵望天树。

晚上黎大品不到7点就睡下了，他睡得香极了。当闹钟铃响时，才5点钟，天还黑着。

他连灯都没点，背起头天晚上收拾好的帆布背囊，带上干

粮、行军水壶，关好房门，来到小河旁。

依江早已收拾停当，在河边扣在沙滩上的大木船上坐着等他了。

选择依江当他的同伴，这是他灵机一动想出来的。本来他怕老阿爸不乐意，没想到老阿爸一口应承下来。

他所以没找所里的人，一是怕宣扬出去引起一些没意思的议论，二是本来没人愿意跟他去从事这种保险系数极小的行当。昨天商议定了以后，他再三嘱咐依江，不要对任何人讲起这件事，尤其不能向覃泓露半点风声。

现在，他和依江顶着熹微的晨光上路了。山野里静悄悄的，芒寨人们正在熟睡，鸡宁犬静，没有半点灯火。

天亮时分，他们钻进了真正的原始森林。这才叫名副其实的自然群落！

热带雨林可不像温带的山林那样疏朗，几乎形成一堵厚厚的绿墙！高大的带有气根、板根的树木真够奇特了，那板根很像为大树调整方向的拨风摆。大树底下是野芭蕉、野山芋，还有攀援到树上的羊蹄甲藤、龟背藤。最粗的藤条赛水桶，爬到树冠，再折过来向下爬，形成藤网。更有好多植物本来就是寄生在树干上的，真是树上有树。

想穿过热带雨林，那是十分艰苦的，前次砍倒荆棘走出来的小路，你只要3天不来，就又封得同铁蒺藜网一样密。

黎大品一直走在前面开路。他带着一把长柄砍刀，一边走一边抡圆胳膊左右挥舞，藤条、灌木满天飞舞。

依江一直跟他拉开一箭地的距离，不时地回头看看，每隔二三十米，总要在树干上砍上一个十字形标记。

有一次，黎大品回头看见，问她：“你砍记号干什么？回去我们从南麓联戈方向返回。”

“不是，”依江说，“我不是砍路标，我是试试刀口快不快。”

其实，依江在说谎。她砍的是路标，是给覃泓砍出来认路的。

覃泓并没有回北京。她确实打点好了包裹，但依江向她透露了黎大品的全部计划。依江所以违约，是她可怜这姑娘。她知道覃泓恨黎大品的“不争气”，她很怕别人曲解她的老师。

这一下招来了麻烦。依江本意是叫即将上路的覃泓放心，不要再怪罪黎大品，却没想到覃泓坚决要跟随他们进山。依江自知闯了祸，无论如何不肯答应。后来还是覃泓点子多，她说：“你偷着给我砍路标，我绝不把你出卖了，还不行吗？”

于是两个姑娘达成了协议。

依江心里一直不落底，生怕覃泓迷路。若是在这样森林茂盛的大山里迷了路，那是几天都转不出去的。

中午时分，黎大品和依江翻过一道山梁，来到一座更高的山峰下。黎大品将背囊朝草丛一扔，说：“休息，咱们该吃午饭了。你去拣点干松枝，我来砍竹子。”

依江奇怪，他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休息？对面的高山实际是造山运动形成的断裂层，笔直、立陡，像一刀劈出来的，仰视不见极顶。这座崖壁是纯白色的，像大理石堆成，崖上垂挂着粗细不等的羊蹄甲藤，崖顶长满密集的华山松、飞松和滇柏，像是给山崖戴上了绿色的假发套。

他们落脚的地方，是闷热的灌木丛，最多的是弥勒竹、苦竹和野芭蕉，还有少量的珙桐树，一条窄小的溪水从山崖根流过来，漫过积满腐叶的灌木丛下。

一般说来，上山的人最忌在灌木丛中歇脚，万一遇到猛兽袭击，没有高大的乔木可供攀援，那是危险的。可是依江没有驳回别人的习惯，没有吭声，去拣干树枝引火了。

黎大品砍了一根粗大的弥勒竹，剥下两节，在溪水中洗净，从米袋里抓出米来放到竹筒中，正要封盖，依江走过来，又

砍了一节竹子，也装上米，加了盐巴、腊肉丁。

黎大品问她：“怎么做三筒饭？”

依江点着火，抿嘴一笑，说：“我就不兴吃两筒？”

黎大品笑了，说：“看不出你这细弱的姑娘还有这么大饭量呢。”

依江也不吱声，待火烧旺，把三个封好的竹筒焙到火中烧起来。鲜竹筒被烈火一烤，沁出水珠，发出滋滋的响声。

黎大品在小溪里痛痛快快地洗了头、洗了脸，当他走回到珙栲树下时，依江已经把烧好的筒饭从火堆里拨拉出来。

黎大品垫上厚厚的芭蕉叶子，抓起两个竹筒互相一撞，只听一声脆响，竹筒同时从顶端一裂到底，露出两筒香喷喷的米饭来。

黎大品折了两根树枝当筷子，开始捧着竹筒吃饭了，却见依江心神不宁地回头望着。

黎大品问她：“你看什么？”

依江不做声。

过了一小会儿，在他们方才走来的小路上，响起一个女人格格的笑声。

黎大品正在惊疑，只见从苦竹背后走出一个人来，正是覃泓。她可能摔了跟头，脚步蹒跚，拉着一根青竹竿，头发蓬乱，沾满了草籽儿，漂亮的裤子划了两个三角口子。她的精神不坏，毫不在意，笑嘻嘻地来到了珙栲树下，大声嚷着说：“好嘛，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黎大品一下子全明白了！怪不得一路上依江落在后面砍路标，怪不得她要烧三筒饭，她们是合谋者！

黎大品无可奈何地说：“我以为你已经飞到昆明了呢。”

覃泓甩掉青竹竿，往草地上一坐，懒洋洋地说：“我那么容易甩掉吗？你别忘了我是搞情报的！”

黎大品说：“若不是我身旁出了小克格勃，你什么情报都不会有。”

覃泓开心地笑起来。

依江显然头一回听说“克格勃”这个词儿，眨着眼问：“你们说什么勃……是啥？”

覃泓笑得更响了，说：“小傻瓜！他诬蔑咱呢！克格勃是苏联的特务。”

依江也笑了。

覃泓从背囊里掏出一个鸭嘴绿方格图案的暖水瓶，向水杯里倒了点儿水，拿出一片药，递给了黎大品。

黎大品愣了！这不是从前妻子时青上山必带的鸭嘴水瓶吗？每逢饭前饭后，时青也是这样，拿过一片胃药，递上半杯开水……覃泓是怎样把这只摔扁了的暖瓶复了原、带在身上的呢？很明显，她一定是听所里的什么人讲了时青的往事，才有意用亡妻的遗物来试探他的，也许这是覃泓表白爱情的独特方式。黎大品不能不在心底称赞她的聪明，他自己却只能装傻。

他接过水和药，吞下去，只是说了声“谢谢”，仿佛根本没认出这水瓶来。

覃泓暗笑，也不揭破。她劈开一竹筒饭，闻闻，说：“别有风味，还真有一股青竹的香味呢。怎么样，是不是我应当做饭后忏悔呀？”

黎大品只顾低头吃饭，说：“你有你的事要干，何苦缠着我呢！”

“这就是我要干的事！你虽然骗了我，我却很高兴。”覃泓说，“我毕竟没有看错你，你是一条百折不回的硬汉子。为了这，你应当接受犒劳！”说着，她从挎包里拿出一听午餐肉罐头，卷去封盖，用小刀切割成两份，一份给黎大品塞到饭筒里，另一份二一添作五，依江一半，自己一半。

依江嚼着饭说：“你受了骗，还高兴？”

覃泓说：“好心的欺骗，比没出息的真话要值钱得多。”

黎大品一声不吭。他知道自己一搭话，覃泓的话就要一发不可收拾了。覃泓的神奇出现，照说他应当反感的，可他自己也纳闷，不但没有反感，反倒觉得充实、有趣，真是怪事。

忽然，一片大花瓣飘飘悠悠地落到覃泓的饭上。覃泓拈起花瓣一看，这叶子十分奇特，像巧手剪出来的艺术品！它有两翼，那形状很像一只振翅欲飞的鸽子。她仰起头来问：“这是什么树？花瓣像和平鸽。”

依江说：“你真会猜。我们都叫它鸽子树。”

黎大品说：“学名叫珙桐树。”

覃泓说：“鸽子能飞，好预兆，预示我们要起飞了！”

黎大品没有覃泓那么多的浪漫色彩。他吃完饭，把竹筒、筷子咚一声丢到小溪中去，洗了把手，弦外有音地说：“科学需要冷静、脚踏实地，不需要诗人的浪漫，也不要形象思维。”

覃泓说：“还是不欢迎我喽？是不是要赶我回去？”

黎大品说：“请便。不过，我希望你不再给我帮倒忙。”

覃泓冲依江挤了挤眼睛，说：“那好吧，我试着努力。”

黎大品站起身，看看太阳，对依江说：“多准备点干树枝吧，今晚在这儿过夜。”

依江说：“才中午啊……”意思是说还能赶一下午路呢。

黎大品没有出声，沿着小溪向前走去。他边走边采撷着遍地盛开的杜鹃花、山茶花。

钻出一片旱冬瓜树丛，黎大品跳过小溪，来到悬崖下。这地方地层断裂的痕迹更明显了，一层一层，可以看出亿万年前地壳变动时力的走向。这座石崖上，也吊着几根粗大的羊蹄甲藤，白云缭绕的山顶，有一群白色鸽子飞来飞去。

黎大品来到一片苦竹前，那里掩着一个圆圆的青冢，坟头爬

满七里香，枝蔓纠葛，几乎看不见坟土。这正是七里香盛开的季节，细碎的白花比茉莉、米兰大不了许多，但花香沁人心肺。

黎大品把采来的杜鹃、山茶花放到坟前贺得木树下。这棵珍贵的贺得木已经有5年树龄，茶杯口粗细，枝叶婆娑，在微风中飒飒作响。

没有什么像样的墓碑，只有一根削光了的滇柏插在坟头，上面写着这样一行黑漆字：“你安睡在古老的南诏瘴疠之乡，你的心血却点缀着繁华的人间。1975年10月为亡妻时青而立。”

这便是黎大品的朋友、同志、同学、妻子时青永远沉睡的所在。5年来，不论哪次进山，黎大品必定要走这条路线，他总来看看时青。

他坐在坟前，凝思着。他总忘不了那恍惚是昨天发生的一幕：

贺得木，同他们先后找到的龙血树、美登木、望天树一样，也和即将要找到的化石树一样，不仅具有很大的经济价值，而且对研究古生物、植物分类等，也有极重要的作用。

贺得木的样子并不奇伟、瑰丽，但为了把它从上万种植物的海洋中捞出来，他们做出了多大的牺牲啊！他的妻子时青不就是献出了生命吗！

那还是1969年珍宝岛事件的时候，上级给他们研究所下达了一项研究任务，寻找贺得木。贺得木在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绝迹了。它的木质中含有一种元素，可以提炼出高效抗凝剂。有它做润滑剂，坦克车可以在零下50度的酷寒中运转自如，而此前我们北方的坦克车却要天天烘烤！

他们一直找了五六年，没有找到。直到1975年，他们终于找到了第一棵标本，运回到植物园里却枯死了。于是决定再去移植几棵。

贺得木长在悬崖顶上，移植它难度极大。

那一天，是个大雨如注的坏天气，他们一行4人来到这座峭壁下。

由于头几天黎大品胃病发作，时青说什么不要他爬山，就和另一个小伙子担负了最艰巨的任务。

雨林里的雨，下得像瓢泼一样，叫人睁不开眼睛。黎大品看着时青和同伴把羊蹄甲藤缠在腰间，艰难地顺石崖向上攀登，时而两脚悬空，时而抵住石崖，从崖顶泼下来的空山水，就同黄果树的瀑布一样。

有谁能料到，拴着时青那藤子的老树出问题呢？由于暴雨的冲刷，本来扎根不深的树根开始摇晃，加上上面一个人的重量，终于连根拔起，眼看到顶的时青连人带树摔到了涧底，她连一句话都没有说出来，就咽了气。

5个年头过去了，黎大品耳畔永远回响着时青的那句话：“只有心死，那才是真的完了。”

是的，她的心没有死，只是形体消失了。

黎大品坐在坟前，仿佛又听到了时青的歌声，那是她自己谱写的曲子，是她在牛棚里第一次唱出的。她没有多少音乐天分，她不过把当地傣族小调稍加演化罢了。可是黎大品却觉得这首歌是人间最美、最动听、最壮丽的歌。是啊，这首歌没有歌颂什么，也没有抨击什么，只是如实地说出，这里是远离人群的地方。可只这一句，它包含了多少内容啊，那是只有黎大品才能够尽解的。

不知什么时候，覃泓来到了墓前。她默默地给死者献上一大抱杜鹃花。

两个人都不说话。彼此在想什么，那是无须用语言交流的。

覃泓也仿佛听到了回荡在山谷间的那首歌，是那样凄切、哀婉动人……

荣誉比碌碌无为更可怕

号称绿色植物王国的热带雨林，是令人向往的，望一眼都叫人心醉。不过，这只是对那些旅游、观光的人而言。假如你整年生活在山林中，在那里工作，就不会有这种美的享受了。

仅仅一个星期的跋涉，覃泓身上天然的浪漫色彩就被冲淡了。潮湿、雨雾，即便是晴天，大森林里也见不到阳光，身上永远湿淋淋的，衣服随时能拧出水来。风餐露宿，这4个字仍然有点诗意，不足以概括他们的艰辛。两瓶防蚊油抹光了，身上被各种叫不上名字来的虫子咬得红肿、破水，蓬头垢面，完全像个穴居的野人。

最可笑的是在一个晚上，趁他们熟睡的时候，来了一群淘气的金丝猴，把他们全部的粮食、压缩饼干洗劫一空。这以后，他们不得不过起猴子一样的生活了，吃酸丫果，吃野芭蕉心，吃生竹笋，吃野山芋茎，覃泓感到比鲁滨逊还要苦。有幸的是他们有3个人，不用驯化一个“礼拜五”来做伴。

现在是第9天的清晨，黎大品在野外日记上写了几笔后，跑到很远的地方采来一些野木瓜，还没熟透，但也能充饥。

覃泓像啃青萝卜一样啃着半生不熟的野木瓜，说：“将来，我要写一本游记，书名都想好了：为寻找绿色植物王国王冠宝石的旅行。”

依江笑了：“名字太长了。”

黎大品望了她一眼，心里好笑。她现在可是再也不注意修饰、美容了。披肩发用藤条绑成一绺，像锦鸡的尾巴拖在肩后，脸晒黑了，到处是伤疤，香水味早就没有了，一样是汗碱气息。

黎大品忍不住说：“我在等待你后悔，我随时准备送你下山去呢。”

覃泓说：“你太自负了吧？你以为天下只有一个黎大品吃得辛苦吗？”

黎大品正要答话，忽然站起来，仰着脖子向天上看，脑袋不时地转着。

“你看见什么了？莫非是护林站的飞机来了？”覃泓也站起来，仄耳谛听。

一片嘤嘤的鸣叫。

原来是一群土蜂，从香榧树林那面漫过来。还有一群从花间飞起来，正好和前一拨形成对流，后一群无疑是采了蜜回巢的。

黎大品兴奋地说：“走，咱们跟着蜂群走。”

覃泓问：“干吗？要去吃蜂蜜吗？”

黎大品说：“上路前，杨教授又特地找我一次。他说又查到了一份资料，说化石树下一般土质松软，有一种黑腰土蜂喜欢在化石树下做窝。你们看，这种野蜂的腰上不是有两道黑杠吗？”

依江早在花蕊里抓到了一只土蜂，果然是有黑腰的。

这条路更难走了。野蜂有翅膀，是直线飞来飞去，他们却要越山涧、爬石崖。人有时候不如昆虫！

一直追到下午两点钟，他们连午饭都忘了吃。

转出一片望天树和棕榈树林，黎大品突然发狂似的向峡谷断层那里奔跑起来。

覃泓和依江紧紧跟过去。

只见眼前是长满藻木的峡谷，黎大品正打着滚在草地上大笑，发疯似的喊着：“找到了，两性花……”

真的！连覃泓都认出来了。她见过这种树的化石。那棵有着对生厚叶，正开着小白花的灌木，多么像上次那棵呀，但这一棵树干光滑，有斑纹，果真和“假化石树”有别。

笑够了，黎大品带着眼泪抚摩着化石树，过了好一会儿，才拿出背囊里的小筒锹。

覃泓和依江也早忘记了疲劳，一齐扑过来帮他破土。

突然，黎大品把她们赶开，说：“这里有一个好大的土蜂窝，你们赶快躲到远处去。”

覃泓小时候被蜜蜂蜇过一次，脸上肿起鸡蛋大的包，过了很久，一下雨还发痒。她是深知蜂毒的厉害的。她向后退了几步：“那，怎么办呢？”

黎大品说：“用开水浇可以，可上哪儿去找开水呀？得几大桶呢！况且，也不够人道。”

覃泓笑了：“那是蜂道，不是人道。”

黎大品无心开玩笑。他围着化石树转了几圈，说：“只有一个办法，尽量在南面多挖点，争取不碰到蜂窝。野蜂也是讲理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覃泓又小心翼翼地走拢来观看。

黎大品说：“你们走开，我一个人来。”

覃泓不干：“你又没和野蜂订立互不侵犯条约。”

“下去！”黎大品把锹向地上一插，突然铁青着脸吼了起来，“站到200米以外去！”

覃泓第一次看到黎大品发火，而且比雷公那副模样还吓人。她知道黎大品是出于好心，只得拉起依江悄悄走开。

覃泓和依江没事可干，就在附近挖起野木薯来。这东西虽说不太好吃，毕竟含有大量的淀粉，不像吃水果那样干吃不饱。她们俩商量，把木薯焙烧得又红又软，单等化石树挖出来，叫黎大品饱餐一顿好上路呢。

覃泓哼起了小调。她比黎大品都高兴，总算不虚此行啊！

突然，拾干柴的依江“啊呀”地大叫一声，手里的柴火掉到地上。她喊着：“蜂子，蜂子……”

顺她手指的方向望过去，覃泓只觉得头皮一阵发麻，脸都吓黄了，两个姑娘吓得不知该怎么办好！

不用说，黎大品终于侵犯了野蜂王国，引起了众怒。只见黎大品正在山坡上翻滚，上衣脱下来拿在手中，这是他惟一的防身武器，上下左右抡着，引赶着密密层层扑向他的土蜂。

离老远就听得见嗡嗡声，土蜂简直倾巢出动，疯狂地围着在地下扑打的黎大品。

两个姑娘清醒过来，每人折了一根大树枝，赶上来帮忙。

可是黎大品在向她们喊：“站住，别靠近我，你们来找死吗？”

稍一愣神，覃泓就疼得一机灵，脖子和胳膊上已经被蜇了两次。

依江想了想，说：“把脸包上。”

覃泓被提醒，两个人把所有的衣服都包到头上、围在脖子上，然后抡着大树枝扑过去助战。

大战了半个钟头，土蜂战败，地上留下黑乎乎一片尸体，另外一群跟着蜂王向远处飞走了。

看看黎大品，已经少说被几百只蜂子蜇了，浑身上下，立时肿起来，脑袋肿得像笆斗。

覃泓吓得掉了眼泪，正要去扶他，黎大品自己爬了起来，倔强地说：“来，快点挖……蜂子蜇几口算什么？蜂毒还能治病呢！”

3个人用最快的速度挖出了带着大泥坨的化石树。

但是黎大品支撑不住，躺倒在山坡上了。

依江用竹竿、藤条绑了一副简易担架，说：“先把黎老师送下山去，蜂子都能蜇死老牛呢。”她一边说，一边吧嗒吧嗒掉眼泪。

黎大品死也不肯上担架。他气喘吁吁地说：“我自己能走，只是……累了。你们把……化石树抬下山去，别忘了时常浇水。从这里向东走，爬过一道山，就看见公路了，不要走回头路。”

说完，他昏沉沉地又躺倒了。

覃泓给他喂了几口水，对依江说：“我看，你快下山吧，连树也不要背下去，到公路上喊人来。”

依江含泪答应一声，拿起砍刀走了。

依江一走，山上突然显得空旷起来。山风呜呜地响着，远处不知什么野兽嗷嗷地叫，叫得人心里发怵。

黎大品梦呓般地叫着：“水……水……”

覃泓把他的头轻轻放到自己腿上，打开行军壶的盖，小心地喂了他几口水。

夜幕轻轻地、神秘地垂下来，森林里一片晦暗。覃泓又害怕、又焦急。她不时地去摸摸黎大品的脉搏，生怕他会死去。一想到死，她感到恐怖而又不可思议。她平生没去过太平间，只在电影里看过人死的模样、表情，说出最后的几句遗嘱，头一歪，便可以死了。她总觉得有点滑稽。但是，死，毕竟不只是一个概念，对于每个活着的人来说，都有一死，不过是迟早不同罢了。躺在七里香缠绕的土坟里的时青，当年不是和自己一样有血有肉、有乐有愁吗？一旦死去，就什么都不知道，世间的一切都不再与她有关联。

不，他不会死的，他有用，科学需要他……

覃泓不住地胡思乱想。他若是真的死了，自己会不会哭晕过去？会的，因为……一想到这里，覃泓的泪水早流下来了。她想像不出，一旦考察队和研究所的人听到黎大品的噩耗，会是什么样子？震惊？哀惋？叫着可惜？少不了要给他开一个隆重的追悼会，悼词里用尽人间的赞美词，不再有人提起他还有什么缺点，甚至会追认他为共产党员。

她觉得心中涌出一股又酸又苦的东西。她真不明白，是因为人死了不再威胁任何人才给他最高的赞美呢？还是只有盖棺时容易得出趋于公正的结论？

你尽想些什么？他怎么会死呢？！

覃泓已经想好，回去再写一篇文章，题目都想好了，就叫《成名之后》。她觉得几天来的所见所闻，具有普遍意义，到处都有发生这种事情的土壤，也许能给人一点启示。天才如果被敌人堂堂皇皇地扼杀，那是没办法的事；而大量的却是窒息在看不见的病毒里！啊，可怕的污染了的生物圈！更可怕的在于人们的不认识、无动于衷。

很快的，覃泓又推翻了自己的想法。愚蠢！你写什么文章？你和他已经不是萍水相逢的昔日，你不是要大胆地爱他吗？爱一个比自己差不多大 20 岁的男人吗？那么，你去写文章，不等于黎大品自己吹捧自己吗？

他会接受自己的爱吗？换句话说，他会爱自己吗？会的，这没有疑问。自己年轻、俏丽，有正义感……他又不是清教徒，他会不动心吗？但也有可能拒绝，爱是一回事，不敢爱又是一回事。年龄的悬殊就可能使他望而却步，他这种书呆子很可能会以为拒绝年轻姑娘的爱是“人道”呢！

过了一阵，黎大品醒过来了。当他看到自己枕着覃泓的腿，躺在姑娘怀里时，立刻紧张起来。他努力抬起头来，想挪到草地上去。

没能成功。覃泓伸出胳膊把他抱住了。她那柔软的乱发垂落到黎大品的脸上。

忽然，黎大品喃喃地对她说：“有一件事……你得答应我。”

覃泓的心怦怦一阵乱跳，她感到自己的脸像火烤的灼热。她俯在他耳边说：“你说吧，你什么要求……我都能答应。”

黎大品闭了闭眼睛，说：“依江已经答应了，下了山，就说化石树是她找到的。”

原来是这件事！

覃泓明白他的心，他接受了上次的教训，不想再过那种看别

人冷眼的日子，不得不想出个移花接木的办法来。她的眼睛又一次湿润了。

覃泓说：“这是何苦呢？你以为你屈服了，污染人们灵魂的病毒就会自消自灭吗？”

“你不懂我的心，”黎大品着急地说，“重要的是找到化石树，而不是张三找到还是李四找到。你还不了解我，我把那些……看得同晨雾、朝露一样淡……”

覃泓滴下泪来，感动地说：“我……照你说的办……”

漫长的夜晚总算熬过去了。天明时分，依江带着6个阿佤族壮汉赶来。她是在森林里碰上这几个猎人的。他们二话没说同她跑来，4个人负责抬担架，两个人轮流背化石树，在林子里走得风快，覃泓几乎空手都跟不上他们。

火山灰

真正的化石树找到的消息，令森林研究所考察队震动的程度，绝不亚于高能物理学家听到洲际弹道火箭发射成功。人们奔走相告，很快传遍了全队。如果说有说不出的遗憾，那只是获得成功的人，是个与森林科学毫不沾边的傣族小姑娘。

赵士函却一点都不沮丧。当她听到消息时，正在实验室里同搞培养基地试验的几个研究人员谈奖金问题，是李尚年拼命在外面敲玻璃窗子，把她叫出去的。

李尚年报告完了消息，却补了这样一句：“这真有点像买有奖储蓄，你下大本钱，可能连本儿都得不到，一个孩子只有那几块钱，一下子就中了头奖！”

赵士函扑哧一下笑了。她明白李尚年的意思，为不是研究所的人发现化石树而遗憾，仿佛一注到手的财破了，落到陌路人手中。

赵士函不这样看，她对李尚年说：“你的名利思想好重啊！问题不在于是谁找到，只要找到了，能给植物学这门科学填补一项空白，这对祖国、对人类都是了不起的贡献。”

末了，她嘱咐李尚年，马上找来一份黎大品没有定稿的论文底稿，她要连夜整理、写出论文来。

她才没有李尚年那种遗憾，越是与科学毫不相干的人找到，她越高兴，她可以再附上这样一笔：科研与群众相结合，又是一条经验，反正这个账都要记在她这个直接组织者的名下。迄今为止，谁敢说赵士函不是业务干部？从不从事业务无关紧要，她有一张大学毕业文凭，等于上了税那么保险。

黎大品上次寻找化石树的挫折，对她来说是件好事，去掉了潜在的威胁。她自己最清楚，要与黎大品比治学精神、比真才实学、比本领，她是甘拜下风的。多年来，她所以能够永远高他一头，保持优胜纪录，无非是政治条件的优越。她早在念大学时就入了党，从那时起，就打上了“红专”的戳记。她用不着像别人那样花力气，就比他们受重用。

近年来，这种天然的优越性日渐贬值。人们不再像从前那样偏重政治了，这使她感到内心恐慌。她有时也想一头扎进去，在事业上干出点名堂来。可她觉得好时光已经过去，底子打得不好，年龄越来越大，又离不开家，鼓不起勇气来。有时她真想顺从丈夫的意愿，调到机关去当个处长算了，她总算轻车熟路。

可她不甘心。她看得清趋势，业务的价码是一日高似一日的，她不能走下坡路。

在分类研究室里，惟一威胁她地位的就是黎大品了，杨泽泗可以忽略不计，他已近垂暮之年。论才干，论人品，黎大品都高于她，这是客观事实。他惟一缺的只是没有党员这块牌子，如同一只凤凰没有翅膀。

说良心话，黎大品是早就可以发展入党的了。赵士函打心眼

里不愿意给他插上翅膀。只要他在政治上也与自己平起平坐，那她就只能望洋兴叹了。好在思想不能上秤量，天地间又本来没有完人，多考验五年、六年，那都是无可非议的。

自从上次黎大品找到化石树以来，一个多月的时间，赵士函饱受了精神的熬煎。她觉得一直处在自己肩膀头下面的黎大品正在疯长，眼看要高出自己一头了！那么，提拔呀、出人头地的光彩事呀、出国啊，就都从自己手上飞走，落到他头上了。

这是赵士函无论如何忍让不了的。

现在，她可以垫高枕头睡大觉了！黎大品找来的化石树是真的！她真想狠狠奚落覃怀元几句！你看他前些天那个样子，黎大品成了他的掌上明珠。

还有那个讨厌的“钦差大臣”覃泓，还不是灰溜溜地走掉了！

赵士函甚至从党组内部知道，覃怀元是支持黎大品当所长后继人的，虽然他没有公开贬低她赵士函，抬黎抑赵，本身不就是贬吗？

她感到好笑，看你覃怀元现在还敢不敢坚持原来的动议！

现在，化石树真的找到了、成功了，功臣不是他黎大品！小小的山村丫头依江是上不了科学殿堂的。那么，到北京去宣读论文、去领奖，就历史地、理所当然地落到了她这研究室头头的肩上，没人能与她抗衡！

她刚从植物园归来。她和杨泽泗一起把化石树栽种下去，杨泽泗的话说得十二分肯定，这是真正的化石树，他甚至激动得落泪了。

赵士函也激动，直到现在心里还平静不下来，那股劲头，大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气概。

惟一忧心忡忡的是覃怀元。

这倒不是因为偏狭，也不是因为对黎大品的偏爱，他知道，

黎大品又二次深入雨林去寻找化石树了，覃怀元是惟一的知情者。为了避免麻烦，他答应，连覃泓都不叫她知道。他多么希望化石树是由黎大品找到啊！那对黎大品本人、对他覃怀元，都很光彩。可老天好像有意捉弄人，此时说不定黎大品还在山上苦苦寻找呢。覃怀元真有点可怜这个能干的学者了。

中午，覃怀元本想躺在竹榻上睡上一小会儿，可怎么也睡不着，脑袋里乱哄哄的。

突然，窗外探进一个小脑袋，是个傣族小男孩，他用不太熟练的汉语叫道：“有人找你。”

覃怀元跟着那个小孩子，一直向芒寨走去，问他是谁找，他只摇头。覃怀元有点纳闷，他猜想，可能是找到化石树的依江家请他去“谈判”，说不定要求得到报酬。报酬，理所当然要给的，但只怕要价太高，他一个人就做不了主了。

没想到，在寨外卜少河口站着等他的竟是覃泓！

覃怀元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没错，真的是她。她再也不是那样潇洒、漂亮了，脸黑黑的，爆起一层层白皮，轮廓瘦了一圈，眼窝深深地凹陷下去，像害过一场大病的模样。她浑身上下的衣服撕得一缕一缕的，赤着脚，像个落难者。

她没有回北京？

是的，她进山去了！也许就同黎大品一道出发的。覃怀元一时间，好像悟到了什么，有点激动。他走上去，眼里含着热泪，问道：“你……进山去找化石树了？”

女儿好像突然老练、成熟了，挂在嘴角的那种调皮的笑容不见了，代之而来的是无比的深沉。她站在竹林下，点点头，说：“我来告诉您的，是黎大品住院了，叫黑腰土蜂蜇得不轻，住在40里地以外的勐巛，您不想去看看他吗？”

覃怀元问：“那么，化石树是他找到的？”

女儿又深沉地点了点头。

别提覃怀元有多高兴了，仿佛黎大品就是他自己。他一边叫着“马上去看他”，一边埋怨说：“你们怎么能开这种玩笑？将来真相大白，所里的人会怎么想？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这样干？”

“这一连串问题提得是时候，”覃泓说，“我不想回答，这是留给您去思考的答案。”

覃怀元并不是地球生物圈以外的人，他用得着冥思苦想去寻找答案吗？他可以毫不费力地猜到这其中的理由。他虽然未必赞成黎大品和覃泓的做法，却也没有理由责难他们。

他走了几步，又趑回来，叫女儿先等他一会儿，他要回去备点果子露、罐头拿上。他不能空手去。

他买好了东西，又觉得不告诉赵士函一声不好，也应当叫杨泽泗知道。他叫人去分头寻找，自己站在卜少河边等着。

杨泽泗先到。他听完覃怀元说明原委，几乎没有什么不寻常的表示，但是，覃怀元却看到了他的泪水，虽然老先生抑制着自己，没有叫泪水流下来。

两个人在河边走了几步，覃怀元发现，山坡一片紫茎草丛中，有人刈倒一片，栽上了几棵团花树。覃怀元感到很奇怪，问道：“这是谁干的？不是说紫茎草中，什么植物都会被欺死吗？”

杨泽泗眯起眼睛，仰望着辽远的天空，慢条斯理地说：“一切都是相对的。正气上升，邪气就下降。有那么一天，生态会出现新的平衡，那，紫茎草就要绝迹了。”

覃怀元没有再问下去，他听得明白，这是借自然界来隐喻人类社会呀。

杨泽泗突然问了这么一句：“报上去了吗——假如不保密的话。”

虽然他问得含蓄，覃怀元还是明白了，他是指接班人的人选。保密倒是保密的，可是覃怀元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对杨泽泗这样的人保密，似乎良心上有点说不过去。

但他也没有把话说得过于直白，只限于两个人都能意会的地步：“报了两个，你能猜得到的。”

“那么，到底哪个可能性大些呢？”杨泽泗有些得寸进尺了。

覃怀元轻轻地叹息了一声：“这个，那是连我也猜不到的。”

杨泽泗一笑了之，没有穷追下去。其实，连杨泽泗也猜得到，何况覃怀元？

赵士函姗姗来迟，见覃怀元提着果品篮子，便问道：“所长是要走亲戚吗？”

覃怀元说：“咱们一起去勐蠡医院看看黎大品吧，他叫土蜂蜇了，很重。”

赵士函有点发愣：“这是怎么回事？”

覃怀元总不能用女儿对自己那种口吻奚落别人，他说：“黎大品是真正找到化石树的人，他是故意叫依江出面来领功的。”

一霎时，赵士函的脸色很难看，眼前发黑，好像预感到世界末日到来那么心悸。她镇定一下自己，好半天，才愤愤地说：“这是干什么？搞这样的恶作剧，是同组织开玩笑吗？”

这一回，覃怀元可是不假思索地照搬了女儿方才那一句：“这是留给我们思索的答案啊！”

赵士函不敢看覃怀元那双眼睛。她觉得那冷森森的目光已经洞穿了她的心，自己努力经营的一切，都像飓风中的烂蛛网一样，被吹得七零八散了。

她觉得骑在身下的死火山终于爆发了，大地在震荡。而她自己，正随着上升的岩浆熔解，直到变成僵冷的火山灰！

任何故事都有个结尾，但这个故事不好虚构结尾，因为生活在生物圈里的人，正在意识到，铺在他们脚下的路还很长、很长……

(原载 1982 年 3 期《收获》)